

建党以来
重要文献选编

(一九二一—一九四九)

第十五册

建党以来 重要文献选编

(一九二一——一九四九)

第十五册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编
中央档案馆

中央文献出版社

目 录

- 怎样动员群众积极参战·····董必武 (1)
(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
- 怎样进行持久抗战?·····周恩来 (6)
(一九三八年一月七日)
- 论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战术——袭击·····毛泽东 (15)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日)
- 中共中央关于发动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
等问题给山东省委的指示····· (28)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五日)
- 怎样渡过抗战的困难时期·····任弼时 (31)
(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二日)
- 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关于战术原则的训令····· (43)
(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五日)
- 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与野战政治部
关于整军的训令····· (47)
(一九三八年二月一日)
- 毛泽东同《新中华报》记者其光的谈话····· (49)
(一九三八年二月二日)
- 关于抗日游击战争中的政策问题·····刘少奇 (65)
(一九三八年二月五日)
- 毛泽东在延安反侵略大会上的演说····· (75)
(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一日)

- 毛泽东给范长江的信 (77)
（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五日）
- 毛泽东、滕代远关于一一五师向河北、山东
等地进军问题给朱德等的电报 (79)
（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五日）
- 项英关于部队改编等问题给中共中央长江局等
的报告 (81)
（一九三八年二月十六日）
- 毛泽东关于力争建立长期抗战的主要战略支点
问题给朱德等的电报 (88)
（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一日）
- 关于武装农民问题 徐特立 (90)
（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二日）
- 毛泽东、任弼时关于保卫西安、武汉的战略计划
及我军将来之行动给朱德等的电报 (95)
（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三日）
- 论抗日游击战争 朱 德 (98)
（一九三八年）
- 毛泽东同合众社记者王公达的谈话 (133)
（一九三八年二月）
- 晋西北抗战经过概述 贺 龙 (138)
（一九三八年）
- 毛泽东关于巩固河防的部署给朱德等的电报 (145)
（一九三八年三月二日）
- 张闻天关于目前上海工作方针给刘少文、刘晓的
电报 (147)
（一九三八年三月四日）
- 毛泽东关于有计划地部署晋豫边的游击战争
给朱瑞等的电报 (148)
（一九三八年三月六日）

- 附：朱瑞关于晋豫边工作布置情况的报告 (149)
（一九三八年三月三日）
- 毛泽东关于军委指导只提出大的方针
给朱德等的电报 (151)
（一九三八年三月八日）
- 毛泽东关于八路军应准备转战陕甘豫地区
给朱德、彭德怀的电报 (152)
（一九三八年三月九日）
- 论山西战局 叶剑英 (155)
（一九三八年三月九日）
- 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 陈绍禹 (158)
——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
（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一日）
- 中共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 (186)
（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五日）
- 中共中央关于征收党费的通知 (188)
（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五日）
-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目前时局与党的任务
给刘晓等的指示 (191)
（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一日）
- 华北战区工作的经验 刘少奇 (193)
（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一日）
- 张闻天等关于冀晋豫目前的中心任务
给朱瑞等的电报 (215)
（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四日）
- 毛泽东、刘少奇关于组织以八路军名义出现的
游击兵团给朱德等的电报 (217)
（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四日）
- 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电 (219)
（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五日）

- 附：中共中央长江局关于对国民党临全大会建议问题
给中央书记处的电报 (222)
(一九三八年四月二日)
- 论游击战与运动战 刘伯承 (223)
(一九三八年三月)
- 中共中央关于党报问题给各地方党委的指示 (232)
(一九三八年四月二日)
- 张闻天等关于在山西进一步开展统战工作
给陈光等的电报 (233)
(一九三八年四月二日)
- 论青年的修养 张闻天 (235)
(一九三八年四月十二日)
-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对国民党临全大会宣言与
纲领立场的指示 (255)
(一九三八年四月十八日)
- 中共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 (256)
(一九三八年四月十八日)
- 中共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党内报告大纲 (257)
(一九三八年四月十九日)
- 毛泽东等关于巩固与发展晋察冀根据地问题
给聂荣臻等的电报 (263)
(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日)
- 毛泽东等关于发展平原游击战问题
给朱德等的电报 (266)
(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一日)
-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国民党临全大会后的策略问题
给陈绍禹、周恩来、秦邦宪、何克全的电报 (268)
(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七日)
- 毛泽东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 (270)
(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八日)

- 陈绍禹、周恩来、秦邦宪答复子健先生的一封信
公开信 (275)
(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八日)
- 附：子健同志给陈绍禹、周恩来、秦邦宪三同志的信 (286)
(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六日)
- 毛泽东关于放手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等问题
给项英的电报 (289)
(一九三八年五月四日)
- 张闻天、刘少奇关于建立晋东南党的领导中心
给邓小平等的电报 (291)
(一九三八年五月四日)
- 中共中央关于组织青年工作委员会的决定 (292)
(一九三八年五月五日)
- 毛泽东关于不赞成《大公报》准决战论调
给陈绍禹等的电报 (293)
(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三日)
-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新四军行动方针
给长江局等的指示 (294)
(一九三八年五月十四日)
-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加强领导乡村游击战争、
创立游击根据地问题给江苏省委的指示 (296)
(一九三八年五月十四日)
- 陕甘宁边区政府、第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布告 (297)
(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五日)
- 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
工作和任务 任弼时 (300)
(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七日)

- 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
决议案 (338)
(一九三八年六月)
- 开展河北的游击战争 徐向前 (344)
(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一日)
-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徐州失守后长江以北工作
给长江局的指示 (350)
(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二日)
-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毛泽东 (352)
(一九三八年五月)
- 论持久战 毛泽东 (381)
(一九三八年五月)
- 论华北正规战的基本教训与游击战争的
发展条件 林彪 (450)
(一九三八年五月)
- 毛泽东关于新四军可放手在敌后活动
给项英的电报 (466)
(一九三八年六月二日)
- 新四军的昨天和今天 项英 (467)
(一九三八年六月十五日)
- 中共中央关于中共十七周年纪念宣传纲要 (475)
(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四日)
- 毛泽东同世界学联代表团的谈话 (477)
(一九三八年七月二日)
- 论在敌人后方工作 彭雪枫 (484)
(一九三八年七月二日)
- 我们对于国民参政会的意见 毛泽东等 (491)
(一九三八年七月五日)

- 中共中央为抗战一周年致蒋介石及全国抗战
将士电 (495)
(一九三八年七月六日)
- 陕甘宁边区政府一年来的政况 林伯渠 (497)
(一九三八年七月七日)
- 刘少奇关于晋察冀根据地工作给聂荣臻、
彭真的信 (508)
(一九三八年七月十日)
- 毛泽东等关于对阎锡山的统战工作问题
给朱德、彭德怀等的电报 (517)
(一九三八年七月十四日)
- 论秘密工作及其与公开工作的联系 刘少奇 (519)
(一九三八年七月二十二日)
- 张闻天等关于我们在抗战过程中的总方针
给陈绍禹等的电报 (537)
(一九三八年八月六日)
- 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 (538)
(一九三八年)
- 毛泽东等关于晋察冀边区货币政策
给聂荣臻等的电报 (540)
(一九三八年八月十七日)
- 关于党内教育问题 刘少奇 (542)
(一九三八年八月十八日)
- 毛泽东等关于对阎锡山取消战委会的态度及
对山西新旧派的方针给彭德怀等的电报 (545)
(一九三八年八月二十二日)
- 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声明 (547)
(一九三八年九月)

- 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定 (550)
- 国际指示报告 王稼祥 (553)
- （一九三八年九月十四日）
- 论干部政策 陈 云 (557)
- （一九三八年九月）
- 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开幕词 张闻天 (570)
- （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
- 论新阶段 毛泽东 (573)
- 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
- （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二日——十四日）
- 论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 彭 真 (655)
- （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三日）
- 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与党的组织问题 张闻天 (665)
- 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提纲
- （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五日）
- 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 毛泽东 (713)
-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五日）
- 关于抗战中职工运动的任务 林育英 (716)
- 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发言的一部分
-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五日）
- 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致蒋介石电 (729)
-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五日）
- 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致东北义勇军及
全体同胞电 (731)
-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五日）
- 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致八路军、新四军电 (733)
-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五日）
- 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致日本共产党电 (735)
-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五日）

- 战争和战略问题 毛泽东 (737)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
- 党规党法的报告 刘少奇 (749)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
- 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 (755)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
- 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
规则与纪律的决定 (766)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
- 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
规则与纪律的决定 (771)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
- 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各级党委暂行
组织机构的决定 (774)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
- 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召集第七次
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 (777)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
- 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告全国同胞、全体
将士和国共两党同志书 (779)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
- 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闭幕词 王稼祥 (784)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
- 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中原局委员会的通知 (785)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九日)
- 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北方局及分局委员的通知 (786)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九日)
-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冀南工作的指示 (787)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毛泽东等关于建立大青山游击根据地及党的政策

给周士第等的电报 (789)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毛泽东等关于冀热察区工作的意见

给朱德等的电报 (791)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陈绍禹等关于同蒋介石谈话情况

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报告 (793)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三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彭德怀同蒋介石谈判内容

给陈绍禹等的指示 (795)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怎样动员群众积极参战*

(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

董 必 武

五个月余的抗战，我们虽不像民族失败主义者一样，只看见军队伤亡的众多，领土丧失的广大，而获得有民族觉醒、国家统一等不可磨灭的成绩；但军事上部分的失利，是不容讳言的。这种军事上部分的失利虽是暂时的，不能认为抗战就失败了，但失利总是失利，我们不应当悲观失望，而应当细心地研究失利的原因。

为什么我们抵抗日寇的进攻，军事上会有部分的失利呢？其中自有客观的和主观的原因。我们撇开客观的原因不讲，单就主观的原因来说，广大的群众没有积极起来参加这次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实为许多原因中的一个极重要的原因。广大群众没有积极起来参加这次的抗日战争，不是少数人或某一部分人这样指明，而是极大多数人都有这种感觉。至于报章杂志、小册传单指出这种战时病态的，更是数不胜数。若把这次群众对抗战的态度拿来和民国十五、六年群众对北伐军的态度相比，不管他是什么人，总不能不觉得是两样，总不会不有今昔之感吧！特别是参加过国民革命军北伐之役的人们，看了目前群众对抗战的情形，这种感觉就更为痛切！

有人忌嫌群众运动，以为群众起来不过是散传单、贴标

* 本文原载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出版的《群众》第一卷第四期。

语、开大会、喊口号、列队游行示威而已。具这种思想的人，至少他看掉了或者故意抹杀了几件小事：即战时群众起来不仅要散传单、贴标语、开大会、喊口号、列队游行示威，还要为革命军队烧水送饭、引路探信、运军需、捉敌探、抬伤兵、打扫战场、武装游击扰乱敌人后方两翼等等。群众没有起来，固然没有散传单、贴标语、开大会、喊口号、列队游行示威等类令某些先生讨厌的事，却也没有人为革命军队烧水送饭、引路探信、运军需、捉敌探、抬伤兵、打扫战场、打游击牵制敌人等等。《大公报》在十月十一日社论中曾经指出目前抗日战争中这样一种状况：“本国的军队在本国领土内与外敌作战，竟如荒岛行军，看不见民众；有了民众的行动，却是敌人的奸细！这样情形，如何可以保证我们抗战的最后胜利？”是的，这样情形不但说不能保证抗战的最后胜利，而且也难保证抗战的初期胜利，五个月余的抗战，不更加证明这是一个真理么？

这次抗日战争是我们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我国群众为什么不积极起来参加呢？是不是我国群众特别不爱国，不爱自己的民族呢？决不是的。中国的群众是很爱中华民国和中华民族的。在卢沟桥事变以前，爱国歌曲已很普遍流行，救国公债的推销，慰劳物品的募集，无一不得力于广大群众的努力。这些都证明广大群众是如何地热烈爱护中国和中华民族呵！然这次抗战群众确实没有积极起来参加，是不是因没有人做群众运动呢？也不是的。抗战一起，各地各业的抗敌后援会如雨后春笋一般，通都大邑，穷乡僻壤，到处都成立抗敌后援会，到处都挂起了抗敌后援会的招牌。这不能说没有人做群众运动。

有人做群众运动而群众还没有积极起来参加抗战，这不是由于怕群众起来，不敢放手去动员，即是由于对群众没有信心而懒得去动员，或则是由于动员的方式与方法成为问题。

如果怕群众起来，不敢放手去动员，这样自然做不动。

但目前群众的起来，为的是救中国，为的是抵抗日寇的进攻，为的是拥护政府的抗战，而不是与国防政府来对立。政府领导着群众抗战，怕这种群众的应当是日本帝国主义而不应当是中国人。

如果对群众没有信心而懒得去动员，自然也无法发动群众。群众中蕴藏着无限的力量，一切社会的困难问题，只要依靠群众都能获得适当的解决。如中国目前最困难的问题，是兵员的补充赶不上，假使把群众动员起来，在四万万五千万人中征调二三十万壮丁，纵然不是一呼立就，也就不须要三令五申了。

五个月余的抗战过程，已把某些人惧怕群众或不相信群众的心理改变了许多。坚持抗战下去，政府军队愈需要与群众合作而逐渐能与群众打成一片。

不怕群众，相信群众，还不能把群众动员起来，这就令我们不得不考虑动员的方式与方法的问题了。

过去群众不积极参加抗战，首先就是由于政治动员的不够。卢沟桥事变以前，爱国尚有时被视为犯罪。抗战一起，没有广泛地和深入地做政治宣传解释工作。武汉大学一位女生告诉我，洪山附近的一个种菜的人不知道现在中国同什么人打仗，有个别部队士兵中尚有不知道同什么人打仗、为什么要打仗的。中央某校是以造就国防军队中下级干部为宗旨的，在中国抵抗日寇侵略已三个月，据说还不准学生们唱爱国歌与义勇军进行曲。政治动员薄弱到这种程度，群众不知道政府要干什么，及为什么要这样干，动员不会生效又何足怪呢？

其次，是缺乏组织上的动员。城市学校在战争紧急关头，依然照旧上课，乡村农民老少男女没有组织起来，工人虽一部分人加入工会，很少有开会的，甚至号称领导群众团体的政党，有很多下级党部没有开过会。依靠组织去动员，很多地区

几乎可以说完全没有这回事。

复次，动员方式采取虚应故事刻版式的办法。各级都组织宣传队。宣传队所持的宣言标语都是从上而下规定出来，口头所讲者，不管群众感受如何，老是自己预定的一套。你说没有动员么，各省各县都有很多人在奔走，你说动员了么，群众许多还是不愿参加抗战。

目前怎样动员群众积极起来参加抗战呢？我以为下面几个问题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第一，各抗日党派和各救国团体，在动员民众和组织民众工作上，必须共同计划、共同工作，统一组织、统一行动，不应有包办独占、排挤朋友的企图，应当把动员民众积极参加抗战作为高于一切利益的神圣事业。

第二，各党各派须把国民政府迁都的宣言和蒋^{〔1〕}先生告国民书以及国共两党其它一切有关于抗战的重要文献，在群众中作普遍的宣传和解释，要使千千万万的群众，不管老的少的，男的女的，文化程度高的或低的，职业部门同的或不同的，都懂得日寇怎样侵略中国，现在侵略到什么程度，日寇是怎样的凶残和狡猾，亡国奴殖民地是如何的痛苦，提高全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和爱国心，使全国人民在国防政府和最高统帅一声号召之下，即能担负起其应尽的责任，参加正规军，组织游击队，抬担架运伤兵，运输接济，肃清汉奸，打扫战场，增加生产，提高文化等。

第三，宣传解释国府迁渝蒋先生告国人书，应首先在有组织的群众中进行，工会、商会、农会、青年、妇女、文化界、宗教团体、慈善团体、学校、兵营、商店、工厂、作坊、农村等等有组织的应使之充实活泼，将已有组织的人尽量吸收到原有组织中去，没有组织的应把他们组织起来，有地方武装的群众须经常给以政治和军事的训练，使之成为国防政府的真实

基础。

第四，宣传解释的方式，露天大会、剧院电影场的集会、少数人的座谈会、个人谈话等方式可因时因地适当的采用。

第五，作群众政治动员时，必须联系到群众本身的生活问题，须按照各地方、各阶层、各职业的人在抗战期中提出适当的口号。群众要求过高时，须多方解释使他们明了过高的口号提出之不适当。

除上述几个问题以外，还有动员群众须使群众能动为条件，这就须要政治上有相应的民主与自由，经济上要能减轻其若干负担，军队须能与群众发生良好的关系，这样去动员群众参战，没有不可动员起来的。

根据法律出版社一九九〇年出版的
《董必武统一战线文集》刊印。

注 释

〔1〕指蒋介石。

怎样进行持久抗战？*

（一九三八年一月七日）

周 恩 来

—

只有持久抗战，才能争取最后胜利，这是抗战五个月中最主要的教训！

五个月前，抗战初起，我们即主张坚持长期抗战，决定最后胜负的方针。但当时未尝不有人设想：上海战役可以幸胜，日寇侵略可以限于局部，国际大战可以立即牵动。等到抗战经过五个月，察绥沦亡，保定、太原、上海相继失守，最后首都亦复陷落，认明抗战既不可幸胜，国际大战亦非轻易可以牵动，于是这些人便设想调解或可找到出路，屈服或可停止日寇前进，日寇汉奸又从而利用之，因此，和平妥协的主张，便一时甚嚣尘上。然而日寇的贪欲，却是无止境的。日本阁议对于中国的屈服主义者的幻想，算是给了当头一棒，而蒋^[1]先生的告国民书（十二月十七日），更安定了浮动惶惑的人心，击破了一切和平妥协自甘退屈的主张，坚持着贯彻抗战到底求得最后胜利的基本方针。

本来这个基本方针早就定下了的，但是由于战局的变化，由于对于怎样执行这个基本方针，过去没有很好地阐明和贯

* 本文原载一九三八年一月八日出版的《群众》第一卷第五期。

彻，致一部分人对于这一基本方针发生动摇，失去信心，并表示无办法，另有一部分人便因之发生埋怨和愤慨。这是抗日阵线内部生长着离心和动摇的现象。现在为消灭这些现象，贯彻持久抗战的基本方针，就必须对于怎样进行持久抗战，提出更积极更具体的任务，号召和动员全中国的同胞，为实现这些任务而奋斗。

二

要回答怎样进行持久抗战的问题，首先须认清：抗战五个月中的主要的经验和教训是些什么？

第一，这次对日抗战是中国海禁开后近百年来所没有的。以两个敌对的党——国民党和共产党，武装斗争了十年，一旦团结御侮，走在一条战线上杀敌；以一个尚未完全统一的政府，一个尚未完全统一的军队，一旦决心抗战，无问南北东西，都一致行动，一致奔赴前线；以许多装备不完善的军队，许多尚无组织训练的新兵，继续向前线输送，前赴后继地牺牲。这种统一团结的意志和英勇战斗的精神，是我们抗战中的伟大成绩。如果从此长期坚持下去，并扩大和发扬起来，将基本保障着中华民族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强盗。

第二，这次抗战几乎可以说以无甚准备的中国，抵抗准备了四十多年的日本。毫无疑问的在战争初期，日寇是尽量发挥他们准备好了的长处，而我们则到处都发现我们没有准备或是没有准备好的短处，以致遭受军事上的失利。从军事对比上看来，中国国防力量与技术条件，就大大落后于日本；经济对比，亦不相称，尤其是军事工业与运输，我国居绝对劣势；在政治上，日本取得了中国汉奸托派和亲日分子的内应，而中国则还没有取得日本内部反战运动的响应。本来我们并不反对抗

战需要准备，只是内战不停，抗战无从准备，即有准备，也要对消掉了。内战停后，日寇又不让我们准备。故我们对抗战的准备，只能在长期抗战中来完成，一边抗战，一边准备。以西班牙那样国家，被佛朗哥一直打到马德里，还能在坚持抗战中组成了新式军队五十万，构筑起新式防御工事，建立了现代化的军事工业，并且能做到制造飞机，自装坦克。我国地大物博人多，战争的条件还没险恶到马德里被困的状态，我们的长处是可以在持久战中发扬和增加起来的。特别是民众动员，愈因战争延长会愈加深入；军队作战，愈因持久，会经验愈丰，改正愈多；军事工业和军事交通，愈因持久会成就愈大。在日寇方面，则因它的短处，在于财政困难、军事工业原料缺乏、国内矛盾增长、后方不巩固、远东形势陷于孤立等等，如果战争持久，战线延长，它的兵力将不够分配，它的短处将日益暴露，它的长处将逐渐减少。

第三，这次抗战以中国军队装备技术的落后，竟能给敌以极大的损伤（敌我伤亡约一与三之比），使敌人不能依其预定计划实现，直到现在，日寇在中国的北方及东部仅占有沿铁路和公路的城市，而广大的北方及沿海地区仍在我手，这不能不归功于中国军队将士的英勇和某些军队（如八路军等）的机动，以及日本军队不善于山地战与不够分配等原因。但我们虽不赞成唯武器论的观点，然而军队技术的提高，装备的现代化，是迫切需要的。没有装备好的技术高的政治坚定的现代化的几十个师，是不能最后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

第四，这次抗战，我国军队能在狭窄的上海地区，吸引敌军至十余师之众，坚持至三个月之久，引起全中国民众、全世界同情我们的人士的拥护和称赞，这是伟大的成绩。但以我军的装备和技术条件的落后，阵地战尚非我们特长，当时我军如能抽出相当数量和质量好的部队，转移北方的战场上去，则在

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的把握，当较东战场为多，北方的战局也许更能开展。现在沪、宁失陷，我军今后作战将更便于发挥我中国军队在山地战运动战中的特长，但这并不是说阵地战就不要了，没有某些支点和要塞的顽强防御，便不能吸引和暴露敌人的兵力，阻止敌人前进，使我主力部队得以进行突击；但这也不是要将以游击战争为主力了。运动战是正规战的一种，并不是游击战，游击战是配合正规战的一种主要的辅助战。只有在敌人占领和包围区域，主力部队不易立足和不易集中行动的条件下，才以游击战争为主，游击战争本身是不能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要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不仅要发挥我军在运动战中的特长，并且要在提高技术条件和军队现代化的基础上，使我军转入阵地战的壕沟工事里去。

第五，这次抗战表示出我国军事指挥的开始统一和集中。我国最高统帅决心的坚强，与许多高级将领指挥的坚决，是值得称赞和尊敬的。但是，现代战争是一个有组织的科学战争，特别在中国的军队复杂、地区辽阔、交通不便、补给不济的条件下，在敌我军事力量强弱的对比下，更需要有计划地组织战争。因此，在指挥上，一方面需要全国的统一和集中；另一方面需要分工，需要依据一定的战略计划授权与各战区，使之能机断专行地独当一面，小而至于一师一旅一团一营，都要能依据当前情况，授以机断专行的权力。在补给上，依据敌人深入的情况，也要有分区自给的办法，尤其在敌人占领区域及其周围，更要有独立专行的作战区分。这一切都是过去抗战中没有完满进行的，并且有时候因为指挥系统的混乱、重复、无权和受限制，使某些战役遭受不应有的损失，这是应当立即改正的。

第六，这次抗战，我们应当称赞某些部队补充的迅速、新兵参加前线的勇敢与某些民众团体及个人参加战地服务的勤劳，但我们同时应当指出：过去民众运动还没有以动员参战为

一切工作的中心。首先征募兵役的机关，便有保安司令、师管区、军训委员会等等的重复组织；征募的方法，多带强迫性而缺少宣传鼓动与解决优待抗日军人家属的具体办法。在民众运动中，不论指导机关、民众团体与个人，对于动员新兵上前线，动员青年学生受军训、入军校，动员一切民众参加战地服务，推销公债，都还没有造成广大的动员热潮，这不能不说是抗战五个月中的一个损失。

第七，由于抗战的英勇与坚持，已经使国际同情中国的运动发展，使友邦的赞助增加，但应当指出：过去我们还没有尽量运用国际的有利条件，来增强自己抗战的力量，反而有时散布一些不应有的幻想和依赖情绪，转至丧失了中华民族自力更生的信心。目前最能运用的有利条件，一方面是扩大国际宣传，取得全世界工人阶级及一切爱好和平人民的精神上、物质上乃至技术上的援助；另一方面应加紧建立军事工业，加速军事交通建设，以便尽量利用友邦的援助，更强地武装起来。

第八，这次抗战是进行了肃清汉奸的工作，并取得部分成绩的，但严重的问题，却不在于肃清一般的小汉奸，而在于某些特殊化的思想、汉奸的理论、亲日派的活动，特别是日本侦探托洛茨基匪徒的言行，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制裁。这就使我们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容易受人利用挑拨，发生误会磨擦，特别是抗日的前线和后方，容易被日寇所利用，进行军事上的阴谋，张慕陶在山西的行动和王公度等匪徒在广西的阴谋，便是明证。

三

根据上述的这些主要的经验和教训，很清楚地可以看出：

决定持久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的基本条件是获得了，现在的困难是要依据与发展现有的力量和基础，阻止敌人的深入，以渡过这一青黄不接的难关，以准备决定胜负的战斗。具体的办法，我们认为应当是：

第一巩固前线——在蒋委员长坚决意志之下，要坚强北方、津浦及东南各战线将士在那里持久抗战的决心，要认识敌人愈深入愈困难的真理，确定各战线的作战部队、作战地区与作战基地，确定全国统一的作战计划，并严格遵守各作战地区在统一计划下的相互配合行动。残破的部队应调在后方整补。留在战区的应缩小庞杂的单位，使之适宜于发挥运动战、山地战的特长，改变过去某些时候专守防御的战略战术，尽一切可能求得在广大地区以运动战消灭敌人，阻止敌人的前进，万一敌人突破某些支点，必须抛弃过去前线后撤的办法，在正面留下钳制部队，坚守纵深配备的支点，将突击兵力转移到敌人的侧面后方，寻求新的机动，以迟阻敌人的继续深入。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我们全线溃退，敌人跟踪而入的危险；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危险；只有这样，才能争取时机，渡过目前的难关。太原失陷后两个月来，敌人不敢南下临汾，主要的因为有八路军、十三军及一部分晋绥军在它的侧面后方威胁吸引所致，这是最值得效法的例子。

第二建设新的军备——在最短期内，在现有的军队基础上，要决心建立几十个有新式武装的和政治坚定的国防师。为达到这一目的，这些国防师的编制，必须适合于对日作战和新的技术条件。这些国防师的干部，必须以有抗战经验的军官作骨干，并迅速培养和训练大批的青年军政干部。这些国防师及其干部的教育，必须特别着重于实战经验的联系、技术条件的提高与政治训练的加紧。这些国防师的生活和待遇，必须从健全政治上，做到政治上官兵平等，军民一

致，连队上经济公开，废除打骂制度，实行自觉的严格纪律。只有这样，才能造成坚强的革命军队；只有这样，才能最后地完成统一指挥、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补给和统一的作战计划；只有这样，才能与敌人进行决定胜负的战斗。

第三建立军事工业——为提高军事技术，最后战胜日寇，必须集中各种专门人才，建立统一的国防工业。依据目前可能的条件，我们应迅速地适当地分布军事工厂于一些安全而便于制造和运输的地区；应有计划地集中生产于某些急需的部门；应加强国防工业各部门对于这些生产必要的配合；应集中现金负责地购置必要的军火与制造兵工的器材；应用国内外专门技术人才，迅速建立制造或装置新式的军事器械。特别重要的，应迅速打通和巩固西北与西南的军事交通，以便利和加速一切军事上的运输。

第四发展敌人占领地区的广大游击战争——依据敌人现有的兵力，不论其在北方、在津浦、在东南，只能占领我国交通要道及重要城市，如敌继续前进，其后方将愈加薄弱。因此，我们应抓紧敌人这一弱点，派遣某些得力部队，到敌人占领地区的侧面后方，做游击战争的骨干，去动员、组织和武装被敌摧残、压迫或被欺骗的民众，首先以自立的原则，一直发展到脱离自己乡村城镇的武装队伍，去发展广大的游击战争，以袭击、扰乱、疲惫、分散和吸引敌人，并配合我主力作战。只有这样，才能使敌人不易在其占领地区建立汉奸组织和汉奸部队，更难于统治起来。

第五进行广大的征募兵役运动——动员新兵上前线，应成为今天动员工作的中心。在政府方面，应由上而下将一切征兵机关统一起来，组成各级征募兵役的委员会，号召、指导和进行征兵运动。各种民众团体应抓住这一中心工作，有

组织地有计划地到乡村中去，直接召集群众大会，响应政府这一号召，动员壮丁自动地参加抗战，讨论优待这些抗日军人家属的具体办法，使有钱的人担负他们家属的救济，有力的人帮助解决他们家属的劳动，并发动群众举行盛大的庆贺与欢送，务使这一运动形成上前线杀敌的广大热潮。更经过这一运动，成立各乡村群众选举出的动员委员会及优待抗日军人家属委员会，使这一运动扩大到全国范围中去，使这一运动深入到各种动员工作——募捐、运输、慰劳、救护、自卫的工作中去。

第六巩固后方——这首先须从政治上军事上进行保卫武汉的工作，要巩固江防，要加强平汉、粤汉两路及其两侧的保卫力量，要动员大江南北的群众，参加这一保卫大武汉的计划。但这不是说巩固后方的中心，只放在保卫武汉方面。为准备长期抗战，我们应同样在其他重要城市构筑和加强全国必要的要塞和支点，巩固全国的交通运输，特别是宣传和组织各地民众，使之适合于军事抗战的需要和参加一切有利于抗日的工作，肃清一切汉奸、敌探、托派的组织和活动，以造成统一的强固的后方。

第七加强国防机构——为使全国政治的军事的机构能适合抗战胜利的需要，必须使过去不适合战时需要的重复的庞大的分散的一切政治机构，加以适当的改变，务使各级政府组织能适合于领导全国战争，尤其是军事组织，更要有适当的科学的集权与分工，以便于指挥战争、组织战争。在人力上，要不受人事的牵制，能集中全国确能代表民意和有能力的各方人才，参加各种工作，以充实统一政府，加强国防机构，这是目前最有利于巩固政府、团结御侮的工作的。

第八运用国际的有利条件——因为抗战要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我们固反对幻想出兵式的外援，但我们并不反对运

用国际环境中存在着和发展着的有利条件。过去因幻想出兵式的外援，痴等外国出兵，致许多国际的有利条件反被忽视了，反而没被运用。现在我们应估计到国际上的同情增长，要以全国统一的对外宣传，有计划有系统有组织材料，向全世界供给；要以各党派各团体联名的通电、联合的组织，派遣到海外去，并配合华侨的活动，取得各国人民物质上技术上的援助。特别重要的是要利用各国可能的赞助，加紧推动，加速进行，务使这种可能扩大起来，顺畅起来，而不要像现在已经获得的某些可能，停顿和迟缓起来，这是于长期抗战的支持和发展极为不利的。

以上这一切具体办法，都为着实现一个目的，即是争取持久抗战的最后胜利的一个目的！重复地说，要能贯彻抗战到底的方针，必须首先加强和巩固中华民族能够支持长期抗战的信心和决心，反对一切动摇，反对一切妥协、屈服、投降的思想；次之，必须坚决相信进行这些持久抗战的具体办法，是能够渡过目前难关，准备进行决定性的战斗的。有了坚强的信心，有了实行这一切具体办法的意志，有了实行这一切具体办法的长期努力，日本帝国主义强盗的进攻必然会遭受到最后的惨败，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事业必然会达到最后的成功！

一九三八年一月七日完成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的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二卷刊印。

注 释

〔1〕指蒋介石。

论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 战术——袭击*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日)

毛 泽 东

一 袭击是游击战争的基本作战形式

游击战争不能一刻离开民众，这是最基本的原则。讲到战术，则游击战争的基本作战形式不是别的，乃是袭击。袭击是攻击的一种，游击战争不注重正规的阵地攻击这种形式，而注重突然袭击或奇袭的这种形式，这是因为游击战争是战略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非如此不能达到目的。

二 袭击战术的要领

游击战争袭击战术的要领，一般地可以举出如下十二条：

第一，袭击的基本原则，就是要有秘密而周详的计划，迅速而突然的动作。

第二，游击战争袭击的目的，总的方面，在于消灭小敌，

* 这是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第三五九旅旅长陈伯钧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期间，节录的毛泽东一九三四年所著《游击战争》一书中论游击战术的一部分。后经毛泽东修改校正，发表在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日出版的《解放》第二十八期。

削弱大敌，扰乱敌之侧翼与后方，配合游击部队之政治工作，破坏敌之政权，唤起民众起来抗敌，保持或恢复抗日政权，由此以创造抗日战争的游击根据地，配合正规军作战，因缴获武装使游击队逐渐发展成为抗日的正规军。至于袭击的具体目的，则在各个消灭敌之小部队，扰乱敌之大部队，消灭敌之民团，破坏敌之后方机关，破坏敌之交通路等等。

第三，袭击要选择有利于袭击的条件。无此条件或条件不足时则须注意造成之。这在许多时候是可能的，只须根据敌人部队的素质、指挥者的个性以及其战术的运用等，而采用如下的办法：（1）骄纵敌人。例如故意以战斗力不强之游击小队与敌周旋，使敌以为不要紧，而在敌人不防备时突然袭击之。（2）麻痹与迷惑敌人。例如声东击西，忽南忽北，使敌捉摸不定，因而袭击其一点。又如派遣游击小队或小组用大游击队署名的标语或布告活动于甲地，而大游击队则实行袭击乙地或丙地。（3）疲劳与恐吓敌人。例如动员民众坚壁清野，使进攻之敌饥疲不堪。又如将游击队分为数起，或派遣许多游击小组，不时进袭驻止之敌，使之一夕数惊，发生疲劳情绪，然后选择适当之时机袭击之。若敌人虽多，但素质不良，指挥者懦弱，则散播谣言，虚张声势，以增加其动摇，然后举行袭击。（4）派遣间谍打进敌人驻地，取得当地人民及敌人内部士兵同情于我者，以作我之内应，便利袭击之成功。（5）使用游击小组及人民自卫队四出活动，使他处敌人固守一地，钳制可能应援之敌，使我在另一地之袭击易于成功。以上这些，都是以自己的动作变化敌人的情况，便于游击队的成功，虽不是一定有效的，反而是往往有效的。

第四，袭击前之侦察，这是首先重要的。侦察的内容，应该注意下列各项，即：（1）敌人兵力多少，战斗力强弱，武器如何。如准备袭击驻止之敌，则须知道敌军配置情形，警戒程

度，及其换班秩序等。(2) 附近有无其他敌军，兵力多少，可能增援的程度如何，运输速度，距离远近，电话电报联络情形，最低限度的增援时间，增援方向及道路状况，均须一一查明而考虑之。(3) 附近居民的情形。(4) 袭击部队到达准备袭击地点的大小道路及有无隐蔽接近地。侦察上列各项，须以秘密而巧妙的方法出之。侦察愈详明，则袭击计划愈能正确。可能时顶好预先绘出一简易地形图，并将敌人配备标记出来。

第五，袭击的时间问题。不外下列四种：(1) 在夜间。这一般是对驻止之敌，因在其他时间袭击不利而采取的。一则利用夜暗最能隐蔽接近敌人；二则夜暗冲锋，可以减少自己的损伤，并可扩大自己的声势，增加敌人的恐慌；三则邻近敌人夜间增援不易。因此游击队须经常注意夜间动作的练习。(2) 在拂晓。这一般也是对驻止之敌而实行的，即是利用夜暗行军接近敌人而于拂晓时实行攻击，这在游击队离敌较远或夜间攻击动作尚不熟习时，是袭击的最好时机。但冲锋开始，须在敌人起床以前为宜。(3) 在黄昏。这一般也是对驻止之敌而说，在其他时间敌人均比较注意，同时接近敌人的道路又较隐蔽，白天行军不成问题或通过地区可以伪装时，采用此种时间袭击之。在此种时间，万一袭击不成功亦可利用夜暗安全撤退。(4) 在白天。敌人运动多在白天，故袭击行动之敌大都选在白天。游击部队欲最有效果地袭击敌人，必须不丧失敌人正在行动中的机会，此种时机必须普遍采用。此种袭击多为伏击。如欲白天袭击驻止之敌，则须在下述情况下方可采用：1. 敌人素质甚差，不机警，无工事，疏忽已极；2. 敌人根本不知道游击队要来袭击；3. 孤立无援之敌；4. 大雨大雾最易隐蔽袭击动作时。在这些情况下，白天袭击驻止之敌，也是可能成功的。

第六，必须保持袭击计划的秘密。袭击敌人虽有好的计

划，若此一计划被敌人知道了，则不但一钱不值，还有遭受损失的危险。所以袭击计划之严守秘密是最要紧的。除了第三项所述尽量利用抗日人民及游击小组四处活动以迷惑敌人外，还应该注意下列事项：（1）袭击计划不应全部告知部下，只告部下以应知之事或分段告知之（如在出发前、行军中及到达目的地以后）。（2）对驻地人民及所请向导，均不应使其知道游击队袭击的企图。（3）可能时，在出发时先向假方向走一段路然后折转向袭击目的地前进，这在敌人耳目众多之处可采用之。

第七，袭击部队的开进。下列各点是值得注意的：（1）如有必须通过的河川及障碍地段，应于出发前研究通过方法及携带必要的器具。（2）携带标语布告等。（3）约定各种记号，例如开始冲锋记号等，并规定袭击不成功及遇特种困难时的集合场。（4）行进中选择极隐蔽的小路甚至走没有路的地方。（5）行进中保持极端的肃静，禁止说话与笑声。除侦察警戒人员外，其余队员均不准装红子（只装暗子）。（6）在行军纵队先头，派出少数便衣武装的侦察人员担任直接的侦察与警戒。（7）行进尽可能地快。（8）行进中，要有遭遇敌人的战斗准备。

第八，到达袭击目的地以后的动作。这是全部袭击计划中的重要关节，应注意的有如下各点：（1）迅速在敌人警戒线外隐蔽集结，如果敌人还不知道，切记不要惊动他。此时部队首长应迅即召集各分队首长，指示具体的攻击方法。在白天，要引导各分队首长隐蔽观察敌人的配置，当面指示各分队的具体任务。如有可能，则以便衣侦察员不动声色地捕捉敌人的步哨，进一步察明情况。（2）兵力大（一营以上）则将全部分成两路（不可隔得太远）实行攻击，兵力小（一连以下）则一起投入冲锋就行了。（3）派遣少数人枪，在不易攻击的方面举行佯攻，钳制敌之一面，而以主力投入敌人薄弱较易冲击的一二

点，但决不可平分兵力。(4) 在兵力优裕时，可派遣一小部埋伏于敌人可能逃走的方向，截断敌人去路。(5) 必须在敌人有增援部队的方向，派出少数人的警戒，并破坏其电话电报线及桥梁道路。(6) 准备攻击的位置，不应过近也不应过远；准备攻击的时间，要尽量缩短；准备攻击的动作，要尽量地快。(7) 夜间袭击，要有很好的识别标记，以免混杂不清。

第九，冲锋动作：(1) 冲锋开始，应按照预定的时间、方向、道路而迅速地突然地实行之。如分几路冲锋，则以主要之一路到达冲锋地点所需要时间之多少来决定全部冲锋的开始时间。其他各路应向主要的一路取齐，以免敌人过早发觉。(2) 冲锋开始时，不要作声，也不要打枪（就是敌人先打枪也不管），也不要喊杀，而用刺刀、梭标、大刀，一下冲入敌人配置，实行格斗，迅速解决敌人。如果有手榴弹，应首先投掷手榴弹（注意——不要打倒自己人，只准在最先头的几个人打，后面的不准打。），趁着手榴弹爆炸的瞬间，扑拢敌身而解决之。(3) 只有在钳制方面，可以少数火器射击敌人而吸引其注意力，以便突击方向迅速取得胜利。(4) 如敌人固守房屋顽强抵抗，可实行放火烧屋逼其投降（只准烧其固守之屋，不准乱烧），或趁敌人混乱之际从其他房屋袭人之。(5) 如袭击成功，敌人溃退，则担任埋伏截击之部队首先应努力堵截，此时突入部队应不顾武器、财物之缴获，除管理俘虏、警戒战场之必要部队外，其余均应跟踪追击，期于大量解决敌之有生力量，使敌无反攻之可能。但在有增援敌人之顾虑时，则不应远追。

第十，袭击后的动作：(1) 袭击成功时，立即把部队集合，连同伤员、胜利品等，带到通来路有阵地的附近集结，并以一部占领阵地，防止敌人反攻。(2) 如残敌远逃，已无反攻力量，又无增援敌人之顾虑时，则袭击部队可在当地留相当时间。此时以一部工作人员担任分发缴获敌人之财物于当地贫

民，帮助人民反对著名的汉奸。而游击队主力则选择有阵地的地点，集结休息，绝对禁止自由行动。虽然如此，游击队主力一般仍不应在当地宿营，应移于离此若干里之优良地点宿营。（3）如情况紧张，则应缩短处理战后工作的时间，以便游击队能迅速地胜利地离开此地。（4）关于处置俘虏，在离自己根据地或抗日正规军不远时，则将俘虏全部押送后方或交给正规军去处理。不然，则问明情况，给以适当宣传后立即释放，严禁杀害俘虏，仅对民众痛恶的汉奸首领可以在民众要求之下处决之。就是有时俘虏不愿跟着游击队走，亦只应解除武装将他释放。须知杀害俘虏只足增强敌人战斗力，于抗日战争是完全不利的。但在释放俘虏时，要注意保守自己行动的秘密，为达此目的，应把俘虏事先放走，而把没有走的关在一个房子内，使其不能看到游击队退去的方向。（5）如袭击不成功，或袭击刚半而敌人增援已到，则应毫不迟疑地迅速撤退。如在敌人压迫下退出战斗，则应实行分散退却，同时以一部最精干的老游击队员担任掩护。退却后的集合场，多应是先一天的宿营地或是预先指定的。（6）游击队就是在无严重敌情下撤退时亦应伪装，例如先向假方向走若干里，再折到真正要走的道路，用以迷惑敌人，失去敌人可能跟追的踪迹。

第十一，袭击堡垒、寨子、土围子及城市。以游击队劣势的武器，去袭击堡垒、寨子、土围子或城市，只凭一般的战斗方法是不行的。这些东西是可以袭击的，但应注意下列的条件：（1）最好在要袭击的城寨堡垒中，要预伏间谍或有同情于游击队的人民、兵士为内应，这种政治工作游击队要经常有计划地做。（2）选择敌人警戒最疏忽之点，利用夜暗，乘其不备，悄然爬入。或在最危险之处，即是敌人最放心的地点，有时也是我们悄然爬入的最好场所，但这决不是经常的。（3）如袭击被敌发觉，则以小部在他方向佯攻，吸引其主力，而以游

击队之主力从其松懈处薄弱点袭入之。(4) 在白天实行远距离的袭击，在可能情况下，可伪装敌军，乘机袭入之。(5) 在城堡附近的野战中击溃敌人，跟踪追击，乘势袭入，这是最有利的情况，不应放过此种机会。(6) 在抗日根据地附近的城堡，有时也在敌人薄弱的远后方，如果民众条件好，而游击队力量优裕时，可以采取围困爆破的办法。但必须在敌人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才能采取此种办法。

第十二，扰乱或钳制敌人。扰乱是游击战争袭击战术的附属部分，但也是必要部分，目的在于增加敌人不安，减杀敌人威势，以造成我们消灭敌人或逼退敌人的条件。其方法如次：(1) 在夜间袭击不成功时，则改变其任务为扰乱。高喊口号，大声唱歌，四面打枪，都是方法。退去之前可散发标语传单于空地上。(2) 在配合正规军作战，为了分散敌人兵力使其胶着一地不能增援其他方向时，亦可采用扰乱方法。此时可将游击队分为若干起，轮番于黄昏、夜半、拂晓等时间，潜至敌人驻地附近，突然地射击与呐喊，使其惊疑不定，无法增援或迟滞其增援时间。(3) 还有一种办法，就是虚张声势。其法是在敌人驻地附近多插旗帜，多举烟火，即古人所谓设疑兵的办法。目的或在欺骗敌人，便于我方在他处之行动，或在恐吓敌人，增加其惊惶心理。此时我游击队只虚与周旋，决不要进入严重的战斗，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三 袭击行动之敌

上述十二条虽然说到了一般袭击战术的原则，然而主要地是说的袭击驻止之敌。游击战争取得最大胜利的时机，还以袭击正在行动中的敌人为多，所以游击队不应放弃一切当着正在行动而又条件适合的敌人的袭击机会。这种袭击按其性质都是

遭遇战，但分埋伏与急袭两种。埋伏是预期遭遇的性质，但采取埋伏的形式。急袭是不预期遭遇而发生的，采取急袭的形式。前者是游击队重要的战术，故说明较详。后者是偶然情况，故只略为述及之。

第一，埋伏即伏击，是游击队有计划地隐蔽配置于敌人必经道路的一旁或两旁，待敌通过时而突然袭击之。这种动作，就叫做伏击。根据情况及配置的不同，分为两种伏击方法：（1）是待伏。预先在敌人必经道路上埋伏好，待其通过而袭击之。（2）是诱伏。以主力埋伏好，而以一小部故意示弱，诱敌至埋伏圈内，然后袭击之。

第二，根据敌人战术、部队素质及地形等各种不同条件，埋伏可以采取一侧埋伏，两侧埋伏，多面埋伏或重层埋伏等几种方法。

第三，埋伏的目的在于：（1）消灭或打击敌之步兵、炮兵、骑兵、运输队、征发队、汽车、火车、船舶等。（2）捕捉敌军单个或多个通讯员、侦察员、电话员、采买员等，以搜集关于敌人的情况。（3）以埋伏截击败退之敌。

第四，埋伏，首先要求明了情况。若情况不明，则或致落空，或反受损失。故埋伏前的侦察，须周详仔细。侦察应注意事项如下：（1）侦察的方法：第一，利用居民中同情于游击队的，使用各种方法去接近敌人，从敌士兵、夫子口中，得出必要的情况。第二，使用便衣侦察员接近敌人，进行侦察。第三，窃听敌人电话。第四，捕捉敌之人员，从其口头或文件上，得出消息。（2）侦察的要求，主要的是敌人出发时间，兵力多少，将走道路，要到地点，行军力，有无特种武器及特别装备，有无辎重，行军中之通讯联络情形，行军时的特殊惯性等。（3）侦察的技术，以能隐蔽自己企图、得到敌人消息为原则。侦察所得之消息，除对必须告知之人外，均应保守秘密，

以防泄露。必须记着，不论在敌人后方或抗日区域内，随时随地都有敌人侦探潜伏的可能。

第五，伏击地区的选择。选择伏击地区以利于发挥自己最大威力、不利于发挥敌人最大威力为原则。因之，选择伏击地区时应注意下列各点：（1）有良好的隐蔽，使游击队容易看见敌人，而敌人不易看见游击队。（2）有良好的地形，使游击队便于出击敌人，而敌人不便于攻击游击队。（3）埋伏地点附近之道路，须利于游击队退却，不利于敌人退却。（4）埋伏地点，须选在敌人一般行军警戒搜索正面以外。有时道旁虽有良好地形，如果过于接近敌走道路，则游击队埋伏时的隐蔽集结地，应选在更靠后的适当地点。（5）要有良好的观察地点。伏击最好是具备这些条件，但不是一定要这许多条件——齐备，才能设伏。

第六，埋伏部队的开进：（1）时间不要过早，免得游击队久处于埋伏中，减弱其紧张性与慎重性，容易暴露企图，增大敌人发觉的危险；但也不要过迟，免得来不及布置埋伏。（2）行进路要隐蔽，宁肯走小路，甚至走没有路的山地谷底。（3）行进时，先头须派出伪装的便衣武装侦探，以任警戒。如必须通过住民地，顶好全体伪装，以保持行动的秘密。（4）到着埋伏地区时，即应封锁消息。

第七，伏击实施：（1）配置兵力，应按照游击队兵力大小，敌人兵力大小及地形情况而定。通常以一小部（在全兵力百分之三十以下），占领险要地点，用火力杀伤和钳制敌人，而以主力埋伏于便于出击地点，实行突击。有时，应派出少数人枪在有敌人增援顾虑的方向或为便于撤退而必须占领的掩护阵地上，担任警戒。（2）在袭击敌人大部队时，应放过其先头及本队，而袭击其后尾。此时如能以游击小组于敌人先头部队之前方侧方实行扰击而抓住敌人，则更便于伏击部队之袭击。

还可以预先设法将道路、桥梁实行某种程度的破坏（泛滥，淤塞，石头拦阻，将一般的桥变成不良的桥等），加长敌人的行军纵列，使之不易首尾相顾。（3）如果是袭击敌人小部队，则可以堵塞其去路，截断其来路，而全部消灭之。（4）关于开始出击的信号，各分队的具体任务，出击道路，何部首先射击等，均须预先详细告知各分队首长。（5）出击以前，须极端保持隐蔽肃静，不准吸烟，不准说话，不准随便探望。（6）战场观察。顶好能设立两个观察所，第一个设在通敌人来路十里左右的附近，并带通讯员三四人，一律伪装，担任观察。将敌人行军长径，兵力多少，警戒搜索情形，不断报告游击队长，以便指挥者根据情况适时处置。这个观察所，须在敌人全部通过后，始得回归。第二个设在伏击地区附近，指挥者亲自观察，以便适时发出开始出击的信号。（7）开始出击的时间，要选择得最好，要能抓住敌人行进中一个最适合于自己出击的时机。同时，还须要全体队员绝对服从命令，不准自由行动，免致敌人事先发觉。（8）出击时的动作，要迅速猛烈，要能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很短促地将所有火器一齐快放，跟着立即冲锋，迅速解决战斗。任何迟疑与犹豫，都是不利的。

第八，战斗成功，立即集合部队，处置俘虏，收集战利品及伤员，以便迅速撤去。如只消灭敌人一部，则撤退更要快，以免遭受敌人的反攻。若有不能带走的笨重物品，一律毁坏之。

第九，伏击不可能或不成功时的处置：（1）如刚出击尚未进入战斗，忽然发现敌人兵力过大或被敌人预先发觉我之埋伏而早已占领阵地，出击毫无胜算，则应马上停止出击，断然撤退，以保存自己力量。这时候，需要指挥者之最高的机断与灵活的处置。（2）已经进入战斗，但遇敌人顽强抵抗，确无胜利把握时，亦应终止战斗，决心引退。

第十，扰乱。有时目的不在消灭敌人，或伏击不能解决战斗，均可实行扰乱任务。其方法是用小部队，分散数处，以火力杀伤敌人，扰乱其行军纵列；或于高山峭壁处，推巨石、倒古木以杀害其人马。

第十一，伏击敌人单个或少数的传令兵、采买、侦探等，则是游击小组或游击队所派出的便衣侦察员的任务。此种机会很多，不应放弃。

第十二，伏击骑兵：（1）敌骑的运动力和冲击力较大，所以埋伏时，应选择森林或隘路（有时住民地也可以），敌骑运动不便之处而实行之。（2）集中火力杀伤乘马，则人员自易捕获。（3）如伏击少数敌骑确有把握捕捉之时，可设置重层的多面的埋伏。（4）可以伪装居民，预伏某一村庄中，待敌骑进入村庄人马分离时，突然袭击之。

第十三，伏击汽车：埋伏地点，应选在山谷、谷底、沟底、转弯处、上下坡处，并预先设置障碍、陷阱，或埋置地雷（束集手榴弹和迫击炮弹亦可），使汽车到此不得不停止或被炸毁翻倒。而游击队则埋伏于附近隐蔽地点，待汽车停止或翻倒之际，以一小部拦住先头，另以一小部截断归路，主力则直扑汽车捕获其人物。如有护卫兵士，则须先解除其武装，再行烧毁汽车。但对被俘之驾驶人员及士兵，须注意争取，不要杀害。

第十四，伏击火车：（1）在转弯处、上下坡处、有高堤处、洼地、隧道口，都是埋伏的好地点。（2）方法：先卸松铁轨上的狗头钉或径拆散铁轨的一段，使列车到时，跌出轨外。或在铁轨上、隧道口上，用大石头大木头堆塞起来，以制止火车前进。而游击队则分为三部：一部占领阵地，预防列车上卫队抵抗。一部对车厢射击。另一部则准备进入车厢，收缴枪械，俘虏人物。最后放火烧毁车辆。（3）对装甲火车，则更应特别注意，因为它是移动的炮台。游击队一面不但预先卸松狗

头钉，而主要是尽量用地雷炸毁之，待其倒坍后，再行出击。

第十五，伏击船舶：（1）游击队可以伏击的船舶，主要是敌人运输用的商船或较小的内河炮舰。（2）伏击的地点，要在河岸上便于隐蔽之处、弯曲处、靠近我岸处。（3）伏击时，游击队主要火器及兵力应准备迎击船头，而以一小组截击船尾，准备敌船回头时用火力拦阻之。待敌船一到，即猛力以步枪机关枪，顶好是炮兵（若无洋炮就是大土炮松树炮也可以），一齐快放。（4）如是木船，则迫令其停止靠岸，搜查其军械及资财。私船放还，并给船工以财物，官船则烧毁之。

第十六，伏击敌人征发队：（1）在敌人征发队尚未接近村庄时而伏击之。游击队须预先埋伏于敌人必经的道路旁边，待敌一到，突然袭击而消灭之。（2）或在敌人征发队已进村庄分向各家征发时袭击之。此时敌人分散，不能集合，最易消灭，若预先在村庄内伪装埋伏一小部，而以大部从村外攻击之，则收效更易。但村内埋伏的，一定要等村外大部队先行动作，方免敌人惊逃。（3）或因时间来不及，未能实行上述两项办法时，即可待其征发完毕满载而归之时，在敌去路旁边伏击之。伏击成功后，所获财物，应交还原来被征发之民众，只有在民众自愿慰劳游击队情况下，才可分取一部分，帮助游击队的给养。（4）但对敌人征发队，无论何时伏击，均须以突然的动作，首先消灭其掩护部队，方能达到目的。

第十七，伏击敌人运输队：（1）应选择隘路或道路狭窄之处。（2）若敌掩护部队的兵力较大，则可分游击队为两部，以主力同敌掩护部队战斗吸引其向我，以小部夺取运输品或烧毁之。（3）若敌掩护部队较小，则首先消灭其掩护队，再夺取其运输品。（4）伏击敌人运输队一般原则，须先射击其先头，使运输纵列发生错乱，夫乱跑，道路阻塞；其次猛力消灭或驱逐其掩护部队，再行夺取辎重。（5）若要防止运输队向后逃

跑，须先以小部截断其退路。

第十八，急袭：这是处置不预期遭遇的方法。(1) 在行动中的游击队，可能遭遇行动中的敌人讨伐队、征发队或运输队，所以，游击队在行动时应经常准备这一着。(2) 游击队行进时，应经常派遣便衣侦探在部队先头三五里处行进，以便遭遇敌人时能迅得消息，定下处置方法。(3) 如遇小部或兵力相等之敌，应即争取先机，将游击队迅速转入于敌人侧面，而突然向之开火，猛力冲锋，一鼓消灭之。此时若敌溃败，又无其他敌情顾虑时，则跟踪追击将其全部消灭，但追击不应过远。(4) 如遇大部之敌或情况不明，则以毫不迟疑、迅速引退、脱离敌人为原则。如敌首先开枪，则我应以小部占领阵地抵抗，掩护主力先撤，掩护部队随后撤走，避免损失。(5) 总之，突然遭遇敌人，要有最快的决心，或打或走，不可迟疑。迟疑不决，是危险的。

以上十八条都是袭击行动敌人的方法，抗日游击部队应该加以研究。

但一切战术都以适合情况为原则，文字条文仅能作为实战的参考，不能死板应用。抗日战争中一定有许多新的可贵的经验，胜过过去文字条文的东西，希望大家共勉，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二卷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发动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等问题给山东省委的指示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五日）

山东省委：

济南失守后，日寇继续南下，津浦线济南徐州间有完全被日寇占领之可能，因此山东广大地区有沦为被日寇占领区域之危险。

目前省委工作的布置，应注意，即使山东完全变为日寇占领区域，还能使我们的党坚持在山东的发动群众组织游击战争保存党的力量，坚持的与日寇进行长期的斗争。因此省委的工作，应着重下列几点：

（甲）应以发动游击战争与建立游击区的根据地为中心。根据最近中央新的决定（参看洛甫⁽¹⁾的文章《巩固国共合作争取抗战胜利》，及中央的宣言），重新布置工作与重新教育干部成为顺利的进行游击战争与创立游击区域的基本条件。从省委十二月二十一日报告中，已经看到你们已注意这个问题，这是非常之好的。对于发动游击战争我们还有下列的提议：（一）创立在党领导下可靠的基干游击队。必须动员好的干部党员到这种游击队内去。（二）游击战争必须密切与群众联系，才能生存和发展。（三）游击战争必须正确的实行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才能达到抗日的整个任务。（四）山东为土匪最多的地区，必须对土匪有正确的政策，我们对土匪总的方针应当

是争取他们抗日。当土匪还是抗日时，我们不应去削弱或瓦解他们的部队，应当帮助他们的发展，巩固他们的部队，并逐渐的帮助他们改善与群众的关系，与他们采取共同行动去反对日寇。当土匪为日寇所利用时，我们也不应当去积极反对他们，而应当使他们中立，即是他们一方面去敷衍日寇，而又与我们保持善意的中立。（五）对于当地旧政权和专员县长等，当他仍旧在该地继续抗日，应当与他们合作，共同行动，当旧政权退出的区域，抗敌后援会可起政权的作用，但不必组织其他名义的政权。（六）估计山东地区广大，日寇虽然暂时占领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但无法占领一切地区，因此在开始一个时期内坚持在山东的游击战争是完全可能的。（七）同时估计到山东大部是平原，交通比较便利，因此当游击队受到敌人的压迫时，应当非常机动的，采取有进有退、流动游击的办法，不使游击队受到不必要的损失。当大的游击队（如连以上）不能在某个区域内活动时，他应当按照情况向新的地区转移和发展，应当留下小的游击队（如班排）继续坚持斗争。（八）最重要的应当估计山东游击战争是比较长期性的，因此必须准备长期艰苦奋斗，因此在党的工作上、群众工作上、游击战争上都必须采取积蓄力量保存力量的方针，即是“赚钱就来，蚀本不干”。

（乙）党的工作应当适应山东被占领的环境和游击战争的任务来布置工作。因此，（一）把党的组织和党员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在当地不能立足以及准备动员到游击队内去工作的干部和党员，应当参加到游击队内去；另一部分是准备在日寇已占领或将占领的区域内坚持党与群众的工作，须严格的保持秘密条件下党的工作原则，利用一切合法的可能进行工作。（二）省委工作的中心应当放在鲁中区，开始依靠新泰、莱芜、泰安、邹县的工作基础，努力向东发展，尤以莒县、蒙阴等广大地区为重心。因此我们提议省委应在鲁中区较为适宜，万一

在徐州被占的情况下，省委应以苏鲁边广大地区为活动范围。（三）在目前民族革命的高潮中，应当大量的吸收积极的工农成分和革命的学生入党，但同时必须严密党的组织不使一个奸细和投机分子混入党内。（四）对于出狱和恢复关系的党员应重新考查。（五）应当设法与各个区域建立经常的秘密交通关系。

在山东被占后，省委的工作将进到一个较困难的时期，应当抱定在山东坚持长期的艰苦奋斗，即使在与中央的关系断绝后，也应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独立的进行工作。依靠中国正规军队收复山东不是短期内的事，因此省委应当在保存力量、积蓄力量的原则下发展群众运动和游击战争，坚持在山东与日寇作斗争。

中 共 中 央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五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刊印。

注 释

〔1〕即张闻天。

怎样渡过抗战的困难时期*

(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二日)

任 弼 时

一 坚定我们奋斗的方针与信心

半年来的抗战，中国北部和东部大块土地与重要城市被暴日暂时侵占。我方虽在军事上受到一些失利——但决不是决定最后胜负的失败，然而却换得了中华民族从来未有的团结，冲破了积弱传统与恐日思想。这种举国一致的顽强抗斗，英勇壮烈的牺牲精神，使日寇“不战而胜”、“战即速决”的政策遭受了失败，使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大大地提高了。这里面是隐伏着我伟大中华民族最后战胜日寇的胜利因素的。

灭亡中国，独霸东亚，是日本帝国主义确定不移的国策。它这次动员了经过数十年准备的武力、人力和财力，撕毁了一切国际信约，不顾一切地疯狂侵略。它是不会以占领华北为满足的。它在北平设立了“中华民国”的伪政府，且准备正式承认之手续。它在快要占领太原和上海时成立了大本营。它宣布在占领南京后，除非中国政府屈服，是没有停止军事行动之必要。这一切表示它过去步步并吞中国的侵略计划，想在这次侵略战争中一次完成。

摆在中华民族面前有两条相反的道路：一是接受日本的条

* 本文原载一九三八年二月十四日、十五日《新华日报》。

件而投降屈服，一是继续抗战到底以争取最后的胜利。

投降屈服的結果，实际上是要走到灭亡的。或者有人设想，在接受日本条件之下，中国中部南部大部领土可保完整，以图养精蓄锐，将来寻机再行反攻。殊不知在日寇灭亡中国的基本国策之下，在你战败之后，它的条件之苛刻，将不会容许你有准备反攻之机的。而且它占有中国北部及沿海富裕之区，利用占有区域之资源财富，成为更强大的侵略国家，将来的反攻条件比现在继续抗战要困难若干倍。而且中国现在所争得的国际同情与帮助将随之失去，国际地位必大为降低。日本将用其“以华制华”之惯技，造成中国更为纷乱的内争局势，以便达到它最后并吞之目的。

因此，接受日本条件而投降屈服，只有黑暗悲惨的前途，是汉奸托派卖国贼之徒所走的道路，是一切不愿做亡国奴隶的人们所反对的。

只有继续抗战到底，才是中华民族光明的大道，是一切黄帝子孙所应走的道路，是蒋^{〔1〕}委员长今天所采取的方针，是中国共产党所抱定的主张，是一切不愿做亡国奴隶的人们所拥护的政策，也就是日寇所最惧怕的，是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与国家所同情而愿意赞助的。

但是继续抗战到底的前途如何呢？是否可以获得最后胜利呢？是否继续抗战也是走到最后灭亡的悲惨结果，或是得到光荣灿烂的新中国呢？有些绝对不愿而且真正反对投降屈服、主张继续抵抗的人们，他们看见几个月抗战结果，大块土地被敌人占去，中国军队大量消耗，目前摆着许多困难难于克服；看见日寇要继续向中国中部南部进攻，感觉没有力量抵抗而无出路，甚而至于消极悲观。因此，是否有力量继续抗战到底？继续抗战的前途究竟如何？是我们应当考虑和研究的中心问题，也是我们决定方针所必须依据的基础。

我们的答案：在继续抗战当中，伟大的中华民族将涌现出不可战胜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阻止日寇的前进。它将在奋斗中日渐扩大雄厚，它将得着国际间的更多同情与帮助，它将在日寇内在的矛盾困难增长的情况之下，使着今天困难的抗战局势转入有利的形势。中国将由部分的战役的反攻，走到战略上的反攻而获得最后的胜利。这自然是一种极端艰苦的斗争过程，但这种胜利前途的可能条件是具备的。我们应当建立起这种坚毅的信心，不要受失败主义者的理论所影响；要揭发那些缺乏自信心的失败主义的思想与情绪，虽然它不同于亲日派、汉奸、托派的思想，若不加以克服，是会走到投降屈服道路上去的。

我们现在是处在抗战困难的过渡时期，今天的任务是如何努力使这种过渡时期缩短，使我们迅速过渡到有利局势的新阶段。

二 相信中华民族的伟大力量， 巩固与扩大国防军队

要缩短抗战困难的过渡时期，主要的就在于如何巩固培养和生息涌现出中华民族抗战的伟大力量。

首先，我们要相信，面对日本继续向我国中部南部的进攻与屠杀，中华民族在坚决抵抗之下，必然会更加团结。最偏僻落后地区的同胞，也会激发起深刻的民族仇恨。加以政府正确适当的领导与推动，一切不愿意做亡国奴隶的同胞，是可以做到牺牲一切来为着国家民族的生存而奋斗的。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我们就可以动员起大量的人力，来补充现有的国防军队，并且可以组成大量新的国防军队。我们可以动员全国的财力，组织一切力量，忍受一切困难，来进行长期持久的抗战。

我们知道，西班牙政府在战争的初期，是遭遇着比中国现在更为困难的境况的。政府的军队，几乎完全叛变，当着佛朗哥率领叛军进攻首都马德里的时候，政府手中没有足以抵抗叛乱的军队；政府中的有些人物也是丧失了信心，许多人预料政府方面无力支持长久的斗争。但由于当时一部分坚决主张抵抗的领导者，号召全国人民为拥护民主自由、反对法西斯势力而奋斗，在最困难的保卫马德里的斗争境遇当中，不到一年建立起五十万近代化装备的军队和足供军队需要的军事工业，保卫了西班牙大块领土之完整。

以国土大若山西，人口比山西只多二三百万之西班牙，而能创造如许强大之国防力量。以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除充实现有军队外，再组织五百万人的正规军队，只要稍加改善动员的方法，是完全可能的。

有些人感觉部队增加了新兵而未经训练，很难作战，更以为新组成的军队是不堪用以与日寇作战的。不错，未经长久训练的新战士，在军事技术上是赶不上久经训练的老兵，然而我们应当看到，新动员补充和组成的军队具有其他方面的优良特点：首先这些新战士是在日寇疯狂侵略屠杀的亡国灭种危险当中被动员起来的，他们具有为着祖宗后代而拼死救国的决心；第二，新动员起来的战士，绝大多数是从田野工厂或其他职业初脱离生产的，没有某些老兵的不良习气与嗜好，他们将忠诚于自己的职守。

我们可以而且一定要相信，新动员补充和组成的军队的兵员质量，是要优秀于原有军队的。这种军队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学习进度，也必定很快，战场上及对居民的军事和政治的自觉纪律也容易建立起来。他们初脱离生产，知道老百姓生活的疾苦，就不会随意去侵犯人民利益，使着军民合作更能关系密切。

但是，要使新动员补充和组成的军队，迅速成为坚强有战

斗力的部队，还须具备其他的条件。首先就是干部的选择与配备。干部的条件，必须是具有高度忠实于民族利益，坚决勇敢，有作战经验的政治和军事素质。一切以自己荣华富贵个人享受高于民族利益的贪生怕死之徒，是不能充任这样军队的干部的。须知军队中的干部，是有模范和决定的作用。今天军队干部的选择，最好是从实际抗战军队里，去选择战斗中表现忠诚而坚决勇敢的分子，加以必要速成的训练，以之去充任新组成军队的中下级干部。其次，新动员组成的军队和补充起来的原有军队，都必须有健全的政治教育和健强的政治工作机关，消除军队中干部与士兵间的鸿沟和恶劣的关系，使军队有高度政治自觉与亲密团结。

具备这样政治质量的兵员，加上优秀的干部，加上健全的政治工作，迅速完成必要的军政训练，如果能够（我想将来是能够），再加上新式武器的装备，这样的军队是坚强而有力量，可以抵御日寇的进攻，直到最后击败日寇的。

三 建立坚固的国防军事工业基础

在巩固、培养、生息抗战军队与抗战力量当中，必须加紧军事工业的建立与扩大。估计到敌人的封锁，而且这种封锁的范围还可能扩大，我们必须以最大的决心与努力，逐渐做到在持久抗战中军火之自给，而且能够供给军队以必需的新式武器。

西班牙的经验同样告诉我们，这是完全可能的。西班牙国内的原料，不会比中国富足，它的工业基础虽高于中国，但中国如果能集中全国兵工厂和各种重工业的力量，其总和不会弱于西班牙的力量。西班牙以自己的高度努力，加以国外各种同情与帮助，建立起足以自给的军事工业，出产质量与数量足够

的飞机、大炮、坦克和机枪步枪，使自己的军队装备成为近代化的质量兼优的军队。美国记者斯特朗说，倘若佛朗哥没有德意的支持与帮助，早被政府军所击败，而德意帮助与支持佛朗哥，使政府在艰苦奋斗当中，创造了坚强的国防力量。这话是有相当真理的，“多难可以兴邦”。我们应有如西班牙政府的决心，加上中国的地大物博，在长期抗日斗争中来兴我国邦，创造雄厚的自卫力量。

日寇为实现独霸东亚而疯狂进攻，它要驱逐与毁灭英美法在东方的势力与利益。这在今天，尤其是将来，对英美和其他国家是一种很大的威胁。但我们今天不能设想这些国家能够出兵帮助我们去打败日寇。因为他们必须权衡自己在中国的利益受日本毁灭之损失，与自己同日本以兵戎相见所造成的损失，孰轻孰重。就是极端同情与愿意帮助中国之苏联，也必须依据自己的政策，估计到世界整个利害来决定帮助中国的程度。然而，这些爱好和平、与日本有利益冲突的国家和人民，是能够给与中国抗战以各种帮助的。中国愈坚决抵抗，这种帮助也必随之而增大。

我们今天应当运用自己现有的军事工业和重工业，加上同情国家可能的帮助，去努力建立并扩大长期抗战的国防军事工业的坚固基础，保障将来能够出产必要数量与质量的飞机、大炮、坦克、机枪、步枪和子弹等，使我现有的和新组成的国防军队，达到技术装备水准的提高而趋于近代化，准备在万一全部对外交通被敌封锁时，我仍能继续进行不屈不挠的战斗。这是我国坚持抗战到底在目前急待解决的迫切问题。

四 努力把全国民众动员组织起来参加抗战

半年来的抗战，表示了全国军民上下一致，在政府坚决抗

战方针下，去为着祖国的生存而斗争。人民忍受日寇最残酷最野蛮的烧杀、奸淫、抢掠，而毫未动摇其抗战决心，或有何怨言。全国军队在统一指挥之下，经过浴血苦斗之后，犹能再接再厉，虽遭受不小的损伤，而未有甘心屈服者。敌人虽以各种方法，以图破坏抗战之团结，阴谋引诱中国向之屈服，但中国抗战的团结与决心，是愈趋巩固与坚决。

在抗战的过程中，开始激发了民众参战的积极性。然而，抗战力量的生息与强大，使一切不愿意亡国灭种的同胞成为更有组织更有战斗能力的力量，仍然是持久抗战中一个急需继续努力实现的重大任务。反对侵略的抗战战线已延伸到我国境内深远的地方，如果我们能够发展人民积极参战的活动，这将成为极伟大的力量，使敌人到处受到我们的反抗、威胁与损害。如果不善于组织、领导和运用这个力量，被激发起来的群众就会感觉无所事事而苦闷，以至于消沉，尤其在敌占之区，容易被敌欺骗，甚至为敌所用。

我们要以周密的系统的宣传方法，把日寇灭亡整个中国的侵略阴谋，把敌军烧杀、奸淫、抢掠的残暴行为，把持久抗战能获得最后胜利的条件，把每个国民应负的责任，把群众参战的具体方法，进行最普遍的宣传鼓动与教育，鼓起群众炽烈的爱国热情，建立起坚固的胜利信心，积极起来参加各种抗战的实际斗争。

我们要使被激发起来的每一个民众，组织在各种形式的救国团体或人民武装组织之内。而这些组织，又必须实际地去进行抗敌救国的动员工作，如新兵的动员，壮丁的军事训练，抗战政策法规的宣传解释和推动其实现，财力、物力和战争勤务的各种动员，扰乱敌人、传递敌情、封锁消息、铲除汉奸等等工作的组织。使这些人民的组织成为政府所能依托的力量，使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使抗日团结有更坚实的

基础。

抗日战争是一种自卫的革命战争，是要动员全民族力量去奋斗，才能持久与胜利。艰苦地去把人民动员和组织起来，使之成为不可摧毁的力量，是持久抗战中军事、财政和其他种种力量产生的主要源泉。如果放松这项工作，简直是一种罪恶。这有赖于领导抗战的政党、各级政府与已有民众团体，共同协力而密切合作地去努力。

五 加强在敌人远近后方游击运动的领导与组织

在敌人远近后方的游击运动，有组织地和自发地逐渐开展，在今天已经增加敌人不小的困难与顾虑，为中外人民所重视，因为这是中国支持长期抗战的一支最重要的辅助力量；而在敌占区域（如华北及苏鲁广大地区内），又成为持久抗战的主要斗争方式。游击战争愈发展，人民战斗情绪可更增高；敌人的顾虑必愈增，兵力不得不更分散，前进也就随之而更困难。敌人消耗愈增加，使抗战亦愈能持久。这也就是游击运动今天被人重视的原因。

游击队运动是抗战以来滋长出来的战斗力量，它将随着抗战的持久而要更加发展的。它在今天，只是处于敌人深远后方作零散的破坏骚扰的活动，然而我们必须预见它的前途，是可以从斗争中壮大锻炼成为较正规的军队的。那时候，不仅可以分散进行游击，而且可以集中进行较大规模的运动战斗；不独可以在敌占区域内保持大块土地与人民不受敌人蹂躏与摧残，使敌人无从利用占领区域内的资源财富，而且要逼使敌人不得不分散强大的兵力，去对付其后方的抗战力量。这就能更有力地配合正规国防军进行持久灭敌的战斗。

这样从艰苦斗争中生长出来的武装力量，是有其更优越的

特质。首先，这些战士是在日寇直接屠杀压迫下，出于完全自愿而参加的；其次，是由小的单位独立奋斗而汇合的，它将具有高度机动灵活的性能和充分的战斗经验。

我们要看到敌人远近后方游击运动的重大国防意义，而加以尽可能的帮助与指导，使之迅速滋长发育与壮大。政府应供给其干部与必要的物质资财，内地人民应作种种精神上与物质上的声援、鼓励与帮助。在没有游击运动的敌占区域，应即派遣适当的干部去迅速发动组织起来。游击运动较发展的区域，要逐渐创立比较统一的指挥机关，整饬其军政纪律，特别要注意各种政策的正确执行，防止土匪主义破坏统一战线的危险。

六 努力争取迅速过渡到抗战局势 胜利开展的新时期

上面的叙述，说明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力量将在持久抗战中涌现，滋长、生息、培养、发育起来。在最大的决心与努力之下，国防军队可以巩固与扩大，军事工业可以建立，人民愈发动愈团结愈有力量，游击运动愈扩大愈斗争也就愈坚强。这一切的总和，就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如果不能看到这些力量可以长成与壮大，则对于今天的抗战，会要陷于悲观与失望。

我们的抗战愈持久，力量就愈加壮大；而敌人的侵略战争愈延长，则其不能解决的困难将愈增加，恰成相反的发展。故我利于持久以取胜；敌须速决，持久必遭失败。

敌国能充兵役的人丁，至多不能超过五百万人，最多只能保持前线一百万人的作战力量。它在东方，主要敌人不是中国。它必须保存必要力量，以应付将来对苏对美的大战。敌国的财政，已到相当严重的困难程度，据外报估计它进攻中国的侵略战争，一个月消费的金钱，已超过日俄战争的全部，超过

攻占东北的几倍，每月约需耗费五亿元，政府已无力支持。它几十年战争准备的储藏，只够大战开始的半年供给，有些只够三个月（单与中国作战或可稍长）。原料的供给，也开始感受困难了。

中国抵抗侵略的战争愈持久，愈是可以得到国际间更多的同情与帮助。但日本侵略战争愈深入愈延长，则其国际地位愈孤立。能够帮助它的德意两国，是如日本一样的穷凶极恶的，他们只能在西欧牵制英法以声援，不能以大量金钱原料来帮助的。

日寇在被迫延长侵略战争情况之下，只有加重对国内人民和其殖民地的压榨，以图困难之解决。然而因为壮丁的被征调，对外贸易大为减低与人超，国内生产更趋凋零，人民忍受不了国家的增税与无止境的公债负担。占领东北后，日本人民生活实际上比未占东北以前更为降低，厌战与反战的情绪日益增高。殖民地的斗争活动，也将乘此时机而开展。

中华民族愈抗战则愈见团结。日本愈侵略则必愈形分崩，这将影响日寇远离家乡的前线士兵发生动摇以至反抗。

然而在今天，日本的法西斯军阀和军火商人，是不会停止其侵略战争的。日寇将在中国不投降不屈服之下，驱使其精锐的海陆空军，继续向我国中部南部进行其残暴的侵略。它如不被中国打败，或因国内矛盾之尖锐而引起革命，或受其他强烈之压迫，是不会放弃屠刀的。

日寇向我国中部南部继续进攻，我们在继续抗战的初期内，还可能有些地区被其占领。这对于地面宽大、军备薄弱的中国与装备优势的侵略国家抗战，是不能完全避免的。然而，这仍绝不能决定战争的胜负。这里我们必须看到，日寇的继续深入，因战线纵横的延长，其困难必为之大增，兵力将更分散，前线战斗实力必更见削弱，弱点也就会随之而更加暴露与

生长。

在中国抗战力量逐渐巩固、滋长、壮大，在日本力量逐渐削弱消失，在敌人更深入，弱点愈增加的情况下，我们会看见中国的持久抗战将产生由失利而取得许多小的胜利，由不利局势转入有利局势，由被动防御转入主动的战略上反攻的新过程。这就过渡到有利的胜利时期之到来。

这种时期从何时开始，是由各种斗争力量成熟的过程来决定的，然而这是可能产生的过程。

中国军队经过半年的抗战，虽在军事上有过不少的失利，但也有不少战术上、战斗上部分的胜利，渐次熟识了敌人战略战术上的长处和弱点。这说明中国抗战军队，不仅打破了恐日的情绪，而且学得了与日军作战的许多宝贵的战斗经验。抗战的军队，在血的教训中，已逐渐改变自己的战略与战术，以期求得适应各种条件，去给敌人以打击，而使自己的损伤减少，使敌人的消耗增加。

我们可以预想到新时期到来的最初，必定是在敌人更深入、更分散、更薄弱，弱点暴露得更多的时候。抗战军队在新的作战方法下，首先求得给敌人弱点以连续的胜利的打击，这就会造成敌人不敢轻举妄动，而须更集结行动。在这样大小胜利的情形之下，抗战胜利信心愈见增高，群众斗争行动与情绪更见积极，游击运动猛烈地扩大，国防力量滋长会愈迅速，抗战军队更见坚实，装备得到初步的改进。当着敌人集结兵力前进时，我们可以求得在运动战与阵地战中给以更强大的打击，乃造成敌人不敢再前进深入，而呈比较固定战线的形势，使战争进到对峙的局势，由此而逐渐转入战略反攻的新时期。

这样的对峙局势，将使中国争取充分时间，在更有利的国内与国际条件之下，来培养壮大自己的各种力量，使国防军队更臻于巩固与坚强。相反的，日寇各方面困难将随之剧增，军

心愈见动摇，深感战线扩大延长之难于应付，而需要更加集结力量，缩短战线，依据交通便利之退路与后方进行抗斗。这时我们就开始大规模的战略反攻，或者反攻形式是困敌于主要城市和战略要地，完全截断其交通接济与外援，求得歼灭或消灭其可能增援的力量，以困死最前线之孤军。如果国际形势起了强烈的变动，则更有利我们胜利的反攻。

这样反攻胜利的结果，可以收复大半已失之领土，我们强大的条件亦必随之愈增。敌人困苦愈急，或由于我们最后将其驱逐与歼灭，或由于敌国内部的革命变乱，而逼使其退出，或加上同情于我之列强的逼迫，而使之最后归于完全失败。这种惨败是可能引起日本国内革命的胜利，而使中国在抗战斗争中得到从日本强盗侵略之下的完全解放与胜利，以达到自主自强、成为有着坚固国防力量的新国家。

这是一种可能的转变过程，然而是一种最艰苦奋斗的过程。这过程中的磨折，必然也会很多。如果中华民族不能更坚固地团结一致，不能坚持艰苦的长期抵抗，而受日本挑拨阴谋的陷害，也可以产生不同的悲惨的发展结果。然而我们应当努力争取胜利发展前途的实现，这是每个不愿做亡国奴隶的有血性的儿女应有的责任。

努力巩固培植中华民族伟大的抗战力量，以争取胜利局势新时期的迅速到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出版的
《任弼时选集》刊印。

注 释

〔1〕指蒋介石。

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关于 战术原则的训令

(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五日)

甲、由于我军及各游击部队在敌后方联络线上（正太、同蒲两线）之积极破坏、袭扰，打击其往返部队，给敌不断损失，使敌甚感不安。一月来，敌人以保障其联络线安全之目的，除加强其沿联络线之戒备，无情镇压居民抗日运动，组织伪组织，推广其警戒线以外，更采取积极防御的动作。经常派遣多数支队兵力（从三百到二千人不等），并加强其技术兵种的协助，利用汉奸作向导，或伪装中国军队，或与汉奸部队混杂，向沿线近旁之城镇，或被其查明之我军驻地与游击队根据地等，作脱离联络线远出二三天行程的分途袭击与合击（各支队间隔约半天至一天行程），其行动颇为灵动敏捷并具突然性。当发现我军时，即作突然的奇袭与强袭，或迅速展开其兵力与兵器进行包围迂回，作强烈的战斗，利用飞机大炮向我轰炸，并不时伪装疏于侦察与警戒或伪装退却，以诱击、伏击我军，或牵制我于正面而以两侧支队包围我之翼侧，和常以敏捷的动作迅速转移其兵力与兵器于新的突击方向。实施这些手段之唯一目的，即在于肃清或驱逐沿联络线之我军与游击队，力求消耗与消灭我之有生力量，以巩固其联络线之安全。然而，在敌人这种行动与方法中暴露了不少的弱、缺点。

1. 兵力分散，给我各个击破之利。

2. 进入山地，技术兵器减少了作用。
3. 外翼侧完全是暴露的。
4. 远离后方联络线，一切供给困难。
5. 与群众是对立的。

乙、抓住敌人的弱点，发挥我军运动战、游击战之特长，求得不断的大小胜利是极大可能的。然而，敌人疯狂般的活动未能给以不断的重大的打击，相反的，还遭受了不应有的个别的损失，这不能不指出部队的战斗动员还不够和战术上的薄弱。

丙、对于上述敌人作战的战术原则，指示如下：

1. 在敌人的分进合击中，主要的应在诸支队之暴露的外翼侧实行机动，不应在诸支队间实行机动，这可以避免敌人之合击。

2. 突击运动中的敌人，并且主要的是突击其后尾部队而不是突击其先头，主要是采用伏击，在预定之伏击地点应有详细的地形和敌情侦察，取适当的部署与具体规定各部分之任务与动作。

3. 当突击某一支队时，应向敌可能来援之方面派出足够的警戒兵力，并以积极的动作向敌前进，隔绝可能来援之敌人。

4. 对敌人的进攻与冲锋，应保持着高度的突然性质，突击一开始应最迅速坚决地、猛烈地、连续冲锋歼灭敌人，迅速干脆解决战斗。在这种情况下，一切犹豫、动摇、迟缓都不应有的。

5. 保持自己的主动地位，保持能迅速地转变自己的突击方向。当发现敌人已占领阵地，已站稳了脚，无消灭的把握时，应迅速脱离战斗，转移突击方向，以免被敌吸引，消耗我之兵力与兵器。

6. 自己行动应极端秘密，应利用昏暗夜间接近敌人。与敌人一经接触，应坚决迅速向敌冲锋。火器主要是用来直接补助近距离的战斗，而战斗之过程主要是白刃战。

7. 要保持主要的兵力与兵器使用在选定的突击方向、突击点及突击时间以内，对其次要的方向，分派游击队积极袭击扰乱敌人以迷惑之。

8. 突击部队的战斗队形，避免以大部队走一路，前进的行军纵队应避免集团冲锋。

9. 对住止的敌人如已有坚强防御设备，不应强攻，而应向之佯动，诱动其他方向敌之增援，求得在运动中突然袭击增援之敌。

10. 在敌联络线两侧活动之各部队，应有密切联系和行动上适当的配合。当发现敌人向某一地区动作时，各方均应适时地、机断地采取适当动作，配合某方之作战。一切等待与互不相关各自为战的现象是有害的。

11. 当敌人向我前进时，各地方游击队不应单纯地作正面抗击，而主要地应向敌之侧后活动。向敌之后方前进，应有高度的机动性、敏捷性、弹韧性，袭击敌人的后方与侧背，但须与正规军有严格的配合。

12. 加强侦察工作，并在群众中建立自己的耳目，特别在沿铁道线上和可能来敌之主要方向。

13. 加强警戒，及时发觉敌对我之一切企图。接近敌人的部队，应选择适当的宿营场所，并经常变换自己的宿营地，注意封锁消息。

14. 加强防空，注意隐蔽与伪装；注意躲避敌人炮火杀伤的威力。

15. 对可能利用的道路，加以必要的破坏。

16. 应多派优良的射击手，潜伏在敌人的前进路旁或宿营

地附近，不时给敌人以杀伤。

（丁）争取不断地打击和消灭敌人，争取战斗中连续的大小胜利，这对于兴奋全国军队，全国人民，持久山西战局，配合全国抗战形势，有极大意义的，也是我军目前的重要战斗任务之一。在部队中应有积极的战斗的动员，发扬我军运动战、游击战的特长，提高我军固有的敏捷性、机动性和进攻勇气，发扬我军坚决、勇敢、刻苦、耐劳、机断专行的战斗作风，以争取胜利，打破敌之巩固后方联络线之目的与企图。

总司令 朱德

副总司令 彭德怀

根据解放军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的
《朱德军事文选》刊印。

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与 野战政治部关于整军的训令

（一九三八年二月一日）

林、罗、贺、萧、关、甘、刘、徐、邓、宋、聂、舒、徐、黄⁽¹⁾等：

（一）我军人晋抗战以来，打击敌人，动员武装民众，补充部队方面，收有显著成效，但在十二月底以前部队分散行动和扩兵时期，暴露和产生一些严重现象，如贪污腐化浪费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某些干部逃亡，军事政治纪律的松懈，由外界恶劣意识的影响滋长着的军阀主义与忽视政治工作的倾向，党和政治军事机关经常工作制度的削弱等，这一切是极端有害而将有丧失我军传统的危险，特提出以警觉我各级首长与政治机关之严重注意。

（二）在今天复杂的统一战线斗争和部队多数分散行动环境当中，在老的成员因消耗减少，新的人员大量增加，而党员数量质量，干部质量，随着相对减弱的情况下，在敌人托匪汉奸等的挑拨引诱收买破坏打击活动以及外界各种恶劣影响的传播等等情形下，要保持我军艰苦卓绝，意志团结，坚决勇敢，高度政治警觉等优良的模范传统，这须依赖更加艰苦的政治工作和坚强的党的工作。这必须对于一切生长发育那些只有微弱表现的各种不良倾向，给以即时的纠正与教育，一直到公开与之斗争。一切对于不良倾向放任的自由主义，都是可能产生不

良的结果的。

（三）各级首长和政治机关，必须严格检查近几个月来部队中各方面的工作，要把部队中军事、政治、党的系统工作制度，适应着今天战时而且是分散情况的实际环境去建立起来。但健全各级政治机关组织，要保障党和部队中的教育工作，在任何情况之下不致中断，特别是健全支部的工作与领导，使党员及一切指战员深刻了解党的统一战线，各种具体策略。连以上各级干部除应参加小组会（或者党的小组会），以期能集体加强部队工作领导外，并须讨论一些基本理论政策和党的建设等类问题，以提高政治理论水平，发展正确的自我批评，锻炼坚强的布尔什维克的思想。在思想斗争中应注意反对存在着的贪污腐化浪漫堕落现象，反对生长着的军阀主义和忽视政治工作与党的领导作用之倾向，必须严格党的纪律。为着坚强党的领导力量，应注意党员的大量发展，惟吸收新党员时，须有慎重的选择，提高部队对汉奸托匪高度的警觉性，并广泛揭发托匪汉奸反革命理论和事实。

（四）此项训令文字的发到团级为止，但必须口头上党内的传达到支部中去讨论。

朱、彭、任、傅^{〔2〕}

二月一日（一九三八）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刊印。

注 释

〔1〕指林彪、罗荣桓、贺龙、萧克、关向应、甘泗淇、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宋任穷、聂荣臻、舒同、徐海东、黄克诚。

〔2〕指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傅钟。

毛泽东同《新中华报》记者 其光的谈话

(一九三八年二月二日)

本报记者其光以近来有些报章杂志盛倡所谓“一党专政”之说，其所持理由，首先以苏联为例，其次以德意为例，因特于二月二日走访毛泽东先生，征询其对此问题的意见。承蒙毛先生接待并答复记者所提各问题，兹将谈话内容抄寄于后，想为全国新闻界所乐于登载。——延安《新中华报》编者

问题一：苏联现在的政治制度是一党专政吗？

答：苏联是工人阶级专政的国家，即工农社会主义的国家，但不是以党专政的国家；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看来，阶级的专政与党的专政是有分别的东西，党只是阶级的最觉悟的一部分人的组织，党应当而且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中起领导作用，党不应当而且不能代替阶级去实行专政。因此，苏联的政治制度的创造者列宁、斯大林从来未曾将党的专政与阶级专政问题混为一谈，而他们有时借用所谓党的“专政”这个名词时，不过是指的党在国家系统中的领导作用这一点而已。为的使您能明了和相信我的这种说法，我乐于将列宁和斯大林关于这个问题所说的话介绍一点给您。为的记忆和了解的便利，我特将斯大林所著《关于列宁主义底问题》这本书上对这

个问题所引证列宁的意见和他自己的意见介绍一点给您，在这本书里，在“无产阶级专政系统里的党和工人阶级”这一段中，斯大林曾将列宁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加以详细的发挥。例如他说：

“比方，在我们苏联这里，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应当把这样一事实看作党领导作用底最高的表现，这事实就是我们的苏维埃的或其他的群众组织，在解决任何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或组织问题的时候，都要根据党底指示。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无产阶级底专政，在实质上，是它的先锋队底‘专政’，是它的党底‘专政’。因为党是无产阶级底基本的领导力量。请看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世界大会上关于这个问题所说的话：

“‘田纳尔说，他是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的，但是他所了解的无产阶级专政并不完全和我们所了解的一样。他认为我们所了解的无产阶级专政，在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底哪个有组织的和有觉悟的少数底专政。而且真的是，在资本主义时代，当工人阶级是遭受着不断的剥削而不能发展自己的人类的能力的时候，工人政党底最大的特点，正是在于这政党只能包括本阶级底少数。政党只能团结本阶级底少数，正好像在无论哪个资本主义的社会里，真正觉悟的工人，只能占全体工人底少数。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只有这个有觉悟的少数，才能够指导和引导广大的工人群众。而如果是田纳尔同志说他是政党底仇敌，而同时又主张由工人阶级中少数最有组织的和最革命的分子来给整个无产阶级指示道路，那末，我就要说，在我们彼此中间，实际上是没有有什么意见分歧的。’（请参看《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三四七页）

“可是这是不是可以说，可以在无产阶级底专政和党底领导作用（党底‘专政’）之间放一个等号呢？可以将前者与后

者看成一个东西呢？可以将后者代替前者呢？当然不是这样说。当然是不可以的。例如苏林同志就说过‘无产阶级底专政就是我们党底专政’（请参看《列宁关于党的学说》第九十五页）。这个说法显然是把‘党底专政’和无产阶级底专政看成一个东西。从列宁主义底立场上看来，可不可以认为这种把两个东西看作一个东西的事情是正确的呢？是不可以的。”

由此可见，苏联实行的是工人阶级的专政，而不是共产党的专政；把阶级的专政和党的专政混为一谈，是既不合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又不合乎苏联的实际。我想，对苏联这方面问题的了解，苏联政治制度创造者列宁、斯大林自己的意见是最有权威和最有信任的意见。

问题二：虽然苏联不是以党专政，但苏联只有一个共产党存在的原因何在呢？

答：这一方面是由于过去俄国各党派长期斗争中人民意志选择的结果，即是俄国人从长期历史斗争中厌弃了其他党派而只拥护共产党的结果，另一方面是由于在社会主义的苏联国家内已没有其他政党存在的社会基础，因而也就没有其他政党存在的必要与可能。为的使您能明了和相信我这种说法，最好也还是将斯大林自己关于这个问题的说话介绍给您。苏联只有一个共产党存在这事实，并非人工捏造或空想或行政命令办法造成的结果，而是历史生活所形成的结果。关于这一点，斯大林在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与第一次美国工人代表团的谈话中，说得很明白。他说：

“我们共产党的地位，全国内唯一的公开政党的地位（一党垄断的地位），并不是造作而成的，也不是有意空想出来的。这个地位决不是故意造作地用行政命令的方法所能造成的。我们共产党的垄断是从实际生活中自然地生长出来的，是在历史

上逐渐形成的，这是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完全破产而下台的结果。”

在苏联，除共产党以外，无其他政党存在的社会基础，无其他政党存在的必要和可能。关于这一点，斯大林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关于苏联新宪法的报告中，特别解释过。他说：

“末了，还有一类批评家。如果上边所述的一类批评家，责备苏联宪法草案是放弃工人阶级专政，那末，这一类批评家，恰恰相反，他们责备苏联宪法草案，说它丝毫没有改变苏联的现状，说它没有放弃工人阶级专政，没有容许各种政党的自由，仍保存着今日共产党在苏联的领导地位依然有效。同时这一类批评家认为苏联各种政党没有自由，乃是违犯民主主义基础的一个标志。

“我承认苏联新宪法草案的确仍保留着工人阶级专政的制度依然有效，同样也保全着苏联共产党目前的领导地位，而毫无变更。如果可敬的批评家，认为这是苏联宪法草案的缺点，那末，只能对这一点表示惋惜而已。我们布尔什维克，却认为这是苏联宪法草案的优点。

“至于各种政党的自由，那末，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观点略有不同。政党是社会阶级的一部分，是社会阶级的先锋部队。只有在有着对抗阶级，其利益互相敌对，彼此不能调和的社会里面，换一句话说，只有在有资本家和工人，有地主和农民，有富农和贫农等等社会里面，才能谈到数个政党和政党的自由的存在。在苏联，资本家、地主、富农等等这一类阶级，早已没有了。现在苏联只有两个阶层，即工人和农民，这两个阶层的利益，不仅不彼此敌对，而且恰恰相反，是互相融洽的。因之，在苏联并没有几个政党的基础，因之，也没有这些政党自由的基础。在苏联，只有一个政党——共产党的基础；在苏

联，只有一个政党——即勇敢和彻底保障工农利益的共产党，才能存在。它对于这两个阶层的利益，保证得并不坏，这一点未必有人可以发生怀疑的。

“人们都说民主，可是什么是民主呢？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有彼此对抗的阶级，那里的民主，归根到底，乃是对于有势力的民主，乃是对于有财产的少数人的民主。在苏联的民主，恰恰相反，乃是对于劳动者的民主，亦即对于一切人民的民主。由此可见，违犯民主主义原则的，并不是苏联新宪法，而是资产阶级的宪法。因此，我认为，苏联宪法，乃是世界上唯一彻底民主的宪法。”

由此可见，一党存在的事实，只有在这党以外的其他党派已在革命过程中完全为人民大众所鄙弃、所推倒和没有其他党派存在的社会基础的国家——如社会主义的苏联一样，才能够真正形成和做到。

问题三：为什么德国、意大利都能实行一党专政呢？

答：首先必须把国内一党掌握政权与一国内是否真只有一党存在的问题分别清楚。在德、意两国的确只有一个政党掌握政权，但这不是说，在这些国家里只有一个当权的政党存在。在德国，固然今天当权的只有法西斯主义的国社党，但是，在法西斯党上台执政以前的其他各政党——曾在末次（一九三三年）国会选举时拥有千百万选民的社会民主党，拥有五——六百万选民的共产党，拥有数百万选民和有历史传统的各种拥护民主制度的资产阶级各党派——都是继续存在着和活动着，不过是不公开不合法的存在和活动着而已。请任何人到德国的城市农村里去仔细考察一下，他便立刻可以看出集中监狱里虽然囚禁着几十万反政府党派的分子，但社会民主党、共产党和一切拥护民主政治反对法西斯专政的党派，都还潜在地英勇地奋斗着，他们秘密地出版自己的报纸杂志，他们艰苦地进行教育

和组织民众的工作。在法国、捷克斯拉夫、比利时等国的德国政治侨民正联合国内自己的党派，为建立反对法西斯主义和拥护民主政治的人民阵线，在社会民主国际（即第二国际）和共产国际领导机关里，均坐有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的代表。意大利的情形和德国没有两样，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和一切民主主义的党派，同样英勇地秘密地进行反法西斯党的活动，这些党派的代表，同样地在国内外进行建立反法西斯主义的人民阵线；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和社会民主党代表，同样在第三国际和第二国际领导机关内占着重要的位置。

由此可见，如果说在德、意两国内只有一党掌握政权，只有一党有合法地位，这是对的，如果说在这些国家内只有法西斯蒂党存在，那就完全不合事实。

问题四：有些人说：现在国民党应该实行“一党专政”，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意见呢？

答：对这个问题，我可以分两方面来回答您：

第一，如果您所说的“一党专政”，是指国民派一党掌握国民政府政权而言，那末，今天这是已成的事实。因为，谁都知道，在国民政府内负责的只有国民党党员，或国民党自愿指定的人物，中国的其他各党派，现在还均无代表参加政府。我们中国共产党，是国民党以外的我国第二个大的政党，我们今天并不要求参加政府。关于这一点，我们党的领导人陈绍禹同志，在其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与美国记者白得恩先生的谈话当中，以及我们党的另一领导人张闻天（即洛甫）同志，在《解放》二十八期所发表的《巩固国共合作争取抗战胜利》一文中，已经代表中共中央坦白恳切地声明过。关于这一点，我可再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作一次郑重声明：我们中国共产党现在诚恳地帮助国民党对日抗战，但我们现在并不要求参加国民

政府。

第二，一党掌握国家政权的所谓一党执政，并不一定要采取“专政”的办法；如果，所谓“一党专政”的办法，实际就是等于国民党过去十年所实行的政策，那我以为有考虑的必要。在我看来，今天国民党虽可以维持一党掌握政权的局面，但为的集中抗日救国的人才和表现抗日救国的民意，似应当采取相当的民主办法，当然这些民主办法是绝对有利抗战的民主办法，是绝对巩固政府和更增加人民对政府拥护信任的民主办法。

问题五：现在有人说，国民党应该再实行“党外无党”的政策，换句话说，即是不允许国民党以外有任何其他政党合法存在的政策，先生对此问题有何意见？

答：只允许国民党一党合法存在，不仅不承认共产党和其他政党（国家主义青年党、国家社会党等）的合法存在地位，而且企图以武装力量去消灭国民党以外的其他党派，这在中国不仅不是什么新的理论，而且是曾经实行过十年的旧的事实。然而这个事实的惨痛结果是：不仅内部纷争不已，而且招致来空前未有的外患。十年来中国实际政治生活的痛苦的经验告诉我们：国民党企图用武力消灭其他党派的政策，已经遭受失败；同时，中共在中国现有条件下企图造成一党领导的政权，也未收到预期的效果。第一次因国共合作而取得北伐胜利的经验，十年来因国共分裂而形成严重民族危机的事实，教训了国共两党同志和全中国人民一件苦的真理，即是中国统一局面造成的真实有效办法，不是以某一党派反对或企图消灭另一党派的内争，而是把各党派力量在共同政治基础上，形成民族统一战线，——首先是国共两党的亲密合作。六个月来我国之所以能够实行对日抗战的根本前提，便是由于国内民族力量的团结和统一；而我国民族力量团结和统一的具体方式和具体内容，

便是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各党派形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即是国共两党不仅相互抛弃了过去互不承认和互相对立的立场，而且在抗日救国基础上实行携手合作，即是国民党放弃过去否认共产党和其他党派的立场，实行一切抗日党派团结御侮的方针；共产党和其他反日的党派也放弃过去反对国民党的立场，实行与国民党合作，去进行抗日救国的共同事业。由此可见，各党派力量结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对日抗战的必要前提，没有这个前提，破坏了这个前提，便是实际上使中国继续内乱，中国一有内乱，便无法继续对日抗战，这是显而易见、人所公认的真理。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日本法西斯军阀于军事侵略之外，时刻企图使用“以华制华”的毒计，首先是企图再挑拨中国各党派之间的内争，以便破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由此可见，今天有些人宣扬的不许国民党以外的任何政党存在的理论，实际上是中国历史事实已经否定了的理论，是使中国回复到团结抗战以前的纷争局面的企图，同时就是使中国已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形成的统一局面不能继续，因而也就是使中国再形成无力对日抗战的局面。因此，无论宣扬这种理论的人，口头上如何空喊“国家统一”，如果他们的理论不幸而见诸实行，实际上所得的结果，一定是破坏今日既经形成的统一局面；因而无论宣扬这种理论的人，口头上如何高呼“抗日”，如果他们的理论不幸而见诸实行，实际上所得的结果，一定是破坏抗日团结，使对日抗战不能继续。正因为如此，所以我深信：这种借统一之名而行有害统一之实的理论，这种借抗日之名而实行有害抗日之实的理论，这种实际上要使中国退回到国内团结一致对外以前的悲惨局面的理论，一定会受到爱国人民的反对，一定会受到全国抗战军队的否认，同时也就一定会受到国民党的贤明领袖人物和一切为国为民而愿继续抗日的国民党同志们的斥责和厌弃。这是毫不足奇

的，首先因为这种理论完全不合于实际，违反着实际。这些人说：国民党之外，如其他党派也有合法存在的地位，便因党争而妨碍抗日。事实的证明是：原来只许国民党一党合法存在而不许其他政党有合法地位时，中国确实有极大的党派内争，以致中国未曾抗日——顶多也不过局部抗日，以致中国无力进行全面的抗日抗战；恰恰相反，当国民党一允许其他政党有合法存在地位并与其他政党合作时，中国的确停止了内战，消释了党争，造成了空前未有的国家政权和军队的统一局面，因而才能进行空前未有的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以保障民族的生存和争取民族的解放。这些人说：国民党以外，如允许其他政党有合法存在地位时，则多党合法存在的事实，便成为妨碍国家统一和破坏国家统一的因素；中国的事实证明是：只国民党一党有合法地位而同时不允许其他政党有合法地位时，国内纷乱到不断的国内战争；恰恰相反，国民党一允许其他政党有合法存在地位时，国内统一的局面立见，各政党之间，对某些问题即有争论，也绝不会用武器作批评，顶多也不过相互以友谊的批评作武器。英、美、法、比、捷、瑞等国的事实证明：多党合法存在的事实，绝未曾妨碍或破坏这些国家的统一。由此可见，只允许国民党一党合法存在，中国才能统一、才能抗日的理论，是不合中国实际生活的理论，是使中国既不能真正统一，又不能真正抗日的理论，这种理论绝不能为中国爱护统一和坚决抗日的军民所接受。

问题六：现在有人说共产党既宣布相信三民主义，便不能再相信共产主义，先生对此问题的意见怎样？

答：首先我要声明的是，有些人说共产党员宣布为三民主义的实现而奋斗，就是等于放弃自己的共产主义的信仰，我可以再一次正式代表我们的党郑重声明：这只是拨弄是非者的谣言，这绝不合乎事实。我们是共产党员，我们宣布愿意与国民

党同志们一起去为中山先生的未竟的革命事业——即为中国的国际地位平等、政治地位平等和经济地位平等的三民主义的事业而奋斗，同时，我们绝不会放弃我们自己虔信多年、并为之牺牲奋斗多年的共产主义。其次，有人说，如果你们宣布为三民主义实现而奋斗，同时又信仰共产主义，这便不合乎三民主义的立场，因为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根本不相容。关于这一点，我可以再一次郑重指出：这种说法完全不对的。这种说法完全既不合乎手创三民主义和国民党的革命导师孙中山先生的理论和行动，也不合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形。从理论上看起来，三民主义的民族、民权、民生等主要的內容，与共产主义所主张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压迫，使中国人民达到民族独立；彻底摧毁封建压迫，使中国人民得到民主自由；彻底改造中国经济制度，使中国人民达到民生幸福，这些思想恰能相容的。因此，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绝不是不能容和的，因而本党与国民党也不是不能合法并存和携手合作的。关于这一点，中山先生在民生主义演讲中不止一次地明白指示过。例如，在《民生主义》第二讲里，中山先生公开指责有些国民党员这种意见的错误。他说：“所以一讲到社会问题，多数的青年便赞成共产党，要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去实行。到底赞成马克思主义的那般青年志士用心是什么样呢？他们的用心是很好的，他们的主张是要从根本上解决，以为政治社会问题，要正本清源，非从根本上解决不可，所以他们便极力组织共产党在中国来活动，我们国民党的旧同志，现在对共产党生出许多误会，以为国民党提倡三民主义，是与共产主义不相容的。”（见《中山全集》第一集《民生主义》第二讲四十二页）由此可见，中山先生公开指出国民党员中有些同志认为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不相容，是一种误会。为什么发生这种误会呢？中山先生在这段演讲里（即同上全集的四十四页、四十五页）特别指明是：一般地是由于

这般人不了解三民主义的互相结合性，特别是由于这般人不了解民生主义。因此，在解释这种原因以后，中山先生在这篇演讲里继续说：“为什么我敢说我们革命同志对于民生主义还没有明白呢？就是由于这一次国民党改组，许多同志因为反对共产党，便居然说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不同，在中国只要行三民主义便够了，共产主义是不能容纳的。然则民生主义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我在前一次讲演，有一点发明，是说社会的文明发达、经济组织的改良和道德的进步，都是以什么为重心呢？就是以民生为重心，民生就是社会一切活动中的原动力，因为民生不遂，所以社会的文明不能发达，经济组织不能改良和道德退步，以及发生种种不平的事情，像阶级战争和工人痛苦那些种种压迫，都是由于民生不遂的问题不能解决，所以社会中的各种变态都是果，民生问题才是因。照这样判断，民生主义究竟是什么东西呢？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所以我们对于共产主义，不但不能说是和民生主义相冲突，并且是一个好朋友，主张民生主义的人，应该要细心去研究的。”孙中山先生在演讲中接下去发问说：“共产主义既是民生主义的好朋友，为什么国民党员要去反对共产党呢？这个原因，或者是由于共产党员也不明白共产主义为何物，而常有反对三民主义的言论，所以激成国民党之反感。但是这种无知妄作的党员，不得归咎于全党及其党中之主义，只可说是他们个人的行为；所以我们决不能够以共产党员个人不好的行为，便拿他们来做标准去反对共产党，即是不能以个人的行为，便反对全体主义。那末，我们同志中何以发生这种问题呢？原因就是不明白民生主义是什么东西，殊不知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从中山先生这段演讲里面，我们应当得出哪些结论来呢？结论应当是：第一，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是能够相容并存的，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是一个很好的朋友关系。第二，认为三民主义与

共产主义不相容的人，实际上是不懂三民主义的人，特别是不知民生主义为何物的人，这些人应该是国民党中的极少数；同样，认为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不相容的人，实际上也是不了解共产主义的人，特别是不了解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相互关系的人，这种人也应该是共产党中的极少数。而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中山先生认为这只是某一方面的个人行动，任何一方面不能因此来反对另一方面的全党及其主义。第三，中山先生认为，不仅主张共产主义的人，应该了解三民主义；同时，中山先生指示：主张民生主义的人，也应该细心去研究共产主义。这是一种光明磊落、大公无私的态度。我们共产党员非常赞美中山先生这种态度。的确，世界上任何一个伟大的思想和主义，不会是某一部分人或某一个党的专利品，它应当而且必然欢迎别的任何人和任何党来研究、来实行的。我们不仅愿意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同样，我们更欢迎任何人——首先是国民党的同志们遵照中山先生的指示来细心研究共产主义。因为我们深信：凡是愿意为人类解放事业奋斗而又真正研究和懂得共产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人，一定会承认马克思主义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最高的理想，是集几千年来人类思想的大成，共产主义社会是全人类最美满、最愉快、最幸福的社会，绝没有什么可怕的东西。正因为如此，所以我国近代最伟大的革命家中山先生才说：“……从前人类战胜了天同兽之后，不久有金钱发生，近来又有机器创出；那些极聪明的人，把世界物质都垄断起来，图他个人的私利，要一般人都做他的奴隶，于是变成人与人争极剧烈的时代。这种争斗要到什么时候才可以解决呢？必要回复到一种新共产主义时代，才可以解决。所谓人与人争，究竟是争什么呢？就是争面包，争饭碗，到了共产主义，大家都有面包和饭吃，便不至于争，便可以免去人与人争，所以共产主义就是最高尚的理想，来解决社会问题的。”

（见《中山全集》第一集《民生主义》第二讲第三十八页）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价值，中山先生曾说：“至于马克思所著的书和所发明的学说，可以说是集几千年来人类思想的大成，所以他的学说一出来之后，便举世风从，各国学者都是信仰他，都是跟住他走。”

从以上所说的一切，您可以看出，在中山先生亲手著作的三民主义理论中，绝找不出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不相容的指示来。至于讲到中山先生对这个问题在行动中的表现，更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于一九二一年，自成立以后，中山先生与共产党员便有着亲切的关系，所以到一九二四年中山先生决心改组国民党时，便公开与共产党的合作；而且合作的方式是非常亲密的，即不仅建立国共两党的国民革命联盟，而且允许共产党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组织中去，共同担任革命的工作。当时共产党在全国不过几百党员，成立历史不过几年，而且共产党员并以个人资格去加入国民党，去共同为国民革命而奋斗，即在那种情形下，中山先生是否曾向共产党员提出过除三民主义外不允许同时相信共产主义的要求呢？没有！即在那种情形下，中山先生是否提出只允许国民党一党存在，不允许共产党同时合法存在的主张呢？没有！不仅没有，而且中山先生还坚决反对别人提这种要求和这种主张。这正是中山先生伟大远见和洞悉实情之处，因为中山先生深切懂得：任何主义和政党的产生，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社会基础和历史根源的；任何人的信仰，绝不是可以强制制止或取消的，古今来为信仰而杀身成仁的不可胜数；任何有社会基础和群众拥护的组织，绝不是可以强制解散或消灭的，古今来多少革命国体在万重压迫、极端镇压下依然存在和发展。而现今的情形，比之当时，还更不相同，中国共产党已经有十七年奋斗的革命历史，有数十万党员，有久经战斗的坚强组织，有为主

义、为党、为革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和为全人类解放而百折不屈、英勇奋斗的领导和干部，有千百万群众的信仰和拥护，哪里能谈得到取消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的信仰和党的组织呢？如果说只是因为 we 宣布了我们愿为三民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一层，就应当取消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这完全是误解，因为我们对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相互关系的了解，的确如中山先生一样，即我们认为它们是好朋友、是相容的，所以我们共产党员不仅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曾以共产党员的资格去与国民党同志一起，为三民主义的实现而奋斗，即在国共分家后，我们在自己单独的革命苦斗中，也还是为的中国的民族独立、民权自由和民生幸福的目的，即是与三民主义根本思想相符合的目的。今天和过去国共分裂时不同的，只是过去我们共产党员在国共合作破裂后，单独地为自己的共产主义思想和革命的三民主义事业而奋斗，今天在国共重新合作时，我们共产党员又与国民党同志们在一起为共同的革命事业而奋斗。所以在这种情形下，如果有人要求共产党员放弃其共产主义的思想和组织，这不仅不能为共产党所接受，而即直接违反着中山先生的理论和行动。

从中国的实际情形看来，第一次国共两党的合作，造成了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的蓬勃发展和北伐军的伟大胜利；而国共关系破裂，便造成了十年来外患内忧空前严重的局面；现在国共两党一经合作，对外便能发动空前未有的光荣的民族自卫抗战，对内便能造成近数十年来空前未有的政权和军队的统一，便造成空前未有的全民族中各党派各阶层力量的大团结，使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感觉到，这是中华民族生死关头中的唯一生机和希望。两个主义和两个党同时合法并存，对于中国人民和国家是有利或有害，应该根据活的、人所共知的事实来判断，而不应该根据少数人的偏见和主观愿望为决断根据。中

国的过去和现在的铁一般的事实，既经一再证明：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互助合作，则国家统一，革命发展；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互相对立、互相否定，则国家分裂，革命困难。所以任何违反这种事实的意见，必然都是不能实现的，——设或不幸而实现了，定造成国家民族新的灾难。

由此可见，认为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不能相容的意见，以及由此而认为国民党与共产党不能同时合法并存的意见，都是毫无根据而且有害国家民族解放事业的意见，这种意见既违背中山先生的理论和行动的遗教，又违反中国的实际情形，这种意见的实际危险，就是有把目前举国一致对外的良好政局，转移成视线对内、增加内部困难的可能局面。

因此，在谈话结束时，对这个问题我再重复郑重地告诉你几句话：如果所谓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内容，即是说国民党一党掌握政府的政权，这是已成的事实，这没有问题。我们共产党员虽然自己不参加政府，但我们对领导抗战的国民政府绝对拥护，今天只有日本法西斯军阀才否认国民政府并企图推翻国民政府，今天只有执行日寇特务机关意旨而行动的托洛斯基及其门徒们，才会造谣说国民政府是克伦斯基式的临时过渡政府，因而才对国民政府采取“表面上虚与委蛇”、“实际上准备打倒”的汉奸政策。我们共产党员对国民政府的拥护和帮助，是绝对真诚的，是从国家民族根本利益的根本立场出发的。同时，如果把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内容，扩大到和曲解成除国民党外不允许共产党和其他党派合法存在，除三民主义外不允许共产党员有自己的共产主义的信仰等等，这绝不是新的理论，而是旧的实际，这是再重新回转到十年来走不通的道路和做不到的办法。这一思想如不幸而见诸实际行动，则既有害统一而又有害抗日，则是使中国既经形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解体，因而也就是使抗战救国的事业，发生危险。因此，这一思想客观

上一定会被日本法西斯军阀和汉奸所利用。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我确难相信，这种意见能得到国民党中以国家民族根本利害为重的有识之士的同情。当然，更说不上这种意见能得到宝贵统一和彻底抗日的而无党派偏见的军民大众的同情了。不过，这个问题既恰当着民族危机更加紧迫的关头，能公然提出，这就不能不唤起共产党员和其他一切抗日救国的党派和同胞们的严重警惕，这的确不只有关于国共两党关系的问题，而且有关于各党各派和整个中华民族生死命运的问题。所以我希望全国各界同胞、各党派有远见的贤明之士，都严重注视这一问题的发展趋势，尽一切努力使以各党派合作的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受威胁，使国家统一和抗日救国的事业不受危险，以达到抗战到底、争取国家民族最后胜利的任务。

根据一九三八年二月十日《新华日报》
刊印。

关于抗日游击战争中的政策问题*

(一九三八年二月五日)

刘 少 奇

半年来在华北进行抗日游击战争的经验，使我们更加有可能来进一步研究抗日游击战争中的各种政策问题。同时，由于这些经验，也更加使我们懂得：政策问题是抗日游击战争中最重要的问题。

确定华北游击战争中的各种政策，首先主要的应根据于下列的基本思想出发：

第一，华北的抗日游击战争，只是整个中国抗日战争的一部分，是在敌人后方和侧翼进行的一种战争。不论由于战争形势的发展，游击战争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意义是怎样的增加了，以及由于特殊的环境与条件需要采取许多特殊的办法来解决游击战争中所发生的各种特殊问题，但是各个地区的游击战争，在战略上和政策上必须服从整个抗日战争，就是在战略上必须遂行中央军事委员会统一的战略意旨，在政策上必须实行中央政府统一的抗日政策。这在目前华北，更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日寇正在华北成立傀儡政权以分裂中国的时候，而华北的人民与华北一切的抗日武装部队更加亲密的团结在中央政府的统一领导之下，这对于日寇汉奸是严重的打击和回答。

* 本文油印件的封面上有刘少奇的批语：“这是在群众运动已大大发动，为纠正某些‘左’倾错误而写的。”

第二，是日寇在华北的企图以及游击战争在华北的基本任务。目前日寇虽然占领了华北的主要城市和交通要道的绝大部分，但是日寇在华北广大地区的统治，还没有建立起来。日寇现在正企图建立它在华北的统治，巩固它对于华北的占领，以便利用华北丰富的资源和人力，使华北成为日寇并吞全中国的根据地。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在日寇后方侧翼广大的发展，就要破坏日寇这种企图，就要使日寇在华北广大地区的统治建立不起来，至少使日寇不能安定华北，不能充分利用华北的资源和人力，并且使华北若干地区成为长期坚持抗日战争的根据地。因此，华北游击战争的任务：一方面要尽可能多的牵制敌人在自己方面，在华北，使敌人不能集中多的兵力向晋南及华中华南进攻，并且破坏敌人的后方与交通联络，配合主力和敌人作战。另一方面要破坏敌人的统治，摧毁汉奸政权，瓦解汉奸的一切组织，并且保持与恢复我中华民国的地方政权，动员组织和武装人民坚持反对日寇，创造游击根据地，以保障与扩大山西现有阵地，并准备将来反攻日寇、收复华北的有利阵地。

第三，是日寇用以征服华北的政策，以及我国用以战胜日寇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日寇除采用武力以征服华北的政策外，还广泛的采用“以华制华”的政策；除开用残酷的屠杀政策以镇压华北人民的反抗外，还广泛的采用欺骗、挑拨、离间的政策，以和缓、削弱和分裂中国人民反抗的力量。日寇虽然有许多弱点，但它不仅是一个强有力的凶恶的敌人，而且是一个善于利用中国内部的矛盾和我们每一个错误以分裂中国抗日力量的狡猾的敌人。它威胁利诱收买中国的人民作汉奸，广泛的建立汉奸组织，挑拨中国人民内部的斗争以及汉人与回蒙民族的斗争。它在以前提出“只打中央军，不打杂牌军”的口号，现在又提出“只打八路军，不打其他中国军”的口号。它

在某些地方甚至召开群众大会，号召难民回家，散发一些糖果食块给人民等。这些东西都是日寇征服华北整个计划中的一部分，与屠杀、奸淫、掳抢、掠夺、毒害配合起来，在各地广泛的实行着。为了胜利的对付日寇这些征服华北的政策，在华北游击战争中必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必须团结最大多数的党派、团体和人民来参加抗日，尽量减少以至消除敌人“以华制华”政策的效能，使敌人愈孤立愈好，使同情赞助游击队的人愈多愈好。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游击队应当提出并实行：“只打日寇，不打伪蒙军及其他军队”、“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等口号。应该尽量减少中国人民内部的磨擦，在抗日的总目标下团结全体人民。应该使华北游击战争中的各种政治军事组织更加走向统一，互相呼应、互相配合作战。

第四，要准备长期坚持华北抗战，在最困难最严重的环境之下坚持华北的游击战争。日寇是一个强大的敌人，只有在持久战争中才能最后战胜它。日寇要征服中国，它首先是企图“不战而胜”，后来又企图“速战速胜”，现在已经使得日寇不能不和中国进行持久战争了。这对于日寇虽然是不利的，但是由于全中国坚持抗战，它非使战争持久不可。因为这次中日战争，不论对于中国和日本帝国主义，都是决定生死的战争。在持久战争的过程中，华北的游击队如果发展得愈广大，给予敌人的打击与威胁愈大，就愈有可能吸引敌人用优势的兵力来进攻华北的游击战争及根据地。因此，华北的游击战争在长期抗战中遭受一些最严重的困难，是完全可能的。因此，华北的游击队要准备在最严重的环境下和敌人进行斗争，不只要有公开的武装斗争，而且要准备秘密的、武装和非武装的斗争。不只要保障现在能公开的动员最广大的群众和敌人斗争，而且要准备将来在最严重的和秘密的环境之下，还能够有组织的动员广泛的群众配合游击队去反对敌人。因此，在政策上不只是

要估计到现在，而且要估计到比较远的将来；要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到最后、到将来中国军队向全华北反攻的胜利，收复华北。

上述四项，都应该成为华北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政策的出发点。广泛的抗日游击战争，是一种群众战争，它必须取得人民各种各式的拥护、赞助和掩护，它才能够长期坚持、发展与胜利。它不仅是军事的，而且是群众的。它不仅要能运用正确的战略战术，而且要能执行正确的抗日政策，而且要在全中国抗战胜利的过程中，它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根据上述各项我们来研究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具体政策问题。在这里我首先要说到的，是去年十月十六日陶尚行⁽¹⁾同志所发表的《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的小册子。在这本小册子上各种政策问题差不多都说到了。他所提议的一般的原则，大体上是对的。但是在几个具体问题上根据最近的经验还需要有一些修正。

关于抗日游击战争中的武装与政权问题，我应该说到下列各项：

第一，在日寇的后方和侧翼，应该鼓励与援助人民和一切抗日的组织自动的拿起武装来，组织队伍和日寇拼命，进行抗日游击战争。但是这些队伍必须尽可能的统一在当地的、华北的以及中央的最高军事指挥机关的直接指挥之下，并且执行华北最高政治机关以及中央所规定的政策。各级军事指挥人员要尽可能经由上级的委任或批准。

第二，在日寇的后方和侧翼，必然产生一些由土匪出身的以及其他的抗日武装部队。这些部队一方面是抗日的，但是他们的抗日或者不是为了救国，而是为了发财、升官或其他。因此，他们不能执行中央所规定的政策，并不能接受中央与华北的甚至当地的最高军事指挥官的指挥。对于这些部队，应该联

合他们抗日，同时还应该争取他们来救国，争取他们服从中央的统一指挥与统一领导。但是必须忍耐的说服他们与争取他们，切实避免在日寇的后方与他们发生恶感和冲突，以致被日寇利用。

第三，在日寇后方侧翼，应努力保持与恢复我国的地方政权。这些地方政权应该努力实行与目前全中国同一样的制度与政策。主要的行政人员由上级政府委任或批准。即使在游击战争的特殊环境下，政府的组织与行政方法须要有一些变动，但是必须尽可能的呈报上级，如在县政府中增加人民武装部或军事科、粮食科，在区乡公所中加强其工作能力等。

第四，必须使这些地方的政府与人民有密切的结合。采用动员委员会或咨议会参议会等，使人民团体的代表与政府有经常的接触，使政府能够依靠人民，而人民也能够监督政府以及参加政府所提出的各种战时工作。

关于各种政策问题我要说到的是以下几点：

一、财政政策

在游击战争的环境中要建立有秩序的经常的捐税制度，是不可能的。只有在已经建立起政权与秩序的根据地中，才能征收若干种经常的捐税。为了补充抗日部队的给养及其他费用的开支，在保持政府财政统一的原则之下，征收一些捐税是必要的。过去的捐税有一些合理的、能够征收的，应该继续征收；而另外一些不可能征收的与不合理的，就只得取消或者改变。某些税则的重复规定，是必要的。根据有钱出钱的原则，使有钱人的负担增加一点，贫苦人民的负担减少一些，对于团结全体人民坚持抗日是有利的。但是无限制的增加富人的负担也是不应该的。

政府的财政，应该尽可能由经常的捐税征收中来取得。临时的捐款或派款，只有在十分必要与人民不反对时，才可实行。而且一次不能派款太多。

抗日武装部队所需用的粮草，在有我地方政府的地方，应该要求政府筹办，部队不应直接向人民派粮派草，只有在部队深入敌人后方，没有我地方政府的地区行动时，才可以在完全自愿的原则下，直接要求人民捐助或商借若干粮草。抗日武装部队一般不要直接向人民摊派粮款。

为了帮助解决抗日经费的困难，发动人民的爱国热忱，在完全自愿的原则下捐助抗日经费是可以进行的。如果在执行中不带任何强迫的意味，这可以不致引起人民的什么反感。

关于公务员薪饷的减低或取消，也应该在实际的可能与自愿的原则下来实行。但是反对贪污与禁止浪费，在中央的命令之下应该严格的执行。不过在惩治贪污人员时，一方面要有明确证据，经过法定的手续，另一方面对于过去的贪污事迹，不应该追究与惩治过严。

二、经济政策

对于逃跑的资本家之工厂的开工与逃跑的地主之土地的耕种问题，是应该如陶尚行同志所提议的办法来解决。政府应该保护个人的私有财产，保护商人的营业自由，工厂的开工及地主土地的私有，号召逃跑的地主与资本家回去经营他们的工厂与土地。但当他们不回去的时候，政府为了增加生产起见，只有将工厂转租给别人或组织合作社等方式来开工，土地只有由佃农来耕种，租息当然暂时无法交，但这种临时的办法，不能视为侵犯地主与资本家对于土地工厂的所有权。只要地主与资本家回去时，仍然可以管理他们的土地与工厂。

奸商是应该取缔的，但须很慎重的来执行。限制高利贷的利息，根据最近的经验，如果不能办理低利或无利借贷，只从消极方面去限制，就要引起资金的窖藏、农村资金流转的困难。所以一般的限制还不很适宜，只有在具体的借贷事件上，经过人民团体的努力与调解，减少一些息金的归还，还是必要的。牙行垄断的取缔，暂时也是无法执行的。

为了保障游击区域的粮食，应该进行春耕运动，帮助农民解决各种耕种的困难。要号召农民多种粮食，少种棉花及其他日寇所需用的原料。

三、关于改善人民生活的问题

为了动员与组织最广大的民众来参加抗日救国战争，政府保障民众运动的自由，尊重民众团体的独立，并在物质上帮助民众团体，实行一些改善民众生活的政策（如过高地租的减轻，过长工时的缩短与工资的酌量增加，贪污中饱的剔除等）是完全必要的。但在游击战争的环境下，在乡村中，对于最高租额的规定，佃农土地永佃权之保障，以及八小时工作与最低工资额的规定等，暂时都是无法执行的。

当着民众组织起来以后，群众就会很自然的起来要求改善生活。这时候民众团体应该有很清楚的方针。一方面要认定民众生活有改善的必要，另一方面又必须使民众改善生活的要求和运动服从抗日战争，服从统一战线的利益。因此，民众团体在这里须有很正确很艺术的领导。

民众团体应该在动员民众参战的运动中，在抗日的口号之下，在不破坏统一战线的范围里面，来努力改善民众的生活。改善民众生活的方式，应该切实避免采用斗争的手段，应该采用协商、调解及仲裁等方式为主，去达到群众要求的被承认，

去达到工农群众与地主资本家双方的同意。民众团体在这里不好不顾一切的去故意加紧对于地主资本家的反对，应更多的采取协商、说服以及其它的方法（如请求政府或第三者来仲裁调解等）使他们承认工农的要求。在政府内部设立工农科或其它特别机关来负责解决这些问题是必要的。

为了共同抗日，应该设法减少中国人民内部的磨擦与相互的斗争，以免被日寇所利用。应该号召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抗日。应该去调解人民之间的斗争与磨擦。

过去以及最近在某些地区，因为地主与资本家对于工农的过分剥削，以及工农反对地主资本家的斗争，曾经种下了某些深刻仇怨的，应该去进行调解，号召工农与地主资本家抛开私人的仇怨，去共同对付民族的死敌日寇。这种调解，在相互的让步及某种条件之下，是可能的。

四、关于汉奸武装及维持会等问题

中国的抗战，要在持久战中才能取得胜利。因此，必须反对中途妥协与投降，对于北平及各地的傀儡政权，必须反对，对于我政府中及我军后方的汉奸亲日派，必须肃清淘汰，这些都是无疑问要这样做的。但是日寇的后方，在游击战争中来具体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有一些特殊的办法。

首先，为了瓦解与争取日寇所组织起来的汉奸武装，如自治军、蒙伪军、民团、保安队等，我们可提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只打日寇，不打自治军保安队”、“中国人联合起来打日寇”等口号，在实际上，游击队不要去故意找寻这些部队作战，以便争取他们。但在他们进攻游击队与游击区，及阻碍游击队的行动时，就应该解决他们。游击队与这些部队个别的长官订立互不侵犯的条约，并派遣抗日分子去加入这些部队中宣

传与组织抗日，都是必要的。

其次，是在日寇后方的人民以及村长、区长等，因为完全处在日寇的统治下，没有任何中国军队的保护，他们虽然是不愿意，然而他们不能不在表面上投降日寇，甚至他们不能不去参加日寇所召集的会议，担负日寇所派遣的勤务，敷衍日寇。在日寇的后方，我们不能禁止人民这样做，尤其不能将这样做的人民看为汉奸来处罚。游击队只可以要求这样做的人民仍然在暗中秘密的来帮助游击队，将日寇的消息送给游击队及帮助游击队购买物品、带路、送信与掩护游击队的宿营行军等。游击队还应该代替他们守秘密，不使日寇知道他们帮助游击队，以免他们受到摧残，因为在日寇统治下的人民如果由于帮助游击队而受到过多的摧残，将会要使人民不敢帮助游击队。

第三，在日寇后方侧翼发展游击战争，应该使汉奸政权建立不起来，应该尽量破坏汉奸政权，指出维持会等是傀儡政权的过渡组织，劝告人民不要去组织维持会，拒绝维持会的命令等。但是根据最近的经验，在敌人力量很大的地方，有一些人加入维持会是被强迫的，还有一些人加入维持会主要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身家性命，对于这些人我们也不能一律把他们当作汉奸来处罚，但应该责备他们，要他们改悔，要他们在以后帮助游击队，接受游击队给与他们的任务。只有那些坚持反对游击队，压迫人民抗日运动，屠杀人民的汉奸，以及受日寇收买替日寇作侦探，和在我军后方捣乱的汉奸，才应该坚决肃清，处以死刑，并没收其财产。

中央政府惩治汉奸的法令是对的，但如果拿到日寇后方去执行的时候，还必须顾及到上述各种特殊情形。

第四，最近发现日寇在华北为中立一些地方武装及绅士等，曾提出“保境安民”的口号，而这口号又恰恰适合一些绅士地主的口味，因此，就有一些民团的首领，甚至政府行政人

员（如河北某专员等），就宣布他们的保境安民。他们拒绝抗日武装部队到他们那里去，同时他们也不寻找抗日部队来打。他们投降日寇，禁止他们那里的人民抗日，这种人实际上是比维持会更坏的东西，我们应该反对这样的保境安民，主张武装人民来保卫家乡。应该向这些人指出：这样的保境安民，只是一种幻想，将来必然还要受到日寇的宰割。东北与朝鲜过去一些事例，都证明这一点。但是当着这些人还没有觉悟的时候，只要这些人不打游击队，游击队暂时不要去打他们，应该忍耐的去争取他们。

第五，日寇对于不肯屈服和抗日的人民，是采取残酷的屠杀政策。因此，我们在靠近敌人驻点的地区，必须切实设法使人民避免一些可以避免的不必要的屠杀。在那些地方需要进行秘密工作——秘密的组织群众及秘密的建立武装队伍等。尤其抗日军人家属应尽可能秘密起来（可以说他家里没有人当兵）。就是在游击战争的根据地中，也应该有秘密工作的准备，以便万一在日寇进入根据地时，在最严重的条件下，还能坚持与日寇作斗争。

这一切政策的目的是，为了在游击战争中更广泛的坚持进行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团结更广大的人民，并与中央更亲密的团结起来，在持久战争中去战胜日寇。一切与此目的相违背的政策，都应在纠正之列。

二月五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即刘少奇。

毛泽东在延安反侵略大会上的演说*

(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一日)

同志们：

今天举行的反侵略大会，从它的意义来说，不仅是延安的，而且是全国性的，全国各地在这几天均举行同样的大会，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反对侵略战争。这个大会又不仅是中国的，而且是世界性的，在明天，伦敦将举行全世界的反侵略大会，几十国代表都参加，表示一个空前伟大的世界斗争的开始。现在，世界的侵略者结成一种侵略阵线，破坏世界的和平，反侵略者则团结世界上大多数人民保卫世界的和平，反对侵略战争，这样两个相反方向的阵线在全世界斗争着。过去历史上还没有过这样伟大的世界运动，还没有过像今天这样动员全世界地区的大运动，现在是全世界大多数好人向着世界上少数坏人算总账的时候。

因为中国今天是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所以全中国人有了一个空前伟大的团结，这也是过去中国历史上没有过的。我们的全国大团结，现在已经有了基础，正在向着前途扩大。尽管暂时打了一些败仗，失了一些土地，但这样伟大的团结，是力量无比的，加上世界与日本人民的援助，一定能战胜日本侵略者。现在有三个反侵略的统一战线：中国的统一战线，世界的统一战线，还有一个是日本的统一战线，在日本有广大人民群

* 本文原载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日《新中华报》。

众不赞成他们政府侵略中国，正在组织反侵略的统一战线。这三个统一战线的目标是一样的，就是一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有人说，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反侵略运动都失败了，今天的反侵略运动也会失败。这是不对的。今天的情况和过去不同，主要因为今天不但有了全国的反侵略统一战线，而且这个统一战线恰好和历史上空前的全世界反侵略统一战线相遇合；不但能和全世界的统一战线相遇合，而且恰好又和历史上空前的日本内部矛盾相遇合，即同日本人民的统一战线相遇合。这些历史特点是从前没有的，现在恰巧都有了。所以我们说中国的打败仗是暂时的，中国的抗战一定可以取得最后的胜利，其根据就在这里。这三种统一战线，正如日初升，向着日益巩固日益扩大的方向走去，最后的胜利必属于我们，悲观主义是没有根据的。

因此，今天延安城的大会，有它的全国性及世界性的意义。全中国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不分党派，不分信仰，不分男女，不分老幼，统统向着同一的目标而团结起来。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厌恶战争的人，也统统向着同一的目标而团结起来。日本国内的广大人民，也统统向着同一的目标而团结起来。这个目标就是反侵略，这就是今天世界政治的总方向。这样的全中国人民、全世界人民和全日本人民的大团结，其力量是如何伟大，这种伟大的力量是无疑要把侵略者的力量逐渐削弱下去，最后把它打倒。因此我们坚定地说：只要我们努力，中国一定能够战胜侵略者，新中国的创立是必然的。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二卷刊印。

毛泽东给范长江的信

（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五日）

长江先生：

马先生来，获读手书，张同志回延，又接一月三日大示，久稽回答，幸原谅之。

先生提出的问题都是国家重大问题，要说个明白，非一封短信可了。但解决先生问题的主要一点，我认为即是真实地承认并执行一个共同纲领。现在共同说并共同做的东西已有了许多，从实行抗战到若干民主自由都是，但还没有全部东西，还没有从共同抗战到共同建国的全部东西，并使这个东西为国共两党及全国各界所实心承认并实心求其实现。如果有了这个东西，而且实心承认了它又实心求其实现，那先生所提问题的全部便都获得解决了。关于用实际行动帮助国民党健全，我们已在开始做，并望新闻界及全国各界大家都做。诚如先生所感，这是重要问题，但一面也需要国民党同志们欢迎这种帮助，至少不拒绝。我们已提出互相帮助的口号，如果有了一个共同纲领，事情就好办了。军队问题，先生所虑为两党互信障碍者，实由于没有一个包括从抗战到建国的纲领之故，有了的话，这种顾虑，在任何一党方面就都不会有了，因为在过去十年的教训之下，任何一党要背叛纲领而重起内战，必为全国人民所反对，要打也打不起来。否则不但两党之间可为互信障碍，一党内部，何莫不然，过去十年国民党同一主义同一政党内部的无数战争，不是明显的证据吗？我们诚恳希望中国永远不要内

战，我在去年五月延安会议所作报告的结论中（此文先生谅已看过），对于遥远的中国前途——民主革命到社会革命的转变，都曾指出共产党应该争取和平转变，而避免流血，何况只在战胜外敌与建立民主国的阶段之内？故问题实质不在共产党而在国民党的真实政治态度，即从抗战到建国的全部纲领之态度。以历史论，十年前的分裂，主动者属谁，被动者属谁，以及因何而破裂，已是人人皆知历史铁铸之事实，彼时谁撕毁那个共同纲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大会宣言），因而掀起内战，先生当能言之。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故今后症结不但在于要有一个纲领而且要保证永不许任何一方撕毁这个纲领，这是一件最中心的事。十年前并没有八路军，因为两党破裂才出来了一个八路军，以此推知即使今天把八路军解散，甚至把共产党解散，谁能担保中国境内不再出一个八路军，不再造一个共产党？要知这些东西不是凭空发生的，并非真如某些人们的见解是若干共产党领导分子从心所欲造出来的，或真是所谓“不合国情”的，而实实在在是国家政治经济现象的结果。至于先生的第二个问题——一方面当局感觉不安一方面人民要求改革，我以为也即是上面同一性质的问题，症结同在国民党承认并实行一个共同纲领。

要达此目的，无疑需要各方面努力，两党党员及领袖以至全国各界一切关心民族前途的人，应为共同促进并实行这个纲领而奋斗。两党的事不是两党私事，而是国民公事，先生于此关心至切，钦佩无已。远承下问，略述鄙见，尚希进而教之。手此奉复。敬致
民族解放之礼！

毛 泽 东

二月十五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二卷刊印。

毛泽东、滕代远关于一一五师 向河北、山东等地进军问题 给朱德等的电报

(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五日)

朱彭林左并告周叶⁽¹⁾：

当敌集力攻陇海路时，河北全境及山东境内乃至江苏北部必甚空虚，同时晋察绥三省之敌一时尚无力南进。在此估计下，请你们考虑下述问题并电复。

甲、用一一五师全部向东出动，徐⁽²⁾旅由阜平出至天津、沧州、北平、石家庄间，师部率陈⁽³⁾旅由现地经邯郸、磁县地域出至沧州、齐河（济南北岸）、石家庄、彰德间活动一时期为第一步。如证明大兵团在平原地域作暂时活动是有利的，而且渡黄河向南与渡运河向西均不成问题，则实行第二、第三等步。否则至不能立足时及他方紧急时，向安徽、河南出动，或向西撤回。

乙、假定第一步有利，又能过河，又能得国民党同意，则实行第二步。两旅并列，分数路突然渡河，转入山东境内，在津浦路东山东全境作战，并以鲁南山地为指挥根据地，并发展至徐海南北。在此步骤内依情况尽可能持久，然后实行第三步。

丙、第三步转入安徽，以鄂豫皖边为指挥根据地，为保卫武汉而作战。

丁、如第一步实行后，河南、武汉危急，则或不去山东，将第三步改为第二步，或以徐旅出山东，而以陈旅出安徽，此时当另以一二九师主力出豫西策应作战。这时当依情况再定。

戊、但一一五师最后准备转入豫西与鄂西。

己、这一战略行动在国内国际之政治作用很明显不必说，从抗日军事战略说来，也是必要与有利的。问题是比较带冒险性，实际可能程度如何，主要是大小河流障碍能否克服问题。

庚、如经你们考虑认为可行时，则请周叶向国民党接洽出河北的各种必须事件，但切不可提出出黄河以南的问题，第二步以下完全不要提。

毛 滕

十五日

根据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集》
第二卷刊印。

注 释

〔1〕指彭德怀、林彪、左权，周恩来、叶剑英。

〔2〕指徐海东。

〔3〕指陈光。

项英关于部队改编等问题 给中共中央长江局等的报告

(一九三八年二月十六日)

陈、周、博并转毛、洛⁽¹⁾诸兄：

我到湘赣和赣南各地改编部队传达指示，到十二号才返南昌。此间整个情形分述如下：

一、江西自从去年取得和平后，各地工作取得一些发展，特别是部队的相当扩大，不可免的磨擦就不断发生。熊式辉及其所属，遂集中视线到我们方面，土豪官僚更乘机进攻。另一面大造谣言，借端生事，同时将以前“进剿”时由叛徒所集合的党政工作团扩大到各行政区（第一行政区设一分团），布置特务工作，专为侦察我们的行动和组织。近来，更有企图暗杀的计划。当着我们部队还未开拔以前，在赣东、湘赣等地，布置保安团进行威胁，借故挑衅。特别借蒋⁽²⁾之密令（全部开赴前方，否则“进剿”），积极借端寻衅，以达到进攻之目的。

自从《扫荡报》、《武汉日报》社论发表以后，此间CC更在各方扩大“只有一个信仰和主义，只有一个党和政府，只有一个领袖”等宣传，最大木牌标语到处树立。毛的谈话⁽³⁾发表以后，此间反映还未正式表现，将来等熊和范⁽⁴⁾争取一批人从汉口回来后，就必然明了的。

二、自熊式辉回南昌以后，他们积极扩大保安团，现已成立二十五个团，还在继续扩充。全省每一行政区设立一个游击

支队司令部，搜刮民间枪支，强编民间武装，并到处□□会青帮等，以作他们之助。

南昌曾办了一个青年服务团训练班，学生千人，我们的影响在其中很大。熊指为是共产党的，□□将其分散各乡，并用位置和金钱示惠，结果学生不愿去，只得分成几个队到各县做宣传工作。因此，熊等感觉到处有我们的人，并通知各地严密注意我及黄道之活动。目前，熊为培养自己的力量，另办一个地方政治学校，以便分发到各县、区机关服务。

目前的形势，他们集中视线对付我们，并感觉处处有我们的活动，十分恐惧。一方面严加戒备，同时从下属进行破坏，因此更使土豪乘机活跃。在各个斗争较深区域，在部队开走之后，大小的事故不可免的要发生。

三、江西整个政局当然是十年内战所构成的死闷恶劣的现象，因此比武汉、长沙还要差。政府成分多系熊之同学、同乡、亲朋所把持，完全是做官发财，虽有少数较开明的人，为了吃饭的原故，也只能讲一些风凉话。

CC是范争取所领导，范是极端反对我们的。但各县的CC有一些是无所谓，混饭吃而已。

最近蒋经国当了保安副处长以后，与熊式辉之旧熊滨为争取权柄发生暗斗甚烈。但蒋对我们无什坏的表现。

四、各部队除高、张⁽⁵⁾两部外，新的成分占多数。目前，整编傅秋涛为第一团队，湘赣及赣南合编为第二团队（属陈毅支队）；张鼎丞及闽南、汀瑞⁽⁶⁾合编为第三团、第四团，但人数仅足四个营；黄道部编为第五团，叶飞编为第六团；高部编为第七团，周骏鸣编为第八团（人数仅两个营）；赣东北部队编入第一支队（人数仅百余人），刘英部（人数约四百余）将来准备编入第二支队（张鼎丞）。各个部队新兵现占多数，老

的指战员几乎都变成干部，因此干部能力就显示十分弱，特别是军事干部，大多数不能胜任。这在领导部队特别是作战时，要感觉很大的困难。目前又无干部代替，本想抽出训练，但部队就无人领导了。

过去，各部队系住各地，缺乏充分的抗战动员，所以在动员开赴前线 and 开拔中，发生不断的逃亡现象。有些部队扩大多带招兵性质，因此成分上表示复杂，巩固部队和淘汰坏分子的工作也就十分重要了。

武器缺乏得很，除高团有千枪，叶飞团有六百余，二团有五百余外，三、四团不到千枪，傅团仅二百，黄道团仅二百余，周团有四百余。因此徒手太多，加以枪支中有很多土造单响、五响，这样去作战，显然太弱。叶⁽⁷⁾弄来五百枪，须在月底才能到来。

各部的服装还未补充够，有些还穿着长衫，真不像样，没有办法，已拿一批钱去做了。

各部指挥机关不健全，仅有几个光杆负责人。因此，在领导部队、改造部队，曾有心有余而力不足之慨。

现在第一支队的两团已开拔，第二支队等接收安庆来枪支后再开动，第三支队正在补充衣服，准备开动。

五、各地方工作多有依靠部队为活动靠山，决定部队开动以后，纷纷要求给部队的符号、名义作掩护，不了解利用合法方式作公开活动，游击战争的一套老方法自然运用不灵。因此影响我们工作的开展（如动辄跑到联保保长那里，命令他召集会，或者要他答应活动，完全不了解群众工作的方法和方式），同时，也是下面增加磨擦的一个原因。

党的组织发展非常不够，很多地方是恢复与建立党的组织（如湘南、汀瑞、湘赣、闽赣、闽浙赣等），党员数量除闽西、

湘鄂赣有相当数量，其他不多。因此，特委除湘鄂赣、湘赣、闽赣、闽东北、赣粤、闽西、闽东外，湘南暂不设立，归赣粤边指挥，汀瑞归闽西指挥。关于城市工作，仅南昌、吉安开始建立。

原来被失的地区，仅兴国有发展，和谈后，其他各地仅有一些关系和少数组织。但一个最中心的问题，就是过去党员十分之九以上都是自新过，现在又来积极找我们，兴国就占大多数。这一问题，必须有一妥善办法解决。目前，熊式辉及一般土劣官僚正从各方找自新自首分子（党政工作团），来团结他们，向我们进攻。目前我们的态度暂不宣布，仅要他们参加群众工作、填表，否则叛徒就可借此号召团结他们，那就对于我们不十分有利。

六、游击区无论党、军干部都十分的弱（除闽西、湘鄂赣），对于党的政策了解十分差，加以过去游击中个人集权领导，结果没有把一般干部的创造性、积极性发扬起来。因此表现十分的散漫和不紧张的精神，学习的情绪不高，使地方工作不能迅速开展。

陕北来的干部大部分是好的，但劳苦功高、享乐倾向、缺乏艰苦工作的精神，思想回家，特别是闹钱等等，表现得或多或少有。因此在地方中也发生逃出现象，在陕北来的也逃跑了两个。

为了建立四军和开展地方工作，都必须加强得力干部到各部队和各特委中才好，使领导机关健全，一方面教育，一方面在工作中有正确领导，推进工作迅速开展。

七、分局⁽⁸⁾到现在还未正式的把组织弄好，有计划的去指导各地工作。曾山同志找到湘赣、赣南一次，日内即可返南昌，黄道不久可来。方方不能调来，因为张、谭、邓⁽⁹⁾都随

队。方方再走，闽西就失了重心。……这样以来，分局确成问题，仅曾山与黄道两人（黄还要兼南昌特委），当着我们部队出动以后，地方纠纷更多，工作第一步的指示是关系整个工作的开展，分局现有的力量仅仅是勉强应付日常工作，不能把江西（北）的工作局面打开，这是值得考虑的一个问题。

八、党、军经费均成问题，军队的增补两万元还未完全批准。党费每个特委最低要一千七八百元，多到三千元（闽西），但长江局所批五千元还不够闽西和另一二个特委经费。目前四军自身难顾，何能帮助分局，必须先设法增加一万元的经费才行。

目前，我们的工作，我的意见如下：

一、努力集中部队开赴前线，避免正面冲突。努力在各方面开展统一战线，特别是利用各县区保联与我们接近的关系，巩固统一战线，开展下层的群众工作。

二、党的工作，应该是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分开和正确联系，以保证在任何意外事变而不致遭受打击。

三、争取一切抗日分子与我们站在一边，竭力避免继续过去国共的对立现象和冲突，转为大多数抗日力量，反对少数坏分子和不抗日者，特别争取一切前方和地方的武装，建立统一战线和我们的工作。

四、以毛的谈话作为目前宣传纲要，向各方面进行宣传解释，联系我们部队的出动，证实我党的态度，揭破一切谣言和阴谋。

五、加紧对于干部的教育，使明确了解党的政策，转变我们一切工作方式，正确运用党的策略。

六、分化叛徒，争取普通自新自首分子的善意中立，以削弱反对者的进攻力量。

七、巩固部队，建立部队正规生活，保持我们的传统精神，提高战斗力，争取在抗战中的大小胜利，仍然是我们当前的中心工作。因此，我认为目前我们要以全力到部队中去工作，准备随部队行动一个相当的时期（约三个月到半年）。

八、中央应派一个最得力的领导人来负分局领导责任，否则分局的力量不够应付当前的局势。因为这个时候是我们将来工作开展的一个关节，部队与地方都如此。

九、部队中要调一批较强的军政干部来，使力量加强，争取部队在短期内坚强起来，同时加强一部较强的地方干部，去加强各特委更为必要。

十、你们切实设法帮助一批钱给我们添购武器，这是将来生利的本钱，本钱不强所生的利息也不多。这一点不单是为四军前途，而且是为当前抗战的发展都有意义的。

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因为分局同志不在家），你们有何指示？望告。并请长江局和中央经常给我们的工作指示才好，一切情报和消息也望常能供给。

致

布礼

项 英

二月十六日夜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二〇〇三年出版的《项英军事文选》刊印。

注 释

〔1〕指陈绍禹、周恩来、秦邦宪，毛泽东、张闻天。

〔2〕指蒋介石。

-
- 〔3〕指毛泽东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
 - 〔4〕指熊瑾玎、范长江。
 - 〔5〕指高敬亭、张鼎丞。
 - 〔6〕即福建之长汀、江西之瑞金的简称，这里指闽赣边游击区红军游击队。
 - 〔7〕指叶挺。
 - 〔8〕指中共中央东南分局。
 - 〔9〕指张鼎丞、谭震林、邓子恢。

毛泽东关于力争建立 长期抗战的主要战略支点问题 给朱德等的电报

（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一日）

朱、彭、林师、贺师、刘师、汉口^{〔1〕}：

甲、在设想国民党能够独力最后保卫武汉的情况下，蒋^{〔2〕}是不会让我们插足于鄂豫皖的。但如果不然，蒋容许我们插足的可能就存在。

乙、长期抗战的重要战略支点有山西区、鄂豫皖区、苏浙皖赣边区、陕甘区、鄂豫陕边区、湘鄂赣边区等六处。这是设想在西安、武汉、长沙、南昌四点被敌进攻及万一不守时，必须力争建立抗战根据地的主要战略支点，而以苏鲁边区、冀南区、热冀边区、大青山脉区辅助之。如果武汉等处万一不守，这一切区域包括武汉附近在内容许我们插足的可能存在的。

丙、因此三个主力师位置，大体上应预拟一个位于鄂豫皖区，一个位于鄂豫陕区，一个位于陕甘区，即两个在内线，一个在外线。

丁、平汉以西的内线地区虽广大，但仅有汾水、渭水、汉水三流域较富庶，而汾渭两流域都是敌所必争的。要使三个师都有广大发展前途，在战争中起重要制敌作用，并影响全国，准备以一个师位于鄂豫皖是必要的。这种意见当然还可以继续

考虑。

毛 泽 东

二十一日

根据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集》
第二卷刊印。

注 释

〔1〕指彭德怀、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一二〇师、第一二九师和汉口中共中央长江局。

〔2〕指蒋介石。

关于武装农民问题^{*}

(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二日)

徐 特 立

中国的国民经济，主要的还是农业生产，因此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是农民。在目前抗战时期，经济上、财政上、军事上、政治上，农民确是一个伟大的力量，因此我们抗日救亡，首先就要使农民得以自卫自治。仿古人寓兵于农之意，仿曾国藩所提倡的乡勇制度，用来组织农民、武装农民，在有事则兵、无事则农的办法下，培植数千万不发饷的民众武装，一方面用来巩固后方，尽着保安团的作用；另一方面配合正规军作战，尽着国防后备军的任务。目前作战半年以上，还没有把广大的农民组织起来、武装起来，成为不脱离生产自卫自治的军队，反而广大的农民受着土匪的抢劫、溃兵的骚扰、贪官污吏的勒索、劣绅的敲诈，致有不能安居乐业的恐慌，又加上修筑道路、充当运输需要的伏役，并不是按人口有计划的、有纪律的进行征发和雇用，而是用拉夫的方式。在征兵方面，也是一样，以致农民感觉不到他自己还是一个国民。他们的心理，只是怕土匪，怕溃兵，怕绅士，怕官。逃亡的现象已经开始：一方面逃往城市，乱找瓜葛关系，一方面加入土匪队伍，因此土匪却得到大量的补充，国军反而形成补充不易。现在春耕已经

^{*} 本文原载播种社一九三八年五月出版的《抗战中的政治问题——徐特立先生论文集》。

到了，田亩荒芜还十分可虑，地方不靖，军食不充，这样持久作战的战略，就将无法实现。这并不是危言耸人听闻，而有事实为证：湘西的土匪之多，多至八九十股，湘南陈铁侠在郴州一呼，即有不少的农民团聚在他的旗帜之下，成为一个力量，沐阳和泗县的农民，也曾经反抗过征兵，这一类的现象目前并没有消灭，而且正在发展着。这就足以证明现在的区乡保甲制度是和农民对立的，没有利用农民来参加抗战，使农民自发的来拥护区乡保甲；没有利用农民自治自卫的武装，来围绕在区乡保甲长的周围，尽保卫地方之责。反使地方武装成为向农民要款的脱离农民的游击队和民团，以致成为压迫农民的有力工具。

以上这些是偏重安定民生、巩固后方一方面之言的。只说明了消极的一方面，下面再把农民自治自卫的积极作用，略加说明。

一、中国面积广大，交通不发达，日本军队只能择交通要道成线形的占领；只能择军事要点，成点形的占据。我们的农民散居在广大的农村里。农民武装可成为面的作战，随时从敌人的侧翼和后方打击敌人，使敌人疲于应付，不能深入内地，至少也不能迅速的深入内地，而加强他的统治。

二、我们的军事要时刻不忘持久作战的原则。因战争的持久，就需要人力和财力，那么生产和军事就像一个人的左右手不能分离。只有寓兵于农的武装，才有打仗和耕田两种作用。这种寓兵于农的办法，现在还没有。现在我们后方只组织有脱离生产的游击队和民团。在后方不作战的游击队和不作战的民团，这种脱离生产的部队，在敌人未来时无事可做，没有尽保卫地方的责任，首先削弱了我们的经济力量。

三、日本的空军作战可以深入到我们后方，敌人的迂回包围常使我们的后方变为前方，同时我们也要用游击队深入敌人

的后方打击敌人，用蚕食的方法去消耗敌人。于是，我们就成为无后方的作战。广大的农民组织就是我们活的后方，不固定的后方，适于游击的后方。就是要把民众广泛的组织起来，以民众作我们的后方。

四、中日战争两方面的精神，是完全相反。日本是为着少数资本家和军阀等少数人的利益而牺牲国内民众的利益，用来进行重分世界而侵略殖民地。因此，日本在进攻中国过程中曾引起几次政变。日本在持久作战中，遭着失败就有转变为国内的人民革命和殖民地革命的危險。日本已经不能用精神来团结，他们所恃的是物质胜过我们；我们所恃的是民族精神胜过日本。卢沟桥事变后，中国由分裂进而统一。因为中国的抗战是为着全民的利益，是为着世界和平，不独能动员全民族参战，还可动员国际主义者来参战。所以，目前在抗日救亡的国策下需要有广大农民的自治自卫的组织，去利用我们精神团结，来回答日本先进的物质进攻。

五、中国农民素来不离开家乡，兼之小生产者缺乏组织性，因此动员参战特别困难，经过全体农民武装的组织，使之组织化、纪律化，就可把农民自卫的组织转变为国防军队，转变为征兵制，在有形或无形中去进行不扰民的教育，而扩充着庞大的后备军。

六、我们的正规军还没有做到官兵一体、军民一体。只有农民武装起来，使军队就是群众，官长就是父兄，天生的军民一体、官兵一体。古人所谓“子弟兵”，就是这种同乡共井的军队。从这种军队中产生出来的正规军队，更容易做到官兵一体、军民一体的条件。

七、没有后方作战的军队，他的组织群众和教育群众的任务，是与打仗有同样的重要。所以每一个士兵都要知道组织群众、建立政权的常识，这种部队是要经过自卫的农民武装，才

能训练出来的。

八、普通农民是富于保守性，乡土观念特别浓厚的，所以不容易动员他们来当兵，但是可以利用他们这种心理组织保卫地方的农民武装，经过野外演习，经过配合正规军作战，当提出防守的口号时，提出保卫本乡各须首先保卫邻乡，保卫本县必须首先保卫邻县，把防守的口号联系到唇齿相依的口号，准备由防守的部队转变为进攻的部队。

九、现代战争，需要避免飞机大炮的特殊威力。因此需要利用地形，需要各自为战，因此队伍不必求其整齐，但在精神上必须一致，带地方性的农民武装是最适合这种条件的。因为本地人地形熟悉，善于机动；本地人举目都是亲故，打散了终必归队。所以从地方武装出身的正规军队，最利于疏散，可分可合，长于独立作战，便于游击战术。在满清咸同时间，从乡勇出身的湘军转战十六个省，没有吃过败仗；当法国大革命时，拿破仑统率一群训练时间很短的民军，把欧洲许多国家已经训练了一二十年的老兵都打败仗，这便是很好的先例。

十、农民武装是正规军游击队和保安队的后备军，其中一部分先进的分子，在战争直接需要时可编为游击队，另一部可编为保安团，其余大多数仍为寓兵于农的地方武装，而保安团和游击队即可随时准备转变为正规部队，这也是切要的。

十一、在长期作战时，不断的需要运输和担架，同时还需要有收容溃兵、收容伤兵、收容难民的组织，并且锄奸工作、放哨工作，更需要群众参加；因此民众要普遍的组织化，利用一切群众组织来支持前线，来巩固后方。过去的军训民训，是自上而下的，民众处在被动地位，因此不能发挥民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民众消极起来。所以我们组织民众，需要给民众以积极自治自卫的。

十二、在作战时期，溃兵和难民最容易破坏生产的组织，

同时在军事及其他动员使力役繁多，又容易使劳动力浪费，再加上保安团和游击队数量太大，留在后方坐食，必然会破坏地方的生产力，对于持久作战十分不利，所以我们需要寓兵于农的农民武装，才可避免这些弊病。

在长期抗战的今日中国，在第二期抗战还正在开展的今日和从第一期抗战所给予我们血的经验与教训，武装农民确是时代和环境所赋予我们的主要任务；而武装农民大众是必须从自动的方式去进行。农民的武装是与农民的自治自卫不可分离的。我们为着保障民族抗战最后胜利，是不可忽略这一伟大任务的。

二月二十二日于长沙

根据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出版的
《徐特立文集》刊印。

毛泽东、任弼时关于保卫西安、 武汉的战略计划及我军将来 之行动给朱德等的电报

(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三日)

朱彭，林聂，贺萧关，刘徐邓，胡杨，陈周博叶⁽¹⁾诸同志：

甲、敌情判断

(一) 敌为夺取陇海、平汉两路直取西安、武汉，决胜点必在潼关、武胜关。

(二) 敌取潼关，依地形，由洛阳西攻较难，由临汾南攻较易，因此，平汉、同蒲两路之敌，似力求由东北两方，分数路向晋南，其总目的在驱逐晋境我军，占领临汾、风陵渡，最后夺取潼关，保障进攻武胜关之右翼。其沿道清路西进之敌，似有由孟津渡河先占洛阳迫令晋境我军南退之企图。

(三) 敌攻武胜关之兵力，主要当从津浦路转来。平汉、同蒲两路之敌，主要当用于夺取潼关。

乙、战略计划第一部

(一) 为保卫潼关及西安而战，不是将全部兵力处于平汉以西黄河以南之内线所能胜任的，如此必至不能保卫潼关与西安，正和过去将全部兵力处于雁门关、娘子关内线不能保卫太原相同。

(二) 为保卫潼关，我们认为必须将兵力分为两部：第一

部，刘峙、宋哲元、商震、胡宗南、樊崧甫诸军，固守郑、洛、潼线，策应该线以北诸军之作战，反对敌人渡河。第二部，黄河以北诸军，包括阎、卫^[2]及八路全部，坚持晋南晋西战局。在好的情况下，力图在临汾以北以东两地区歼灭敌人，顿挫敌之进攻，并出有力一部于道清路北，钳制企图渡河之敌。在坏的情况下，即设想万一临汾不守，洛阳被占，我晋境诸军亦万不可过河，而应转入外线，反过来攻敌之背，截断敌之来路，并图歼敌，根本破坏敌攻潼关计划。在敌进占晋城、霍县、隰县三点时，我军即应以不少于半数之兵力，转入三点之外翼（转入敌后），方能制敌。

（三）我们认为必须力求蒋、白^[3]、阎、卫同意上述计划并鼓励各军执行，方能保卫潼关，亦即保卫了武胜关，保卫了武汉。否则潼关一失，武胜关即处危险中。

（四）假如阎、卫不愿或不能执行上述计划而溃退过河时，则这些军队不但不能参加保卫潼关，反有影响洛、潼诸军之虞。

丙、战略计划第二部

（一）为保卫武胜关及武汉而战，首先须潼关确保在我手中，其次则用正面之阵地战，配合两翼之运动战。

（二）两翼运动战，必须确定至少有二十万左右兵力，长期位于平汉以东，这与在山西配置重兵同等重要，非万不得已，不退豫鄂西，方能配合正面及西面诸军，有力地保卫武胜关及武汉，即使武汉不守，亦使敌处于我之包围中。

丁、八路军将来之行动

（一）假设在山西配合阎、卫作战有利，达到了歼灭及钳制敌军确保潼关、西安之目的，同时武胜关尚无危险，则全部继续在山西作战，并准备加派一部出河北建立华北坚强抗战堡垒，用以捍卫中原、西北及武汉。

（二）假设阎、卫能够执行前述计划，潼关、西安巩固，

但武胜关、武汉危险，则应抽出一个师转入武胜关以东，配合友军作战。

（三）假设阎、卫不能执行前述计划，潼关、西安危险，但武胜关、武汉尚无危险，亦应抽出一个师转入潼、西线，配合友军作战。

（四）假设潼关、武胜关均危险，则应抽出两个师南下，一个位于平汉以东，一个位于平汉以西，配合友军作战。仍留一个师，活动于山西、河北，非至某种必要时期，不撤回来。

（五）边区留守部队，担负陕甘任务。

戊、我们认为必须告诉国民党，如果近百万军队均退至黄河以南平汉以西之内线，而陇海、平汉尽为敌占，则将形成极大困难。故总的方针，在敌深入进攻条件下，必须部署足够力量于外线，方能配合内线主力作战，增加敌人困难，减少自己困难，造成有利于持久战之军事政治形势。

己、以上是我们意见，你们意见如何，盼告。

毛泽东 任弼时

二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时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二卷刊印。

注 释

〔1〕指彭德怀，林彪、聂荣臻，贺龙、萧克、关向应，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刘少奇、杨尚昆，陈绍禹、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

〔2〕指阎锡山、卫立煌。

〔3〕指蒋介石、白崇禧。

论抗日游击战争*

(一九三八年)

朱 德

总 论

第一节 游击战争在抗日自卫战争中的重要意义

一 抗日游击战争的定义——抗日的大众战、民兵战

抗日游击战争，这已经是传遍全国的一个新的名词。有不少的人在议论它、研究它。书局里出版了许多书籍论述这个问题。许多爱国人士、民族英雄，已经在把它付之实践，例如东北的人民革命军、义勇军。晋西北、晋冀察、山东、河北、绥远以至上海的郊外，抗日游击战争也已经广泛地发动起来了。以上这些事实指给我们，对于抗日游击战争的理论予以深刻的研究，实为必要。

抗日游击战争，它为什么会自然地而且广泛地发动起来？这种战争的实质是什么？它应该有个什么正确的定义？

事实告诉我们：抗日游击战争，并非谁能故意制造出来的东西，同时也没有力量能够把它取消。它是一种时代的产物。

* 这是朱德撰写的一部军事著作，全书共三章十七节。这里收入第一章“总论”和第三章“抗日游击队的战术”的前两节。

苏联出版的《游击队怎样动作》一书上说：“游击队是不大之武装的游击支队，当某一个领土被敌人占领时，这一支队即在该敌人后方动作。”又说：“在一切战争当中，人民或人民之某一阶级都是有充分理由来热烈仇视占领其国土的敌人，所以战争是激起人民之游击运动的。”在中国目前具体情形之下，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动，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日寇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的人民不愿做亡国奴，他们或者有武器，或者没有武器，或者有军事人才，或者没有军事人才，他们不管这些条件，就在敌人远近后方或者敌人将到的作战区内自己动手干起来。或者，经过抗日政府与抗日军队，有计划地分派出正规部队担任游击的任务和组织民众的游击战争。抗日游击队就在这中间形成起来。它包含着各种抗日的社会成分，得到全体同胞的拥护。每个抗日游击队的产生和发展，都是一部悲壮激烈、可歌可泣的史诗。

由此可见，抗日游击战争是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领土这一历史条件之下产生出来的。它的实质，是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同胞为了救死求生而采取的一种最高、最广泛的斗争方式。它以日本帝国主义为其敌人。

抗日游击战争的定义因此应当是：抗日的大众战及民兵战。我们指明它是抗日的，以与其他的游击战争分别开来；我们指明它是大众战或民兵战，以与正规武装部队的战争分别开来。

但是，抗日游击战争虽然与抗日正规军的战争有着区别，这两者之间也并无不可逾越的鸿沟存在。一方面，抗日游击队当它长大起来，或者几个游击队集中在一起时，也能作较大规模的战斗；另一方面，正规军队，只要它与群众有着很好的联系，得到群众的同情与拥护，它也可以分派出小的甚至相当巨大的部队，进行游击战争。

抗日游击战争是抗日战争的一部分，是抗日战争中的一种

形式和一个阶段。

抗日游击战争，更值得我们全国同胞和一切支持正义的人去同情和赞助。抗日游击队处在敌人后方，他们的斗争非常困难，他们有的几乎以赤手空拳抗击强敌，为我民族争光辉、争人格。对于艰苦奋斗的抗日游击队，我们全国同胞，当然更应钦敬他们，帮助他们，鼓励他们。

我们在上面已经说到，抗日游击战争是抗日的大众战、民兵战。现在我们要指出几种对于抗日游击战争不正确的了解。

第一种，以为抗日游击战争是一种神秘的东西。我曾经看见一本书，举出三国时诸葛亮的战例来说明游击战争。据该书著者的意见，抗日游击战争似乎是军事天才如诸葛亮的发明，而不是一种群众运动。这种对于抗日游击战争的了解，可谓一窍不通。抗日游击战争，绝对不是某个军事天才的独得之秘，或者什么奥妙无穷的东西。抗日游击战争，本质上是抗日的群众运动，不过它是群众抗日斗争的一种最高方式罢了。离开了群众，就根本谈不上抗日游击战争，而抗日游击战争的全部秘密就在于它是一种群众运动，一种群众抗日自卫的武装斗争方式。

第二种，以为抗日游击战争与我国历史上的农民游击战争或军事天才诸葛亮等所发明的若干战法一样。这种说法，有一部分道理，因为现代的抗日游击战争，其反抗性和一些战法的原则（如声东击西、避实就虚之类），是与历史上的许多游击战争大致相类。但这里有一个大的不同：过去中国的游击战争，一般是以刀矛相战，与现在以劣势武装对现代化军队作战的抗日游击战争大不相同。所以，抗日游击战争，主要地应从现代的游击战争中，从一八七〇年普法战争中，从俄国十月革命后的国内战争中，从中国十年来的国内战争中吸取经验教训，而更把这些经验教训，在新的条件下加以研究，使之完全

适合于全国一致抗日的条件。

第三种，以为抗日游击战争即是十年来的国内游击战争。这种说法有一部分理由。因为第一，现在发生着和发展着的抗日游击战争，的确从过去十年的国内游击战争中取得了许多宝贵的经验。第二，它的干部中的确有一部分是十年来国内游击战争中锻炼出来的干部。但这种说法并不完全正确。不但如此，而且这种说法犯了很大的错误。它看不见现在的抗日游击战争是以日本帝国主义为唯一敌人的，与过去的国内游击战争大大不同。它看不见对过去的国内游击战争，我国的人民不是全体都同情的，那时游击队的队员，也只包括工人、农民的成分。现在的抗日游击队，则得到我国无论哪一个阶级的同情与拥护，它的成分包含着各阶层不愿当亡国奴的分子，虽然其中主要的成分还是工农。它也看不见抗日游击队不是过去为苏维埃、为土地革命而奋斗的武装，而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产物，是为团结全国一切同胞战胜日寇而奋斗的武装。对于抗日游击队与过去国内游击队的分别的认识，是非常重要的。

抗日游击战争既然是群众运动，那末，任何地方，凡是有了这种群众运动的，有着军队的帮助固然能够发动起游击战争来，没有军队的帮助也未始不能发动起来。抗日游击战争既然包含着各阶层的分子，为各阶层的共同利益而奋斗，它就能更广泛地发动起来，得到全国上下的一致赞助与拥护。

二 抗日游击战争的作用

抗日游击战争是整个抗日战争中的一部分，而且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是取得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主要条件之一。

抗日的民族自卫战争要取得最后的胜利，仅仅依靠游击队，谁也知道是不够的；必须有政治坚定、指挥统一、装备优良的数百万正规的、现代化的国民革命军作为主力才能达

到目的。

但是，我国的抗日民族自卫战争，究竟是弱国反抗强大的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军事技术方面我们处在劣势地位，我们用以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主要因素，乃是政治上的理直气壮和人力方面的无穷源泉。正因为如此，抗日游击战争即是抗日的大众战、民兵战，成为我们抗日自卫战争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成为争取这一战争最后胜利的主要条件之一。

试举历史上的事实来证明发展抗日游击战争的重要。一八一二年俄国发生“祖国战争”的时候，由农民和小部队的军队混合编成的游击队或单由农民编成的游击队，竟然完全破坏了法国军队的后方工作系统，并且，使法军几乎饿死。一八七〇年普法战争的时候，德国军队占领了法国一大部分土地，那时有种未编入法军的义勇武装队，叫做“自愿射手队”，曾给德军后方及其独立支队许多打击。在俄国十月革命后的国内战争的时期中，在西伯利亚乌拉尔山地方以及在邓尼金将军及波兰人之后方等的红色游击队，不仅时常破坏了和停止了敌人的后方勤务，并且时常阻止了敌人的正式进攻，且于白党将军退却之际更将其被击溃的部队一网打尽。进攻苏维埃共和国的高尔察克、邓尼金及波兰军、日本军，为要和这些红色游击队斗争起见，不得不从战线上抽自己的精锐部队，因而减弱了自己战线的兵力。在中国，十年的国内游击战争，创造了正规军八路军。东北的数万人民革命军、义勇军经常牵制着数十万日伪军，使日伪在东北的统治不能稳定，使日寇很困难甚至无法榨取东北的资源。

抗日游击战争的作用，具体地表现在哪里呢？

第一，在于抗日游击队是民众抗日学校，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武装宣传者和组织者。抗日游击队从民众的群众抗日斗争中发生和发展起来，抗日游击队的本身，就是民族英雄、爱

国志士的集团，也是他们训练自己的场所。抗日游击队与民众的关系，就好比鱼和水的关系一样。抗日游击队如果脱离民众，得不到民众的拥护，就休想在敌人远近后方存在，它迟早会被敌人消灭。因此，抗日游击队为了自己的生存与发展，就必须把自己变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者和组织者，发动和团结广大的民众起来抗日，起来自卫。在这样的行动中，就把广大民众教育成为抗日战士，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了极宝贵的工作，增添了无限的力量。

第二，在于抗日游击战争能够部分地恢复国家领土和维系失地的人心。抗日游击战争在敌人的远近后方发动和发展起来，那里本来已经没有我国军队或者至少没有我军主力，那里已是被敌人占领的地区，或者至少是有被敌人占领可能的地区，那里我国政权机关已经不存在或者已在危险中，那里敌人已经或者将要组织起傀儡政权。在这样的地方，游击战争的发动和发展，根据地的建立，游击行动的进行，将使那里的一部分领土、一部分人民重睹光辉灿烂的祖国的旗帜，重新恢复自己的政权，发扬他们的民族意识，因而奠定了基础和信念，准备下力量和条件，使这块土地和民众终于有重见天日的机会。

第三，在于抗日游击战争能够使日寇无法从它所占领的地区中取得人力和资财的补充来灭亡我国。日本帝国主义是穷凶极恶的帝国主义，是泥脚的帝国主义。它资源缺乏，人口又少，它占领中国一部分领土，就想在那一部分领土上立即取得资源和人力的补充、商品市场的独占，以便更进一步来占领全中国甚至整个亚洲。广大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动，将使日本强盗这种如意算盘完全打破。越是抗日游击战争发展得广大，敌人就越是不能榨取占领区域的资源、人力和独占市场来作为进一步侵略的本钱。敌人在占领区域组织汉奸傀儡政权来代它维持统治，游击战争的广大发动，就使汉奸傀儡不敢抬头。因此，

抗日游击战争对日本帝国主义造成致命的创伤。如果对于抗日游击战争这一作用估计不足，显然是非常错误的。

第四，在于抗日游击战争能够配合正规军作战。抗日游击战争的发生和发展，使敌人士气消沉，这就已经给了我国正规军以帮助了。对于打运动战的正规军队，游击战争的广大发展几乎是保证其取得胜利的最主要条件，因为它可以隐蔽我正规军的运动，侦察敌人，迷惑敌人，扰乱敌人，在作战时钳制敌人的增援部队或者造成我军进攻取得胜利的良好条件。对于我扼守要点的正规军，游击战争可以相当截断敌人的后方运输、弹药、粮秣和有生力量的补充，袭击其兵站等，使敌人的机械化兵种减少威力，后方的死伤与损失甚至超过前方，后方维持交通的兵力等于前方作战的兵力，陷敌于进退维谷、异常困难的境地。忻口战役便是这种配合的例证之一。一般说来，特别因为我国比起日本来是一个弱国，在当前的技术之下，单靠守备部队的顽强抵抗而战胜敌人的事，应当视为例外。阵地战、运动战和游击战三种的配合，是战胜敌人所必须采取的战法，是每个优秀的军事家所应当郑重考虑的原则。

第五，在于抗日游击战争能够为正规军创造优良的后备军和新的兵团。抗日游击战争是民众的抗日学校，特别是民众的抗日武装斗争的学校。那里是千千万万最勇敢、最坚决、充满民族意识和朝气的黄帝子孙，他们不是为了升官发财，不是为了个人的利欲，而是为了民族的生存，在最困难的条件下，几乎是赤手空拳地起来搏斗。任凭敌人怎样凶狠，也丝毫不能动摇他们的决心。他们的精神，真是动天地而泣鬼神。那里能训练和锻炼出百折不挠的铁汉、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从这种艰难困苦的斗争中发展和壮大起来的队伍，补充到国民革命军中或者创立成为新的兵团，他们的胜任愉快是毫无疑问的。抗日游击队的前途，是保卫中国抗御日寇的正

规军队。

总结起来，我们可以看到，发展广大的抗日游击战争，实为我国各界志士极其重大、极其紧要的事业。我们诚恳地希望政府和各界来努力地采取具体办法，协助、奖励和促进抗日游击战争的广大发展。

三 反对污蔑抗日游击战争

虽然抗日游击战争有上述的重要性，但是它仍不免被若干人所误解。汉奸托派亲日派，则更故意想出种种办法来污蔑抗日游击战争。

托派张慕陶，在各种企图失败之后，现在正在计划收编土匪和用极左的口号欺骗农民，组织他的“游击队”成为汉奸武装，为日寇效劳。托派正在徐州帮助日寇组织别动队，而另一些托派如叶青之流，却在攻击和诋毁抗日游击队，称它们为“土匪”。托派们用危言耸听的话来恐吓某些人们，挑起他们对于过去国内游击队的恐惧心理和恶感，而若干人竟居然受其蒙蔽，也对抗日游击战争起了误解。

再则，有少数自私自利之徒，他们不是为了民族的利益，而是为了自己的升官发财，为了骗取委任状，也来组织游击队。这种游击队组织起来之后，扰敌不足，扰民有余，最后自然只有归于失败。这种人，与其说是组织抗日游击队，毋宁说是破坏抗日游击队。

第三，有许多好心善意的人们，因为看到抗日游击队中成分复杂，有若干不良的分子在内，因而对于抗日游击队多少发生疑虑。我们不否认，抗日游击队中会包含若干社会出身不良的成分，而且，这些成分如果占着领导地位，就会坏事。但另一方面，我们要知道，在全民抗日的大潮流中，有一部分社会出身不良的人参加抗日游击队，乃是难免的事。我们所应当注

意的，是去改造他们，诱导他们，教育他们，使他们弃邪归正，变成民族而奋斗的战士，却不能因为有了这种社会成分，而否认抗日游击队的光明前途和抗日游击战争在抗日民族自卫战争中的重大作用。

第二节 抗日游击战争的诸要素

一切战争，离不了政治、经济、人员、武器、交通（包括地形）五个要素，在这五个要素的具体条件和敌我的对比之下来定出具体的战略战术，游击战争也当然不能例外。唯武器论者的根本错误，是在他们只看见武器一个要素，而完全看不见其他要素。

有一种意见，由单纯军事观点出发，以为游击战争除了灵动机巧的战术而外没有旁的东西。这种意见是不正确的。游击战争与别种战争一样，要能完全适当地运用和发挥上述五个要素，尤其因为游击队在某些要素上特别薄弱（例如武器的不精良、不齐全，经济的困难），所以更要善于发挥五个要素的特质，适当地运用它们，才能用其所长、去其所短以战胜敌人。游击战争与其他战争有一个显著的不同点，这就是它的最主要的作战要素，是政治要素。这就是说，抗日游击战争主要的是政治战争。下面我们来把游击战争如何适当地应用五个要素的问题一一加以考虑。

一 政治战争

一切战争，都具备着政治的要素，也可以说，没有政治要素的战争是没有的。拥有现代化军队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劣势武装的中国，如果照唯武器论者的说法，日本帝国主义强盗是用不着对中国进行任何的政治战争，就可以奴役中国、灭亡

中国了。但实际上，日本帝国主义绝不像唯武器论者那么设想。日本强盗用了多大的力量，宣传“日本人口过剩”的侵略理论，是大家都知道的。日本强盗用了多少力量在中国收买汉奸托派挑拨离间，以华制华，讲求所谓利用“恐日病”者，提出“共存共荣”、“东亚和平”、“剿共灭党”等等口号，这又是大家所知道的。只要读过田中奏折和松室孝良秘密报告的人，就可知道日本强盗丝毫不因为自己有了现代化的武备而稍稍忽略了政治要素的运用。相反地，它从前和现在都没有一个时候不在讲求如何在政治上战败中国，它从前和现在没有一个时候不在讲求分裂中华民族、以华制华的毒计。

拿日本强盗对于政治战争的如此注意与中国某些政治家来对比，就可以看出这些政治家对策的程度太差。因为这些政治家觉得要战胜日本强盗，连抗日自卫的广泛宣传与教育都是多余的，都是用不着的。

由此看来，我们就可以得出明白的结论，我们应当认识政治要素在战争中的重要地位。我们每个政治家，每个抗日军人，每个有民族觉悟的黄帝子孙，都要竭力于注意抗日的政治战争，就是要努力揭破敌人一切侵略政策、分裂中华民族以华制华的阴谋，要努力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想到我们比起日本来是个弱国，想到我们所进行的是进步的革命的战争，我们就更要注意政治战争了。

尤其是游击队，如果不注意最大限度地运用自己的政治武器，想单纯地拿刀矛对抗敌人的飞机、坦克，是没有不被消灭的。抗日游击队必须最正确、最灵敏地使用自己的政治武器，认识到这是自己的第一件最宝贵的武器，认识到政治战争的胜利虽然是眼睛看不见的，但其实际意义却等于缴了敌人许多枪炮，甚至还不止此。

政治战争的要点，第一，在整顿内部，除去内部队员中不

正确的观念和坏的习惯行为，求得游击队本身钢铁一般的团结，无论如何不会瓦解，任何的风浪都能经得住，吃得起。抗日游击队如果以升官发财、大吃大喝，以个人的光荣为目的，是不能团结的。只有以同一政治目标，完全站在保卫民族、国家和人民的立场上，不惜牺牲自己的身家性命以求得抗日民族自卫战争最后胜利，才能把抗日游击队团结成为坚强的队伍，才能号令如山，上下一致。个人自私自利、闹意见、闹派别、以升官发财为目的的人，不配当光荣的抗日游击队员。

政治战争的第二个要点，是以群众为堡垒，把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如果抗日游击队不能团结群众、维护群众利益，不能使群众成为游击队的良好依托，那末，这样的游击队将会没有出路。抗日游击队与群众的关系，好比鱼和水的关系一样，鱼在水中才能生存和长大，抗日游击队有了群众依托才能生存和长大。鱼一离水就死，抗日游击队一离开群众也就无从生存。抗日游击队是由群众之中生长起来的，而不是从群众之外来的东西。就是正规军派出的游击队，也要做到使当地的群众认为这是自己的队伍，是与自己切身痛痒相关的队伍，才能生存和发展。

团结群众的政治中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日本强盗侵略中国，半壁河山已经丧失，亡国的危险临在每个中国人的头上。即使过去有着怎样的深仇积怨，便算是杀父之仇罢，在这大难当前的日子，也不应再记往日的仇恨，而唯有团结起来一致对付当前最大的敌人，在“抗日高于一切，一切为着抗日”的原则下和衷共济，为大家的共同利益而奋斗，才是出路。不但应当不记过去的仇恨，而且要撇开对于将来的惧怕。因为今天的问题是亡国不亡国的问题，在这样的紧急关头，合则同存，分则俱亡。如果为了自身的富贵，以一己的私利，惧怕统一战线的巩固扩大，惧怕群众的发动，这是不怕做亡国奴的人

们才干得出的事情。

团结群众的最重要工作，就是抗日游击队政治纪律的优良。要做到不拿同胞一针一线。要实行进出宣传，打扫清洁，借物要还，损物要赔，买卖公平，讲话和气，不乱拉屎，尊重习俗等八项注意。

政治战争的第三个要点，是瓦解敌军。对于与我作战的日军及伪蒙伪满军队、保安队等等，估计到它们的士兵和一部分长官是不愿当日本强盗侵略中国的牺牲品的，他们或则思念家乡，或则不忘祖国。抗日游击队应当用种种方法，如散发传单到敌军之中，喊话（用他们所懂得的言论），连络伪军里亲戚朋友等等，揭破敌人欺骗的政治宣传，指明侵略中国是于他们无益而有害，使他们知道自己是帮助敌人——日本军阀来打自己的朋友，使他们明了我们抗日自卫战争的政治意义，说明我们与他们之间并无仇恨，说明即使他们战胜了，他们也是一样的受苦，说明他们只有用革命的败北主义——掉过枪口来杀日本军阀和汉奸才能得到自己的解放。用这种种方法，使他们不反对以至同情我们的抗日自卫战争，使他们厌恶以至反对丑恶残暴的进行侵略战争的日本军阀和汉奸。

对于敌人国内及其殖民地的工农运动、反战运动要与之取得联系，取得互相的帮助。

抗日游击队必须牢牢记着，如果舍弃或者忽略上述的工作，要想用粗劣的原始的武器来战胜强敌是不可能的。不仅如此，连自己本身的生存和发展都没有可能。因此，把抗日游击战争要素的政治战争这一武器，提到最主要的地位，吸收全体队员不懈怠地来进行政治工作，使每个队员都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者与组织者，每个队员都成为抱着牺牲自己为国家为民族奋斗到底的民族英雄，更希望造成为具有天才的优秀政治家，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

二 经济战争

我们说，抗日游击战争，它的主要要素是政治要素，要竭力发挥它对于政治要素的运用，但这并不是说，政治即是游击战争的一切。我们还要考虑到其他四个要素。现在让我们考虑第二个作为政治的基础看的要素——经济。

只要看看田中奏折，就可知道日本强盗侵略中国，其目的是在夺取中国的经济命脉和无限宝藏。一方面使日本的财阀得以大肆剥削挖取，以挽救它的经济危机，另一方面也要利用在中国夺得的资源以进一步占领整个亚洲，征服全世界。

就目前的形势来说，日本强盗已经占领我东北四省、华北五省的主要部分和江、浙、皖的富饶区域。日本强盗贪饕无厌地占领这些地区的目的，一来是要竭力榨取这些地区我国同胞的膏血，来挽救它的经济危机，二来是要利用那里的资源作为侵占整个中国的军费，三是为的削弱我国的经济力量，使我国经济上不能持久作战以致向它屈服。在作战中，日本强盗更利用夺取我们的粮食、武器、军用品（尤其重要的如汽油）来加强他们自己和削弱我们。

自从“九一八”以来，我国不战而失去东北四省和冀东、察北。资源的损失，仅在东三省即达到一个巨额。这一庞大的资源和三千余万人口的市场，未经摧毁而落入日本强盗之手，成为日本强盗用来继续侵略的经济武器，实在可惜。所幸东北同胞，组织了数万人民革命军和义勇军，不让日本强盗在那里安然开发资源和利用市场。相反地，日本强盗为了维持东北的“治安”，却要派极大的军队，耗费了许多有生力量和每月数十万的军费。“九一八”到一九三二年三月，半年之内，日寇为了占领东北，只花了三千万余日元的军费，而为了对付东北的游击战争，却要花更大的军费，总计自“九一八”到去年三

月，日寇的军费消耗为十一万万日元。

卢沟桥事变以来，中央政府决定抗战。虽然在我国方面来说，经济上损失相当重大，但在日本方面来说，更是得不偿失。日本强盗侵华军费达到每个月五万万日元的巨额，一个月的军费，比之“九一八”日寇占领整个东北六个月战争中所用的军费超过十数倍。尤其在江苏、浙江、山东等地，因为我中央政府定下破坏敌人占领区域的一切重要产业的“焦土政策”，日寇不但不能取得我国的重要产业，而且，仅仅山东一地日寇的直接损失就达二万万日元以上。这种打击，对于泥脚的日本帝国主义，实在是极其重大的。

日本强盗在占领华北主要部分和江、浙、皖富庶之区后，曾努力推动汉奸和亲日派进行所谓“和平运动”，宣传“安居乐业”。这一“和平运动”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取得余闲来开发和掳掠华北经济。虽然日本强盗在占领华北的过程中损失不赀，但如能实现所谓“和平”来开发华北丰富的资源，增强其国力，那末，今后就可能更有把握来灭亡全中国了。我最高军政当局毅然拒绝这种“和平”，坚决抗战到底，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六日的告国民书发出之后，全国一致拥护。全国同胞现在都看得极其清楚，我们不但不能让日寇有“开发华北”的机会，并且还应更进一步彻底破坏敌占领区域我们所没有破坏或者未及破坏的资财，使其完全不能使用。而要想达到这个目的，是非广泛发展敌人远近后方遍地皆见的抗日游击战争不可的。

西班牙的经验告诉我们，在战争中进行国防建设，非但必要而且可能。西班牙的经济情形并不比我国好得多少，然而它现在已建立起自己的国防工业，能制造飞机、大炮、坦克等新式武器，足够与德、意和佛朗哥叛军作战之用。中华民族为了顺利地战胜日本强盗起见，亦需要采取西班牙建设军事工业的

经验。但是，为着要这样做，我们必须至少要能迟滞敌人，使敌人不易于前进。抗日游击战争的广泛发动，对于迟滞敌人是必能发生其应有的作用的。这样，便能争取时机，使我国的国防工业得以建立起来。

抗日游击战争，在经济的作战方面，是消耗日寇由国内运来的资财，尽量地消耗和夺取日寇的车辆、弹药，摧毁其交通运输和兵站等等。日寇依靠着高度机械化的武装来战胜我国，但是越是高度机械化的部队，越是依靠于后方的接济，否则，这些机械化兵种缺少了汽油、炮弹等等，不但不能发挥其威力，而且成为累赘。对于我方民间可被敌人利用的资材，例如粮食、饮水、燃料以至炉灶、用具等等，只要可移动的或填塞的，都要移动开去或填塞起来。抗日游击队的任务是要动员广大群众实行彻底的坚壁清野，以求最大限度地疲困敌人。这样消耗敌人的人马资材，使其前线不能得到补充，战地又无以征发，而失去其长期战争的能力。

抗日游击队，即在敌人后方，也可以并应该在群众中进行抵制日货工作和破坏敌人直接抽收捐税的工作。

以上我们说了抗日游击战争在整个经济战中的作用及任务。现在，我们要说到抗日游击队本身的经济问题。

为着和敌人作持久的战争，当然最好应当在破坏敌人的经济中使自己得有充分的给养和储备，或者经常不断地得到我国政府和民众的援助。但这在游击区域内是难以办到的。抗日游击队自身，应当准备在艰难困苦、弹尽援绝的情形下坚持奋斗。因此，抗日游击队必须依照下列几个原则，在经济上来维持自己。

第一，取之于敌。没收日本在游击区域的财产及夺取日军辎重、粮秣及其他资材。

第二，没收汉奸卖国贼的财产。

第三，要取得当地民众经济上的援助。抗日游击队为着全体中国人的利益斗争，它是能取得全体同胞（除了汉奸托派以外）的拥护与援助的。即是贫苦的人民，也会自动地援助游击队给养。他们有时宁愿自己吃不饱，首先让游击队吃饱，自己穿不暖，先让游击队穿得暖。有钱的人也乐于资助游击队。大的富翁自愿捐出数百担粮食给抗日游击队的事并不少见，因为他们知道，与其被日本强盗抢走，毋宁给予抗日游击队。在东北，许多被迫做了伪官的人，暗地里资助游击队的也很多。抗日游击队应当忠实地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取得每个同胞的爱护与赞助。

第四，要节省，要过刻苦的生活。抗日游击队是为民族解放，为保卫家乡而奋斗的。为着民族，为着同胞，即是半饥半饱地生活着也要坚持我们的斗争。抗日游击队的领导者对于每个队员，要把这一点作深入的解释，而领导者自己更应以身作则，作模范。要反对一切贪污腐化浪费的行为，实行官兵一律平等的生活，真正地与士卒同甘苦。这种刻苦生活的模范作用，在抗日游击队中特别重要，往往成为决定抗日游击队前途的主要因素之一。

三 人员战争

从人力的方面来说，每一个战争包含着人的质与量的战争。而人力的质，又应从政治素质和肉体素质两方面加以考察。

政治素质，关系于战斗力和战争方法；肉体素质，直接关系到战斗力。

在日本强盗侵略我国的具体条件下，我国的战争是民族自卫战争，与战士的利益相符合。因此，不愿意当亡国奴的战士的爱国精神和具有的积极性、牺牲精神以及机动性，亦因之提

高。结果，军队全体的战斗力亦愈为提高。正是在这样的客观条件之下，所以能够人自为战，增加我国军队的自动性，抗日的游击战争也才能风起云涌地发动起来。我们在主观上更要以高度的政治工作来保证和加强我们部队的政治素质。政治素质，又与肉体素质相关连。虽然在肉体素质方面，包括战士和指挥者的文化技术水准方面，我们不如日本，但因为我们有高度的政治素质，也就能求得必要的军事技术的素养和文化水准的提高。

然而，人员战争的中心一环，在抗日的民族自卫战争中，还是在量的方面。我国人口有四万万五千万，占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等于日本人口的七倍以上；尤其是在中国领土内作战，每个人都是使用得上的。这是我们制胜的最重要的条件。持久抗战与争取最后胜利的关键，在于我们能否去团结这庞大无比的人力，并很好地运用它。

如何团结和运用这个庞大无比的人力呢？在战线后方发动民众的工作，因不在这本书范围之内，我们只在这里提出而不去讨论它。在敌人后方发动和组织民众起来坚持抗战，这就是抗日游击战争的任务了。

我们的同胞大家都应警觉到：现在我国人口的一半，是在敌人的后方。敌人正在那里惨杀他们，奸淫她们，剥削他们，榨取他们。敌人正在实行抽丁，组织伪军、伪保安队等，把他们当作侵略我国的后备军，当作炮灰。敌人连幼童都搜集起来运到日本去，预备养大起来再驱使和强迫他们来进攻中国。这种以华制华的毒计真是毒辣到极点！我们忠实于民族的同胞们，要坚决为争取抗战胜利奋斗到底的同胞们，看到这种现象能不痛心吗？我们应不应当想尽一切方法，使中华民族的半数同胞不作无代价的牺牲，更不作敌人以华制华毒计的牺牲品呢？我想是应当的。那末，用什么办法来达到这一目的？除了

广泛开展敌人远近后方的游击战争外，很少而且几乎没有别的方法了。

有一些好心善意的人们，他们看见日本强盗在有抗日游击队活动的区域烧杀得很厉害，因而觉得为要顾全那里同胞的生命财产起见，最好是不要去发展游击战争。这种意见不免是“妇人之仁”。试反问一下：第一，难道日本强盗在没有游击队的地区就不烧杀么？或者烧杀得稍微客气一些吗？我们看看事实就知其不尽然。南京城内没有抗日游击队，那里日本强盗两天杀人五万以上；江、浙、皖一带，被敌占领时没有游击队，那里据外人估计，被杀的同胞在三十万人以上。那里的民众正在觉悟到，与其这样被杀，还不如组织抗日游击队，索性同日本强盗拼个你死我活，反为值得，也才有生路。因此，素称人民文弱而且地形平坦的江南，现在蔓延着广大的游击运动。这是拿事实来答复了我们的好心善意的怀疑者。第二，即使说日本强盗对于没有抗日游击队活动的地区真正是烧杀得不厉害一些，难道日本强盗就不在那里抽丁组织伪军来打自己的同胞吗？如果让日本强盗这样干下去，我们的损失将是双重损失。第三，我们还要指出，恰恰在有了抗日游击队活动的地区，民众有了经验教训，并且有了依靠，知道怎样来避开敌人，怎样来求得自己的安全，反而损失会比较小一些。看吧，老百姓都爱当抗日游击队，如果抗日游击队对老百姓有害无益，老百姓怎么会爱它呢？第四，日本强盗不惜驱其国内的四百万壮丁作孤注一掷地进攻中国，进攻东亚，牺牲其国民以图换得少数军阀、财阀的升官发财。日本强盗对它本国的人民，都不惜全部牺牲，又何爱于被占领区域的中国人民而不驱使他们去当炮灰呢？与其大家受屈辱而死，何不大众起来与他们硬干！

由此看来，在人员的方面，我们的原则应当是：要舍得为

祖国而牺牲。我们的民族英雄、爱国志士，要去广泛地组织民众，把各党、各派、各阶级、各宗教的同胞，在爱国家、爱民族的大义下团结和组织起来，为祖国而战，至少使他们不去帮助敌人。要做到全国人民心心相印，为着一个共同目标而人自为战，只有这样的不怕牺牲，我们才能死里求生。当然，我们对于无代价的牺牲应当避免，无谓地损失一个同胞，也是我们不应有的损失。因此，我们也不能好勇而无谋。

我们不但要把广大的同胞唤醒起来，还要把他们组织得能发挥其最大的作用，使各人都能真正尽他的能力做实际的工作，而不是光有一个意志。要使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各有自己的事情做，学生、工人、农民、商人、教职员等等各人尽其所长来做工作。

我们要争取落后的人，善于运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他们不致被迫走到敌人方面去，而成为抗日的力量。只要他们不是汉奸，都应把他们争取到抗日的方面来，在行动中来帮助他们。

要实行“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古训，不要互相恐怖、猜疑，互相争雄、并吞，以致中敌人的离间之计。要真正做到“光明磊落、大公无私、委曲求全、仁至义尽”十六个字。做到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知识出知识，有枪炮出枪炮，团结得像同胞兄弟一样。

这样做法，我们就能保证在人员方面有一定能战胜敌人的信心，并且补足我们别的要素上的缺陷。

对于敌人，抗日游击战争的目的在消耗它的人员。

日本人口少，壮丁更少，能动员到战场上来的充其量不过有四百万。其他老的、小的、弱的、女的均不能来中国帮助作战。人员少，是日寇最大的弱点。

消耗敌方人员的方法，第一是瓦解和争取他们，第二是给

以肉体的杀伤与疲劳。抗日游击队要不失时机地去不断袭击敌人，消灭其有生力量，不论大小总要求得消灭它。要去散发传单，写标语，喊口号，用种种方法煽动敌军士兵反对侵略战争。

再加以我们的人力不给敌人利用，那末，敌人是不够消耗的，我们的制胜是有把握的。

四 武器战争

敌人有着优良的武器，他们有大炮、飞机、坦克以至毒瓦斯等等。我们的武器不及敌人，特别是游击队的武器更差。我们上面已经说过，如果游击队仅靠着刀矛而不靠着别的要素，尤其是政治的要素，要与日寇作战，那末，谁也不会有信心的。

虽则如此，武器不是万能的，武器的作用也是有限度的。每一种武器有一定的效能，它要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发挥其力量，它也有可以被制服的方法。举例来说，新式武器，如飞机、大炮、坦克等，在夜间就丧失或大大减低了作用；如果夜间被袭击时，其作用反而不及短兵器，不但无法使用而且反成累赘。再例如，大炮如果来不及进入阵地、放列与开火，或者没有弹药，就等于废物；飞机找不到目标，坦克到了山地或油用完了时，也成了无用武之地的“英雄”。

因此，抗日游击队虽然只有很坏的武器，却用不着怕敌人。游击队要尽可能地避开敌人的新式武器，因此就应当经常用奇袭的战法去制胜敌人。抗日游击队要经常地利用夜间作战、打埋伏、突然袭击、断绝敌人交通等战法。抗日游击队万万不要拿自己肉体与敌人的武器去硬拼，那是自己找死。应当找敌人的有生力量去拼，像闪电一样快地投入肉搏。敌人的人员被我杀死了，武器再好，没有人使用，也是枉然。

抗日游击队的武器，比起敌人的来当然是劣势。抗日游击队只能有刀、矛、短枪、手榴弹、步枪、轻重机关枪，最多只有迫击炮、小炮。但武器虽然比不上敌人，如果使用这武器的人善于使用它，善于利用时机，利用旺盛的攻击精神，利用地形配合起来，必能发挥其威力。二十九军的大刀就是一例。再则，虽然抗日游击队武器的质远不及敌人，但是量的方面却能超过敌人。除了上面所说的一些而外，中国的土武器如弩箭、挨丝炮、桧树炮以及用迫击炮弹埋在地下当地雷，用硝药炸毁桥梁等等，我们都可以应用。

如果抗日游击队自己相信自己的武器，善于使用自己的武器，那末，游击战争可以战胜优良武器的敌人就不是幻想的事情了。

抗日游击队的武器虽则落后，但是使用武器的人不应当落后。抗日游击队一方面要使用自己现有的武器，另一方面要夺取敌人的武器来使用。我们的前途，是要夺取敌人各种新型武器并且自己都会拿来使用。因此，我们不能做一个落后的劣势武器的拜物教徒，如像红枪会的某些师父那样用念符咒、吃打药等去挡炮子，那是无益而有害的。

五 交通战争

现代化的军队之作战，前后方是同等的重要。这是由于粮食、武器、弹药、汽车和一切机械兵种各种需要之极度增大而来的。现代化的军队，在作战时如果前后方被隔断，那末，这个军队的作战力量就要大为减弱而不能持久，甚至有全师覆没之可能。所以交通对于现代化的军队，是一个决定胜负的要素。

交通，包括运输和通讯联络。运输，又包括马路的汽车运输，铁路的火车运输，水道的轮船运输，以至飞机的空中运

输。机械兵团必须有足够的运输工具与道路，接济给养、弹药、汽油、药品和输送伤病员等等。通讯联络，则包括有线电、无线电、空中和陆地的通讯工具等。这些对于机械化兵团，都是如像命脉一样的重要。

敌人的机械化兵团，要有很好的交通，要能善于利用其交通，要能有把握地保持其交通，然后才能发挥它的威力。抗日游击队就与之相反，利用交通不灵便的地方为最有利。

但交通并非不可变的。可以修理，亦可以破坏和阻塞。因此我军对于敌人的交通，要经常进行破坏，使敌人的交通由最便利的变为不便利的。除了飞机交通游击队不易破坏以外，其余各种交通，我军要发动广大群众和多数游击队，尽可能地破坏它，使敌人不能利用。由于在敌人后方把敌人的交通阻塞，使敌人前线上的部队作战困难，使我军正面作战的部队容易取得胜利，这就是一件大功劳。对敌人作战，前方后方是同等重要，如使敌军前送后送均感困难，对于我们正面作战的胜利有决定的意义。因此破坏敌人交通的胜利，也有同等的功绩。

在地形方面，游击队利于在山地、水沟、洼道、断绝地、村落等机械兵种不能行动或难于行动的地方活动。游击队必须尽量利用有利的地形进行战斗，争取自己的胜利。但是只要群众组织得好的地方，即依靠民众为堡垒，在平原开阔地也可以进行游击战，如同蒲路、平汉路线上均能进行，不过要更灵敏活动些。

六 结 论

总结上面所说，我们知道，凡是战争都是依据上述的五个条件——政治、经济、人员、武器、交通来决定自己的战略战术。游击战争更要依据这些条件，善于把它们密切联系，配合

运用，这即是很好的战略战术，这样才能得到胜利。

游击队武器不好，这是毫无疑问的。但质量虽然差，却因为可以应用各种武器的缘故，数量上是可以多的。因为武器不好，所以作战时第一须利用地形，利用夜间或特殊天候来补武器之短，选择有利于自己的武器的地形来发挥自己武器的效力。我们抗日游击队的武器，是利于近战、利于白刃战和突击的，故须秘密迅速地接近敌人。我们不但应利用地形的好坏，还要利用对地形的熟悉，不仅要知道一切的道路，而且要知道何处高低不平，何处有树林村落等等。

人力，是我们优越的条件，尤其是数量上要多。不论男女老少，不论什么职业、什么党派、什么宗教，都要争取他们积极地或消极地、公开地或秘密地来帮助、掩护和拥护抗日游击队。抗日游击队能存在与发展，主要的是依靠着人民做自己的堡垒，而不专靠武器与地形。不要以为没有好的武器就不能战胜敌人。因为主要的要依靠人民的堡垒，所以政治要素非常重要，正确地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非常必要的。敌人用以华制华的毒计分化我们，驱使汉奸托派来进行种种挑拨离间，企图收得渔人之利。我们要不上他们的当。抗日游击队有了群众，再有了一点武器，有了相当的地形，就可以经常打胜仗。

因为游击队的广泛发展，游击队的人数是会增多的。他们在经济方面，比较困难。在隐蔽方面，大的游击队也不容易。抗日游击队不仅破坏敌人的经济，还必须注意于夺取敌人的辎重、武器、资材、粮食来补充自己，养活自己。抗日游击队的生活，必须刻苦耐劳，要过最低限度的生活。就在衣不暖、食不饱的状况之下，也要抗战；就在没有一文零用钱，没有一文薪水的情形下，也要抗战。队长和政治上的负责人员，要以身作则，生活与队员一样，真正把“与士卒同甘苦”这句话切实

兑现。有着升官发财心理的人，自己必须把这种观念改变。抗日游击队要有好的群众纪律，就是怎样困难，也宁使自己困难些，不取同胞的一针一线。要维持人民的生活，保护人民的利益，把人民看作是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一样，关切他们。这样，才能与民众打成一片，才能获得必要的条件来生存和发展。

抗日游击队的队长和政治负责人，他们的一切工作都是困难的，都需要他们在实际工作中，本其爱国热忱，本其保国卫民的忠心，团结群众，收集武器，战胜困难，白手成家。有了这样的热忱，有了这样的忠心，就算是赤手空拳，也必能得到群众的拥护。加以部队能够严守纪律，保护群众，战胜日寇，就必能取得群众的帮助。

抗日游击队的领导者，不简单是军事人才，而应是善于运用政治、经济、人员、武器、交通等五个要素的领导者，要能在实际的环境中具体应用这五个要素来决定当时对敌的战略战术。同时，他们要有最高度的政治认识，经常留心国内国外情形的变化。他们要领导政治工作，时时刻刻昼夜不停地在自己部队、敌军和民众中进行政治工作。手头要写，口头要讲，要抓住有关政治的事实给以正确的解释，并作宣传。所以他们也就是民众的教师。

抗日游击队的领导者，要懂得组织群众。如果群众只有对付日本的心思而没有组织，也就不能抗日。

每个抗日游击队的领导者，能够这样做，游击队就能发展，能壮大，这是确有把握的。游击队的领导者在军事上固然要有特长，但如果只懂军事而忘掉其他一切条件，不去运用，专靠政府补助，发给枪支给养，拨给人员拿去打游击，打完了就会没有的。如果想升官发财找自己的出路，不以武器对付敌人而对付老百姓，这就会使抗日游击队极其尊贵的名誉丧失净

尽。这是最卑污的行为，想要如此来组织游击战争是不可能的。

在抗日游击队初成立的时候，并非每个队长和政治工作人员及其每个队员都能做得很好的。游击队中，也不可免地有一些分子，他们有自私自利的思想，并非为了忠心爱国而是为了谋自己出路而来的。这样的抗日游击队，这样的分子，是会使群众对他们发生不满的。但这并不可怕，并不因此就应当把抗日游击战争整个地加以否定。我们不能把抗日游击队当作圣人一样看待，某些错误是不可免的。只要在工作中求进步，只要领导得好，使抗日游击队有训练，培养其民族意识与政治认识，清除个别的坏分子，使游击队日益改善起来。我们这样做，就能把游击战争广泛地发展起来，把抗日游击队到处建立起来，把抗日游击队变成为一个民众大学校，日本强盗就会怕起抗日游击队来了。

所以，抗日游击队不是神奇古怪的东西，也不是过去国内战争时期的游击队，而是爱国救亡的人们大家都懂得去组织的，是大家能够去组织的，是为大家而奋斗的，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之毫无办法的群众性的武装组织。

问题是在于：我们有没有爱国的热忱和对民族的赤诚的忠心，我们知道不知道民众的伟大力量而去完成这一伟大任务。

抗日游击队的战术

第一节 总 则

不论一个抗日游击队是如何组织成的，或者是民众自动组织的，或者是由民团、警察、绿林、会门等改编的，甚至于是以一部正规军为基干的，它大都没有优良的武器，人数也少，

物质补充也不会充足，训练也不一定熟练。但是，它偏偏一定要战胜武装齐备、训练熟练、数量众多、经济来源也充足的敌人。为了这个原故，抗日游击队不能不有特殊的打法，不然就无从取得胜利。

一个抗日游击队要怎样打仗呢？简单地说，就是要最热心地、积极地行动，争取主动地位，集中自己的全力，用一切方法向敌人进攻。

第一，为什么能够积极呢？因为抗日游击队的活动力量，完全以其编成分子的抗日精神为基础。每一个抗日游击队员都清楚地认识他的任务，他不是雇佣的士兵，而是一个自觉的抗日民族自卫战士。由这种自觉，才能产生战斗的积极性。就凭这种积极性，才能克服困难，在最艰苦的环境中也能积极活动。在正规军里面，积极性和自动性、机动性常常受到各种束缚，但也必须在统一指挥、总的意图之下机动地积极活动。但是，在游击队中，这种积极性更可能尽量地发挥。因此，无论在怎样困难的环境之下，都能成立游击队，也都能活动；无论怎样原始的武器，到了游击队员的手中也能运用自如，恰到好处，而给敌人以重大伤害。

抗日游击队为什么一定要积极地行动呢？因为游击队多种条件处在劣势，积极正可以补救自己的弱点，且可寻求敌人的弱点。但是，积极决不是只应付敌人就算数，更不能游而不击，避免战斗。只要有会可以打，立刻就要打；屡次错过机会，必然会造成游击队恶劣的环境，消磨了游击队员的英勇气概。专门防御的、专挨打的游击队，不但不能取得胜利，反而要处处吃亏。因为抗日游击队具有这种积极性，又必须用积极的打法才能取得胜利，所以，它一定要争取积极。

第二，什么叫做主动呢？主动的意义，无非是无论敌人有多少，依据当时的敌我位置、数量、质量和武器及时间等条

件，抗日游击队要不断地扰惑、破坏、疲劳和消灭敌人，使敌人不愿和我们作战而又不得不和我们作战。抗日游击队在敌人后方，如被敌人正式围攻，敌人寻求我们作战时，我们也不妨避开，偏偏不和他们作战。所谓“避实击虚”、“避强攻弱”、“声东击西”、“围魏救赵”、“能进能退”、“速战速决”等类的话，都有争取主动的意义。做到这样，不打就罢，打则常胜，就是偶然吃点亏，多少也赚回一点，不会折大本。

第三，什么叫做集中呢？游击队的人数，经常并不很多，武器又劣，训练也差，如果老是分散各地，不但难于给敌人以打击，反而阻碍自己的进步。所以，游击队的主力，应当常常和领导者在一起。抗日游击队的首长，自己是一个计划者，同时又是一个执行者。规定了一个计划，应该迅速地就去执行。所以他应当随时集中力量，不但要扰惑、破坏敌人，而且要随时以突然的动作打敌人一点，消灭一部分敌人，这才是有效的战术。

因此，抗日游击队如果不是在随时可以集中的条件之下，并不以“化整为零”做经常的原则。除非在敌人强力的压迫下，或者必要时为了解决粮食的问题，或做群众工作，或迷惑扰乱敌人，是不采取分散的办法的。

因为想要达到上述的三种条件，抗日游击战术的基本形式不是别的，而是突然袭击的进攻。非袭击不能取得胜利，非袭击不能培养游击队员的胜利信心，不能适应抗日游击队的主观的需要。

有人说，游击队既然无优良武器，人数经常不多，怎么能够采取进攻的方法呢？殊不知正因为敌人较我们装备好，人数多，所以我们才采取进攻的方法。不过抗日游击队并不着重于正规的阵地攻击，而着重于突然的袭击，乘敌人火力未曾展开、大炮不能发挥威力、队伍密集的时候，出其不意施以猛烈

的奇袭。用这种方法，即使以最原始的武器，也常常能够达到进攻的目的。

甚至于在消极方面，在不得已时，抗日游击队也宁可采取运动防御而不采用坚守防御。退却的时候，经常是突破某一方面，打击某一方面之敌而掩护自己退却。因为游击队员处处都采取进攻形势，而队员随时都有战斗准备，富于积极的精神，所以，就在遭遇意外的事变时，也能够居于主动的地位。

如果不积极采取进攻动作，争取主动的地位，游击队最容易气馁。损失了几个人，没有了弹药，没有粮食，都会使游击队员发生动摇。仓促遇见敌人，也不能够顺利应付，这是最危险的。不积极采用袭击的办法，而用消极的战术，是要不得的。相反地，抗日游击队也不能拼命蛮干，冒险打硬仗，这不是进攻，因为这样的打仗法，缺乏积极主动的条件。在处于敌逼迫时，无条件乱打一阵，反而是帮助敌人消灭自己，这也是要不得的。游击战术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统一，运用它是需要技巧和艺术的。

在实际的行动中，抗日游击队要怎样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积极性，争取到主动的地位，集中一切力量向敌人施行有效的奇袭呢？这全看这个抗日游击队是否迅速，是否秘密，是否坚决。迅速、秘密和坚决，是抗日游击战术的基本原则。一个抗日游击队的行动，如果经常能合乎这三个原则，它才能胜利，才能生存，才能扩大。相反地，如果违背了这三个原则，它必然地将要失利，将要被削弱，被消灭。一个抗日游击队只有在胜利中才能生存，而且经过胜利，它必然有惊人的发展。

第一，迅速不单指高度的运动性，而且也包含灵活巧妙的意义。一个抗日游击队的行动，固然都要快，不但行军、袭击、进击、退却、宿营要快，就是其他一切行动都要迅速。但

单是快还不够，更需要经常地移动位置。积极方面，能够出敌意料之外随时破坏、扰乱和消灭敌人；消极方面，也不会为敌所算，遭受敌人突然的袭击。我们应当养成积极动作的习惯，在灵活巧妙的高速度运动之中，即使遭遇敌人的骑兵和坦克车袭击，也不致为敌所算。

第二，秘密是保护抗日游击队安全的护符，它和迅速一样，是游击队活动的必要条件。一个抗日游击队要能够经常地出没无常、声东击西，使敌人不知道我们究竟在何处；要能够在一段短时间内出现于几个不同的地点，并且在每一个地方完成任务，使敌人感觉到处都是游击队，增加敌人行动和进攻的困难。在广大的群众拥护之下，秘密并非一件困难的事。我们经常能够做到“游”则敌不知我所往，“击”则敌不知我突来。不够迅速、不够秘密的游击队，是不能争取主动的，不但要挨打，而且根本影响到游击队的生存。例如在袭击或打埋伏时，无论我们有怎样好的计划，给敌人知道了，先期展开了火力，有了提防，则什么好计划都一文不值了。

第三，坚决是保障抗日游击队胜利的必要条件。一个抗日游击队经过妥贴的考虑，拟定一个计划，明了地规定了任务之后，就应当立刻坚决地去执行，干脆地消灭敌人的一部，或是迅速地破坏目的物。如果不够坚决，在略一犹豫之间，危险之际，就会改变了企图，在胜利前的一瞬间发生了动摇。只要我们行动坚决，常常在众寡悬殊、于我极不利的生死关头，也能够征服敌人，克服敌人的抵抗。稍微迟疑一下，就错过了良机，在紧张的一刹那，给敌人以时间准备，得以从容镇定。结果，我应当成功的都不能成功。相反地，无结果的战斗是不应当继续的，应该撤退的就毫不迟疑地坚决撤退。

游击战的目的，不只是破坏交通，劫夺粮械，消耗和分散敌人兵力，创造敌人的弱点，它也需要集中兵力消灭敌人的有

生力量。因此，一般游击战也可以说是小的运动战，而且，事实上几个游击队也常常联合起来，在敌人进攻时或运动战时，突然集中力量消灭其一股。这种打法，实际就是运动战。相反地，正规军队也可以打游击战。总之，打游击战需要运动战配合，打运动战也需要游击战掩护。在二者之间，并没有一道长城把它们间隔开来。

有人说过：“游击战是手工业，运动战是机器工业。”或者他们以为这句话表现了二者在军队组织中的威力，实际上，这还表现了抗日游击队的发展过程。在这个复杂的过程中，有许多错综复杂的条件交错着。比方说吧，一个抗日游击队活跃在崎岖山地上，比较在平原广阔处便利些；在森林隐蔽中，比较在田野开朗处便利些；在风雪夜中，比较在晴朗白昼便利些；在夏秋冬，比较在春季便利些；在敌人力量稀薄处，比较在敌人力量密集处便利些；在民众抗日情绪高涨处，比较在低落处便利些。在一个时候，在敌人力量强大、民众抗日情绪低落的地方，一个极小的抗日游击队困难地在平原上挣扎着；但是在另一个时候，这个游击队已经在敌人力量稀薄、群众愤恨压迫而卷起反日怒潮的地方，变得强大有力，说不定已变为正规军，在山原间活跃了。而且这个强大的抗日游击队，在白天，在平地敌人多的地方，或者只能扰乱一下，明天，却会在黄昏拂晓的风雨中，崎岖的隘路上，干脆地消灭一部分敌人。因此，游击战和运动战不但在战役中应当互相配合，实际上这二者也常常是互相推移变化的。

第二节 抗日游击队的活动方针

在战役中的抗日游击队的活动方针，应在战略、战术上起大作用的，可以分做七点来讲。

一 破坏敌人后方交通，破坏仓库，袭击飞机场

日本强盗的新式武器，如大炮、坦克车等，只在交通运输便利处才便于发挥威力，离开了大路，就大大削弱了它的活动力量。如果大路被破坏了，它的机械化兵团就简直难于活动，不但运动受阻碍，而且补充上更容易发生恐慌。近代机械化兵团所需要的补充，是非常庞大的，短期间的后方交通断绝，也使前线受非常严重的影响。

在忻口战役中，日本强盗的后方交通，完全被我方的游击队破坏了。敌人的粮食、子弹、医药都发生问题，万般无奈，只有靠飞机运输，借以维持。它的进攻力量已经大大地削弱了。

尤其是由于兵力不敷分配，日本强盗虽然显得很凶，像锥子一样无处不钻进来，但经常只能占领一条交通线，有时只占联络这条交通线的必要据点，仅仅勉强维持这一条路的交通。这种线与点的占领，正给予游击队活动以好机会。例如在山西的正太路，不管日本强盗的防御如何谨慎周密，但是，因为是一条线式的占领，处处暴露出弱点，所以不断地被抗日游击队破坏着，而变成一条濒死的铁路，使敌人的运输遭受非常严重的困难。

二 暴露敌人的企图

正规军和敌人正面作战，很难得悉敌人的动作，只有依靠间谍和侦探的报告。然而游击队的活动，却很容易暴露敌人的兵力和他们的兵力配置，而且在顺利的时候，还可以暴露敌人的企图。游击队袭击敌人的兵站和运输队等，也经常可以缴获敌人很多文件，得到关于敌人的番号和配置的材料。这些材料，常常是非常宝贵的，应当送交正规军的参谋处汇集起来研究。有时游击队在敌后方，也能在高地配置观察哨，数清敌人

有几个，监视其行动，而取得情报。

三 震恐敌人的军心

游击队的每一次动作，都是突然的奇袭。即使袭击造成敌人的物质损失有限，甚至是一次失利的袭击，然而就其动摇敌人的军心与挫折其胜利意志而言，却有很大的影响。在敌人没有防备、相信自己安全的时候，他们却突然出现；在敌人有了准备、小心谨慎、辛苦提防的时候，他们又偏偏不来。在这种出没无常的活动与威胁之中，无论敌人有多少都会震恐。

战争开始的时候，日本强盗并不知道游击队在中国的厉害，还有轻视之心，连吃好多亏之后，这才不敢小觑，而且渐渐地害怕起来。

例如，在山西昔阳附近，一个日本士兵曾经向一个老百姓哭着，在自己周围划了一个圈子，表示他已经被我游击队包围。在日本军官严密的检查之下，日军下元部中，一个名叫千叶的士兵在家信内这样写着：

“三月十七日，辎重队受二千以上的正规军配合游击队的袭击，几乎全灭，我们的工兵赶做了三百五十个送骨箱，兵站也赶做了一二百。……关于凯旋，现在是连梦也不敢做了。听说五月三日在石家庄开第一次慰灵祭，我或者在那时回家也说不定。”

我们的游击队很多，经常流动，虚虚实实，到处都是队伍。敌人随时有被我们袭击的可能，但是对我们却战不得战，防不胜防。即使敌人知道这一带有游击队活动，也不知道它的力量。以为只是一个小的游击队时，却会突然发现一个大的运动部队；有时以为是一个大的运动部队，却偏偏只是一个小游击队。真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使敌人徒然劳苦，费力防备，昼夜提心吊胆，惊慌万状。

四 破坏敌人政权，恢复自己的政权

抗日游击队在军事上不厌秘密诡诈，在政治上却力求公开明确，不只彻底粉碎敌人的武断宣传，揭破敌人的毒恶欺骗；而且要根本动摇、瓦解和铲除一切汉奸伪组织，消灭敌人的特务班、侦探队和宣抚班，打击敌人以华制华的阴谋。同时，更要恢复或建立自己的政权，争取广大的民众积极参加抗日运动。

在繁峙、广灵，抗日游击队常消灭下乡来搜索妇女的日兵小部队。民众被日本强盗欺负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时候，忽然有游击队替他们出气，非常高兴，竭力帮助游击队的需要。现在，那一带已变成巩固的抗日支点了。

民众失去了政府，在敌人的压迫之下，就像丧失了父母的孤儿，只好随人摆布。焚烧打杀，奸淫抢掠，任敌人硬来软去，随心所欲。但是，有游击队活跃的时候，民众不但有了行动的方向，而且增加了胜利的信心。在这种情形之下，敌人即使占领一片地方，但它想要建立这一个地方的政权却是非常困难的。

五 分散敌人兵力

游击队的积极活跃，威胁敌人后方的交通线，使敌人不得不分出一部兵力，除掉经常驻扎在交通线的要点上，更要派出巡逻的部队往来巡视。因此，敌人就不能把兵力集中前线，时时都要顾虑着自己的尾巴。同蒲路、正太路和平汉路上，敌人建筑了许多堡垒，专门防备游击队。有些地方，每隔几里路就有一座堡垒耸立着。尽管敌人分布了许多兵力，这几条路的交通还是难于维持，常常死蛇似地一段段被切断。

当正规军在前线和敌人作正面战争时，游击队也可以迟滞敌人增援部队的动作，牵制敌人侧翼的行动，吸引敌人正面的

兵力到两翼。即使这种动作没有达到目的，也能够扰惑敌人的军心，使其在未进入正规的决战前就挫折了胜利的意志。

六 破坏敌人的经济、给养

袭击敌人的兵站、运输辎重和征发队，不但影响敌人的正规军的活动力量，而且给游击队很大的帮助。游击队经常缺乏粮食、械弹和必需品，在这种战斗中就可以得到补充。袭击征发队，更可以获得民众的同情。

日本是一个资源贫乏的国家，它占领一个地方一定要尽量利用这个地方的资源以补充自己的不足。游击队在敌人后方活动，常常可以完成不使敌人利用我国资源的任务。在敌人占领之后短时间内难望收复的地区中，抗日游击队应当积极地爆破煤矿和铁矿的隧道，破坏水管，炸毁敌人的机器工厂，使敌人无从利用我国的资源，加重日本的经济原料的恐慌。例如，日本强盗占领井陘煤矿之后，不久因为水管全部被游击队破坏，简直不能出煤，直到现在，还是有一天没一天，不能尽量利用。

七 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前面屡次说过，游击队的战术不只在扰惑、破坏敌人，它也需要集中力量突然消灭一部分敌人。日本强盗如果要占领广大的地区，军力就不能不分散开来而变为单薄。因此，游击队很可能有机会在各地消灭一小部敌人。

每一次袭击中，虽然只能消灭一部分敌人，敌人并没有什么大损失，然而，无数游击队积极不断地活跃，在无数次的埋伏和袭击中，将使敌人的有生力量遭受重大的损失。

总之，每个游击队单独的活动，在主要集团军的战役上并没有决胜的意义。可是，无数游击队的不断的动作，却是非常伟大的力量，像连续的滴水可以蚀穿石头，使敌人的交通迟

滞、阻塞，企图暴露，军心动摇，汉奸政权也不稳固，兵力不敷分配，给养断绝，经济资源被破坏，有生力量被削弱。在军事活动的全时间内，所有的游击队配合主力军一齐动作起来，就和蚂蚁蛀蚀着朽楼一样，可以倾覆敌人存在的基础，影响到全面抗战的结局。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朱德选集》刊印。

毛泽东同合众社记者 王公达的谈话*

（一九三八年二月）

王公达：现在有许多人对中国抗战的前途表示悲观，先生对此意见如何？

毛泽东：我对此完全是乐观的，因为中国抗战的过程必然是先败后胜、转弱为强，这已经成了确定的方向了。在中日战争初期，一般形势是日本强、中国弱，可是今后的形势必是日本的弱点渐渐暴露出来，中国的力量则渐渐加强起来。日本现在正借钱打仗，除过去半年已经用去二十二万万元以外，今年一年的需要据说是四十万万元，必定还不止此数，这已经消耗它大量的国力。日本的国际信用降低，公债跌落，它的“速战速决”计划已经失败，试问它哪有那许多钱无限长期地打下去？就军事方面讲，日本在中国的战线已经延长到自杭州以达包头的数千里的距离，它的兵力不够分配防守之用，所以它的兵力已随深入与扩大的程度渐渐薄弱。它占领了长距离的铁路，便需要军队去防守每一个车站。日本已动员三分之一的军队来侵略中国了，如果它再要占领汉口、广州等地，至少须再动员几十万军队，那时它的情况将十分困难。因为日本的敌人

* 本文原载一九三八年三月五日出版的《解放》第三十二期。编者按说：“美国合众社记者王公达先生于二月间来访延安，与毛泽东先生作了一次谈话。兹根据王先生的记录，经过毛先生审阅，在本报发表。”

不止中国一个，加上日本国内国际的其他许多大矛盾，它终必走上完全崩溃之途。

王：先生说中国的力量能够渐渐加强起来吗？

毛：根据过去七个月作战的经验，在军事上我们若能运用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三种方式互相配合，必能使敌军处于极困难地位。我的意见，在目前除应以二三十万精兵组成数个强有力的野战军，从运动战中给敌人前进部队以歼灭的打击之外，还应抽调八九万军队组成二三十个基干的游击兵团，每个兵团三四千人，派坚决而机动的指挥员领导，加强其政治工作，配置于从杭州到包头的敌人阵线前面，从这个长阵线的二三十个空隙中间，打到敌人后方去。如能运用得宜，结合民众，繁殖无数小游击队，必能在敌后方建立抗日根据地，发动千百万民众，有力地配合野战军的运动战，而使敌军疲于奔命。至于阵地战，由于我们技术不足，在目前不应看作主要方式。但我们必须建设国防工业，自制重武器与高武器，同时设法输入这些武器，以便能有力地防御的与攻击的阵地战，这是非常必要的。有人说，我们只主张游击战，这是乱说的，我们从来就主张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三者的配合。在目前以运动战为主，以其他二者为辅，在将来要使阵地战能够有力地配合运动战。而游击战，在它对于战斗方式说来，则始终是辅助的，但游击战在半殖民地的民族战争中，特别在地域广大的国家，无疑在战略上占着重大的地位。在政治方面，我们已有国内的统一，更拥有全世界民主国家的同情和援助。但现在的成绩还不够，还应进一步加强起来。所有上述军事上政治上的加强，都是必须的。只要继续努力，也一定能够加强，这就显示着前途的光明。

王：第八路军在日军数面包围之中有被日军驱逐或歼灭的危险吗？

毛：八路军现在共在四个区域中进行广大的游击战。第一个区域是平汉、平绥、正太、同蒲四铁路中间及其以东以北的地域。这地域拥有坚决反日的一千二百万民众，都与军队密切结合着，这是一个极大的抗战的堡垒。八路军在这里已经立稳了脚跟，虽然敌人正在加紧进攻这个区域，但要驱逐他们是不可能的，歼灭更不可能。八路军的几个大的东进支队已迫近津浦线。第二个区域是平绥以南、同蒲北段以西和黄河以东的晋西北地带。第三个区域是平汉、正太、同蒲中间的晋东南、冀西南地带。第四个区域是晋西南。他们都与地方人民有密切的联系，都随时猛烈地破坏敌人的后方联络线，有了很多大小的胜利，使敌人大减其前进的力量。从这些区域看来，中国失去的不过是几条铁路及若干城市而已，其他并没有失掉。这一实例给全国以具体的证明：只要到处采用这种办法，敌人是无法灭亡中国的。这是将来举行反攻收复失地的有力基础之一。

王：先生觉得此次国共合作是具有永久性的吗？

毛：我以为是的。民国十六年国共的分裂，原是违反着共产党的志愿的。共产党一向不愿意和国民党分裂。过去十年来国共双方及全国人民都经历了艰苦的经验，这种经验能增强今后的团结。现在及将来合作的目的是共同抗日与共同建国，在这个原则之下，只要我们的友党能有和我们一样的诚意，加上全国人民的监督，这个合作必然是长久的。

王：是的，共产党对时局宣言说过，国共两党不但共同抗日，并且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还要共同建国。请问这代表着两个不同阶级的政党将来怎能合作建立新国家呢？

毛：因为中国是处在半殖民地地位，目前则更处在亡国灭种关头，连半殖民地地位都在危险中。党派与阶级虽不同，这个共同的地位则一，就此决定了两党不但能合作抗日，并且能

合作建国。但合作是在一定纲领下的合作，是有原则的合作，是真正的合作，而不是苟合与貌合。如果离开纲领与原则，必变成苟合与貌合，这是任何有原则的政党所不许可的。有纲领有原则的合作，如同朋友之间的道义之交，只有这种道义之交，交情才能长久。

王：什么是共产党主张的“民主共和国”？

毛：我们所主张的民主共和国，便是全国所有不愿当亡国奴的人民，用无限制的普选方法选举代表组织代议机关这样一种制度的国家。这种国家就是民权主义的国家，大体上是孙中山先生早已主张了的，中国建国的方针应该向此方向前进。

王：共产党对于目前的中央政府满意吗？还须召开临时国民大会吗？

毛：我们拥护现在的中央政府，因为它坚持抗战的方针并领导抗战的行动。但我们希望加以充实和扩大，并在内政上进行必要的改革，以便更加有利于抗战。我们曾经提出了临时国民大会这种主张，这也是孙中山先生提倡过的，我们认为有益于团结全国加强抗战的力量。但究用何种方法更于抗战有利，我们并无成见，只要真正有利于抗战，什么方法都可以采用的。

王：东三省义勇军的抗日活动，有中国共产党前去领导吗？

毛：中国共产党和东三省抗日义勇军确有密切关系。例如有名的义军领袖杨靖宇、赵尚志、李红光等等，他们都是共产党员，他们的坚决抗日艰苦奋斗的战绩，是人所共知的。那里也是民族统一战线，除共产党员外，还有其他的派别及各种不同的军队与民众团体，他们已在共同的方针下团结起来了。

王：先生对于美国一般感想如何？

毛：美国民主党的赞助国际和平，罗斯福总统的谴责法西

斯，霍华德系报纸的同情中国抗日，尤其是美国广大人民群众对于中国抗日斗争的声援，这些都是我们所欢迎与感谢的。不过希望美国能更进一步，出面联合其他国家给暴日以实际的制裁。现在，是中美两国及其他一切反对侵略威胁的国家更进一步联合对敌的时候了。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二卷刊印。

晋西北抗战经过概述*

(一九三八年)

贺 龙

日本帝国主义，原来是想不费什么力气，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要达到完全侵占我们整个华北的目的。现在怎样呢？在表面上虽然算是暂时的掠夺了我们华北绝大部分的领土，特别是大城市和交通线。但是他原来那样美满的计划，显然是失败了！

只拿山西来看吧！日本帝国主义开始的打算，是迅速顺利的、长驱直下风陵渡的。结果，由于在山西抗战的军队，是无比的英勇，不断地给以坚决顽强的抗战，使日本强盗不能不付极大的代价，经过几个月的血战，然后才能取得太原。平型关之战，给了敌人以重创。实际上并不算天险的忻口，却能阻敌二十余日不能前进一步。这是出乎我们凶横残暴的敌人意料之外，而不能不为之胆寒的。这就使敌人在占据太原后至今还不敢南犯；使在山西所有英勇抗战的军队，争取了更多的时间，进行整理和巩固新阵地的布置；使广大的晋南地区，仍安然的保持在中华民国的旗帜之下。造成这样的局面，一方面由于我友军不顾一切牺牲，以坚决抗战到底的精神，不断地给予敌人以巨创，树立了许多光荣不可磨灭的功绩。

另一方面，在晋察冀边与晋西北广大地区，我军积极活

* 本文原载一九三八年二月四日出版的《前线》第二期。

动，一刻不停地迷惑敌人，扰乱敌人，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破坏敌人的交通，特别是广大民众抗日斗争的发动，广泛的群众游击战争的开展，与游击战争根据地的创立，一天一天的增加着敌人不可克服的“后顾之忧”，是有着很大的配合与牵制作用的。

我们在晋西北是怎样战斗着的？

主力和支队巧妙的配合起来，积极地打击敌人。

我军是十月初到达神池、宁武，当时敌已占朔县，固守阳方口、大水口，我们的部署：决派宋^[1]支队绕攻敌后，进占井坪、平鲁，打击敌人，迟滞敌向神池、宁武之前进；一方面将我另一部置于长城利民堡附近，准备消灭由平鲁向朔县前进的敌人。布置刚完，朔县的敌人即向阳方口、大水口进犯。三日并占去宁武，恰巧当天的下午和第二天，我宋支队也完成了占领井坪、平鲁的光荣任务。同时我某部亦积极转移，于第三日占领宁武侧后之摩天岭，给宁武的敌人极大的威胁，十四日更尾敌占大牛店，于十五日赶到贺家庄之线我军之又一部，同我平原一带作战的友军，取得了密切的配合。

宋支队胜利的克复井坪、平鲁后，更积极活动于大同、岱岳、怀仁一带，使敌人顾此失彼，处境异常困难。李^[2]支队亦开始积极行动，与宋支队遥相呼应，曾一度袭占宁武、四门。我骑兵营密切的配合着各支队日夜袭扰困守宁武之敌，特别是十三日在宁武以北袭击增援宁武之敌坦克车、装甲车五十余辆，这在敌人高傲的认为是最锐利的武器，结果还是狼狈的败回朔县。

宁武的敌人更加恐慌了！虽然已经挣扎了几天，然而终于不得不乘着十三日的黑夜仓皇逃走，使我友军马旅和我骑营顺利地收复了遭受日寇蹂躏，横尸满地，瓦砾半城的宁武城。目睹这种惨无人道的烧杀、抢掠、奸淫，将士对侵略者日本帝国

主义，无不切齿痛恨，有敌无我、有我无敌的怒火，更盛炽地燃烧在每个人的心坎中。

晋北持久抗战的基础，现在是胜利的初步奠定了！

要尽我们所有的力量，亲密地配合其他抗战军队作战。

我在大牛店一带，积极配合忻口友军作战之部队，是分三路进行的：一路切断崞县之十里铺；一路切断原平、崞县间之白家村；其余的一路夜袭崞县城。在十里铺附近发现敌人的汽车百余辆，满载步兵由北向南增援。长期抗战以来，全体指战员一次一次的发扬着自己的积极性。“打他一个来不及”，大家都这样准备好了。当场毁敌汽车数十辆，烧毁二十余辆。敌人认为是最利害的武器又上来了，坦克车、装甲车一齐奔向我军侧击，飞机数架配合作战。有一个模范班长，果敢的率领全班战士用手榴弹齐放，就这样将敌人的坦克车、装甲车打坍下去，同时打退了敌人增援的骑兵。敌又开来大批增援的汽车，我们的这一班英勇战士，即掩护我军安全的退出了战斗。

这一战斗，也明白地告诉了我们：在平地里，在敌人坦克车、装甲车、飞机、步兵配合作战的情况下，虽然我们少于敌人，我们却不可慌张失措，要积极的沉着的采取适当的手段，对付敌人的进攻，才不致遭受无谓的损失。

为着更密切的配合忻口友军作战，我军之某部曾数次攻占忻县之班村、永兴镇，上、下白水，不分昼夜的切断敌人的交通。

敌人宁武与平型关两路的交通都被切断了，敌人主要的交通线只剩了雁门关一路。我主力和支队在晋西北广大地区不失时机的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破坏敌人的交通，击毁敌人的车辆，夺获敌人的接济，发展游击战争，创造持久斗争的根据地，各种工作同时一天一天地开展着。

切断敌人唯一的交通线，两度占领天险雁门关。

天险雁门关也被我另一支队在二十日占领了。我军到达雁门关后，敌满装步兵之汽车二百余辆，正向雁门关开来。该支队突然施以袭击，当场烧毁二十余辆，打毁数十辆，死伤敌人二百余，等到敌人两面的步兵配合，企图正式同我作战时，我们却非常迅速地集结，又安全地退出战斗。此役我军虽有将近百人的伤亡，但是给了敌人一个预想不到的重大打击。

第三天再度占领，我军分三路：一路占领雁门关，一路往广武镇，一路向太和岭，破坏桥梁道路，一夜彻底的破坏八座桥梁，许多险要的道路一段段地分崩了。快要拂晓，时间真是宝贵极了，迅速收回散在各处工作了一夜的步兵，集结荫蔽，准备消灭南北两面前来的敌人。拂晓后，南北两面，果然都发现敌人，好像他们是约好了出发时间的。他们因为第一次痛苦的教训，在离关很远的地区，就下车搜索，在空军的掩护下，以乌龟的速度向前推进，一天一夜的时间，才到关上，由此可见，贼胆懦怯。经我伏兵痛击，死伤数十。

雁门关的重要，在敌人是唯一的交通线，我军两次占领后，敌人已设置坚固的守备。主要的道路两旁，装置了铁丝网，为了更加严密，铁丝网上还系着许多响铃，处心积虑，可谓周到已极。我军始终为了切断雁门关，使我忻口友军更顺利地抗击敌人，乃增加兵力作第三次进攻雁门关。在第二次占领雁门关后，第四天的夜晚，摸到雁门关，毁坏雁门关以北桥梁数处。当天关上的天气虽然酷冷，战士的衣裳虽然单薄，甚至有些已经没有了鞋子，打着赤脚，更由于以前的行动的疲劳，但是为了杀敌，为了配合友军，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气概，在这极艰苦的场合，不但没有丝毫减弱，相反地更加发扬了。一个个精神抖擞，按照他们指挥员的命令在那里紧张地进行着各种不同的战斗动作。终因敌人守备周密，一时未能得手，而仅给了敌人以扰乱与疲劳，但也使敌人

坐卧不安。天险雁门关，我们中华民族的儿女始终是要把它夺回来的！

敌人的眼中钉——宋支队：

宋支队攻克井坪、平鲁后，即进至大同附近黑流水一带积极活动，不停地破坏敌人的交通，夺获敌人的接济，毁坏敌人的汽车，迟滞敌人的运输与增援，大量的杀伤敌人，部分的消灭敌人，同时发动了广大群众的抗日斗争，组织了群众抗日武装游击队，开展了广泛的游击战争，创造了晋西北持久抗战的根据地，相应地补充了本身，粉碎了敌人第一次的五路（左云、岱岳、尚希庄、怀仁、大同）与第二次的四路（左云、怀仁、山阳、朔县）的进攻，大大提高了广大民众特别是敌人后方民众的抗日胜利的信心。直至今日，敌人还不能很快的南犯，宋支队的英勇、积极、坚强的斗争起到了相当的作用。

几个经验与教训：

群众的力量是无比的伟大。

一、当我李支队准备袭击宁武时，有宁武的民众十余人冒险跑来，详细的报告了城内敌人的数目和住址，特别是敌人城内各种残暴的兽行。当晚，他们帮助带路，从许多人向来不知道的水坑里安全进入城内，敌人还不知道。

二、十一月间，我骑兵连长带着一班人到×县附近二三里处进行侦察，因为警戒疏忽，敌人已经快到门前。当地民众不顾一切的跑来报告，使这一班人安全的冲出重围，毫无损失。

三、××地失守后，城墙下以前的军火库内，还剩下一些军火，敌人一到××即大肆烧杀，成了一片焦土与遍地死尸，逼得敌人驻城外不远的乡村，但是对我们的警戒仍是非常严密的。在这种恶劣的情况下，当地群众在夜晚自动踊跃的偷进城去，搬运了许多军用品出来，送给我军。

四、忻口附近，我们刚刚组织的游击队，夜晚摸入敌营，

背出步枪四五十杆。

这几个例子，证明了千百万同胞是决不愿当亡国奴的。只要我们能够把他们抗日的热情很好的提高起来，适当的组织起来，发挥其力量，这就是我们战胜日寇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伟大的力量”。

宋支队胜利发展的原因：

他在军事上是灵活的、巧妙的运用了游击战争的原则；在政治方面与当地广大的民众、政府及各团体，亲密的团结一致，并取得了他们热烈的拥护和帮助；在与友军的关系上，取得了我骑兵部队密切的配合作战。

努力提高全体战士独立作战的能力是战胜敌人的一个重要条件。

一、第三次进攻雁门关后，我们留了一个班在老窝一带活动，不到一月，他们发展了游击队数百人，自卫队员数百人，并能经常的袭击敌人，缴获敌人许多步枪、子弹和服装，保卫了许多村庄没有遭到敌人的烧毁、奸淫、抢掠。

二、十月间在忻口附近，我一班侦察员被敌发觉，敌人立即派出骑兵四十余名包围。我侦察员异常沉着，一面向侧翼移动，一面利用有利的地形，用手榴弹猛烈还击，结果将敌全部击退，并得战马三匹。

三、十一月间，我侦察员三人，在阳曲桥附近遇敌武装通信员五人。我侦察员奋勇向前，将敌全部击毙，枪支、脚踏车等全部缴获，特别是搜得敌第九师团在太原一带整个布置的命令。

这些说明了努力提高每个战士独立作战的能力的重要性。恰恰这一点在今天还是我们的一个弱点，迅速克服这一弱点，对于今后我们的胜利是有重要意义的。

努力学习巷战。

宁武城西门一度被我军完全占领，而始终没有全部消灭城内据点内的守军，我们不是很熟练的巷战经验与注意随带摧毁据点的武器（如迫击炮），是我们一个很深刻的教训。

为什么没有切实的比较长期的据守雁门关？

在客观上，因为平型关、蔚县敌之交通线已被杨^{〔3〕}支队完全截断。然而在我们主观上，第一存在着不合乎游击战争原则的动作，分兵过散，没有突然的袭击；第二使用兵力过少，不能在几次打垮敌人后完全消灭敌人，这也是不可否认的缺点。

广泛的游击战争，在山西、在华北许多重要的区域里都猛烈的展开了。正确的分析具备近代优良军备的日本帝国主义，深刻地检讨抗战的各种经验与教训，发扬我们的特长，坚决的纠正我们的弱点和错误，集结全民族的力量像钢铁一样地坚实起来，在有敌人的地方能够采取各种不同的方式，在军事上主要的是广泛的民众游击战与正规战密切的配合起来，并持久的斗争下去，那么，虽然日本帝国主义暂时的强占了我们的的大好河山，但是，我们坚决相信，最后他们必然地要在这些地方崩溃。

根据解放军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
《贺龙军事文选》刊印。

注 释

- 〔1〕指宋时轮。
- 〔2〕指李井泉。
- 〔3〕指杨成武。

毛泽东关于巩固河防的部署 给朱德等的电报

(一九三八年三月二日)

朱彭并林，聂，贺萧关，刘徐邓⁽¹⁾：

甲、敌之企图在一面攻陕北，一面攻潼关。现军渡、碛口之敌两路猛攻，河防有被突破可能，绥德、延安紧急，威胁河东整个军队之归路。

乙、目前部队在晋西北必须照贺萧关已定部署，以警六团对付进攻河曲之敌，以一个旅攻击由五寨向临县进攻之敌，以一个旅星夜兼程至离石以北，攻击碛口军渡两敌之背阻碍其渡河。此三部并须猛力发动群众，巩固北段河防之一切未失渡口，保障后路。如敌突破河防攻绥德，须以一个旅渡河，配合河西部队消灭该敌，保卫延安。

丙、徐⁽²⁾旅必须立即西移，归还一一五师建制，协同陈⁽³⁾旅消灭当地之敌，猛力发动离石、中阳、石楼、永和、大宁、隰县、吉县及整个吕梁山脉之民众，配合友军部队，巩固中段河防一切大小渡口，保障晋东南晋西南整个国军的归路。如潼关、西安危险，在山西国军主力转移之前，准备先以一一五师之一旅渡河南进，为保卫西安而战。

丁、一二九师应位于同蒲以东，布置侧面阵地，破坏铁路，阻滞敌向潼关进攻，并策应林贺两师作战，如潼关、西安危急，蒋⁽⁴⁾有另调晋境国军主力渡河，改任保卫西安之任务

时，该师主力亦应准备西移，而留一部永久位于晋东南坚持游击战争。上述方针，政治局会议完全同意，望坚决执行。

毛

三月二日

根据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刊印。

注 释

〔1〕指彭德怀，林彪，聂荣臻，贺龙、萧克、关向应，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

〔2〕指徐海东。

〔3〕指陈光。

〔4〕指蒋介石。

张闻天关于目前上海工作方针 给刘少文、刘晓的电报

(一九三八年三月四日)

少文、刘晓：

(一) 你处工作情况如何？二十八期的《解放》收到否？同长江局有经常关系否？有何新问题与新经验？望告。

(二) 上海市目前工作应以准备与积蓄力量为主，坚持秘密党的组织与利用公开的方针。切忌急躁与冒险。但在乡村中有利条件下却可以发动游击运动。根据北方经验，战争中在平原上发动游击战是可能的。

(三) 日寇在山西已达黄河东岸与北岸，正企图过河。中特区已处于战争前线，榆林、保德均有被占领的危险，延安并受威胁。

洛甫

根据中共党史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
《张闻天文集》第二卷刊印。

毛泽东关于有计划地部署 晋豫边的游击战争给朱瑞等的电报

(一九三八年三月六日)

朱瑞同志并告朱彭，胡杨⁽¹⁾：

甲、三日电悉，部署甚妥。晋豫边甚重要，望有计划地部署沁水、翼城、曲沃、垣曲、济源、博爱、晋城地区的游击战争，配合主力在西北两面之行动。

乙、应令阳城李⁽²⁾县长，将布置七县游击战争及自兼晋豫边游击司令计划，派人绕道至吉县报告阎⁽³⁾主任，求其委任，并接济枪支、子弹、经费。

丙、朱彭率东路军在榆社、辽县地域，卫⁽⁴⁾率南路军在吕梁山脉，卫本人在河津，傅作义率北路军在汾阳、离石以北，阎在吉县，胡杨向大宁、隰县转进。

丁、敌一路从博爱到阳城，一路从长治、府城到临汾，一路从灵石、赵城向临汾，一路从隰县、蒲城向临汾，一路从汾阳到军渡，一路从文水、交城向娄烦镇，一路从宁武、神池向五寨，一路从平鲁、清水河到保德，总共不过五万人。我八路军各部正配合友军以坚持游击战争之决心，向各路敌之侧后作战。

毛

三月六日

根据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集》
第二卷刊印。

附：朱瑞关于晋豫边工作布置情况的报告

（一九三八年三月三日）

胡、杨并告洛⁽⁵⁾、毛：

（一）二十七、二十八两日，晋城、阳城相继失守，我随阳城县政府日夜辗转迁移，故联络中断。

（二）阳城县长及公安局长均是同志，公安局及自卫军人枪共三百。

（三）我决以此为中心领导及开展晋豫边工作。

（四）游击战布置如下：

（甲）组织晋豫边军政委员会，由我负责，豫北特委、晋东南中心县委书记、县长李敏之及唐天际同志均参加，执行秘密领导。

（乙）县长以兼晋豫边区游击司令名义领导，以公安局、自卫队及豫北党的小组武装合编为第一、二、三支队，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及各队长、政指、政治工作员，均以随带之干部与学生充任。

（丙）以沁水、翼城、曲沃、垣曲、济源、博爱及晋城之间地带为游击区域。如沁水、晋城之自卫队可取得联络，将增至五个支队。

（丁）第三支队为豫北武装，在短期训练后，可委南下发展。

（五）县长李敏之、公安局长张月川，对×尚信任，但领

导战争一无把握。

（六）部队成分甚复杂，需下苦心整训，现移阳城西南大山中，争取短期整理以便行动。

（七）直南四支队来信先后占领清丰、南乐，取得数次小胜利。

（八）各方组织及工作正努力进行。

朱 瑞

三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指朱德、彭德怀，刘少奇、杨尚昆。

〔2〕指李敏之。

〔3〕指阎锡山。

〔4〕指卫立煌。

〔5〕指张闻天。

毛泽东关于军委指导只提出大的 方针给朱德等的电报

（一九三八年三月八日）

朱彭，陈罗，贺萧关，刘徐邓，聂^{〔1〕}：

甲、军委指导只提出大的方针，由朱彭根据此方针及当前情况作具体部署。军委有时提出具体作战意见，但是建议性质，是否切合情况，须由朱彭按当前敌情情形加以确定，军委不加干涉。

乙、关于敌我位置、作战情况等，除总部随时向军委报告外，各师给总部报告之电报，应同时发给军委一份，使军委充分明了情况。

毛 泽 东

八日十六时

根据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集》
第二卷刊印。

注 释

〔1〕指彭德怀，陈光、罗荣桓，贺龙、萧克、关向应，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聂荣臻。

毛泽东关于八路军应准备转战 陕甘豫地区给朱德、彭德怀的电报

(一九三八年三月九日)

朱彭：

虞戍电⁽¹⁾悉。

甲、政治局决定之战略方针⁽²⁾，包括现时在华北及将来转移至陕西、河南两个阶段，不是单指目前而言。

乙、在目前阶段，不但因蒋⁽³⁾令，而且主要因战略需要（如二月二十三日电⁽⁴⁾所言），在不被敌根本隔断条件下，我军均应在敌后配合友军坚决作战，有效地消灭与削弱敌人，发动广泛抗日运动，如此方能钳制与阻碍敌向潼关、西安与陕北之进攻。只要无被隔断危险，决不应过早渡过河来，更不应不顾蒋令不顾友军渡过河来。为了保障将来转移便利，必须巩固吕梁山脉之转移枢纽，并布置太岳山、王屋山（朱瑞处）工作。第一阶段之部署，要照顾第二阶段情况变化时之处置。

丙、在将来阶段，即敌大举进攻潼关、西安、武胜关、武汉及陕北时，在取得蒋阎⁽⁵⁾卫同意后，八路主力及其他国军主力，应渡过河西河南，为保卫西北保卫武汉而战，而留适当兵力位于山西各区，继续坚持游击战。如敌突破吴堡线，进攻绥德，威胁延安，应准备从一二〇师抽一个旅先行渡河击敌。如敌攻潼关，西安危急，而武胜关、武汉尚不危急，应准备抽出一一五师或至少一个旅，同时并应从阎卫军抽一部，先行渡河

击敌。如何具体处置，应依当时情况而定。但不论多少部队过河，那时均应事先力求取得蒋之同意，并与友军协同。

丁、总之，在目前阶段，所有晋境军队，均应负担消灭敌人发动民众之任务。但同时应准备下一阶段情况迅速变化时之转移。如果八路全部被限制于华北敌之包围圈中，根本不能转移至陕甘豫地区，则对整个抗战及全国政治关系都是不利的。这是政治局战略决定之基本精神。从战争长期性出发，必须如此，方为有利。

戊、因此，你们向阎卫报告及召集军官会议时，应说在敌后作战之战略意义及依靠民众之大有办法，但同时无论如何也不要说全部长期在华北的话。事实上，蒋虽严令，但卫之五十四师、八十三师已从吉县过宜川（武亭亲见），何柱国一部已从保德过府谷（见贺萧关⁽⁶⁾电）。他们此时过河是完全不对的，但亦可见卫立煌等执行命令之动摇。并注意蒋之命令是双关的，一面包含战略需要之积极意义，一面又难免不包含恶意在内。

己、其余另告。

毛 泽 东

九日十时

根据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集》
第二卷刊印。

注 释

〔1〕指朱德、彭德怀一九三八年三月七日给中共中央暨长江局的电报。电报说：（一）战略方面。在友军未撤退黄河以南之前，应坚决而积极地在华北坚持配合友军作战，争取连续的胜利，以达到有力地保卫武汉、保卫西北和巩固统一战线的目的。（二）作战方针方面。在日军主力未转移到华北时，积极保卫华北，收复失地。如日军主力转移华北，津浦路我军应向济南、浦口，江南我军应向京（南

京）沪路积极进攻。

〔2〕见一九三八年三月二日《毛泽东关于巩固河防的部署给朱德等的电报》。

〔3〕指蒋介石。

〔4〕指毛泽东、任弼时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三日关于保卫西安、武汉的战略计划及我军将来之行动给朱德等的电报。

〔5〕指阎锡山。

〔6〕指贺龙、萧克、关向应。

论山西战局*

(一九三八年三月九日)

叶 剑 英

山西情况如何？这是关心祖国的人们所急欲知个大概的。的确，山西的存亡，关系于抗战的前途极大。在敌人方面，它欲进窥中原，威胁武汉，先要肃清黄河左岸（包含山西在内）；敌欲进攻西北，先要奠定山西；敌欲截断陇海路，从河之北岸潼关到开封间处处均能用火力遮断或实行截断。在我们方面，保障山西不仅可以屏障西北，掩护河南，并且北进平绥，东出平汉，东北出涑源，均能给敌军以极大打击，直接威胁平津。因此，山西阵地为我方必须坚持，同时也是敌人亟图攻取的。

此次敌军倾华北之师，悉力西犯，其进攻情况依判断所得约略分述如下：

第一，土肥原之第十四师团，及由山西抽调之第五师团主力，系沿平汉线南下，经道清铁路向西急进，直取垣曲；其第一〇八师团经武安、涉县攻占长治后，分两路一经屯留、府城、古县镇向洪洞，一经高平攻占沁水企图向翼城、扑侯马。

第二，历来在山西作战之第一军主力沿同蒲线南下，派出约一旅团之兵力，攻取离石，占军渡；又派出一部（约一团），

* 这是叶剑英为《新华日报》撰写的社论，原载一九三八年三月九日《新华日报》。

则经大麦郊、川口，取隰县。

第三，由宁武派出一支队（约一旅团）攻占保德，以准备渡河，进攻府谷。估计敌军在山西境内作战的兵力，总在五师左右。

敌人用这多兵力，下这大决心，向山西总攻，企图把临汾当作“色当”，实行其迂回歼灭的作战。直到今天为止，敌军这一企图实现了没有呢？事实证明是没有的：

一、沿道清铁路西进之敌，其先头受挫于闻喜、曲沃，后路被断于新乡；我黄河南岸部队正渡河北上，侧击敌军。

二、由长治、长子西犯之敌，一面遇到地形的困难，一面受到襄垣、屯留方面我军之侧击。

三、沿同蒲路及其两侧南下之敌亦被滞于侯马。

四、进占隰县之敌，经我军英勇的袭击后，夺回县城，给该敌以严重的打击。

五、军渡、碛口、保德之敌企图渡河进攻陕北，但已被我军以坚决的攻击逐回东岸，并已克复军渡、柳林。

依上述情况看来，敌军总攻山西，并没有达到迂回歼灭的目的，相反的，在敌军不顾一切只往前趋的情况下，所谓敌人愈深，危险愈大，反把自己陷于极端困难之中。依敌人三月四日自己的广播说：“山西南郊之日军各部队，皆备历艰险，继续行军，军行所至，岩山比接，行军极感困难，步兵无法散开作战，炮队和辎重等，更无法运输，子弹粮食之补给，特感困难，仅靠骆驼队补给少数之粮秣。我某部队特电乞陆军飞行队出援，由空中向我军投下粮米等。又因支那军将所有桥梁道路，尽行破坏，故日军进击之困难，实非言语所可形容。”像这种情况，正是我们千载一时之机，给敌人以歼灭的惩创。

从前许多战例，消灭敌人有许多方法，冻饿可以消灭敌人，拿破仑在莫斯科就是这样被消灭的。疲奔可以消灭敌人，

苏联内战时代，夏伯阳就是这样消灭哥萨克军队的。山西之敌冒万险而来，已深入到我们腹地，沿汾河两侧，左吕梁而右太行，山势险峻，恰如敌军的自白，我们可以自主的使敌冻饿，可以自主的使敌疲奔，兵法要乘劳，要善于承其弊。

但是如果有人以为敌人在山西，恰如鳖在瓮中，随便可以捉取，像这样轻敌，又会造成不可挽救的结果。我们要战胜侵入山西之敌，除坚决执行上级命令以外，还应该：

第一，山西主将要有钢铁似的决心，因为山西今日所处的地位，是死地求生，亡地求存，只有主将自己有坚持在山西作战的决心和不惜牺牲的精神，才能激动三军，与敌人作艰苦的战斗。

第二，山西作战，因为主要的后方联络线一时被敌断绝，作战军队自然不能保持固定的战线，因此山西作战军队必须依托广大群众，依托有利地势，在整个作战计划下，造成几个新的作战基地，使作战军队有所依托，以便继续进行持久的战斗。

第三，在山西局面紧急的转变下，山西群众及其武装，和作战的军队，更要求得军民一致。因为失去了后方联络线的作战，要更多的依靠群众的支持，要进行更大范围的机动，使冀晋两省的广大地区，均成为作战军队大踏步前进、长距离后退的机动区。这些区域的人民，应有自己的合法的政权，才能更有力的清除汉奸，号召广大群众起来参加战斗，帮助作战军队解决粮秣运输等问题。

很明显的，山西局面，双方均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中支持着战斗。地形有利于我，人民是帮助自己的军队的，只要巩固作战决心，发动广大群众，利用良好地势，进行机动战斗，勇敢、沉着、坚持，我们相信是可以把敌人歼灭在山西山地的。

根据解放军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的
《叶剑英军事文选》刊印。

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

——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继续抗战 和争取抗战胜利

(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一日)

陈 绍 禹

三月初，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举行了三天会议，议事日程是：（一）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二）党的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具体准备工作。在报告和讨论中，充分地表现出出席政治局会议的同志对目前时局和党的工作问题的意见完全一致。

（一）目前抗战形势的估计

在报告和讨论中，大家都一致认为：从去年十二月上半月前一次政治局会议到现在的三个月过程当中，我国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表现出一些新的进步。军事方面的进步，主要地表现在：

（a）南京失陷后一部分军队的溃退现象已经克服了；

（b）我国军队在第一期抗战中所受的相当严重的损失，在基本上已经补充起来了；

* 本文原载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三日出版的《群众》第一卷第十九期。

(c) 我军作战的战略逐渐转向到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的战术也较前更广泛地运用，并且开始收到这一战略转变的成效；

(d) 军纪和士气的提高，军队一般的都提高了作战能力和牺牲决心。如在第一期作战时战斗力较强者为中央军、两广军、八路军等，而第二期作战中，其他各部队均有显著的进步；即有些原来抗战不力的部队，也改变了原来的态度，而英勇地走上抗敌的前线为国效命；

(e) 大部分部队能够留在敌人占领区的后方和两翼坚持抗战；

(f) 大批新的军事的、军事政治的和军事技术的青年干部的培养和训练，开始具体准备建立有新式武装技术的部队；

(g) 空军力量的增长和空军战斗的屡建奇功；

(h) 政治部组织的成立和工作的开始。

政治方面的进步主要表现在：

(a) 国共及一切抗日党派的合作，有进一步的巩固；

(b) 政府中骈体和重叠机关的裁撤，军事委员会效能和威信的提高；

(c) 对抗战将士奖惩条例的颁布和执行；

(d) 惩治贪污明令的颁布和在有些地方开始反贪污的斗争；

(e) 许多省份庶政开始有部分的改革（如山西省明令废除苛捐杂税，广西、广东方面民众运动和民众武装工作的更加开展，安徽、山东、湖南各省的政务开始改进等）；各省开始大批培养青年政治工作干部；

(f)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式的民众运动有初步的开展。

同时，政治局会议指出：我国第二期抗战中的这些军事上和政治上的进步，远赶不上日寇继续侵略和民族危机继续加深

的速度和程度；我国这些进步，不仅还未能造成全线反攻驱逐倭寇收复失地的一切必要的军事上和政治上的条件，而且还不足以打破敌人第二期进攻的主要危险。敌人的第二期作战计划的中心内容是：打通津浦、平汉，联贯自己的南北交通；截断陇海、粤汉，断绝我国的国际联络；完全占领山西、河南，部分地占领陕西（特别是潼关、西安一带及陕北边区），以便达到肃清黄河北岸我国军力和包围武汉以至占领武汉的阴谋。敌人企图实现这一计划，以便达到巩固其第一期作战收获和准备其第二期进攻基础的目的。两个月来，虽然我军在山西、山东、河南各个战线上给了敌人以多次的打击，消耗了敌人的部分军力，挫折了敌人的战略计划，但是山西、山东、河南、陕西的危急情形依然继续，武汉被包围被威胁的危险形势依然存在；而如果为北方锁钥、西北门户和武汉屏障的山西、河南、陕西等省不能免于被敌盘据，如果中国最后一个最大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武汉不幸终于被敌占领，则我国的抗战，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都要处于比今天更严重更困难的局面。因此，保卫山西、河南、陕西，以达到保卫武汉的目的，是一切抗日党派和全国军民今天最紧急、最重要的任务。

（二）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

有许多人问：“现在我们固然要用一切力量去达到保卫武汉的目的，但是，设若万一不幸而武汉不保，中国是否能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呢？”政治局会议对这个问题的意见是：我国军民现在应当尽一切可能用一切力量来达到武汉不被敌占领的目的，同时，并且应当对保卫武汉事业具着最高度的热忱和抱着最坚强的信心；但是，我们也应当有更深远的认

识和更长期的准备，即我们应当假定和确定：在武汉不失的条件之下，我国固然能够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而即在武汉不守的情势之下，我们抗战虽然要遭遇更大更多的困难，但继续长期抗战和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的基本条件依然存在的。

有哪些基本条件决定我国能够继续长期抗战和能够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呢？

第一个最重要和最基本的条件，是我中华民族和中华民国本身具有伟大的能够坚持长期抗战和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许多基本因素。这些因素就是：

(1) 全民族力量的坚强团结——首先是国共及一切抗日党派的亲密合作；

(2) 全国统一的政府，数百万统一的军队和民众武装的存在和发展；

(3) 最众多的人口；

(4) 广大的领土；

(5) 丰富的物产。

正因为我国具有这些优良的基本因素，所以敌人虽然能挟其较我优势的兵力，六年之内占领了我东北辽、吉、黑、热四省领土；八个月之中又占领了我冀、察、晋、绥、鲁、江、浙七省的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最近又将其兽蹄践踏到皖、豫两省一部分疆土，但敌人“以华制华”和“速战速决”的企图均宣告破产；而我国的抗战力量却再接再厉、屡败屡战、愈战愈强；也正因为我国具备有这些优良的基本因素，所以不仅使我们对保卫武汉和第二期作战抱着极大的信心，而且使我们敢于假定和相信，即在武汉不保的情形之下，我们依靠着湘、赣、闽、粤、桂、川、滇、康、藏、陕、甘、宁、青、新等十四省区两万万以上的人口，广大领土和富源作根据地，配合以我国

广大军民在敌人占领区域中的广泛运动战和游击战，定能坚持长期抗战并在长期抗战过程中达到消耗敌人以至最后驱逐和歼灭敌人的目的。

第二个条件，是敌人具有的许多重大困难和弱点。这些困难和弱点是：

（1）财政的困难和枯竭——敌国内公债已达一百七十万万之巨额，对外借款发生空前的困难，人民的捐税负担已非常繁重，战事的消耗是与日俱增（在战争开始时，敌人每日军费消耗即在五百万日元以上，现在当已数倍于这个数目了），对外商业是与日俱减。

（2）军事工业原料的缺乏——钢、铁、汽油、棉花、橡皮等重要军事工业原料，敌国内均极感缺乏，平时即主要地仰给于美国、加拿大、澳洲、英国、印度、荷兰和中国，战时更极端感觉到这些原料品的缺乏；如果国际工人团体——首先是运输工人国际反日援华运动能有更大的开展，真正做到不运军事原料和军火到日本去，则敌人便很难支持较长期的对华大规模作战。

（3）国内反战反法西斯主义的民众运动日益增长——敌国的广大工农劳苦群众，在平时已感受到极大的政治压迫和经济痛苦；几年对华战争的结果，使民众的生活更加处于水深火热的状况之中；大批壮丁被征调入伍和被迫送来中国作战，使农村经济遭受打击，使许多家庭失去父子兄弟丈夫，以致饥寒交迫无以为生；六七年来日本法西斯军阀所努力进行的“占领满洲，日本一切困难问题都可解决”的宣传，事实上既经证明失败，多年来日本法西斯军阀所狂喊“三个月内，皇军可以完全占领中国”的谰言，事实上也宣告破产。日本广大劳苦民众从自己切身经验中日益感觉到：法西斯军阀所进行的对华侵略战争，不仅是反对中国人民利益的，而且是违反日本劳苦民众利

益的；不仅是无端加中国人民以无穷的灾难，而且是借端加日本人民以无限的痛苦。因此，反战反法西斯的民众运动，在日本国内不断增长起来。虽然因为法西斯军阀实行严密的新闻统制政策，日本民众的许多壮烈的反战反法西斯运动，外间不能完全知道，但即从敌人报纸和外国通讯上有时偶然发表的片断消息看来，也可看出这一运动的严重性：许多次成团的士兵公开表示不愿离开国土去异乡作战，大批组织的索夫团和索子团，今年二月东京七千五百人（其中多数是大学生！）因反战运动被捕下狱，大批的作家教授和社会名流因反战而被逮捕，在战死和俘虏敌兵日记中，不断发现厌战和反战的记载……所有这一切，都说明敌人在这方面恰与我国处在完全相反的情形：敌人方面，因为是法西斯军阀进行奴役别国人民和荼毒本国民众的侵略战争，所以敌国民众与军阀间的矛盾和裂痕愈演愈深，战争愈延长，敌人内部民众反军阀反政府的斗争愈广泛愈尖锐；而我国方面，则因为我国军民进行的是保卫民族生存的民族自卫战争，所以战争愈持久，社会各阶层愈团结，人民和政府及军队的关系愈密切。敌人国内民众反战反法西斯运动的增长，这毫无疑问地是敌人的心腹大患。

（4）统治阶级内部的裂痕日深——这首先表现在法西斯军阀与政党之间的明争暗斗，在日本政友、民政两党中，显然存在有一部分反法西斯军阀进行对外持久战争的资产阶级分子，虽然这些分子各有不同的见解，有的是害怕在军阀长期对外冒险战争中，将日本经济闹到完全破产的地步；有的是害怕军阀在长期对华战争中遭受失败，因而引起日本国内不可收拾的危机；有的是简单地希望有和平环境以便继续对华的商业关系；但他们对法西斯军阀消耗一切来对华长期作战，显然是不满意的；民政、政友两党中大多数党员及一部分开明领袖对法西斯军阀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军事预算和总动员法案在议会中经

过长期斗争才能勉强通过的事实，法西斯军阀公开提出所谓合并一切党派为一个法西斯党的威吓……所有这一切，都表现出敌国内军阀与政党间矛盾的增长。

(5) 军力不敷分配——敌人有五十个师团的动员部队，原来计划以十五个师团进攻中国，以三十五个师团对付苏联，现在敌人派到中国来的已经在二十五个师团以上，而且因为战线延长几千里，来华的二十五个师团的兵力，又已经感觉到顾此失彼不敷分配的困难；在这样情形之下，敌人如果继续增派军队来华则国防上感觉到极大的空虚，对苏联进攻的计划方面受到极大的破坏；如果不增派军队来华，则不仅战胜中国的计划归于泡影，而且已来的军队，有被中国歼灭的危险。因此，敌人现在用尽威胁利诱的方法，企图在已被他占领的区域内利用汉奸组织中国人的伪军队来协助日军作战。虽然在有些地方，敌人曾经能够在汉奸帮助之下，组成以日本人作军官中国人当士兵的军队来助战，但无疑义地，这些少数中国同胞受欺骗受威胁是暂时的，只要我们进行艰苦的政治争取工作，他们早迟是会掉转枪头去攻打中华民族公敌的。

(6) 战线延长，有被我各个击破的危险——敌军深入我国土数千里，所居的是中国领土，所残害的是中国民众，所敌对的是中国军队，所依靠的是中国给养和中国交通工具，因此，四方八面感受到各种威胁和危险。同时，因为兵力分散在各个战线和城市及交通要道，时常被中国军队和武装人民袭击和打击。最近敌人在山西、山东各个战线上每日遭受数千人马的损失，便是他遭受这种危险的开端。

(7) 来华军队的迅速堕落腐化——敌军在我国被占领区域内的奸掳焚杀的非人暴行，固然给了我国成千累万同胞的人格生命财产以莫可言喻的损害，但同时，也造成了敌军在思想

上、行动上迅速堕落腐化的结果，因而一方面形成敌军纪律废弛和战斗力减弱的现象，另一方面形成敌国政府不许来华军队再回本国的企图，以致造成敌军将士悲观绝望的情绪。

(8) 远近后方的不稳——敌人国内各种矛盾的增长，不能不影响到后方的不安；此外，不仅敌人特别倚重的我东北后方，有变成前线的可能，而且台湾、朝鲜均正在酝酿着与日俱增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台湾数千矿工武装起义进攻日寇的驻军，便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下弱小民族准备进行大规模解放运动的信号。日寇这种后方不稳的危险，一定随着中国抗战的坚持和日寇困难的增加而与日俱增，这是毫无疑问的。正因为日寇具有这些基本的困难和弱点，正因为日寇这些困难和弱点随着战争延长和扩大而日益增长，所以我们不仅深信我们能够制止日寇的无止境的侵略，而且我们相信我们一定能够在坚持长期抗战中取得最后打败日寇的光荣胜利。

第三个条件，是国际形势基本上与我国抗战有利。这种有利的国际形势主要地表现在：

(1) 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以及一切爱好和平人士对我国抗战的同情和援助——我国反对日本法西斯军阀的民族自卫战争，不仅是保卫我民族生存和国家独立的战争，而且是捍卫世界和平和人类正义的战争。因此，我国抗战不仅能获得国际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和团体（共产国际及其领导下的各国共产党——首先是苏联共产党，西班牙、美、英、法、日、德、意、捷、墨西哥、加拿大、印度等国的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群众团体；社会民主国际及各国社会民主党和工党——首先是法、英、美、西班牙、德、意等各国社会民主党和工党及其领导下的群众团体，各种工会国际和苏联、英、法、美、捷、西、墨等各国家的工会组织）的同情和声援，不仅能得到亚

洲、非洲、中美、南美各被压迫民族的同情和赞助，而且能得到世界一切爱好和平人士的拥护和援助（如包括各界各党派参加的国际反战反法西斯大会，国际青年反战反法西斯大会，国际联盟之友联合会，世界学生会，国际妇女反战反法西斯大会，许多基督教青年会和天主教青年会，英、美、法、加、捷等各国的中国人民之友社等等团体）。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及爱好和平人士给我们的实际帮助，虽然还不够，但是，他们对我国抗战的同情和援助是与日俱增的。我们必须认识和相信：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同情和帮助，是一种伟大的力量。这种力量曾经帮助苏联人民打退过十四个资本主义国家军队的进攻；这种力量曾经而且正在帮助西班牙人民坚持反抗德意两法西斯国家军队及其走狗的侵犯；这种力量，对于中国人民坚持长期抗战的事业，一定表现出一天比一天增强的伟大作用。

（2）社会主义的苏联民众和政府，对于我国民族自卫抗战的精神同情和实际援助——在我国抗战一开始时，苏联政府即与我国政府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给侵略者精神上以打击，给我国精神上以援助；苏联各种报纸杂志上充满对我国抗战同情的文字，苏联外交代表在国际联盟各种会议上仗义直言地对日寇谴责和对我同情，苏联在物质上给中国政府以援助；苏联人民对我国的同情和援助，一定是随着我国坚持抗战和中苏友谊增进而逐渐加强的。苏联现在是一等富强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是一个与中国有数千里疆界连接的国家，是对中国民族解放运动本着其社会主义国家根本立场而抱着绝对真诚同情的国家，是与中国在反对侵略和捍卫和平问题方面有共同利害的国家，因此，苏联对中国人民日益增长的同情和援助，是一种莫大的实际力量，是中国能够坚持长期抗战和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国外条件中最有决定意义的条件。

(3) 世界三大资本主义民主国家——法、美、英对我国抗战的友谊态度——虽然法国在远东方面没有英美那样重大的利益，虽然法国主要地忙于欧洲紧张局势的应付，但是，由于法国人民战线各党派——社会民主党、共产党、急进社会党、法国总工会等——对于反法西斯、反侵略和捍卫和平的极大努力，由于法国政府依靠着人民战线的力量，由于法国感觉到其在安南的统治和中国的利益受日寇的威胁，所以法国人民和政府对于中国反侵略的抗战，始终抱着友谊的态度。虽然美国直到现在未能公开改变所谓“孤立”政策，虽然美国直到现在对远东问题未能采取其应有的积极态度和行动，但是，从美国国家的根本利益立场看，美国是不能放弃或漠视远东问题的。近年来罗斯福和赫尔再三发表反对侵略和捍卫和平及拥护民主的声明，美国民众和正义人士不断表示对中国抗战的同情，美国在太平洋上海空军力量的逐渐加强，都是表示美国准备在必要时采取适当办法保障其太平洋东岸安全和利益的。正因为如此，所以美国政府对中日抗战保持着友谊的态度。英国张伯伦政府最近采取的公开对德意法西斯侵略者让步的政策，的确不仅鼓励了德国法西斯蒂实行武装并吞奥国和德意法西斯蒂大举增兵西班牙的举动，而且实际上造成了日寇在中国更加放胆横行的环境。不过，截至目前止，我们虽然还未见到英国对制止日寇侵略采取应有的积极政策，但同时我们也还未见到英国已经决定采取与日寇妥协来宰割中国的政策。我们固然知道英国对中日战争的根本政策，是既不愿日寇独霸中国，也不愿中国战胜日寇，而是希望中日双方在长期战争中相互减弱，以便增强英国在远东和中国的地位。但正因为英国是不赞成日寇独占中国的，所以直到现在，英国政府对我国抗战还是在许多方面加以帮助的。

(4) 日德意法西斯侵略者内部的冲突——虽然德日是订有

所谓“反共产国际协定”的同盟国，但日德在中日战争问题上显然有两种冲突存在着：第一，德国法西斯蒂害怕日本在中国战争中消耗过大的兵力，甚而有遭受失败的危险，以致不能执行德日意军事协定的义务；第二，德国法西斯蒂每日狂呼收复战前殖民地和租借地，以及重新分配殖民地，中国不仅过去有德国的租借地，不仅一般地是一个广大的市场，而且中德经济关系近几年来有极大的进步，因而德国不愿意日寇独占中国。正因为这样，所以德国政府不仅再三企图出来“调解”中日战争，而且同时也出卖军火等给中日双方。至于最近德国法西斯蒂承认伪满一事，这不仅是为的表示他对所谓侵略同盟国的精神上的帮助，而且是为作他自己以武力并吞奥国的一笔伏案和张本。由德国并吞奥国和准备进攻捷克以及德意增兵西班牙而引起的欧洲战云密布的紧张环境，的确给远东法西斯强盗暂时更横行无忌的机会，但事变发展的最终结果，未必会即有利于日寇侵略的。最重要的，日寇现在所谓同盟国，实际上不能真正以军事同盟国应有态度和程度来帮助日寇的。德国法西斯蒂并奥暴行和扰乱全欧的大阴谋，并不是由于其国内政治力量加强和巩固的结果，而是由于国社党与国防军冲突尖锐化以及国内经济困难增加和人民对法西斯政治不满深刻化，德国法西斯蒂企图用对外冒险行动来转移国内视线和强迫国防军对外作战的结果。德国既忙于干涉西班牙，又忙于并吞奥地利，更忙于准备扰乱全欧的大变乱，同时，国内的经济情形和政治情况又极端严重，当然很难于给日寇以有力的帮助。意大利法西斯蒂既忙于阿比西利亚的战争，又忙于西班牙的干涉，更忙于应付欧洲行将到来的大事变，同时，国内经济财政更到了极窘的境地，当然也难于给日寇以有力的帮助。

正是根据上述的这种种情形，所以中共中央认为虽然我国的国际形势，还不能满足我国抗战的要求和愿望。但是，一般

的说来，国际形势对于我国的抗战是有利的，至少我国的国际形势，比我们的敌人要好些，日寇除德意法西斯蒂的同盟者外，已成为全世界先进人类的公敌！

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虽然在抗战中始终着重于“自力更生”的原则和信念，但同时，我们经常指出要善于运用我国有利国际环境作为我们争取抗战胜利的一个重要条件。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自始至终坚决反对和揭露那些用“中国国际环境与抗战不利”或“中国的国际环境根本没有出路”等作遁词，来掩饰“抗战必然失败和抗战没有办法”的投降主义的人们的原形。这些人们既否认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声援是一种巨大的力量，又故意造谣侮蔑素以平等待我的社会主义的苏联而把它与资本主义国家混为一谈，更否认今日愿意维持现状和保卫和平的民主国家与已经武装进攻西班牙和中国以及已经武装占领阿比西利亚和奥国的法西斯侵略国家之间的分别，当然他们不能不归结到国际形势不利于中国的抗战。而这些人们既对本国民族力量的团结表示怀疑和反对，又对国际形势抱悲观失望的态度，当然不能不得出不能抗战和抗战无出路的失败主义的结论。当然，说这些话的人，有些是作日寇应声虫的托派政治间谍，有些是国际常识不足的幼稚朋友，我们对他们的批评态度是不同的，但是，我们必须指出：这种分析国际形势的“理论”，事实上是妨碍抗战事业和便利日寇侵略行动的。

由此可见，无论中国本身条件，无论敌人方面条件，无论国际条件，基本上都是说明我国能够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

然而这是不是说：我国抗战的国内外条件全都顺利，我国抗战已经没有严重的困难和弱点，我国抗战的最后胜利已经预先有了保证呢？不是的，绝对不是的！

八个月的抗战，固然造成了我国空前未有的进步：全民族的空前觉醒和空前团结，统一政府和统一军队的建立，政府与人民关系的开始逐渐改善，武力开始与人民结合，中华民族和国家地位在国际上的增高和世界先进人类对我国同情的空前增长，所有这一切，都是举世公认的事实。但是，同时，我国抗战无论在政治方面，无论在军事方面，都还有极严重的困难和弱点：军队新式武装和新的军事干部的不够，军事工业的缺乏，军事运输的迟缓和不够，军事战略转变的不充分，统一军队条件的不充分具备，这一切都是军事上不容否认的弱点和困难。抗日各党派本身力量都还不能满足抗战形势的需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未达到应有的巩固和扩大的程度，政府设施还不能完全适合抗战的需要，战时民意机关的缺乏，民众运动和民众组织的不发展，贪污土劣的横行，这一切都是政治上无容讳言的弱点；大批难民和失业同胞的流离失所和饥寒交迫，许多军事原料和军用品的供给不足，大量的财政消耗，许多地方物价的高涨，这一切无疑义的是财政经济方面的困难；欧洲的紧张局面，英国张伯伦的对侵略者让步的政策，国联的软弱无力，美国的动摇政策，这一切都是目前我国抗战的国际形势中的困难和弱点。

全中国军民的任务就在于：不仅清楚地认识中国抗战的国内外的一般的有利条件和优点，而且能够勇敢地看清我国抗战中的各种严重的弱点和困难；不仅明白地认识这些困难和弱点，而且能够大胆地找到克服这些困难和补救这些弱点的有效办法。

为的使第二期抗战能胜利地进行，为的使我国能继续长期抗战和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此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认为我们对于目前抗战的许多重要问题有坦白表明意见的必要，这不仅是为的使我们党的全体同志对这些问题有清楚的认识和共同

的了解，而且是为的使我们这些意见能提供国民党同志和国民政府当局以及全国各抗日党派、各抗日部队、各抗日团体和全体爱国同胞作为讨论和实行的参考材料。

(1) 对军事问题的一般意见：

A. 确定和普遍地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在抗战初期，只是八路军采取运动战和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八路军不能作阵地战，因为没有重炮），在平型关、广阳等战斗中，获得显著的打击敌人和歼灭敌人的胜利。在第二期抗战中，大部分在山西和山东、河南等战线上的我国部队，也都开始在采取运动战为主的战略，在江浙皖各地，我军和地方人民武装也开始比较广泛的采用游击战术，所以能获到最近一个时期部分打击敌人和歼灭敌人的成效，特别是鲁南和山西各战线上的相当重要的胜利。为的保卫武汉和在河南、山西、山东各战线上给敌军以更大的打击，我们必须坚决确定及广泛实行以运动战为主而辅之以游击战和配合以阵地战的战略方针。为的能够真正顺利地实行这一战略，必须：第一，组织相当数量的野战军团，在运动战中来消灭敌人、打击敌人和消耗敌人；第二，组织相当数量的挺进军团，深入敌人后方游击；第三，扼守几个重要支点，以阻止敌军的前进深入。

B. 建立真正统一的政治坚定的战斗力强的国民革命军——为的战胜武装优越的敌寇，须要建立统一的国家军队，关于这一点，中国共产党还远在一九三五年八一宣言中便即公开地提出。我们所提的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的口号，既不是说离开中国原有军队而纯粹另外去创造新军队，也并不是说把中国所有军队联合统一起来换作抗日联军的名称，而只是表示我们希望：第一，把原来国内各种不统一的军队，联合而成为全中国统一的军队；第二，这个统一的军队要担负起保卫国防

的责任；在中国现在具体条件下，即是说，担负起抗日的责任。统一军队要具备那些基本条件呢？我们始终认为它应有下列几个基本条件：（甲）统一指挥；（乙）统一编制；（丙）统一武装；（丁）统一纪律；（戊）统一待遇；（己）统一作战计划；（庚）统一作战行动。

现在我国已经开始有了统一的军队的基础，这主要表现在：（a）过去各种不同系统的（如中央军，红军，各种地方军队等）军队编成为统一的国民革命军；（b）这些军队受最高统帅及军事委员会的统一指挥；这些军队正在努力执行统一作战计划和表现统一作战行动。但是，同时对于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武装、统一编制等问题却至今还未能做到。统一待遇和统一武装，既为抗战本身的事实需要，已成一切抗战军队的共同要求，所以毋庸加以解释；至于统一纪律和统一编制方面，我们提议：一方面根据作战需要和利益，另一方面选集各军队的优点和长处，来建立一个真正尽善尽美的统一纪律和统一编制。怎样才能做到部队的政治坚定呢？在今天，这至少需要进行下列三件基本工作：（甲）立即在军队中普遍地建立起有系统的政治教育制度；最近军事委员会下已设立政治部，这是一件值得注意和称赞的事情。我们希望政治部负责人员和工作干部能毅然恢复北伐军时代的政治工作的革命精神和光荣传统，参照八路军的政治工作经验，在军队中普遍地建立起政治工作机关，慎重地选择政治工作人员，认真地进行政治教育工作，以达到提高我军政治觉悟和战斗意志，以达到建立军民一体的亲密友善关系，同时，达到瓦解和夺取敌军的目的。（乙）军官与士兵共甘苦共死生，达到官兵一体的地步；（丙）迅速普遍地改善征兵制度——我国既无国民必需服兵役的教育准备，又无详细的人口登记和调查；同时，再加以实行征兵时，也未明白规定应征兵役的年龄和期数（即第一期应征者为

某年出生年龄达若干岁之壮丁，第二期应征者为某年出生之壮丁等），因而变成普遍抽丁的办法。于是许多地方的土劣及保甲长乃得乘机将征兵变为敲诈勒索的差事，有钱的人家虽壮丁多也可以出钱买别人去顶替，没钱的人家虽壮丁少也被强迫拉去当兵，甚至在许多地方发生强迫捉人当兵，闹成天怒人怨的现象。那些被强迫捉去当兵的人，既然不能明了当兵的意义当然不能有充分的战斗力。为补救征兵制现在的缺点和特点，我们以为一方面必须在广大民众中作抗战和兵役的教育解释的准备工作，另一方面暂时仍采取以募集志愿兵为主办法，以逐渐过渡到实行普遍征兵制。当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和人民爱国热潮风起云涌的时候，绝不愁没有千百万壮丁自动到抗日军队中去尽抗日救国的神圣天职。只有战士们都懂得为什么而战和为何人而战的军队，才是政治坚定的武装力量。怎样才能使部队的战斗力强呢？在中国今天的具体条件下，除上述的统一和政治工作等外，必须：（甲）提高和加强官兵的现代军事战略战术的训练；（乙）提高和加强官兵的现代军事技术（航空、坦克、铁甲车、军事化学、炮科等）的教育和学习；（丙）培养大批新的军事的和军事技术的干部人才；（丁）加强现有军队的近代武装。

C. 建立几十师新的有新式武装的部队作为全军的骨干——我们绝不能使我国几百万军队都有足够数量的新式武装，但我们不能不努力建立几十师有现代武器的部队作为全军的骨干。为的达到这一目的，必须：（一）利用一切时间空间和争取更多时间空间来建立这种部队；（二）坚决抽出成立这几十个师为建立这种新军之用，平时绝不轻易动用这些部队；（三）努力取得必要数量的新式武器；（四）认真培养善于使用这些新式武器的技术干部和能指挥近代作战的军官人才；（五）以大公无私的态度从各种政治坚定的战斗力强的部队中

抽调一部分队伍出来作为建立这种新军的组成员，抛弃一切派别和门户的偏私之见，只有在一定时间内我国能创立出相当数量的有新式武器的国防师作为全军的骨干，才能真正谈得上准备了对敌人反攻的军力，才能达到在长期抗战中消耗敌人和歼灭敌人的目的。正因为如此，所以中共中央再三要求我国政府及军事当局和全国军民，用异常严重的注意和决心来解决这一个对抗战有决定意义的问题。

D. 迅速建立和扩大军事工业和加速军事交通——以我国落后的技术基础和抗战的时光迫切，当然我们不能很快建立高度的军事工业（如摩托及重要机件制造等）。但是，我们应当而且可能把我国一切工业基础和物质条件搜集和利用起来，在友邦技术和人才帮助之下，迅速建立起最起码的新式的军事工业（以装修飞机、坦克、装甲车等开始，直做到买得摩托后，可以自己制造这些武器）；同时，应大大地扩大现有的兵工厂，以便大大地增加枪炮子弹等的出产量。此外，必须努力改良和扩张军事交通网，以便利国内外军事运输，现有的军事交通情形，是不能满足军事需要的。建立和扩大军事工业，不仅是现时抗战中的一个最关紧要的问题，而且是使中国国防力经常巩固和加强的一个根本问题。正因为如此，所以中共中央再三建议我国政府及军事当局严重注意这个问题。

E. 加速普遍地给军民以防毒的常识和设备——日本法西斯军阀在上海和北方战线上曾开始试用过毒瓦斯来毒死我国军民，今后当敌军困难增加和失败屡见的条件之下，将不可避免地要采用放毒杀人的非人暴行。因此，我国政府和民众，应该一方面加速努力进行防毒的教育和设备；另一方面呼吁全世界无产阶级政党工会和民主政党和团体、卫生慈善团体，以及国际联盟和英美法苏等各国政府起来抗议和制止日寇的此种野蛮举动。

(2) 对国内政治中几个迫切问题的意见：

A. 对巩固和扩大国共及一切抗日党派的抗日救国团结问题信仰自由和各党派不能取消而应并存合作以挽救民族的危亡这一层真理，不仅由毛泽东同志在其今年二月二日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其光谈话中，代表中共发表过明确的意见，而且已为国民党的贤明远见领袖和绝大多数干部党员等所共信。只许一党合法存在，同时不承认其他党派合法并存的办法，既为事实所不许；取消现存一切党派而合并为一党组织的办法，亦为事实所不能。但巩固和扩大国共及一切抗日党派的合作，既为人民愿望和抗战事业所必需，因此，政治局会议一致认为：解决此问题的唯一正确办法，在于遵照中山先生的精神建立一种包括各党派共同参加的某种形式的民族革命联盟。这种联盟建立的基本原则，应有下列三点：（一）各党各派各团体拟定一统一战线纲领作为各方宣传行动共同遵守的方针；（二）由各方代表组成一由上而下的即中央与地方的统一战线组织，以规划抗日救国的大计和调整各党派各团体间的关系；（三）参加此联盟之各党派仍保存其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统一战线纲领内容，由各党派（国民党，共产党，国家主义青年党，中国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国家社会党等）代表共同商计和拟定；统一战线组织形成的方式，或采取各党派各团体选派代表组织的方式，或恢复民国十三年至十六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方式，或拟定其他的办法和方式，只要与团结抗战有利，中国共产党均愿与国民党及其他一切抗日党派诸同志共同计议和执行。

B. 对国民党的关系和希望——国民党现在在政府和军队中均居于领导地位，为我国第一个大政党，因此，凡是真诚抗日救国的人，都热望国民党本身工作有更大的改进和加强。今天，只有日本法西斯军阀及其走狗汉奸托派等才企图打倒国民

党，才企图在南京等地伪造国民党组织来污蔑国民党，才希望国民党坏。我们中国共产党员是中华民族的女儿的一部分，对于我们的民族国家抱着生死与共的真挚的热爱，对于侵略我国的日本法西斯军阀抱着不共戴天的仇恨，因此，对于继续坚决对日抗战和争取国家民族最后胜利的事业，抱着无限的忠诚和信心。正因为如此，所以对于我国领导军民抗战的第一个大友党——国民党，抱着诚挚的友谊，充满着热烈的希望，希望国民党在政治上组织上有更大的改进，希望国民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有更大的发展有更大的增强。因为国民党愈改进愈加强愈有力量，就是等于抗战事业的愈改进愈加强愈有力量。因此，国民党愈加进步和强大，不仅是国民党本身有利的事情，而且是全民族有利的事情，同时，也就是共产党和一切抗日救国的党派有利的事情。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诚恳和热烈地希望国民党本身有如下的改进和加强：（甲）淘汰贪污腐化及一切不忠于党不忠于抗战革命事业的分子，以刷新党的组织；（乙）大量吸收先进青年和进步人士到国民党组织中来，以增进新生力量；（丙）在组织内实行真正民主集中制（即：少数服从多数，问题未决定前，党员有充分讨论和批评的自由权利，决定后，无论个人意见如何，必须执行组织的决议；下级必须执行上级的决议和指示，如对上级决议和指示有不同意见时，可向上级提供意见，但上级未改变决定前，仍须执行等等）以健全党内生活和培养大批干部人才，民主集中制与党的领袖和领导机关威信绝不冲突，恰恰相反，只有实行民主集中制，领袖和领导机关才更有威信更有作用，以前中山先生为国民党的总理，同时，他在民十三年改组国民党时在党章上毅然决定采取民主集中制，结果，使中山先生威望作用更加增大，同时，党的组织内健全生活也建立起来，党内大批新的干部人才，也产生出来，便是明证；（丁）加强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团结，以巩固党

的统一；（戊）提高和严格执行党的纪律，使党员均能自觉地为党为革命事业而努力。国民党的贤明领袖和党员同志们，对于国民党本身工作改进和加强，当然具有卓见，我们谨以友党兄弟之谊向国民党提供上述几点意见，不过作为参考的资料。

C. 对于统一政府问题的意见——为的保证抗战事业的胜利，必须有全国统一的政府，这是我们自始至终的坚强信念，所以不仅在一九三五年八一宣言上，中共中央便提出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的口号，同时，再三说明这一口号的意义和内容，既不是推翻现有的国民政府，也不是要求国民政府改变名称，而只是说明须使国民政府成为统一的政府，并实行抗日以尽保卫国防的任务，而且我们早已在实际上将苏维埃政府改成为地方边区政府，以推进和促成全中国统一的中央政府的建立。陕甘宁边区政府是中华民国的地方政府之一，服从统一的中央国民政府，这已经是举世皆知的事实。关于边区政府人选及行政系统问题，中共代表曾再三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负责同志谈明，并再三得到蒋⁽¹⁾先生的同意和答应，明令不久即可发表。在陕甘宁边区中不仅共产党有合法地位，国民党及一切抗日党派均有合法地位。在陕甘宁边区中，因为地瘠民贫我们还作不出什么值得满意的成绩，我们现在做到的，不过是：肃清了贪污土劣，废除了苛捐杂税，相当地改善了人民生活，广泛地给予了人民民主自由，教育和组织民众优待抗日军人家属。所有这一切，我们认为不仅是陕甘宁边区民众热烈欢迎的事情，而且是全中国同胞急切盼望的事情；不仅是我们共产党员应该实行的事情，而且是一切真正中山先生信徒应该进行的事情。因此，不仅是陕甘宁边区应有的事情，而且是整个中华民国领土内应该普遍的事情。所有这一切，绝不能说是违背了中央政府的意旨，相反地，照我们想，应该是为中央政府赞许的地方自治的庶政。此外，在八路军收复的晋冀察边区三十几县

中，一切行政系统和人事问题，均系事先征得战区司令长官和中央军事委员会及国民政府的同意和批准。对中央政府与任何地方政府因某种问题有误会和磨擦时，中共总是始终站在维护统一和抗战的大原则下去力求取得合理的解决，所有这一切，都在事实上证明我们共产党对于拥护统一政府的问题的光明正大的立场。

此次政治局会议更一致坚决认为：我们不仅在现在努力维护领导抗战的统一政府，即在将来抗战更困难更复杂的局面之下，我们也是竭力赞助统一政府的。因为抗战愈困难，民族危机愈深广，对内对外，统一政府的需要更迫切更必要。因此有少数企图用陕甘宁边区问题来诋毁中国共产党“破坏行政制度统一”，甚至污蔑陕甘宁边区为“封建割据”等，以便破坏国共两党抗日救国的团结，以便挑起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误会，这不仅是一种抹煞事实的昧心之谈，而且是一种不识大体、不顾大局的有害之举。

D. 关于建立健全民意机关问题——为增强政府与人民间的互信和互助，为增加民众和政府抗战救国的效能，健全民意机关的设立，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至于民意机关的形式，政治局会议认为：或为更扩大的国防参议会，或为国民大会，或为其他形式，均无不可。最主要地在于：（甲）此机关要真能包括抗日党派、各军队、各有威信的群众团体的代表，即包括真能代表四万五千万同胞公意的人才。（乙）此机关要真有不仅建议和备政府咨询的作用，而且能有商讨国是和谋划内政外交的权力。

E. 关于动员和组织民众问题——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自卫战争的胜利不仅需要政府和军队的最大努力，而且需要广大民众的全体动员和积极参加，这是古今中外再三考验过的真理。

关于这一真理，革命导师早已向我们指明过。例如列宁在

其批评卢森堡对民族革命战争问题错误时曾说：“反帝国主义列强的民族战争，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它是不可免的，进步的，革命的。不过它底胜利，当然应有：或者是被压迫国家中伟大数量人民底联合的努力（例如我们引作例证的印度和中国中几万万人民底综合的努力），或者是国际状况底条件，有特别顺利的配合（例如帝国主义列强因为它们本身的削弱，它们本身的战争，它们本身矛盾等，足以制止他们的干涉行动），或者是大国之中某一国的无产阶级同时作反对资产阶级的武装起义（最后这一种情形，从对于无产阶级胜利的观点看来，是最合乎希望的和最有利的）。”由此可见，列宁把“被压迫国家中伟大数量人民底联合的努力”，看成是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自卫战争可以取得胜利的一种条件。同时，中山先生在民族主义第六讲上说：“有了四万万人的大力量，共同去奋斗，无论我们民族是处于什么地位，都可以恢复起来。”我国抗战已达八月之久，动员民众的力量还没有充分发挥。为着继续抗战和争取最后胜利，政治局会议认为我们正应急切的补救这种弱点。我们提议将工农学商各界按照其职业地域而组成各种职业的联合团体，将青年、妇女、文化界等按照其切身利益和特殊需要而组织成各种统一的群众团体，将已有的群众团体加以健全和充实，将无组织的民众吸收到各种群众团体内去，同时，在全国范围内成立统一的全国性的领导机关，在各地方组织统一的各界群众团体的领导机关。这些团体应向政府机关登记，并接受政府的领导，在抗日救国的前提之下，发挥各群众团体自己的工作，帮助政府和军队抗战，以达到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的统一。

此外，政治局会议特别指出：我们不仅应该注意帮助政府动员和组织政府统治区域的民众，而且要注意去艰苦动员和组织被敌占领区域的同胞。在我政府统治区域的民众运动的总方

针，应该是动员和组织民众去帮助政府和军队进行抗战和取得抗战的胜利；在敌军占领区域的民众运动的总方针，则是动员和组织民众去反对和推翻敌军及其傀儡组织的统治，使他们在军事上不断失败。因此，在我政府统治区域的民众运动的工作方法，应该是以合法统一和互助合作为原则；在敌人统治区域的民众运动工作方法，必须是严守秘密利用合法可能以达到动员和组织民众去推翻敌伪统治的目的。

(3) 对外交问题的意见——在前面叙述我国抗战的国际条件时，我们已经指出我国抗战固然要首先坚持“自力更生”的原则，但同时必须认清国际方面谁是我们真正的朋友，以便善于运用有利的国际条件，争取一切可能和必要的外援。此地我想指出的，就是我国在外交政策方面，不仅政府要更加积极地去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抗日的朋友为外援，同时，还须发动和组织广大的国民外交行动。我国抗战已经进行了八个月，但是，我们的国际宣传工作，我国各界民众团体对国际上各种民众团体的联系，都太薄弱了。我们提议：A. 由我国各党派各界群众团体共同发表一告世界无产阶级团体（共产国际，社会民主国际，阿姆斯特丹职工国际及它们领导下的政党和工会）和一切维护世界和平的国际组织（国际反战组织，国际联盟之友联合会等）宣言，请求他们给我们更有力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援助；B. 迅速派遣包括工农军商学各界有威望的代表及妇孺难民等代表的代表团，到欧美及东方各国去进行宣传寇敌在华残暴及我国英勇抗战详情；C. 摄制反映中国人民生活、揭露日本残暴和表现我国民族团结御侮的几部有声有色的影片，送欧美及东方各国放映；D. 加紧供欧美及东方各国的报章杂志通讯社以各种必要的书籍材料照片等；E. 为着顺利进行这一工作，必须政府与各党派及民众团体切实合作，成立一统一机关以领导计划和执行这一工作。

(4) 最后，政治局会议讨论了中共本身的强固和改进问题。首先，政治局会议认为：必须向党内党外广泛解释，巩固和扩大共产党力量，对于抗战和使抗战获得胜利的伟大事业，有绝对的必要。因为共产党是坚决抗战到底和为使抗战获得最后胜利的中国第二个大的政党，因此，共产党的力量愈增加愈扩大即是抗战的力量愈增加愈扩大；因此，巩固和扩大共产党本身的力量，不仅是共产党本身有利的事情，不仅是工人阶级有利的事情，而且是全民族有利的事情，因而也就是国民党和一切抗日党派有利的事情。今天，只有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汉奸托派们，才努力企图消灭中国共产党，才尽力造谣侮蔑中国共产党。全中国同胞和一切抗日力量，应当而且必然对共产党加以爱护的。其次，政治局会议特别指出：

A. 我们党今天在数量上还远不能适应抗战事业的需要。因此，要求全党同志把发展党员看作日常工作中的一种最基本工作。

B. 我们党的质量（即社会成分）须要有大的变更；过去几年因为特殊的历史环境和种种原因，所以我们党员的社会成分是农民雇农和手工工人占多数，大城市产业工人的比例不够，现在我们应当努力克服这一弱点，应当努力吸收重要产业的先进工人和先进知识分子入党。

C. 因为国内外政治环境的复杂和紧张，因为新党员增加和老干部理论修养的不够，加强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常政治教育，加强党内对三民主义的深刻研究，已经成为全党各级机关和每个同志的刻不容缓的严重任务。

D. 加紧选拔和培养大批新的党的干部和非党的革命干部，以增强抗战的力量。

E. 为适应抗战环境的需要，建立和健全地方党部的独立工作能力。

F. 加强党报工作和使全党同志了解党报的意义和重视党报的指示。

G. 建立正确的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联系，加紧秘密工作，以防制日寇及汉奸的破坏和捣乱。

H. 加紧两条战线上的思想斗争，坚决反对那些不懂得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坚持长期抗战和取得抗战最后胜利的基本保证的左倾关门主义的分子；同时，无情打击那些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曲解成为无原则的投降或者对中国革命前途抱完全悲观失望态度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分子。

I. 加强党内教育工作，保持党员的艰苦勤奋牺牲的光荣的布尔塞维克的作风和传统，严厉打击那些思想堕落和行为腐化的个别分子，直至将他们驱逐出党。

J. 提高革命警惕性，严密注意和打破日寇汉奸及一切反动分子用尽各种方法在共产党内外进行破坏工作的阴谋。

K. 特别注意巩固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团结和统一。

（三）抗战与中华民主共和国口号问题

首先要说的，是我们所提出的中华民主共和国的性质问题——我们党中央在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七日曾通过一个专门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在这个决议上，我们党的中央公开说：“中央认为在目前形势之下，有提出民主共和国口号的必要，因为这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来保障中国领土完整和预防中国人民遭受亡国灭种的惨祸的最好方法，而且这也是从广大的人民的民主要求产生出来的最适当的统一战线的口号。”有人说：共产党提出统一的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口号，是擅改中华民国的国号，这当然是一种无稽之谈。

中华民国这个国号本身并没有什么坏处，问题并不在于国号，而是在于中华民国的实质。不仅照字义说，而且照创造中华民国的诸先烈和全中国同胞的愿望说，中华民国应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主共和国家。但是，可惜得很，二十几年来，中华民国仍未能名副其实。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党才提出建立统一的中华民主共和国这个口号，以说明我们所希望的真正中华民国的性质。至于讲到统一的中华民主共和国与三民主义国家问题，我们已经再三说过，我们所希望的是民族独立、民权自由和民生幸福的新中国，换句话说，也即是中山先生所希望所奋斗一生而未能实现的三民主义的中国。其次说到所谓现阶段的革命战略与策略问题——在中国革命发展的现在这个历史阶段上，我们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同时，并公开说明在这个阶段上放弃使中国苏维埃化的口号，愿意为建立统一的中华民主共和国而奋斗。因此，在我们同志中间引起一种理论上的争论：有的说这是一种策略的改变，有的说这是一种战略的改变。到底我们应当怎样正确了解这个问题呢？首先我们必须了解什么是革命的战略和策略以及战略和策略的相互关系怎样。什么是革命的战略呢？“战略就是根据当时的革命阶段来决定无产阶级底主要打击方向，规定革命力量（主要的及次要的后备军）底相当布置计划，在这个阶段底整个过程中为实现这个计划而斗争。”什么是革命的策略呢？“策略就是无产阶级在比较短促的时期内，在运动底来潮或退潮时期，在革命的高涨或低落时期内行动路线底决定，就是以新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来代替旧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等等的方法，来为实现这条路线而进行的斗争。”战略与策略的相互关系怎样呢？“策略是战略的一部分，是服从于战略和服务于战略的。”（以上所引均见一九三五年莫斯科外国工人出版社印行的斯大林著《列宁主义问题》中文版第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页）在中国革

命的前一个时期为苏维埃中国而奋斗的阶段上，革命要推翻的目标是一切帝国主义的在华统治和本国地主资产阶级政权。革命的基本力量是无产阶级，最亲近的后备军是农民和城市贫民。革命的直接目的是要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政权。在现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为民主共和国而斗争的阶段上，革命要推翻的目标是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傀儡政权。参加这个民族革命的动力是：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它一切抗日的力量。革命的直接目的是要建立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切阶层和党派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在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共产党在现在革命阶段上实行了一个战略的改变，即是大的革命力量布置计划的基本改变，而不只是个别的部分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的改变。当然，既然战略有了改变，策略更是随着战略改变而为战略服务了。

（四）党的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具体准备工作问题

去年十二月间，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在最近期内召集党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此次政治局会议讨论了进一步具体准备这一大会的工作问题。此次政治局会议认为，前次政治局决议所指出的，在最近期间内召集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全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工作，对于党的本身工作，都有最严重的意义，是非常正确的。全党同志现在应该努力进行七次大会的具体准备工作。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央本身应该立刻进行下列具体准备工作：A. 发布为召集七大事告全党同志书；B. 发表为召集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告全国同胞书；C. 给地方党部怎样在政治上和组织上进行七大准备工作的指示；D. 成立大会四个议事日程报告的准备委员会；E. 责成

政治局及中央同志起草大会第一、第二两个议程的政治提纲，以及写关于第三、第四两个议程的论文和其它专门问题的论文，不仅作为地方党部和全党同志讨论和研究大会问题的材料，而且作为一切对中共七次大会愿意发表意见和提出建议的人士们的参考。中央政治局要求和责成所有地方党部领导全体同志立即积极进行关于七大议程各问题的广泛热烈的讨论。在这种讨论中，任何一个同志都有权利明确详尽地发表他对于中国革命全部问题——特别是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问题的意见；在这种讨论中，来教育全党同志学习过去革命的经验教训和研究现在如何战胜日寇以便建立独立自由幸福新中国的基本问题。使这种讨论，不仅成为搜集全党同志对大会意见的有效办法，而且成为用严格自我批评方法检讨我们过去和现在工作的各种错误和缺点，以及找出改正和补救这些错误和缺点的有力工具；使这种讨论，不仅成为准备大会的最重要的基本工作，而且成为在政治上、组织上教育党、巩固党和扩大党的重要武器；使这种讨论的结果，不仅成为共产党本身一个大的政治上和组织上的进步，而且成为对全国同胞的抗日救国团体大事业的新的有力贡献。

（三月十一日完稿）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刊印。

注 释

（1）指蒋介石。

中共中央关于大量发展 党员的决议

(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五日)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与民族革命的新高潮，由于党的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领导与党的影响的威信的提高，大批的革命分子要求入党，这给了我们发展党以极端有利的条件。

为了担负起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神圣的任务，强大的党的组织是必要的。但应该指出，目前党的组织力量，还远落在党的政治影响之后，甚至许多重要的地区，尚无党的组织，或非常狭小。因此大量的十百倍的发展党员，成为党目前迫切与严重的任务。

为此，中央决定：

(一) 打破党内在发展党员中关门主义的倾向，反对把党的注意力局限在恢复与审查旧关系和旧线索的狭窄圈子内。

(二) 打破在统一战线中忽视党的发展，以为党的扩大无足轻重，甚至于取消党的发展的严重倾向。要宣传有了强大的党才能有强大的统一战线的真理。

(三) 大胆向着积极的工人，雇农，城市中与乡村中革命的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坚决勇敢的下级官兵开门，把发展党的注意力放在吸收抗战中新的积极分子与扩大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之上。

(四) 特别注意在战区在前线上大量的吸收新党员，建立强大的党的组织。在后方无党的组织的地区，当地党应有计划的与迅速的重新建立与发展党的组织。

(五) 大量的发展党员，不是采用不经审查的拉伕式的办法，新党员的入党，必须经过支部一定党员的介绍与一定党部的审查。

(六) 为适合于大量发展党员的需要，新党员候补期暂时重新规定：工人雇农不要候补期，贫农、小手工工人一个月，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小职员、中农、下级军官三个月，但在特殊情形之下得伸缩之。

(七) 严防汉奸、托派分子、阴谋家、投机家混入党内，但不能因此妨害党的大量发展。

(八) 在日寇占领的中心城市与重要的工商业区域及一切党的活动需要极端秘密的地方则吸收新党员的数量以不妨碍建立精干的极端秘密的党的组织为原则。

(九) 对新党员应注意给他们以初步的马列主义与党的建设的教育，使他们了解共产主义与其他党派理论思想的基本区别。

(十) 把发展党员成为每一个党员及各级党部的经常的重要工作之一，进行经常的检查与推动。

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五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征收党费的通知

(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五日)

经常交纳党费及物质上帮助党是布尔什维克党员应绝对遵守的义务，也是构成布尔什维克党员资格的条件之一。但各地组织或同志往往有不注意征收党费或不交党费的不良现象。为纠正这一现象，特通知如下决定：

1. 党员应交党费按照下列的比例：

(一) 每个月固定收入在一五元以下者交百分之一

每个月固定收入在一六元——三〇元者交百分之二

每个月固定收入在三一元——五〇元者交百分之三

每个月固定收入在五一元——七〇元者交百分之四

每个月固定收入在七一元——一〇〇元者交百分之五

收入超过一〇〇元以上的，一〇〇元以内数目按照上列比例收入党费，一〇〇元以上的数目按照下列比例收费（如每月收入一五〇元，则收一〇〇元之百分之五及五〇元之百分之一〇，即一〇元；如每月收入三〇〇元，则收一〇〇元之百分之五与二〇〇元之百分之十五，即三十五元）。

一〇〇元交百分之一〇

二〇〇元交百分之一五

三〇〇元交百分之二〇

四〇〇元交百分之二五

其每月收入超过五〇〇元者，则除五〇〇元照上述比例收党费外（即一〇五元），五〇〇元以上数目应全部交出（例：五五〇元则除交一〇五元外所余五〇元亦应交出即共纳一五五元）。

（二）除固定收入尚有临时收入或额外收入者：

五〇元以下交百分之五

五〇一元——一〇〇元交百分之一〇

一〇〇一元——二〇〇元交百分之一五

二〇〇一元——三〇〇元交百分之二〇

三〇〇一元——五〇〇元交百分之二五

临时收入超过五〇〇元以上者除按上述比例交纳党费外超过数亦全部交出。

2. 学生党员应交的党费：初中学生每月至少五分，高中以上至少二角。

3. 每月没有固定收入者，如农民、手工业者，其应交党费数目得由地方党部酌量规定。

4. 失业者免收党费。

5. 有收入而因特别困难与变故（疾病其他灾祸）致无力交党费者，经地方党部批准得减少或免交。

6. 除规定应交的党费外，得征收特别捐，但以自愿为原则。

7. 无故不交党费连续至三次以上者，应负组织处分，直至开除党籍。

8. 党部应负责将每月党费收齐交地方党部取得收据，并向上级机关报告。

9. 地方党应保证这一决定，通知每个支部和党员，并进行关于党员应交党费的解释与教育工作。

10. 原为红军出身，其生活已规定有津贴费者，如有外间

收入，除按规定收党费外并应征收特别捐。

一九三八、三、一五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刊印。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目前时局 与党的任务给刘晓等的指示

（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一日）

刘晓转省委：

（甲）目前形势总的方面说来是在走向好转，但各方面进步的速度仍然远赶不上抗战的需要。

（乙）军事方面的某些进步，使津浦线方面日军直到今天尚未达到打通的目的。山西敌军已到黄河北岸，日寇正在调动兵力来达到他占领榆林、绥德、西安、武汉的目的，榆林、绥德、西安与武汉失守的可能，是存在着的。敌人的总攻击方面是在武汉。夺取西安、武汉的大战即将开始。

（丙）如西安、武汉失守，继续抗战的困难必将更多，而中国内部必将发生新的动摇，这动摇或许将更甚于南京失守之后。然而由于中国只有持久战才有出路，故克服动摇、坚持抗战方针仍将取得胜利。但需要我党与全国人民的极大努力。

（丁）国共两党的关系有些进步，但国民党仍用一切方法限制我党的发展，国民党内现正酝酿着改革党务的倾向，临时大会或将使这种倾向表面化，我们将向它们提议在共同纲领下，组织各党仍保持自己独立性的民族革命联盟之类的政党以实现更进一步的统一团结战胜日寇。

（戊）在敌人后方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极大可能，已被冀察晋边区的发展所证实，这种区域的意义，由于敌人占领区域的

扩大而扩大起来。

（己）在这种情状之下，党的任务：

（一）还是继续过去巩固与扩大统一战线坚持抗战的总方针。

（二）但应更加努力在统一战线中大量扩大党员，建立党的组织，扩大党的武装力量与民众运动，这首先是在加强敌后方战区与邻近战区的工作，这些地方党有顺利发展的优良条件。

（三）在敌人占领的中心城市中，应以长期积蓄力量、保存力量、隐藏力量，准备将来的决战为主。在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在重要企业中建立精干的极端秘密的党的组织，切不要轻举妄动暴露力量，受敌人的摧残与打击。同其他党派的合作，决不应该把我党的组织与他们混淆起来，使党受他们的恶劣影响，而遭受不必要的牺牲。

（四）红五月在敌人占领的大城市及重要的工商业区域中，不必有什么特殊举动，应埋头苦干，而不要虚张声势。

（五）有计划的从城市中征调得力干部，特别是工人干部到农村中去担任领导游击战争等工作。

中央书记处

三月二十一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刊印。

华北战区工作的经验*

(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一日)

刘 少 奇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华北

我现在要说的是卢沟桥事变以来，在华北统一战线的经验与教训。

卢沟桥事变时，华北是最复杂，矛盾最多的地方。有各种军队与派别，各种思想、行动是不同的，指挥是不统一的，抗日的也有（多数是抗日的），动摇妥协的也有，此外还有伪军、伪组织的建立。这个地方是中国政府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地方，也是我们抗战力量比较小、敌人力量比较大的地方。在这种实际的环境之下，更需要用巧妙的方法团结各派别以及各军队一致抗日。那时，我们是采用统一战线的策略，减少各党派的磨擦，加强中央政府的统治，反对一切动摇妥协的分子。这一活动开始时，各派别对统一战线的态度不一致，有人赞成合作抗日，有的不赞成；有的反对，有的赞成合作又来一个“但是”。尤其是与共产党合作的态度更不一样，因此进行统一战线的办法也不一样，而是采用各种各样的办法去进行推动，譬如：

* 这是刘少奇在抗日军政大学的讲演，原载抗大政治部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日编印的《名人讲演记录》。

（一）有些人一方面主张抗日，但始终反对共产党，反对进步的办法（如开放民众运动，改革政治机构，开展游击战争等等），也不赞成统一战线。

对这种人我们应该怎样办？当然我们不能反对他们，我们还是采取坚持合作的态度，同时可以推动他们的下层，结果许多人表示愿意部分的合作，而那些顽固的分子则陷于孤立的地位，失去了威信。

因为我们诚恳的态度与坚持合作的态度，再加上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加紧，许多人后来也与我们合作了。

（二）有些人赞成统一战线，但不敢公开的合作，而要秘密的合作。

对这种人当然我们不应坚持公开合作的主张，我们可以与他秘密的合作，然后渐渐的转为公开的合作。

（三）有些人赞成与八路军合作，不赞成与共产党合作。

对这种人当然我们可用八路军的名义与他们合作。

（四）有些人是要下层合作，上层不合作。这时我们赞成他的意见，进行下层合作。

（五）有些人主张是进步的，甚至于比共产党的主张更进步（如改造军队，组织民众，游击战争，肃清汉奸等等），但他们要独立自办，不愿和我们合作。

对这些人我们是赞成他去办，帮助他去办，向他们建议，渐渐地他们看到共产党的办法不错，就提出“只要共产党的办法，不要共产党的人”的主张，但他们又要用秘密的，这些办法又要用他们的名义发表。无论怎样，只要他们肯采用我们的办法，对于抗日是有利的。

（六）有些人表示要与共产党合作去反对蒋⁽¹⁾委员长，反对阎总司令的。还有一些派别表示愿与共产党合作去反对其他派别。

对这些人，我们的态度是拒绝，我们好好向他们解释：合作是好的，但不能反对蒋委员长、阎总司令的。在这民族危急关头，不能自己反对自己，应该联合一致对外抗战。如果他们明白了这个道理而愿意与我们合作更好，如果他们不愿意就作罢论。

但有的人却因对我们不满，造谣破坏共产党。在山西曾有人假共产党的名义，发宣言攻击阎总司令，并将这种反动宣言寄给阎总司令，企图分裂统一战线，幸而阎总司令深信我们共产党的态度与主张，知道这种宣言不是共产党发的。像这种人是托匪、汉奸、敌探，是全民族的公敌，我们应该坚决反对，要求拘捕处置。

从这里我们可得出一个结论：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采用单纯的一种办法是不行的，而是要采用各种各样的活泼的办法。而且最主要的，还是要有一定的方针、一定的原则，就是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打日本，抵抗日本的侵略。不抗日是没有统一战线可谈的！

在进行统一战线中，我们也得着这样的经验与教训：虽然一定的纲领、一定的形式是必要的，但也不是呆板的，我们还可以灵活的采用各种各样的办法。

在起初，我们可以从一个具体问题、具体行动的合作。譬如我们可以与某一个游击队共同打一仗，在合作中若打了胜仗，可以把胜利品送给他们，使他们感觉到与八路军合作的好处，接着二次三次的合作，他们自然会提出长期合作的问题。

在合作中，批评工作是重要的，批评要诚恳，不要损害他们的威信。

有不少的同志不会灵活的运用，只是要求全部纲领的合作，要求公开的合作，造成了磨擦的增加，甚至于脱离原则的

统一战线也有发生，这是很错误的。

同志们！还要有工作的独立性，把自己认为必要做和可能做的工作积极去进行，以实际工作成绩来给群众看。

例如在山西，起初阎总司令是害怕共产党的。在太原时，我们提议办一个大学，训练青年干部，他不接受；后来我们办了一个训练班，许多青年都来了，他就马上在临汾办了一个“民族大学”。又如废除苛捐杂税的问题，我们曾向阎总司令建议，他不同意；后来我们进行起来获得广大人民的拥护，而阎总司令也就颁布了废除苛捐杂税的法令。所以统一战线不仅是口头上讲，而且要实际地先做。

由于日寇进攻的加紧，由于共产党的努力，由于华北的军事领袖的坚决抗战，华北统一战线一天天地进步了，在华北已建立了许多的军事根据地。

现在我们的朱总司令、彭副司令⁽²⁾，不仅指挥八路军，许多军队（如中央军、四川军、东北军、民众武装部队等）都在朱、彭二司令指挥之下作战。在冀察晋边区组织了边区政府（冀察晋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我们的聂同志就是政府委员之一，代表共产党。在山西许多地方的动员委员会，也由空洞的机关变为有生气的团体，政府里面有许多贪污腐化的分子，也开始肃清出去，补充新的力量，颁布了许多法令（如减租减税、废除苛捐杂税、优待抗日军人家属、组织民众等等）。军队方面也有进步，学习打运动战的方法，提高纪律，建立政治部，颁布了政治教育大纲，开始了军队中的政治工作，新军队也建立了一部分，“山西青年抗日决死队”成立了。现在游击部队有十万人，广泛地组织游击武装，群众组织普遍建立了，农民救国会、妇女协会、工会各地都有，人民生活也改善了……。这些都是证明统一战线的进步，这些进步使华北成为坚持抗战中的重要战略支点之一。

为使统一战线更加开展，为保证抗日战争的胜利，我们认为成立统一的政治领导机关、军事领导机关是非常必要的。

共产党在山西坚持统一战线的方向，我们抗大的毕业生在统一战线方面也有很大的功劳，但是也有弱点。

第一，八路军部分的干部到外边去工作，尚有贪污腐化骄傲的现象发生。这是要不得的。希望在校同学们特别注意这一点，要继八路军的精神艰苦奋斗，同时更有和气的、虚心学习的态度。

第二，在工作中缺少实际的经验、缺少办法。这一点希望同学们要多多学习具体的工作方法，不要仅仅是理论，仅仅是“矛盾统一”这一套。

抗日根据地的建立

（一）抗日根据地建立的可能性及其前途。

要坚持华北及全国的抗战，必须在日寇后方建立抗日的根据地。因为在华北及全国的许多地方虽然给日寇占领了，我们并不要放弃这些地方，而是要与日寇作持久战，去收复回来的。目前我们要发动广泛的游击战争，但游击战要能长期地坚持下去，必须有游击战的根据地，因此就有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必要。

在日寇后方来建立这种抗日根据地是不是可能呢？我们说是可能的，而且这种可能性已经被冀察晋边区所证明了。我们八路军已在那边建立了坚强的抗日根据地。这种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必须有以下的条件：

第一，政治条件。要有坚持抗战的政府，能组织民众，武装民众，领导民众抗日。

第二，军事条件。要有足以自卫的武装力量，能保证这个

区域不被日寇毁灭，能与日寇作战。

第三，群众条件。要组织、训练与武装广大的群众。这些群众能与军队及政府合作，打成一片，配合作战。

第四，地形条件。地形好，便于游击队的发展，不便利日寇作战，交通不便、多山的地形。

第五，全国的坚持抗战。这一条是最主要的，有了全国的坚持抗战，我们在敌人的后方才不会孤立，使日寇不能集中优势军力来消灭游击队，使其后方更加空虚，而便利我们的发展。

在这些条件之下，抗日根据地便有可能建立，不仅可能建立，而且有胜利前途。我们能与日寇坚持几年，最后战胜日寇收复失地。虽然在长期抗战中，我们可以想到日寇是可能调动军队向我们的根据地进攻的。在今天以前日寇曾经调兵进攻冀察晋边区，以后假如徐州、潼关、郑州被日寇占领，日寇也可能暂时停止南下，集中兵力进攻我们的抗日根据地。这样一来，根据地在困难的条件下与日寇作战，地域可能缩小，有些县城可能被日寇占领，但是我们不会失败，我们还是有胜利的前途的。

为使同志们更加了解，我可以报告一些具体的材料：

在冀察晋边区，有八路军部队军区司令聂荣臻同志（一一五师副师长），有阎总司令直辖下的行政主任、县长及牺牲救国同盟会的组织。日寇占领太原与同蒲路后，这个根据地成为日寇的后方，日寇没有法子占领这个区域。相反的，那边的民众武装起来了，并且建立了抗日政府，名称是“冀察晋边区临时委员会”。一九三八年一月初开代表大会，到会有武装部队的代表，各党各派各民众团体、民众武装的代表、政府代表，共有一百多人，通过了政治、财政、经济、教育、军事、妇女、民众运动等决议案，选出九人为政府委员，选举后已向阎

总司令报告，得到他的同情，并呈报中央政府行政院及军委会，得到中央政府的承认，发出宣言、通电。这个边区包括三十九个县，一千二百万人口，不仅平汉线以西，而且平汉线以东保定等地都派了代表参加。

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它首先做了全国的模范，告诉了全国建立抗日根据地方法，证明了在日寇后方建立抗日根据地有极大的可能，证明了不仅冀察晋建立边区政府，其他被日寇占领的区域（江、浙、鲁、晋、黄河以北）都应该而且可能建立这种边区政府。这种边区政府已得到中央政府的批准，它的宣言、决议都有全国的意义。

有些同志提出一个这样的问题：在平原是否可能建立抗日根据地？即是说地形的条件不好是否可能建立抗日根据地？

我们说：虽然地形条件便利敌人不便利我们，但有其他条件也能坚持游击战，也能建立根据地。在华北我们看到，日寇并没有兵力把冀鲁的大平原都占领。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日兵并不多，不够分配，全中国的坚持抗战使日兵大都到前线去，后方更加空虚，所以在平原坚持几年的游击战争与建立不大稳固的抗日根据地还是可能的。

日寇想压服华北的游击战是不可能的，日寇想安定华北也是不可能的，只要我们在那边的工作做好，有好的军事家、游击战家的领导，有好的群众组织与武装，我们是可能长期坚持游击战争的。所以，在今天不管山地也好，平原也好，最重要的任务就是：

最广泛地发动华北民众走上抗日战场，拿起武装和日寇拼，并建立坚固的抗日根据地与日寇长期战斗！

（二）怎样去建立抗日根据地？

1. 建立统一的抗日政府——要建立与冀察晋那样的政府。这种政府的特点是：（1）中华民国的地方政府，直接受中央的

管辖，与中央政府建立密切关系，执行中央的法令。（2）与汉奸傀儡政府绝对对立的抗日政府。（3）人民的政府，民主的政府，能组织与武装民众，改善人民的生活，得到人民的拥护。政府的负责人是抗日的领袖。（4）国民党的政府，统一战线的政府，不是另外组织人民政府与国民党政府对立，而是使国民党政府真正成为人民政府，能团结广大的各阶层的人民在政府领导之下和日寇斗争。

要建立这种统一的抗日人民的国民党的统一战线的政府，首先必须使这个地方的混乱的状态停止，恢复抗日的革命的秩序，迅速地建立我们的政府，愈快愈好。如果县长跑了，抗日军队可以委派一个县长；如果县长没有跑，就得考察他是抗日的或是汉奸，给以适当的处置。但这仅是临时的，进一步我们召集当地政府机关代表、民众团体、武装部队及各党的各派的代表开联席会议，选举县政府，把许多县联合起来组织边区政府，规定一切政策，呈报附近的省政府与中央政府，成为合法的政府。政府的组织法一般地要按照中央、政府所颁布的组织法去执行。但在特殊环境里面，组织方法的部分的改变是必要的。例如县政府的组织，县长以下除了原有的行政、财政、教育、公安四科之外，还可以增加管理人民自卫军，管理粮食等科；区公所及区长以下的协理员人数可以增加并具体分工（行政、军事、财政、粮食等等）；乡政府的组织是最重要的，它是直接与民众发生关系的。在我们陕北这边的组织，乡长以下设立各种委员会，如教育、文化、粮食、妇女等等，都是不脱离生产的。此外，为增加政府的力量及与群众保持密切的关系，保甲制度也还可以采用。建立民意机关，也是必要的，最好的方式是议会（现在中央政府还没有准备组织议会，但我们用“参议会”的名称，把人民的代表组织起来，经常开会，讨论政治问题）。在山西，每个地方都有“动员委员会”的组织，

包括政府、军队、工会、农会、牺牲救国同盟的代表，我们可加以扩大、增加代表的人数与单位，这样便成为代表民意的机关了。

还有一点要特别注意的，就是在选举政府负责人的时候，要肃清一切贪污腐化的分子、动摇官僚主义的分子，而选择真正的、抗日的、勇敢的、有能力的、在群众中有信仰的分子，使这个政府更加刷新，更加加强起来。

2. 建立统一的军事指挥机关，统一的武装部队，——要在一个游击区（即军区）设立一个军区司令，使一切部队的行动统一起来。但是在这种区域的部队是非常复杂的，例如在山西，有八路军，八路军游击队，中央军的游击队，阎总司令的游击队，其他的游击队，抗日发财的土匪，红枪会，黑枪会等。因为是复杂的，各有不同的办法、不同的指挥。所以，我们应该采用很好的方法去统一起来。我们的方法应该是民主的自愿的联合，而不是强迫的吞并，我们反对那种强迫的统一与吞并，而赞成自愿的由小合为大游击队，合为正规军，共同打日本。

对付土匪我们也要采用不同的态度：（1）在我们根据地里或根据地的后方捣乱的——我们不应放任，而应加以消灭；（2）在日寇后方活动的——我们应与他们联合。

各部队不但要统一，而且要建立支干的游击队，能打仗，能执行政府的命令。各部队应取得合法的司令官，队长应取得中央政府及军委的批准。现在，在华北除正规军外，有十万的游击队，大部分是很好的，但比较成问题的是缺少枪支，我们要完全得到枪支全靠中央政府供给是困难的。我们应该收人民的枪及缴敌人的枪来解决这个问题，要用很好的方法去收人民的枪支。在山东有一个模范的游击队，很快地收到了一千支枪，他们的方法可以参考，他们用鼓动的方法，鼓动参加游击队的人自己带枪来，并且用借枪的办法，借了老百姓的枪，发

给借枪证，这些方法希望同志们好好地研究。

3. 广泛地武装人民——记得有人曾经问过一个抗大的同学，请他告诉武装人民的办法，我们这位同学不懂得这种办法，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多多研究。我们要武装人民最好的方式应该是组织“抗日人民自卫军”，山西动员委员会曾经颁布了一个法令，指出人民自卫军的任务是：协助军队与游击队作战，传达消息，放哨，救护伤兵，铲除汉奸，破坏敌人交通，坚壁清野。组织的方法：十八岁以上五十岁以下的人民都有加入自卫军的任务，以村为单位，分小队（班），中队（排），大队（连），人民都不脱离生产，以枪、刀、锤、扁担作武器，并且备有担架，各种破坏道路的工具。这种自卫军的组织在华北已经很广泛的建立，每一县都有四五万人，县政府常常召集各乡各村的干部分子加以一两个月的训练，然后派回去工作。现在自卫军在华北抗战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国民政府曾经在许多地方组织了“壮丁队”，但有许多缺点，如壮丁队由人民送饭、捐税，打骂等。所以，在有壮丁队组织的地方，我们可以把壮丁队变为人民自卫军的组织，纠正一切为老百姓所不喜欢的缺点，把组织加强起来。人民自卫军是动员人民当兵的必经的道路，人民自卫军组织好了，对于军队的补充是很容易的。

4. 肃清汉奸、敌探、托匪——我们应该经过政府，经过军政机关，来惩治这些汉奸、敌探与托匪，不应该由人民随便个别的抓来，加以枪毙，应该建立维持秩序的部队，原有的民团、警察可以改组或由人民自卫军里面选出来成立保安队。

5. 广泛地开放民众运动，组织民众——首先必须使民众有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等的自由，政府要保持民众团体组织上的独立性，组织的方法可按照职业如农民组织农人救国会，工人组织工会，商人组织商人救国会。此外还要有青年救

国会，妇女救国会的组织。这些民众团体应与政府合作，动员其会员帮助政府，参加政府一切工作，参加军队作战。此外，还要相当地改善人民的生活，如减租减税、增加工资，这些都是必要的，要为保障其会员的切身的利益而努力工作。

照这样做去，抗日的根据地也就可以建立起来了！

现在还要说一说这个根据地的抗日的政府的政策！

1. 要有自己的财政方针——我们的口号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首先应该废除一切苛捐杂税。至于土地税、赋税、商业通过税还可以抽，但是抽税的方法要改一改，要做到有钱的才抽税，没有钱的免税。此外还可以举行募捐，自愿捐，要绝对禁止用强迫的派捐，如人民不愿意交出财物就加以汉奸罪名的那种现象发生。粮食的困难，也可以用借粮的办法打条子给人民，以后偿还；财政上要尽量节省一切不必要的浪费，政府人员的薪水要一律平等，游击队不发饷，允许工商业自由，提高工业与农业的生产，创办合作社，钞票用法币，但在必要时也可以用伪币，抵制日货要实行，但有些日货对于我们是需要的时候，也可以采用；组织“难民财产清理委员会”，处理一切已经逃跑了的地主、资本家、商人的财产，在他们未回来以前，应该利用这些土地、工厂来提高生产，等他们回来后，才交还给他们。

2. 教育政策——创办干部训练班，采用抗大、陕公一样的方式。此外还可以创办夜学，识字班，小学。教育的内容要适应抗战的需要，如抗日救国理论，打仗的方法，组织民众等等。

3. 对外政策——我们反对的是日本帝国主义，而不是日本的人民，所以，我们要优待俘虏的日兵，要保护英、美、法各国的人民，承认少数民族（回民、蒙民等）有民族自决权，与他们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4. 对内政策——要肃清汉奸，巩固后方，禁止种鸦片及吸鸦片烟，实行男女平等，颁布“婚姻法”等等。

总之我们一切政策的基本方针是统一战线，为巩固与扩大统一战线，为团结与发动大多数的人民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我们要使抗日根据地成为全中国的统一战线的模范区。为建立抗日根据地而斗争，同时就是为建立统一战线的模范区而斗争！

在敌人的伪政府统治下的区域与 游击区里怎样进行我们的工作？

在敌人的政权已经建立起来的地方（如北平、天津、石家庄、太原、冀东等），与那些没有我们的政府也没有敌人建立的汉奸政府的游击区，我们的工作方针是要破坏、瓦解与消灭汉奸的政府与军队，使得汉奸的政权建立不起来。

（一）对付汉奸政府的方法：

如果在一个地方已经有了汉奸的政府，我们游击队必须将它打倒，把汉奸捉去枪毙，建立我们中国的抗日的政府。我们在华北要时时刻刻进行宣传工作，反对汉奸政府及反对敌人组织起来的“维持会”（“维持会”是中国军队退出后，当地的豪绅组织起来的政权，是帮助日本帝国主义的，是汉奸政权的雏形），使群众了解“维持会”是汉奸的组织，应该号召人民不要组织“维持会”。拒绝日寇的命令及“维持会”的命令，对“维持会”的主要负责人要加以惩罚，最坏的应该捉来枪毙、杀头，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还应该采用比较巧妙的方法，使得“维持会”动摇与瓦解。根据我们的经验，在“维持会”里不见得个个都是汉奸。有的人不是自愿的，而是被日寇强迫的，一方面不得不与日寇敷衍，一方面仍旧不忘记他是

中国人。在华北常常有县长或区长跑到八路军的地方，向我们报告，日本强迫他去开“维持会”的会议，要求八路军指示他的办法。有一个县长曾经这样说：你们在这边的时候可以保护我们，但是你们走了，我如果是反对日本一定被他杀死，我不能不和日本敷衍，现在请你们指示我的办法。在这种情形之下，如果我们反对他去，认为他去便是汉奸，而要枪毙他，这样好不好呢？我说这是不大好的，我们可允许他去，规定他开会后马上回来把开会的情形及敌人的欺骗的手段、敌军的数量等等，向我们做详细的报告，使得我们更加明白敌人的情形。

还有，在北平附近有一个人要当伪县长，他四处找八路军与共产党，声明自己是不做汉奸的，而是为着钱，并说：“只要你们允许我做县长，你们还可以随便组织民众打游击战。”可见汉奸的队伍里的分子也有动摇的。又如冀东殷汝耕伪组织□□建立了许多年，但伪组织里坚决执行日寇命令、最残酷屠杀中国人的最可恶的汉奸还是少数，大多数的办事人是采取敷衍的态度的，所以我们提出的中国人保护中国人的口号发生相当的效果。我们曾经做过这样的事，把一个“维持会”的人抓来，问他是愿意当汉奸或是与日本敷衍的，他说明他自己是不愿做汉奸，不反对中国人，而是与日寇敷衍的，我们相信他这一点，便给他一个委任状，派他到日本那边去刺探消息，要他签字。这时他不得不签字，以表白他自己的态度。我们就放他去，于是他就不敢积极去反对游击队了。

在东北赵尚志同志曾经派人请“维持会”的负责人来谈话，他们都表示自己是中国人。我们就把他的父亲、祖父三代的名字都登记起来，与他结拜为兄弟，到了我们游击队没有粮食时，可以要他帮助，同时他不敢积极帮助日本鬼子。

由这些经验，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维持会”的人

并不是个个都是死心塌地的汉奸，有一部分还可以动摇的，所以我们对于那些坚决做日寇的走狗，反对中国、破坏抗战、刺探消息的这种汉奸，要立即毫无迟疑的枪毙，但对那些动摇的还有中国人良心的，我们可以原谅他，利用他。我们的策略是要使得汉奸减少，而不是要使得那些动摇分子都去依靠日本人，坚决做汉奸，所以我们不能采用一律枪毙的法子。

这里还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这种工作的进行要秘密，因为如果是公开进行，一来使日寇知道会杀掉他，二来使当地民众知道，会对我们发生误会。在华北能够和“维持会”谈话，只有八路军与共产党才有资格（因为民众相信八路军与共产党是坚决反对日本的），其他的友军便不可能。有一次国军孙殿英和“维持会”的人谈话，被民众看见，于是传说纷纷，说孙殿英要投降，靠不住，结果解释了很久才弄清楚。

所以，这种法子只有最坚决的，至死不动摇的取得群众信仰的部队才能采用的。他如一般的军队或刚成立不久的未取得广大群众信仰的游击队是不可采用的。

（二）对付汉奸军队的方法：

日本帝国主义采用其一贯的“以华制华”的手段来向我们进攻，它曾经在华北组织反共自治军，许多地方都组织不起来，往往队伍一组织，发枪发钱后就跑掉了，现在日本的办法是在日军中加入中国人当伙夫、运输或是在一班里插进几个中国人，对付这样的军队，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方针和办法呢？我们的方针是要瓦解汉奸军，争取一部分过来，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的办法是提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中国人要保护中国人”、“只打倒日军不打倒自治军”、“只打日军不打蒙古军”这种口号来进行宣传与鼓动，已经开始收了效果。此外我们尽量避免与伪军作战，不故意找伪军打（但如果伪军来打我们，当然我们要抵抗）。

在山西有这样的例子：有一次伪军穿上中国军服，假装中国军队，近迫我们八路军一一五师，我们的同志以为是友军来了，派人去联络，敌军开枪射击，打了半天，我们才知道是敌人，结果我们一个小勤务员被伪军俘去，他们问：“为什么你们不开枪打呢？”小勤务员回答：“我们中国人是不打中国人的。”结果他们得到很大的感动，就把小勤务员放回来了。由此可见得他们——伪军中的中国人也是动摇的，我们应该想法子争取他们反正，联合他们共同打日本。

我们应该选派真正坚决抗日的忠实的同志，打进“维持会”与“自治军”里面去活动，使得他们能够帮助我们的军队，瓦解他们的组织。有许多同志不高兴到“维持会”与伪军中去工作，而喜欢到延安到边区来工作，这当然是好的。但是，希望同志们要看到打进“维持会”与伪军里面工作的重要性。将来你们毕业以后，有的还是要到“维持会”与伪军里面工作。

我们要做到我们的游击队不仅能得到人民的帮助，而且能得到“维持会”与伪军的帮助。这样的游击队才能长期的坚持与日寇作战！

（三）对敌军的宣传工作：

对敌军的宣传工作在敌人后方特别来得重要。这一工作在华北我们还做得很不够。在敌人将要到的而且一定要到的地方，看不到我们一句宣传口号与标语。相反的，敌人是写了许许多多的欺骗民众的标语口号。如“大日本皇军是救中国的”，“抗日亡国”，“亲日兴国”等等。

还有，同志们不要以为日本帝国主义只是采用烧杀、强奸等野蛮的手段对付我们，其实日本帝国主义还采用了许许多多的欺骗的政策。如对中国人说：“中国人是很好的，我们的日本的祖先也是中国人，同种同宗。”又说：“日本也是信奉佛教

的。”到一个地方也召集群众大会，见到小孩子虚情假意地抱一抱，给糖吃，见到中国人请吸香烟，有时还分些粮食，叫老百姓回家等等，所以有些群众被欺骗。在冀北曾经有一个寨子不让我们的游击队进去，当地的豪绅地主这样说：“我们不反对日本，老老实实的做老百姓还可以过日子，反对日本就活不了。”有些地方被敌人大烧大杀，但汉奸们却说：“这是八路军与共产党到来才造成的。”同志们！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敌人的欺骗宣传是有相当的收效的。因此，我们必须加强我们的宣传工作，向群众进行详细的解释，揭破敌人的一切欺骗，暴露敌人的罪恶和兽行。我们还要写各种文字（日文、汉文、蒙文等）的标语与口号。扩大我们的宣传工作，最近已经开始有日军携枪来投降八路军的事情发生，这是由于我们优待俘虏与宣传工作的进行所收得的效果。

民 众 运 动

开展民众运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我们应该根据当地的环境来决定我们民众运动的方针。目前在华北有几种不同的环境，有我军的后方，有敌人后方。我们所建立的抗日根据地，有游击区，有敌人统治的地方，在各种不同的环境里面，群众的工作方式、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都不相同的。

现在，我要报告关于山西民众运动的经验。

同志们都知道山西阎锡山将军是抗日的，因为他抗日，所以需要民众的帮助，须要组织民众，但同时他又害怕群众组织太多，在这种“又要又怕”的矛盾心理之下，他组织一个“牺牲救国同盟”来发动群众抗日，而又利用这个团体来限制群众运动的发展，禁止别人来组织群众（当然对于这种主张我们只赞成发动群众这一方面，而且我们还尽量帮助他们，但对于限

制方面，我们便不赞成，我们向他们批评这个缺点)。结果，“牺牲救国同盟”组织了很久，还是一个空架子，真正的群众运动并没有发动起来。这是什么原因呢？这就是因为不了解组织群众的原则与方法。

第一，不了解什么叫做民众——我们说大多数的人就叫做民众，民众就是人，人的特点是能活动的，有思想的，所以要组织他们，应该是使他们能自动地起来组织，要使得群众觉悟到自己有组织起来的必要。假使没有这一点，你无论怎样也组织不起来；另一方面，当群众觉得有组织起来的必要而组织起来的时候，无论你怎样阻止甚至于你打他们、杀他们，他们还是要组织起来的。譬如中国共产党不管人家怎样打杀、枪毙，他还是要组织，而且还是要发展起来的。又譬如山西军到了某县，群众都跑得干干净净，军队电告省政府主席，大发脾气，省政府立即下令该县县长于二星期内把群众组织起来，否则杀头，结果不管是杀头或是给钱，群众同样是组织不起来的，所以群众自动的组织是民众运动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第二，不了解民众是有各种不同的要求的——在民众中有各种各样的人（工人、农民、商人、小手工业者、教员学生……等），也就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要求，要组织民众就要根据民众各种各样的要求，用各种各样的办法与形式去组织。比如民众有政治要求，我们就可以组织政党；民众有经济要求，就组织经济的团体如工会、农民协会等；民众有文化上的要求，就组织研究会、图书馆、唱歌队、体育会等等。但是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不了解这一点，而只是提出牺牲救国一个要求、一个方式去组织广大的群众，结果弄不出什么成绩。

这便是在山西开始进行民众运动的缺点。现在，我们在抗日根据地所做的以及我们认为应该做的便不是这样，而是采用

比较适当的方法：

第一，工会。

1. 会员——工会是工人群众的团体，凡是依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人（或是全部的，或是主要的）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籍贯，都可以加入工会。他的会员应包括产业工人（工厂、矿山等），被雇佣的手工业工人（被雇佣的集在一起的，如陕北做席工人等），雇农（长工、短工等），城市工人（店员、伙计等），小学教员，机关的下级职员，农村里有的佃农什么都没有，田地、马匹、工具、种子都是地主的，他只有劳力，收获的东西百分之八十交地主，这种人也可加入，因为他得到百分之二十粮食，也就是等于工钱。有的农民一方面种田，但主要的收入是依靠用骡子替人家驮东西或划船，这种农民也可以加入工会。佛庙里的工人也可加入工会。

但注意那些小手工业者（如木匠、裁缝等老板），则不能加入工会，因为他们出卖生产品，而不是工钱劳动者，是小资产阶级，他们可以组织合作社或手工业联合会。那些靠宣传宗教吃饭的人（如和尚、道士、牧师、算命先生等）及戏班子，也不可加入工会，因为他们并不从事于社会有益的劳动。

所以工会不但要吸收一切工钱劳动者来参加，而且还要保持它是工人的组织。

2. 组织——以产业为单位组织工会。一个地区组织一个总工会（如陕甘宁边区总工会），下面有县工会、区工会、村的工会支部。村支部是工会的基本组织，在村支部里按会员的职业分小组。一切的产业部门如兵工厂、煤油矿等，单独组织他们的工会，直接受总工会的领导。在城市里组织一个工会，按照会员的职业分为支部。

各级的工会都设一个领导机关（委员会），内分组织、宣传、文化教育、劳动保护、青工女工等部。

3. 要求——在经济上主要的是加薪减时，要求休假日、劳动保险、伤病死亡的抚恤金等，以及青工、女工的特殊要求，工会必须保护与争取这些要求；政治上的要求是抗日救国。

第二，农民协会（或农民救国会）。

1. 会员——凡是在乡村中一切从事农业劳动的人都可以加入农协，包括雇农、贫农、中农、富农（豪绅地主不可加入）。此外，乡下工人、小学校教员及学生，都必须加入农协。为什么工人、教员及学生都必须加入农协？因为在农民当中是没有干部的，而是要依靠别人领导，农民常常受到豪绅地主的指挥去做事，所以工人、教员、学生加入农协，目的是要做领导者。他们虽然是不大了解农民的生活，但总比豪绅地主强得多了，所以工人、教员、学生加入农协，农协的领导权便不会落在不坚决抗日的豪绅地主的手里，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2. 组织——有统一的组织系统（省、县、区、村），各级领导机关设立委员会，分组织、宣传、文化、教育、武装（自卫军）等部。

3. 一般的要求是减租、减税、公平派粮、水利、设立合作社等。

第三，青年组织（儿童附属在青年组织里面）。

可以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少年先锋队、学生会、青年救国会等。吸收所有的青年分子来参加，要有整个的从上到下的组织系统，及各级领导机关的建立。主要是文化教育及青工、青农、青年妇女的要求。

第四，妇女救国会的组织。应该吸收所有的妇女来参加，要有从下到上的组织系统及各级领导机关的建立。主要的要求是男女平等，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法律、社会地位都要

与男人一律平等。

第五，商人救国会。可把原有的商会加以改造，以抗日救国为目的。一样要有组织系统与领导机关的建立。

在一个村子里，有了上述五种组织的建立，大多数人民都加入组织，而且都能很好地做工作，这样我们就可说大多数的人民都组织起来了，再把这五个团体联合起来组织“抗敌后援会”。在山西则叫做“牺牲救国同盟”。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把这些民众组织起来干什么？他们的任务是什么？

我们说在目前抗日时期，一切群众团体的任务是：动员最大多数的群众来参加抗战，参加抗战中各方面的工作，如当兵、组织自卫军、游击队帮助军队打仗，帮助军队造饭、运输、放哨、警戒、救护伤兵、侦探、破坏道路等等。

但这样还不够，如果仅仅是动员民众参加抗战而不顾到民众的生活，那么这些群众团体同样要倒台。因此，改善人民生活同样是群众团体的任务，要能改善人民生活，才能动员最广大的人民参加抗战，这是一定的道理。

我们应该认识在抗战中必须改善人民的生活，但改善人民生活又必须适合于抗战，不要使群众的经济斗争妨害到抗战。即是说：抗日第一，改善人民生活第二。所以我们的原则是：要在抗日口号之下，要在不妨害统一战线的范围内来尽可能地改善人民生活。

这样是不是矛盾呢？是的。困难的地方就是在这里。我想我们可以采取这样的办法，尽可能的避免采用斗争的方式，而采用协商、调解、仲裁的方法去达到群众的改善生活的要求。这办法走得通或走不通呢？我们说是走得通的，我们曾经有这样的经验。

在山西有个地方农民曾向地主提出减租的要求（那时日寇

正在加紧进攻)。地主说：“现在日本快打来了，你们的田租及借款能交多少都行。”可见地主并不统统都是顽固的，而是有商量的可能。

又有一个县长接到阎总司令减租的命令，他就办一个酒席，请地主及农协的代表来，县长指示目前抗战的意义及农民的苦痛的生活须要改善，希望地主深明大义，自动签字减租，地主到此时也不能不自动承认减租，散会后县长立即下令褒奖，把地主的姓名公布全县。这样做法地主也很满意，农民的生活也改善了。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我们应该学习（自然也有地主死顽固的，无论怎样解释都不管，这时我们就有拿出斗争的武器的必要）。

此外，当蒋委员长下令严惩贪污官吏的时候，山西曾经发现了人民与政府的极大磨擦。因为山西的官吏没有一个不贪污的，此时农民在这些“上有蒋委员长的命令”、“下有农民协会”的有利条件之下，都纷纷召集群众大会，要抓贪污的村长或区长来算账、枪毙，而村长、区长也设法反攻，向县长禀告：“农协”是共产党或汉奸的组织，结果为了算账闹得一塌糊涂，抗日救国的大事也忘了。这是很不好的现象。我们主张不算旧账，但一切官吏今后不得贪污，如再贪污则严厉惩罚，这样才能把问题解决，而减少了政府与人民的磨擦。同时在政府方面还应设一个专门机关来调解与仲裁各种的纠纷，如在县政府里设工农科或工农所。

我们还须培养与训练大批的干部，要使得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商人各群众团体，都有他们自己的干部来领导。干部的能力越是加强，民众运动的开展，便越深入，便能动员更大的力量去参加神圣的抗战。

最后，为着要很迅速地组织民众与武装民众，在华北都是采用由上到下的方式去建立群众的组织，即是先召集几个积极

分子开一个筹备会，选出筹备委员（省的、县的或区的），进行筹备，训练与分配干部人才到各村去建立组织，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召集代表大会，正式成立组织。这种由上而下与由下而上的互相配合的方式，在目前抗战紧张的时期，是可以采用的。

照上述说的这些办法去做，我们就能把最大多数的群众组织起来，动员起来，热烈地参加抗战的各方面的工作。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指蒋介石。

〔2〕指朱德、彭德怀。

张闻天等关于冀晋豫目前的 中心任务给朱瑞等的电报

（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四日）

朱瑞同志并致朱彭，尚昆，刘徐邓^[1]，唐天际：

摆在冀晋豫全区面前的中心任务，是以最快的速度创造冀晋豫边区成为坚持抗战的巩固根据地。因此你处党与八路军的任务是：

（一）建立完全在党领导下的有战斗力的若干游击兵团（如荣臻同志的游击支队）及地方游击队。

（二）广泛组织不脱离生产的自卫军，并使他们担任侦察、警戒、放哨、坚壁清野等。

（三）争取改造友军，特别是准备永久留华北打游击的友军，成为坚强进步的抗日军。

（四）逐渐改造政权机关，使之成为广泛人民阶层的抗日民主政权，但同时是国民党政权。各级动员委员会吸收真正人民团体及武装部队代表参加，使之成为实际的各级政府委员会，逐渐洗刷机关中的腐败分子，尤其是汉奸动摇分子。

（五）逐渐求得军事政治的统一指挥与领导，采取必要过渡办法，以准备将来召集冀晋豫边区政府代表大会，成立边区临时政府。

（六）在统一战线方针下坚决执行动员武装群众及肃清汉奸的政策。

（七）设法召集全边区或若干县联合的群众团体的代表会议，以动员群众参战及建立真正有广大群众的团体。在抗日的大前提下，依照阎^{〔2〕}之法令解除人民一些痛苦，满足人民一些迫切要求。

（八）大大发展党，建立与健全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办一两个较大的学校训练政治军事群众团体及政府的干部，党办训练班。

（九）你准备留在冀晋豫边区负总责，如聂荣臻同志在冀察晋。

洛甫 毛泽东 胡服^{〔3〕}

二十四日

根据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集》
第二卷刊印。

注 释

〔1〕指朱德、彭德怀，杨尚昆，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

〔2〕指阎锡山。

〔3〕即刘少奇。

毛泽东、刘少奇关于组织 以八路军名义出现的游击兵团 给朱德等的电报

(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四日)

朱彭，朱瑞，刘徐邓，贺萧关，陈罗并各省委，子华，尚昆^①：

由于战争形势的发展，八路军主力或许在不久的将来有转移地区作战的必要。为了在八路军主力转移至其他地区后，我党仍能在统一战线中有力地坚持与领导华北抗战，必须立即组织以八路军名义出现的下列游击兵团：

一、在晋西北除宋时轮支队外，在偏关、河曲、保德、五寨及其以北地区组织一个支队，在雁门关以南崞县、忻县、宁武地区一个支队，在阳曲、交城、文水地区一个支队，在方山、临县、离石地区一个支队，统由贺萧关会同晋西北省委及子华负责。

二、在晋西南中阳、石楼、永和地区组织一个支队，在临汾、孝义、汾西、灵石、赵城、隰县、洪洞地区一个支队，在乡宁、吉县、大宁地区一个支队，统由陈罗、尚昆及省委负责。

三、在晋东南太谷、榆次、平定地区组织一个支队，元氏、赞皇、内丘以西地区一个支队，磁县、武安、涉县地区一个支队，晋城、陵川、修武地区一个支队，阳城、济源、垣曲

地区一个支队，沁源、安泽地区一个支队，翼城、沁水、绛县地区一个支队，统由刘徐邓、朱瑞及省委负责。

四、在平汉路以东组织若干支队，由刘徐邓转告陈宋^{〔2〕}及当地党部负责。

五、各师迅即开办游击队干部训练班，至少一百个学生，由部队及地方游击队中调集。

六、上述各支队至少各有一千左右，各以八路军有战斗经验之主力一二个连作基础，由地方游击队及新兵编成。

七、如上述各地区为友军驻地，八路军暂时不便派队前去时，即暂在其他地区编成，在将来情况允许与必要时，再到指定地区活动。

八、各支队之军事政治干部均须配备妥当，并于编成后以八路军游击支队名义活动，树立威信。

毛泽东 胡服

二十四日

根据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刊印。

注 释

〔1〕指彭德怀，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贺龙、萧克、关向应，陈光、罗荣桓，程子华，杨尚昆。

〔2〕指陈再道、宋任穷。

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临时 全国代表大会电

（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五日）

全体代表同志们！

中共中央谨代表本党全体同志，向担负着领导全国抗战神圣任务的孙总理所手创的伟大的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全体代表同志致敬！并向坚决领导全国抗战的蒋介石先生致敬！

九个月抗战，虽是我国广大地区受到了日寇兽军的蹂躏，然而我们已经给了敌人以相当打击，增加了敌军内部的困难。尤其值得我们指出的，即是新中国正在血战中生长起来。但我们给日寇的打击还很不够。日寇现正倾其全力继续向我国进攻，中国的西北部、中部与我们的首都武汉正在危急中。在全国人民面前，当前最中心的任务，就是如何加强全国团结，不屈不挠，坚持抗战到最后胜利。为达此目的，中共中央谨向贵党全国临时代表大会提供下列意见，尚希讨论采纳。

（一）用一切宣传鼓动方法号召全国人民以中华民族必胜的信心，克服一切困难，忍受一切牺牲，誓与日寇抗战到底，指出只有持久战，才能制日寇的死命。坚决反对一切投降妥协悲观失望的倾向，同汉奸亲日派分子做严厉的斗争。

（二）继续动员全国武力人力财力物力为保卫西北、保卫武汉而战。在前线，彻底执行阵地战、运动战、游击战三者适

当配合的新战略，以击破敌人前进部队，消耗敌人力量。在敌人后方坚决援助与发展广泛的人民的自卫战，以达到收复失地，创立许多抗日根据地与支点的目的。在我们后方，努力改善我们各方面的工作，以满足抗战的一切需要。这样来准备以后胜利的反攻。

（三）继续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首先即须发布以孙先生三民主义为基本原则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作为动员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明显旗帜。再在这一纲领下，遵照孙先生过去联共的精神建立一种各党派共同参加的某种形式的民族解放同盟。只有这样，才能使全国人民与全国各党派最坚固的团结起来，增强抗战力量到最高限度，任何其他取消一党一派或一切党派的勉强办法，都是不能达到这个目的的。

（四）继续扩大与巩固国民革命军。切实加强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建立有权力有威信的政治机关，吸收全国优秀的革命青年到军队中去，担任军事的与政治的工作，严紧军队纪律，进一步使军民打成一片，认真改善征兵制度，以达到大量扩军与组织新军的目的。加紧新兵的军事政治训练，有计划的改善军队的技术装备。

（五）继续改善政治机构。首先应该召集真能代表全国民意的全权的国民大会，通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制定各种实施纲领的具体法令。大量吸收全国人民中各党派中富有民族意识，积极勇敢，急公好义的有威信有能力的爱国志士参加政府。切实整顿地方政府，洗刷贪官污吏，开始实行区乡保甲的民选制度，对地方民团警察亦应即刻加以整顿。

（六）继续全国人民的动员。首先用最大力量普遍组织民众的自卫队、联庄队、游击队，对民众自动武装起来的各种

武装队伍，及全民众的原始武装组织，应给以各方面的援助与指导，提高他们的政治认识与军事技术。各种抗敌后援会、动员委员会等，应实际上成为有广大民众参加的民众团体。大量扶植与发展一切抗日救国与工人的、农民的、青年的、妇女的、各界的、职业的民众团体，在全国的与地方的范围内，把他们统一起来。颁布民族统一战线总方针下，言论、集会、结社、出版、信仰自由的民主法令，以建立抗战时期的革命秩序。

（七）为使政府与民众进一步结合起来，为更能顺利的动员民众参加抗战，必须采取具体的办法，实施优待抗日军人家属，优待伤病官兵，严惩贪污，豁免战区地赋等改善民生的法令，具体解决抚恤流亡，救济灾民难民与失学失业的青年等问题。订立累进的派款办法，减轻贫民负担，以达到有力出力、有钱出钱的最高原则。

（八）组织抗战的经济基础，建立国防工业，发展军需工业，改进农业。用一切方法提高工业农业的生产，首先是国防工业的生产。鼓励海外华侨及国内富裕资产者的投资，保护与奖励工商业，发展国家资本，提倡国货，改良土产，调剂粮食，推广合作运动，实行节约运动。

以上八项建议，是否有当，尚祈裁夺赐复。敬祝贵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成功！

中共中央委员会

三月二十五日

附：中共中央长江局关于对国民党临全大会建议 问题给中央书记处的电报

（一九三八年四月二日）

中央书记处：

我们根据政治局决议原则所起草的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政治建议书于二十四日已送去，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昨夜已闭幕，你们所写的东西既不能也来不及送国民党，望你们在任何地方不能发表你们所写的第二个建议书，否则对党内党外都会发生重大的不良政治影响。对此问题的详细情形，我们有信交可靠同志带给你们。

陈、周、博、凯^{〔1〕}

冬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刊印。

注 释

〔1〕指陈绍禹、周恩来、秦邦宪、何克全。

论游击战与运动战*

(一九三八年三月)

刘 伯 承

一 对于游击战与运动战的一般了解

一般说来，运动战和阵地战，都属于“正规的作战”，游击战就属于“非正规的作战”。这是在军事上就兵力的大小及其指挥的方式来说的。

所谓游击战，是使用小的队伍，少至几人，多至几百人的队伍，在敌军后方活动的。这些队伍的组成，无论是正规军派出的或者是由民众政治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或者是由这两种混合组成的，通常是在敌人的后方，特别是在广大民众拥护掩护之中，袭击或伏击敌军，破坏其交通与辎重。其动作方式是机敏灵动，出没无常，尤其小队伍在敌军后方活动紧张情况之下，要求游击队长机断专行，独立自主地决定行动。它没有战线与后方的组成，所以说它是“非正规的作战”。

所谓运动战，就它在军事上的精义说来，应该是叫“机动战”。一般是使用相当大的数量的正规军队来进行的。因为军队数量比较大，就必须有协调各部在单一意志之下行动的统一指挥。正规军队进行的机动战，就是指挥军队在战斗之前、战

* 本文原载一九三八年三月出版的《战术研究资料》，后转载于一九三九年四月十五日出版的《八路军军政杂志》第四期。

斗之中和战斗之后的移动，求得造成便于使用武器的地位，并且利用已得的战果，发展到完全消灭敌人。假使敌人在动作中造成不利于我的战斗条件时，那我们就引退到适当的地点，以求避免其突击，且就此抓到有利的条件。

运动战与阵地战，时常是互为变换的。如遭遇战，就是标本的运动战，但它一转固着一地时，就变成了阵地战。如阵地战的阵地一被突破时，又变为运动战了。无论运动战和阵地战，都是具有相当大的数量的正规军来进行的。因为它们的一般行动都须有严格的纪律，统一的指挥，所以说它是“正规的作战”。

总而言之，游击队因兵力少而突击力弱，不如正规军的兵力强大，特别是不如它能够严密组织各兵种的协同动作，在统一指挥之下执行艰巨的任务。所以游击队在军事上不能解决战略任务而是起一种辅助的作用。有个军事家说：“游击战是手工业，正规战是机器工业。”这就是从军队组织上来说明它们作战的威力，然并不能因此就轻视游击队在保卫祖国战争中的伟大作用。

二 敌人在作战中表现的特点

我们在抗战未开始之前，曾经把敌人在作战中的特点估计过和讨论过。现在我们在战地所证实的是：

（一）由于敌寇的暴行，加速扩大了民众团结救亡的运动——特别表现在战地民众痛恨日本强盗的奸虏烧杀，普遍开展游击战争，反对救亡运动的只是极少数的汉奸和托洛茨基分子。

（二）屠杀、诱惑、恐吓、离间同时并用——头天飞机轰炸武安，第二天特务机关就指使汉奸诱惑区长开会，强其接待

日本军队进城。临城东塔村刚被烧杀，接着在附近散发其掠自我国的糖、盐、香烟、粮食以示恩，扬言只打这军不打那军。昔阳守备队长高田，明令立即持火烧有游击队的村庄，同时由伪县长求其延期，好勾引游击队员回家。太谷逼壮丁烧杀其本村抗日军人家属，想造成自相残杀的局面。

(三) 害怕游击战争，特别害怕游击队做瓦解日本满蒙军队的运动——日本强盗屡次派相当大的兵力，突然地分进合击游击队，企图消灭它，终未成功。相反地，游击战争长期包围并吓怕了日军，正如敌伊藤少将所说：“行踪飘忽，出没无常，我前进则彼逃散，我停止则彼出现。”“在广大之中国，到处流窜，不能使作城下之盟。”表现着对于持久性的游击战争的忧虑。榆次曾发现日军中有一兵士，在地划一圆圈，自己站在中间，表示其被游击战争包围，不能回家的苦况。我们在广阳、沾尚战斗中，曾用日本话喊“缴枪优待”的口号，招降了日本兵卒和官长。榆次日本清乡军满洲籍士兵经常逃亡。最近邑城的日军中，发现产业组合、日本无产党^{〔1〕}等瓦解日军的小传单。正太线日军到处搜查、扯毁我们游击队的日文标语。当然，日军并不会忘记它在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二年出兵西伯利亚在游击战中所受的消耗。

(四) 要求速战速决——敌伊藤少将说：“战争一开始的时候，日本军队立刻占领中国重要区域。”去年冬，近卫内阁也曾再三声明：“至迟今年底或明年春，即可解决中日战争。”事实上，它已经使用优越的军事技术，执行了速战速决的歼灭战略，也占领了北平、太原、南京、济南等要点，然而抗战还是顽强地继续着，并未如它所预定的日期使中国降服，解决中日战争。现在它国内的反战运动的发展，国际间和平战线进步的团结，不能不使它一面在中国民众中散布所谓“中日亲善”、“东亚和平”的空气，另一面将继续进行更大

的侵略战争。

（五）掠夺资材——这不只是说日本财阀、军阀掠夺半殖民地一般的资材，以延长其反动统治，而是着重地说日本强盗战争资源缺乏，难以支持长期的侵略战争，特别在中国长期抗战的条件下，不顾一切来掠夺占领区域内的军用资材，如工厂、煤、铁、粮食、棉花等，甚至这几天连民间的破铜烂铁也收集起来，从正太路东运出娘子关，去造军火。

（六）夺占交通线，逐次转移作战重点，企图各个击破我军——开来中国的寇军，现在是四十六万以上了，但以这样少的兵力，分布于兵多地宽、交通不便的中国，必然要把作战线放在铁路公路线（有时虽离开铁路公路线作战，终归是要夺取铁路公路）及河运线上。对于敌人，运输的便利不但在供给现代战争技术化兵器所需要大量的煤油、弹药等资材上有意义，而且在使中国各军策应不灵，而使敌人仍灵敏转移兵力于决战方面各方击破我军上更有意义。我军在深远的冀察晋三省的地域活动，经常截断其后方交通线，确给了敌人以很大的困难。特别在它越深入内地、交通线越延长的时候，使它更感觉困难。它最近到处散布“一民护路，万民享福”的欺骗宣传，并定出民众护路的严厉办法，这已暴露它因交通阻滞而受了莫大的痛楚，然而交通仍经常被我们破坏着。

（七）战役上的突贯攻击——因为日本作战军队数量上有限，而又不能不沿着主要交通线作战，于是采用了战役上的（不是说战术上的）突贯攻击。不管如何困难，总是沿交通线为轴心的作战目标努力直钻。忻口的战役，把这一点表现得非常明显。这是给我军突击其侧背的好机会。

（八）占据要点——日本军队因恐兵力耗散，只把占领的广大区域内军事之要点派兵据守，空出广大地域，则想发展汉奸伪政权，组织“以华制华”。拿山西来说，共有一百零五个

县，只有二十个县才有日本军队。除晋南不计外，也空出不少的地面。这已成为发展游击战，组织民众，遂行运动战的好场所。

(九) 战略重点放在华北——日本侵略中国，特别企图截断中苏联系，以及苏联的积极反对这一侵略战争，这使日本陆军在战略上的重点不能不在华北，以便策应两方，虽然它在灭亡全中国的战略方针之下，此刻把作战的重点转移到津浦线，甚至将来再转移向南，然而就整个战争来说，其全国陆军战略的重点，仍在华北。

(十) 武器精良，其常备军长于协同动作，但其步兵攻击精神并不很旺——就是有名的坂垣师团，表现也是如此。它们拥有优越的技术兵器，而动作严格遵守着典范令的规定。其对于我国军队的被动的单纯的防御，当然要占些上风。但如果我们作战审计了敌我的长短，玩一点出乎它们典范令之外的新的花样——主动袭击的运动战与游击战，它们就要感觉难于应付。如平型关、阳明堡、七亘村、广阳诸战斗。它们在感觉不易应付时，竟至避开我们。至于新由预备役成立的师团，其素质就比较坂垣师团更差多了。

三 现在我们应进行的游击战与运动战

根据上述的特点，并见到我国领土的宽大，交通的不便，特别是在抗战的广大民众中繁殖游击战争条件之下，我们组织和进行游击战、运动战，以及游击战与运动战的适当配合，这在长期抗战的战略上，更有严重的意义。当然，在某些要点的阵地战也是必须的，但在整个战局上不是最主要的。

游击战争，原来是抗日战争中广大的民众武装斗争的事业，而不是单纯的军事行动。它是在敌寇侵略中国肆行奸掠烧

杀的战地，尤其是敌人的后方，中国民众为保卫自己身家性命、国家民族而产生的。它的出路，只有把日本强盗的军队完全赶出中国去，使民族得到解放。因此，它的基本任务是：

（一）公开或秘密地发展民众抗战的组织，特别是武装的组织，来繁殖游击战争；同时，揭破敌人的欺骗阴谋，铲除汉奸，瓦解敌人的傀儡政权，特别是敌伪的军队，使我国已失的领土和政权，从一切斗争中，主要是武装斗争中，恢复起来。

（二）配合正规军队，消灭或消耗敌人，取得最后的抗战胜利。这些基本任务，具体地说，就是：

1. 从敌人后方伏击敌人，袭击敌人，使它腹背受敌，而不能不耗散其兵力，借此创造敌人的弱点，配合正规军队突击之，并为正规军查报敌情，同时封锁消息，机动迷敌，使敌人陷于聋瞎的状态。

2. 破坏敌人的交通，首先是铁路公路，其次是土路，主要是破坏道路的技术工物，如桥梁山洞之类，使敌转移兵力、输送粮弹都感困难，甚至使敌人各部孤立起来，受着饿困，这对于战争全局有很大的作用。

3. 截毁敌人停留的或运送中的武器、军用品及其他资材，特别是飞机场、弹药库、煤油池、粮食站，以及运送中的各种辎重。在敌人收集原料制造军火的区域，如河北（棉花食盐）、山西（煤铁）等地，更要繁殖游击战争，使敌人不能利用中国的资材来做杀中国人的工具。这就是从物质方面来加速消灭敌人侵略战争的实际办法。

我们有了民众的抗战而表现之于游击战争的条件，那我们就好进行运动战。如使游击战配合运动战，消灭敌人，那就使运动战的歼灭性质增大。如敌人在被消灭之后，集结重兵行动，则空出的地面更为广大，又是给游击队活动范围加宽发展、民众组织加快发展以机会。这就是游击战与运动战互相为

助的地方。

我们进行运动战，通常是大踏步地前进或后退。无论是在构成的战线的附近，或挺进到敌人的深后方作战，都要把握住主动性、秘密性、迅速性、坚决性和干脆性，主要是力求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因此我们的作战的机动，必须：

（一）寻找敌人的弱点，如其没有弱点，那就要创造敌人的弱点。

（二）集结绝对优势的兵力，来突击敌人这一弱点。

（三）在适当的时间和适当的条件之下完成机动，使敌人不能援救其被突击的弱点。

（四）尽可能争取时间，来组织优于敌人的火力配系。这是我们机动的要求。但艺术的机动，还要求适时发觉敌人对我们的突击，而避免其将我们压溃。

因此，我们在布置时：

（一）选择主要的突击方向，最好是在这一方向能以几面会合突击敌人。

（二）选择集中主力的地点；一个或几个地点。集中主力于决战地点，是保障胜利的基本路线。

（三）适时区处主力转移的秩序，务使在战役上决战之时能集中主力。

以上这些就是我们运动战一般的基本原则。我们要实现运动战的这些原则，主要地是靠在我们周围的为自己身家和民族生存而斗争的广大民众的上面，特别是游击战争的上面。

我们的军队的区分又应当是：

其一，在次要方向，我们就用极少数的正规军的兵力，甚至不用这兵力，而只使用现地域的游击队或游击兵团，在广大民众掩护之下，运用自卫队等抗日戒严的组织，肃清敌探，封锁消息，就已使敌人不易知道我们的虚实了。如游击队还能佯

动迷惑或袭击敌人，那就使敌人越发摸不着头脑了。到处民众都是日本强盗的对头，都在暗算日本强盗。即使它们晓得那里有我们的游击队，它也没有信心来消灭游击队，而只有受游击队的消耗。

其二，在主要突击方向，我们正规军队可以集中绝对的优势兵力，在广大民众掩护及游击战争配合之下，于适当的时机，不动声色地采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向着敌人完全不知觉、不戒备的地点，特别是向着敌人侧背的弱点，给以致命突击，而消灭其有生力量。这样，敌人虽有精良的武器，也来不及发挥威力，而可能被我们缴械。万一所选择的突击点情况临时变迁，由敌之弱点而变为敌之强点，且无胜利把握时，那就临崖勒马，只派出小部队，给敌人以相当的消耗或威胁。

总而言之，我们每次进行运动战，必须把敌情可能的变化，战地民众的政治情绪及其帮助作战的力量，游击队、自卫队的多少及其任务的分配，都要站在取得运动战胜利的立场上，计划清楚，作秘密审慎的准备，迅速突然的袭击，这样才能使我们每次消灭或消耗敌人，而不使敌人消灭或消耗我们。当然，我们必要的伤亡是无法避免，也不可能避免的。

无论游击战或运动战，一方面因为我们本身要求隐蔽灵动，容易抓住或突然袭击敌人的弱点，不使敌人抓住或袭击我们的弱点；另一方面，因为敌军使用现代优越的技术兵器，如飞机、装甲车队之类，要求明朗干脆的速战速决。照一般说来，我们的活动在山地比在平原便利些，在森林隐蔽地比在沙漠开阔地便利些，在荒辽僻塞的地方比在交通便利的地方便利些，在夏秋冬三季比在春季便利些，在夜间比在日间便利些，在敌军稀少的地方比在敌军众多的地方便利些，特别是民众抗

日运动更开展的地方比落后的地方便利些。这些后者不利的条件，只能影响到游击战与运动战兵力组成及运用原则的某些方式的不同。是要我们随时精密审计，适当运用原则，但绝不能以这些条件来否定游击战与运动战的原则。因为我们游击与机动的原则，特别着重的是适时适地配合运用各种力量，乘敌不备来袭击敌人的弱点，而以秘密坚决干脆——特别是秘密实施之，并不要对敌人先下“战书”，预约决战的战场和时间，教它准备。

上述的那些条件，事实上也是参差错综生长的，绝不会一切不满人意的条件都生长在一个地方。问题是要我们如何适当地配合运用当地当时客观的条件，加以主观的努力，来推动到某些限度罢了。

在中国地方作战，日夜四季都随我自由运用，无须说了。单说对运动战和游击战有密切关系的民众抗战运动，是要我们到处努力推动和发展的。如果有了民众抗战运动的高潮，日寇占领的重镇的平津都有可能用武装暴动来恢复的，又何处不可以进行游击战与运动战呢？

苏联国内战争时，游击队在邓尼金占据的新俄罗斯城的活动，曾经吓得城中驻军发生“风声鹤唳”的现象。现在日本作战兵力过少，不能分驻于各大城市，许许多多的城市乡村，特别是广大的地面，都便于游击队活动和正规军机动的回旋了。

根据解放军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
《刘伯承军事文选》刊印。

注 释

〔1〕日本无产党，一九二八年成立，一九四〇年解散。

中共中央关于党报问题 给各地方党委的指示

（一九三八年四月二日）

由于过去党处在长期秘密工作之下，不能发行全国性的党报，因此对于党的各项政策只能靠秘密的油印刊物传达，这样就养成同志们不了解党报的作用。在今天新的条件之下，党已建立全国性的党报和杂志，因此必须纠正过去的那种观念，使每个同志应当重视党报，读党报，讨论党报上的重要论文。党报正是反映党的一切政策，今后地方党部必须根据党报杂志上重要负责同志的论文，当作是党的政策和党的工作方针来研究。在党报上下列几种论文：（一）“新华报”上的社论；（二）“新华”、《解放》、《群众》上中央政治局负责同志的文章，必须在支部及各级党的委员会上讨论和研究。

各地方党应当尽一切力量来帮助《新华日报》，以达到加强报纸与群众的联系。（一）每个支部应有一份《新华日报》，每个同志应尽可能定一份“新华报”，并帮助推销和发行。（二）帮助建立通讯工作。（三）帮助建立读者会。各地方党应把这通知给每个支部每个党员知道，并讨论具体执行的办法。

四月二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刊印。

张闻天等关于在 山西进一步开展统战工作 给陈光等的电报

（一九三八年四月二日）

陈、罗并致尚昆^{〔1〕}：

由于日寇的严重进攻，山西许多顽固分子逃跑和八路军新的胜利，都造成了统一战线进一步发展的客观条件。同时为了建立吕梁山脉成为抗日根据地，坚持抗战，也使统一战线有进一步发展不可。因此，我们认为：

甲、一一五师陈罗必须与决死第二、三纵队及行政主任张文昂等建立秘密关系，推动他们出面来：（一）恢复晋西南抗日秩序，肃清汉奸。（二）逐渐淘汰政权机关中的腐化动摇分子，吸收坚决抗战而有能力的分子加入政府，增强政府战时工作。（三）召集区长村长及各县长的联席会议，讨论并执行战时工作。（四）吸收各民众团体代表加入动员实施委员会，扩大动委会，使之成为政府与民众联系的桥梁。（五）更深入更广大地发动民众运动，大量组织自卫军武装民众。（六）各级政府与群众团体的工作可以放手些去做。

乙、陈罗须设法向汾西地区找到赵城特委王一夫同志，并与之在一起计划工作。□支队在吉县地区找到晋南省委张文

清、黄骅等同志并要省委与师部一起行动。

洛、毛、胡服^{〔2〕}

二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指罗荣桓、杨尚昆。

〔2〕指毛泽东、刘少奇。

论青年的修养*

(一九三八年四月十二日)

张 闻 天

同志们！你们都是从全国各方面来的青年，所以我今天就同你们讨论讨论关于青年的问题。

从全国民族抗战开始到现在这个时期内，青年的确占着一个很重要的地位。我们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不论是军事方面也好，政治方面也好，文化教育方面也好，都可以看到广大青年群众的活跃。他们总是站在抗战的最前线，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牺牲奋斗。同时，由于抗战规模扩大和展开，青年的责任也更加重要了。怎样使我们的青年更能在抗战中尽他们的责任，是我们大家所要商讨的问题。我今天所要讲的青年的修养问题，即是想在这方面向大家贡献一点意见。

我认为中国现代的青年，有很多共同的优点，同时也有一些共同的弱点。怎样发挥这些优点，克服那些弱点，即是青年的修养问题的内容。我现在就根据我们的经验与考察来具体讲几点，希望大家来讨论。

一 要有坚定的高尚的理想

青年有一个很大的优点，这就是他们有高尚的理想，不论

* 这是张闻天在陕北公学的讲演，原载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二日出版的《解放》第三十九期。

这个理想是抗日救国也好，共产主义也好。他们对于现社会是不满足的，他们希望着一个理想的社会出现。青年的这种理想是最可宝贵的东西。正是这种理想不断的鼓舞着我们的青年向前进步。正是这种理想使他们不愿在现社会中醉生梦死，而愿意为理想社会的实现牺牲奋斗。正是这种理想，使我们的青年，在过去，在现在，创造了许多惊天动地与可歌可泣的伟大事业。眼前的例子，也可证明这一点。比如你们，陕北公学的同学，究竟为了什么不远千里而来陕北这个比较荒凉的地区呢？陕北公学的物质条件是很困难的。住的是窑洞，吃的是小米饭。教育设备都很简陋。然而你们为什么不怕一切困难而来呢？如果你们不是为了寻找高尚的理想，我想你们是不会来的。所以高尚的理想对于青年是最可宝贵的东西。我们对于青年的理想，不但不应该鄙视，而且应该极大的爱护。旧社会里的人，常常骂青年为“理想太高”。这种骂法，我们认为根本错误的。这只是证明那些骂青年的人的无理想之可鄙而已。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理想，不是也给人家骂为“大炮”吗？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共产主义理想，不是给人家骂为“空谈”吗？然而我们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孙中山的伟大，也正是在于他们有高尚的理想。所以青年有高尚的理想，正是青年的优点。

但是如果我们把青年人的某些理想研究一下，那我们即可发现有些青年人的理想不是理想而是空想。空想可能常常是美丽的东西，然而究竟是空想而不是理想。那么，理想与空想的区别究竟在哪里呢？

首先，我们应该说，我们的理想是建筑在现社会的物质基础之上的东西。空中楼阁，究竟是幻想而不是理想，因为它是脱离现社会的物质基础而建立在空中的。一切伟大的理想，都从现社会的具体分析得来。闭户造车终究只能是幻想而不是理

想，因为它是个人头脑中间随便想出来的，而不合于具体的与实际的物质条件。共产主义的理想，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崇高的最伟大的理想，然而这个理想，只能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上产生出来。脱离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分析的“大同世界”的思想，究竟是幻想而不是理想。

其次，我们的理想应该适合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说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三民主义可以是我们今天的理想，因为中国社会今天正是向着这个方向发展着的。我们说共产主义社会是我们将来的理想，因为人类社会终究是要向着这个方向发展前去的。如果今天有人要恢复原始共产社会或恢复奴隶社会，或仿效君主专制或法西斯独裁的统治，那这种思想就不是真正的理想，因为这种思想是违反于人类现代社会发展的趋势的。这种思想，我们不叫它理想，而叫它做反动思想。因为这种思想不是要使社会走向前进，而是要它转向后退，就是所谓“开倒车”。一切不合于人类社会发展趋势的思想，只能是一种空想。

第三，理想与空想不同，就是理想是能够实现的，空想则是永远不得实现的。而理想的实现，需要有在一定的物质条件下所产生的社会力量。没有这种力量，理想也就不能实现。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理想，就要依靠在全国一切不愿意当亡国奴的各阶级、各党派、各团体的民族统一战线力量之上。离开实现自己理想的社会力量而谈理想，那也是一种空想而不是理想。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离开工人阶级的社会力量，就成为乌托邦，成为空想。

第四，理想之为理想，除上述条件外，还需有实现理想的具体办法。比如，实现民族解放的理想，就要有建立、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办法。实现共产主义，就要有一定的纲领与步骤，一定的策略与战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与战

略是每一共产主义者所必须学习的科学，因为离开了它们，理想虽是很好的，然而仍然成为空谈而不能实现，使理想成为空想。

这就是理想与空想的基本区别。我们的青年如果赞成我所说的这些区别，那么请你们就拿这几个标准，来检查一下自己的理想：究竟你们过去所抱的理想，是理想还是空想？如果是空想，那就应该决然抛弃。如果是理想，但又不完全，那就应该修正与充实，或重新加以检讨与整理。我们应该不客气的说，在我们青年的理想中，常常不免有些空想的成分，因此，他们有时对于自己的理想把握不定，而发生一些朝三暮四的摇摆现象。要免去这种现象，就必须把自己的理想建筑在结实坚固的科学的基础之上。

这是我所要说的第一个问题。

二 要为实现自己的理想奋斗到底

青年人在一旦觉醒，找到了自己的理想之后，都能够不顾一切为自己的理想奋斗。这种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牺牲奋斗的精神，是我们青年的一个很大优点。我们在社会中看到不少这样的人，他们也不满意于现状，他们也希望有个较好的社会出现，他们甚至同情共产主义，但是他们自己不愿意为改造社会而奋斗。他们舍不得自己的妻子儿女，他们舍不得自己的家乡故土，他们舍不得自己的生命财产，他们不得不“马马虎虎”的生活，不得不“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但青年就不是这样。他们不了解到自己的理想则已，一旦他们了解到了自己的理想，他们就会抛弃一切，奔赴自己的理想，去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这种不顾个人利害而牺牲奋斗的精神，是值得钦佩与歌颂的。

但是，实现理想，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理想虽是建筑在现社会的物质基础之上，但理想是超过现社会的东西。理想好比泥土中生长出来的花。它虽生长在泥土中，但它又不是泥土。所以理想看来常常是美丽的，而现社会则看来是丑恶的。要把这个丑恶的现社会变为美丽的理想社会，那决不是一天两天以至一年两年的事，而需要几十年以至上百年的奋斗与工作。不但这样，在奋斗与工作的过程中还必然要碰到无数的困难与波折，有时甚至看来似乎是不能克服以至绝望的困难。所以不论在任何困难之下，坚持自己的理想，坚持为自己理想的实现而奋斗，是绝对必要的。没有这种坚持性，任何的理想也都不能实现。

一切伟大的革命家之所以伟大，不但因为他们有着伟大的理想，而且还因为他们始终能够为了自己的理想奋斗到底。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虽是在他奋斗的过程中碰到了无数的困难，然而他始终坚持他的理想，为他的理想奋斗到最后。世界无产阶级的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的伟大，就是他们那种为自己的理想而坚持奋斗到底的精神。他们在丑恶的旧社会中看到美丽。他们在黑暗中看到光明。他们排除万难，克服一切困难而前进。

中国共产党人曾经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件事震动了全世界。为什么二万五千里长征能够有这样伟大的影响呢？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在这次长征中充分的表现出了它为了自己的理想而牺牲奋斗与坚持到底的精神。没有这种精神，就是一千里的长征也是不可能的。在这次长征中，我们的确曾经碰到了无数的困难。我们曾经碰到了几乎不能渡过的天险金沙江与大渡河。我们曾经碰到了人类几乎没有到过的雪山与草地。我们处在敌军的四面包围之中。困难几乎是不能克服的。然而我们那时只有一个思想，就是无论如何要克服这些困难，要为自己

己的理想奋斗到底。最后，我们还是完成了我们当时的任务，到达了当时的目的地。

就以今天的抗战为例吧。中国的民族抗战是一个持久的战争。困难也是很多的。波折也是很多的。如果我们碰到一些困难，遭受一些挫折，就悲观失望，就准备同敌人妥协，那中国就有亡国的危险。显然的，如果我们不能坚持抗战到底，则最后战胜日寇、实现民族独立的理想是不可能的。

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在为了自己理想的实现而奋斗到底的问题上，我们有些青年常常表示一些弱点。他们一开始往往以无限的热情与兴奋去奔赴自己的理想，但是一旦他们碰到困难，碰到波折，他们往往不能坚持到底，以至半途而废。过去常常有人以“五分钟热度”讥笑青年学生。这种讥笑在现在说来已经不对了，因为中国青年学生经过无数的斗争，现在已经有了极大的进步。然而在某些部分的青年中缺乏斗争的坚持性，则依然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为什么在我们部分青年中发生这种现象呢？我以为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我们的青年往往对于革命的持久性估计不足。要把人类的高尚理想实现出来的革命，像我在前面说过的，不是一天两天以至一年两年的事，而是几十年以至上百年的事。这是一个持久的斗争。不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是如此，即最后战胜日寇也不是一年两年的事，而是一个持久战。同志们大多数是从西安步行到延安的。你们对于走陕北的山地，大概已经有了相当的经验。革命就好像走陕北的山地一样，翻过了一座山又一座山。你们在路上不是常常想，翻过了前面一个山头一定再没有山了吧，一定可以到延安了吧。然而事实常常是相反的，山接连着山，而延安总是还在前面。这样你们在路上就要走十天，才得到达延安。这对于你们，就是一个很好的人学考试。

然而革命究竟比翻山要持久得多，困难得多。如果我们青年参加到革命中来，没有持久斗争的准备，结果是一定要失望与半途而废的。正像你们到延安来，如果你们没有这样一定要到延安的决心，你们一定会半途而返的。

第二，我们的青年往往对于革命的困难性估计不足。要把人类高尚的理想实现出来的革命，不克服无数的困难是不可能的。革命决不像上海的大马路那样平坦好走，决不像吃饭睡觉那样容易简便。这简直同爬着没有人迹到过的崎岖的高山一样，山上没有路，没有人家，到处是荆棘与浓密的森林，到处有毒蛇猛兽的威胁，有些地方简直是不能越过的绝壁。但是我们必须前进，必须克服一切困难前进。我们有时会被荆棘树枝所刺伤，有时会被毒蛇猛兽所咬伤，我们前面的伙伴有时会用尽了一切气力而倒毙，但是我们必须前进。如果我们的青年参加到革命中来，不预先看到这种困难，没有克服一切困难的准备，那结果必然是“知难而退”。

第三，旧社会的思想习惯以及一切物质上的诱惑，也往往是使青年半途而废的一种极大的力量。我们常常看到一些有志的青年，受不起这种力量的压迫而退却了，而放弃了自己的理想。旧社会对于青年的理想，总是取着敌视的态度。他们用各种思想上的毒素，讥笑青年，陷害青年，使青年“老大”，“颓丧”，“消沉”。他们用地位、金钱、美女腐化青年，笼络青年，消磨青年的“朝气”。你们看到过无数这类的例子吧。当青年学生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往往“志向远大”，想“给国家民族谋点幸福”，“为人类解放做番事业”，然而一出学校到旧社会中混上几年，往往把过去的一切完全抛弃了。旧社会吞没了他们。旧社会融化了他们。所以，如果我们的青年不能同这种旧势力奋斗，坚持自己的理想，不为这些力量所动摇，那结果也必然是半途而废。

第四，我们的有些青年本身常常有一种“动摇性”，缺乏足够的忍耐与坚定。我们常常称这种特点为“小资产阶级性”。他们往往今天参加革命工作，就希望革命在明天胜利。如果明天革命不能胜利，那他们就失望而消极了。他们在革命形势高涨的时候，常常趋向狂热与盲动，而在革命形势低落的时候，则又转到消沉与绝望的深渊。他们胜利时常常为胜利冲昏头脑，失败时则又因失败而垂头丧气。他们不会把今天一点一滴的切实的工作，同他们远大的理想联系起来。他们不能穷年累月的去为自己的远大的理想而进行今天看来好像是没有结果的工作。他们常常讨厌这种“琐碎”与“麻烦”的工作。他们不能清楚了解，一切革命的工作，只要能够坚持的干下去，一定可以得到一定的成绩。巨大的建筑工程没有一砖一瓦的砌筑，是永远不能成功的。伟大的理想不经过许多胜利与失败，是永远不会实现的。

这些是常常使我们的青年不能坚持自己的理想、为自己的理想奋斗到底的原因。这些弱点的克服，是每一个中国青年的严重任务。这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然而这件事是必须做到与可能做到的。

当然，今天我们离开我们的理想还很远，然而我们总是在一天一天接近着自己的理想。社会主义的理想，过去还只是在书本上，而现在已经在占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的苏联，变成了完全的现实。所以只要我们能够坚持自己的理想，为自己的理想奋斗到底，我们的理想的实现是可能而且是必然的。

三 要学习实现理想的办法

有了理想，有了实现理想的决心，是不是就已经够了呢？还是不够的。我们青年还要有实现理想的办法。

青年有一种很大的长处，就是有热烈的革命情绪，纯洁坦白的胸怀。正是因为他们有热烈的革命情绪，所以他们能够勇往直前，不顾一切困难与个人利益，向着自己的理想前进。正是因为他们有纯洁坦白的胸怀，很少受到旧社会的各种陈腐的思想、习惯与传统的影响，所以他们比较容易接受革命的真理。青年同那些麻木不仁的人是不相同的，同那些顽固守旧的死硬派也是不相同的。青年是有生气的，活跃的，充满着愉快与光明的一代。他们是旧社会中生长起来的美丽的花，他们也是美丽的新社会的创造者。

在中国革命史上，我们可以举出无数例子，来证明中国青年如何常常站在民族解放的前卫地位，以他们的头颅与热血创造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勇的光荣的史诗。在今天伟大的民族抗战中，我们也可以到处看到青年怎样为民族抗战的最后胜利而进行着勇敢无比的斗争。如果他们沒有热烈的革命情绪与纯洁坦白的胸怀，则一切这些事业的创造是不可能的。我们共产党人对于青年的这一优良的特质，尤其有深切的感觉。当我们在最黑暗最困难的时候，当在我们的周围到处是恐怖与造谣污蔑的时候，我们总是从许多青年朋友那里得到他们的同情与拥护。在今天，他们对于我们所表示的爱戴与信任，也是我们不能以言语来表示感激的。谁都可以看到，在我们延安，没有官可做，没有薪水可拿，没有很好的生活可过，还有不少人在我们的周围造我们的谣言，破坏我们，然而你们仍然不远千里而来，其原因何在呢？除了你们的那种热烈的革命情绪与纯洁坦白的胸怀，还能有其他的说明吗？

青年的这种优良的品质，是我们所应极力爱护与发扬的。

但是光是热烈的革命情绪，纯洁坦白的胸怀，还是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完成伟大的革命事业的。有些青年的弱点，常常表现在不会使革命的热情去服从于革命的理智，不会把纯洁

坦白变为对于真理的深刻的追求。响亮的革命口号，耀眼的革命词句，可以迷惑我们的青年，使他们发狂，使他们以此为满足。他们往往抓住问题的一方面，把它发挥，把它夸大，认为这是唯一的“真理”，排除一切其他的方面，否认一切其他的意见。他们的革命热情容易变为盲目的冲动，他们的纯洁坦白容易走向片面性、狭隘性与幼稚病。他们往往不能更冷静的去考虑问题，想出具体的办法来实现自己当前的任务，来实现自己的理想。这种弱点，当然是我们的青年所应该设法克服的。

我们应该使我们的青年清楚的了解到：在理想确定之后，有了为理想而奋斗到底的决心之后，学习实现理想的具体办法就有着决定的意义。在这一方面，我想向同志们贡献几点意见。

第一，就是要了解具体情况。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首先的问题就是了解情况。正像一个在前线上指挥军队的将军，他为了要实现他打胜仗的理想，就必须讲求作战的方法。这里，首先就是要弄清敌情，然后来决定作战的计划。我们的工作方法也是如此。比如，你们将来从学校毕业之后，你们到一个地方去工作，你们的责任决不是到那里去照你们自己的头脑中所想的来乱干一顿，而是要首先了解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比如那里的抗战形势，那里的政治与经济，各阶级、各阶层、各党派、各民众团体以及党、政、军、民间的相互关系等。没有这种了解，我们就无法决定正确的工作方针与工作计划来实现自己的理想。

当然了解具体情况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一切具体情况都是在矛盾中发展着的，都是依照普遍的辩证法的规律变动着的，所以只要我们能够把握住这些方法，那比较正确的去了解具体情况也不是不可能的。问题只是要我们的青年在接触具体情况的时候，能够更多的“想一想”，更多的研究一下，考

察一下，决不要以自己的一些片面的主观的了解为满足。世界上的一切都是非常复杂的，不是马马虎虎、冒冒失失就能够了解的。如果我们没有这种了解具体情况的要求与忍耐心，那我可以告诉大家，你们是什么事也做不好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彻底了解具体情况之后才能开始工作。这种彻底了解，在一个短的时期内是不可能的。但我们要求在开始工作之前，有一种初步的与起码的了解。不然，到一个地方不管一切乱干一气，那是异常危险的。

第二，在我们对于具体情况有了初步的与起码的了解之后，我们就要根据对具体情况的了解来决定我们的方针、我们的任务、斗争的形式、工作的方法方式等。比如你们现在到上海工作，你们在了解到了上海的具体情况之后，你们就必须规定你们今天在上海需要做什么，能够做什么，而且如何做。显然的，在上海日寇军队占领的地区，我们今天的具体任务、斗争形式、工作方法方式等，决不能同其他区域相同。你们要考虑，究竟今天在上海是同在其他某些战区一样地去发展游击战争，进行公开的反日的活动，或者是这里需要执行另一种任务，即积聚自己力量准备待时而动的任务，采取另一种斗争形式，即秘密的反日斗争的活动呢？是组织公开的抗敌后援会，还是一方面组织秘密的抗日团体而同时去利用公开的合法的组织形式呢？只有正确的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才能使我们的力量巩固与发展，达到最后配合全国力量战胜日寇的理想。如果我们的任务规定得不正确，工作方法方式等都规定得不对，那我们必然会遭受严重的失败，而达不到我们的目的地。

在目前全中国人民的前面的最中心的任务是坚持抗战，最后战胜日寇。但是实现这个中心任务的方法是在各个具体的地方都不能完全相同的。我们青年要善于根据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来决定实现这个中心任务的具体办法。由于中国政治经济

发展的不平衡，由于中国的地大物博，所以实现目前中心任务的方法，都不能有千篇一律的公式。公式主义常常是我们实现总任务中的最大的障碍物。

就是各地方的具体情况，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同样的变动着。所以你们就在一个地方的工作中仍然要时时刻刻注意新的情况的变化，而及时的改变自己的任务及工作方法方式等。至死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这里，要求我们以极大的灵活性、机动性与创造性，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固执自己的死公式或老办法，结果必然会遭受严重的失败，而达不到目的地。

第三，在任务等规定之后，就应该立刻开始自己的实际工作。我们是革命家、行动家，而不是空谈家。“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恶习惯，我们青年是决不应该学习的。我们必须把我们自己所决定的方针与计划来见诸实行。只有革命的行动才能改造世界。革命的伟人马克思曾经说过，我们的任务不但在认识世界，而主要的在改造世界。要改造世界就要革命的实际工作。而且也只有在实际工作中，我们才更能进一步的认识世界，更正确的来决定自己的任务与工作方法方式等。也只有实际工作，能够考验我们过去的决定是否正确，充实与发展我们的决定，改正错误等。

所以我们青年在实际工作中也仍然不是盲目的乱干一顿，而要时时刻刻注意自己在实际工作中所碰到的一切问题，总结自己在实际工作中的经验。如果在实际工作中证明过去自己的决定是不正确的，是做不通的，那自己应该毫无怜惜的抛弃过去自己的决定，而根据自己对于具体情况的新了解来重新决定自己的任务。如果有部分的错误，即应改正部分的错误。如果有不够的地方，即应以新的经验使之充实，使之发展。这里所需要的是虚心的服从真理的态度，而不是“自作聪明”去蛮干。不顾事实的蛮干，是会碰到钉子以至毁灭自己的。

所以我们的青年，应该时时刻刻在实际工作中实行工作的检查，发展自我批评，总结工作中的经验与教训，使我们的工作能够更好的得到进步与成绩。一切先进的革命的理论，我们也只能当作行动的指南而不能当作教条。一切先进的革命理论，也要在实践中充实自己与发展自己的。

我想，这三点是我们青年人在工作中所应该注意的。这三点的中心所在，即是要使我们的青年不但要有理想，有实现理想的决心，而且要学习实现理想的具体办法。

当然，青年人终究是青年人，他们一般是富于革命热情而缺乏实际经验，因此他们有时要“感情用事”，有点“冲动”，有点“幼稚病”。我们指出青年的这些弱点，并不想以此来责备青年，而只是要求青年们在自己的工作中注意到自己的这些弱点，克服这些弱点，使自己逐渐的在实际工作中成为一个比较“能干的”与“老练的”革命青年。

四 要同群众在一起去实现自己的理想

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要实现革命的理想，一定要依靠于一定的社会的力量，这社会的力量就是千千万万的群众。历史上的伟人，固然在创造人类历史中起了很大的作用，然而如果没有群众的拥护与群众的行动，任何推动历史前进的理想都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我们青年要实现自己的理想，就必须能够率领群众去为自己的理想奋斗。

青年在革命行动中肯负责，肯出头，肯打先锋，这是很可宝贵的品质。在中国民族解放的历史中，青年常常起着先锋的作用，就是由于青年这种优良品质的结果。但是就在这个方面，部分青年仍然表现出他们的弱点。他们肯负责，肯出头，肯打先锋的品质，往往发展到好出风头，目空一切，自高自

大，包办，不耐烦，脱离群众的偏向。这种例子，我是见得很多的，不知道你们见过没有？我想一定是见过的。

在陕北公学学习的青年，一般的是觉悟程度较高的一部分中国人，他们的确有责任去领导另一部分比较落后而又占大多数的中国人，发动他们，教育他们，训练他们，以提高他们的政治水平与组织力量。没有先锋的领导，广大的比较落后的群众，是不会自己走到先锋的地位的，这是无可否认的真理。

然而怎样可以使我们陕公的青年能够负担起这个先锋的领导的责任呢？是不是我们青年装出一个领导者的架子，自命不凡，目空一切，就能够实现这个领导作用呢？是不是只要我们的青年把我们的理想在群众前面一解释一宣布，群众就会跟了我们走，就实现了我们的领导作用呢？这些都是不能成功的。任何领导者，如果自命不凡，目空一切，装出领导者的架子，那结果他不但不能领导群众，而且会脱离群众。至于把很美丽的理想讲给群众听，群众自然可能来听一下，然而要他们为了这个理想来牺牲奋斗，那单靠这种宣传工作是不能达到目的的。

领导群众，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青年人决不要把这个问题的看得太简单了。这里，第一个问题，就是要求我们的青年到群众中去。我们的青年对于“群众”两个字的观念常常是比较抽象的，有时把“群众”理想化，有时看不起“群众”，而不能活生生的去了解“群众”。所以下决心到群众中去，实是开始领导群众时的必要的一步。

我们青年到了群众中之后，就要学习如何去接近群众，去同他们生活在一起，去了解他们，以至取得他们的信任。这里，首先，就是要时时刻刻去为群众服务，处处能够为他们谋利益，为他们的利益牺牲自己的一切。其次，要我们处处谦逊和气，刻苦耐劳，宽宏大量，急公好义，诲人不倦，做人家的模范与教师。第三，要能够团结与培养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发

挥积极分子的作用，依靠积极分子推动全体。第四，要以民主的精神与民主的工作方法来吸收与教育群众积极参加工作，不要个人包办一切。第五，要善于孤立最顽固的少数坏人，依靠群众的公愤去打击他们与驱逐他们。只要这样，群众就会把我们当做他们“自己的人”，就会信任我们，接受我们的领导。

无疑的，当我们真正深入到群众中去时，我们必然会看到群众中有许多落后意识，落后的思想与习惯，他们的狭隘的宗法的与行会的观点。这一切我们都会碰到的。然而我们是不是因此就失望而脱离他们呢？决不是的。我们的责任，正是要提高他们的政治水平，克服他们的落后性。但是当我们认真在群众中工作时，我们更会碰到群众中的光明的一面，他们的丰富的革命性与他们的伟大的革命力量。我们在他们的深处，可以看到在旧社会的上层所没有的那种德性。他们的力量，他们的德性，可以给我们以最大的信心，使我们相信他们是我们的最伟大理想的负担者，而且他们最后一定能胜利。这就使我们在他们中间感觉到一种崇高的安慰与喜悦，这就使我们在任何困难的情形之下，总是不会脱离他们，而且总是要依靠他们的力量来克服一切困难。事实已经证明，正在证明，将要证明，一切我们当前的困难，只要我们真能发动千百万群众起来，并且依靠他们的力量，就是一定能够克服的。一切前进的革命者，是决不应该惧怕群众的，相反的，他们必须依靠群众。

领导群众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要善于使群众根据自身的经验来了解我们的领导的正确。比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开始时不是大多数中国人都能了解与拥护的。当时我们用什么口号使群众根据自身的经验来了解我们的方针的正确呢？这就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对于中国内战的痛苦都是切身感受到的，他们都能够懂得日寇的无限制的侵掠同内战是不能分离的。因此他们也许还不了解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然而对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是热烈拥护的。结果，内战停止了，中国开始统一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了初步的成功。不久卢沟桥事变发生了。当时我们用什么口号使群众根据自身的经验来了解我们的方针的正确呢？这就是“为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而战”。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对于日寇的这种无限制的侵掠已经到了不能再行忍耐的地步，他们都要求抵抗。全国抗战开始了。于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了进一步的成功。在抗战发动之后，我们用什么口号使群众根据切身的经验来了解我们的方针的正确呢？这就是“坚持抗战、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口号。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对于这个口号是能够懂得的，因为谁都可以看到，如果中国今天半途投降妥协，那中国就会亡国，中国人就会变为亡国奴，而亡国奴是不好当的。于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了更进一步的成功。

这不过是举一个例子罢了。不但在提出口号上是如此，即在斗争形式的采用上也是如此。我们要使自己不脱离群众，必须采取那种能够吸引群众参加的斗争形式，他们认为今天可以而且需要的斗争形式，以锻炼他们，提高他们的觉悟程度与组织力量。在斗争形式上是如此，在其他问题上也莫不如此。

不估计群众今天觉悟的程度，而提出很高很“左”的口号，是决然不能动员群众参加运动的。这里需要采取各种过渡的办法来动员他们，再在运动中提高他们走向我们的理想。这里，一切急性病是有害的。这里，领导者的努力工作的精神，要同极大的忍耐心配合起来。群众的觉悟的速度，不但依靠于我们的工作，而且依靠于无数客观的政治经济的要素。革命是决不能凭主观的愿望来制造的。在没有革命形势的时候，特别在反动的黑暗的时期，群众觉悟的速度非常缓慢。那时我们如果没有等待时机的忍耐心，而想用强迫命令的方法去对待群

众，那结果是必然会失败的。所谓等待时机，当然不是不要努力工作，而是把我们的工作放在准备必要的力量上，以便将来革命形势到来时，群众成千成万卷入革命浪潮中时，我们能够站在浪潮的前面负担起领导者的责任。

在群众工作中的命令主义，结果没有不遭受失败的。群众在某种压力之下，可能勉强的服从，然而一切不根据群众自觉的服从，违反于他们意志的服从，最后必然会引起他们反抗并推翻那些压迫者或命令主义者。只有群众自觉的自愿的服从，才能发挥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力量到最高限度，来实现我们远大的理想。所以我们领导群众的中心问题，也就是如何使群众心悦诚服的来接受我们的领导，并且为了我们的理想的实现牺牲一切。这就要求我们在领导工作中善于使群众能够根据自身的经验来了解我们领导的正确。这里，应该反对那些光会喊喊革命口号、唱唱高调的空谈主义者，与企图以强迫命令的方法来“驱使群众为己用”的老爷们！

但是，当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群众觉醒的速度一日千里的时候，我们要谨防自己落后于群众，变为群众的尾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仍然应该站在群众的前面，组织群众的积极性向着一定的目标前进。我们要善于迅速的改变过时的口号，提出新的更高的动员口号，采取大刀阔斧的办法来动员、组织与武装群众，推动群众斗争走向最高的形式。比如在目前被敌人占领区域的广大乡村与战区的情况，就是如此。群众抗日的斗争往往一开始就采取武装斗争的形式。在这里，几天内群众所达到的觉醒程度，可以比上过去的几十年。旧的口号、旧的斗争方式与工作方法等，决不能满足群众今天的要求。群众的民族革命的高潮，会冲开一切这些陈腐的东西，找到他们的新的领导者，走向他们的目的地。

领导群众的第三个问题，就是要向群众学习。一切革命的

经验，都是从群众的实际斗争中创造出来的。离开群众的革命实践，我们就不能有革命的理论。而群众的革命实践是长生的，是无穷的，是永远继续前进着的。它发展与充实我们的理论，它改正我们的错误，它使我们一天一天接近着绝对的真理。所以我们必须在群众斗争中去学习，在这个人生的大海中去学习。我们的学习是没有止境的。

群众的革命实践不断创造出极可宝贵的斗争形式、组织形式、工作方法与方式以及各种极可宝贵的经验。这些群众创造出来的东西，常常是一个领导者，即使是天才的领导者，也不能预料到的。有时一个领导者常常苦于找不到一个适当的斗争形式或组织形式以进一步开展群众运动。但是群众的革命实践常常创造了这种适合的形式。群众对于一个问题所发表的意见，他们对于一个问题的看法与感觉，常常是一个领导者，即使是天才的领导者，也想不到的与感觉不到的。而正是他们的意见，他们的看法与感觉，可以补足一个领导者对于某个问题的理解之不足与缺陷，使某个问题得到圆满的正确的解决。

所以，群众不但需要我们去教育，而且他们也教育我们。我们的青年切不要在群众前面摆资格，自高自大，瞧不起群众，而应该很虚心的去跟他们学习，很细心的去倾听他们的意见，与他们的脉搏一起跳动。

总之，我们在领导群众中的基本原则，是无论如何要领导群众前进，而同时无论如何不要脱离群众。脱离群众的先锋主义与落后于群众的尾巴主义，都是我们所不应该赞成的。

同志们，要把这样广大的、千千万万的、觉悟程度不同的群众动员到为我们的理想而牺牲奋斗的一条战线上，真不是简单的事。要达到这个目的，你们无论如何不要脱离群众，而要成为他们的领袖。

同志们！这就是我今天想同同志们讨论的关于青年的修养

的四个问题。

同志们！我前面已经说过，革命是一件最伟大的事业，也是最困难的事业。我们在革命中犯些错误，甚至是非常严重的错误，是免不了的。至于青年朋友们，由于生活经验与斗争经验的缺乏，犯些错误更不是什么不得了的问题。我们决不能因为怕犯错误，就不干革命。相反的，我们就要在错误中学习。

我们青年人切不要以自己已经有的一点知识与一点经验，甚至一些生吞活剥的革命的公式与口号为满足。这对于青年们是最大的危险，因为这种满足就阻碍了你们的进步，结果必然会使你们成为无用的“空头革命家”。青年们必须以列宁的“学习学习再学习”的口号，当作自己的座右铭。你们今天在陕北公学学习，明天就要到抗战的前线与后方的实际工作中去学习。青年应该有最热烈的学习愿望，很高的学习精神与谦逊的学习态度。只有这种不断的学习，才能丰富你们的知识与经验，才能使你们成为一个能干的革命者，才能使你们更能负担起在自己肩膀上所负担的责任。

我重复的说，工作中的错误是谁也免不了的。我们就要在错误中学习。任何错误，不论为它曾经付了如何高昂的代价，只要我们从错误中得了宝贵的经验，那这种代价也是不算可惜的。所以，我们用不着怕犯错误。但犯了错误，我们应该知道很快的去改正错误，切不要坚持错误。任何错误，如果坚持下去，那是非常危险的。青年人应该打破“爱好面子”、不肯或者害怕承认错误的恶劣倾向。青年人应该“爱好真理”。一切错误的非真理的东西，都应该决然抛弃，丝毫也不应该留恋。只有这样，才能使你们不断的进步。

所以，同志们，你们更努力的去学习革命理论吧，更大胆的去工作奋斗吧，在学习的过程中，在工作奋斗的过程中，去锻炼你们自己成为钢铁一样的战士吧！要不怕困难，不怕挫折

与失败，要不怕天不怕地，要再接再厉地不屈不挠地向着你们光明的伟大的理想前进！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出版的
《张闻天选集》刊印。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对国民党临全大会宣言与纲领立场的指示

(一九三八年四月十八日)

各中央局，各省委、特委：

我们对于国民党代表大会的宣言与纲领应取如下立场：

甲、立在主动地位，取积极赞助与拥护的态度，指出其基本精神同我党的主张是一致的。

乙、用一切方法推动其具体实施，并自己提出实施的具体办法，表示出我们是实施纲领的最积极的力量。

丙、发挥其中一切进步的东西，并根据之以回答及反驳一切对于我们之攻击。

丁、关于其中反对阶级斗争与反对国际主义的理论以及其他缺点，应给以侧面的适宜的解释。

戊、赞助国民党的进步与扩大及三民主义青年团的成立。

中央书记处

四月十八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 党籍的决定

（一九三八年四月十八日）

张国焘已于四月十七日在武汉自行脱党。查张国焘历年来在党内所犯错误极多，造成许多罪恶。其最著者为一九三五年进行公开的反党反中央斗争，并自立伪中央以破坏党的统一，破坏革命纪律，给中国革命以很多损失。在中央发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路线后，他始终表示不满与怀疑。西安事变时，他主张采取内战方针，怀疑中央和平方针。此次不经中央许可私自离开工作，跑到武汉，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路线表示不信任，对中国革命的光明前途表示绝望，并进行破坏全国抗日团结与全党团结的各种活动。虽经中央采取各种方法促其觉悟，回党工作，但他仍毫无改悔，最后竟以书面声明自行脱党。张国焘这种行动当然不是偶然的，这是张国焘历来机会主义错误的最后发展及其必然结果。中共中央为巩固党内铁的纪律起见，特决定开除其党籍，并予以公布。

一九三八年四月十八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 党籍的党内报告大纲

（一九三八年四月十九日）

甲 张国焘脱党的经过

（一）四月二日张国焘以祭中部黄帝陵为名，不经中央允许，自行跑到西安，与当地要人接洽，备受他们优待与保护。住西京招待所二天，不住八路军办事处。只是当他在七日决意逃跑，登上当地要人所备专车时，才用电话找林伯渠同志至车站谈话。谈话时，企图以造谣污蔑、挑拨离间的手段破坏党内团结。中央在接到林同志报告之后，即估计他已走上了脱党的道路，但为最后挽救他，故即致电武汉中央同志，寻找他，劝导他，促其觉悟，回党工作。

（二）张到武汉后，未去八路军办事处，亦未找党，在党外人的秘密保护之下，开旅馆居住。当中央同志将他找到与之谈话时，他公开表示自己已对革命已经动摇，对党的总路线与党均表示不信任，对革命前途表示绝望，不愿再干革命。经中央同志多方劝导之后才勉强搬入八路军办事处。

（三）他住办事处时，曾见蒋介石先生一次，开始即向蒋介石先生说：“在外糊涂多时”，完全失去了共产党员的立场。在回办事处时，又中途逃脱，经办事处同志多方寻找之后，才找回办事处。在办事处期间曾见过陈独秀一次，并遍访当地要人，到处进行破坏民族抗日团结与党的团结的各种挑拨离间的

活动。最后他自己决定同国民党特务机关某负责人见面，并由该负责人派武装汽车将他接去，从此即不知其所在。

（四）张到汉后，中央曾多方设法劝导，促其悔悟，要他回党工作，万一不愿回党工作，亦望他向党请假，暂时找一适当地点，或在国内，或在国外，或到国际去，以便改变其思想。但均被拒绝，而在他于四月十七日见了国民党特务机关某负责人后，即以书面申明自己最后脱离的决心，于是中央乃于十八日最后决定开除其党籍，并公布此决定。

乙 张国焘脱党的历史根源

（一）张国焘是中共党内老党员之一，也是犯错误最多的一人。他开始曾做过工人运动，在工作中即进行无原则的小组织活动。在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时，他在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坚决反对国共合作及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路线。在第一次大革命中，他又是当时机会主义领导者陈独秀的左右手。大革命失败后，他曾对革命表示极大的动摇，同情陈独秀。在中共六次代表大会上，他又是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进行小组织活动，反对中央。因他历次的严重错误，曾被留国际三年余，给他学习机会，改正错误。但他在国际不但不曾改正错误，反而参加了反党的小组织活动，并联合过托派分子。后来，几次写悔过书，承认自己的错误，国际方才允许他回国工作。

（二）他回国时已在反立三路线的四中全会之后（一九三一年），当时，他在工作中表示积极，以图取得中央的信任。不久，即被派往鄂豫皖苏区担任领导工作。开始时，尚能执行四中全会的路线。但在工作中又进行其小组织活动，以个人的野心为出发点，用无原则的官僚政客手段，拉拢干部，打击坚决拥护国际与中央路线的沈泽民同志。这些事实均证明张国焘

始终以两面派的手段掩盖他的机会主义的政治面目。

(三) 在川陕苏区时，他的机会主义倾向又逐渐发展。由于对于中国革命的悲观失望，最后形成整个错误的退却逃跑的政治路线。从退出川陕苏区到与中央会合，又与中央分裂，成立伪中央为止，是他的错误登峰造极的时期（关于他那时的错误，见一九三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议）。他在那时犯了无数为一个共产党员所不应犯的错误，造成了很多不可宽恕的罪恶，违犯一切党纪军纪，给了中国革命以很大的损失。

(四) 由于他的错误领导的无出路，军中党内大多数干部的不满意与中央的正确路线和宽大政策，所以最后他不能不被迫取消伪中央，率领队伍北上与中央会合，表示暂时屈服。后来他又写了几次声明书，承认自己过去的错误。但对于中央当时所采取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始终表示怀疑与不满。西安事变时，坚决主张谋害蒋先生及发动内战的方针，同中央的和平方针相对立。在这期间，他仍然处处以两面派的手段来掩盖自己的严重错误。

(五) 张国焘的脱党是有他的一贯的历史根源的，这是他的机会主义的最后发展及其必然结果。

丙 张国焘何以在统一战线成立之后 与抗战紧张之时脱党呢？

(一) 与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民族自卫战，其中必然要经过与克服无数的困难与曲折，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张国焘在抗战未发生之前，即对革命表示悲观，对抗日表示绝望，因此形成了他的退却逃跑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抗战发生之后，他经不起这种残酷的长期的斗争，以至在日寇的横暴的进

攻前面表示投降，而离开了最坚决抗日的中国共产党。

（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华民族求得最后解放的唯一正确路线。本党是这一路线的最坚决的主张者与执行者，因此，本党和国民党合作是出于至诚的，而不是暂时的与敷衍的。但本党是无产阶级的党。为彻底实现民族解放的任务以及将来共产主义的任务，本党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的保持是绝对必要的。但张国焘始终不了解这一点。在国共合作尚未成立以前，他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表示怀疑与不满，在国共合作已经成立之后与正当抗战紧张之时，他又转到另一极端，走到投降国民党。

（三）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是长大起来了，党的影响也扩大了。无数纯洁的革命分子要求在党的领导之下工作奋斗，并大批的加入党。但是，在另一方面，党内最少数最不坚定的分子，经不起这个民族革命的浪潮，在资产阶级的影响之下，在其挑拨离间与各种诱惑之下，发生动摇腐化，丧失了阶级的立场以至个别的脱离党。这种个别脱离党的现象是不足为怪的。最近如周昆、张绍东、李龙贵等的逃跑，就是由于这个原因产生的。张国焘的脱党，外界对他的这种影响也不能不是一个原因。对于资产阶级这种影响，我们不能有过分的夸大的估计，因为这只能够影响个别的动摇分子。党就要在清洗这些投降资产阶级的动摇分子的斗争中来巩固自己的团结与力量。但对于这种影响是值得我们严重注意与十分警惕的。

（四）党在中央的正确路线的领导下，得到了很大的成功，在思想上、组织上更加布尔塞维克化了。党的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得到全国人民的同情与拥护。八路军在抗战前线的胜利与模范的作用，更加扩大了党的影响，提高了党的威信。全党同志像一个人一样团结在中央的周围，为中央的路线而奋斗。过去受过国焘路线影响的同志，

也因中央正确的开展了反国焘路线的斗争，都能了解到国焘路线的错误，而拥护中央路线了。因此，在两面派掩盖之下的反党的张国焘路线得不到党内任何同志的同情与拥护，他的反党的言论与活动，处处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张国焘在党内是孤立了，他在党内寻找群众的一切企图是失败了。于是他只有从党内跑出去，在党外去寻找反党的同盟者，他的会见陈独秀，当然不是偶然的，这就是张国焘脱党以后的前途。

丁 党对张国焘脱党的态度

（一）中央对于张国焘过去的错误曾一贯的采取了教育与说服的方针，就是在他犯了成立伪中央的那样严重错误之后，中央仍本宽大精神用一切方法多方诱导，并仍分配他以负责的工作，给他以悔过自新的机会。然而，一切这些仁至义尽的方法终究挽救不了这个腐朽的机会主义者的没落。中央过去对于挽救一个犯错误的党员实已尽了最大的努力。

（二）张国焘的出党对于本党不但不是什么损失，而是去掉了—个腐朽的不可救药的脓包。这使我党清洗了自己的队伍，使我党更能健康的与巩固的向着自己光明的前途迈进。

（三）在清洗张国焘这种叛党分子中间，各级党部更应该坚持民族抗战，坚持扩大与巩固民族统一战线以最后战胜日寇的总路线，加强同各种机会主义倾向、同一切个人野心的派别的无原则的破坏纪律的行动以及同生活上的腐化现象做坚决的斗争，以教育全党同志，巩固党内布尔塞维克的统一与团结。

（四）在反对张国焘这种叛党分子中间，各级党部应该加紧向全党同志解释统一战线中共产党的作用与意义，使他们清楚了解，扩大与巩固统一战线是与扩大巩固共产党不可分离的，应该加紧对全党同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使他们能

够灵活的使用这个尖锐的武器去为民族解放的事业与共产主义的事业而奋斗。

（五）中央对于坚决反对张国焘叛党行为与坚决拥护国际和中央路线、忠实于民族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同志，不论他过去是否受过张国焘的影响与是否犯过错误，都是一致爱护的。各级党部不得因反对张国焘的叛党行为而无根据的牵涉到或怀疑到任何忠实同志。同时，估计到张国焘出党之后必然从党外千方百计的破坏党的政治影响与组织力量，各级党部及全体同志，必须提高自己政治上与组织上的警惕性，严防张国焘的挑拨离间、欺骗煽惑与破坏。

（六）让张国焘等这类腐化的叛党分子滚出去吧。更加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加巩固与加强党的团结与一致。吸收成千成万的优秀的革命分子到党内来，回答这些东西的叛党吧。

让我们全体忠实的共产党员高举起马克思与列宁的旗帜，为最后战胜日寇，为民族的、社会的与共产主义的事业而奋斗到底！

中共中央

一九三八年四月十九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刊印。

毛泽东等关于巩固与发展晋察冀根据地问题给聂荣臻等的电报

(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日)

荣臻彭真二同志并致朱彭⁽¹⁾：

十日来电，今天才到。

甲、由于各种顺利条件与你们领导和同志们的努力，使冀察晋广大地区的抗日运动在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发展，根据地的建立，已经大体成功，但在各方面都还不是巩固的。目前你们的任务中心是在各方面巩固已得的胜利，并在巩固现有的基础上去继续发展。

乙、你们的胜利和发展，大大地威胁日寇的根据地——平津，日寇必然想尽一切方法来进攻与破坏你们。除开采用残酷武装进攻外，更必然要派遣和收买大批的汉奸、流氓、土匪混入各党、政、军、群众团体，特别是军事组织中来，进行阴谋破坏。路东党委负责人的被暗杀以及党内和军队内的各种无原则纠纷，难免没有敌人的阴谋作用存在，这应该引起你们的严重注意。

丙、为了迅速巩固你们的力量，以便继续更大的发展，我们提议：

(一) 加强对部队的整理训练及党的工作，刷洗混入部队中的流氓、土匪等不良的分子，考察并团结各级干部，慎重而切实地建立部队的保卫工作。

（二）肃清根据地内部的土匪，采用慎重而有效的办法，改造那些土匪式的抗日部队。加强地方上的除奸工作，恢复与建立抗日的秩序。

（三）除派黄敬去路东整顿党的工作外，应即从王平、刘道生、赵尔陆三同志中派一人去路东任吕⁽²⁾部政治委员，并兼省委军事部长，或成立路东军分区司令部，切实整理吕孟⁽³⁾两部。在吕部整理就绪后，可分出一部分兵力随邓华部队向冀东热边发展。

（四）巩固党的组织和党内的团结与统一，提高铁的纪律。在目前，任何破坏党内的团结与统一的行为，都是最大地帮助了敌人。严厉地批评与纠正一切小组织的行动，加强对于党内原则的教育，提高党与主要干部在群众中的威信。

（五）在群众运动中，纠正某些过左的行动与行会倾向，和缓地主富户对于我们的恐惧与反对，但中心工作仍在发动群众抗战热潮，建立真正强有力的群众团体，进行切实的组织工作。

（六）政府组织方式不必再有更多的变更。主要的工作除广泛组织训练自卫军外，就是筹集经费与粮食，解决部队给养。筹款方法除经常的税收捐款外，要注意向汉奸筹款。可组织特别的队伍，到铁路车站及城市附近去没收与逮捕汉奸。我们没有可能大批帮助你们的经费。

丁、延安的干部已大批派出，你们所要的高级干部，待查清后看是否可能派一二人来，下级干部可再派一些到你处。文件、电台当设法经晋西北送你们。

戊、你们应设法与天津建立交通，调平津一批干部到你处工作。

毛泽东 洛甫 胡服⁽⁴⁾

二十日

根据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刊印。

注 释

- 〔1〕指朱德、彭德怀。
- 〔2〕指吕正操。
- 〔3〕指孟庆山。
- 〔4〕即张闻天、刘少奇。

毛泽东等关于发展平原游击战 问题给朱德等的电报

（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一日）

朱彭，刘徐邓转陈陈，朱瑞，宋，聂荣臻，彭真，尚昆^{〔1〕}诸同志：

甲、根据抗战以来的经验，在目前全国坚持抗战与正在深入的群众工作两个条件之下，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广大地发展抗日游击战争是可能的，而且坚持平原地区的游击战争也是可能的。

乙、党与八路军部队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应坚决采取尽量广大发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尽量发动最广大的群众走上公开的武装抗日斗争。秘密的抗日斗争只有在敌人统治的城市与铁道附近才成为主要的方式。

丙、根据上述方针，应即在河北、山东平原划分若干游击军区，并在各区成立游击司令部，有计划地系统地去普遍发展游击战争，并广泛组织不脱离生产的自卫军。

丁、在收复的地区应即建立政府，设法多少恢复当地的抗日秩序。这些政府由上级或司令部委任，或由民众团体推选，都跟随一个游击队行动，发布简单的布告与法令，组织民众抗日斗争，镇压汉奸，保护民众利益，帮助部队筹措给养等。

戊、在范专员、丁专员^{〔2〕}地区，仍有原来的政府，应即经过统一战线的推动，迅速改造与加强政府，使之成为人民的抗

日政府，吸收坚决有能力的分子参加进来，洗刷腐化无能的分子，使政府、部队、人民密切联系起来。

己、吸收民间的枪支加入游击队与军队，要采用宣传说服及借枪（可给借枪证）的办法，或发动民众自带枪支来当游击队。筹粮筹款，以自愿及公平摊派为原则，并注意逮捕城市及车站的大汉奸筹款。

庚、以人民自卫军为主要的群众组织形式，可能时再组织农会及青年团体。

辛、对于会门、土匪采取慎重的态度去应付，依据具体可能条件去改造他们。

壬、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大部分的党员宜以抗日积极分子面目出现，担负各种公开工作。

癸、发展党的组织，一般要保持秘密。

毛 洛 胡⁽³⁾

二十一日

根据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集》
第二卷刊印。

注 释

〔1〕指彭德怀，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陈赓、陈再道，宋任穷，杨尚昆。

〔2〕范专员，指山东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范筑先。丁专员，指河北濮阳专区（今属河南省）专员（又称直南专员）丁树本。

〔3〕指张闻天、刘少奇。

中共中央书记处 关于国民党临全大会后的策略问题 给陈绍禹、周恩来、秦邦宪、 何克全的电报

(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七日)

二十三日来电收到。我们中间实并无不同意见，为免除误会起见，特为如下说明：

(甲) 今天全国政治总的方面是坚持抗战的最后胜利，国民党纲领的基本精神正是朝着这个方向的。在这个方向上说来，我党十大纲领（除此纲领外还没有其他整个纲领）同国民党纲领应说基本上是一致的。我们坚决赞助其实现，亦即为此。至于其中缺点与不足处，我们在赞助的基本方针下，给以充实与发展，其中错误处，亦应在此方针下给以侧面的解释与适当的批评。

(乙) 全国最大多数人民对于国民党纲领基本上是赞成的，但是他们担心的是国民党过去“决而不行”的习惯。一部分顽固分子则表示消极抵抗。在国民党内部，一切进步的分子对纲领表示极大的兴奋，并愿为其实现而工作，而顽固派则表示冷淡，而且正采取各种方法来阻碍纲领的实施与曲解纲领。围绕在纲领周围，将发生积极拥护的与消极抵抗的两派的斗争，国民党内部亦将深入左右分化。共产党站在主动的积极拥护纲领并促其具体实施的立场上，不但能够取得全国最大多数人民的同情与拥护，依靠他们的力量同一切顽固分子做斗争，而且也

能够取得国民党内一切进步分子的赞许，使他们更能勇敢的团结他们的力量同顽固派斗争。

（丙）今天的中心策略，不是要国民党定出一个更完善的纲领，而是站在主动的积极地位，帮助国民党实施这个纲领，在实施中发展与提高他。在抗战继续发展的过程中，只要今天认真的实施这个纲领，那这个纲领明天就会要求进一步的充实与修正，而更急进的更高的纲领的提出，仍然是可能的。

（丁）我们党对国民党一切口头上要做的好东西，如扩大国民党、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都应该采取积极赞助的态度，使全国最大多数人民与国民党中一切进步分子，看到共产党同国民党合作的诚意，以争取他们对我们的同情与拥护，并且这样也可认真的推动国民党进步，这种进步在坚持抗战中是必要的与可能的。这时共产党应该做出一些模范，起领导作用。如果国民党不管我们的赞助，而仍然不能把自己所说的话实现起来，或把原来企图进步的东西变坏，如青年团的变为特务机关，那人家决不会责备共产党的赞助不好，而只会骂国民党的顽固派混蛋。今天国民党当局还不能把改造国民党建立青年团的事做好，然而将来进步的可能是存在着的。

（戊）国民党的一切进步的设施，都包含有同我党争取领导权、孤立我党的一面在内。我们赞助他们的一切进步的东西，即使口头上的允诺与企图也好，不但不使自己孤立，而正是替自己开辟更有利的场所。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刊印。

毛泽东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

（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八日）

你们要我来讲几句话。可是我不熟悉艺术方面的问题，只能贡献一些粗浅的意见给你们参考。

一、我们对艺术应持什么观点？在这个问题上，过去中国有过很大的争论。大家可能知道，徐志摩先生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诗要如银针之响于幽谷”，银针在幽谷中怎样响法，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是一个艺术至上主义者。那时像他这样主张的人很多，他是这方面的一个代表。另一方面是鲁迅先生所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艺术论者。他们在艺术论上的争论，有长期的历史，现在不能去细说它。艺术至上主义是一种艺术上的唯心论，这种主张是不对的。但现在为了共同抗日在艺术界也需要统一战线，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不管他是写实主义派或是浪漫主义派，是共产主义派或是其他什么派，大家都应当团结抗日。当然对我们来说，艺术上的政治独立性仍是必要的，艺术上的政治立场是不能放弃的，我们这个艺术学院便是要有自己的政治立场的。我们在艺术论上是马克思主义者，不是艺术至上主义者。我们主张艺术上的现实主义，但这并不是那种一味模仿自然的记流水账式的“写实”主义者，因为艺术不能只是自然的简单再现。至于艺术上的浪漫主义，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它有各种不同的情况，有积极的、革命的浪漫主义，也有消极的、复古的浪漫主义。有些人每每望文生义，鄙视浪漫主义，以为浪漫主义就是风花雪月哥哥妹妹的东西。殊

不知积极浪漫主义的主要精神是不满现状，用一种革命的热情憧憬将来，这种思潮在历史上曾发生过进步作用。一种艺术作品如果只是单纯地记述现状，而没有对将来的理想的追求，就不能鼓舞人们前进。在现状中看出缺点，同时看出将来的光明和希望，这才是革命的精神，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有这样的精神。

中国文艺界还曾有所谓“第三种人”^{〔1〕}，在今天我们也并不排斥他们。今天第一条是一切爱国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二条才是我们自己艺术上的政治立场。艺术上每一派都有自己的阶级立场，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劳苦大众方面的，但在统一战线原则之下，我们并不用马克思主义来排斥别人。排斥别人，那是关门主义，不是统一战线。但在统一战线中，我们不能丧失自己的立场，这就是鲁迅先生的方向。你们鲁迅艺术学院要遵循鲁迅先生的方向。

二、艺术作品要有内容，要适合时代的要求，大众的要求。作品好比饭菜一样，要既有营养，又有好的味道。中国人是最会做饭菜吃的，做菜的时候适当地调配各种材料，加上油盐酱醋各种佐料，经过巧妙的烹调，便产生一种美味，并且保持了营养成分。大师傅做得一手好菜，要有一个长期实践的过程，不是学一天便做得好的。他们做菜，用的材料和别人一样，却能做出好的味道来，这就要研究各种材料的调配和时间火候的掌握。艺术至上主义者是只注重味道好不好吃，不管有没有营养，他们的艺术作品内容常常是空虚的或者有害的。艺术作品要注重营养，也就是要有好的内容，要适合时代的要求，大众的要求。比如现在唱京戏，在戏报上已经看不见《游园惊梦》之类的东西了，因为那样的戏在今天卖不了座。演旧戏也要注意增加表现抗敌或民族英雄的剧目，这便是今天时代的要求。艺术作品还要有动人的形象和情节，要贴近实际生

活，否则人们也不爱看。把一些抽象的概念生硬地装在艺术作品中，是不会受欢迎的。

三、鲁迅艺术学院要造就有远大的理想、丰富的生活经验、良好的艺术技巧的一派艺术工作者。你们不应当是只能简单地记述社会生活的艺术工作者，而应当有为新中国奋斗的远大理想。这就是说，不但要抗日，还要在抗战过程中为建立新的民主共和国而努力，不但要为民主共和国，还要有实现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的理想。没有这种伟大的理想，是不能成为伟大的艺术家的。但只有理想还不行，还要有丰富的生活经验与良好的艺术技巧。中国近年来所以没有产生伟大的作品，自然有其客观的社会原因，但从作家方面说，也是因为能完全具备这三个条件的太少了。我们的许多作家有远大的理想，却没有丰富的生活经验，不少人还缺少良好的艺术技巧。这三个条件，缺少任何一个便不能成为伟大的艺术家。

鲁迅先生在《毁灭》的后记中说到，《毁灭》的作者法捷耶夫是身经游击战争的，他描写调马之术写得很内行。像上马鞍子这类细微的动作，《毁灭》的作者都注意到了，鲁迅先生也注意到了。这告诉我们，大作家不是坐在屋子里凭想像写作的，那样写出来的东西是不行的。《红楼梦》这部书，现在许多人鄙视它，不愿意提到它，其实《红楼梦》是一部很好的小说，特别是它有极丰富的社会史料。比如它描写柳湘莲痛打薛蟠以后便“牵马认镫去了”，没有实际经验是写不出“认镫”二字的。事非经过不知难，每每一件小事却有丰富的内容，要从实际生活经验中才会知道。你们是青年艺术工作者，现在的大千世界都是属于你们的，都是你们活动的园地。你们的艺术作品要有充实的内容，便要到实际生活中去汲取养料。你们不能终身在这里学习，不久就要奔赴各地，到实际斗争中去，正如你们唱的《游击队员之歌》中所说的，“我们都是飞行军，

哪怕那山高水又深”。你们不但要在口里唱，而且要实际地去那样做。没有丰富的实际生活经验，无从产生内容充实的艺术作品。要创造伟大的作品，首先要从实际斗争中去丰富自己的经验。艺术家固然要有伟大的理想，但像上马鞍子一类的小事情也要实际地研究。过去一个研究《红楼梦》的人说，他曾切实地把大观园考察过一番。现在你们的“大观园”是全中国，你们这些青年艺术工作者个个都是大观园中的贾宝玉或林黛玉，要切实地在这个大观园中生活一番，考察一番。你们的作品，“大纲”是全中国，“小纲”是五台山。要把中国考察一番，单单采取新闻记者的方法是不行的，因为他们的工作带有“过路人”的特点。俗话说：“走马看花不如驻马看花，驻马看花不如下马看花。”我希望你们都要下马看花。

到群众中去，不但可以丰富自己的生活经验，而且可以提高自己的艺术技巧。夏天的晚上，农夫们乘凉，坐在长凳子上，手执大芭蕉扇，讲起故事来，他们也懂得胡适之先生的八不主义⁽²⁾，他们不用任何典故，讲的故事内容却是那么丰富，言辞又很美丽。这些农民不但是好的散文家，而且常是诗人。民歌中便有许多好诗。我们过去在学校工作的时候，曾让同学趁假期搜集各地的歌谣，其中有许多很好的东西。这里存在着一个极大的不协调，就是有丰富的生活经验与美丽言辞的人不能执笔写作，反之，许多能写作的人却只坐在都市的亭子间，缺乏丰富的生活经验，也不熟悉群众生动的语言。我们都知道高尔基，他的生活经验丰富极了，他熟悉俄国下层群众的生活和语言，也熟悉俄国其他阶层的实际情形，所以才能写出那样多的伟大作品。

至于艺术技巧，这是每个艺术工作者都要学的。因为没有良好的技巧，便不能有力地表现丰富的内容。艺术技巧是多方面的，并不只限于语言。但是，对于艺术工作者来说，掌握语

言的能力确是非常重要的。我看鲁迅先生便是研究过大众语言的。你们一定要下一番苦工夫去学习和掌握艺术技巧。

要做伟大的艺术家，必须具备以上所说的三个条件，缺一不可。现在，我们阵线上有些人所写的东西，缺乏丰富充实的内容，不合于客观的实际，艺术技巧也比较粗糙。这种缺点我们一定要努力克服。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二卷刊印。

注 释

〔1〕一九三二年七月，苏汶（即杜衡）在《现代》杂志发表《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一文，自称“第三种人”，宣扬超阶级的文艺，受到鲁迅、瞿秋白的批评。

〔2〕胡适在一九一七年和一九一八年先后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和《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将自己对文学改良的主张归纳为“八不主义”：一、不做“言之无物”的文字。二、不做“无病呻吟”的文字。三、不用典。四、不用套语滥调。五、不重对偶；——文须废骈，诗须废律。六、不做不合文法的文字。七、不摹仿古人。八、不避俗语俗字。

陈绍禹、周恩来、秦邦宪答复 子健先生的一封公开信

（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八日）

本报接到中共领导人陈绍禹、周恩来、秦博古三先生给子健先生之复信及子健先生与陈、周、秦三先生之信，信中所谈问题与抗日各党派团结救国等问题有关，特为发表于左，以饷读者。（编者）

子健同志！

四月二十六日来信收到。你来信所提的两个问题，最近还有两个同志来信问过，所以我们决定把你的信发表，并公开答复你，同时，也就作为对其他两同志来信的答复。

首先应当指明的，就是你对于这两个问题的了解和解释，基本上都是正确的。这证明我党同志对于目前政治问题及党的问题，平时能严格注意和正确了解，这是值得欣慰的事。

为的使你和其他同志对这两个问题有更具体更深切的了解，兹特详为解答如次：

关于第一个问题的第一部分，即国共两党关系问题，更具体些说，即中国共产党是否准备最近也如国家社会党一样致函国民党，表明共产党对国民党及对三民主义态度问题。你的了解是对的。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三五年八一宣言时起，即表示愿与国民党及一切党派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九三六年八月

中共中央曾专门致书国民党，提议恢复两党合作；一九三七年二月国民党三中全会时，中共中央曾向三中全会提供两党具体抗日救国合作的基本纲领和办法；去年卢沟桥事变及“八一三”全面抗战开始后，国共两党关系迅速确定和增进；因而有去年九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宣言的发表及蒋^[1]先生在九月二十四日谈话的发表。在去年九月二十三日宣言中，中共中央不仅又一次坦白说明自己抗日救国的内容，而且又一次恳切说明中共对国民党及中山先生手订的三民主义基本方针的赞助和拥护的立场。同时，在蒋先生的九月二十四日谈话中，正式代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自此以后，在抗战以来的整个时期中，国共两党关系日益增进，已为举世公认的事实。因此，确如来信所说，共产党没有再重复一次类似去年九月已经发表的说明国共关系一类的文件的必要。至于最近国家社会党上书蒋汪^[2]两总裁于先，中国青年党致函蒋汪两总裁于后，表明他们赞同三民主义的最高原则，并愿与国民党共赴国难；同时，蒋汪两总裁复函慰勉并在实际上承认国家社会党及青年党的合法地位，这的确是值得欣慰的事情。这不仅是使最近以前一时期所谓党派问题的争执（即国民党以外，中国是否应允许其他党派合法并存问题）得到光明合理的事实上的解答，而且是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与扩大。盖除国共两党之外，应吸收一切抗日党派和群众团体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本为中共夙来一贯之主张，今竟能逐步见诸事实，中共同志当然对之表示无限欢迎和快慰。至于第一个问题中的第二部分问题，即共产党对于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所通过、发表的宣言及抗战建国纲领的态度问题，来信所谈，一般的也正确，不过有更深刻更具体了解的必要。首先要说明的，即中共中央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以前，的确曾给大会一个建议书。不过当时因某种关系，国民党在大会开幕前不

便宣布召集大会及开幕日期和地点问题，所以中共中央也不便将其致大会建议书发表。现在因许多同志和朋友亟欲知道这一建议书的内容，兹特将全文披露于左：

“蒋先生转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全体代表同志们！

当大敌当前河山破碎之时，我炎黄子孙——首先是我国共两党同志，能毅然亲密携手共御外侮，在前线共同流血牺牲、奋勇杀敌，在后方共同艰苦奋斗、努力救国，这不仅证实我中华民族的伟大，而且预示我中华民族的复兴。当目前寇敌深入和第二期抗战积极进行之际，加紧巩固和扩大我四万五千万同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首先是巩固和扩大国共及其他一切抗日党派的合作，加强政府与民众间的互助，已成为国共两党同志和全体爱国同胞的一致热望。

贵党适于此时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想对于如何改进贵党本身工作，如何加强国内的团结，以及如何发扬民意，以便争取抗战胜利和完成救国建国大计等问题，当有所讨论。敝党仅以兄弟之谊，对上述各问题向贵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提供意见，以资参考：

（一）关于巩固和扩大各党派的抗日救国的团结问题——只许一党合法存在，同时不承认其他党派合法并存的办法，既为事实所不许；取消现存一切党派而合并为一党组织的办法，亦为事实所不能。解决此问题的唯一正确办法，在于遵照中山先生的精神，建立一种包括各党派共同参加的某种形式的民族革命联盟，即由各党派各团体拟定一统一战线纲领，作为各方宣传共同遵守的方针。同时，由各方代表组成一由上而下的（即中央与地方的）统一战线组织，以规划抗日救国的大计和调整各党派各团体的关系。而参加此联盟之各党派，仍保存其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统一战线纲领的内容，敝党愿与贵党及各方代表共同商讨和拟定；其发表方式，或由各党派各团体

共同签名发表，或由贵党，或由蒋先生名义发表，然后由各党派各团体宣言拥护和遵守，均无不可。统一战线组织形成的方式，或采取各党派各团体选派代表组织各级组织的方式，或恢复民国十三年至十六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方式，或拟定其他的办法和方式，只要与团结抗战有利，敝党均愿与诸同志共同计议和执行。

（二）关于健全民意机关问题——为增强政府与人民间的互信和互助，为增加民众和政府抗战救国的效能，健全民意机关的设立，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民意机关的形式，或为更扩大的国防参议会，或为国民大会，或为其他形式，均无不可。最主要地，在于此机关要真能包括抗日各党派、各军队、各有威信的群众团体的代表，即包括真能代表四万五千万同胞公意的人才。同时，此机关要真有不仅建议和备政府咨询的作用，而且能有商讨国是和谋划内政外交的权力。

（三）关于动员和组织民众问题——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自卫战争的胜利，不仅需要政府和军队的最大努力，而且需要广大民众的全体动员和积极参加，这是古今中外再三考验过的真理。我国对日抗战虽已继续八个月之久，但民众动员和组织的不够，已成为前方将士和全体同胞所痛切感到的弱点。

贵党为中国第一大政党，在政府和军队中均居于领导地位，对于抗战中这一最大严重的弱点，当能积极设法加以补救。关于此问题，敝党敬向贵党提议：将工农军商学各界，根据其职业地位而组成各种职业联合团体，即：将已有组织的群众团体，加以健全和充实；将还无组织的民众，组织在各种群众团体以内去；同时，根据地域原则，在各地方组织统一的各界群众团体的领导机关；在全国范围内，成立统一的全国性的领导机关。青年、妇女、文化界等应根据其切身利益和特殊需

要而组织成各种统一的群众团体，以便真正实行‘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原则，以便真正达到全国人民物力财力总动员的目的。当然，所有群众团体及其领导机关，均应向政府机关登记，并接受政府及党部的领导。敝党愿尽力赞助贵党在抗日救国大前提下，造成统一的群众运动和统一的群众组织。

以上各项提议，敬请贵党中央委员会和临时全国代表会代表列入贵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提案，作为研究和讨论的参考。此外，敝党拟派代表团列席贵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同时，并预请贵党选派代表团将来出席敝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示两党同志兄弟般友爱与团结。贵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当能大有裨益于全国精诚团结和争取抗战胜利的伟业。敝党中央委员会谨代表敝党全体同志预祝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抗日救国事业中的伟大成功。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三八年三月一日”

由此可见，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未开幕以前，中共中央即以最大的注意力和热忱来赞助大会的工作。在这一建议书中，中共中央不仅向大会提供自己当前几个重要政治问题的意见，而且预祝大会的成功，并相信大会的决议能大有裨益于全国精诚团结和争取抗战胜利的伟业。在国民党临时全国大会开幕的前一天（三月二十八日）《新华日报》的社论，实际上即为这一建议书的主要内容。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抗战建国纲领四月二日夜交各报发表时，当日因《新华日报》收到宣言较迟，收到纲领更迟，来不及撰述社论，但当即对大会宣言发表短评，称之为“一个有严重意义的大会宣言”。在这个短评里说：“当寇敌深入和第二期抗战积极进行之际，领导我国军民抗战的第一个大的政党——国民党，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因此，全国同胞一致热望着国民党这一临时代

表大会的决议，大有助于抗战救国的事业，本日各报发表的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一方面表示出国民党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又一次坚决地昭示着抗战到底和抗战必胜的毅力和信心，另一方面明显地表示出国民党领袖和全体同志对于建国事业的希望和计划。这一个宣言，对于国民党本身工作的今后工作，对于全中国同胞当前的救国事业，无疑地均有严重的意义。我们曾诚挚地预祝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成功，我们更热烈地希望国民党在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后，能更加努力去加强国内各党派抗日救国的大团结，能更加积极去加强民众与政府的互助，能更加提高我军将士的抗战精神和抗战信心，以加速我国抗战胜利和建国成功的伟大历史时期的到来。”次日，四月四日，《新华日报》立即又发表社论，命题为《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的成就》。社论一开始便说：“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于四月一日闭幕，通过了宣言和抗战建国纲领和关于党务决议案，并选举蒋委员长为国民党总裁。就已发表的文件看来，这次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是最近十年来国民党最有历史意义的一个会议，因为这次会议表现了国民党更向前的进步，对于抗战时期许多重要的国策，更确定了基本的方针。”社论接着历举大会宣言和纲领中所明白昭示的对内对外的政策以及对于三民主义的阐述。在结尾时，社论以极恳切的态度说：“国民党这次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成就，正是中国继续抗战和争取胜利的重要步骤，我们深望这些进步的继续发展，这些成就的一一实现。”此外，《新华日报》四月五日之社论为《抗战与改善民生》，四月六日之社论为《抗战中的民权主义》，四月九日之社论为《抗战与外援》，均为根据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和纲领的基本精神而对内外政策加以发挥和建议的。

《新华日报》为代表中共主张之报纸，为中外公认之事实。故《新华日报》这几篇社论之主张，即为中共对国民党临时代

表大会的宣言和抗战建国纲领的响应，这是明白无比的事实。从这些社论当中，任何人不仅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和纲领作恳切的响应，而且有热忱具体的建议。由此可见，张国焘在其声明中，企图借对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的宣言和抗战建国纲领为更恳切的响应一层，作为他与中共中央的分歧点，显然是毫无根据而白费精力的。

我们愿利用回答你的信的机会，再一次说明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宣言和纲领的态度。我们认为此次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宣言和纲领，对于抗战建国问题有重要的意义，宣言和抗战建国纲领所提出的我国抗战时期的一般施政方针，我们是赞同拥护的。它和中共中央历次发表的抗战时期的政治纲领的基本方向，是共同的。不过有一点，我们还未得到国民党中央明白指明的，就是这一纲领发表时命名为《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因而我们到现在还不清楚知道：国民党领导机关是把这一纲领只作为国民党一党的纲领，还是用国民党大会名义提出交各党派及各团体共同讨论和研究，以便得到各方意见而变成抗战时期各党派各团体共同遵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纲领。关于这一问题，中共中央准备再与国民党领导方面交换意见。

关于第二个问题，即中央开除张国焘党籍的问题，《新华日报》四月二十二日所发表的《中共中央开除张国焘党籍决议》，已经简明地指出张国焘被开除出党的原因，原文如左：

“张国焘已于四月十七日在武汉自行脱离中国共产党。查张国焘历年在党内曾犯错误极多，造成许多罪恶，其最著者为一九三五年进行公开的反党反中央斗争，并自成立伪中央，以破坏党的统一，破坏革命纪律，给中国革命以很多损失。在中央发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路线，他始终表示不满与怀疑。西安事变时，他主张采取内战方针，怀疑中央的和平方针。此次

不经中央许可，擅自离开工作，跑到武汉，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路线表示不信任，对中国革命的光明前途表示绝望，并进行破坏全国抗日团结的各种活动，虽经中央采取各种方法促其觉悟回党工作，但他仍然毫无改悔，最后竟以书面申明，自行脱离党。张国焘这种行动，当然不是偶然的，这是张国焘历来机会主义错误的最后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共中央为巩固党内的铁的纪律起见，特决定开除其党籍，并予以公布。”

由此可见，张国焘之所以被开除出党的直接原因，是由于他因为在政治上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信任及对于中国革命的光明前途表示绝望，因而走到在组织上破坏党的纪律，自由离开工作，从陕西私自跑来武汉作反党和破坏抗日团结的活动。

的确如来信所说……“张国焘在党内是一个著名的老机会主义者和小组织者”，在一九二三——二四年，他始而站在“左倾关门主义”的立场来反对国共合作的政策，继而在一九二七年时又站在机会主义的立场与陈独秀一起造成革命失败的严重错误。当时大家都晓得，对机会主义错误负主要责任的，即为陈独秀、彭述之、张国焘等。在一九二八年中共六大大会时，张国焘虽承认了他的错误，但在大会后在莫斯科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时，又犯了对许多政治问题有右倾倾向及参加少数中国学生的反党反国际右派小组织活动，而这种右派小组织，当时曾与托洛斯基派勾结。关于这一点，共产国际政治委员会在一九三〇年曾通过有专门的决议。当一九三〇年中国党的反立三路线时斗争取得胜利时，张国焘开始表示承认自己在代表团工作中反国际反党的错误，并表示反对立三路线。一九三一年四中全会后，张国焘回国，表示拥护四中全会决议及四中全会新选之政治局。党为给张国焘以在实际工作中改正错误和表现对党忠诚起见，派他赴鄂豫皖区工作。在鄂豫

皖区及四川通南巴区工作中，张国焘犯了许多严重的错误，其中重要者为轻视军队中党的政治教育工作，忽视建立地方党组织及群众工作，特别是肃反工作中马虎和对青年的不负责任和罪恶的态度。当一九三五年秋季，原一、四方面军会合于川西时，张国焘因为在政治上估计中国革命已完全失败，革命形势已又如一九二八年六次大会时一样的所谓“两个革命高潮之间”的低落，于是主张采取完全右倾消极的机会主义路线；当其机会主义主张为我党中央拒绝时，并擅自成立伪中央以分裂党的统一，破坏党的纪律。一九三五年冬，我党中央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告诉他时，他表示怀疑。一九三六年秋，原二、四方面军在朱德、贺龙等同志督促和原四方面军绝大多数干部要求之下，复出甘陕而与原一方面军会合后，张国焘的路钱错误虽经党中央及全体同志严厉指责，但张国焘时常采取口是心非的两面派态度，时而承认错误，时而重复错误。对于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始终表示怀疑和不了解。到西安事变时，更坚决主张继续内战方针，因而极力反对党中央联合全国一致对外的政策。中央为教育干部起见，特再三帮助他改正错误，并仍给以负责工作，希望他能在工作中学习和改正错误。不料张国焘机会主义错误和反党积习既深，势难挽回，因而有此次擅离工作、自动脱离之举。

此次张国焘从延安到武汉以至被开除出党的事实，简单经过如下：

四月四日，因为张国焘在边区政府工作，他要求去中部参加祭黄帝陵，可是祭陵完毕后，张国焘不通知我党中央即自行到西安。到西安后，住西京招待所两天，没有与驻陕办事处发生关系，只在火车快要开动前，用电话约林祖涵^{〔3〕}同志在车上略谈几句，即自动来武汉。到武汉后又不肯来驻汉办事处，经我们三人屡加责劝才勉强搬住办事处。当时他曾电告党中央

谓：“不辞而别，歉甚，愿在武汉做些工作。”我们看到他这种态度，表示还有回党工作可能，既来武汉，他是边区政府负责人之一，当然应当晋谒中央政府领袖，报告边区工作状况，于是由恩来同志陪他晋谒蒋先生。不意在见蒋先生后，渡江至江汉关码头时，乘恩来同志与另一同行朋友谈话之际，抽身疾驰而逃，始在汉口继在武昌各大街小巷乱跑乱撞数小时，然后始在武昌寓住一个事先与别人约好的旅馆中。我们见国焘深夜未归，派人四出寻找，在得知他所住旅馆后，即又于深夜渡江劝其返汉，当他不得已而返汉时，坚不愿再回办事处住，于是遂转寓一个朋友家中。在我们与他几次谈话中，他在政治上再三表示说：“国民党没有办法，共产党也没有办法，中国很少办法的。”因此，他再三提出意见说：“我感觉到消极，请允许我回江西老家去作老百姓，我家饭还有得吃的，我此后再不问政治了。”同时，他却又私自去找看陈独秀等人。由此可见，张国焘在声明中说什么他对中国革命的光明前途并未绝望等，完全系一种欺人自欺的昧心之谈。

张国焘的政治观点既如此悲观，而个人行动又如此反常，我们知道对他已无从迁就可能，遂正式向他提出三点办法：（一）改正错误回党工作（这是我们最希望的）；（二）向党请假，暂时休息一时期；（三）自动声明脱离党，党宣布开除他的党籍。当时他的回答认为第一条不可能，可以在第二、第三条中考虑，并允两日内闭门考虑后答复。不料，谈话后不及一小时，即十七日晚，张国焘竟跑到太平洋饭店，乘一有三人保护的汽车而去。临行时，用书面写交我们三人的信说：“弟已决定采取第三条办法，已移寓别处，请不必派人找，至要。”从此，张国焘便脱离了中国共产党。因此，党中央于十八日正式决定开除张国焘的党籍，于二十二日才将开除他的决议公布，因为中央还希望他在脱离党后或尚有所考虑。

只在开除党籍的决定公布后，张国焘才又派人将他写的二十一日和二十二日两信同时送到，在二十二日的信上说：“连日因寓所未就绪，故不曾致函诸兄，昨晚即写好一信，拟今晨派人送来，突阅报载有开除弟党籍的决定之公布，深使我痛心。……千祈我们间应维持冷静而光明之政治讨论，万一决定不能改变时，亦希彼此维持最好友谊。”由此可见，此次中央开除张国焘的党籍，首先由于他不能遵守一个共产党员应当遵守的起码的党的纪律，由于擅自离开工作而至自动脱离党。由此可见，确如来信所说：“共产党中央对每个党员的党籍问题，素持慎重态度”，而对于处理张国焘问题，真是已仁至义尽。由此可见，张国焘在声明中假装声势地说，好像他正在拿诚恳的态度与我们三人谈判政治问题时，中央忽而开除了他的党籍，是一种完全抹煞事实的欺人自欺之谈。当然，外面不知此事底细之人，初见张国焘声明，或不免有以为中共中央开除张国焘党籍似嫌过急，但凡是知道张国焘的为人及此次事实经过者，相反地均恰恰异口同声地说党中央对张国焘太宽大了。其实，张国焘早应开除党籍。的确，在过去两年中，有不少同志再三要求中央开除张国焘党籍以维党纪，中央始终希望以教育方法改正一个较老同志的错误。但是，张国焘既已不能再留存于共产党的队伍之内，共产党为党的纪律、党的统一和党的政治纯洁起见，只有将张国焘这类自甘暴弃于革命队伍之人驱逐出党。

对你所提两个问题的答复，暂止于此。以后遇有问题，望不时来信，我们当尽可能地抽时间答复你。此致
同志的敬礼！

陈绍禹、周恩来、秦博古 同复

四月二十八日

附：子健同志给陈绍禹、周恩来、 秦邦宪三同志的信

（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六日）

绍禹、恩来、博古三同志：

我是一个在学校中工作的一个共产党员，昨天我和两个非党员的同学谈话中，发现了两个问题，我虽然根据我所懂得的见解答复了他们，但我自己不晓得我的意见到底是否完全对，所以决定写这封信给你们，请你们抽暇为我解答一下。

第一个问题是共产党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和纲领的态度——最近几天因为报纸上发表了张君勱先生代表中国国家社会党致函国民党蒋汪两总裁，以及蒋汪两先生给他的答复信；同时，张国焘在他的登报声明中，也说到什么他主张中共中央对于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抗战建国纲领为更恳切之响应。因此，有一个同学在谈话中问我说：中共是不是准备最近也与国家社会党一样致函国民党，表明共产党对国民党和三民主义态度呢？我回答他说：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抗日救国合作早已建立，在去年九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便发表了宣言，说明共产党抗日救国主张及国民党与三民主义的关系；同时，九月二十四日蒋先生代表国民党发表谈话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自去年九月以后，两党关系日臻亲密，两党负责同志且时相过从，遇事协商。这与国家社会党的情形不同。国家社会党致函国民党领袖，表明他对抗战建国态度及对国民党和三民主义最高原则之关系。同时，蒋汪两先生公开复函承认他的合法地位。这都是第一次。这是很好的事情。但是，共产党与国民党这类函件往还，早已见之于去年九月，现在无再行重复

一次的必要。至于对这次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的宣言和抗战建国纲领的态度，我说，我曾听说，中共中央在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开会前，便曾经有一个建议书给大会，不过到现在我还未见到这个建议书罢了。此外，在大会宣言和纲领发表后，《新华日报》已有过几次社论说明中共对大会宣言和纲领的基本精神的赞助和拥护，态度都很恳切。所以对这次大会宣言和纲领问题，中共也没有专门发表致国民党函件这类举动的必要。

第二个问题是中央开除张国焘党籍的问题——另一个谈话的同学问我说：据张国焘声明说，好像他不过有些政治意见想找陈绍禹、周恩来、秦博古三先生谈谈，而中共中央似乎在他正在谈判的过程中，便把他开除党籍了，这是否太急了一点呢？我回答他说：开除张国焘的详细情形，我还不知道。不过我知道，张国焘在党内确是个著名的老机会主义者和小组织者，党对他屡加教育和纠正，他却屡次承认错误后，又重犯错误，特别是一九三五年的重大反党错误，的确早已值得开除党籍。此次他又破坏党的纪律擅自离开工作，当然应该开除出党。我绝不相信张国焘所说的话，我知道共产党中央对每个党员党籍问题，素持慎重态度。此次开除张国焘党籍经过，绝不会像张国焘在各报上登的声明所说的那样简单。

我不知道，我对于这两个问题的解答对不对。因此，请三位同志迅速帮助我更清楚地了解这些问题。匆此，敬致
布礼！

子健 上

四月二十六日

根据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九日《新华日报》
刊印。

注 释

- 〔1〕指蒋介石。
- 〔2〕指汪精卫。
- 〔3〕即林伯渠。

毛泽东关于放手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等问题给项英的电报

(一九三八年五月四日)

项英同志：

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虽有困难，但比在敌前同友军一道并受其指挥反会要好些，方便些，放手些。敌情方面虽较严重，但只要有广大群众，活动地区充分，注意指挥的机动灵活，也会能够克服这种困难。这是河北及山东方面的游击战争已经证明了的。在侦察部队出去若干天之后，主力就可准备跟行。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五区之间广大地区创造根据地，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组织民众武装，发展新的游击队，是完全有希望的。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渡江进入江北地区。在一定条件下，平原也是能发展游击战争的，条件与内战时候很大不同。当然，无论何时应有谨慎的态度，具体的作战行动应在具体情况许可之下，这是不能忽视的。薛岳等的不怀好意，值得严重注意。但现时方针不在与他争若干的时间与若干里的防地，而在服从他的命令开到他指定的地方去，到达那里以后就有自己的自由了。尔后不要对他事事请示与事事报告，只要报告大体上的行动经过及打捷报给他。此外，请始终保持与叶⁽¹⁾同志的良好关系。以上请加以

考虑。

毛 泽 东

五月四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二卷刊印。

注 释

〔1〕指叶挺。

张闻天、刘少奇关于 建立晋东南党的领导中心 给邓小平等的电报

(一九三八年五月四日)

小平转朱瑞、李雪峰同志并致朱、彭^{〔1〕}：

在粉碎敌人九路进攻后，东南目前的中心工作应是从事于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因此，必须建立晋东南党的领导中心。为此我们提议：

一、朱瑞同志及省委机关，应即与总部靠拢，合理的分配工作，并扩大省委机关。

二、设法使薄一波之行政主任公署与总部、朱瑞靠拢，并推动薄从事政权机关、地方武装及群众运动之改进、发展与统一。

三、分别召集党的、政府的、群众团体的、地方武装的会议，去推动各方面的工作。

洛甫、胡服

四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指朱德、彭德怀。

中共中央关于组织青年 工作委员会的决定

（一九三八年五月五日）

为了发展全国青年运动与集中统一党领导下各青年团体的领导，特决定：

（一）县委以上各地方党部直至中央，成立青年工作委员会，青委内至少有一个不兼别的工作，而专做青年工作的人，同时吸收在青年团体中的负责党员参加青委，隶属于同级党部领导之下。上级青委对下级青委应给以经常的指导，下级青委应对上级党委及青委作工作报告。

（二）党的委员会不应随便调走青年工作干部，必须调动时，应该不使青年工作受损失。同时应顾及青年群众团体组织上的独立性。

（三）各地党部应该把青年工作做自己主要工作之一，实行经常的检查与推动。

五月五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刊印。

毛泽东关于不赞成《大公报》 准决战论调给陈绍禹等的电报

(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三日)

陈周博凯^{〔1〕}：

《大公报》否认持久战，提倡准决战的论调^{〔2〕}，我们认为是不对的。徐州决战只应该是某种程度的战役决战，而决不应该看作战略决战。必须准备在徐州决战失败后，仍有充足力量为保卫武汉而战。

毛 泽 东

五月十三日

根据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集》
第二卷刊印。

注 释

〔1〕指周恩来、秦邦宪、何克全。

〔2〕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六日的汉口《大公报》针对当时的徐州会战发表社评说：“这一战，当然不是最后决战，但不失为准决战。因为在日本军阀，这一战，就是他们的最后挣扎。”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新四军 行动方针给长江局等的指示

（一九三八年五月十四日）

长江局、东南局及项英同志：

甲、迭次来电均收到。根据华北经验，在目前形势下在敌人的广大后方，即使是平原地区，极便于我们的游击活动与游击根据地的创造。我们在那里更能自由的发展与扩大自己的力量与影响。只要自己不犯严重错误与慎重从事，是没有什么危险的。

乙、因此新四军正应利用目前的有利时机，主动的、积极的深入到敌人后方去，以自己灵活坚决的行动，模范的纪律与群众工作，大大的去发动与组织群众，建立地方党，组织与团集无数的游击队在自己的周围，扩大自己，坚强自己，解决自己的武装与给养，在大江以南创立一些模范的游击根据地，以建立新四军的威信，扩大新四军的影响。

丙、必须向党的干部解释，目前斗争形势与过去的根本区别，因此目前的工作方法与方式应与过去有根本的不同，要他们在大胆的向外发展与积极的抗战行动中来扩大与巩固统一战线，争取更多同情者在自己的周围，同时扩大与巩固

自己的力量。也只有这样，才能有力的打击造谣中伤与打破防范限制。

中央书记处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刊印。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加强领导 乡村游击战争、创立游击根据地 问题给江苏省委的指示

(一九三八年五月十四日)

江苏省：

中央三月二十一日给你们的指示讨论否，有何意见？根据这一指示，我们再提起省委对于下列问题的注意：

(甲) 省委目前中心任务，是加强对于乡村游击战争的领导，创立许多游击的根据地。应该确定的认识，在目前环境下，我们活动的中心是敌人统治薄弱或没有敌人的广大的乡村，被敌人统治的中心城市工作，应服从广大乡村的游击战争。

(乙) 在被敌人占领的中心城市的工作，应以长期积蓄力量，准备力量，以便将来配合全国胜利的反攻。应该转变过去的斗争形式、组织形式、工作方法，以适合于目前新的情况。决不要为城市中的一时的便利所迷惑与群众中一时的抗敌情绪的高涨所影响，而走向冒险的斗争，削弱自己的力量。

(丙) 应该不断的有计划的从中心城市中派遣优秀的干部特别是工人干部到各地乡村中去工作，首先应该派他们到各种武装组织中去，以加强城市乡村的领导。

中央书记处

五月十四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刊印。

陕甘宁边区政府、第八路军 后方留守处布告*

(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五日)

为布告事：自卢沟桥事变以来，我全国爱国同胞，坚决抗战。前线将士，牺牲流血。各党各派，精诚团结。各界人民，协力救亡。这是中华民族的光明大道，抗日胜利的坚强保障。凡属国人，必须循此前进。我陕甘宁边区军民，服从政府领导，努力救亡事业。凡所实施，光明正大。艰苦奋斗，不敢告劳。全国人民，交口称誉。本府本处，亦惟有激励全区民众，继续努力，以求贯彻。不许一人不尽其职，一事不利救亡。乃近查边区境内，竟有不顾大局之徒，利用各种方式，或强迫农民交还已经分得的土地房屋，或强迫欠户交还已经废除的债务⁽¹⁾，或强迫人民改变已经建立的民主制度，或破坏已经建立的军事、经济、文化和民众团体的组织。甚至充当暗探，联络土匪，煽动部队哗变，实行测绘地图，秘密调查情况，公开进行反对边区政府的宣传。上述种种行为，显系违反团结抗日的基本原则，违反边区人民的公意，企图制造内部纠纷，破坏统一战线，破坏人民利益，破坏边区政府的威信，增加抗日动员的困难。察其原因，不外有少数顽固分子，不顾民族国家利益，恣意妄为。甚有为日寇所利用，假借名义，作为掩护其阴

* 这个布告是毛泽东起草的。

谋活动的工具。数月以来，各县人民纷纷报告，请求制止，日必数起，应接不暇。本府本处，为增强抗日力量、巩固抗日后方、保持人民利益起见，对于上述行为，不得不实行取缔。合亟明白布告如次：

（一）凡在国内和平开始时，属于边区管辖地域内，一切已经分配过的土地房屋和已经废除过的债务，本府本处当保护人民既得利益，不准擅自变更。

（二）凡在国内和平开始时已经建立及在其后按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原则实行改进和发展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组织及其他民众团体，本府本处当保护其活动，促进其发展，制止一切阴谋破坏之行为。

（三）凡属有利抗日救国的事业，本府本处在坚决执行《抗战建国纲领》的原则下，无不乐于推行。对于善意协助的各界人士，一律表示欢迎。但是凡未经本府或本处同意并取得本府或本处的证明文件，而从外面进入边区境内停留活动之人，不论其活动的事务属于何项，一律禁止，以防假冒，而杜奸宄。

（四）当此抗战紧张期间，凡在边区境内从事阴谋破坏，或肆意捣乱，或勾引煽惑，或暗探军情的分子，准许人民告发。证据确实者，准许就地逮捕。一经讯实，一律严惩不贷。

右列四条，全边区军民人等一律遵照，不得违背。倘有不法之徒，胆敢阴谋捣乱，本府本处言出法随，勿谓言之不预。切切。此布。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刊印。

注 释

〔1〕在陕甘宁边区内，大部分地方原来已经实行了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和废除农民原先所负债务的政策。一九三六年，为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决定停止没收开明绅士的土地。一九三七年，又宣布以减租减息的政策代替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同时宣布坚决保障农民已经从土地改革中所获得的果实。

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

(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七日)

任 弼 时

这个报告的基本内容，已经写在书面报告大纲里面，现在只是根据那个大纲的几个主要问题，加以说明和补充。

关于中国的抗日战争

(一) 中国九个月抗战的简单经过。

中国抗日战争，从去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起到现在，共有九个多月，战争的范围包括中国的北部和东部，并且是在继续扩大当中。

日本帝国主义，原来是没有预料到中国会有顽强持久的抵抗，初则想以少数兵力，占领平津，屈服中国；继则同时进攻华北、上海，想以速战速决方针，击败中国而达到占领华北之

* 一九三八年三月，任弼时赴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负责人。四月十四日，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提交的书面报告大纲《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撰写完毕。五月十七日，任弼时与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代表王稼祥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向会议作关于四月十四日书面报告大纲的口头说明和补充。六月十一日，任弼时与王稼祥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会议讨论任弼时的报告并作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

目的。然在上海、南京、太原失陷后，中国仍不屈服，乃采取第二期作战方针，企图继续进攻武汉，并夺取西安；同时在政治上运用其“以华制华”手段，利用汉奸、亲日派、托派，破坏中国的团结与抗战，使德意从中活动调解，企图从各方面逼迫中国承认其灭亡中国的条件。到现在止，中国政府仍然是采取坚决抵抗方针，且抵抗力量逐渐强大，使日本第二期进攻遭到中国强烈抵抗而遇着很多的困难。

九个月当中，中国政府的抗战方针也经过三个阶段的变化：

第一阶段是从去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到上海战争爆发以前。这一阶段，中国政府的抗战方针是动摇不定的。蒋介石和国民政府，那时还不愿立刻爆发全面的抗日战争，尚希望用局部抵抗解决中日冲突。认为全面抗日战争，需要有四五年或至少两年的准备，一方面增调一部分军队北上，另一方面由宋哲元与日本谈判。但是日本利用谈判时间，继续增兵，占领平津后，又分三路向西向南进攻，同时进攻上海。

第二阶段，是从上海战争爆发到太原、南京失陷。上海战争爆发后，由于日本进攻的逼迫，我党抗战的号召，全国人民与某些实力派要求抵抗，蒋介石与国民政府乃定全面抗战方针，由临时召集之国防会议，调动全国各省军队，开赴前线，划分战区，进行各种动员，乃展开了华北与上海的战争。

第三阶段，是从上海、太原、南京相继失陷后到现在。日本原拟以占领中国首都南京来威逼中国政府，使之接受条件而屈服。占领南京后，即经德国大使陶德曼向中国政府提出下列谈判先决条件：

1. 加入防共协定，肃清反日反满运动；
2. 撤销中国某些城市地区的军队；
3. 中日满经济合作，用日本顾问；

4. 赔款。

中国军队在上海、太原、南京失陷过程中，遭受重大损失。在南京失陷后，政府当局丧失了阻敌深入和保卫武汉的信心。蒋介石及其左右对持久抗战各项具体办法，当时亦无多大兴趣，而表示希望苏联出兵。蒋介石虽拒绝了德使的谈判条件，但政府中主和分子相当活动。当时的情势是相当严重的。

当时我党采取下列方针，努力争取抗战能够继续。

1. 向蒋介石继续提议，支持前线，并提出一些抗战的基本方案。

2. 争取前线将领，坚持华北和东南的持久抗战，特别是推动阎锡山、程潜、李宗仁、白崇禧、陈诚、张发奎等，稳住前线。

3. 推动白崇禧设法加紧巩固前线与整个部队的工作。

4. 推动陈诚担任政治部的工作，以整理抗战军队的政治工作。

5. 继续作建立军事工业及新军队的活动，并与国民党讨论招募兵役运动与开展民运等。

6. 迅速集中新四军，派出南京、上海、杭州间前线，开展游击战争。

7. 由党中央发布宣言，号召贯彻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

由于这些活动，前线得以支持，蒋介石亦发表《告全国军民书》，声明抗战到底的决心。中国中央政府，宣言迁都重庆继续抗战，并且召开各个战线将领、参谋人员及政治工作等会议，传达坚决抗战方针；严整军队纪律，枪毙了韩复榘，制裁了一些畏缩的军官；政府中的主和派亦不敢大活动，使中国第二期抗战得以继续开展。

（二）九个月抗战的估计。

九个月的抗战，中国在军事上虽然遭受了部分的严重的失败，华北和华东大块领土及上海、南京、北平、天津、太原、绥远、济南、芜湖等重要城市被敌占领，这些地区的人民遭受重大的牺牲，中国军队有八十到一百万的消耗，但是，日本的部分胜利是付了很大的代价的。根据日本自己在今年一月宣布的材料，它的军队伤亡已达二十万。到现在止，总在二十五万到三十万左右。财力物力的消耗很大。日军士兵中的厌战情绪是在生长着。而战争愈持久，日本的消耗和困难必然是要更形增加的。

中共中央估计，中国的抗战只是暂时的部分的失败与挫折，而不是最后决定胜负的失败。最后的胜负，要在长期持久战中去解决。

中国在九个月抗战中，虽然遭受了军事上的部分的严重失败，但是在抗战过程中，使着中国有了迅速的重大的进步。

中国在过去百年来，经过中英（一八四〇年）、英法联军（一八五六年、一八五七年）、中法（一八八四年）、中日（一八九四年）、八国联军（一九〇〇年）、中日（一九三一年、一九三二年）等战争，遭受失败后，中国政府对外来侵略完全采取投降屈从的政策，对于邻近的日本尤为惧怕，养成一种积弱的传统与恐日病。广大人民对外来侵略虽有深刻仇恨，但常为政府屈辱方针所限制。这次抗日战争，表示着全国人民、政府与军队一致合作，打破了这种积弱传统与恐日思想，坚决起来为着保卫民族生存而英勇抵抗日本侵略，而且在抗战当中，使着中国有了下面显著的进步与收获：

1. 由于坚决抗战，造成了中国内部从来未有过的统一团结。中国在一九一一年推翻清朝政府后，经过长时期不断的军阀内战，一九二七年国共分裂后，又经过了十年的内战，中国中央政府与各省地方政府向少合作。抗战起后，各党派重新合

作，中央政权与地方政权关系密切起来，人民对政府的关系也改善了。

2. 中国政府过去在对外政策上，对日本的进攻只是妥协让步；对内政策上，以一党专政，进行“剿共”。抗战起后，中国中央政府逐渐成为国防性质的政府，由降日而抗日，由“剿共”而联共，相当地实现了民主。如释放政治犯，取消《紧急治罪法》，某种限度的开放民运，召集国防会议，最近成立人民政治参议院，准许进步分子参加政府某些机构，同汉奸及不守职责人员斗争等，都是进步的具体表现。

3. 中国的政府军队，过去是一种互相争夺地盘，对内进行战争的工具，地方军队不能受中央指挥调动。抗战起后，也逐渐成为统一的国防军。全国各省军队均被调赴前线（惟以青海、宁夏两马⁽¹⁾最坏），一般能够受中央统一指挥，并且能够以民族利益为前提而英勇坚决地进行战斗（经常在前线作战的约有一百万军队）。韩复榘被枪决后，情形更好一些。

由于中国团结一致，坚决抵抗日本的侵略，中国的国际地位也就提高了许多。我们估计在继续坚持抗战当中，必然会要更加进步。

这些进步，如果没有发动抗日战争是很难得到的。

中国抗日战争遭受军事上失利，是由于客观上和主观上的许多原因：

在客观上，因为日本是一个武装齐备的帝国主义国家，有长期的侵略准备与布置，且有德意的援助与配合，而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的，不统一的，武装不完备而且还少抗战准备的国家。

在主观上，有不少军事上与政治上的缺点与错误。

首先，就是全面抗战的决心下得太迟，致使敌人利用了时机，调动兵力来华。而中国军队，反因和战未定，未能全部动

员，以致未经激烈战斗，即失去平津，使敌得依托平津为军事重点，迅速沿津浦、平汉、平绥三路，向西向南进攻。

其次，在战略布置上，没有能够以基本主力使用于华北战场，利用开阔战场，打击与消耗敌人，而被敌人将中国主力，吸引于上海不利地区，与敌人决战。上海战场狭窄，中国军队精锐消耗甚大。上海失陷后，又以重兵守不易固守之南京，复受重大损失，而华北主要战场多系各省地方军队，战斗力弱，并且复杂不易指挥，故在溃退中损失甚大。

再次，中国军队在战役战术上，在整个时期中，多采取消极正面防堵作战方针，而未采取积极防御的侧后方面的运动战的配合。以武器居劣势的中国军队，特别在平原地带，是不能抵御敌人新式武器——坦克、大炮、飞机的强烈火力，而容易被突破溃乱下来。

在政治上，政府机构中未能坚决淘汰亲日主和分子，吸引进步分子加入，而加以改革。这就一方面影响坚决抗战方针，同时使许多应有的动员工作及进步法令不能实现。对群众抗日运动，则惟恐群众起来走入共产党影响之下，而不敢完全开放。这就使公债（五万万元公债只销了二万万元）和新兵动员成绩很差。

一般说，中国与日本作战，战争的初期，遭受某些失利是不能完全避免的。但如果没有这些主观上的缺点错误，早可能取得更多胜利，使战争的发展处在比今天更为有利的情况之下。

在南京失陷后的第二期战争当中，显然有一些新的进步，其最显著的有以下几点：

第一，中国军队在作战的战略战术上，有了一些进步。在血的教训中，开始改变过去单纯正面防堵的阵地战，除正面防阻敌人外，部分地组成了野战军，在敌人侧后进行运动战，并

注意游击战的配合。津浦线徐州以南及以北，就是用这种方式，迟滞了敌人前进。最近台儿庄胜利，也是因为战略战术的进步而获得的。山西方面，也因为蒋介石严令所有黄河北岸军队，不准南渡黄河，敌虽进到黄河北岸，因有三四十万军队留在山西、河北敌人后面，打击敌人，断截其后方交通，敌陷于孤军深入而不敢贸然地渡过黄河。

第二，在作战地区和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近两三月来，有着普遍性的发展，政府和军队也去注意组织人民的游击队，或由正规军拨出小的部队，深入敌人后方，配合人民发动游击战争。所以游击战争不仅在八路军活动的华北起了很大的作用，就在山东、江苏、浙江一带，也有着很大发展。敌人因为被游击队到处袭击，破坏其后方交通线（铁路、汽车路），已感受重大的威胁，而不得不出重大兵力，以应付游击队。

第三，中国军队本身也有了一些政治上和技术上的进步。官兵的政治觉悟有了一些提高，开始注意部队政治工作的建立，纪律比以前严紧，指挥上比以前更统一与进步。军阀制度逐渐减少，军队与人民的关系，比以前稍改善了一些。政府从国外购买了一批新的武器，故一部分军队技术装备也提高了些。特别是空军的战斗力，又重新恢复并比以前还要增强。

这些进步，使着中国抗战开始了一些新的转机，不像过去那样遭受严重损失，或是随便向后溃退；使敌人的消耗增大，困难也增多。

（三）中国抗日战争发展的趋势与前途。

中日战争爆发后，在日本，因为它在军事、经济、财源及政治上，都是需要求得速战速决，战争延长是于它不利的，而在中国，则需要采取持久的抵抗，在持久战中，去消耗敌人，组织自己的力量，求得最后去击败敌人。因此，持久抗战以求得最后胜利，是中国抗战的总方针。

中国的持久抗战方针，是具备着以下的有利条件：

第一，中国军队在武器上虽然比日本落后，但中国是一个版图宽大、人口众多、物产丰富的国家；中国经济落后，交通不发达，虽然被敌人占去大块领土和许多重要城市，但依托现有地区，仍然可以继续抵抗。敌人则因兵力限制，只能占据交通要道与重要城市，而不能巩固已占区域，使中国仍然可以在敌占领的广大后方，发展游击战争，给敌人以重大打击。中国是处于被侵略的地位，在持久战中，中国会更加团结，民族仇恨愈益加深，新的力量可以培养生息。这都有利于持久的抵抗。

第二，日本虽为军备发达的帝国主义国家，但其国家的人口和财富有限，且其侵略方针并不能得到全国的拥护。战争愈加持久扩大下去，一方面它的兵力将感不够，兵力愈加分散，弱点困难必更增加，且经济财源不能持久；另一方面，日本国内矛盾必然增大，反战情绪可能增高，以致引起前线作战士兵更加动摇厌战。

第三，这一次中国的抗战，与一九二五年——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时代所处的国际环境，也有很大的不同。上次是处在国际资本主义局部稳定之后，中国革命比现在要孤立些。现在是国际资本主义总危机过程，和平阵线的力量正在增大。且日本在东方的侵略，加重了与英美法的矛盾，使中国的抗战能够得到比上次大革命时代更多的外援。

这一切条件，都是有利于中国的持久抗战以致胜日本的。如果中国能够团结一致，加紧组织各种力量，奋斗到底，的确是可能取得最后胜利的，但必须以很大的忍耐心。要取得战争胜利，免不了经过许多挫折、困苦、艰难的斗争过程。

在目前中国抗战局势中，还存在着许多困难与危机。这些困难与危机表现在：

第一，政府的机构没有进行必要的改革，亲日派、汉奸、托派及主和分子和贪污作恶分子，还是包容在政府机构中。他们破坏与动摇中国的抗战方针，阻碍抗战动员工作（不过目前他们尚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蒋介石、国民党没有决心将其驱逐淘汰出去。

第二，中国政府的财政状况相当的困难，政府的基金快要用完，借外债也很困难。现在到英美法等国购买武器均需现款，而中国本身的军事工业基础本来薄弱，在抗战中又受到了一些损失，这就使中国的武器来源觉感缺乏。现在有些军队在战争中受损失后，人员补充起来了，而轻重机枪甚至步枪还未完全补充齐备；而政府对于军事工业的建立，是很迟缓的，认为中国缺乏钢铁，建立军事工业很困难。

第三，政府及国民党对群众运动，虽然比以前开放了一些，但是还表示一种畏惧的心理，对群众运动加以限制。如今年二月，还要解散西安某些群众团体。因为群众运动不能充分发展，故新兵动员的成绩还是很差，过去多以强迫方法去征集新兵，引起人民的不满，只能勉强补充原有军队人员的损失，因此新军队的组织成绩还是很差。

因为财政经济上的困难情形，武器的缺乏，旧有军队力量削弱，而新的军队建立很慢，使得抗战派内部的一部分人，缺乏持久抗战的胜利的信心，甚至感觉在敌人更大进攻时无办法与失望。

敌人在台儿庄失败后，目前正增加新的军队，继续向徐州积极进攻，仍未放弃第二期作战计划夺取武汉的企图。如果中国方面能够取得新的胜利，使河南、武汉、陕西能够长期保持在中国手里，则中国可以争取较多的时间，组织新的力量——组织军队和建立军事工业，这对以后继续抗战是有很重大意义的；如果徐州失守，河南、陇海铁路一概被敌占领，武汉、西

安危急，甚至短时期内被敌占领（我三月初离开中共中央时，按照当时的情形，中央估计武汉在两三个月内有失陷可能），则可能引起政府对抗战方针产生新的动摇。因为武汉、西安失守，可产生下列情况：

第一，武汉是今天中国的军事政治中心，它可以连接北面与东南的战线；西安是今天中国一条最主要的对国外的交通线。如果武汉失去，则中国北面战线与东南战线会被分割；西安失去，则外援的困难增加。而在这一战斗过程中，中国军队必然会有更大的消耗，一时来不及补充、整理，组织新的力量的条件比现在更坏，会引起失败情绪的增长。

第二，在新的困难情况之下，亲日派、汉奸、托派及主和派等，必然抬头活动，他们会要积极起来，破坏政府的抗战方针。

第三，日本在占领武汉后，可能提出一些和平谈判条件，且提出的条件在表面上可能比过去还要低些，以便引诱和威逼中国政府承认。如三月初日本曾向蒋介石夫人提出的和平条件，比南京失陷后经德国提出之和平条件，表面上要温和些，其内容如：1. 黄河以北为特区，并请日本顾问；2. 日本有权驻兵平、津、京、沪；3. 中国赔款三万万元，而不提参加防共协定及中日满经济提携等类条件了。

第四，因为日本畏惧中国长期抵抗，想逼使中国承认其条件而屈服，可能邀请英国出面调解。英国近几个月来，外交政策之改变，有向着侵略主义者投降的倾向，此时也可能出面调停。这可能引起中国政府中某些分子的动摇。

但是，我们虽处在这些困难与危机前面，就目前的情形看，在中国坚持抗战的力量，还是超过主和投降派的力量。目前政府中，亲日与主和分子，主要的是政学系的张群（行政院副院长）、熊式辉及汪精卫、何应钦等，但他们没有实力；而

主战派中有许多实力派和一部分国民党中的元老，如两广军队将领，蒋系之陈诚、罗卓英、卫立煌、胡宗南、汤恩伯、孙连仲等，在今天均是坚决主张继续抗战的。阎锡山亦主张抗战。川滇两省军队在 frontline 作战有进步，尚坚决。东北军（于学忠）、湖南军（刘建绪）、山东军（原韩复榘部）、陕西军（原杨虎城部）虽不能起重大作用，但还是要抗战的。一般说经过九个月抗战，军队虽受相当重大损失，但所有前线抗战将领尚未灰心，更无整个部队叛变投敌，如满洲失陷时那样可耻的现象。在国民党元老当中，如孙科、冯玉祥、于右任、张继、邵力子等，现在是坚决主张继续抗战的。他们有政治上的号召作用，但因无实力，也不能起决定作用。在政府中有决定意义的蒋介石，今天还是表示要坚决抗战的。全国人民和国民党内大部分党员是不愿投降而需要抵抗到底的。

以上说明中国抗战过程中，存在许多困难与危机，特别是武汉万一失守，可能产生严重动摇。但今天的情形是，台儿庄胜利后，抗战有些新的转机。台儿庄战斗的胜利，可以提高中国军队及人民的抗战自信心。如能继续取得新的胜利，则抗战能够顺利地支持下去。即如武汉万一失守，只要很好地去推动、影响政府和前线的军队的将领，在困难的情形下还是可能争取继续抗战的。

因此在抗战问题上，目前摆在中国党面前的最基本的任务，是防止和克服中国政府对抗战方针的动摇，以一切努力，争取中国能持久抗战，以求得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在目前最中心的一环，是推动国民党、政府及军队，以一切努力保卫河南、武汉与西安，巩固徐州与津浦南段，阻止敌人由山西及平汉铁路南渡黄河，继续争取新的胜利，以达到破坏敌人第二期进攻计划。

万一武汉、西安不幸而被日寇占去，我党亦应推动政府与

军队，仍然坚持抗战方针，并且提出继续抗战的具体方案。估计在武汉、西安失守后，中国仍保持有西南和西北广大地区，仍然可能继续抗战，争取最后胜利。

保障抗战能够持久，而且使抗战转入有利的发展，直至战胜日寇的最基本的任务，就在于培养与创造新的力量。这须要从各方面推动与帮助国民党、政府真正地而且迅速地组织新的军队，建立必需的军事工业，使中国军队在质量上和技术上逐渐提高。

为着防止和克服政府对抗战方针的新的动摇，须努力提高政府、军队与人民持久抗战的胜利信心，反对一切投降理论与失败主义的思想。

这就是中共在目前抗战问题上的中心任务。

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状况

（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般状况和中共在统一战线中的基本方针。

中国党所号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久已获得全国人民的拥护。但国共两党的合作，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结束，国内战争停止以后，才逐渐具体化。一九三七年二月，国民党中央召集的三中全会，在原则上接受了我党的建议。七月，我党向国民党中央提议发布两党合作宣言；之后，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又将陕甘宁根据地的苏维埃政府改为边区政府。九月二十二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延搁已久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翌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我党亦取得初步合法的活动地位，过去被国民党拘捕的党员也次第释放出来。经过十年血战的两党重新合作，我党在全国的政治地位和影响飞速地提高和增大起来。

在去年十二月前后的短时期中，两党合作问题上引起了一些磨擦。如捣毁《新华日报》馆^{〔2〕}，限制我们活动，甚至诬以汉奸名义拘捕共产党员；造谣说八路军不听指挥，不愿牺牲等；禁止我们成立游击队，不准八路军就地筹办粮食，不优待八路军新扩大兵员的家属，以限制我们的扩大等。

这些磨擦产生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国民党上层分子看到共产党与八路军在全国群众中有极高的影响，八路军不断地壮大，引起他们的畏惧。他们还抱着很深的仇视观念与成见，故意从各方面来限制和破坏我们。同时，我党对国民党转变和两党合作长期性认识不充分，在工作方式上有严重缺点也是重要原因。

去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王明^{〔3〕}同志等带回季米特洛夫同志对巩固与扩大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详细检查了统一战线工作，认为我党号召的民族统一战线获得了最大的成功，由于国共的合作，发动了抗日战争。同时指出，目前巩固与扩大民族统一战线，又成为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与先决条件。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认为此次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长时期的。并且指出，目前抗日战争的任务与动力，同苏维埃革命时代有了一些基本上的改变，即：过去中国党六次大会上规定的任务，是打倒一般帝国主义和消灭中国封建势力，推翻国民党政权，建立工农苏维埃，革命的动力是工农；现在抗日战争中的任务，则只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国内的亲日汉奸，和国民党合作，建立民主共和国（这个共和国并不是非资本主义的或社会主义的国家），革命动力不仅只是工农，而且包括了民族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认为这一与国民党合作的统一战线，不仅是我党策略上的改变，而是带着战略上改变的性质。因此与国民党合作的时期是很长的。

其次，指出与各党派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条件就是抗日。一切抗日的力量，都可以而且应该合作，提出“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的口号。民主与改善民生的要求，应服从于抗日的基本利益，提出的要求不应过高与过左。

再次，指出在民族统一战线中，各党派在共同纲领之下，共同奋斗，不是谁去削弱谁的力量，而是互相帮助，互相发展，共同领导，共同负责。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虽然不能消灭，但是要尽量减少和避免。

各个党派保持自己组织上的独立性与批评自由，但批评应当是善意的而不是恶意的攻击。指出我党在与其他党派合作中，一方面要反对投降主义，另一方面又要反对关门主义的倾向。

中国党根据这些原则教育全党同志，同时并向外宣布。在去年十二月宣言中，提出与国民党合作是长期的，不仅为着抗日，而且在抗日胜利之后，共同建国。这使得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在基本上有了一些进步，如建立两党委员会⁽⁴⁾，准许我党公开在武汉办日报，周恩来同志被邀请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等。

共产党、国民党以外，中国还有一些力量不大的小党派，如第三党（不超过一百个党员）、国家主义派（只四五百人）、国家社会党（只数十人）等，他们过去也受国民党排挤压迫，现在向我们表示尚好，也参加了统一战线的活动。因为他们自身的力量很小，所以国民党是不重视他们的。

另外还有一个政学系，他们是由一些政客、官僚、买办组成的，也不过数十人，他们中的领袖分子是亲日的。

（二）国共重新合作的特点，合作中的困难与阻碍。

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在十年以前的大革命时代有过一次合作（一九二四年——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中间经

过十年的武装斗争，现在又重新合作。上一次合作的方式是共产党员单独地加入国民党，而共产党仍保持它独立的组织。

这次合作与上一次合作，有了一些不同的特点：

上次合作时，国民党仅有广东一省尚不十分巩固的政权和数量不很大的军队，而且是受着外部与内部敌人的压迫；现在它有了全国性的政权和强大的军事力量，以及全国的舆论机关。

上次国共合作时，共产党没有自己的政权和军队，但在全国各地党的组织力量相当强大；现在是有自己的军队和独立的地区，在全国有很大的政治影响，但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党的组织力量比较薄弱。

上次合作时，主要的斗争对象是北洋军阀，这次合作的主要斗争对象是日本帝国主义；上次是打倒军阀的内战，这次是反对日本侵略的对外战争。

从上次合作到这次合作中间，经过了十年血战，共产党曾在相当大的地区内，已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创立了军队，实行了土地革命。

因为国民党现在一方面有着全国性的政权和强大军事力量，并且有十年一党专政的统治；另一方面国民党过去十年的反动统治，失去人民的同情与信仰，且有了过去与共产党斗争的经验，惧怕共产党力量的壮大。故它一方面表示自大主义，不愿以平等地位来与共产党合作；另一方面惧怕共产党力量壮大，将来夺去抗日领导、危害其统治地位，故想尽方法来削弱共产党力量。因此，在两党合作的过程中，仍然有许多的障碍与困难。

国民党在卢沟桥事变不久以前，在它的庐山军官训练班的政治教材中说：现在国民党有十分力量，在抗战中将要消耗五分，只余五分；现在共产党已有五分力量，要使它在抗战中消

耗三分，只余二分。将来苏联再帮助共产党一分力量，共产党也只有三分力量，国民党还可以保持优势地位，中国还可以与苏联平等谈判。如果共产党力量在抗战中不消耗，苏联再帮助它一分，则它将有六分力量，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将要到莫斯科请训，那就不好。从此可以看出国民党上层分子对共产党的畏惧心理和削弱共产党力量的企图。

山西的阎锡山说：现在共产党八路军在山西，是有十支洋烛的光，晋绥军是一支洋烛的光，中央军呢，只有一根香火的光。但共产党有一个漏洞，他们是不要祖国的；所以在一九三二年时，德国共产党虽然有很大势力，但后来终被希特勒压迫下去。他说，山西政权在他手里，将来还有办法。

因为国民党上层分子对共产党存着削弱企图和自大心理，故在国民党三中全会接受我党合作建议的决议中，还用着“根绝赤祸”的名称，表示共产党是向它投诚。我党要求共同发布宣言，亦被其拒绝。而我党单独发布之宣言内，所提“国共合作”字样，被其删去，改为“国共两党，推诚相见”的字样。国民党还禁止在其报章上用“国共合作”的名词，不愿意公开表示国共两党是平等的合作。

蒋介石企图把中国各个党派统一于他的控制之下，以逐渐削弱溶化共产党。他在抗战爆发前，曾提出一种合作方式，是在两党之上成立一个共同的党，两党分子均可加入，由两党选出同等数量人员组织最高委员会，而以他为主席，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两党必需服从这最高机关的决议而行动，共产党不再与第三国际发生关系，即由最高委员会与第三国际发生关系。他这一建议，被我们拒绝了。

后来他想引诱中国共产党成为他底下的一个派别，即想要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内，成为一个派别，取消共产党的组织。认为两党存在，总免不了冲突与竞争。他说：你们共产党讲策

略，则共产党隐蔽在国民党内来发展，不是好策略吗？将来在国民党内，最革命最能干的，就会成为国民党的基础。并说国民党可以改变名称，各党均取消而加入为一派，党内是可以有派的。

复兴社的上层领袖，勾结托派分子，更依据蒋介石的意图，利用“统一”的名词，利用我党七月宣言承认“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向我党及八路军进攻。在其机关报《扫荡报》上提出：中国只能有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政府，一个军队等口号；并引证苏联、德、意都是一党专政。因此，中国现在应当尊重国民党的唯一性，拥护国民党的领导权。他们说，中国团结有两种方式，一为联合，一为统一，而联合式的团结，不能坚固，亦不能持久，而且在某种情形之下，还要火并起来。统一的团结方式，是用以大并小的方法，溶化小的单位，合而为一，则根本没有离心倾向；所以主张加紧团结的人，应该主张合并。又说，这个合并，根据一九二四年——一九二七年的教训，在实现以后，即不能在国民党内成立党团，在国民党外保存组织。他们说，共产党既承认三民主义又信仰共产主义，共产党是反复无常的。他们并谓中国有两种危险势力：一种是封建势力，一种是反动势力（指八路军）。散布封建势力抗而不战，反动势力游而不击，这两种势力不肃清，中国不能统一等等谣言，中伤我党。他们在行动上，收买流氓，捣毁我党在汉口的《新华日报》馆。今年一月间，在武汉一带，造成相当严重的形势。

复兴社这些领袖，与托派勾结，想借统一之名来消灭中国共产党。他们这种活动，除得到国民党内一部分对共产党成见很深的分子的同情外，还有少数政治见解很低而希望中国统一团结的分子，也对他们盲目地表示一些同情，以为其他党派都

取消，而加入国民党，中国会更团结统一，更好反对日本。

为着答复复兴社分子消灭共产党的企图，揭露蒋介石引诱我们成为国民党内一个派别的意图，中国党由毛泽东同志发表了谈话，说明苏联一党存在，是因为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不存在其他政党的社会基础。在德意两国，虽为法西斯党专政，但还有其他政党不合法的存在与活动，并非只有一个党。指出英法美等国许多党合法存在，仍然保持了国家民族的统一。说明国民党过去以武力消灭其他政党的企图，经过十年纷争，已遭失败，今日合作，反能统一，并能抗战。那种借统一之名，企图消灭共产党的理论，实际上要使中国退回到国内团结、一致对外以前的悲惨局面。最后引用孙中山所说，“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所以我们对于共产主义，不但不能说是和民生主义相冲突，并且是一个好朋友，主张民生主义的人，应该要细心去研究”，说明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能够相容。我们执行革命的三民主义，绝不会放弃相信了多年的共产主义。

毛泽东同志的谈话发表后，一般是得到很好的印象。国民党中一部分元老和许多党员及进步群众，都认为取消共产党是办不到的，而对复兴社和托派分子所引起两党关系之恶化，表示忧惧，惟恐因此而引起两党合作的分裂。对于复兴社利用与勾结托派，表示不满意。他们之中，仍有人提出新的方式，如提出在各党独立存在之外，另行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各党分子均可加入。有的认为可以保持现状，有的则赞成我党提出之合作组织形式，也有主张恢复上次大革命时代合作方式的。

蒋介石后亦声明并不取消共产党，只要意志统一，思想可以自由，并表示复兴社的言论不能代表国民党的意见。自此以后，一个党、一个主义等类口号，也不再提出了，且下令各报不谈党派问题。

我们党本来提出的各党派合作的组织形式，是采取民族联盟的组织形式，即按民主原则，由各党派选派若干代表，成立中央与地方的共同委员会，依照共同纲领而行动。各党派仍保持自己组织上的独立性。这种组织形式的建议，因为复兴社及托派分子的捣乱，及蒋介石取消共产党的企图并未完全打消，故尚未得到具体解决。这次国民党临时大会对此问题，亦无具体决定。目前尚只是由两党委员会进行了一些谈判，与蒋介石及其左右和国民党元老中一些进步分子，讨论某些重要问题。两党委员会内，因为国民党的四个委员（陈立夫、张冲、康泽、刘建群）有两个是复兴社顽固分子，故谈判得不到很多具体结果。

对于三民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形式之主张，我党准备加以赞助，因为这可以吸引广大青年，经过它可能影响国民党的进步和改造。这次国民党临时大会，已通过成立民族青年团组织。

（三）国民党的现状及其进步的趋势。

国民党主要依靠民族资产阶级为其基础。当它起着革命作用的时候，它便靠拢小资产阶级以至工农，逐渐淘汰地主、军阀成分，如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共产党及许多工农也加入了国民党，军阀势力被淘汰出去，国民党成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工农的政治联盟的组织。当国民党离开革命的时候，它又与封建地主、军阀势力联合起来，逐渐将工农小资产阶级排挤出去。如一九二七年国共分裂后，它进到专门以反共为主的反动时期，它必需与军阀、地主势力结合，军阀、地主就大批涌进国民党内，并占主要地位；工农和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从里面分化出来。

现在，国民党由反动地位又重新回到抗日的民族革命斗争中来。既然它要起革命的作用，就需要革命的群众力量来支持。它必须靠近工农小资产阶级。

在抗战起后，国民党一般的是在向前进步的过程，它的政治地位也逐渐提高起来。除去对外对内政策改变，重新与共产党合作，国民党的上层，如蒋介石及一部分元老和进步分子，已渐感觉到国民党组织之无力量，不改造无以适应战争需要。国民党下层党员，对国民党组织之腐败无能，毫无民主生活，也表示着深刻的不满，而要求改造。故蒋介石近已提出复兴国民党的问题。在这次临时大会上，也讨论到一些关于改进国民党的问题。

我们估计，国民党在继续抗战过程中会要进步，但进步的速度，因为许多条件的限制（内部腐旧分子把持，有害怕群众与共产党等思想成见）不会很快。而在国民党前进中，其中的顽固分子，还可能从事破坏。

我们要使国民党不仅能与我们合作抗日，而且能与我们共同在抗战胜利后合作建国，就必须使它的机构进步。故我党对于国民党的复兴与改进运动，采取赞助方针，设法使其组织内能够增加大批进步的成分，逐渐淘汰腐旧的封建的分子，争取内部民主的实现，以达到其内部左派势力壮大，能够起到推动作用。为着这个目的，准备以一些色彩不浓的共产党员加入进去。这样可以推动国共两党向着巩固合作的前途前进。

这次国共合作中，中共因为有着比上次大革命时代不同的条件——有红军和苏区，这是顺利地取得与国民党合作的重要条件。但是我们的军事力量，与国民党军队相比，还是太小；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力量，今天还不大。因为我们有军队，有地区，有很大的政治影响，有战争经验，我们能与它合作，经过与他们的上层谈判，能影响国民党的对外、对内政策及军事上的进步。但正因为我们的力量还不大，特别是在全国各地群众中的组织力量薄弱，不能以群众力量影响和推动国民党中央与地方机关。而国民党内部的进步仅在开始，且内部顽

固分子尚在捣乱，故今天国民党对我们还不能以平等地位相待，使合作中遇到许多的困难与障碍。

然而，这次与国民党重新合作，是在对日抗战的过程当中形成发展的。在日本帝国主义直接军事进攻的状况下，必然要推动中国更加团结，这比上一次的合作有着更加顺利的条件与基础；在日本的进攻之下，国民党要抵抗到底，就必须进步，必须更加依靠广大群众的力量。这种客观条件，是可以促成国共两党的合作，向着巩固的前途发展。我们要使国共两党的合作能够更加迅速地进步与巩固，就必须更加壮大我们各方面的力量，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发展游击战争，发展群众运动与共产党组织。我们这些方面的力量更加壮大，地位就更高，合作就更有力量。

（四）当前党在统一战线中的任务。

中国党认为，中国要战胜侵略的日本帝国主义，必须经过长期的艰苦斗争过程，必然还要遭遇许多的困难与挫折，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团结中国一切力量，是争取最后胜利的基本条件。很明显的事实就是：国共两党以及其他党派合作，则能抗日，能够胜利；国共两党如果分裂，则中国的抗日必定要失败。日本、亲日派、汉奸和托派正从各方面来破坏中国的统一团结，首先就要破坏和挑拨国共两党的团结。特别是日本最近的进攻遭受一些挫折后，它必然要以更大的努力来破坏中国内部的团结。因此，巩固与发展民族统一战线，仍是中国党在抗日战争当中最基本、最中心的任务。

虽然在国共合作当中，还有许多的困难与阻碍，党还是在努力说服国民党及其领袖，使他们打消那种并吞或消灭共产党的企图，使得国共两党以及其他党派之间，能建立起更密切的合作关系。中共中央正在起草合作的共同纲领，继续与国民党进行各种具体问题的谈判。

中共认为目前的统一战线，尚偏重于上层的活动，广大群众缺乏组织，这就使得统一战线的下层基础不坚实、不宽广。因此，将广大的无组织群众组织到统一战线的各种群众组织中去，成为发展与巩固统一战线的一个最重要的迫切工作。

抗战起后，中国的地方政府与军队对中央政府的关系，人民对军队与政府的关系，显然比抗战以前大为进步。但这还没有达到必要的密切程度。有些地方军队对中央政府不给予他们补充与枪械，还存在着许多矛盾，人民因政府的许多设施与处置的不得当（如强迫征兵与强募公债等），尚有许多不满，这需从各方面推动，使这中间建立起合理而密切的关系。

我们准备在国共合作关系进步的基础上，推动国民党政府采取更多的进步的设施，逐渐改革现有的政治机构，淘汰亲日派、汉奸、托派，引进进步分子参加政治机构，充实政府组织战争的能力。

以上是在统一战线方面，摆在中国党前面的迫切的工作。

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及其最近状况

（一）八路军的工作方针和它在抗战中的作用。

八路军是由过去中国红军改编而成的。它在过去十年当中，曾经击败过国民党几次的进攻，是在这种不断的战争当中长大与锻炼出来的。所以它有着革命战争的丰富的经验。但是八路军的武器，都是在过去战争中从国民党军队的手里夺取过来的，所以是比较陈旧而不整齐，并且没有重兵器，连山炮都是没有的，更不必说大炮、坦克、飞机等类新式兵器了。它作战主要是依靠战士的政治觉悟与热情，指挥人员在战术上的灵活机动，指战员作战时的坚决勇敢，以战胜敌人。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八路军首先向政府要求开赴抗日前线，并开始由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但当时蒋介石还不许我们开动，因为他恐怕八路军首先开赴前线扩大了影响；并且他尚在和战未决当中，恐怕我们军队去了，会把战争扩大起来。在那时，蒋介石还不给八路军成立总指挥部，只许改编为三个国防师，由他直接调动，并分开使用到各个战线上去。

去年八月，华北战争吃紧，蒋介石这时才给了八路军的名义，调八路军到平绥路南口附近作战。八路军去年八月即由陕西向山西北部开进，参加晋北的战争。当时引起了全国人民和军队的注意与兴奋。

我们军队到达山西时，即确定了下列方针：

第一，采取运动战游击战的作战方针，不用当时国民党军队单从正面防守办法。我们是从敌人的侧后面去打击敌人，在敌人远近后方发展游击战争，破坏敌人的后方交通，打击其增援部队，配合其他友军作战，并求得我们行动的胜利，以影响国民党军队战略战术上的进步。

第二，在八路军作战的过程中，加紧做组织与武装地方居民的工作。在敌人后方，创造游击战争的根据地；发动群众的游击战争，以配合正规军队作战。以这些工作的成功来证明：只有发动和组织民众，发展人民的游击战争，才可以使战争能够持久，能够胜利，以推动国民党政府及军队，去注意组织民众和发展游击战争。

第三，加紧八路军内部的政治工作，及对敌军的瓦解工作，建立与居民的亲密关系等，来推动其他军队去改进政治工作及改善与人民的关系。

总之，我们必须从各方面去起到模范先进的作用，去推动抗日战争向前发展。

由于我们运用运动战游击战的作战方法，首先就取得平型关的胜利。这是抗战起后中国的第一次胜利，击溃了日本最精锐的第五师团，消灭了将近一个旅团。后来，我们的军队转入到敌人的侧后方，截断它深入山西北部后的路。正面有国民党军队的坚决抵抗，我们在敌人的后面，打击了敌人的增援部队，夺获和毁坏敌人千辆以上的辎重汽车，二十架飞机，使得进入忻口（太原城以北）的四万余敌人没有粮食、炮弹和汽油，大炮、坦克被迫停止活动，仅靠飞机运送少数粮食和弹药，使忻口得以支持二十余天的猛烈战斗，敌人陷于非常危险的地步。

我们的这些胜利与成功，逼得敌军不得不改变过去常以支队迂回中国军队的作战方法，因为这种迂回的小支队时常被我们在侧面消灭掉。同时逼得敌人不得不分散一些兵力，去守卫交通线上的据点。

我们的这些成功与胜利，一方面使着国民党抗日军队的作战信心提高，他们说八路军的武器比他们坏得多，还能够打胜仗，他们一定能够同敌人拼一下。这就使得当时向后溃退的军队，也坚决抵抗起来。另一方面，使得国民党军队逐渐认识阵地战与运动战、游击战互相配合的重要意义，而开始采取新的作战方针，推动了国民党军队战略战术上的进步。最近台儿庄的胜利和津浦南段战争能持久，就是由于战略战术上进步的结果。

八路军在山西北部作战过程中，毫未放弃组织武装群众的工作。在八路军活动区域以内，经过一两个月工作，成立了许多救国会、农民协会、工会、妇女协会、自卫队等群众组织；并成立了大批的人民游击队，由八路军抽出一批有游击战争经验的干部去领导这些游击队的活动。游击队的武器，一部分是收集民间的旧枪和中国军队在抗战中遗散在农村中的枪支，另一部分是在行动当中夺取敌人的枪支。自然，他们的枪支数量

还是差得远。他们的粮食和给养，则由当地群众供给，特别是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口号之下，向地方上的富豪募集一部分粮食或金钱。自然，游击队的生活过得很差，有的到冬季还没有棉衣。医药对于他们更是困难的问题。

那些区域的游击队，在不断的战斗当中力量逐渐壮大，而且逐渐集中起来形成较大的队伍。特别是在晋察冀边区，已经由游击队编成了几个独立师，每师有五六千人，设有军区，统一指挥他们的行动，成为在敌人后方创造新军队的模范。他们时常伸到北平附近，越过平汉铁路，到津浦路附近天津以南地区打击敌人。

在晋察冀边区内，现有四十多个县、五六百万人口的地区，已经恢复了中国的政权，并建立了该边区的统一的政权。这政权能够在我党领导之下工作。这一区域内，普遍组织了民众，建立了党的组织，有着强大的武装力量，他们时常截断平汉、平绥、正太铁路，给敌人重大损伤。敌人曾经用了很大的兵力，分八路去“围剿”他们，但是他们用着很灵活的游击战术，将敌人击退。现在，晋察冀边区已成为敌人后方一个有基础的游击战争根据地。

八路军在红军时代，就有优良的政治工作传统，今天依然是保存着的。士兵中系统地进行了关于统一战线与抗日战争许多问题的教育，战士的政治文化水平比中国一般军队要高，他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打日本和持久战能致胜日本的基本知识。入伍后经过相当时期的战士，都能识得一些文字。部队不论是在驻军、行军或作战当中，都有各种不同方式去进行政治工作。部队能自觉地遵守纪律与服从命令，同时生活上能够刻苦。指挥员与战斗员间建立起友爱的同志的关系。共产党支部起着领导和模范的作用。部队中逃亡的现象很少，作战时坚决勇敢，部队内部有团结活泼的精神，这是引起友军非常敬慕的。有一

次，一个国民党报纸的新闻记者，到八路军总指挥部来访问朱德同志。当他走到八路军总司令部的门口，看见一个年纪已老的人，穿着普通士兵的衣服，戴着眼镜看报纸。他走进司令部门内经参谋长介绍，才知道这老人就是朱总司令，引起了很大的惊异。他与朱总司令同吃午饭，饭菜极简单，与士兵所食相同。他又找了八路军士兵、伙夫谈话。于是，他得出一个结论，说八路军有一个极大的特点，上自总司令，下至士兵、伙夫、马夫，所说的话，观点完全一致，只是程度有深浅不同而已。他说，八路军的教育与团结，真是值得钦佩的。

八路军除内部政治工作外，在抗战中还特别注意瓦解敌军的工作。为着这个目的，除印发许多日文、中文、蒙文、韩文传单小册子，利用政府飞机或经过游击队和地方居民，以及组织武装宣传队，散发张贴到敌人区域，并教育指战员学习几句简单的日文口号，以便在作战时向敌人宣传。对俘虏的日本士兵，给以很好的优待和教育。我们散发的传单小册子，对日本士兵已起到一些影响，时常从俘虏以及战死的日本士兵身上，可以找到我们散发的宣传品。在战场上被我们包围的日本士兵，经过我们喊口号，有自动缴枪过来的。俘虏来的日本兵，有很少数现在帮助我们写日文传单小册子，他们甚至要求留在八路军工作，并要求设法将他们的家眷也搬到中国来，以免受日本政府的摧残。

八路军与地方人民间，建立了很亲密合作的关系。首先是由于八路军有很好的政治纪律，他们驻扎民房，须先征求居民的同意，损坏东西要赔偿，更没有损害群众利益的现象。我们的军队每到一个地方，群众都请我们到他家里住，送许多东西来慰劳，而别的军队到一个地方，群众多逃走。特别在战争初期，国民党军队纪律很坏，发生掳掠甚至强奸妇女的现象，引起群众很大的反感。有些村子的群众，自动规定一些办法，就

是别的军队到了，由村长敲三下警钟，全村人民便躲到山上；但八路军到时，便敲一下警钟，大家在家里烧茶水欢迎。我们的队伍因为得到群众拥护，在作战时，群众自动替我们搬运伤兵和战利品，修补难走的道路，使我们好通过。平时则帮助我们运粮食、弹药，给予我们以很大的便利。

由于八路军部队内的政治工作，瓦解敌军工作，特别是与居民的亲密关系，引起了其他抗日友军很大的注意与兴趣。他们便回想到北伐时代，那时北伐军内部也有政治工作，得到人民的拥护。他们便提出恢复北伐军时代军队政治工作的要求，并开始建立政治工作。因此，在中国大本营下，设立政治部，以陈诚为部长，并请周恩来同志为副部长。现在，各个集团军招收了许多学生，正在培养政治工作的干部。阎锡山新组织的军队，仿照八路军成立政治部，并设政治委员制度。

八路军是从土地革命中，从小的游击队逐渐生长壮大起来的；过去十年经过残酷的反国民党军队的斗争，有极丰富的游击战与运动战的经验；行军力极强，并能刻苦耐劳；指挥员多有独立行动和机动的能力，故在作战中有许多特长。能够集中起来打大的仗，同时又能够分散开来，独立行动去发展游击战争。能够以少数兵力，勇敢地去攻击数量强大的敌人。

因为八路军的战术运用得灵活，在山西作战的过程中，使敌人遭受重大的损失与消耗。敌人在山西被八路军击死和伤者近三万人，而八路军伤亡只有敌人伤亡数三分之一。这种作战方法，是消耗敌人的最好办法。我们缴获敌人的文件中，有一敌军官的日记这样写道：见到八路军就头痛，他来了你不知道，你去打他，又打不到。因为我们与敌作战，如在极不利情况下，就避免过大的牺牲而迅速组织撤退，以引敌于运动当中再去打击它。敌人对中国别的军队的行动很清楚，惟对八路军行动是不明了的。敌很难主动地找到我们决战。

八路军在抗战的战略战术上，军队政治上，群众工作与游击战争上，起到了推动和模范作用。蒋介石最近也逐渐相信八路军的作战指挥。他拨出七个师和一个旅，交八路军指挥作战，但八路军因为还没有重兵器，如大炮、坦克、飞机等，所以还不宜于从正面与敌人进行顽强、持久的阵地战。

（二）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仍然保持共产党的绝对领导。

中国共产党手里有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这是国民党最害怕的。汪精卫在去年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有两个不同的政府存在，而说是一个统一的政府；有两个不同的军队存在，而说是一个统一的军队。在法国人民阵线中，法国共产党就没有自己的政府和军队。中国共产党要统一战线，就要取消红军和苏区。

蒋介石在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时，初则只允许我们成立三个师，发给三个师的经费，不设总指挥部，要朱德、毛泽东出洋或到他的中央政府工作；继则想尽方法，削弱共产党在八路军中的领导。他要派副师长、参谋长及政治部副主任，要求把我们的军事干部调到他们的军队中工作，美其名曰“交换干部”，可以交换工作经验。我们的政治干部，则须调到南京受训后，才回原队工作。他要求八路军内的教育和管理，完全与他的军队一致等。

当时红军的数量，本来不只编三个师。为着避免过分的争执，我们就应允编成三个国防师。抗战起后，蒋介石才给了八路军总指挥部的名义。到山西后，更升为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他的其他要求，均被我们坚决拒绝了。直到最近，才准许他派四个联络参谋（每师一个，总司令部一个），这只是一种传达情报的性质。自然他还是想利用联络参谋来侦察八路军内部的情形，和进行瓦解我们军队的活动。我们不放松随时考察

其行动。

蒋介石在这些要求没有达到后，随即采取不补充八路军的办法，使八路军在抗战中消耗后，不能恢复和壮大。第一，他不补充我们的新兵，并采取一些办法限制我们自己扩大；第二，不补充我们的武器；第三，不增加我们的经费，并下令不准军队就地筹粮。除此以外，自然他还要进行一些秘密的办法来勾引和收买八路军的干部；不过在另外一方面，八路军能够打击敌人，他还是需要利用这一个力量，不得不接济我们必需的弹药和一定数量的衣服等。

在我们拒绝了他的要求的情形下，八路军虽然在名称上改变为国民革命军，但原来红军时代的各种制度仍然是保存着的，并仍旧保持着共产党在这一军队中的绝对领导。我们也公开向国民党提出：这一军队，是共产党领导的，共产党决不放弃或稍减弱对八路军的领导。

现在八路军中，团以上各级均有健全的政治机关，营有政治教导员，连有政治指导员，师、旅、团仍设有政治委员。营以上军政干部百分之百为共产党员，连排干部百分之九十是党员。各个连队，均有党的支部组织。全体军人中，在出发到山西时，党员占总数百分之四十五；现在因为部队扩大和战争中伤亡很多党员，党员占全体军人百分之二十。在八路军中，没有国民党的组织。共产党在八路军中有最高的威信和绝对的领导作用。

八路军的社会成分，仍然保持着工农成分占绝对多数。工人、手工业工人、雇农人数占全体的三分之一。贫农、中农占三分之二稍弱。此外有极少数的知识分子。在部队中经常进行党的主张、政策的系统教育。

八路军人员，虽然在战争中消耗了得不到政府的补充，而且自己扩大也受到一些限制，但我们仍然进行了扩大新兵的工

作。我们依靠了自己的努力，去补充在战争中的伤亡减员。我们党把扩大八路军作为自己的一个任务。

因为八路军与居民建立了很好的关系，而且有着过去的扩大军队的经验，我们在作战过程中，组织了一批有活动能力的干部与战士，在战区进行扩兵的工作。我们的扩兵，经过群众中的政治动员，群众极踊跃地自愿参加八路军。因此，我们新兵的补充并不感觉困难。去年三四个月内，我们在山西前线作战的军队，不仅补充了减员，而且扩大了三倍。只因为经费上的限制，我们在去年十二月底，就停止了扩兵的工作。如果经费、武器问题能够解决，八路军再扩大十万人，在今年年底即可以完成。

因为部队的迅速扩大，战争中一些干部的伤亡，现在部队中开始感到军事、政治干部的缺乏。目前正由后方的学校及前方各师与总司令部开办的随营学校，大批培养干部。

因为八路军受着经费的限制，现在部队是过着极苦的物质生活。许多扩大来的新兵，还没有发衣服、鞋袜、毯子，冬季没有棉衣；士兵虽规定每月发中国钱一元，作为买鞋袜、烟草等零用，但因为经费的困难而常常不能发给。伙食费虽规定每人每月为五元，但也不能发足。至于干部，则与士兵生活相等，虽曾规定零用钱连排长每月二元，营长每月三元，团长四元，师长与总司令五元，也因经费困难，不能经常发给。我们的干部的生活，与其他军队比较，是相差很远的。他们的薪水连长每月有百余元，师长有八百元，总司令在千元以上。

我们的武器也很缺乏，许多新兵现在还是徒手，或者拿着手榴弹去参加战斗。缴获敌人的枪支，自然可以补充一小部分，然而很不容易缴到完全好的。敌人打败仗时，往往将枪支打坏，缴来后不能使用。

除八路军外，现在中国沿长江流域，又组织了一支与八路

军性质相同的新四军。它在数量上比八路军小些，但也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

新四军是由保存在中国中部南部原有各个苏维埃区域，如江西苏区，福建苏区，浙南、皖浙赣、湘赣、湘鄂赣、湘鄂边、鄂豫皖等苏区的游击队集中起来组成的。这些区域的游击队，在三四年前，中国主力红军离开那些区域以后，保存在原有区域内同国民党军队进行过长期游击战争。他们在极困难的条件之下，进行了三四年的游击战争，故有极丰富的游击战争经验。

这些部队也有坚强的共产党的领导，内部也有很好的政治组织与工作，有很多的共产党员。国民党原来不愿意他们集中起来编成独立部队，而想编到他们军队里边去，经过长期交涉，才允许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由叶挺任军长。

新四军已由各个区域集中起来，大部分开到南京、芜湖、上海、杭州之间地区，进行游击战争。一部分在长江以北，深入安徽北部活动。

（三）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军事上的任务。

为着使得八路军及中国党所领导的其他军事力量，逐渐在抗日战争中起决定意义的作用，这就需要党以最大努力克服一切困难，继续在数量上能够扩大，并要在技术装备的水平上提高，使之成为近代化的军队，成为抗日战争中一支最有力的突击力量，一方面可以给敌人以很大打击，同时更能推动抗战各方面的进步。为着这个目的，中国党正在注意提高现有干部的军事技术水平，培养能够掌握新式兵器的干部与技术人员。

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中有其特殊重大的作用与意义，而且随着中日战争范围更加扩大，特别是万一武汉等城市失陷以后，它的作用意义更为重大。因为中国经济、地理、交通的许多条件，游击战争将成为最后战胜敌人的一个重要力量。在晋察冀

边区的经验告诉我们，游击战争是在敌人后方建立强大的新的军事力量的重要方法。中国党正以极大的努力，在敌人占领区域内开展人民的游击战争，并使中国党在游击战争中起到主要的领导作用。最近，正选派干部和一部分队伍，到敌人后方有战略意义的地区，创造像晋察冀边区同样的许多游击根据地。

估计到国民党还未放弃削弱我们军事力量的企图，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汉奸、托派等，必然想尽方法来破坏我们的军事力量。同时，我们现在的斗争环境，比过去苏维埃土地革命时代更为复杂，外界影响容易侵入我们队伍中来，故巩固部队中的共产党的领导，保持和发扬过去十年来红军的优良传统，提高一般指战员的政治水平，以最高度的警觉性，防止外界恶劣影响的侵入及托派、汉奸的破坏等，是目前中国党巩固自己的军事力量的最重要的任务。

群众运动的发展和中国共产党人的状况

（一）中国人民参加抗日斗争的一般情形。

在九个月抗战当中，中国人民一般的是英勇地起来参加抗日的各种斗争，然而有组织的群众运动，因为国民党还未能完全放弃控制包办政策，所以，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

中国人民经过大革命的教育，对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有很深的仇恨。因此，在这次抗战当中，虽然忍着巨大的牺牲，还是表示不愿屈服，而且人民参加抗战的各种斗争正在发展着，如游击战争的普遍发展便可看出。

这次日本帝国主义对付中国的人民，是采取最残酷的最野蛮的政策，企图镇压中国人民的抗战，造成中国人民的怕战心理。这就是在其占领区域内采取疯狂的烧杀、奸淫、掳掠方法，和用空军到中国内地到处肆意轰炸。凡是日军所到之地，

常将铁路、汽车路两旁的村镇、县城及附近房屋尽行烧毁，任意屠杀人民。特别是它在某一遭受中国军队的打击或游击队的袭击的地方，它便将这些城市或村落中未及逃走的居民，大肆杀戮。奸淫中国妇女，更是最普遍的现象，而且在日军中被承认是合法的行为。至于财产的掠夺，则更普遍。中国人民在敌人屠杀、奸淫、掳掠之下，对日本仇恨愈益加深。故在战区和被敌人占领地区，人民自动起来，用各种方式向敌人斗争。同时在中国后方，各种群众组织与各种活动也在发展。国民党虽想控制这一运动，然因群众力量的壮大，也就逐渐难于控制了。同时他们自己也采用一些方式去组织群众，想使已经起来的群众运动，仍得被其控制。

在各种群众抗日斗争中，工人阶级表现是先进的，积极的。特别是交通、军事工业工人，在最困难危险的状况中，他们不顾一切牺牲，修复被敌空军炸毁的铁道、桥梁，保证军事运输得以连续。在上海、山东等地和平汉、正太、同蒲、沪宁等铁路沿线敌人占领区域的各种工人，许多人自动组织游击队或参加群众武装组织。上海的工人，在上海战争时，组织有参战队，积极协助军队作战。

农民抗日斗争，在战区和敌人后方也极为活跃。在战区，他们担负着极繁重的军事劳役，如征集农民的骡马、车辆，帮助运输粮秣、弹药、伤兵，修筑工事及道路，参加武装组织等。在敌人后方区域，则有大批农民参加游击队及各种武装组织。但在中国后方地区农民的抗日斗争，除某些省份进行军事训练和两广农民运动有些发展外，尚未能很大地发动起来。

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在抗日运动中也表现了很大作用。学生除参加一般救国团体，进行后方宣传动员工作外，近几月以来，有大批青年学生加入军队。现在各省军及中央军收容了大

批青年学生，正在加紧军政训练，准备培养为军政干部。有些学生，直接加入军队里当兵；有些学生，参加到游击队中活动。城市贫民，特别是被占领区域的贫民，过着极苦的生活，他们中间有许多参加到军队中当兵。

妇女以至小孩，都有些积极的活动。组织有许多战地服务团，流动剧团，经常到前线做宣传慰劳工作，或在后方募集慰劳品，看护伤兵。如上海有一个儿童剧团，是由八岁到十八岁的工人和贫民的子女、小学生自动组成的。他们冒着一切危险，到前线与后方进行演剧宣传。

工人、农民、学生是抗战群众运动中最积极的力量，并且工人、农民的作用，正在一天天增加起来。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自抗战起后，他们是站在抗战方面的。他们希望战胜日本，但对抗战的胜利信心是不坚强的。在上海、南京、杭州、北平、天津、太原、青岛、济南等大城市失陷后，他们的企业受了很大损失。他们现在还是希望能战胜日本。但他们有过去大革命时代的经验，惧怕共产党取得抗日领导权，故对真正的群众运动表示畏惧。这反映在国民党的方针上，就是抑制群众运动的发展。

中国地主阶级，一部分大地主和绅士被日本利用，在敌人占领区域组织伪政府。中小地主在敌人残暴政策之下，对抗战还是表示一些同情。如在游击区域，他们还可以出一部分粮食，供给游击队。日本必然要找到中国地主阶级、绅士、官僚、老军阀和一些流氓，作为它统治占领区域的社会基础。故我们的政策，是不应过于使农民反对地主的斗争尖锐化，不要把地主阶级推向日本方面去，并争取其中某些部分能继续同情于抗日的斗争。

在大后方的人民中，有许多工人、职员，有的将自己每月工资的一部分捐作抗日报费，有的甚至将全部财产捐出。南洋

和美国的华侨，支援祖国抗日战争的热情高涨，对募捐也非常积极。

总之，中国人民虽然忍受战争的最大牺牲，他们还是坚决要求抵抗。不管国民党怎样想方设法去控制人民的抗日斗争，这一运动还是在日益发展、普遍与深入。战争愈持久下去，群众抗日斗争力量毫无疑问的是只有更加扩大更加强有力。

（二）中国党在群众中的活动及组织状况。

中国共产党在广大人民当中，有着很大的政治影响和威信。我党出版的各种刊物，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地位。党中央出版的《解放》周报，销售到三万余份。今年一月出版的《新华日报》，二月时已销售到二万余份。在武汉出版的《群众》周刊，近二万份。最近八路军政治部出版的《前线》周报，销数亦达万份。文化界和救国团体出版有大批刊物和小册子，是在我党影响之下，上海失陷前，有五十三种小刊物，其中有四十九种是在我党影响之下。武汉最近有四十种刊物，其中有三十八种是在我党影响之下。此外，在广州、长沙、重庆、成都、西安等地还有许多同情抗日或在我党影响之下出版的刊物杂志。许多书店，自动印发一些关于八路军的小册子，或汇集我党刊物上重要文章，出版小册子，因为有共产党人和八路军将领的文章，在中国销路特别大。

因为我党所号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功，我党获得公开或半公开地位，得到广大民众的拥护。但因为我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组织和工作，于过去十年内战期间，遭受国民党白色恐怖摧残有极大损失，在统一战线成功后，才开始恢复。陕西的党，在前年西安事变后，就逐渐恢复起来，在西安城及农村中，建立了一些基础。西安及各县的许多抗日救国的群众团体，是在我党影响之下。国民党曾下令要解散我们领导的团

体，现在正努力争取这些群众团体能够合法存在，并与国民党的群众运动求得统一起来。山西的党在八路军的协助之下，近半年来，也有很大的发展，并在山西的游击战争及群众团体中，起到很大的领导作用。山东、河南北部的党，也有新的发展，他们正在组织与领导游击战争。上海的党，在上海战争时，有些恢复与发展。自上海失陷后，许多同志难于立足，党的工作也就困难得多。广东、湖南、湖北、四川等地，也已经派了干部去恢复工作，最近恢复和建立了一些党的组织，但是党员数量还是不大；他们参加了国民党所允许的各种群众团体内的活动，扩大了我党的影响。在武汉，文化界救亡协会、学生救国联合会、妇女自卫抗战慰劳团等组织中，我们有很大的影响。然而我党在工人中的工作，还很薄弱。

国民党在抗战起后，只允许各地民众成立抗敌后援会，承认它为合法组织，并由国民党地方党部派人主持。另外各城市和交通工人中，过去有国民党的工会组织，然这些组织都没有广大群众基础。我党在群众运动方面，现正采取统一的方针。在工人运动中，即号召工人加入国民党的工会，不另成立独立工会；我们原有的赤色工会，也加入到国民党工会中去；在没有工会的地方，即用国民党允许的工会组织去建立工会。对工会和其他国民党允许合法存在的群众团体，逐渐充实其群众基础，争取内部民主，推动这些团体进步，并逐渐在其内部扩大我们的影响。

在敌人占领区域，我们党的活动比较自由，未受到国民党许多限制。这些区域，我们仍是采取统一战线方针。由我们在敌人后方恢复政权的地区，准许各个党派合法存在，并与之合作，共同恢复政权，建立群众工作。但在那些地方，我们是居于领导地位的。特别是我们建立的群众武装组织，更是保持在我党的绝对领导之下。

在群众斗争方面，我们注意到在可能范围内求得改善群众生活，不提出过高的口号与要求，并且采用合法方式，使群众改善生活的要求能够顺利地实现。一般地说，不是号召群众采取直接斗争的方法。

中国党在原来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工作，尚在恢复时期。党在这些区域的政治影响很大，而组织群众力量的工作则落在后面。特别是工人运动中，我们的力量尚薄弱。但是在抗战过程中，我们有着恢复和发展工作的条件，我们依靠党的正确的工作方针，群众运动是能够迅速发展的。党最近将召集的七次大会，对群众运动及工会工作，将有详细的讨论。

陕甘宁边区是由过去的苏维埃区域改变而成的。该区域内土地过去已经分配了，地主阶级已被打倒。党在边区内有强固基础，每个乡村都有党的支部组织。

我党在边区内的工作方针，是使边区成为统一战线的模范区域，同时又是中国最民主与进步的区域，拿这些去影响和推动国民党区域政权的进步。最近决定在边区允许国民党成立其党部，并且按照民主的原则，重新改选各级政府机关。在民主选举中，准许各个党派公开参加选举运动，并准备在新选举中，吸引一部分国民党人参加政府；并以边区内准许国民党公开活动来取得我党在国民党区域内公开活动的地位。

我们边区内正在加紧战争紧急动员工作。现在全边区有十万壮丁组成的自卫队，五万青年参加的少年先锋队，正在加紧军事上的训练，准备在必要时动员补充八路军。边区政府同时加紧领导群众的春耕运动，以增加耕地面积和农产品。

边区工人有工会组织，加入工会的有三万五千工人。除政府的印刷厂、兵工厂、被服厂外，均为农村手工业工人。工会

以外尚有边区青年救国联合会，包括有六万余会员；儿童团的组织，包括七万多儿童。

国民党要派它的中委丁惟汾来任边区政府主席，以前我们是拒绝了。后来我们同意了，而它尚未派来。到现在止，国民政府还尚未正式承认边区政府为合法组织。

（三）中国党在党的建设方面的任务。

中国党在最近两年来的努力，建立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中国走向反对日本侵略的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党的地位大大提高；党所领导的八路军，也起得了很大的推动中国军队进步的作用。中国党在中国抗日战争发展中，将要取得更加重大的领导和推动作用。依靠于中国党政策之是否正确，来决定中国是否能够坚持抗战直到最后胜利。正因为它在中华民族存亡命运中，有重大的决定作用，国内外的敌人，必然要设法来破坏中国党；故中国党更加要健全和发展自己的组织，巩固党在抗战中的领导，是党在建设问题上最基本的任务。

为着党在组织上动员群众的力量得到加强，发展党的组织，建立全国党的坚固基础，成为目前重要的工作。首先要在各个主要城市和产业、交通工人中，以及敌人占领区域内有重大军事战略意义地区，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大批吸引工人、农民及先进的青年学生，加入到党里来。

估计到党内主要成分是农民，和党在最近将有大批新的党员涌入，估计到一般党员对党的统一战线还缺乏深刻的了解，在工作中还表现着关门主义及旧的工作方式；同时，估计到日本帝国主义及国内阶级敌人托派等，必然要利用党的弱点来破坏党，因此，加紧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教育，提高党员的理论水平，保证党在思想上的一致，以高度警觉性，防止敌人和奸细的破坏，也是党

的迫切任务。

培养大批有独立工作能力的干部，改善和学习统一战线中群众工作的方式，建立地方党健全的领导机关，这又是推动党在全国工作能够迅速发展的重要的一环。

为着总结过去十年的工作，和保证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中国党决定最近召集党的第七次大会，现在全党正在进行准备工作。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出版的
《任弼时选集》刊印。

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 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

（一九三八年六月）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在听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活动的报告以后，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在复杂和困难条件之下，灵活地转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之结果，已建立起国共两党的新的合作，团结起民族的力量，去反对日本的侵略。为着继续向前执行这个正确的路线，以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特别是为着准备和进行最近将要召集的党的第七次大会，必须要特别注意以下的任务，作为中共代表团宣言中所提出的任务之补充。

（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没有和不能有限制参加统一战线各党派在政治上及组织上独立性之目的，这无论是对国民党、共产党或其他抗日的党派来说，都是如此。任何这种企图都足以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瓦解中国人民的抗战力量。孙中山

的三民主义：民族独立、民主自由及民生幸福，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基础，是全体中国人民在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所能适用的。诚心诚意地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工作，这是继续向前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必需的政治条件。孙中山学说内所要求的民权主义包含着尊重共产党及其他忠实于中国民族解放事业的政党的独立性。中国共产党从自己方面来说，用一切方法援助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政府，去实行一切必须的办法，以便胜利地进行武装抗日的斗争。共产党员应该诚恳地援助蒋介石，去反对日本强盗及其在华走狗的任何阴谋诡计。在保护祖国的事业上，共产党员应该用自己的忠诚、坚决、英勇、诚实及彻底性，来给全中国的爱国主义者一个好榜样。

（二）中国共产党员应该积极帮助国民政府，去实行征兵制，建立新军和动员全体人民来参加战争；加紧军队内军事技术的准备，提高军队内政治觉悟与纪律，巩固所有中国军队相互间的友爱关系及其与居民的友爱关系。共产党应该运用自己的经验和自己的一切能力，去在日本军队后方继续开展游击运动，要以光荣的八路军在山西的活动区域为模范，去帮助建立许多游击运动的根据地。

（三）中国共产党员应该用一切方法去帮助国防工业的发展，并使整个的国民经济适合于民族解放战争的需要，要使工人物质状况有相当改善，这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必要条件。在工人群众中进行有系统的工作，以达到提高他们的自觉性、纪律性及组织性之目的。

（四）中国共产党诚恳地援助国民政府及蒋介石，去坚决进行防卫战争，不仅不否认，而且正是包含着经常反对亲日的妥协的分子。他们企图投降日寇，与日寇妥协，并企图分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侵入国土的民族敌人，民族防卫战争的发展，人民对于日本野蛮强盗的仇恨及救国运动的高涨，就更

加造成在日本面前投降及妥协性之困难。但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侦探，特别是托派分子，经常企图利用各个政党间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权间相互不信任之残余，以挑拨内部的斗争，以分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实现“以华制华”的诡计。因此，必须共产党同国民党及其他进步分子的共同亲近，必须共同进行揭穿日本阴谋，消灭日本侦探、卖国贼及托派分子，孤立亲日派分子及那些自觉地帮助日本强盗的人们等等工作。

（五）国共合作在政治上是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及其共同进行民族防卫战争为基础。共产党的义务就要影响国民党，在实际上真正实行孙中山的进步原则。国民党的负责领导者放弃了数年来中国政府对于日寇的动摇政策，这已是不可争论的进步；坚持抗战下去，就推动国民党走上继续向前进步的道路。彻底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使国家民主化及满足民众的物质及社会要求这也是无疑义的。但是同时在国民党的队伍内及国民政府内还有保守的倾向活动着，这种保守倾向还有力地阻碍着国家民主化、劳动群众物质及法权地位之改善，劳动群众组织性之提高及民族统一战线的群众运动之开展。

所以，必须友谊地说服国民党的领导者、国民党员及国民党的一切拥护者，在军事环境之下，实行进步的民主的政策，不仅是可能的，并且是为着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利益着想所直接必需的。

（六）勇敢地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不否认并包含着在政治上、组织上各方面去巩固共产党本身。共产党的巩固，它的独立性及它的统一，正是继续向前发展民族统一战线和继续同日寇作胜利的斗争的基本保证。然而在边区及游击区以外、在广大领土内建立党的工作还是非常薄弱。所以必须在

全中国的领土，这首先是在大城市内，在军事战略区域内，在军事工业的工人中及在铁路工人中建立党的组织，把共产党变为强有力的全中国群众的党的组织，以适合党现在已有的政治影响。在日寇占领的领土内，特别是在大城市内，必须建立灵活的巩固的地下党的组织。

（七）职工运动方面，共产党员应该只是在合法的（国民党的）工会内工作，把赤色工会的所有存留下来的分子，都包括在这些工会内，在各地征收工人加入这些工会，并最彻底地拥护职工运动的统一。共产党员的努力应该是集中在扩大这些工会内部的民主，加入到这些工会内，并把工会变为真正广大群众的组织，达到改变工人的物质条件，提高他们的政治及文化水平，并吸收工人参加民族解放运动。

（八）在农民中工作方面，为着提高农民参加防卫战争的兴趣与积极性，必须改善他们空前未有的贫穷及无权的状况，用一切方法去帮助农民的组织，建立自卫队及其他合法的组织，特别是在战区附近及重要的军事战略区域内，这个工作非常重要。在日本占领区域内，必须组织农民参加游击队，并采用其他的斗争形式去反对日本匪贼。

（九）必须在中国少数民族中发展广泛的工作，吸收蒙古人、回人参加民族防卫斗争。日本帝国主义在他们中间进行着撞骗的及挑拨离间的工作。必须帮助蒙古人及回人自己组织起来，以保护自己的土地与生命，去反对日本强盗。

（十）中国共产党应该加紧和扩大八路军及新四军的战斗力。必须采用一切办法，去巩固在这些部队中政治的、党的工作及军事技术的准备。共产党员应该努力，使八路军及新四军用自己忠实于人民的事业，用英勇善战、高度的纪律及模范的政治工作，去表现自己为全中国军队中的先进突击部队。要特别注意克服一切孤立八路军及新四军的企图，要发展八路军及

新四军同中国军队各部队的接近与亲善，把自己的斗争经验转告他们，推动他们前进，使他们走上继续向前巩固战斗力、提高政治自觉性及军事纪律之道路。

继续用一切力量，在日军后方组织游击队及游击区域；共产党员应该在执行彻底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精神上，在承认中央国民政府的政权精神上，去进行这个工作。在日军及俘虏中到处都要组织政治解释工作。

在边区内应该实行彻底的政策与工作，以组织民众去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并要使边区民主化，使它成为中华民国全国中最民主的组成部分。

（十一）中国共产党应该经常巩固党的政治上、思想上及组织上的统一，并巩固党的队伍中之铁的纪律，必须最高限度地提高革命警惕性，有系统地考查干部及党员，清洗党内可疑的分子、暗藏的托派分子及其他敌人，并要有特别的办法去反对这些分子侵入党的队伍中来。

要特别注意日本侦探及国民党内反共分子用一切可能的阴谋诡计及其他方法，在中共领导同志中、干部中及八路军中造成分歧和纷乱的企图，来破坏中共领导的集体工作。保证党及八路军领导的团结，这是执行党的政策、巩固和国民党的合作及继续向前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最主要条件。

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学说，加紧教育干部及党员，重新训练现有干部，从群众革命运动中培养新的积极分子及领导者，并且有系统地消除一切关门主义及右的机会主义的投降倾向，这都是在巩固党的事业上所不可容缓的任务。

（十二）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批准中国共产党开除前中央委员张国焘之党籍。张国焘叛变了共产主义的事业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事业，而出卖给中国人民的敌人。主席团相

信：张国焘的叛变行为不仅在中国共产党的队伍内，并且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真诚的拥护者中，都会遇到完全的唾弃与蔑视。

在为中国人民谋自己解放的伟大斗争中，中国共产党还要克服许多困难。但是，共产国际执委会相信：英勇的中国共产党将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党的大会将给一个新的推动，去开展一切党的工作，而在伟大的中国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起光荣的作用。

根据《文献和研究》一九八五年第四期刊印。

注 释

〔1〕指马步芳、马鸿逵。

〔2〕《新华日报》是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的报纸。国民党当局虽然被迫同意该报出版，但对筹备工作百般刁难。该报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日在武汉正式创刊，数日后，国民党反动派又指使特务到报社印刷部寻衅闹事，捣毁机房，企图破坏报纸正常发行。由于报社全体同志的坚决斗争和不懈努力，保证了报纸的正常出版和发行。

〔3〕即陈绍禹。

〔4〕两党委员会，即国共两党关系委员会，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周恩来等在武汉与蒋介石会谈时协商成立的。委员会由中共代表周恩来、陈绍禹、秦邦宪、叶剑英和国民党代表陈立夫、张冲、刘健群、康泽组成。由于国民党方面缺乏诚意，两党委员会的工作未能取得积极成果。

开展河北的游击战争*

(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一日)

徐 向 前

河北在持久抗战上的意义

平汉、津浦两大南北平行的铁路干线，纵贯于河北境内，日寇向中国的腹地侵略，这两条干线，已成为转运兵力的重要枢纽。为牵制日寇的前进，截断日寇的运输，分散日寇的兵力，所以开展河北的游击战争，是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这是第一。

第二，河北有三千万以上广大人口，日寇想实现其“以华制华”的阴谋，与应付独霸东亚的大战，是需要大批的中国人民来替他做牛马当炮灰的。最近日寇在河北所占各县，成立伪组织“维持会”、“清乡军”，并强迫群众成立“护路队”等，便是明显的表现。我们为着持久抗战，增强抗日力量，削弱日寇的力量，开展游击战争，配合主力军作战，也必须要把河北的三千万以上的同胞，推动到抗战的阵线中来。

第三，河北是华北物产丰富之区，不仅有大量的粮食和其他物产，而且有居中国首位的棉花生产。棉花是火药制造的原料，也是日本国内特别发达的轻工业——纺织工业的原料，所以开展河北的游击战争，在打击日寇的资源掠夺上，也是很重

* 本文原载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一日出版的《群众》第一卷第二十三期。

要的。

总之，开展河北游击战争，在中国的持久抗战与取得抗战胜利上，是有其伟大意义的。河北游击战争的展开，可以破坏日寇在平汉、津浦两大铁路干线的交通运输，使日寇的资源掠夺、物资补充、兵力转移，陷于麻痹的状态；可以使日寇利用中国人打中国人的阴谋归于泡影；而且在扩大抗日的阵地，充实抗日的力量，即在供给抗日的资源上，对全国的抗战有极大的帮助。

建立平原地进行游击战争的观念

河北的地形，除西北两面的一部分是山地外，其余都是广漠无垠的平原地。如果单从战术上的眼光看来，游击队在平原上的活动，自然没有像山地那样多的地形上的便利，相反的敌人的机械化的兵种或骑兵，倒有较便利的条件了。因此或许有人会怀疑到平原地开展游击战争，也许会不可能。有些人说游击队既无山的依托与隐蔽，自然地形上的帮助是很少的，而人的两条腿又哪能跑过机器的汽车或坦克车呢？不错，在平原地上进行游击战争，上面这些困难，确实是存在着的，但这仅仅只是困难，不能因此作出平原地无法进行游击战争的结论。否则必然会否认华北广大平原地区的游击战争。这种观念，对于开展河北的持久抗战，扩大抗战的阵地，与充实抗战的人力物力，是非常有害的。

创造平原地的“人山”

游击队活动的依托，一面是地形上的便利条件，如山地森林等等；另一面是与广大人民的结合。游击队要自己能巩固和

发展并进行机敏的灵活的动作，其主要条件是取得广大人民的拥护与帮助。过去宝贵的经验，都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周恩来同志说：军队与游击队是鱼，而人民是水。这个比喻是最正确不过的。河北是人口较稠密的区域，假如我们能在河北平原地上，把广大的人民推动到抗日战线上来，把广大的人民造成游击队的“人山”，我想不管什么样的山，也没有这样的山好。

人民的力量是最伟大的力量，也只有这伟大无比的活动的力量，是日寇无法战胜的力量。我们要在平原地开展游击战争，就必须把广大的人民造成“人山”。但是如何能把散漫的人民造成团结的“人山”呢？那就必须在人民中进行广泛的教育说服、宣传组织等艰苦工作，提高人民的民族意识与政治觉悟，使人民本身的利益，与抗日的利益联系起来，使每个人认识到要想自己不受日本的蹂躏，那就只有为中华民族的自卫战争而牺牲一切，为民族的生存而奋斗到底。这是每个人的天职，是每个人应担负起的责任。凡是苟安贪生，把个人利益看得比国家民族利益高的观念，是极端有害的。殊不知“皮之不存，毛将安傅？”整个民族亡了，个人还有什么？

其次从日寇的力量上说，也可清楚的看到日寇虽然占据平汉、津浦铁路的北段及沿铁路的重要城市，但因为战区的日益扩大，战线的不断延长，与各地人民抗战武装的继续兴起，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日寇的兵力异常不够分配，这是日寇最痛苦的地方，所以日寇只能抓着交通线上要点的要点，而不能分兵深入各地。就是日寇在巩固沿铁路的要点上，也已使用了不少兵力，减弱了对我们进攻的力量。这一时期平汉线上的交通，常遭我游击队之破坏与威胁，已使日寇东奔西突，南增北援，大有疲于奔命之苦了。

日寇因感到兵力的不敷分配，交通的难于维持，于是在到

达之处，便收买汉奸，成立伪组织——“维持会”与“清乡军”、“光复军”等，企图利用汉奸的政权以实现其“以华制华”的毒计，而补其兵力不足之弱点；同时大杀大烧，镇压日益开展的人民抗日运动，并用阴谋诡计，挑拨离间，分裂抗日军队与人民的团结。但这些并没有收到好大的效果，并且在中国的民族觉悟中与抗战团结之下，受到了严重的打击。日寇的奸掠烧杀，激起了中国人民仇恨的心理。

游击队的经常胜利，不仅保全了千万人的生命财产，而且还给予日寇以大大小小的打击，更提高了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兴奋了人民参加游击战争的勇气。

无论从主观上客观上说来，造成“人山”的条件是具备的。但是必须同样的指出，空喊是不成的，我们必须有进行这种工作的决心，一切的游击队必须有良好的纪律，具有抗日的高度积极性，在一切行动中，真正表现自己是为民族利益而斗争，真正站在保护人民的利益上，才能造成“人山”。这是政治上最主要工作。

几个战术上和组织上的问题

甲、河北人户稠密，这些一望无际、连绵不断的村庄，就是游击队最好的辗转活动的依托。这些稠密的村庄，可以隐蔽行动，可以秘密企图，又可作为埋伏袭击敌人的据点。但是村庄只能作为袭击的掩护，而不是待敌人来打时，作为固守的据点。

乙、平原地是利于骑兵活动的，最好组织一些骑兵游击队的支队。因为骑兵的运动性大，可以迅速移转地区，不易受敌人包围，可以远距离的向敌人防御疏忽与薄弱之点，实施突然的袭击，使敌难于防备，疲于奔命。但骑兵支队的兵力，不应

过大，过大即有笨重之累，且难于隐蔽自己的行动与防空。

丙、一般游击队的组成，都同样不宜过大。尤其在敌人机械化兵种的袭击与飞机的扰乱下，必须以机敏的迅速的动作隐蔽起来，与迅速转移另一地区。兵力过大，是不宜于这种战术要求的。但是许多游击队中必须有基于游击队的组织，在基于游击队的周围，繁殖与组成或分遣若干的小游击队。这些小游击队的作用，是在基于队的周围进行侦察、警戒，袭击敌人，迷惑敌人，牵制敌人，截断敌人交通，配合基干部队作战。

丁、游击队的主力应位于可以四面周转的地区。在情况有利下，可以迅速突击敌人；在情况不利时也可以迅速转移另一地区。所以游击队的根据地或休整的场所，应该多取几个，并且要相互间有很好的联络。

戊、脚踏车在平原地上运动是比较迅速的，利用它作为交通工具是最好的。而且还可以组成脚踏车游击小组，作远距离行程上的活动。尤其对于施行突然袭击，炸毁敌人疏于防卫的土工建筑物与仓库等是有相当作用的。在这种场合，并不在于兵力的相当大，而是在于乘敌不备的无法防卫的突然动作。

加紧河北地区的工作，开展河北游击战争

现在日寇在各地的奸掠烧杀所造成的种种惨状，迫使河北同胞不能不起来与日寇作自卫的战争。推动这些民间武装，使他们走上抗日的道路，是异常紧迫的工作。但这个工作，不仅各方面在精神上、物质上、人力上予他们以帮助，而且必须在政治上提高其民族意识与政治觉悟，调解相互间的争端，加强抗日的团结，逐渐消灭其宗派门户之见，逐渐破除其落后迷信

的思想，使其在抗日的过程中，锻炼成为国防的力量。这是目前在河北开展游击战争的任务之一。

特别是河北地区民间枪支很多，民性强悍，最近各地武装组织猛烈的扩大，都是我们在河北开展游击战争的有利条件，但必须认识这些武装部队多系自发的无组织与无纪律的。一般存在着下面的弱点：

第一，游击战争的组织还没有普遍，过去大家对这一问题的注意也极不够。

第二，现有的武装部队，多半带有封建性（如红枪会、天门会等等）与多少带有土匪性。这些武装组织相互间还存在着一些宗派门户的成见，私人利害观念尚未克服，因之动作极不一致，配合也不密切。甚至在日寇汉奸的阴谋挑拨下，互相猜忌，互相争夺，引起了一些蠢笨的行为，减低了抗战的力量，客观上替日寇起了“以华制华”的作用。

第三，有一部分在日寇的威胁利诱下，走上了伪组织、伪军的道路，但这只是个别上层分子的私欲行为，而广大的下层群众是反对这种叛卖国家民族的无耻行为的。

只要我们有正确的政策，有艰苦卓绝的工作精神，把我们的工作重心放在争取每一个中国人、每一个武装部队到抗战道路上来，只要我们有决心去组织与进行河北的艰苦的游击战争，我们便一定能够创造广大的“人山”，创造出许多平原游击战争的经验与英勇奋斗的光辉篇章，以最后配合主力，葬送日本帝国主义，收复我们的失地。

开展河北的游击战争，把游击战争的火焰在河北各地广泛地燃烧起来！

根据解放军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
《徐向前军事文选》刊印。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徐州 失守后长江以北工作 给长江局的指示

（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二日）

长江局：

徐州失守后，对长江以北的工作，我们有以下的建议：

（一）立刻成立鄂豫皖省委，领导津浦路以西，平汉路以东，浦信公路以南的广大地区的工作。将现在湖北省委的主要干部，大部派去加强省委与各主要地区的工作。设省委，中心任务是武装民众，准备与发动游击战争，有计划的建立几个基干游击队与游击区，用一切力量争取高敬亭支队在党的领导下，使之成为这一区域的主力。

（二）即指示河南省委，动员沿平汉、陇海两铁路线，要所有中心城市的大批学生、工人、革命分子到乡村中去组织与领导群众，准备与发动游击战争，组织游击队，建立游击区。省委目前即应将河南省划为二个主要区域，以津浦线、陇海线、平汉线、信浦公路中间的豫东与皖西北为一个区；陇海线以南、平汉线以西为一个区。省委负责人首先应以一部分到豫皖边工作，并建立豫皖边工作委员会，以统一领导，准备将来成立省委。省委另一部分准备即向豫西移动，加强豫西工作，作将来与鄂豫边特委在一起，即以鄂豫边为根据地，领导豫皖边工委、鄂豫边特委及整个河南省的工作。

(三) 应大批动员住在武汉的鄂豫皖三省的学生、失业工人、革命分子，回到自己的家乡去领导保卫家乡与反抗暴日的游击战争，应鼓励集中在武汉的人才大批到长江以北的乡村中去工作。长江局应有计划的分配党员去这些地方建立各地党的领导机关，大大发展党的工作与党的组织。为此目的，武汉城市工作受到部分损失，是不应顾惜的。

(四) 汉水流域党的工作，应有必要的布置。

(五) 在津浦路以东、陇海路以南、长江以北的江北广大地区内，即应建立一个能独立领导工作的工委，其主要任务为发展游击战争，江苏省委即应派一些得力干部去，并应从上海有系统的动员学生、工人、积极分子、革命分子、党员到那里去工作。

中央书记处

养辰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刊印。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一九三八年五月)

毛 泽 东

第一章 为什么提起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抗日战争中，正规战争是主要的，游击战争是辅助的。这一点，我们已经正确地解决了。那末，游击战争就只有战术问题，为什么提起战略问题呢？

如果我们是一个小国，游击战争只是在正规军的战役作战上起些近距离的直接的配合作用，那就当然只有战术问题，没有什么战略问题。又如果中国也像苏联那样的强大，敌人进来，很快就能赶出，或虽时间较久，但是被占地区不广，游击战争也只是一种战役的配合作用，当然也只有战术问题，没有什么战略问题。

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发生的：中国既不是小国，又不像苏联，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这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被另一个小而强的国家所攻击，但是这个大而弱的国家却处于进步的时代，全部问题就从这里发生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敌人占地甚广的现象发生了，战争的长期性发生了。敌人在我们这个大国中占地甚广，但他们的国家是小国，兵力不足，在占领区留了很多空虚的地方，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主要

* 本文原载一九三八年五月三十日出版的《解放》第四十期。

地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并且由于中国的进步，就是说有共产党领导的坚强的军队和广大的人民群众存在，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不是小规模，而是大规模的；于是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等等一全套的东西都发生了。战争的长期性，随之也是残酷性，规定了游击战争不能不做许多异乎寻常的事情，于是根据地的问题、向运动战发展的问题等等也发生了。于是中国抗日的游击战争，就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要求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样又广大又持久的游击战争，在整个人类的战争史中，都是颇为新鲜的事情。这件事是同时代进步到二十世纪的三四十年代一事分不开的，是同共产党和红军的存在分不开的，这乃是问题的焦点所在。我们的敌人大概还在那里做元朝灭宋、清朝灭明、英占北美和印度、拉丁系国家占中南美等等的好梦。这等梦在今天的中国已经没有现实的价值，因为今天的中国比之上述历史多了一些东西，颇为新鲜的游击战争就是其中的一点。假如我们的敌人少估计了这一点，他们就一定要在这一点上面触一个很大的霉头。

这就是抗日游击战争虽然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仍然处于辅助的地位，但是必须放在战略观点上加以考察的理由。

那末，为什么不将抗日战争的一般战略问题中的东西用之于游击战争呢？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本来是密切地联系于整个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的，许多东西二者都是一致的。然而游击战争又区别于正规战争，它本身有其特殊性，因而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颇有许多特殊的東西；抗日战争的一般战略问题中的东西，决不能照样用之于特殊情形的游击战争。

第二章 战争的基本原则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

在具体地说到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之先，还要说一说战争的基本问题。

一切军事行动的指导原则，都根据于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尽可能地保存自己的力量，消灭敌人的力量。这个原则，在革命战争中是直接地和基本的政治原则联系着的。例如中国抗日战争的基本政治原则即政治目的，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在军事上实行起来，就是以军事力量保卫祖国，驱逐日寇。为达到这个目的，在军队本身的行动上，就表现为：一方面，尽可能地保存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尽可能地消灭敌人的力量。何以解释战争中提倡勇敢牺牲呢？每一战争都须支付代价，有时是极大的代价，岂非和“保存自己”相矛盾？其实一点也不矛盾，正确点说，是相反相成的。因为这种牺牲，不但是为了消灭敌人的必要，也是为了保存自己的必要——部分的暂时的“不保存”（牺牲或支付），是为了全体的永久的保存所必需的。在这个基本的原则上，发生了指导整个军事行动的一系列的所谓原则，从射击原则（荫蔽身体，发扬火力，前者为了保存自己，后者为了消灭敌人）起，到战略原则止，都贯彻这个基本原则的精神。一切技术的、战术的、战役的、战略的原则，都是执行这个基本原则时的条件。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原则，是一切军事原则的根据。

第三章 抗日游击战争的六个具体战略问题

现在我们来看，抗日游击战争的军事行动，应该采取些什

么方针或原则才能达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目的呢？因为抗日战争中（乃至一切革命战争中）的游击队一般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故在保存自己之外，还须加上一个发展自己。所以问题是：应该采取些什么方针或原则才能达到保存或发展自己和消灭敌人的目的呢？

总的说来，主要的方针有下列各项：（一）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二）和正规战争相配合；（三）建立根据地；（四）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五）向运动战发展；（六）正确的指挥关系。这六项，是全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纲领，是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配合正规战争，争取最后胜利的必要途径。

第四章 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

这里又可以分为四点来说：（一）防御和进攻，持久和速决，内线和外线的关系；（二）一切行动立于主动地位；（三）灵活地使用兵力；（四）一切行动的计划性。

先说第一点。

整个的抗日战争，由于日寇是强国，是进攻的，我们是弱国，是防御的，因而决定了我们是战略上的防御战和持久战。拿作战线来说，敌人是外线作战，我们是内线作战。这是一方面的情形。但是在又一方面，则适得其反。敌军虽强（武器和人员的某些素质，某些条件），但是数量不多，我军虽弱（同样，仅是武器和人员的某些素质，某些条件），但是数量甚多，加上敌人是异民族侵入我国，我们是在本国反抗异民族侵入这

个条件，这样就决定了下列的战略方针：能够而且必须在战略的防御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在战略的持久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在战略的内线作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这是整个抗日战争应该采取的战略方针。正规战争是如此，游击战争也是如此。游击战争所不同的，只是程度上或表现形式上的问题。游击战争是一般地用袭击的形式表现其进攻的。正规战争虽然也应该而且能够采用袭击战，但是其出敌不意的程度比较小一些。在游击战，速决性的要求是很大的，战役和战斗中包围敌人的外线圈则很小。这些都是和正规战不同的地方。

由此可知，游击队的作战，要求集中可能多的兵力，采取秘密和神速的行动，出其不意地袭击敌人，很快地解决战斗；而要力戒消极防御，力戒拖延，并力戒临战分散兵力。当然，游击战争中不但战略上有防御，战术上也是有防御的；战斗时的钳制和警戒方面，隘路、险地、河川或村落等处为着消耗敌人和疲惫敌人的抵抗配置，退却时的掩护部队等等，都是游击战争中战术上的防御部分。然而游击战争的基本方针必须是进攻的，和正规战争比较起来，其进攻性更加大些，而且这种进攻必须是奇袭，大摇大摆大吹大擂地暴露自己，是较之正规战更加不能许可的。游击战争虽然也有坚持数天的战斗场合，例如攻击某个孤立无援的小敌，但一般的作战较之正规战更加要求迅速地解决战斗，这是被敌强我弱的情况规定的了。游击战争本来是分散的，所以成其为普遍的游击战，且在许多任务，例如扰乱、钳制、破坏和做群众工作等，都以分散兵力为原则；然而就一个游击部队或游击兵团，当着执行消灭敌人的任务，尤其是为着打破敌人的进攻而努力时，就仍须集中其主要的兵力。“集中大力，打敌小部”，仍然是游击战争战场作战的原则之一。

由此也就可知，从整个的抗日战争看来，只有将正规战和

游击战的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集合了很多，即从进攻战中打了很多的胜仗，才能达到战略防御之目的，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只有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集合了很多，即是使得很多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都能因迅速解决战斗之故而取得了胜利，才能达到战略持久的目的，一方面争取时间加强抗战力量，同时促进和等候国际形势的变动和敌人的内溃，以便举行战略反攻，驱逐日寇出中国。也只有每战集中优势兵力，不论在战略防御时期也好，在战略反攻时期也好，一律采取战役和战斗中的外线作战，包围敌人而消灭之，不能包围其全部，也包围其一部，不能消灭所包围之全部，也消灭所包围之一部，不能大量俘虏所包围之敌，也大量杀伤所包围之敌。集合很多这样的歼灭战，才能转变敌我形势，将敌之战略包围，即敌之外线作战方针根本击破，最后配合国际的力量和日本人民的革命斗争，共同围剿日本帝国主义而一举消灭之。这些结果，主要地依靠正规战取得，游击战只有次一等的成绩。但是集合许多小胜化为大胜，则是正规战游击战所共同的。游击战争在抗日过程中起着伟大的战略作用，就是说的这一点。

现在来说游击战争的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的问题。

游击战争的主动性是什么呢？

一切战争的敌我双方，都力争在战场、战地、战区以至整个战争中的主动权，这种主动权即是军队的自由权。军队失掉了主动权，被逼处于被动地位，这个军队就不自由，就有被消灭或被打败的危险。本来战略的防御战和内线作战，争取主动较为困难些，而进攻的外线作战，争取主动较为容易些。但是日本帝国主义有两个基本的弱点，即是兵力不足和异国作战。并且因其对中国力量的估计不足和日本军阀的内部矛盾，产生了许多指挥的错误，例如逐渐增加兵力，缺乏战略的协同，某种时期没有主攻方向，某些作战失去时机和有包围无歼灭等

等，可以说是他的第三个弱点。这样，兵力不足（包括小国、寡民、资源不足和他是封建的帝国主义等等），异国作战（包括战争的帝国主义性和野蛮性等等），指挥笨拙，使得日本军阀虽然处在进攻战和外线作战的有利地位，但其主动权却日益减弱下去。日本目前还不愿也不能结束战争，它的战略进攻也还没有停止，但是大势所趋，它的进攻是有一定限度的，这是三个弱点所产生的必然结果，无限止地吞灭全中国是不可能的。会有一天日本要处于完全的被动地位，这种情况现在就可以开始看出来。中国方面，开始时战争颇处于被动，现在因有了经验，正在改取新的运动战的方针，即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速决战和外线作战的方针，加上普遍发展游击战的方针，所以主动地位正在日益建立起来。

游击战争的主动权问题，是更加严重的问题。因为游击队大多处于严重的环境，这就是无后方作战的状态，敌强我弱的状态，缺乏经验的状态（这是说那些新成立的游击队）和不统一的状态等等。但是游击战争是能够建立其主动权的，主要的条件就是抓住上述敌人的三个弱点。欺他兵力不足（从整个战争看来），游击队就可以放手争取广大的活动地区；欺他是异民族，且执行极端的野蛮政策，游击队就可以放手争取千百万人民的拥护；欺他指挥笨拙，游击队就可以放手发挥自己的聪明。一切敌人的这些弱点，正规军也应捉住，作为自己战胜敌人的资本，但游击队尤其应当注意捉住。游击队自己的弱点，可以在斗争中逐渐减少。且其弱点有时正成为争取主动地位的条件，例如正是因为自己弱小，才利于在敌人后方神出鬼没地活动，敌人无奈他何，这样大的自由是庞大的正规军所不能得到的。

游击队的主动权，在敌人举行数路围攻的场合，是难于掌握和容易丧失的。在这种场合，如果估计和处置得不正确，就容易处于被动，因而打不破敌人的围攻。在敌取守势我取攻势

时，也有这种情形。所以主动权是从正确的情况估计（敌我双方的情况）和正确的军事政治处置产生的。不合客观情况的悲观的估计和随之而来的消极的处置，无疑地将丧失主动权，把自己抛入被动地位。但是同样，不合客观情况的过于乐观的估计和随之而来的冒险（不需要的那种冒险）的处置，也将丧失主动权，而最后归入悲观者一路。主动权不是任何天才家所固有的，只是聪明的领导者从虚心研究和正确的估计客观情况，正确地处置军事政治行动所产生的东西。因此，是要有意识地去争取的东西，不是现成的东西。

已经因为估计和处置错误，或者因为不可抗的压力，被迫处于被动地位了的时候，这时的任务就是努力脱出这种被动。如何脱出法，须依情况而定。在许多情况下，“走”是必须的。游击队的会走，正是其特点。走是脱离被动恢复主动的主要的方法。但是不限于这一方法。往往在敌人十分起劲自己十分困难的时候，正是敌人开始不利，自己开始有利的时候。往往有这种情形，有利的情况和主动的恢复，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现在来说灵活性。

灵活性就是具体地表现主动性的东西。灵活地使用兵力，是游击战争比较正规战争更加需要的。

必须使游击战争的指导者明白，灵活地使用兵力，是转变敌我形势争取主动地位的最重要的手段。根据游击战争的特性，兵力的使用必须按照任务和敌情、地形、居民等条件作灵活的变动，主要的方法是分散使用、集中使用和转移兵力。游击战争的领导者对于使用游击队，好像渔人打网一样，要散得开，又要收得拢。当渔人把网散开时，要看清水的深浅、流的速度和那里有无障碍，游击队分散使用时，也须注意不要因情况不明、行动错误而受损失。渔人为了收得拢，就要握住网的

绳头，使用部队也要保持通讯联络，并保持相当主力在自己手中。打鱼要时常变换地点，游击队也要时常变换位置。分散、集中和变换，是游击战争灵活使用兵力的三个方法。

一般地说来，游击队当分散使用，即所谓“化整为零”时，大体上是依下述几种情况实施的：（一）因敌取守势，暂时无集中打仗可能，采取对敌实行宽大正面的威胁时；（二）在敌兵力薄弱地区，进行普遍的骚扰和破坏时；（三）无法打破敌之围攻，为着减小目标以求脱离敌人时；（四）地形或给养受限制时；（五）在广大地区内进行民众运动时。但不论何种情况，当分散行动时都须注意：（一）保持较大一部分兵力于适当的机动地区，不要绝对地平均分散，一则便于应付可能的事变，一则使分散执行的任务有一个重心；（二）给各分散部队以明确的任务、行动的地区、行动的时期、集合的地点、联络的方法等。

集中使用兵力，即所谓“化零为整”的办法，多半是在敌人进攻之时为了消灭敌人而采取的；也有在敌人取守势时，为了消灭某些驻止之敌而采取的。集中兵力并不是说绝对的集中，集中主力使用于某一重要方面，对其他方面则留置或派出部分兵力，为钳制、扰乱、破坏等用，或作民众运动。

按照情况灵活地分散兵力或集中兵力，是游击战争的主要的方法，但是还须懂得灵活地转移（变换）兵力。当敌人感到游击队对他有了大的危害时，就会派兵镇压或举行进攻。因此，游击队要考虑情况，如果可以打时，就在当地打仗；如果不能打时，就应不失时机，迅速地转移到另一方向去。有时为着各个击破敌人，有刚才在这里消灭了敌人，又立即转移到另一方向去消灭敌人的；也有在这里不利于战斗，要立即脱离此敌转移到另一方向去进行战斗的。如果敌情特别严重，游击部队不应久留一地，要像流水和疾风一样，迅速地移动其位置。

兵力转移，一般都要秘密迅速。经常要采取巧妙的办法，去欺骗、引诱和迷惑敌人，例如声东击西、忽南忽北、即打即离、夜间行动等。

分散、集中和转移的灵活性，都是游击战争具体地表现主动性的东西；死板、呆滞，必至陷入被动地位，遭受不必要的损失。但领导者的聪明不在懂得灵活使用兵力的重要，而在按照具体情况善于及时地实行分散、集中和转移兵力。这种善观风色和善择时机的聪明是不容易的，惟有虚心研究，勤于考察和思索的人们可以获得。为使灵活不变为妄动，慎重地考虑情况是必要的。

最后说到计划性问题。

游击战争要取得胜利，是不能离开它的计划性的。乱干一场的想法，只是玩弄游击战争，或者是游击战争的外行。不论是整个游击区的行动或是单个游击部队或游击兵团的行动，事先都应有尽可能的严密的计划，这就是一切行动的预先准备工作。情况的了解，任务的确定，兵力的部署，军事和政治教育的实施，给养的筹划，装备的整理，民众条件的配合等等，都要包括在领导者们的过细考虑、切实执行和检查执行程度的工作之中。没有这个条件，什么主动、灵活、进攻等事，都是不能实现的。固然正规战争的计划性更大些，游击战争的条件不容许很大的计划性，如果企图在游击战争中实行高度的严密的计划工作，那是错误的；但依照客观条件允许的程度，采取尽可能的严密的计划，则是必要的，须知同敌人斗争是一件不能开玩笑的事情。

上面所说的各点，说明了游击战争战略原则的第一个问题——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中的进攻战，持久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这是游击战争战略原则的最中心的问题。解决了这个问题，游击战争的胜利就有了军

事指导上的重要的保证。

这里虽说了许多的东西，但一切都环绕于战役和战斗的进攻。主动地位只有在进攻胜利之后，才能最后地取得。一切进攻战也都要主动地组织之，不要被迫地采取进攻。灵活地使用兵力，环绕于为着进攻战这个中心；计划性的必要，主要地也是为了进攻的胜利。战术上的防御手段，离开直接或间接协助进攻，则毫无意义。速决是说的进攻的时间，外线是说的进攻的范围。进攻是消灭敌人的唯一手段，也是保存自己的主要手段，单纯的防御和退却，对于保存自己只有暂时的部分的作用，对于消灭敌人则完全无用。

这个原则，正规战争和游击战争是基本上同一的，只在表现形式上有程度的不同。但在游击战争中注意这个不同是重要的和必要的。正是因为这个不同的表现形式，所以使游击战争的作战方法区别于正规战争的作战方法；混淆了这个不同的表现形式，游击战争是不能胜利的。

第五章 和正规战争相配合

游击战争战略问题的第二个问题，是和正规战争相配合的问题。这是依据游击战争具体行动的性质，说明它在作战上和正规战争的关系。认识这种关系，对于有效地战胜敌人，是有重要意义的。

游击战争和正规战争的配合有三种：战略的、战役的和战斗的。

整个游击战争，在敌人后方所起的削弱敌人、钳制敌人、妨碍敌人运输的作用，和给予全国正规军和全国人民精神上的鼓励等等，都是战略上配合了正规战争。例如东三省的游击战争，在全国抗战未起以前当然不发生配合问题，但在抗战起来

以后，配合的意义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了。那里的游击队多打死一个敌兵，多消耗一个敌弹，多钳制一个敌兵使之不能入关南下，就算对整个抗战增加了一分力量。至其给予整个敌军敌国以精神上的不利影响，给予整个我军和人民以精神上的良好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至于平绥、平汉、津浦、同蒲、正太、沪杭诸铁路线两旁的游击战争，所起战略的配合作用，更加容易看到。它们不但在现时敌人举行战略进攻时配合正规军起了战略防御的作用；又不但在敌人结束其战略进攻转入保守占领地时，将配合正规军妨碍敌之保守；而且将于正规军举行战略反攻时，配合正规军击退敌军恢复整个的失地。游击战争在战略上的伟大的配合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游击队和正规军的领导者们，都应明确地认识其作用。

不但如此，游击战争还有其战役的配合作用。例如，太原北部忻口战役时，雁门关南北的游击战争破坏同蒲铁路、平型关汽车路、阳方口汽车路，所起的战役配合作用，是很大的。又如敌占风陵渡后，普遍存在于山西各地的游击战争（主要是由正规军进行的），对于配合陕西、河南两省沿黄河西南两岸的防御战，所起的战役配合作用更是很大的。再如敌攻鲁南时，整个华北五省的游击战争，对于配合鲁南我军的战役作战，也尽了相当的力量。在这个任务上，一切处于敌后的游击根据地的领导者们，或临时被派出的游击兵团的领导者们，必须好好地配置自己的力量，各依当时当地的情况，采用不同的方法，向着敌人最感危害之点和薄弱之点积极地行动起来，达到削弱敌人、钳制敌人、妨碍敌人运输和精神上振奋内线上各个战役作战军之目的，尽其战役配合的责任。如果各游击区或各游击队只是各干各的，不顾战役作战的配合，虽在总的战略作战上仍不失其配合作用，但由于没有战役作战的配合，也就减少了它们的战略配合的意义。这一点是一切游击战争的领导

者应该深切地注意的。为达此目的，无线电通讯之普遍地设置于一切较大的游击部队和游击兵团，实有完全的必要。

最后，战斗的配合，即战场作战的配合，是一切内线战场附近的游击队的任务，这一项当然只限于靠近正规军的游击队，或临时从正规军派出的游击队。在这种场合，游击队应该依正规军首长的指示，担负其所指定的任务，往往是担负钳制部分的敌人，妨碍敌之运输，侦察敌情，充当向导等。没有正规军首长的指示时，游击队也应自动地做这些事。坐视不理，不游不击，或游而不击的态度，是要不得的。

第六章 建立根据地

抗日游击战争战略问题的第三个问题，是建立根据地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是随着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而来的。因为失地的恢复须待举行全国的战略反攻之时，在这以前，敌人的前线将深入和纵断我国的中部，小半甚至大半的国土被控制于敌手，成了敌人的后方。我们要在这样广大的被敌占领地区发动普遍的游击战争，将敌人的后方也变成他们的前线，使敌人在其整个占领地上不能停止战争。我们的战略反攻一日未能举行，失地一日未能恢复，敌后游击战争就应坚持一日，这种时间虽不能确切断定，然而无疑地是相当地长，这就是战争的长期性。同时敌人为了确保占领地的利益，必将日益加紧地对付游击战争，特别在其战略进攻停止之后，必将残酷地镇压游击队。这样，长期性加上残酷性，处于敌后的游击战争，没有根据地是不能支持的。

游击战争的根据地是什么呢？它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没有这种战略基地，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

的实现就失掉了依托。无后方作战，本来是敌后游击战争的特点，因为它是同国家的总后方脱离的。然而，没有根据地，游击战争是不能够长期地生存和发展的，这种根据地也就是游击战争的后方。

历史上存在过许多流寇主义的农民战争，都没有成功。在交通和技术进步的今日而企图用流寇主义获得胜利，更是毫无根据的幻想。然而流寇主义在今天的破产农民中还是存在的，他们的意识反映到游击战争的领导者们的头脑中，就成了不要或不重视根据地的思想。因此，从游击战争的领导者们的头脑中驱除流寇主义，是确定建立根据地的方针的前提。要或不要根据地、重视或不重视根据地的问题，换句话说，根据地思想和流寇主义思想的斗争的问题，是任何游击战争中都会发生的，抗日游击战争在某种程度上也不能是例外。因此，同流寇主义作思想斗争，将是一个不可少的过程。只有彻底地克服了流寇主义，提出并实行建立根据地的方针，才能有利于长期支持的游击战争。

在说明了根据地的必要和重要性之后，下面的问题是实行建立根据地时必须认识和解决的。这些问题是：几种根据地，游击区和根据地，建立根据地的条件，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敌我之间的几种包围。

第一节 几种根据地

抗日游击战争的根据地大体不外三种：山地、平地和河湖港汊地。

山地建立根据地之有利是人人明白的，已经建立或正在建立或准备建立的长白山、五台山、太行山、泰山、燕山、茅山等根据地都是。这些根据地将是抗日游击战争最能长期支持的场所，是抗日战争的重要堡垒。我们必须到一切处于敌后的山

岳地带去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起根据地来。

平地较之山地当然差些，然而决不是不能发展游击战争，也不是不能建立任何的根据地。河北平原、山东的北部和西北部平原，已经发展了广大的游击战争，是平地能够发展游击战争的证据。至于能否在平原地区建立长期支持的根据地，这一点现在还没有证明；但是建立临时的根据地和小部队的或季候性的根据地，则前者现在已经证明，后者也应该说是可能的。因为一方面，敌人兵力不够分配，又执行着前无古人的野蛮政策，另一方面，中国有广大的土地，又有众多的抗日人民，这些都提供了平原能够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临时根据地的客观条件；如再加上指挥适当一条，则小部队的非固定的长期根据地之建立，当然应该说是可能的。大抵当敌人结束了他的战略进攻，转到了保守占领地的阶段时，对于一切游击战争根据地的残酷进攻的到来，是没有疑义的，平原的游击根据地自将首当其冲。那时，在平原地带活动的大的游击兵团将不能在原地长期支持作战，而须按照情况，逐渐地转移到山地里去，例如从河北平原向五台山和太行山转移，从山东平原向泰山和胶东半岛转移。但是保持许多小的游击部队，分处于广大平原的各县，采取流动作战，即根据地搬家，一时在此一时在彼的方法，在民族战争的条件下，不能说没有这种可能。至于利用夏季的青纱帐和冬季的河川结冰之季候性的游击战争，那是断然可能的。在现时敌人无力顾及和将来顾及也难周到的条件下，确定在现时广泛地发展平原的游击战争，并建立临时根据地的方针，在将来准备坚持小部队的游击战争，至少坚持季候性的游击战争，并建立非固定的根据地的方针，是完全必要的。

依据河湖港汊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根据地的可能性，客观上说来是较之平原地带为大，仅次于山岳地带一等。历史上所谓“海盗”和“水寇”，曾演过无数的武剧，红军时代的洪

湖游击战争支持了数年之久，都是河湖港汊地带能够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根据地的证据。不过，各个抗日党派和抗日人民，至今尚少注意这一方面。虽然主观条件还不具备，然而无疑地是应该注意和应该进行的。江北的洪泽湖地带、江南的太湖地带和沿江沿海一切敌人占领区域的港汊地带，都应该好好地组织游击战争，并在河湖港汊之中及其近旁建立起持久的根据地，作为发展全国游击战争的一个方面。缺少了这一方面，无异供给敌人以水上交通的便利，是抗日战争战略计划的一个缺陷，应该及时地补足之。

第二节 游击区和根据地

在处于敌人后方作战的游击战争面前，游击区和根据地是有区别的。在四围已被敌占但中间未被敌占或虽占而已经恢复的地区，例如五台山地区（即晋察冀边区）的某些县，太行山地区和泰山地区也有这种情形，这些都是现成的根据地，游击队据之以发展游击战争是很方便的。但在这些根据地的其他地方则不然，例如五台山地区的东部北部——即冀西察南的某些部分和保定以东沧州以西的许多地方，在那里，游击战争在开始时期还不能完全占领该地，只能经常去游击，游击队到时属于游击队，游击队走了又属于伪政权，这样的地区就还不是游击战争的根据地，而是所谓游击区。这种游击区，经过游击战争的必要过程，消灭或打败了许多敌人，摧毁了伪政权，发动了民众的积极性，组织了民众的抗日团体，发展了民众武装，建立了抗日政权，游击区就转化成了根据地。将这些根据地，增加到原有的根据地里面去，就叫做发展了根据地。

有些地方的游击战争，全部活动地区开始都是游击区，例如冀东的游击战争。那里已有长期的伪政权，当地起义的民众武装和从五台山派去的游击支队，整个活动地区开始都是游击

区。它们在开始活动时，只能在此区中选择好的地点作为临时的后方，或叫做临时根据地。要待消灭敌人和发动民众的工作开展了之后，才能把游击区状态消灭，变为比较稳固的根据地。

由此可知，从游击区到根据地，是一个艰难缔造的过程，依消灭敌人和发动民众的程度如何而定其是否已从游击区过渡到了根据地的阶段。

有许多地区，将是长期地处于游击区状态的。在那里，敌人极力控制，但不能建立稳固的伪政权，游击战争也极力发展，但无法达到建立抗日政权的目的，例如敌人占领的铁路线、大城市的附近地区和某些平原地区。

至于敌人有强大力量控制着的大城市、火车站和某些平原地带，游击战争只能接近其附近，而不能侵入其里面，那里有比较稳固的伪政权，这又是一种情形。

由于我之领导错误或敌之强大压力的结果，可以使上述的情形发生相反的变化，即根据地化为游击区，游击区化为敌之比较稳固的占领地。这种情形是可能发生的，值得游击战争的领导者们特别警戒。

所以，在整个敌占地区，经过游击战争和敌我双方斗争的结果，可以变为三种情况的地方：第一种是被我方游击部队和我方政权掌握着的抗日根据地；第二种是被日本帝国主义和伪政权掌握着的被占领地；第三种是双方争夺的中间地带，即所谓游击区。游击战争领导者的责任，在于极力扩大第一、第三两种地区，而极力缩小第二种地区。这就是游击战争的战略任务。

第三节 建立根据地的条件

建立根据地的基本条件，是要有一个抗日的武装部队，并

使用这个部队去战胜敌人，发动民众。所以建立根据地问题，首先就是武装部队问题。从事游击战争的领导者们必须用全副精力去建立一支以至多支的游击部队，并使之从斗争中逐渐地发展为游击兵团，以至发展成为正规部队和正规兵团。建立武装部队是建立根据地的最基本一环，没有这个东西，或有了而无力量，一切问题都无从说起。这是第一个条件。

和建立根据地不能分离的第二个条件，就是使用武装部队并配合民众去战胜敌人。凡是被敌人控制的地方，那是敌人的根据地，不是游击战争的根据地；要把敌人的根据地变为游击战争的根据地，非战胜敌人无从实现，这是自明之理。就是游击战争控制的地方，如果不粉碎敌人的进攻，不战胜敌人，自己控制的地方就要变成敌人控制的地方，也无从建立根据地。

和建立根据地不可分离的第三个条件，就是用一切力量，包括武装部队的力量在内，去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要从这种斗争中去武装人民，即组织自卫军和游击队。要从这种斗争中去组织民众团体；无论是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儿童、商人、自由职业者，都要依据他们的政治觉悟和斗争情绪提高的程度，将其组织在各种必要的抗日团体之内，并逐渐地发展这些团体。民众如没有组织，是不能表现其抗日力量的。要从这种斗争中去肃清公开的或隐藏的汉奸势力；要做到这一步也只有依靠民众的力量。尤其重要的是从这种斗争中去发动民众建立或巩固当地的抗日政权。原来有中国政权未被敌人破坏的，则在广大民众拥护的基础之上去改造它和巩固它；原来的中国政权已被敌人破坏了的，则在广大民众努力的基础之上去恢复它。这个政权是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它应该团结一切人民的力量，向唯一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汉奸反动派作斗争。

一切游击战争的根据地，只有在建立了抗日的武装部队、

战胜了敌人、发动了民众这三个基本的条件逐渐地具备之后，才能真正地建立起来。

此外，还须指出的是地理和经济的条件。地理条件的问题，在说“几种根据地”时已经指出了三种不同的情形，这里只说主要的要求，即地区的广大。处在四面或三面被敌包围的中间，要建立长期支持的根据地，山地当然是最好的条件，但主要是须有游击队回旋的余地，即广大地区。有了广大地区这个条件，就是在平原也是能够发展和支持游击战争的，河湖港汊更不待说。这个条件已因中国领土广大和敌人兵力不足，一般地提供于中国的游击战争了。从游击战争的可能性说来，它是一个重要的甚至是第一个重要的条件；在小国如比利时等，因没有这个条件，游击战争的可能性就很小，甚至没有。但在中国，这个条件已不是什么待争取的条件和待解决的问题，而是自然具备只待人去利用的东西。

经济条件的性质，从其自然性一方面看来，也和地理条件相同。因为现在并不讨论在沙漠里建立根据地，沙漠里也没有什么敌人，讨论的是在敌人后方建立根据地，而一切敌人能到之处，当然早就有了中国人，也早就有了吃饭的经济基础，故在建立根据地问题上，不发生选择经济条件的问题。一切有中国人又有敌人的地方，不问其经济条件如何，都应尽可能地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永久的或临时的根据地。但从其政治性一方面看来则不然，这里的问题是存在的，这就是经济政策的问题，这一点对于建立根据地是带着严重性的。游击战争根据地的经济政策，必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原则，即合理负担和保护商业，当地政权和游击队决不能破坏这种原则，否则将影响于根据地的建立和游击战争的支持。合理负担即实行“有钱者出钱”，但农民亦须供给一定限度的粮食与游击队。保护商业应表现于游击队的严格的纪律上面；除了有真凭实据的汉

奸之外，决不准乱没收一家商店。这是困难的事，但这是必须执行的确定的政策。

第四节 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

为了把侵入中国的敌人围困在少数的据点，即大城市和交通干线之内，各个根据地上的游击战争必须极力向其根据地的四周发展，迫近一切敌人的据点，威胁其生存，动摇其军心，同时即发展了游击战争的根据地，这是十分必要的。这里，要反对游击战争中的保守主义。保守主义不论是由于贪图安逸而发生的，或由于对敌人力量的过高估计而发生的，均将给予抗日战争以损失，对于游击战争及其根据地的本身也是不利的。另一方面，不可忘记根据地的巩固，而其主要的工作是发动和组织民众，以及游击部队和地方武装的训练。这种巩固，是支持长期战争所必需，也是向前发展所必需的，不巩固就不能有力地向前发展。只知道发展忘记了巩固的游击战争，经不起敌人的进攻，结果不但丧失了发展，且有危及根据地本身之虞。正确的方针是巩固地向前发展，这是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好办法。只要是长期战争，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的的问题，是每个游击队经常发生的问题。具体解决时应依照情况去决定。某一时期，把重心放在发展方面，这就是推广游击区、扩大游击队的工作。另一时期，则把重心放在巩固方面，这就是组织民众、训练部队的工作。因为二者的性质不同，军事部署和工作执行随之而不同，必须依情况分时期有所侧重，才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第五节 敌我之间的几种包围

从整个抗日战争看来，由于敌之战略进攻和外线作战，我处战略防御和内线作战地位，无疑我是处在敌之战略包围中。

这是敌对于我的第一种包围。由于我以数量上优势的兵力，对于从外线分数路向我前进之敌采取战役和战斗的进攻和外线作战的方针，就使各个分进之敌的每一个处于我之包围中。这是我对于敌的第一种包围。再从敌后游击战争的根据地看来，每一孤立的根据地都处于敌之四面或三面包围中，前者例如五台山地区，后者例如晋西北地区。这是敌对于我的第二种包围。但若将各个根据地联系起来看，并将各个游击战争根据地和正规军的战线联系起来看，我又把许多敌人都包围起来。例如在山西，我已三面包围了同蒲路（路之东西两侧及南端），四面包围了太原城；在河北、山东等省，亦有许多这样的包围。这是我对于敌的第二种包围。由是敌我各有加于对方的两种包围，大体上好似下围棋一样，敌对于我我对于敌之战役和战斗的作战好似吃子，敌之据点和我之游击根据地则好似做眼。在这个“做眼”的问题上，表示了敌后游击战争根据地之战略作用的重大性。这个问题，提在抗日战争面前，就是一方面在全国军事当局，又一方面在各地的游击战争领导者，均须把在敌后发展游击战争和在一切可能地方建立根据地的任务，放在自己的议事日程上，把它作为战略任务执行起来。如果我们能在外交上建立太平洋反日阵线，把中国作为一个战略单位，又把苏联及其他可能的国家也各作为一个战略单位，我们就比敌人多了一个包围，形成了一个太平洋的外线作战，可以围剿法西斯日本。这一点在今天当然还没有实际意义，但不是没有这种前途的。

第七章 游击战争的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

游击战争战略问题的第四个问题，是游击战争的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的问题。这是第一个问题里所述的进攻战方针在抗

日游击战争处于防御姿势和处于进攻姿势中如何具体地应用的问题。

在全国的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正确地说，战略反攻）中间，每一游击战争的根据地上面及其周围，也有其小规模的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前者是敌取攻势我取守势时的战略形势和战略方针，后者是敌取守势我取攻势时的战略形势和战略方针。

第一节 游击战争的战略防御

在游击战争已经起来并有相当的发展之后，特别是在敌人停止了对我全国的战略进攻、采取保守其占领地的方针的时候，敌人向游击战争根据地的进攻是必然的。对于这种必然性的认识是必要的，否则游击战争的领导者们全无准备，一旦遇到敌人严重地进攻的形势，必至惊惶失措，被敌击破。

敌人为了达到消灭游击战争及其根据地之目的，常会采取围攻的办法，例如五台山地区就已有四五次的所谓“讨伐”，每次配置三路、四路以至六、七路的兵力，同时有计划地前进。游击战争发展的规模越大，其根据地所处的位置越重要，威胁敌人的战略基地和交通要道越大，敌人对于游击战争及其根据地的进攻也将会越厉害。所以，凡属敌人进攻游击战争越厉害之处，就证明那里的游击战争越有成绩，对于正规战争的配合也就越有作用。

在敌人数路围攻的情况之下，游击战争的方针是打破这种围攻，采取反围攻的形态。在敌数路前进，但每路只有一个或大或小的部队，没有后续部队，不能沿途配置兵力、构筑堡垒、修筑汽车路的情况之下，这种围攻是容易打破的。这时，敌是进攻和外线作战，我是防御和内线作战。我之部署应是次要兵力钳制敌之数路，而以主要兵力对付敌之一路，采取战

役和战斗的袭击战法（主要的是埋伏战），于敌行动中打击之。敌人虽强，经过多次的袭击，也就削弱下来，往往中途撤退，此时游击队又可于追击敌人时继续袭击，再行削弱他。当敌人还没有停止进攻或实行退却之时，总是占据根据地内的县城或市镇，我便应包围这种县城或市镇，断绝其粮食来源和交通联络，等到敌人无法支持向后退走时，我便乘机追击之。一路打破之后，又转移兵力去打破敌之另一路，这样各个地击破敌之围攻。

在一个大的根据地内，例如五台山地区，是在一个“军区”之内分为四五个或更多的“军分区”的，每一军分区都有独立作战的武装部队。在上述作战方法之下，往往同时地或先后地打破了敌人的进攻。

在反围攻的作战计划中，我之主力一般是位于内线的。但在兵力充裕的条件下，使用次要力量（例如县和区的游击队，以至从主力中分出一部分）于外线，在那里破坏敌之交通，钳制敌之增援部队，是必要的。如果敌在根据地内久踞不去，我可以倒置地使用上述方法，即以一部留在根据地内围困该敌，而用主力进攻敌所从来之一带地方，在那里大肆活动，引致久踞之敌撤退出去打我主力；这就是“围魏救赵”的办法。

在反围攻的作战中，地方人民的抗日自卫军和一切民众组织，应全体动员起来参加战争，用各种方法帮助我军，反对敌人。在反对敌人的工作中，地方戒严和可能程度的坚壁清野两事是重要的。前者为了镇压汉奸，并使敌人得不到消息；后者为了协助作战（坚壁），并使敌人得不到粮食（清野）。这里所说的清野，是指粮食成熟时早日收割的意思。

敌人退却时往往将所踞城市中的房屋和所经道路上的村庄放火烧毁，目的在给予游击战争根据地以破坏，但同时就使得敌人第二次进攻时没有房子住和没有饭吃，害了他们自己。这

就是所谓在一件事情上面包含着两种互相矛盾的意义的具体例证之一。

不是在几经反围攻之后业已证明在那里无法打破严重的围攻时，游击战争的领导者不应企图放弃那个根据地而跑到别的根据地去。在这里，应注意防止悲观情绪的发生。只要领导上不犯原则错误，一般的山岳地带，总是能够打破围攻和坚持根据地的。只有平原地带，如果在严重的围攻之下，就应根据具体情势，考虑下面的问题：留着许多小的游击部队在当地分散活动，而将大的游击兵团暂时地转移到山地里去，等到敌人主力移动他去，我又再往那里活动。

由于中国地区广大、敌人兵力不足的矛盾情况，敌人是一般地不能采取中国内战时国民党的堡垒主义的。但是我们应该估计到在某些特别威胁敌人要害的游击根据地中，敌人有可能采取相当程度的堡垒主义，要准备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坚持那里的游击战争。毫无疑问的，根据在内战时还能坚持游击战争的经验，在民族战争中当然更能够坚持。因为即使在兵力对比上，在某些根据地中，敌能使用不但在质量上而且在数量上极端优势的兵力，但是敌我民族矛盾无法解决，敌之指挥弱点无可避免。我之胜利，就建立在深入的民众工作和灵活的作战方法之上。

第二节 游击战争的战略进攻

在已将敌之进攻打破，敌之新的进攻尚未到来的时候，是敌取战略守势我取战略攻势的时候。

这种时候，我之作战方针，不在于攻击不可必胜的、固守着防御阵地的敌人；而在于有计划地在一定地区内消灭和驱逐为游击队力能胜任的小敌和汉奸武装，扩大我之占领地区，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补充并训练部队，组织新的游击队。在这

些任务做得有了些眉目之后，如果敌人还在守势之中，就可以进一步扩大我之新占领地区，攻击那些敌力薄弱的城市和交通线，依其情况而长久地或暂时地占领之。所有这些，都是战略进攻的任务，目的在于乘着敌取守势之时，有效地发展自己的军事的和民众的力量，有效地缩小敌人的力量，并准备敌人再度向我进攻时又能有计划地和有力地打破之。

部队的休息和训练是必要的，敌取守势时是我最好的休息和训练的时机。不是一事不做专门关起门来休息和训练，而是在扩大占领地，消灭小敌，发动民众的工作中，争取时间达到休息和训练的目的。解决给养被服等困难问题，也往往在这个时候。

大规模地破坏敌之交通线，妨碍敌之运输，直接帮助正规军的战役作战，也在这个时候。

这时，整个的游击根据地、游击区和游击部队，都是兴高采烈的时候，被敌摧残的地区也逐渐整理，恢复元气。敌占地区内的民众亦十分高兴，到处都传播游击队的声威。敌人及其走狗汉奸的内部，则一方面发展着恐慌情绪和分化作用，一方面又增加着对于游击队和根据地的仇恨，加紧地准备着对付游击战争。因此，游击战争的领导者们不可在自己的战略进攻中得意忘形，轻视敌人，忘记了团结内部、巩固根据地和巩固部队的工作。在这种时候，须善于观看敌人的风色，看其是否又有向我进攻的朕兆，以便一遇进攻，就能适当地结束我之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再从战略防御中粉碎敌人的进攻。

第八章 向运动战发展

抗日游击战争战略问题的第五个问题，是向运动战发展的问题，其必要和可能，也是由于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而来

的。如果中国能迅速地战胜日寇，并迅速地收复失地，没有什么持久战，也不是什么残酷的战争，那末，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的必要就不存在。然而情形是相反的，战争是长期而且残酷，游击战只有向运动战发展才能适应这样的战争。战争既是长期的和残酷的，就能够使游击队受到必要的锻炼，逐渐地变成正规的部队，因而其作战方式也将逐渐地正规化，游击战就变成运动战了。游击战争的领导者们必须明确地认识这种必要性和可能性，才能坚持向运动战发展的方针，并有计划地执行之。

现在许多地方的游击战争，例如五台山等处，是由正规军派出强大的支队去发展的。那里的作战虽然一般是游击战，但开始即包含了运动战的成分。随着战争的持久，这种成分将逐渐地增加。这是今天抗日游击战争的长处，不但使游击战争迅速地发展，并且使之迅速地提高，较之东三省的游击战争，条件优越得多了。

由执行游击战的游击部队化为执行运动战的正规部队，须具备数量扩大和质量提高两个条件。前者除直接动员人民加入部队外，可采取集中小部队的办法；后者则依靠战争中的锻炼和提高武器的质量。

集中小部队，一方面，须防止只顾地方利益因而妨碍集中的地方主义；另一方面，也须防止不顾地方利益的单纯军事主义。

地方主义是存在于地方游击队和地方政府中间的，他们往往只顾地方的利益，忘记全局的利益，或贪图分散活动，不惯集团生活。主力游击部队或游击兵团的领导者们，必须注意到这种情形，采取逐渐地和部分地集中的办法，使地方保有余力能够继续地发展游击战争；采取首先协同行动然后实行合编以及不破坏其建制不撤换其干部的办法，使小集团能够融合于大集团。

单纯军事主义和地方主义相反，乃是主力部队里头的人们

只图扩充自己不顾扶助地方武装的一种错误观点。他们不知道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并非废除游击战，而是在广泛发展的游击战之中逐渐地形成一个能够执行运动战的主力，环绕这个主力的仍然应有广大的游击部队和游击战争。这种广大的游击部队，造成这个主力的丰富的羽翼，又是这个主力继续扩大的不断的源泉。所以，主力部队的领导者如果犯了不顾地方民众和地方政府的利益的单纯军事主义的错误，就必须加以克服，使主力的扩大和地方武装的繁殖，各得着适宜的位置。

提高质量，须在政治、组织、装备、技术、战术、纪律等各方面有所改进，逐渐地仿照正规军的规模，减少游击队的作风。政治上须使指挥员、战斗员们认识从游击队到正规军提高一步的必要性，鼓励大家为此而努力，并以政治工作去保障之。组织上须逐渐地具备为一个正规兵团所必需的军事和政治的工作机关，军事和政治的工作人员，军事和政治的工作方法以及供给卫生等的经常制度。装备方面，须提高武器的质量和种类，增加必要的通讯器材。技术和战术方面，从游击部队的技术和战术提高到作为一个正规兵团所必需的技术和战术。纪律方面，提高到整齐划一令行禁止的程度，消灭自由和散漫的现象。所有这些方面的完成，需要一个长的努力过程，不是一朝一夕的工程，然而必须向这个方向发展。只有这样，一个游击战争根据地上面的主力兵团才能造成，更有效力地打击敌人的运动战方式才能出现。这种目的，在有正规军派遣支队或派遣干部的地方，是能够比较顺利地达到的。因此，一切正规军均有扶助游击队向着正规部队发展的责任。

第九章 指挥关系

抗日游击战争战略问题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指挥关系的问题。

题。这个问题的正确解决，是游击战争顺利发展的条件之一。

游击战争的指挥方法，由于游击部队是低级的武装组织和分散行动的特性，不容许高度的集中主义，如同正规战争的指挥方法那样。如果企图拿正规战争的指挥方法施之于游击战争，必然地要束缚游击战争的高度活泼性，而使游击战争毫无生气。高度的集中指挥和游击战争的高度活泼性是正相反对的东西；对于这种高度活泼的游击战争，施之以高度集中的指挥制度，不但不应该，而且不可能。

然而游击战争不是不要任何的集中指挥就能够顺利地发展的。在有广大的正规战争，同时又有广大的游击战争存在的情况之下，使二者适当地配合行动是必要的，这里就需要对于正规战争和游击战争配合行动的指挥，这就是国家参谋部和战区司令官关于战略作战的统一指挥。在一个游击区或游击根据地里面，那里存在着多数的游击队，其中往往有一个至数个作为主力的游击兵团（有时还有正规兵团）和许多作为辅助力量的大小游击部队，还有不脱离生产的广大的人民武装，那里的敌人也往往成为一个局面，统一地对付游击战争。因此，就在这种游击区或根据地里面，发生了统一指挥，即集中指挥的问题。

由此，游击战争的指挥原则，一方面反对绝对的集中主义，同时又反对绝对的分散主义，应该是战略的集中指挥和战役战斗的分散指挥。

战略的集中指挥，包括国家对于整个游击战争的部署，各个战区里面游击战争和正规战争的配合行动以及每个游击区或根据地里面对于全区抗日武装的统一指导。在这些上面的不协调、不统一、不集中，是有害的，应该尽可能地求得其协调、统一和集中。凡关于一般事项，即战略性质的事项，下级必须报告上级，并接受上级的指导，以收协同动作之效。然而集中到此为止，过此限度，干涉到下级的具体事项，例如战役战斗

的具体部署等等，同样是有害的。因为这些具体事项，必须按照随时变化随地不同的具体情况去做，而这些具体情况，是离得很远的上级机关无从知道的。这就是战役和战斗的分散指挥原则。这个原则也一般地通用于正规战争的作战，特别是在通讯工具不完备的情况下。一句话，就是：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

在游击根据地组成一个军区，其下分为几个军分区，军分区之下分为几个县，县之下分为几个区的情况，军区司令部、军分区司令部、县政府、区政府的系统是隶属关系，武装部队依其性质分别地隶属之。它们之间的指挥关系，根据上述的原则，一般的方针集中于上级；具体的行动按照具体情况实施之，下级有独立自主之权。上级对下级某些具体行动有意见，可以而且应该作为“训令”提出，但决不应作为不可改变的“命令”。越是地区广大，情况复杂，上下级距离很远，这种具体行动就越应加大其独立自主的权限，越应使之多带地方性，多切合地方情况的要求，以便培养下级和地方人员的独立工作能力，应付复杂的环境，发展胜利的游击战争。如果是一个集中行动的部队或兵团，其内部指挥关系，适用集中指挥的原则，因为情况是明了的；但是如果该部队或该兵团一旦分散行动，便又适用一般集中、具体分散的原则，因为具体的情况无从明了。

应该集中的不集中，在上者叫做失职，在下者叫做专擅，这是在任何上下级关系上特别是在军事关系上所不许可的。应该分散的不分散，在上者叫做包办，在下者叫做无自动性，这也是在任何上下级关系上特别是在游击战争的指挥关系上所不许可的。只有上述的原则，才是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的方针。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刊印。

论持久战*

(一九三八年五月)

毛泽东

问题的提起

(一) 伟大抗日战争的一周年纪念，七月七日，快要到了。全民族的力量团结起来，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同敌人作英勇的战争，快一年了。这个战争，在东方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历史上也将是伟大的，全世界人民都关心这个战争。身受战争灾难、为着自己民族的生存而奋斗的每一个中国人，无日不在渴望战争的胜利。然而战争的过程究竟会要怎么样？能胜利还是不能胜利？能速胜还是不能速胜？很多人都说持久战，但是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很多人都说最后胜利，但是为什么会有最后胜利？怎样争取最后胜利？这些问题，不是每个人都解决了的，甚至是大多数人至今没有解决的。于是失败主义的亡国论者跑出来向人们说：中国会亡，最后胜利不是中国的。某些性急的朋友们也跑出来向人们说：中国很快就能战胜，无需乎费大气力。这些议论究竟对不对呢？我们一向都说：这些议论是不对的。可是我们说的，还没有为大多数人所了解。一半因为我们的宣传解释工作还不够，一半

* 这是毛泽东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六日至六月三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的讲演，发表在一九三八年七月一日出版的《解放》第四十三、四十四期合刊。

也因为客观事变的发展还没有完全暴露其固有的性质，还没有将其面貌鲜明地摆在人们之前，使人们无从看出其整个的趋势和前途，因而无从决定自己的整套的方针和做法。现在好了，抗战十个月的经验，尽够击破毫无根据的亡国论，也尽够说服急性朋友们的速胜论了。在这种情形下，很多人要求做个总结性的解释。尤其是对持久战，有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反对意见，也有空洞无物的了解。“卢沟桥事变以来，四万万人民一齐努力，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样一种公式，在广大的人们中流行着。这个公式是对的，但有加以充实的必要。抗日战争和统一战线之所以能够坚持，是由于许多的因素：全国党派，从共产党到国民党；全国人民，从工人农民到资产阶级；全国军队，从主力军到游击队；国际方面，从社会主义国家到各国爱好正义的人民；敌国方面，从某些国内反战的人民到前线反战的兵士。总而言之，所有这些因素，在我们的抗战中都尽了他们各种程度的努力。每一个有良心的人，都应向他们表示敬意。我们共产党人，同其他抗战党派和全国人民一道，唯一的方向，是努力团结一切力量，战胜万恶的日寇。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十七周年纪念日。为了使每个共产党员在抗日战争中能够尽其更好和更大的努力，也有着重地研究持久战的必要。因此，我的讲演就来研究持久战。和持久战这个题目有关的问题，我都准备说到；但是不能一切都说到，因为一切的东西，不是在一个讲演中完全说得了的。

（二）抗战十个月以来，一切经验都证明下述两种观点的不对：一种是中国必亡论，一种是中国速胜论。前者产生妥协倾向，后者产生轻敌倾向。他们看问题的方法都是主观的和片面的，一句话，非科学的。

（三）抗战以前，存在着许多亡国论的议论。例如说：“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如果抗战，必会作阿比西尼亚。”

抗战以后，公开的亡国论没有了，但暗地是有的，而且很多。例如妥协的空气时起时伏，主张妥协者的根据就是“再战必亡”^{〔1〕}。有个学生从湖南写信来说：“在乡下一切都感到困难。单独一个人作宣传工作，只好随时随地找人谈话。对象都不是无知无识的愚民，他们多少也懂得一点，他们对我的谈话很有兴趣。可是碰了我那几位亲戚，他们总说：‘中国打不胜，会亡。’讨厌极了。好在他们还不去宣传，不然真糟。农民对他们的信仰当然要大些啊！”这类中国必亡论者，是妥协倾向的社会基础。这类人中国各地都有，因此，抗日阵线中随时可能发生的妥协问题，恐怕终战争之局也不会消灭的。当此徐州失守武汉紧张的时候，给这种亡国论痛驳一驳，我想不是无益的。

（四）抗战十个月以来，各种表现急性病的意见也发生了。例如在抗战初起时，许多人有一种毫无根据的乐观倾向，他们把日本估计过低，甚至以为日本不能打到山西。有些人轻视抗日战争中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他们对于“在全体上，运动战是主要的，游击战是辅助的；在部分上，游击战是主要的，运动战是辅助的”这个提法，表示怀疑。他们不赞成八路军这样的战略方针：“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认为这是“机械的”观点^{〔2〕}。上海战争时，有些人说：“只要打三个月，国际局势一定变化，苏联一定出兵，战争就可解决。”把抗战的前途主要地寄托在外国援助上面^{〔3〕}。台儿庄胜利之后，有些人主张徐州战役应是“准决战”，说过去的持久战方针应该改变。说什么“这一战，就是敌人的最后挣扎”，“我们胜了，日阀就在精神上失了立场，只有静候末日审判”^{〔4〕}。平型关一个胜仗，冲昏了一些人的头脑；台儿庄再一个胜仗，冲昏了更多人的头脑。于是敌人是否进攻武汉，成为疑问了。许多人以为：“不一定”；许多人以为：“断不会”。

这样的疑问可以牵涉到一切重大的问题。例如说：抗日力量是否够了呢？回答可以是肯定的，因为现在的力量已使敌人不能再进攻，还要增加力量干什么呢？例如说：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是否依然正确呢？回答可以是否定的，因为统一战线的现时状态已够打退敌人，还要什么巩固和扩大呢？例如说：国际外交和国际宣传工作是否还应该加紧呢？回答也可以是否定的。例如说：改革军队制度，改革政治制度，发展民众运动，厉行国防教育，镇压汉奸托派，发展军事工业，改良人民生活，是否应该认真去做呢？例如说：保卫武汉、保卫广州、保卫西北和猛烈发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口号，是否依然正确呢？回答都可以是否定的。甚至某些人在战争形势稍为好转的时候，就准备在国共两党之间加紧磨擦一下，把对外的眼光转到对内。这种情况，差不多每一个较大的胜仗之后，或敌人进攻暂时停顿之时，都要发生。所有上述一切，我们叫它做政治上军事上的近视眼。这些话，讲起来好像有道理，实际上是毫无根据、似是而非的空谈。扫除这些空谈，对于进行胜利的抗日战争，应该是有好处的。

（五）于是问题是：中国会亡吗？答复：不会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中国能够速胜吗？答复：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

（六）这些问题的主要论点，还在两年之前我们就一般地指出了。还在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六日，即在西安事变前五个月，卢沟桥事变前十二个月，我同美国记者斯诺先生的谈话中，就已经一般地估计了中日战争的形势，并提出了争取胜利的各种方针。为备忘计，不妨抄录几段如下：

问：在什么条件下，中国能战胜并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呢？

答：要有三个条件：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

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就中国人民的立场来说，三个条件中，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

问：你想，这个战争要延长多久呢？

答：要看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实力和中日两国其他许多决定的因素如何而定。即是说，除了主要地看中国自己的力量之外，国际间所给中国的援助和日本国内革命的援助也很有关系。如果中国抗日统一战线有力地发展起来，横的方面和纵的方面都有效地组织起来，如果认清日本帝国主义威胁他们自己利益的各国政府和各国人民能给中国以必要的援助，如果日本的革命起来得快，则这次战争将迅速结束，中国将迅速胜利。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很快实现，战争就要延长。但结果还是一样，日本必败，中国必胜。只是牺牲会大，要经过一个很痛苦的时期。

问：从政治上和军事上来看，你以为这个战争的前途会要如何发展？

答：日本的大陆政策已经确定了，那些以为同日本妥协，再牺牲一些中国的领土主权就能够停止日本进攻的人们，他们的想法只是一种幻想。我们确切地知道，就是扬子江下游和南方各港口，都已经包括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大陆政策之内。并且日本还想占领菲律宾、暹罗、越南、马来半岛和荷属东印度，把外国和中国切开，独占西南太平洋。这又是日本的海洋政策。在这样的时期，中国无疑地要处于极端困难的地位。可是大多数中国人相信，这种困难是能够克服的；只有各大商埠的富人是失败论者，因为他们害怕损失财产。有许多人想，一旦中国海岸被日本封锁，中国就不能继续作战。这是废话。为反驳他们，我们不妨举出红军的战争史。在抗日战争中，中国所占的优势，比内战时红军的地位强得多。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国家，就是日本能占领中国一万万至二万万人口的区域，我们离战败还很远呢。我们仍然有很大的力量同日本作战，而日本在整个战争中须得时时在其后方作防御战。中国经济的不统一、不平衡，对于抗日战争反为有利。例如将上海和中国其他地方割断，对于中国的损害，绝没有将纽约和

美国其他地方割断对于美国的损害那样严重。日本就是把中国沿海封锁，中国的西北、西南和西部，它是无法封锁的。所以问题的中心点还是中国全体人民团结起来，树立举国一致的抗日阵线。这是我们早就提出来的。

问：假如战争拖得很长，日本没有完全战败，共产党能否同意讲和，并承认日本统治东北？

答：不能。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一样，不容许日本保留中国的寸土。

问：照你的意见，这次解放战争，主要的战略方针是什么？

答：我们的战略方针，应该是使用我们的主力在很长的变动不定的战线上作战。中国军队要胜利，必须在广阔的战场上进行高度的运动战，迅速地前进和迅速地后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这就是大规模的运动战，而不是深沟高垒、层层设防、专靠防御工事的阵地战。这并不是说要放弃一切重要的军事地点，对于这些地点，只要有利，就应配置阵地战。但是转换全局的战略方针，必然要是运动战。阵地战虽也必需，但是属于辅助性质的第二种的方针。在地理上，战场这样广大，我们作最有效的运动战，是可能的。日军遇到我军的猛烈活动，必得谨慎。他们的战争机构很笨重，行动很慢，效力有限。如果我们集中兵力在一个狭小的阵地上作消耗战的抵抗，将使我军失掉地理上和经济组织上的有利条件，犯阿比西尼亚的错误。战争的前期，我们要避免一切大的决战，要先用运动战逐渐地破坏敌人军队的精神和战斗力。

除了调动有训练的军队进行运动战之外，还要在农民中组织很多的游击队。须知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仅仅是表示了全国农民所能动员抗战的潜伏力量的一小部分。中国农民有很大的潜伏力，只要组织和指挥得当，能使日本军队一天忙碌二十四小时，使之疲于奔命。必须记住这个战争是在中国打的，这就是说，日军要完全被敌对的中国人所包围；日军要被迫运来他们所需的军用品，而且要自己看守；他们要

用重兵去保护交通线，时时谨防袭击；另外，还要有一大部力量驻扎满洲和日本内地。

在战争的过程中，中国能俘虏许多的日本兵，夺取许多的武器弹药来武装自己；同时，争取外国的援助，使中国军队的装备逐渐加强起来。因此，中国能够在战争的后期从事阵地战，对于日本的占领地进行阵地的攻击。这样，日本在中国抗战的长期消耗下，它的经济行将崩溃；在无数战争的消磨中，它的士气行将颓靡。中国方面，则抗战的潜伏力一天一天地奔腾高涨，大批的革命民众不断地倾注到前线去，为自由而战争。所有这些因素和其他的因素配合起来，就使我们能够对日本占领地的堡垒和根据地，作最后的致命的攻击，驱逐日本侵略军出中国。（斯诺：《西北印象记》）

抗战十个月的经验，证明上述论点的正确，以后也还将继续证明它。

（七）还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一个多月，即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就在它的《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中，清楚地指出：

卢沟桥的挑战和平津的占领，不过是日寇大举进攻中国本部的开始。日寇已经开始了全国的战时动员。他们的所谓“不求扩大”的宣传，不过是掩护其进攻的烟幕弹。

七月七日卢沟桥的抗战，已经成了中国全国性抗战的起点。

中国的政治形势从此开始了一个新阶段，这就是实行抗战的阶段。抗战的准备阶段已经过去了。这一阶段的最中心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

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的胜利。

由于当前的抗战还存在着严重的弱点，所以在今后的抗战过程中，可能发生许多挫败、退却，内部的分化、叛变，暂时和局部的

妥协等不利的情况。因此，应该看到这一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但我们相信，已经发动的抗战，必将因为我党和全国人民的努力，冲破一切障碍物而继续地前进和发展。

抗战十个月的经验，同样证明了上述论点的正确，以后也还将继续证明它。

（八）战争问题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的倾向，是一切错误观点的认识论上的根源。他们看问题的方法是主观的和片面的。或者是毫无根据地纯主观地说一顿；或者是只根据问题的一侧面、一时的表现，也同样主观地把它夸大起来，当作全体看。但是人们的错误观点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根本的错误，带一贯性，这是难于纠正的；另一类是偶然的错误，带暂时性，这是易于纠正的。但既同为错误，就都有纠正的必要。因此，反对战争问题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的倾向，采用客观的观点和全面的观点去考察战争，才能使战争问题得出正确的结论。

问题的根据

（九）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最后胜利为什么是中国的呢？根据在什么地方呢？

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分别地说来，战争的双方有如下互相反对的许多特点。

（一〇）日本方面：第一，它是一个强的帝国主义国家，它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在东方是一等的，在世界也是五六个著名帝国主义国家中的一个。这是日本侵略战争的基本条件，战争的不可避免和中国的不能速胜，就建立在这个日本

国家的帝国主义制度及其强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上面。然而第二，由于日本社会经济的帝国主义性，就产生了日本战争的帝国主义性，它的战争是退步的和野蛮的。时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日本帝国主义，由于内外矛盾，不但使得它不得不举行空前大规模的冒险战争，而且使得它临到最后崩溃的前夜。从社会行程说来，日本已不是兴旺的国家，战争不能达到日本统治阶级所期求的兴旺，而将达到它所期求的反面——日本帝国主义的死亡。这就是所谓日本战争的退步性。跟着这个退步性，加上日本又是一个带军事封建性的帝国主义这一特点，就产生了它的战争的特殊的野蛮性。这样就要最大地激起它国内的阶级对立、日本民族和中国民族的对立、日本和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对立。日本战争的退步性和野蛮性是日本战争必然失败的主要根据。还不止此，第三，日本战争虽是在其强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的基础之上进行的，但同时又是在其先天不足的基础之上进行的。日本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虽强，但这些力量之量的方面不足。日本国度比较地小，其人力、军力、财力、物力均感缺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日本统治者想从战争中解决这个困难问题，但同样，将达到其所期求的反面，这就是说，它为了解决这个困难问题而发动战争，结果将因战争而增加困难，战争将连它原有的东西也消耗掉。最后，第四，日本虽能得到国际法西斯国家的援助，但同时，却又不能不遇到一个超过其国际援助力量的国际反对力量。这后一种力量将逐渐地增长，终究不但将把前者的援助力量抵消，并将施其压力于日本自身。这是失道寡助的规律，是从日本战争的本性产生出来的。总起来说，日本的长处是其战争力量之强，而其短处则在其战争本质的退步性、野蛮性，在其人力、物力之不足，在其国际形势之寡助。这些就是日本方面的特点。

（一一）中国方面：第一，我们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直至北伐战争，一切为解除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的革命的或改良的运动，都遭到了严重的挫折，因此依然保留下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我们依然是一个弱国，我们在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各方面都显得不如敌人。战争之不可避免和中国之不能速胜，又在这个方面有其基础。然而第二，中国近百年的解放运动积累到了今日，已经不同于任何历史时期。各种内外反对力量虽给了解放运动以严重挫折，同时却锻炼了中国人民。今日中国的军事、经济、政治、文化虽不如日本之强，但在中国自己比较起来，却有了比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更为进步的因素。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就是这种进步因素的代表。中国今天的解放战争，就是在这种进步的基础上得到了持久战和最后胜利的可能性。中国是如日方升的国家，这同日本帝国主义的没落状态恰是相反的对照。中国的战争是进步的，从这种进步性，就产生了中国战争的正义性。因为这个战争是正义的，就能唤起全国的团结，激起敌国人民的同情，争取世界多数国家的援助。第三，中国又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这同日本又是一个相反的对比。最后，第四，由于中国战争的进步性、正义性而产生出来的国际广大援助，同日本的失道寡助又恰恰相反。总起来说，中国的短处是战争力量之弱，而其长处则在其战争本质的进步性和正义性，在其是一个大国家，在其国际形势之多助。这些都是中国的特点。

（一二）这样看来，日本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强的，但其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人力、物力又不充足，国际形势又处于不利。中国反是，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比较地弱的，然而正处于进步的时代，其战争是进步的和正义

的，又有大国这个条件足以支持持久战，世界的多数国家是会要援助中国的。——这些，就是中日战争互相矛盾着的基本特点。这些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双方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战争就是这些特点的比赛。这些特点在战争过程中将各依其本性发生变化，一切东西就都从这里发生出来。这些特点是事实上存在的，不是虚造骗人的；是战争的全部基本要素，不是残缺不全的片段；是贯彻于双方一切大小问题和一切作战阶段之中的，不是可有可无的。观察中日战争如果忘记了这些特点，那就必然要弄错；即使某些意见一时有人相信，似乎不错，但战争的经过必将证明它们是错的。我们现在就根据这些特点来说明我们所要说的一切问题。

驳 亡 国 论

（一三）亡国论者看到敌我强弱对比一个因素，从前就说“抗战必亡”，现在又说“再战必亡”。如果我们仅仅说，敌人虽强，但是小国，中国虽弱，但是大国，是不足以折服他们的。他们可以搬出元朝灭宋、清朝灭明的历史证据，证明小而强的国家能够灭亡大而弱的国家，而且是落后的灭亡进步的。如果我们说，这是古代，不足为据，他们又可以搬出英灭印度的事实，证明小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能够灭亡大而弱的落后国家。所以还须提出其他的根据，才能把一切亡国论者的口封住，使他们心服，而使一切从事宣传工作的人们得到充足的论据去说服还不明白和还不坚定的人们，巩固其抗战的信心。

（一四）这应该提出的根据是什么呢？就是时代的特点。这个特点的具体反映是日本的退步和寡助，中国的进步和

多助。

（一五）我们的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中日两国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战争。在我们的敌人方面，首先，它是快要死亡的帝国主义，它已处于退步时代，不但和英灭印度时期英国还处于资本主义的进步时代不相同，就是和二十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日本也不相同。此次战争发动于世界帝国主义首先是法西斯国家大崩溃的前夜，敌人也正是为了这一点才举行这个带最后挣扎性的冒险战争。所以，战争的结果，灭亡的不会是中国而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集团，这是无可逃避的必然性。再则，当日本举行战争的时候，正是世界各国或者已经遭遇战争或者快要遭遇战争的时候，大家都正在或准备着为反抗野蛮侵略而战，中国这个国家又是同世界多数国家和多数人民利害相关的，这就是日本已经引起并还要加深地引起世界多数国家和多数人民的反对的根源。

（一六）中国方面呢？它已经不能和别的任何历史时期相比较。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是它的特点，所以被称为弱国。但是在同时，它又处于历史上进步的时代，这就是足以战胜日本的主要根据。所谓抗日战争是进步的，不是说普通一般的进步，不是说阿比西尼亚抗意战争的那种进步，也不是说太平天国或辛亥革命的那种进步，而是说今天中国的进步。今天中国的进步在什么地方呢？在于它已经不是完全的封建国家，已经有了资本主义，有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有了已经觉悟或正在觉悟的广大人民，有了共产党，有了政治上进步的军队即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红军，有了数十年革命的传统经验，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十七年的经验。这些经验，教育了中国的人民，教育了中国的政党，今天恰好作了团结抗日的基础。如果说，在俄国，没有一九〇五年的经验就不会有一九一七年的胜利；那末，我们也可以说，如果没有十七年以来的经验，也

将不会有抗日的胜利。这是国内的条件。

国际的条件，使得中国在战争中不是孤立的，这一点也是历史上空前的东西。历史上不论中国的战争也罢，印度的战争也罢，都是孤立的。惟独今天遇到世界上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空前广大和空前深刻的人民运动及其对于中国的援助。俄国一九一七年的革命也遇到世界的援助，俄国的工人和农民因此胜利了，但那个援助的规模还没有今天广大，性质也没有今天深刻。今天的世界的人民运动，正在以空前的大规模和空前的深刻性发展着。苏联的存在，更是今天国际政治上十分重要的因素，它必然以极大的热忱援助中国，这一现象，是二十年前完全没有的。所有这些，造成了和造成着为中国最后胜利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条件。大量的直接的援助，目前虽然还没有，尚有待于来日，但是中国有进步和大国的条件，能够延长战争的时间，促进并等候国际的援助。

（一七）加上日本是小国，地小、物少、人少、兵少，中国是大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这一个条件，于是在强弱对比之外，就还有小国、退步、寡助和大国、进步、多助的对比，这就是中国决不会亡的根据。强弱对比虽然规定了日本能够在中国有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的横行，中国不可避免地要走一段艰难的路程，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然而小国、退步、寡助和大国、进步、多助的对比，又规定了日本不能横行到底，必然要遭到最后的失败，中国决不会亡，必然要取得最后的胜利。

（一八）阿比西尼亚为什么灭亡了呢？第一，它不但是弱国，而且是小国。第二，它不如中国进步，它是一个古老的奴隶制到农奴制的国家，没有资本主义，没有资产阶级政党，更没有共产党，没有中国这样的军队，更没有如同八路军这样的军队。第三，它不能等候国际的援助，它的战争是孤立的。

第四，这是主要的，抗意战争领导方面有错误。阿比西尼亚因此灭亡了。然而阿比西尼亚还有相当广大的游击战争存在，如能坚持下去，是可以在未来的世界变动中据以恢复其祖国的。

（一九）如果亡国论者搬出中国近代解放运动的失败史来证明“抗战必亡”和“再战必亡”的话，那我们的答复也是时代不同一句话。中国本身、日本内部、国际环境都和过去不相同。日本比过去更强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地位依然未变，力量依然颇弱，这一点是严重的情形。日本暂时还能控制其国内的人民，也还能利用国际间的矛盾作为其侵华的工具，这些都是事实。然而在长期的战争过程中，必然要发生相反的变化。这一点现在还不是事实，但是将来必然要成为事实的。这一点，亡国论者就抛弃不顾了。中国呢？不但现在已有新的人、新的政党、新的军队和新的抗日政策，和十余年以前有很大的不同，而且这些都必然会向前发展。虽然历史上的解放运动屡次遭受挫折，使中国不能积蓄更大的力量用于今日的抗日战争——这是非常可痛惜的历史的教训，从今以后，再也不要自己摧残任何的革命力量了——然而就在既存的基础上，加上广大的努力，必能逐渐前进，加强抗战的力量。伟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是这种努力的总方向。国际援助一方面，眼前虽然还看不见大量的和直接的，但是国际局面根本已和过去两样，大量和直接的援助正在酝酿中。中国近代无数解放运动的失败都有其客观和主观的原因，都不能比拟今天的情况。在今天，虽然存在着许多困难条件，规定了抗日战争是艰难的战争，例如敌人之强，我们之弱，敌人的困难还刚在开始，我们的进步还很不够，如此等等，然而战胜敌人的有利条件是很多的，只须加上主观的努力，就能克服困难而争取胜利。这些有利条件，历史上没有一个时候可和今天比拟，这就是抗日战争

必不会和历史上的解放运动同归失败的理由。

妥协还是抗战？腐败还是进步？

（二〇）亡国论之没有根据，俱如上述。但是另有许多人，并非亡国论者，他们是爱国志士，却对时局怀抱甚深的忧虑。他们的问题有两个：一是惧怕对日妥协，一是怀疑政治不能进步。这两个可忧虑的问题在广大的人们中间议论着，找不到解决的基点。我们现在就来研究这两个问题。

（二一）前头说过，妥协的问题是有其社会根源的，这个社会根源存在，妥协问题就不会不发生。但妥协是不会成功的。要证明这一点，仍不外向日本、中国、国际三方面找根据。第一是日本方面。还在抗战初起时，我们就估计有一种酝酿妥协空气的时机会要到来，那就是在敌人占领华北和江浙之后，可能出以劝降手段。后来果然来了这一手；但是危机随即过去，原因之一是敌人采取了普遍的野蛮政策，实行公开的掠夺。中国降了，任何人都要做亡国奴。敌人的这一掠夺的即灭亡中国的政策，分为物质的和精神的两方面，都是普遍地施之于中国人的；不但是对下层民众，而且是对上层成分，——当然对后者稍为客气些，但也只有程度之别，并无原则之分。大体上，敌人是将东三省的老办法移植于内地。在物质上，掠夺普通人民的衣食，使广大人民啼饥号寒；掠夺生产工具，使中国民族工业归于毁灭和奴役化。在精神上，摧残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在太阳旗下，每个中国人只能当顺民，做牛马，不许有一丝一毫的中国气。敌人的这一野蛮政策，还要施之于更深的内地。他的胃口很旺，不愿停止战争。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日本内阁宣言的方针^[5]，至今坚决执行，也不能不执行，这就激怒了一切阶层的中国人。这是根据敌人战争的退步性野蛮性而来的，

“在劫难逃”，于是形成了绝对的敌对。估计到某种时机，敌之劝降手段又将出现，某些亡国论者又将蠕蠕而动，而且难免勾结某些国际成分（英、美、法内部都有这种人，特别是英国的上层分子），狼狈为奸。但是大势所趋，是降不了的，日本战争的坚决性和特殊的野蛮性，规定了这个问题的一方面。

（二二）第二是中国方面。中国坚持抗战的因素有三个：其一，共产党，这是领导人民抗日的可靠力量。又其一，国民党，因其是依靠英美的，英美不叫它投降，它也就不会投降。又其一，别的党派，大多数是反对妥协、拥护抗战的。这三者互相团结，谁要妥协就是站在汉奸方面，人人得而诛之。一切不愿当汉奸的人，就不能不团结起来坚持抗战到底，妥协就实际上难于成功。

（二三）第三是国际方面。除日本的盟友和各资本主义国家的上层分子中的某些成分外，其余都不利于中国妥协而利于中国抗战。这一因素影响到中国的希望。今天全国人民有一种希望，认为国际力量必将逐渐增强地援助中国。这种希望不是空的；特别是苏联的存在，鼓舞了中国的抗战。空前强大的社会主义的苏联，它和中国是历来休戚相关的。苏联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上层成分之唯利是图者根本相反，它是以援助一切弱小民族和革命战争为其职志的。中国战争之非孤立性，不但一般地建立在整个国际的援助上，而且特殊地建立在苏联的援助上。中苏两国是地理接近的，这一点加重了日本的危机，便利了中国的抗战。中日两国地理接近，加重了中国抗战的困难。然而中苏的地理接近，却是中国抗战的有利条件。

（二四）由此可作结论：妥协的危机是存在的，但是能够克服。因为敌人的政策即使可作某种程度的改变，但其根本改变是不可能的。中国内部有妥协的社会根源，但是反对妥协的占大多数。国际力量也有一部分赞助妥协，但是主要的力量赞助

抗战。这三种因素结合起来，就能克服妥协危机，坚持抗战到底。

(二五) 现在来答复第二个问题。国内政治的改进，是和抗战的坚持不能分离的。政治越改进，抗战越能坚持；抗战越坚持，政治就越能改进。但是基本上依赖于坚持抗战。国民党的各方面的不良现象是严重地存在着，这些不合理因素的历史积累，使得广大爱国志士发生很大的忧虑和烦闷。但是抗战的经验已经证明，十个月的中国人民的进步抵得上过去多少年的进步，并无使人悲观的根据。历史积累下来的腐败现象，虽然很严重地阻碍着人民抗战力量增长的速度，减少了战争的胜利，招致了战争的损失，但是中国、日本和世界的大局，不容许中国人民不进步。由于阻碍进步的因素即腐败现象之存在，这种进步是缓慢的。进步和进步的缓慢是目前时局的两个特点，后一个特点和战争的迫切要求很不相称，这就是使得爱国志士们大为发愁的地方。然而我们是在革命战争中，革命战争是一种抗毒素，它不但将排除敌人的毒焰，也将清洗自己的污浊。凡属正义的革命的战争，其力量是很大的，它能改造很多事物，或为改造事物开辟道路。中日战争将改造中日两国；只要中国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就一定能把旧日本化为新日本，把旧中国化为新中国，中日两国的人和物都将在这次战争中和战争后获得改造。我们把抗战和建国联系起来看，是正当的。说日本也能获得改造，是说日本统治者的侵略战争将走到失败，有引起日本人民革命之可能。日本人民革命胜利之日，就是日本改造之时。这和中国抗战密切地联系着，这一个前途是应该看到的。

亡国论是不对的，速胜论也是不对的

(二六) 我们已把强弱、大小、进步退步、多助寡助几个

敌我之间矛盾着的基本特点，作了比较研究，批驳了亡国论，答复了为什么不易妥协和为什么政治可能进步的问题。亡国论者看重了强弱一个矛盾，把它夸大起来作为全部问题的论据，而忽略了其他的矛盾。他们只提强弱对比一点，是他们的片面性；他们将此片面的东西夸大起来看成全体，又是他们的主观性。所以在全体说来，他们是没有根据的，是错误的。那些并非亡国论者，也不是一贯的悲观主义者，仅为一时候和一局部的敌我强弱情况或国内腐败现象所迷惑，而一时地发生悲观心理的人们，我们也得向他们指出，他们的观点的来源也是片面性和主观性的倾向。但是他们的改正较容易，只要一提醒就会明白，因为他们是爱国志士，他们的错误是一时的。

（二七）然而速胜论者也是不对的。他们或则根本忘记了强弱这个矛盾，而单单记起了其他矛盾；或则对于中国的长处，夸大得离开了真实情况，变成另一种样子；或则拿一时一地的强弱现象代替了全体中的强弱现象，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而自以为是。总之，他们没有勇气承认敌强我弱这件事实。他们常常抹杀这一点，因此抹杀了真理的一方面。他们又没有勇气承认自己长处之有限性，因而抹杀了真理的又一方面。由此犯出或大或小的错误来，这里也是主观性和片面性作怪。这些朋友们的心是好的，他们也是爱国志士。但是“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的看法则不对，照了做去，一定碰壁。因为估计不符合真相，行动就无法达到目的；勉强行去，败军亡国，结果和失败主义者没有两样。所以也是要不得的。

（二八）我们是否否认亡国危险呢？不否认的。我们承认在中国面前摆着解放和亡国两个可能的前途，两者在猛烈地斗争中。我们的任务在于实现解放而避免亡国。实现解放的条件，基本的是中国的进步，同时，加上敌人的困难和世界的援助。我们和亡国论者不同，我们客观地而且全面地承认亡国和

解放两个可能同时存在，着重指出解放的可能占优势及达到解放的条件，并为争取这些条件而努力。亡国论者则主观地和片面地只承认亡国一个可能性，否认解放的可能性，更不会指出解放的条件和为争取这些条件而努力。我们对于妥协倾向和腐败现象也是承认的，但是我们还看到其他倾向和其他现象，并指出二者之中后者对于前者将逐步地占优势，二者在猛烈地斗争着；并指出后者实现的条件，为克服妥协倾向和转变腐败现象而努力。因此，我们并不悲观，而悲观的人们则与此相反。

（二九）我们也不是不喜欢速胜，谁也赞成明天一个早上就把“鬼子”赶出去。但是我们指出，没有一定的条件，速胜只存在于头脑之中，客观上是不存在的，只是幻想和假道理。因此，我们客观地并全面地估计到一切敌我情况，指出只有战略的持久战才是争取最后胜利的唯一途径，而排斥毫无根据的速胜论。我们主张为着争取最后胜利所必要的一切条件而努力，条件多具备一分，早具备一日，胜利的把握就多一分，胜利的时间就早一日。我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缩短战争的过程，而排斥贪便宜尚空谈的速胜论。

为什么是持久战？

（三〇）现在我们来把持久战问题研究一下。“为什么是持久战”这一个问题，只有依据全部敌我对比的基本因素，才能得出正确的回答。例如单说敌人是帝国主义的强国，我们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就有陷入亡国论的危险。因为单纯地以弱敌强，无论在理论上，在实际上，都不能产生持久的结果。单是大小或单是进步退步、多助寡助，也是一样。大并小、小并大的事都是常有的。进步的国家或事物，如果力量不强，常有被大而退步的国家或事物所灭亡者。多助寡助是重要因素，

但是附随因素，依敌我本身的基本因素如何而定其作用的大小。因此，我们说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是从全部敌我因素的相互关系产生的结论。敌强我弱，我有灭亡的危险。但敌尚有其他缺点，我尚有其他优点。敌之优点可因我之努力而使之削弱，其缺点亦可因我之努力而使之扩大。我方反是，我之优点可因我之努力而加强，缺点则因我之努力而克服。所以我能最后胜利，避免灭亡，敌则将最后失败，而不能避免整个帝国主义制度的崩溃。

（三一）既然敌之优点只有一个，余皆缺点，我之缺点只有一个，余皆优点，为什么不能得出平衡结果，反而造成了现时敌之优势我之劣势呢？很明显的，不能这样形式地看问题。事情是现时敌我强弱的程度悬殊太大，敌之缺点一时还没有也不能发展到足以减杀其强的因素之必要的程度，我之优点一时也没有且不能发展到足以补充其弱的因素之必要的程度，所以平衡不能出现，而出现的是不平衡。

（三二）敌强我弱，敌是优势而我是劣势，这种情况，虽因我之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的努力而有所变化，但是还没有产生基本的变化。所以，在战争的一定阶段上，敌能得到一定程度的胜利，我则将遭到一定程度的失败。然而敌我都只限于这一定阶段内一定程度上的胜或败，不能超过而至于全胜或全败，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一则敌强我弱之原来状况就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二则由于我之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的努力，更加造成这种相对的形势。拿原来状况来说，敌虽强，但敌之强已为其他不利的因素所减杀，不过此时还没有减杀到足以破坏敌之优势的必要的程度；我虽弱，但我之弱已为其他有利的因素所补充，不过此时还没有补充到足以改变我之劣势的必要的程度。于是形成敌是相对的强，我是相对的弱；敌是相对的优势，我是相对的劣势。双方的强弱优劣原来都不是绝

对的，加以战争过程中我之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的努力，更加变化了敌我原来强弱优劣的形势，因而敌我只限于一定阶段内的一定程度上的胜或败，造成了持久战的局面。

（三三）然而情况是继续变化的。战争过程中，只要我能运用正确的军事的和政治的策略，不犯原则的错误，竭尽最善的努力，敌之不利因素和我之有利因素均将随战争之延长而发展，必能继续改变着敌我强弱的原来程度，继续变化着敌我的优劣形势。到了新的一定阶段时，就将发生强弱程度上和优劣形势上的大变化，而达到敌败我胜的结果。

（三四）目前敌尚能勉强利用其强的因素，我之抗战尚未给他以基本的削弱。其人力、物力不足的因素尚不足以阻止其进攻，反之，尚足以维持其进攻到一定的程度。其足以加剧本国阶级对立和中国民族反抗的因素，即战争之退步性和野蛮性一因素，亦尚未造成足以根本妨碍其进攻的情况。敌人的国际孤立的因素也方在变化发展之中，还没有达到完全的孤立。许多表示助我的国家的军火资本家和战争原料资本家，尚在唯利是图地供给日本以大量的战争物资^[6]，他们的政府^[7]亦尚不愿和苏联一道用实际方法制裁日本。这一切，规定了我之抗战不能速胜，而只能是持久战。中国方面，弱的因素表现在军事、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虽在十个月抗战中有了某种程度的进步，但距离足以阻止敌之进攻及准备我之反攻的必要的程度，还远得很。且在量的方面，又不得不有所减弱。其各种有利因素，虽然都在起积极作用，但达到足以停止敌之进攻及准备我之反攻的程度则尚有待于巨大的努力。在国内，克服腐败现象，增加进步速度；在国外，克服助日势力，增加反日势力，尚非目前的现实。这一切，又规定了战争不能速胜，而只能是持久战。

持久战的三个阶段

（三五）中日战争既然是持久战，最后胜利又将是属于中国的，那末，就可以合理地设想，这种持久战，将具体地表现于三个阶段之中。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三个阶段的具体情况不能预断，但依目前条件来看，战争趋势中的某些大端是可以指出的。客观现实的行程将是异常丰富和曲折变化的，谁也不能造出一本中日战争的“流年”来；然而给战争趋势描画一个轮廓，却为战略指导所必需。所以，尽管描画的东西不能尽合将来的事实，而将为事实所校正，但是为着坚定地有目的地进行持久战的战略指导起见，描画轮廓的事仍然是需要的。

（三六）第一阶段，现在还未完结。敌之企图是攻占广州、武汉、兰州三点，并把三点联系起来。敌欲达此目的，至少出五十个师团，约一百五十万兵员，时间一年半至两年，用费将在一百万万日元以上。敌人如此深入，其困难是非常之大的，其后果将不堪设想。至欲完全占领粤汉铁路和西兰公路，将经历非常危险的战争，未必尽能达其企图。但是我们的作战计划，应把敌人可能占领三点甚至三点以外之某些部分地区并可能互相联系起来作为一种基础，部署持久战，即令敌如此做，我也有应付之方。这一阶段我所采取的战争形式，主要的是运动战，而以游击战和阵地战辅助之。阵地战虽在此阶段之第一期，由于国民党军事当局的主观错误把它放在主要地位，但从全阶段看，仍然是辅助的。此阶段中，中国已经结成了广大的统一战线，实现了空前的团结。敌虽已经采用过并且还将采用

卑鄙无耻的劝降手段，企图不费大力实现其速决计划，整个地征服中国，但是过去的已经失败，今后的也难成功。此阶段中，中国虽有颇大的损失，但是同时却有颇大的进步，这种进步就成为第二阶段继续抗战的主要基础。此阶段中，苏联对于我国已经有了大量的援助。敌人方面，士气已开始表现颓靡，敌人陆军进攻的锐气，此阶段的中期已不如初期，末期将更不如初期。敌之财政和经济已开始表现其竭蹶状态，人民和士兵的厌战情绪已开始发生，战争指导集团的内部已开始表现其“战争的烦闷”，生长着对于战争前途的悲观。

（三七）第二阶段，可以名之曰战略的相持阶段。第一阶段之末尾，由于敌之兵力不足和我之坚强抵抗，敌人将不得不决定在一定限度上的战略进攻终点，到达此终点以后，即停止其战略进攻，转入保守占领地的阶段。此阶段内，敌之企图是保守占领地，以组织伪政府的欺骗办法据之为己有，而从中国人民身上尽量搜括东西，但是在他的面前又遇着顽强的游击战争。游击战争在第一阶段中乘着敌后空虚将有一个普遍的发展，建立许多根据地，基本上威胁到敌人占领地的保守，因此第二阶段仍将有广大的战争。此阶段中我之作战形式主要的是游击战，而以运动战辅助之。此时中国尚能保有大量的正规军，不过一方面因敌在其占领的大城市和大道中取战略守势，一方面因中国技术条件一时未能完备，尚难迅即举行战略反攻。除正面防御部队外，我军将大量地转入敌后，比较地分散配置，依托一切敌人未占区域，配合民众武装，向敌人占领地作广泛的和猛烈的游击战争，并尽可能地调动敌人于运动战中消灭之，如同现在山西的榜样。此阶段的战争是残酷的，地方将遇到严重的破坏。但是游击战争能够胜利，做得好，可能使敌只能保守占领地三分之一左右的区域，三分之二左右仍然是我们的，这就是敌人的大失败，中国的大胜利。那时，整个敌

人占领地将分为三种地区：第一种是敌人的根据地，第二种是游击战争的根据地，第三种是双方争夺的游击区。这个阶段的时间的长短，依敌我力量增减变化的程度如何及国际形势变动如何而定，大体上我们要准备付给较长的时间，要熬得过这段艰难的路程。这将是中国人很痛苦的时期，经济困难和汉奸捣乱将是两个很大的问题。敌人将大肆其破坏中国统一战线的活动，一切敌之占领地的汉奸组织将合流组成所谓“统一政府”。我们内部，因大城市的丧失和战争的困难，动摇分子将大倡其妥协论，悲观情绪将严重地增长。此时我们的任务，在于动员全国民众，齐心协力，绝不动摇地坚持战争，把统一战线扩大和巩固起来，排除一切悲观主义和妥协论，提倡艰苦奋斗，实行新的战时政策，熬过这一段艰难的路程。此阶段内，必须号召全国坚决地维持一个统一政府，反对分裂，有计划地增强作战技术，改造军队，动员全民，准备反攻。此阶段中，国际形势将变到更于日本不利，虽可能有张伯伦一类的迁就所谓“既成事实”的“现实主义”的调头出现，但主要的国际势力将变到进一步地援助中国。日本威胁南洋和威胁西伯利亚，将较之过去更加严重，甚至爆发新的战争。敌人方面，陷在中国泥潭中的几十个师团抽不出去。广大的游击战争和人民抗日运动将疲惫这一大批日本军，一方面大量地消耗之，又一方面进一步地增长其思乡厌战直至反战的心理，从精神上瓦解这个军队。日本在中国的掠夺虽然不能说它绝对不能有所成就，但是日本资本缺乏，又困于游击战争，急遽的大量的成就是不可能的。这个第二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也将是最困难的时期，然而它是转变的枢纽。中国将变为独立国，还是沦为殖民地，不决定于第一阶段大城市之是否丧失，而决定于第二阶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如能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持久战，中国将在此阶段中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中国抗战的三幕戏，

这是第二幕。由于全体演员的努力，最精彩的闭幕便能很好地演出来。

(三八) 第三阶段，是收复失地的反攻阶段。收复失地，主要地依靠中国自己在前阶段中准备着的和在本阶段中继续地生长着的力量。然而单只自己的力量还是不够的，还须依靠国际力量和敌国内部变化的援助，否则是不能胜利的，因此加重了中国的国际宣传和外交工作的任务。这个阶段，战争已不是战略防御，而将变为战略反攻了，在现象上，并将表现为战略进攻；已不是战略内线，而将逐渐地变为战略外线。直至打到鸭绿江边，才算结束了这个战争。第三阶段是持久战的最后阶段，所谓坚持战争到底，就是要走完这个阶段的全程。这个阶段我所采取的主要的战争形式仍将是运动战，但是阵地战将提到重要地位。如果说，第一阶段的阵地防御，由于当时的条件，不能看作重要的，那末，第三阶段的阵地攻击，由于条件的改变和任务的需要，将变成颇为重要的。此阶段内的游击战，仍将辅助运动战和阵地战而起其战略配合的作用，和第二阶段之变为主要形式者不相同。

(三九) 这样看来，战争的长期性和随之而来的残酷性，是明显的。敌人不能整个地吞并中国，但是能够相当长期地占领中国的许多地方。中国也不能迅速地驱逐日本，但是大部分的土地将依然是中国的。最后是敌败我胜，但是必须经过一段艰难的路程。

(四〇) 中国人民在这样长期和残酷的战争中间，将受到很好的锻炼。参加战争的各政党也将受到锻炼和考验。统一战线必须坚持下去；只有坚持统一战线，才能坚持战争；只有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战争，才能有最后胜利。果然是这样，一切困难就能够克服。跨过战争的艰难路程之后，胜利的坦途就来了，这是战争的自然逻辑。

（四一）三个阶段中，敌我力量的变化将循着下述的道路前进。第一阶段敌是优势，我是劣势。我之这种劣势，须估计抗战以前到这一阶段末尾，有两种不同的变化。第一种是向下的。中国原来的劣势，经过第一阶段的消耗将更为严重，这就是土地、人口、经济力量、军事力量和文化机关等的减缩。第一阶段的末尾，也许要减缩到相当大的程度，特别是经济方面。这一点，将被人利用作为亡国论和妥协论的根据。然而必须看到第二种变化，即向上的变化。这就是战争中的经验，军队的进步，政治的进步，人民的动员，文化的新方向的发展，游击战争的出现，国际援助的增长等等。在第一阶段，向下的东西是旧的量和质，主要地表现在量上。向上的东西是新的量和质，主要地表现在质上。这第二种变化，就给了我们以能够持久和最后胜利的根据。

（四二）第一阶段中，敌人方面也有两种变化。第一种是向下的，表现在：几十万人的伤亡，武器和弹药的消耗，士气的颓靡，国内人心的不满，贸易的缩减，一百万万日元以上的支出，国际舆论的责备等等方面。这个方面，又给予我们以能够持久和最后胜利的根据。然而也要估计到敌人的第二种变化，即向上的变化。那就是他扩大了领土、人口和资源。在这点上，又产生我们的抗战是持久战而不能速胜的根据，同时也将被一些人利用作为亡国论和妥协论的根据。但是我们必须估计敌人这种向上变化的暂时性和局部性。敌人是行将崩溃的帝国主义者，他占领中国的土地是暂时的。中国游击战争的猛烈发展，将使他的占领区实际上限制在狭小的地带。而且，敌人对中国土地的占领又产生了和加深了日本同外国的矛盾。再则，根据东三省的经验，日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般地只能是支出资本时期，不能是收获时期。所有这些，又是我们击破亡国论和妥协论而建立持久论和最后胜利论的根据。

(四三) 第二阶段，上述双方的变化将继续发展，具体的情形不能预断，但是大体上将是日本继续向下，中国继续向上。例如日本的军力、财力大量地消耗于中国的游击战争，国内人心更加不满，士气更加颓靡，国际更感孤立。中国则政治、军事、文化和人民动员将更加进步，游击战争更加发展，经济方面也将依凭内地的小工业和广大的农业而有某种程度的新发展，国际援助将逐渐地增进，将比现在的情况大为改观。这个第二阶段，也许将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在这个时间内，敌我力量对比将发生巨大的相反的变化，中国将逐渐上升，日本则逐渐下降。那时中国将脱出劣势，日本则脱出优势，先走到平衡的地位，再走到优劣相反的地位。然后中国大体上将完成战略反攻的准备而走到实行反攻、驱敌出国的阶段。应该重复地指出：所谓变劣势为优势和完成反攻准备，是包括中国自己力量的增长、日本困难的增长和国际援助的增长在内的，总合这些力量就能形成中国的优势，完成反攻的准备。

(四四) 根据中国政治和经济不平衡的状态，第三阶段的战略反攻，在其前一时期将不是全国整齐划一的姿态，而是带地域性的和此起彼落的姿态。敌人采用各种分化手段破裂中国统一战线的企图，此阶段中并不会减弱，因此，中国内部团结的任务更加重要，务不令内部不调致战略反攻半途而废。此时期中，国际形势将变到大有利于中国。中国的任务，就在于利用这种国际形势取得自己的彻底解放，建立独立的民主国家，同时也就是帮助世界的反法西斯运动。

(四五) 中国由劣势到平衡到优势，日本由优势到平衡到劣势，中国由防御到相持到反攻，日本由进攻到保守到退却——这就是中日战争的过程，中日战争的必然趋势。

(四六) 于是问题和结论是：中国会亡吗？答复：不会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中国能够速胜吗？答复：不能速胜，必须

是持久战。这个结论是正确的吗？我以为是正确的。

（四七）讲到这里，亡国论和妥协论者又将跑出来讲：中国由劣势到平衡，需要有同日本相等的军力和经济力；由平衡到优势，需要有超过日本的军力和经济力；然而这是不可能的，因此上述结论是不正确的。

（四八）这就是所谓“唯武器论”，是战争问题中的机械论，是主观地和片面地看问题的意见。我们的意见与此相反，不但看到武器，而且看到人力。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如果中国人的大多数、日本人的大多数、世界各国人的大多数是站在抗日战争方面的话，那末，日本少数人强制地掌握着的军力和经济力，还能算是优势吗？它不是优势，那末，掌握比较劣势的军力和经济力的中国，不就成了优势吗？没有疑义，中国只要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其军力和经济力是能够逐渐地加强的。而我们的敌人，经过长期战争和内外矛盾的削弱，其军力和经济力又必然要起相反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难道中国也不能变成优势吗？还不止此，目前我们不能把别国的军力和经济力大量地公开地算作自己方面的力量，难道将来也不能吗？如果日本的敌人不止中国一个，如果将来有一国或几国以其相当大量的军力和经济力公开地防御或攻击日本，公开地援助我们，那末，优势不更在我们一方面吗？日本是小国，其战争是退步的和野蛮的，其国际地位将益处于孤立；中国是大国，其战争是进步的和正义的，其国际地位将益处于多助。所有这些，经过长期发展，难道还不能使敌我优劣的形势确定地发生变化吗？

（四九）速胜论者则不知道战争是力量的竞赛，在战争双方的力量对比没有起一定的变化以前，就要举行战略的决战，

就想提前到达解放之路，也是没有根据的。其意见实行起来，一定不免于碰壁。或者只是空谈快意，并不准备真正去做。最后则是事实先生跑将出来，给这些空谈家一瓢冷水，证明他们不过是一些贪便宜、想少费气力多得收成的空谈主义者。这种空谈主义过去和现在已经存在，但是还不算很多，战争发展到相持阶段和反攻阶段时，空谈主义可能多起来。但是在同时，如果第一阶段中国损失较大，第二阶段时间拖得很长，亡国论和妥协论更将大大地流行。所以我们的火力，应该主要地向着亡国论和妥协论方面，而以次要的火力，反对空谈主义的速胜论。

(五〇) 战争的长期性是确定了的，但是战争究将经过多少年月则谁也不能预断，这个完全要看敌我力量变化的程度才能决定。一切想要缩短战争时间的人们，惟有努力于增加自己力量减少敌人力量之一法。具体地说，惟有努力于作战多打胜仗，消耗敌人的军队，努力于发展游击战争，使敌之占领地限制于最小的范围，努力于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团结全国力量，努力于建设新军和发展新的军事工业，努力于推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进步，努力于工、农、商、学各界人民的动员，努力于瓦解敌军和争取敌军的士兵，努力于国际宣传争取国际的援助，努力于争取日本的人民及其他被压迫民族的援助，做了这一切，才能缩短战争的时间，此外不能有任何取巧图便的法门。

犬牙交错的战争

(五一) 我们可以断言，持久战的抗日战争，将在人类战争史中表现为光荣的特殊的一页。犬牙交错的战争形态，就是颇为特殊的一点，这是由于日本的野蛮和兵力不足，中国的进

步和土地广大这些矛盾因素产生出来的。犬牙交错的战争，在历史上也是有过的，俄国十月革命后的三年内战，就有过这种情形。但其在中国的特点，是其特殊的长期性和广大性，这将是突破历史纪录的东西。这种犬牙交错的形态，表现在下述的几种情况上。

（五二）内线和外线——抗日战争是整个处于内线作战的地位的；但是主力军和游击队的关系，则是主力军在内线，游击队在外线，形成夹攻敌人的奇观。各游击区的关系亦然。各个游击区都以自己为内线，而以其他各区为外线，又形成了很多夹攻敌人的火线。在战争的第一阶段，战略上内线作战的正规军是后退的，但是战略上外线作战的游击队则将广泛地向着敌人后方大踏步前进，第二阶段将更加猛烈地前进，形成了后退和前进的奇异形态。

（五三）有后方和无后方——利用国家的总后方，而把作战线伸至敌人占领地之最后限界的，是主力军。脱离总后方，而把作战线伸至敌后的，是游击队。但在每一游击区中，仍自有其小规模的后方，并依以建立非固定的作战线。和这个区别的，是每一游击区派遣出去向该区敌后临时活动的游击队，他们不但没有后方，也没有作战线。“无后方的作战”，是新时代中领土广大、人民进步、有先进政党和先进军队的情况之下的革命战争的特点，没有可怕而有大利，不应怀疑而应提倡。

（五四）包围和反包围——从整个战争看来，由于敌之战略进攻和外线作战，我处战略防御和内线作战地位，无疑我是在敌之战略包围中。这是敌对于我之第一种包围。由于我以数量上优势的兵力，对于从战略上的外线分数路向我前进之敌，采取战役和战斗上的外线作战方针，就可以把各路分进之敌的一路或几路放在我之包围中。这是我对于敌之第一种反包围。再从敌后游击战争的根据地看来，每一孤立的根据地都处于敌

之四面或三面包围中，前者例如五台山，后者例如晋西北。这是敌对于我之第二种包围。但若将各个游击根据地联系起来看，并将各个游击根据地和正规军的阵地也联系起来看，我又把许多敌人都包围起来，例如在山西，我已三面包围了同蒲路（路之东西两侧及南端），四面包围了太原城；河北、山东等省也有许多这样的包围。这又是我对于敌之第二种反包围。这样，敌我各有加于对方的两种包围，大体上好似下围棋一样，敌对于我、我对于敌之战役和战斗的作战，好似吃子，敌的据点（例如太原）和我之游击根据地（例如五台山），好似做眼。如果把世界性的围棋也算在内，那就还有第三种敌我包围，这就是侵略阵线与和平阵线的关系。敌以前者来包围中、苏、法、捷等国，我以后者反包围德、日、意。但是我之包围好似如来佛的手掌，它将化成一座横亘宇宙的五行山，把这几个新式孙悟空——法西斯侵略主义者，最后压倒在山底下，永世也不得翻身。如果我能在外交上建立太平洋反日阵线，把中国作为一个战略单位，又把苏联及其他可能的国家也各作为一个战略单位，又把日本人民运动也作为一个战略单位，形成一个使法西斯孙悟空无处逃跑的天罗地网，那就是敌人死亡之时了。实际上，日本帝国主义完全打倒之日，必是这个天罗地网大体布成之时。这丝毫也不是笑话，而是战争的必然的趋势。

（五五）大块和小块——一种可能，是敌占地区将占中国本部之大半，而中国本部完整的区域只占一小半。这是一种情形。但是敌占大半中，除东三省等地外，实际只能占领大城市、大道和某些平地，依重要性说是一等的，依面积和人口来说可能只是敌占区中之小半，而普遍地发展的游击区，反居其大半。这又是一种情形。如果超越本部的范围，而把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算了进来，则在面积上中国未失地区仍然是大半，而敌占地区包括东三省在内，也只是小半。这又是一种情

形。完整区域当然是重要的，应集大力去经营，不但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文化方面也要紧。敌人已将我们过去的文化中心变为文化落后区域，而我们则要将过去的文化落后区域变为文化中心。同时，敌后广大游击区的经营也是非常之要紧的，也应把它们各方面发展起来，也应发展其文化工作。总起来看，中国将是大块的乡村变为进步和光明的地区，而小块的敌占区，尤其是大城市，将暂时地变为落后和黑暗的地区。

（五六）这样看来，长期而又广大的抗日战争，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犬牙交错的战争，这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这个战争，不但将影响到中日两国，大大推动两国的进步，而且将影响到世界，推动各国首先是印度等被压迫民族的进步。全中国人都应自觉地投入这个犬牙交错的战争中去，这就是中华民族自求解放的战争形态，是半殖民地大国在二十世纪三十和四十年代举行的解放战争的特殊形态。

为永久和平而战

（五七）中国抗日战争的持久性同争取中国和世界的永久和平，是不能分离的。没有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像今天一样，战争是接近于永久和平的。由于阶级的出现，几千年来人类的生活中充满了战争，每一个民族都不知打了几多仗，或在民族集团之内打，或在民族集团之间打。打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帝国主义时期，仗就打得特别广大和特别残酷。二十年前的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在过去历史上是空前的，但还不是绝后的战争。只有目前开始了战争，接近于最后战争，就是说，接近于人类的永久和平。目前世界上已有三分之一的人口进入了战争，你们看，一个意大利，又一个日本，一个阿比西尼亚，又一个

西班牙，再一个中国。参加战争的这些国家共有差不多六万万人口，几乎占了全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一。目前的战争的特点是无间断和接近永久和平的性质。为什么无间断？意大利同阿比西尼亚打了之后，接着意大利同西班牙打，德国也搭了股份，接着日本又同中国打。还要接着谁呢？无疑地要接着希特勒同各大国打。“法西斯主义就是战争”，一点也不错。目前的战争发展到世界大战之间，是不会间断的，人类的战争灾难不可避免。为什么又说这次战争接近于永久和平？这次战争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已开始的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发展的基础上发生的，由于这种总危机，逼使各资本主义国家走入新的战争，首先逼使各法西斯国家从事于新战争的冒险。我们可以预见这次战争的结果，将不是资本主义的获救，而是它的走向崩溃。这次战争，将比二十年前的战争更大，更残酷，一切民族将无可避免地卷入进去，战争时间将拖得很长，人类将遭受很大的痛苦。但是由于苏联的存在和世界人民觉悟程度的提高，这次战争中无疑将出现伟大的革命战争，用以反对一切反革命战争，而使这次战争带着为永久和平而战的性质。即使尔后尚有一个战争时期，但是已离世界的永久和平不远了。人类一经消灭了资本主义，便到达永久和平的时代，那时候便再也不要战争了。那时将不要军队，也不要兵船，不要军用飞机，也不要毒气。从此以后，人类将亿万斯年看不见战争。已经开始了的革命的战争，是这个为永久和平而战的战争的一部分。占着五万万以上人口的中日两国之间的战争，在这个战争中将占着重要的地位，中华民族的解放将从这个战争中得来。将来的被解放了的新中国，是和将来的被解放了的新世界不能分离的。因此，我们的抗日战争包含着为争取永久和平而战的性质。

（五八）历史上的战争分为两类，一类是正义的，一类是非正义的。一切进步的战争都是正义的，一切阻碍进步的战争

都是非正义的。我们共产党人反对一切阻碍进步的非正义的战争，但是不反对进步的正义的战争。对于后一类战争，我们共产党人不但反对，而且积极地参加。前一类战争，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双方都是为着帝国主义利益而战，所以全世界的共产党人坚决地反对那一次战争。反对的方法，在战争未爆发前，极力阻止其爆发；既爆发后，只要有可能，就用战争反对战争，用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日本的战争是阻碍进步的非正义的战争，全世界人民包括日本人民在内，都应该反对，也正在反对。我们中国，则从人民到政府，从共产党到国民党，一律举起了义旗，进行了反侵略的民族革命战争。我们的战争是神圣的、正义的，是进步的、求和平的。不但求一国的和平，而且求世界的和平，不但求一时的和平，而且求永久的和平。欲达此目的，便须决一死战，便须准备着一切牺牲，坚持到底，不达目的，决不停止。牺牲虽大，时间虽长，但是永久和平和永久光明的新世界，已经鲜明地摆在我们的前面。我们从事战争的信念，便建立在这个争取永久和平和永久光明的新中国和新世界的上面。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要把战争延长到无尽期，我们则要把战争在一个不很久远的将来给以结束。为了这个目的，人类大多数应该拿出极大的努力。四亿五千万的中国人占了全人类的四分之一，如果能够一齐努力，打倒了日本帝国主义，创造了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对于争取全世界永久和平的贡献，无疑地是非常伟大的。这种希望不是空的，全世界社会经济的行程已经接近了这一点，只须加上多数人的努力，几十年工夫一定可以达到目的。

能动性在战争中

（五九）以上说的，都是说明为什么是持久战和为什么最

后胜利是中国的，大体上都是说的“是什么”和“不是什么”。以下，将转到研究“怎样做”和“不怎样做”的问题上。怎样进行持久战和怎样争取最后胜利？这就是以下要答复的问题。为了这个，我们将依次说明下列的问题：能动性在战争中，战争和政治，抗战的政治动员，战争的目的，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歼灭战，消耗战，乘敌之隙的可能性，抗日战争的决战问题，兵民是胜利之本。我们现在就从能动性问题说起吧。

（六〇）我们反对主观地看问题，说的是一个人的思想，不根据和不符合于客观事实，是空想，是假道理，如果照了做去，就要失败，故须反对它。但是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持久战和最后胜利没有人做就不会出现。做就必须先有人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方能做得好。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一切根据和符合于客观事实的思想是正确的思想，一切根据于正确思想的做或行动是正确的行动。我们必须发扬这样的思想和行动，必须发扬这种自觉的能动性。抗日战争是要赶走帝国主义，变旧中国为新中国，必须动员全中国人民，统统发扬其抗日的自觉的能动性，才能达到目的。坐着不动，只有被灭亡，没有持久战，也没有最后胜利。

（六一）自觉的能动性是人类的特点。人类在战争中强烈地表现出这样的特点。战争的胜负，固然决定于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争性质、国际援助诸条件，然而不仅仅决定于这些；仅有这些，还只是有了胜负的可能性，它本身没有分胜负。要分胜负，还须加上主观的努力，这就是指导战争和

实行战争，这就是战争中的自觉的能动性。

（六二）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期求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战争指挥员活动的舞台，必须建筑在客观条件的许可之上，然而他们凭借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很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戏剧来。在既定的客观物质的基础之上，抗日战争的指挥员就要发挥他们的威力，提挈全军，去打倒那些民族的敌人，改变我们这个被侵略被压迫的社会国家的状态，造成自由平等的新中国，这里就用得着而且必须用我们的主观指导的能力。我们不赞成任何一个抗日战争的指挥员，离开客观条件，变为乱撞乱碰的鲁莽家，但是我们必须提倡每个抗日战争的指挥员变为勇敢而明智的将军。他们不但要有压倒敌人的勇气，而且要有驾驭整个战争变化发展的能力。指挥员在战争的大海中游泳，他们要不使自己沉没，而要使自己决定地有步骤地到达彼岸。作为战争指导规律的战略战术，就是战争大海中的游泳术。

战争和政治

（六三）“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在这点上说，战争就是政治，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从古以来没有不带政治性的战争。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革命战争，它的胜利，离不开战争的政治目的——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离不开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的总方针，离不开全国人民的动员，离不开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等项政治原则，离不开统一战线政策的良好执行，离不开文化的动员，离不开争取国际力量和敌国人民援助的努力。一句话，战争一刻也离不了政治。抗日军人中，如有轻视政治的倾向，把战争孤

立起来，变为战争绝对主义者，那是错误的，应加纠正。

（六四）但是战争有其特殊性，在这点上说，战争不即等于一般的政治。“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政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再也不能照旧前进，于是爆发了战争，用以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例如中国的半独立地位，是日本帝国主义政治发展的障碍，日本要扫除它，所以发动了侵略战争。中国呢？帝国主义压迫，早就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障碍，所以有了很多次的解放战争，企图扫除这个障碍。日本现在用战争来压迫，要完全断绝中国革命的进路，所以不得不举行抗日战争，决心要扫除这个障碍。障碍既除，政治的目的达到，战争结束。障碍没有扫除得干净，战争仍须继续进行，以求贯彻。例如抗日的任务未完，有想求妥协的，必不成功；因为即使因某种缘故妥协了，但是战争仍要起来，广大人民必定不服，必要继续战争，贯彻战争的政治目的。因此可以说，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

（六五）基于战争的特殊性，就有战争的一套特殊组织，一套特殊方法，一种特殊过程。这组织，就是军队及其附随的一切东西。这方法，就是指导战争的战略战术。这过程，就是敌对的军队互相使用有利于己不利于敌的战略战术从事攻击或防御的一种特殊的社会活动形态。因此，战争的经验是特殊的。一切参加战争的人们，必须脱出寻常习惯，而习惯于战争，方能争取战争的胜利。

抗日的政治动员

（六六）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抗日以前，没有抗日的政治动员，这是中国的大缺陷，已经输了敌人一着。抗日以后，政治动员也

非常之不普遍，更不说深入。人民的大多数，是从敌人的炮火和飞机炸弹那里听到消息的。这也是一种动员，但这是敌人替我们做的，不是我们自己做的。偏远地区听不到炮声的人们，至今还是静悄悄地在那里过活。这种情形必须改变，不然，拼死活的战争就得不到胜利。决不可以再输敌人一着，相反，要大大地发挥这一着去制胜敌人。这一着是关系绝大的；武器等等不如人尚在其次，这一着实在是头等重要。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要胜利又忽视政治动员，叫做“南其辕而北其辙”，结果必然取消了胜利。

（六七）什么是政治动员呢？首先是把战争的政治目的告诉军队和人民。必须使每个士兵每个人民都明白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必须把这个目的告诉一切军民人等，方能造成抗日的热潮，使几万万人齐心协力，贡献一切给战争。其次，单单说明目的还不够，还要说明达到此目的的步骤和政策，就是说，要有一个政治纲领。现在已经有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又有了一个《抗战建国纲领》，应把它们普及于军队和人民，并动员所有的军队和人民实行起来。没有一个明确的具体的政治纲领，是不能动员全军全民抗日到底的。其次，怎样去动员？靠口说，靠传单布告，靠报纸书册，靠戏剧电影，靠学校，靠民众团体，靠干部人员。现在国民党统治地区有的一些，沧海一粟，而且方法不合民众口味，神气和民众隔膜，必须切实地改一改。其次，不是一次动员就够了，抗日战争的政治动员是经常的。不是将政治纲领背诵给老百姓听，这样的背诵是没有人听的；要联系战争发

展的情况，联系士兵和老百姓的生活，把战争的政治动员，变成经常的运动。这是一件绝大的事，战争首先要靠它取得胜利。

战争的目的

(六八) 这里不是说战争的政治目的，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前面已经说过了。这里说的，是作为人类流血的政治的所谓战争，两军相战的战争，它的根本目的是什么。战争的目的不是别的，就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消灭敌人，就是解除敌人的武装，也就是所谓“剥夺敌人的抵抗力”，不是要完全消灭其肉体）。古代战争，用矛用盾：矛是进攻的，为了消灭敌人；盾是防御的，为了保存自己。直到今天的武器，还是这二者的继续。轰炸机、机关枪、远射程炮、毒气，是矛的发展；防空掩蔽部、钢盔、水泥工事、防毒面具，是盾的发展。坦克，是矛盾二者结合为一的新式武器。进攻，是消灭敌人的主要手段，但防御也是不能废的。进攻，是直接为了消灭敌人的，同时也是为了保存自己，因为如不消灭敌人，则自己将被消灭。防御，是直接为了保存自己的，但同时也是辅助进攻或准备转入进攻的一种手段。退却，属于防御一类，是防御的继续；而追击，则是进攻的继续。应该指出：战争目的中，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因为只有大量地消灭敌人，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因此，作为消灭敌人之主要手段的进攻是主要的，而作为消灭敌人之辅助手段和作为保存自己之一种手段的防御，是第二位的。战争实际中，虽有许多时候以防御为主，而在其余时候以进攻为主，然而通战争的全体来看，进攻仍然是主要的。

（六九）怎样解释战争中提倡勇敢牺牲呢？岂非与“保存自己”相矛盾？不相矛盾，是相反相成的。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是要付代价的，有时是极大的代价。部分的暂时的牺牲（不保存），为了全体的永久的保存。我们说，基本上为着消灭敌人的进攻手段中，同时也含了保存自己的作用，理由就在这里。防御必须同时有进攻，而不应是单纯的防御，也是这个道理。

（七〇）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个战争的目的，就是战争的本质，就是一切战争行动的根据，从技术行动起，到战略行动止，都是贯彻这个本质的。战争目的，是战争的基本原则，一切技术的、战术的、战役的、战略的原理原则，一点也离不开它。射击原则的“荫蔽身体，发扬火力”是什么意思呢？前者为了保存自己，后者为了消灭敌人。因为前者，于是利用地形地物，采取跃进运动，疏开队形，种种方法都发生了。因为后者，于是扫清射界，组织火网，种种方法也发生了。战术上的突击队、钳制队、预备队，第一种为了消灭敌人，第二种为了保存自己，第三种准备依情况使用于两个目的——或者增援突击队，或者作为追击队，都是为了消灭敌人；或者增援钳制队，或者作为掩护队，都是为了保存自己。照这样，一切技术、战术、战役、战略原则，一切技术、战术、战役、战略行动，一点也离不开战争的目的，它普及于战争的全体，贯彻于战争的始终。

（七一）抗日战争的各级指导者，不能离开中日两国之间各种互相对立的基本因素去指导战争，也不能离开这个战争目的去指导战争。两国之间各种互相对立的基本因素展开于战争的行动中，就变成互相为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而斗争。我们的战争，在于力求每战争取不论大小的胜利，在于力求每战解除敌人一部分武装，损伤敌人一部分人马器物。把这些部分地消

灭敌人的成绩积累起来，成为大的战略胜利，达到最后驱敌出国，保卫祖国，建设新中国的政治目的。

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

（七二）现在来研究抗日战争中的具体的战略方针。我们已说过了，抗日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是的，这是完全对的。但这是一般的方针，还不是具体的方针。怎样具体地进行持久战呢？这就是我们现在要讨论的问题。我们的答复是：在第一和第二阶段即敌之进攻和保守阶段中，应该是战略防御中的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战略持久中的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战略内线中的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在第三阶段中，应该是战略的反攻战。

（七三）由于日本是帝国主义的强国，我们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日本是采取战略进攻方针的，我们则居于战略防御地位。日本企图采取战略的速决战，我们应自觉地采取战略的持久战。日本用其战斗力颇强的几十个师团的陆军（目前已到了三十个师团）和一部分海军，从陆海两面包围和封锁中国，又用空军轰炸中国。目前日本的陆军已占领从包头到杭州的长阵线，海军则到了福建广东，形成了大范围的外线作战。我们则处于内线作战地位。所有这些，都是由敌强我弱这个特点造成的。这是一方面的情形。

（七四）然而在另一方面，则适得其反。日本虽强，但兵力不足。中国虽弱，但地大、人多、兵多。这里就产生了两个重要的结果。第一，敌以少兵临大国，就只能占领一部分大城市、大道和某些平地。由是，在其占领区域，则空出了广大地面无法占领，这就给了中国游击战争以广大活动的地盘。在全国，即使敌能占领广州、武汉、兰州之线及其附近的地区，但

以外的地区是难于占领的，这就给了中国以进行持久战和争取最后胜利的总后方和中枢根据地。第二，敌以少兵临多兵，便处于多兵的包围中。敌分路向我进攻，敌处战略外线，我处战略内线，敌是战略进攻，我是战略防御，看起来我是很不利的。然而我可以利用地广和兵多两个长处，不作死守的阵地战，采用灵活的运动战，以几个师对他一个师，几万人对他一万人，几路对他一路，从战场的外线，突然包围其一路而攻击之。于是敌之战略作战上的外线和进攻，在战役和战斗的作战上，就不得不变成内线和防御。我之战略作战上的内线和防御，在战役和战斗的作战上就变成了外线和进攻。对其一路如此，对其他路也是如此。以上两点，都是从敌小我大这一特点发生的。又由于敌兵虽少，乃是强兵（武器和人员的教养程度），我兵虽多，乃是弱兵（也仅是武器和人员的教养程度，不是士气），因此，在战役和战斗的作战上，我不但应以多兵打少兵，从外线打内线，还须采取速决战的方针。为了实行速决，一般应不打驻止中之敌，而打运动中之敌。我预将大兵荫蔽集结于敌必经通路之侧，乘敌运动之际，突然前进，包围而攻击之，打他一个措手不及，迅速解决战斗。打得好，可能全部或大部或一部消灭他；打不好，也给他一个大的杀伤。一战如此，他战皆然。不说多了，每个月打得一个较大的胜仗，如像平型关台儿庄一类的，就能大大地沮丧敌人的精神，振起我军的士气，号召世界的声援。这样，我之战略的持久战，到战场作战就变成速决战了。敌之战略的速决战，经过许多战役和战斗的败仗，就不得不改为持久战。

（七五）上述这样的战役和战斗的作战方针，一句话说完，就是：“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这对于我之战略方针“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说来，是相反的；然而，又恰是实现这样的战略方针之必要的方针。如果战役和战斗方针也同样是“内线的

持久的防御战”，例如抗战初起时期之所为，那就完全不适合敌小我大、敌强我弱这两种情况，那就决然达不到战略目的，达不到总的持久战，而将为敌人所击败。所以，我们历来主张全国组成若干个大的野战兵团，其兵力针对着敌人每个野战兵团之兵力而二倍之、三倍之或四倍之，采用上述方针，与敌周旋于广大战场之上。这种方针，不但是正规战争用得着，游击战争也得着，而且必须要用它。不但适用于战争的某一阶段，而且适用于战争的全过程。战略反攻阶段，我之技术条件增强，以弱敌强这种情况即使完全没有了，我仍用多兵从外线采取速决的进攻战，就更能收大批俘获的成效。例如我用两个或三个或四个机械化的师对敌一个机械化的师，更能确定地消灭这个师。几个大汉打一个大汉之容易打胜，这是常识中包含的真理。

（七六）如果我们坚决地采取了战场作战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就不但在战场上改变着敌我之间的强弱优劣形势，而且将逐渐地变化着总的形势。在战场上，因为我是进攻，敌是防御；我是多兵处外线，敌是少兵处内线；我是速决，敌虽企图持久待援，但不能由他作主；于是在敌人方面，强者就变成了弱者，优势就变成了劣势；我军方面反之，弱者变成了强者，劣势变成了优势。在打了许多这样的胜仗之后，总的敌我形势便将引起变化。这就是说，集合了许多战场作战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的胜利以后，就逐渐地增强了自己，削弱了敌人，于是总的强弱优劣形势，就不能不受其影响而发生变化。到那时，配合着我们自己的其他条件，再配合着敌人内部的变动和国际上的有利形势，就能使敌我总的形势走到平衡，再由平衡走到我优敌劣。那时，就是我们实行反攻驱敌出国的时机了。

（七七）战争是力量的竞赛，但力量在战争过程中变化其

原来的形态。在这里，主观的努力，多打胜仗，少犯错误，是决定的因素。客观因素具备着这种变化的可能性，但实现这种可能性，就需要正确的方针和主观的努力。这时候，主观作用是决定的了。

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

（七八）上面说过的战役和战斗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中心点在于一个进攻；外线是说的进攻的范围，速决是说的进攻的时间，所以叫它做“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这是实行持久战的最好的方针，也即是所谓运动战的方针。但是这个方针实行起来，离不了主动性、灵活性和计划性。我们现在就来研究这三个问题。

（七九）前面已说过了自觉的能动性，为什么又说主动性呢？自觉的能动性，说的是自觉的活动和努力，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这种人的特点，特别强烈地表现于战争中，这些是前面说过了的。这里说的主动性，说的是军队行动的自由权，是用以区别于被迫处于不自由状态的。行动自由是军队的命脉，失了这种自由，军队就接近于被打败或被消灭。一个士兵被缴械，是这个士兵失了行动自由被迫处于被动地位的结果。一个军队的战败，也是一样。为此缘故，战争的双方，都力争主动，力避被动。我们提出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以及为了实现这种进攻战的灵活性、计划性，可以说都是为了争取主动权，以便逼敌处于被动地位，达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之目的。但主动或被动是和战争力量的优势或劣势分不开的。因而也是和主观指导的正确或错误分不开的。此外，也还有利用敌人的错觉和不意来争取自己主动和逼敌处于被动的情形。下面就来分析这几方面。

(八〇) 主动是和战争力量的优势不能分离的，而被动则和战争力量的劣势分不开。战争力量的优势或劣势，是主动或被动的客观基础。战略的主动地位，自然以战略的进攻战为较能掌握和发挥，然而贯彻始终和普及各地的主动地位，即绝对的主动权，只有以绝对优势对绝对劣势才有可能。一个身体壮健者和一个重病患者角斗，前者便有绝对的主动权。如果日本没有许多不可克服的矛盾，例如它能一下出几百万至一千万大兵，财源比现在多过几倍，又没有民众和外国的敌对，又不实行野蛮政策招致中国人民拼死命反抗，那它便能保持一种绝对的优势，它便有一种贯彻始终和普及各地的绝对的主动权。但在历史上，这类绝对优势的事情，在战争和战役的结局是存在的，战争和战役的开头则少见。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屈服的前夜，这时协约国变成了绝对优势，德国则变成了绝对劣势，结果德国失败，协约国获胜，这是战争结局存在着绝对的优势和劣势之例。又如台儿庄胜利的前夜，这时当地孤立的日军经过苦战之后，已处于绝对的劣势，我军则造成了绝对的优势，结果敌败我胜，这是战役结局存在着绝对的优势和劣势之例。战争或战役也有以相对的优劣或平衡状态而结局的，那时，在战争则出现妥协，在战役则出现对峙。但一般是以绝对的优劣而分胜负居多数。所有这些，都是战争或战役的结局，而非战争或战役的开头。中日战争的最后结局，可以预断，日本将以绝对劣势而失败，中国将以绝对优势而获胜；但是在目前，则双方的优劣都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日本因其具有强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这个有利因素，对于我们弱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占了优势，因而造成了它的主动权的基础。但是因为它的军力等等数量不多，又有其他许多不利因素，它的优势便为它自己的矛盾所减杀。及到中国，又碰到了中国的地大、人多、兵多和坚强的民族抗战，它的优

势再为之减杀。于是在总的方面，它的地位就变成一种相对的优势，因而其主动权的发挥和维持就受了限制，也成了相对的东西。中国方面，虽然在力量的强度上是劣势，因此造成了战略上的某种被动姿态，但是在地理、人口和兵员的数量上，并且又在人民和军队的敌忾心和士气上，却处于优势，这种优势再加上其他的有利因素，便减杀了自己军力、经济力等的劣势的程度，使之变为战略上的相对的劣势。因而也减少了被动的程度，仅处于战略上的相对的被动地位。然而被动总是不利的，必须力求脱离它。军事上的办法，就是坚决地实行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和发动敌后的游击战争，在战役的运动战和游击战中取得许多局部的压倒敌人的优势和主动地位。通过这样许多战役的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就能逐渐地造成战略的优势和战略的主动地位，战略的劣势和被动地位就能脱出了。这就是主动和被动之间、优势和劣势之间的相互关系。

（八一）由此也就可以明白主动或被动和主观指导之间的关系。如上所述，我之相对的战略劣势和战略被动地位，是能够脱出的，方法就是人工地造成我们许多的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去剥夺敌人的许多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把他抛入劣势和被动。把这些局部的东西集合起来，就成了我们的战略优势和战略主动，敌人的战略劣势和战略被动。这样的转变，依靠主观上的正确指导。为什么呢？我要优势和主动，敌人也要这个，从这点上看，战争就是两军指挥员以军力财力等项物质基础作地盘，互争优势和主动的主观能力的竞赛。竞赛结果，有胜有败，除了客观物质条件的比较外，胜者必由于主观指挥的正确，败者必由于主观指挥的错误。我们承认战争现象是较之任何别的社会现象更难捉摸，更少确实性，即更带所谓“盖然性”。但战争不是神物，仍是世间的一种必然运动，因此，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

理。错误由于对彼己的无知，战争的特性也使人们在许多的场合无法全知彼己，因此产生了战争情况和战争行动的不确实性，产生了错误和失败。然而不管怎样的战争情况和战争行动，知其大略，知其要点，是可能的。先之以各种侦察手段，继之以指挥员的聪明的推论和判断，减少错误，实现一般的正确指导，是做得到的。我们有了这个“一般地正确的指导”做武器，就能多打胜仗，就能变劣势为优势，变被动为主动。这是主动或被动和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之间的关系。

(八二) 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影响到优势劣势和主动被动的变化，观于强大之军打败仗、弱小之军打胜仗的历史事实而益信。中外历史上这类事情是多得很的。中国如晋楚城濮之战，楚汉成皋之战，韩信破赵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等，外国如拿破仑的多数战役，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内战，都是以少击众，以劣势对优势而获胜。都是先以自己局部的优势和主动，向着敌人局部的劣势和被动，一战而胜，再及其余，各个击破，全局因而转成了优势，转成了主动。在原占优势和主动之敌则反是；由于其主观错误和内部矛盾，可以将其很好的或较好的优势和主动地位，完全丧失，化为败军之将，亡国之君。由此可知，战争力量的优劣本身，固然是决定主动或被动的客观基础，但还不是主动或被动的现实事物，必待经过斗争，经过主观能力的竞赛，方才出现事实上的主动或被动。在斗争中，由于主观指导的正确或错误，可以化劣势为优势，化被动为主动；也可以化优势为劣势，化主动为被动。一切统治王朝打不赢革命军，可见单是某种优势还没有确定主动地位，更没有确定最后胜利。主动和胜利，是可以根据真实的情况，经过主观能力的活跃，取得一定的条件，而由劣势和被动者从优势和主动者手里夺取过来的。

（八三）错觉和不意，可以丧失优势和主动。因而有计划地造成敌人的错觉，给以不意的攻击，是造成优势和夺取主动的方法，而且是重要的方法。错觉是什么呢？“八公山上，草木皆兵”，是错觉之一例。“声东击西”，是造成敌人错觉之一法。在优越的民众条件具备，足以封锁消息时，采用各种欺骗敌人的方法，常能有效地陷敌于判断错误和行动错误的苦境，因而丧失其优势和主动。“兵不厌诈”，就是指的这件事情。什么是不意？就是无准备。优势而无准备，不是真正的优势，也没有主动。懂得这一点，劣势而有准备之军，常可对敌举行不意的攻势，把优势者打败。我们说运动之敌好打，就是因为敌在不意即无准备中。这两件事——造成敌人的错觉和出以不意的攻击，即是以战争的不确实性给予敌人，而给自己以尽可能大的确实性，用以争取我之优势和主动，争取我之胜利。要做到这些，先决条件是优越的民众组织。因此，发动所有一切反对敌人的老百姓，一律武装起来，对敌进行广泛的袭击，同时即用以封锁消息，掩护我军，使敌无从知道我军将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去攻击他，造成他的错觉和不意的客观基础，是非常之重要的。过去土地革命战争时代的中国红军，以弱小的军力而常打胜仗，得力于组织起来和武装起来了的民众是非常之大的。民族战争照规矩应比土地革命战争更能获得广大民众的援助；可是因为历史的错误，民众是散的，不但仓卒难为我用，且时为敌人所利用。只有坚决地广泛地发动全体的民众，方能在战争的一切需要上给以无穷无尽的供给。在这个给敌以错觉和给敌以不意以便战而胜之的战争方法上，也就一定能起大的作用。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我们要把敌人的眼睛和耳朵尽可能地封住，使他们变成瞎子和聋子，要把他们的指挥员的心尽可能地弄得混乱些，使他们变成疯子，用以争取自己的胜利。所有这些，也都是主动或被动和主

观指导之间的相互关系。战胜日本是少不了这种主观指导的。

(八四) 大抵日本在其进攻阶段中，因其军力之强和利用我之主观上的历史错误和现时错误，它是一般地处于主动地位的。但是这种主动，已随其本身带着许多不利因素及其在战争中也犯了些主观错误（详论见后），与乎我方具备着许多有利因素，而开始了部分的减弱。敌之在台儿庄失败和山西困处，就是显证。我在敌后游击战争的广大发展，则使其占领地的守军完全处于被动地位。虽则敌人此时还在其主动的战略进攻中，但他的主动将随其战略进攻的停止而结束。敌之兵力不足，没有可能作无限制的进攻，这是不能继续保持主动地位的第一个根源。我之战役的进攻战，在敌后的游击战争及其他条件，这是不能不停止进攻于一定限度和不能继续保持主动地位的第二个根源。苏联的存在及其他国际变化，是第三个根源。由此可见，敌人的主动地位是有限制的，也是能够破坏的。中国如能在作战方法上坚持主力军的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猛烈地发展敌后的游击战争，并从政治上大大地发动民众，我之战略主动地位便能逐渐树立起来。

(八五) 现在来说灵活性。灵活性是什么呢？就是具体地实现主动性于作战中的东西，就是灵活地使用兵力。灵活地使用兵力这件事，是战争指挥的中心任务，也是最不容易做好的。战争的事业，除了组织和教育军队，组织和教育人民等项之外，就是使用军队于战斗，而一切都是为了战斗的胜利。组织军队等等固然困难，但使用军队则更加困难，特别是在以弱敌强的情况之中。做这件事需要极大的主观能力，需要克服战争特性中的纷乱、黑暗和不确实性，而从其中找出条理、光明和确实性来，方能实现指挥上的灵活性。

(八六) 抗日战争战场作战的基本方针，是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执行这个方针，有兵力的分散和集中、分进和合击、

攻击和防御、突击和钳制、包围和迂回、前进和后退种种的战术或方法。懂得这些战术是容易的，灵活地使用和变换这些战术，就不容易了。这里有时机、地点、部队三个关节。不得其时，不得其地，不得于部队之情况，都将不能取胜。例如进攻某一运动中之敌，打早了，暴露了自己，给了敌人以预防条件；打迟了，敌已集中驻止，变为啃硬骨头。这就是时机问题。突击点选在左翼，恰当敌之弱点，容易取胜；选在右翼，碰在敌人的钉子上，不能奏效。这就是地点问题。以我之某一部队执行某种任务，容易取胜；以另一部队执行同样任务，难于收效。这就是部队情况问题。不但使用战术，还须变换战术。攻击变为防御，防御变为攻击，前进变为后退，后退变为前进，钳制队变为突击队，突击队变为钳制队，以及包围迂回等等之互相变换，依据敌我部队、敌我地形的情况，及时地恰当地给以变换，是灵活性的指挥之重要任务。战斗指挥如此，战役和战略指挥也是如此。

（八七）古人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个“妙”，我们叫做灵活性，这是聪明的指挥员的出产品。灵活不是妄动，妄动是应该拒绝的。灵活，是聪明的指挥员，基于客观情况，“审时度势”（这个势，包括敌势、我势、地势等项）而采取及时的和恰当的处置方法的一种才能，即是所谓“运用之妙”。基于这种运用之妙，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就能较多地取得胜利，就能转变敌我优劣形势，就能实现我对于敌的主动权，就能压倒敌人而击破之，而最后胜利就属于我们了。

（八八）现在来说计划性。由于战争所特有的不确实性，实现计划性于战争，较之实现计划性于别的事业，是要困难得多的。然而，“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没有事先的计划和准备，就不能获得战争的胜利。战争没有绝对的确实性，但不是没有某种程度的相对的确实性。我之一方是比较地确实的。敌

之一方很不确实，但也有朕兆可寻，有端倪可察，有前后现象可供思索。这就构成了所谓某种程度的相对确实性，战争的计划性就有了客观基础。近代技术（有线电、无线电、飞机、汽车、铁道、轮船等）的发达，又使战争的计划性增大了可能。但由于战争只有程度颇低和时间颇暂的确实性，战争的计划性就很难完全和固定，它随战争的运动（或流动，或推移）而运动，且依战争范围的大小而有程度的不同。战术计划，例如小兵团和小部队的攻击或防御计划，常须一日数变。战役计划，即大兵团的行动计划，大体能终战役之局，但在该战役内，部分的改变是常有的，全部的改变也间或有之。战略计划，是基于战争双方总的情况而来的，有更大的固定的程度，但也只在一定的战略阶段内适用，战争向着新的阶段推移，战略计划便须改变。战术、战役和战略计划之各依其范围和情况而确定而改变，是战争指挥的重要关节，也即是战争灵活性的具体的实施，也即是实际的运用之妙。抗日战争的各级指挥员，对此应当加以注意。

（八九）有些人，基于战争的流动性，就从根本上否认战争计划或战争方针之相对的固定性，说这样的计划或方针是“机械的”东西。这种意见是错误的。如上条所述，我们完全承认：由于战争情况之只有相对的确实性和战争是迅速地向前流动的（或运动的，推移的），战争的计划或方针，也只应给以相对的固定性，必须根据情况的变化和战争的流动而适时地加以更换或修改，不这样做，我们就变成机械主义者。然而决不能否认一定时间内的相对地固定的战争计划或方针；否认了这点，就否认了一切，连战争本身，连说话的人，都否认了。由于战争的情况和行动都有其相对的固定性，因而应之而生的战争计划或方针，也就必须拿相对的固定性赋予它。例如，由于华北战争的情况和八路军分散作战的行动有其在一定阶段内

的固定性，因而在这一定阶段内赋予相对的固定性于八路军的“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种战略的作战方针，是完全必要的。战役方针，较之上述战略方针适用的时间要短促些，战术方针更加短促，然而都有其一定时间的固定性。否认了这点，战争就无从着手，成为毫无定见，这也不是、那也不是，或者这也是、那也是的战争相对主义了。没有人否认，就是在某一一定时间内适用的方针，它也是在流动的，没有这种流动，就不会有这一方针的废止和另一方针的采用。然而这种流动是有限制的，即流动于执行这一方针的各种不同的战争行动的范围中，而不是这一方针的根本性质的流动，即是说，是数的流动，不是质的流动。这种根本性质，在一定时间内是决不流动的，我们所谓一定时间内的相对的固定性，就是指的这一点。在绝对流动的整个战争长河中有其各个特定阶段上的相对的固定性——这就是我们对于战争计划或战争方针的根本性质的意见。

（九〇）在说过了战略上的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和战役战斗上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又说过了主动性、灵活性和计划性之后，我们可以总起来说几句。抗日战争应该是有计划的。战争计划即战略战术的具体运用，要带灵活性，使之能适应战争的情况。要处处照顾化劣势为优势，化被动为主动，以便改变敌我之间的形势。而一切这些，都表现于战役和战斗上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同时也就表现于战略上的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之中。

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

（九一）作为战争内容的战略内线、战略持久、战略防御中的战役和战斗上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在战争形式上就表

现为运动战。运动战，就是正规兵团在长的战线和大的战区上面，从事于战役和战斗上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的形式。同时，也把为了便利于执行这种进攻战而在某些必要时机执行着的所谓“运动性的防御”包括在内，并且也把起辅助作用的阵地攻击和阵地防御包括在内。它的特点是：正规兵团，战役和战斗的优势兵力，进攻性和流动性。

（九二）中国版图广大，兵员众多，但军队的技术和教养不足；敌人则兵力不足，但技术和教养比较优良。在此种情形下，无疑地应以进攻的运动战为主要的作战形式，而以其他形式辅助之，组成整个的运动战。在这里，要反对所谓“有退无进”的逃跑主义，同时也要反对所谓“有进无退”的拼命主义。

（九三）运动战的特点之一，是其流动性，不但许可而且要求野战军的大踏步的前进和后退。然而，这和韩复榘式的逃跑主义是没有相同之点的。战争的基本要求是：消灭敌人；其另一要求是：保存自己。保存自己的目的，在于消灭敌人；而消灭敌人，又是保存自己的最有效的手段。因此，运动战决不能被韩复榘一类人所借口，决不是只有向后的运动，没有向前的运动；这样的“运动”，否定了运动战的基本的进攻性，实行的结果，中国虽大，也是要被“运动”掉的。

（九四）然而另一种思想也是不对的，即所谓有进无退的拼命主义。我们主张以战役和战斗上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为内容的运动战，其中包括了辅助作用的阵地战，又包括了“运动性的防御”和退却，没有这些，运动战便不能充分地执行。拼命主义是军事上的近视眼，其根源常是惧怕丧失土地。拼命主义者不知道运动战的特点之一是其流动性，不但许可而且要求野战军的大踏步的进退。积极方面，为了陷敌于不利而利于我之作战，常常要求敌人在运动中，并要求有利于我之许多条

件，例如有利的地形、好打的敌情、能封锁消息的居民、敌人的疲劳和不意等。这就要求敌人的前进，虽暂时地丧失部分土地而不惜。因为暂时地部分地丧失土地，是全部地永久地保存土地和恢复土地的代价。消极方面，凡被迫处于不利地位，根本上危及军力的保存时，应该勇敢地退却，以便保存军力，在新的时机中再行打击敌人。拼命主义者不知此理，明明已处于确定了的不利情况，还要争一城一地的得失，结果不但城和地俱失，军力也不能保存。我们历来主张“诱敌深入”，就是因为这是战略防御中弱军对强军作战的最有效的军事政策。

（九五）抗日战争的作战形式中，主要的是运动战，其次就要算游击战了。我们说，整个战争中，运动战是主要的，游击战是辅助的，说的是解决战争的命运，主要是依靠正规战，尤其是其中的运动战，游击战不能担负这种解决战争命运的主要的责任。但这不是说：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不重要。游击战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仅仅次于运动战，因为没有游击战的辅助，也就不能战胜敌人。这样说，是包括了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这一个战略任务在内的。长期的残酷的战争中间，游击战不停止于原来地位，它将把自己提高到运动战。这样，游击战的战略作用就有两方面：一是辅助正规战，一是把自己也变为正规战。至于就游击战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空前广大和空前持久的意义说来，它的战略地位是更加不能轻视的了。因此，在中国，游击战的本身，不只有战术问题，还有它的特殊的战略问题。这个问题，我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里面已经说到了。前面说过，抗日战争三个战略阶段的作战形式，第一阶段，运动战是主要的，游击战和阵地战是辅助的。第二阶段，则游击战将升到主要地位，而以运动战和阵地战辅助之。第三阶段，运动战再升为主要形式，而辅之以阵地战和游击战。但这个第三阶段的运动战，已不全是由

原来的正规军负担，而将由原来的游击军从游击战提高到运动战去担负其一部分，也许是相当重要的一部分。从三个阶段来看，中国抗日战争中的游击战，决不是可有可无的。它将在人类战争史上演出空前伟大的一幕。为此缘故，在全国的数百万正规军中间，至少指定数十万人，分散于所有一切敌占地区，发动和配合民众武装，从事游击战争，是完全必要的。被指定的军队，要自觉地负担这种神圣任务，不要以为少打大仗，一时显得不像民族英雄，降低了资格，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游击战争没有正规战争那样迅速的成效和显赫的名声，但是“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在长期和残酷的战争中，游击战争将表现其很大的威力，实在是非同小可的事业。并且正规军分散作游击战，集合起来又可作运动战，八路军就是这样做的。八路军的方针是：“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个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反对这个方针的人们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九六）防御的和攻击的阵地战，在中国今天的技术条件下，一般都不能执行，这也就是我们表现弱的地方。再则敌人又利用中国土地广大一点，回避我们的阵地设施。因此阵地战就不能用为重要手段，更不待说用为主要手段。然而在战争的第一第二两阶段中；包括于运动战范围，而在战役作战上起其辅助作用的局部的阵地战，是可能的和必要的。为着节节抵抗以求消耗敌人和争取余裕时间之目的，而采取半阵地性的所谓“运动性的防御”，更是属于运动战的必要部分。中国须努力增加新式武器，以便在战略反攻阶段中能够充分地执行阵地攻击的任务。战略反攻阶段，无疑地将提高阵地战的地位，因为那时敌人将坚守阵地，没有我之有力的阵地攻击以配合运动战，将不能达到收复失地之目的。虽然如此，第三阶段中，我们仍须力争以运动战为战争的主要形式。因为战争的领导艺术和人

的活跃性，临到像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中期以后西欧地区那样的阵地战，就死了一大半。然而在广大版图的中国境内作战，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方面又还保存着技术贫弱这种情况，“把战争从壕沟里解放”的事，就自然出现。就在第三阶段，中国技术条件虽已增进，但仍不见得能够超过敌人，这样也就被逼着非努力讲求高度的运动战，不能达到最后胜利之目的。这样，整个抗日战争中，中国将不会以阵地战为主要形式，主要和重要的形式是运动战和游击战。在这些战争形式中，战争的领导艺术和人的活跃性能够得到充分地发挥的机会，这又是我们不幸中的幸事啊！

消耗战，歼灭战

（九七）前头说过，战争本质即战争目的，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然而达此目的战争形式，有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三种，实现时的效果就有程度的不同，因而一般地有所谓消耗战和歼灭战之别。

（九八）我们首先可以说，抗日战争是消耗战，同时又是歼灭战。为什么？敌之强的因素尚在发挥，战略上的优势和主动依然存在，没有战役和战斗的歼灭战，就不能有效地迅速地减杀其强的因素，破坏其优势和主动。我之弱的因素也依然存在，战略上的劣势和被动还未脱离，为了争取时间，加强国内国际条件，改变自己的不利状态，没有战役和战斗的歼灭战，也不能成功。因此，战役的歼灭战是达到战略的消耗战之目的的手段。在这点上说，歼灭战就是消耗战。中国之能够进行持久战，用歼灭达到消耗是主要的手段。

（九九）但达到战略消耗目的的，还有战役的消耗战。大抵运动战是执行歼灭任务的，阵地战是执行消耗任务的，游击

战是执行消耗任务同时又执行歼灭任务的，三者互有区别。在这点上说，歼灭战不同于消耗战。战役的消耗战，是辅助的，但也是持久作战所需要的。

(一〇〇) 从理论上和需要上说来，中国在防御阶段中，应该利用运动战之主要的歼灭性，游击战之部分的歼灭性，加上辅助性质的阵地战之主要的消耗性和游击战之部分的消耗性，用以达到大量消耗敌人的战略目的。在相持阶段中，继续利用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歼灭性和消耗性，再行大量地消耗敌人。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使战局持久，逐渐地转变敌我形势，准备反攻的条件。战略反攻时，继续用歼灭达到消耗，以便最后地驱逐敌人。

(一〇一) 但是在事实上，十个月的经验是，许多甚至多数的运动战战役，打成了消耗战；游击战之应有的歼灭作用，在某些地区，也还未提到应有的程度。这种情况的好处是，无论如何我们总算消耗了敌人，对于持久作战和最后胜利有其意义，我们的血不是白流的。然而缺点是：一则消耗敌人的不足；二则我们自己不免消耗的较多，缴获的较少。虽然应该承认这种情况的客观原因，即敌我技术和兵员教养程度的不同，然而在理论上和实际上，无论如何也应该提倡主力军在一切有利场合努力地执行歼灭战。游击队虽然为了执行许多具体任务，例如破坏和扰乱等，不能不进行单纯的消耗战，然而仍须提倡并努力实行在战役和战斗之一切有利场合的歼灭性的作战，以达既能大量消耗敌人又能大量补充自己之目的。

(一〇二) 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之所谓外线，所谓速决，所谓进攻，与乎运动战之所谓运动，在战斗形式上，主要地就是采用包围和迂回战术，因而便须集中优势兵力。所以，集中兵力，采用包围迂回战术，是实施运动战即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之必要条件。然而一切这些，都是为着歼灭敌人之目的。

（一〇三）日本军队的长处，不但在其武器，还在其官兵的教养——其组织性，其因过去没有打过败仗而形成的自信心，其对天皇和对鬼神的迷信，其骄傲自尊，其对中国人的轻视等等特点；这是日本军阀多年的武断教育和日本的民族习惯造成的。我军对之杀伤甚多、俘虏甚少的现象，主要原因在此。这一点，过去许多人是估计不足的。这种东西的破坏，需要一个长的过程。首先需要我们重视这一特点，然后耐心地有计划地从政治上、国际宣传上、日本人民运动上多方面地向着这一点进行工作；而军事上的歼灭战，也是方法之一。在这里，悲观主义者可以据之引向亡国论，消极的军事家又可以据之反对歼灭战。我们则相反，我们认为日本军队的这种长处是可以破坏的，并且已在开始破坏中。破坏的方法，主要的是政治上的争取。对于日本士兵，不是侮辱其自尊心，而是了解和顺导他们的这种自尊心，从宽待俘虏的方法，引导他们了解日本统治者之反人民的侵略主义。另一方面，则是在他们面前表示中国军队和中国人民不可屈服的精神和英勇顽强的战斗力，这就是给以歼灭战的打击。在作战上讲，十个月的经验证明歼灭是可能的，平型关、台儿庄等战役就是明证。日本军心已在开始动摇，士兵不了解战争目的，陷于中国军队和中国人民的包围中，冲锋的勇气远弱于中国兵等等，都是有利于我之进行歼灭战的客观的条件，这些条件并将随着战争之持久而日益发展起来。在以歼灭战破坏敌军的气焰这一点上讲，歼灭又是缩短战争过程提早解放日本士兵和日本人民的条件之一。世界上只有猫和猫做朋友的事，没有猫和老鼠做朋友的事。

（一〇四）另一方面，应该承认在技术和兵员教养的程度上，现时我们不及敌人。因而最高限度的歼灭，例如全部或大部俘获的事，在许多场合特别是在平原地带的战斗中，是困难的。速胜论者在这点上面的过分要求，也属不对。抗日战争的

正确要求应该是：尽可能的歼灭战。在一切有利的场合，每战集中优势兵力，采用包围迂回战术——不能包围其全部也包围其一部，不能俘获所包围之全部也俘获所包围之一部，不能俘获所包围之一部也大量杀伤所包围之一部。而在一切不利于执行歼灭战的场合，则执行消耗战。对于前者，用集中兵力的原则；对于后者，用分散兵力的原则。在战役的指挥关系上，对于前者，用集中指挥的原则；对于后者，用分散指挥的原则。这些，就是抗日战争战场作战的基本方针。

乘敌之隙的可能性

（一〇五）关于敌之可胜，就是在敌人的指挥方面也有其基础。自古无不犯错误的将军，敌人之有岔子可寻，正如我们自己也难免出岔子，乘敌之隙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从战略和战役上说来，敌人在十个月侵略战争中，已经犯了许多错误。计其大者有五。一是逐渐增加兵力。这是由于敌人对中国估计不足而来的，也有他自己兵力不足的原因。敌人一向看不起我们，东四省得了便宜之后，加之以冀东、察北的占领，这些都算作敌人的战略侦察。他们得来的结论是：一盘散沙。据此以为中国不值一打，而定出所谓“速决”的计划，少少出点兵力，企图吓溃我们。十个月来，中国这样大的团结和这样大的抵抗力，他们是没有料到的，他们把中国已处于进步时代，中国已存在着先进的党派、先进的军队和先进的人民这一点忘掉了。及至不行，就逐渐增兵，由十几个师团一次又一次地增至三十个。再要前进，非再增不可。但由于同苏联对立，又由于人财先天不足，所以日本的最大的出兵数和最后的进攻点都不得受一定的限制。二是没有主攻方向。台儿庄战役以前，敌在华中、华北大体上是平分兵力的，两方内部又各自平分。例

如华北，在津浦、平汉、同蒲三路平分兵力，每路伤亡了一些，占领地驻守了一些，再前进就没有兵了。台儿庄败仗后，总结了教训，把主力集中徐州方向，这个错误算是暂时地改了一下。三是没有战略协同。敌之华中、华北两集团中，每一集团内部是大体协同的，但两集团间则很不协同。津浦南段打小蚌埠时，北段不动；北段打台儿庄时，南段不动。两处都触了霉头之后，于是陆军大臣来巡视了，参谋总长来指挥了，算是暂时地协调了一下。日本地主资产阶级和军阀内部存在着颇为严重的矛盾，这种矛盾正在向前发展着，战争的不协同是其具体表现之一。四是失去战略时机。这点显著地表现在南京、太原两地占领后的停顿，主要的是因为兵力不足，没有战略追击队。五是包围多歼灭少。台儿庄战役以前，上海、南京、沧州、保定、南口、忻口、临汾诸役，击破者多，俘获者少，表现其指挥的笨拙。这五个——逐渐增加兵力，没有主攻方向，没有战略协同，失去时机，包围多歼灭少，是台儿庄战役以前日本指挥的不行之点。台儿庄战役以后，虽已改了一些，然根据其兵力不足和内部矛盾诸因素，求不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且得之于此者，又失之于彼。例如，将华北兵力集中于徐州，华北占领地就出了大空隙，给予游击战争以放手发展的机会。以上是敌人自己弄错，不是我们使之错的。我们方面，尚可有意地制造敌之错误，即用自己聪明而有效的动作，在有组织的民众掩护之下，造成敌人错觉，调动敌人就我范围，例如声东击西之类，这件事的可能性前面已经说过了。所有这些，都说明：我之战争胜利又可在敌之指挥上面找到某种根源。虽然我们不应把这点作为我之战略计划的重要基础，相反，我之计划宁可放在敌人少犯错误的假定上，才是可靠的做法。而且我乘敌隙，敌也可以乘我之隙，少授敌以可寻之隙，又是我们指挥方面的任务。然而敌之指挥错误，是事实上已经存在过，并且

还要发生的，又可因我之努力制造出来的，都足供我之利用，抗日将军们应该极力地捉住它。敌人的战略战役指挥许多不行，但其战斗指挥，即部队战术和小兵团战术，却颇有高明之处，这一点我们应该向他学习。

抗日战争中的决战问题

(一〇六) 抗日战争中的决战问题应分为三类：一切有把握的战役和战斗应坚决地进行决战，一切无把握的战役和战斗应避免决战，赌国家命运的战略决战应根本避免。抗日战争不同于其他许多战争的特点，又表现在这个决战问题上。在第一第二阶段，敌强我弱，敌之要求在于我集中主力与之决战。我之要求则相反，在选择有利条件，集中优势兵力，与之作有把握的战役和战斗上的决战，例如平型关、台儿庄以及许多的其他战斗；而避免在不利条件下的无把握的决战，例如彰德等地战役所采的方针。拼国家命运的战略的决战则根本不干，例如最近之徐州撤退。这样就破坏了敌之“速决”计划，不得不跟了我们干持久战。这种方针，在领土狭小的国家是做不到的，在政治太落后了的国家也难做到。我们是大国，又处进步时代，这点是可以做到的。如果避免了战略的决战，“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虽然丧失若干土地，还有广大的回旋余地，可以促进并等候国内的进步、国际的增援和敌人的内溃，这是抗日战争的上策。急性病的速胜论者熬不过持久战的艰难路程，企图速胜，一到形势稍为好转，就吹起了战略决战的声浪，如果照了干去，整个的抗战要吃大亏，持久战为之葬送，恰恰中了敌人的毒计，实在是下策。不决战就须放弃土地，这是没有疑问的，在无可避免的情况下（也仅仅是在这种情况下），只好勇敢地放弃。情况到了这种时候，丝毫也不应留恋，

这是以土地换时间的正确的政策。历史上，俄国以避免决战，执行了勇敢的退却，战胜了威震一时的拿破仑。中国现在也应这样干。

（一〇七）不怕人家骂“不抵抗”吗？不怕的。根本不战，与敌妥协，这是不抵抗主义，不但应该骂，而且完全不许可的。坚决抗战，但为避开敌人毒计，不使我军主力丧于敌人一击之下，影响到抗战的继续，一句话，避免亡国，是完全必需的。在这上面发生怀疑，是战争问题上的近视眼，结果一定和亡国论者走到一伙去。我们曾经批评了所谓“有进无退”的拼命主义，就是因为这种拼命主义如果成为一般的风气，其结果就有使抗战不能继续，最后引向亡国的危险。

（一〇八）我们主张一切有利条件下的决战，不论是战斗的和大小战役的，在这上面不容许任何的消极。给敌以歼灭和给敌以消耗，只有这种决战才能达到目的，每个抗日军人均须坚决地去做。为此目的，部分的相当大量的牺牲是必要的，避免任何牺牲的观点是懦夫和恐日病患者的观点，必须给以坚决的反对。李服膺、韩复榘等逃跑主义者的被杀，是杀得对的。在战争中提倡勇敢牺牲英勇向前的精神和动作，是在正确的作战计划下绝对必要的东西，是同持久战和最后胜利不能分离的。我们曾经严厉地指斥了所谓“有退无进”的逃跑主义，拥护严格纪律的执行，就是因为只有这种在正确计划下的英勇决战，才能战胜强敌；而逃跑主义，则是亡国论的直接支持者。

（一〇九）英勇战斗于前，又放弃土地于后，不是自相矛盾吗？这些英勇战斗者的血，不是白流了吗？这是非常不妥当的发问。吃饭于前，又拉屎于后，不是白吃了吗？睡觉于前，又起床于后，不是白睡了吗？可不可以这样提出问题呢？我想是不可以的。吃饭就一直吃下去，睡觉就一直睡下去，英勇战斗就一直打到鸭绿江，这是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幻想，在实

际生活里是不存在的。谁人不知，为争取时间和准备反攻而流血战斗，某些土地虽仍不免于放弃，时间却争取了，给敌以歼灭和给敌以消耗的目的却达到了，自己的战斗经验却取得了，没有起来的人民却起来了，国际地位却增长了。这种血是白流的吗？一点也不是白流的。放弃土地是为了保存军力，也正是为了保存土地；因为如不在不利条件下放弃部分的土地，盲目地举行绝无把握的决战，结果丧失军力之后，必随之以丧失全部的土地，更说不到什么恢复失地了。资本家做生意要有本钱，全部破产之后，就不算什么资本家。赌汉也要赌本，孤注一掷，不幸不中，就无从再赌。事物是往返曲折的，不是径情直遂的，战争也是一样，只有形式主义者想不通这个道理。

（一一〇）我想，即在战略反攻阶段的决战亦然。那时虽然敌处劣势，我处优势，然而仍适用“执行有利决战，避免不利决战”的原则，直至打到鸭绿江边，都是如此。这样，我可始终立于主动，一切敌人的“挑战书”，旁人的“激将法”，都应束之高阁，置之不理，丝毫也不为其所动。抗日将军们要有这样的坚定性，才算是勇敢而明智的将军。那些“一触即跳”的人们，是不足以语此的。第一阶段我处于某种程度的战略被动，然在一切战役上也应是主动的，尔后任何阶段都应是主动。我们是持久论和最后胜利论者，不是赌汉们那样的孤注一掷论者。

兵民是胜利之本

（一一一）日本帝国主义处在革命的中国面前，是决不放松其进攻和镇压的，它的帝国主义本质规定了这一点。中国不抵抗，日本就不费一弹安然占领中国，东四省的丧失，就是前例。中国若抵抗，日本就向着这种抵抗力压迫，直至它的压力

无法超过中国的抵抗力才停止，这是必然的规律。日本地主资产阶级的野心是很大的，为了南攻南洋群岛，北攻西伯利亚起见，采取中间突破的方针，先打中国。那些认为日本将在占领华北、江浙一带以后适可而止的人，完全没有看到发展到了新阶段迫近了死亡界线的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和历史上的日本不相同了。我们说，日本的出兵数和进攻点有一定的限制，是说：在日本一方面，在其力量基础上，为了还要举行别方面的进攻并防御另一方面的敌人，只能拿出一定程度的力量打中国打到它力所能及的限度为止；在中国一方面，又表现了自己的进步和顽强的抵抗力，不能设想只有日本猛攻，中国没有必要的抵抗力。日本不能占领全中国，然而在它一切力所能及的地区，它将不遗余力地镇压中国的反抗，直至日本的内外条件使日本帝国主义发生了进入坟墓的直接危机之前，它是不会停止这种镇压的。日本国内的政治只有两个出路：或者整个当权阶级迅速崩溃，政权交给人民，战争因而结束，但暂时无此可能；或者地主资产阶级日益法西斯化，把战争支持到自己崩溃的一天，日本走的正是这条路。除此没有第三条路。那些希望日本资产阶级中和派出来停止战争的，仅仅是一种幻想而已。日本的资产阶级中和派，已经作了地主和金融寡头的俘虏，这是多年来日本政治的实际。日本打了中国之后，如果中国的抗战还没有给日本以致命的打击，日本还有足够力量的话，它一定还要打南洋或西伯利亚，甚或两处都打。欧洲战争一起来，它就会干这一手；日本统治者的如意算盘是打得非常之大的。当然存在这种可能：由于苏联的强大，由于日本在中国战争中的大大削弱，它不得不停止进攻西伯利亚的原来计划，而对之采取根本的守势。然而在出现了这种情形之时，不是日本进攻中国的放松，反而是它进攻中国的加紧，因为那时它只剩下了向弱者吞剥的一条路。那时中国的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和

坚持持久战的任务，就更加显得严重，更加不能丝毫懈气。

（一一二）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制胜日本的主要条件，是全国的团结和各方面较之过去有十百倍的进步。中国已处于进步的时代，并已有了伟大的团结，但是目前的程度还非常之不够。日本占地如此之广，一方面由于日本之强，一方面则由于中国之弱；而这种弱，完全是百年来尤其是近十年来各种历史错误积累下来的结果，使得中国的进步因素限制在今天的状态。现在要战胜这样一个强敌，非有长期的广大的努力是不可能的。应该努力的事情很多，我这里只说最根本的两方面：军队和人民的进步。

（一一三）革新军制离不了现代化，把技术条件增强起来，没有这一点，是不能把敌人赶过鸭绿江的。军队的使用需要进步的灵活的战略战术，没有这一点，也是不能胜利的。然而军队的基础在士兵，没有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没有进步的政治工作去执行这种贯注，就不能达到真正的官长和士兵的一致，就不能激发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战热忱，一切技术和战术就不能得着最好的基础去发挥它们应有的效力。我们说日本技术条件虽优，但它终必失败，除了我们给以歼灭和消耗的打击外，就是它的军心终必随着我们的打击而动摇，武器和兵员结合不稳。我们相反，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是官兵一致的。在这上面，就有了一切抗日军队的政治工作的基础。军队应实行一定限度的民主化，主要地是废除封建主义的打骂制度和官兵生活同甘苦。这样一来，官兵一致的目的就达到了，军队就增加了绝大的战斗力，长期的残酷的战争就不患不能支持。

（一一四）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

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我们方面，军队须有源源不绝的补充，现在下面胡干的“捉兵法”、“买兵法”^{〔8〕}，亟须禁止，改为广泛的热烈的政治动员，这样，要几百万人当兵都是容易的。抗日的财源十分困难，动员了民众，则财政也不成问题，岂有如此广土众民的国家而患财穷之理？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个把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够打的。

（一一五）很多人对于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弄不好，以为是方法不对，我总告诉他们是根本态度（或根本宗旨）问题，这态度就是尊重士兵和尊重人民。从这态度出发，于是有各种的政策、方法、方式。离了这态度，政策、方法、方式也一定是错的，官兵之间、军民之间的关系便决然弄不好。军队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第一是官兵一致，第二是军民一致，第三是瓦解敌军。这些原则要实行有效，都须从尊重士兵、尊重人民和尊重已经放下武器的敌军俘虏的人格这种根本态度出发。那些认为不是根本态度问题而是技术问题的人，实在是想错了，应该加以改正才对。

（一一六）当此保卫武汉等地成为紧急任务之时，发动全军全民的全部积极性来支持战争，是十分严重的任务。保卫武汉等地的任务，毫无疑义必须认真地提出和执行。然而究竟能否确定地保卫不失，不决定于主观的愿望，而决定于具体的条件。政治上动员全军全民起来奋斗，是最重要的具体的条件之一。不努力于争取一切必要的条件，甚至必要条件有一不备，势必重蹈南京等地失陷之覆辙。中国的马德里在什么地方，看什么地方具备马德里的条件。过去是没有过一个马德里的，今后应该争取几个，然而全看条件如何。条件中的最基本条件，是全军全民的广大的政治动员。

（一一七）在一切工作中，应该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

总方针。因为只有这种方针才能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才能普遍地深入地改善官兵关系、军民关系，才能发动全军全民的全部积极性，为保卫一切未失地区、恢复一切已失地区而战，才能争取最后胜利。

（一一八）这个政治上动员军民的问题，实在太重要了。我们之所以不惜反反复复地说到这一点，实在是没有这一点就没有胜利。没有许多别的必要的东西固然也没有胜利，然而这是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全军全民的统一战线，决不仅仅是几个党派的党部和党员们的统一战线；动员全军全民参加统一战线，才是发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根本目的。

结 论

（一一九）结论是什么呢？结论就是：“在什么条件下，中国能战胜并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呢？要有三个条件：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就中国人民的立场来说，三个条件中，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这个战争要延长多久呢？要看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实力和中日两国其他许多决定的因素如何而定。”“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很快实现，战争就要延长。但结果还是一样，日本必败，中国必胜。只是牺牲会大，要经过一个很痛苦的时期。”“我们的战略方针，应该是使用我们的主力在很长的变动不定的战线上作战。中国军队要胜利，必须在广阔的战场上进行高度的运动战。”“除了调动有训练的军队进行运动战之外，还要在农民中组织很多的游击队。”“在战争的过程中……使中国军队的装备逐渐加强起来。因此，中国能够在战争的后期从事阵

地战，对于日本的占领地进行阵地的攻击。这样，日本在中国抗战的长期消耗下，它的经济行将崩溃；在无数战争的消磨中，它的士气行将颓靡。中国方面，则抗战的潜伏力一天一天地奔腾高涨，大批的革命民众不断地倾注到前线去，为自由而战争。所有这些因素和其他的因素配合起来，就使我们能够对日本占领地的堡垒和根据地，作最后的致命的攻击，驱逐日本侵略军出中国。”（一九三六年七月与斯诺谈话）“中国的政治形势从此开始了一个新阶段，……这一阶段的最中心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的胜利。”“由于当前的抗战还存在着严重的弱点，所以在今后的抗战过程中，可能发生许多挫败、退却，内部的分化、叛变，暂时和局部的妥协等不利的情况。因此，应该看到这一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但我们相信，已经发动的抗战，必将因为我党和全国人民的努力，冲破一切障碍物而继续地前进和发展。”（一九三七年八月《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这些就是结论。亡国论者看敌人如神物，看自己如草芥，速胜论者看敌人如草芥，看自己如神物，这些都是错误的。我们的意见相反：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一二〇）我的讲演至此为止。伟大的抗日战争正在开展，很多人希望总结经验，以便争取全部的胜利。我所说的，只是十个月经验中的一般的东西，也算一个总结吧。这个问题值得引起广大的注意和讨论，我所说的只是一个概论，希望诸位研究讨论，给以指正和补充。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刊印。

注 释

〔1〕这种亡国论是国民党内部分领导人的意见。他们是不愿意抗日的，后来抗日是被迫的。卢沟桥事变以后，蒋介石一派参加抗日了，汪精卫一派就代表了亡国论，并准备投降日本，后来果然投降了。但是亡国论思想不但是在国民党内存在着，在某些中层社会中甚至在一部分落后的劳动人民中也曾经发生影响。这是因为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在抗日战争中节节失败，而日军则长驱直进，在战争的第一年中就侵占了华北和华中的大片土地，因而在一部分落后的人民中产生了严重的悲观情绪。

〔2〕以上这些意见，都是共产党内的。在抗日战争的头半年内，党内存在着一种轻敌的倾向，认为日本不值一打。其根据并不是因为他们感觉自己的力量很大，他们知道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民众的有组织的力量在当时还是很小的；而是因为国民党抗日了，他们感觉国民党有很大的力量，可以有效地打击日本。他们只看见国民党暂时抗日的一面，忘记了国民党反动和腐败的一面，因而造成了错误的估计。

〔3〕这是蒋介石等人的意见。蒋介石国民党既已被迫抗战，他们就一心希望外国的迅速援助，不相信自己的力量，更不相信人民的力量。

〔4〕这是当时《大公报》在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五日和二十六日社评中提出的意见。他们从一种侥幸心理出发，希望用几个台儿庄一类的胜仗就能打败日本，免得在持久战中动员人民力量，危及自己阶级的安全。当时国民党统治集团内普遍有这种侥幸心理。

〔5〕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日本近卫内阁发表声明，宣布以武力灭亡中国的方针；同时宣称由于国民党政府仍在“策划抗战”，日本政府决定在中国扶植新的傀儡政权，“今后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

〔6〕这里主要是指美国。自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〇年，美国每年输入日本的物资占日本全部进口额的三分之一以上，其中战争物资占一半以上。

〔7〕指英、美、法等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

〔8〕国民党政府扩军的一种办法，是派军警四处捉拿人民去当兵，捉来的兵用绳捆索绑，形同囚犯。略为有钱的人，就向国民党政府的官吏行贿，出钱买人代替。

论华北正规战的基本教训 与游击战争的发展条件

(一九三八年五月)

林 彪

华北抗战，自卢沟桥开始的正规战，到临汾失陷后，即一般的宣告了结束，而转入了以游击战争为主的（正规战则极少）新的时期。

在正规战的时期中，正规战上的教训，当然很多，如作战地点与兵力部署的不适当，各地正规战相互配合的不够，游击战与正规战配合的不够，民众运动与正规战配合的不够……等等。但正规战的根本教训是什么呢？我想，这根本教训并不是别的，而是“消极防御”。这个根本教训表现于我军除开极少的且为局部的几个战役是采取了以进攻对待敌人进攻，或在防御中实行进攻外，一般地是采取了设阵待敌的消极防御，即是当敌人正式攻击我军阵地的时候，我军并没有实行大举“逆袭”、“反突击”的攻势，而是一般的采取了单纯的以自己不充分的火力、不坚强的工事，抗击敌人猛烈的飞机大炮的消极动作，并且还不是在狭的正面上、短的纵深上进行这种办法的防御，而是在近百里甚至数百里宽大正面上及纵深内进行这种防御，兵力是很散很散的分散在正面和纵深上的。这样地分散兵力去想守住所有的地方的办法，结果使每个地方兵力都不足，处处都易被敌人各个击破，结果使每个地方都不能守得住。华

北的正规战一般的就是这样进行的（除了数个胜仗外），就是采取了这样消极防御的战术。很明显的，华北所有挫败的或胜利的战役都证明了这种消极防御的战术，决不是中国抗战的出路。为着郑重说明这一问题，特列述于下：

一、在地理条件上中国是一个三千四五百万平方里的大国家。面积广大，本来是中国最重要长处之一，是战胜日寇的有利条件之一，但这个长处还要我们善于利用它，如果不善于利用，则我们的长处反变成我们的弱点，反变成了有利于敌人的条件。在我国这样面积广大的地理条件之下，我们采取消极防御的战术，这实在是无从防起的。我们如对于一般地点不守，而仅集中兵力守要点，敌人即可从我们不守之处长驱直入。如果我们分兵处处去守，则兵力又不够。虽然我国兵多人多，也仍然不足以去处处守的。即令把四万万五千万男女老少个个统做到“执干戈以卫社稷”，但中国恐怕有四十万万四百万万四……万万个山，四……万万条路，即令每个人守一个山或路或一块平地也是守不完的啊！何况敌人攻击时总是拿几千几万现代化的军队攻我一山或一路或一地哩！我们如果采取消极防御战术，那有什么可能守得住呢？因此在这样的地理条件下，我们采取宽而且深的设阵以待的消极防御，是无论如何都是不行的。这样，我们地大的长处便恰恰变成了我们的弱点，变成了有利于敌进攻的条件。反之，在这样的地理条件下，我们若采取一切进退行动都为着进攻敌人的进攻战术，则我们便有了可进可退广大的作战回旋地区，可以自由选择攻击目标、攻击地点、攻击时机，可以自主地作战，可以专作有利之战，不致变为被动的被逼的作战，不致成为无把握的作战。

二、现代的防御战，是依靠有坚固的现代化的防御工事的。中国过去因民族的不团结和国家的贫困，还没有能够建立起起码的现代化的国防工事。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在战术上

采取防御的办法便是不利的，便是没有胜利的条件。若现在才赶做现代式的国防工事，这在时间上财力上又都是来不及的（这不是说现在不应当在一切敌人尚未到而将来必会攻的要点上赶筑工事）。至于中国各地过去的老城寨和天险（如某某关某某山），在今日新式武器发达的情形之下，战争立体化的情形下，它已大大减少了原有的作用，甚至有的完全失掉了作用。它已不能成为防御战的依靠了。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采取防御战术，便是刚刚暴露了自己的弱点。

三、通常的防御战须要有强大的火战力量，要能在阵前阵内组织浓密不透的火网，借火力大量扑灭敌人的进攻力量。但事实上我军的火战力量比敌人小，敌人的火战力量比我们大。可是，我们白刃战的力量却比敌人大，敌人白刃战的力量则比我们小。在这样的情形下，如我们采取防御的战术，则又会恰恰暴露了自己的弱点，恰恰便于敌人优势火力的长处的发挥。敌人可以仅借铁弹（炮弹、炸弹）即可以消耗我军的肉弹，而其步兵等到我们的地形变了原形，地物变成了废物，兵员壮烈牺牲之后，才从容前进。但是，如我们采取进攻的作战，向敌进行进攻的冲锋肉搏，则我之步兵战斗力与白刃战的战斗长处便能充分发挥，敌之重兵器笨重的弱点与缺乏白刃战的力量弱点，便会立即暴露。

四、要争取战斗胜利，就要争取战斗行动上的主动，若陷于被动，则必处处追随于敌人，落后于敌人，听命于敌人，被制于敌人，种种困难便会层出不穷的产生的。消极防御就完全是被动性质的。进攻的敌人则是完全处于主动地位的，他可以自由选定其攻击目标、攻击时间、攻击地点、攻击方法及进行充分的准备。敌人可以集中绝对优于我的兵力，在出我不意的时间与地点，用我所不料的方法向我进攻，这样我军就当然会吃大亏的。可是，如果我们采取进攻的战术，则我可以自由选

定进攻敌人的目标、时间、地点、方法……等等。那时敌人就会陷于被动地位上的一切困难的深坑中。

五、我国军队素质极不一致，编制、装备、训练、战斗经验彼此各不相同，各部战斗力悬殊甚大。敌人对我们这个弱点，甚于比我们自己知道的还要深刻，因此，他们极力去抓住我们这个弱点去利用，他向我军进攻时，总是专门在我们的防线上找出我们战斗力薄弱的部队做他进攻的目标，首先击破我战斗力薄弱的部队，从我们的软弱处侵入，以突破我军的整个防线。我弱的部队被敌击溃后，我军整个阵线即行破碎。这样就立刻影响到我战斗力强的部队，亦随之而乱。这样，就使我能打的部队，亦变成了不能打的部队。强兵变成弱兵，弱兵变成了溃兵。则我们战斗力不齐，而采取防御战术，就必然遭到这样的坏结果。但我们若采取进攻的作战与秘密迅速的行动，突然向敌猛攻，敌人在仓皇应战中，便无法知道我军各部的强弱，就不能施展其一贯的首先击破我军弱的部队的诡计了。我军则能以汹涌澎湃之势，合力歼灭敌人。我强的部队固然能无限制的发挥其坚强的战斗力，我弱的部队在强的部队的配合与影响之下，也就能够打得了。

六、包围迂回为敌作战之惯技。如我军的阵地愈险要、愈坚固、愈力量大，敌人便愈爱采取包围迂回，以此法迫我于阵地以外与之决战，以歼灭我军，或压迫我军自动放弃阵地。我军如采取消极防御的作战，则最便利于敌人遂行其包围迂回的作战惯技。他有充分的时间以及从容进行包围迂回，他可以调足充分兵力，来进行包围迂回。我军因缺乏现代式的国防要塞，无周围式的坚固防御阵地，如一受包围迂回，便立即陷于严重的困难中，后路被威胁或被敌截断，军心更易发生惊慌动摇。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敌人往往可不经剧烈的战斗即能迫我军自动放弃阵地的。但我军如采取进攻的作战，迫敌于应战地

位，则敌之包围迂回惯技，即不能或不易实施了，而且我反可以包围迂回敌人，使敌人陷于严重的危险之中。

七、我军此次的抗战，是革命性的、正义性的、求生存自卫性的战争，所以我军的士气是很忠勇奋发的，敌人的战争性质则刚与我们相反，因此他们的士气也刚与我们相反。但我军如采取消极防御的战术，则我军虽有忠勇奋发的攻击精神，亦无由发挥，恐慌消沉的情绪反随之而至。敌人士兵的战斗情绪，虽不旺盛，但他却可用进攻的作战，加以提高，以弥补他的这一严重的弱点。可见，在士气的问题上，我们采取防御则不利，如采取进攻则能将我军的义勇精神充分地发挥出来。

八、对敌情的明了与否，是作战决心和处置是否正确的先决条件，也是胜败的基本条件。敌人在我国境内进行与我全民族为敌的侵略战争，我全国同胞都是一致反对他的。在此情形下，一般地我军对敌军的情况就比较明了的多，而对自己的企图与目标则比较地容易隐蔽得多。敌军所处的情形，则恰恰与我相反。可是如果我们采取设阵待敌的防御战术，则敌人可以用较充分的时间、用多样的办法对我军进行一而再的情况侦察，直至情况全明之后，他才开始动作，并以疾风迅雷的行动，突临我军阵地猛攻。此时我军虽处本国境内作战，虽有人民的拥护，因敌人来得迅速也会使我们来不及查明敌情，我们对敌情况既陷于不明，处置也就陷于错误，其结果必然遭受到意外的损失。所以在知己知彼的问题上，如我们采取防御，那就有利于敌人，不利于自己，若采取进攻，那情形就当然会相反的。

九、如果以为自己的目的仅在守住某地，因而觉得应当采取防御的战术，其实这种想法是错误的。防守的方法不能达到防守的目的，最后（时间耳）必会失去阵地而后退的。只有采取积极的进攻作战，以攻为守才是达到保守目的的最好方法。

这种方法不仅能达到守住未失的土地的目的，而且因为它是向前进攻的，所以它还能夺回那些已失去的而较易夺回的地点。

十、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论我们的目的是保卫和收复领土也好，保存自己的兵力和民力也好，都只有逐渐地和最后地消灭敌人的力量才行。怎样才能消灭敌人的力量呢？“攻击为摧破敌之战斗力以压倒歼灭敌人之唯一手段，故除状况确有不得已之外，常应决行攻击以挽回战势。”（见《战斗纲要》）这是军事原则上一个起码的道理，一个举世所公认的原则，难道我们应当否认它和不执行它吗？

从上面所述各点看来，中国抗战在战役和战术上，应当采取积极的进攻作战，决不应采取消极的防御作战。可是，过去除开一些胜利的战役是采取了进攻的战术外，其他则一般是采取消极防御的战术。这中间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我想：

第一，由于不了解敌我彼此之长处和缺点。不知道敌人的主要的长处是在兵器技术方面，其基本的弱点是在政治方面与国度小、力量有限的方面，不知道我军的短处是在兵器技术方面，长处是在政治方面与国度大的方面。因为没有明确了解敌我的长处与缺点，因此就不会运用恰恰能发挥自己的长处，避免暴露自己的短处和利用敌人的短处，避免敌人的长处的进攻的战术手段。

第二，由于战略战术了解上的错误。有不少的人，把战略上抗战、应战、防御战、持久战、守土抗战等等的说明我战略地位的名词与我战略上方针的名词，误认为战术上的名词，把它与战术上的防御战、持久战的名词视为一物，把全国的抗战的总方针，作为每一次战役的实际方针，在每一战役中都采取防御的动作，实行呆守阵地的守土抗战，抗战，敌攻击我还击的应战。不知道战略上的抗战、应战、持久战、防御战，主要经过无数的战役上的进攻来进行的。而且不仅把战略上的防御

战，误认为战役上的战术上的防御战，并对进攻的意义也没有正确的了解，把战略上所指的进攻与战术上所指的进攻视为一物，即以为我国既无打到三岛去的侵略野心，就以为不应当有进攻，这种了解在战略上当然是对的，但在战役上战术上也这样，那就大错而特错了。又有的将战术上的进攻了解为一定要去进攻敌人的阵地，却没有想到我们可以进攻向我进攻的运动中的敌人，或采取截断敌人的联络线，进攻其来恢复联络线运动中的敌人，或以我一部包围敌人一点，而以我主力控制于适当地点，求得打击来援的运动中的部队。这种进攻战法，在敌人是在战略上战役上战术上都向我进攻的情况下，我们并不须要去攻击敌人的坚固阵地的。

第三，由于有些人怀着保存实力的自私观念以及缺乏从根本上去解决敌人的战斗观念，因而不自动去向敌进攻，到了敌人打来时，则不得不勉强应付一下，这样，就自然演成了消极的防御战。这种人是没有了解局部的命运是不能与全民族的命运分离的，是没有了解“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的这句话的意义的，没有了解为着全民族的生存而付以局部的牺牲是必要的。且事实上，愈想单独保存实力的部队，其结果却适得相反，即令他在战斗中消耗不大，但此种部队因缺乏政治上的灵魂，其溃散逃亡往往较之坚决战斗的部队数量上的减员还要更多一些。其质量方面则不但不能提高，且反而降低。因为这样的部队的良好之战斗作风是无由建立，士气无由振作，群众对军队之尊敬与帮助亦无由产生的。攻击是从根本上扑灭敌人的唯一手段，如果缺乏从根本上解决敌人的观念，那自然就不会采取进攻战术，而采取防御战术了。

第四，由于不了解战争的政治性质之对于战术上的关系。不少的人提倡用曾国藩对付太平天国的防御战术，以之对付日寇；又有不少的人用过去内战时候的堡垒主义的传统，以之对

付日寇。这些相信曾国藩战术思想和相信用堡垒主义对付日寇的人，是没有了解我们的抗战是革命性的战争，敌人是反革命性的战争；没有了解革命性的战争，就应当采取革命性的战术，采取进攻战术。曾国藩对付革命的太平天国的战术和我国过去内战时代对付革命的红军的战术，在今日我国革命性的抗日战争中是不适用的。且敌人的兵器技术条件，敌人的战略地位与内战时代的红军也是绝对不同的。

中日战争由于敌国小我国大，敌人是反革命性的、强盗性的，我们是革命性的、正义性的，所以，我们是能够战胜敌人的。但由于我国弱敌人强，所以，我们又不能够一下子做到战胜敌人，只有在持久战中逐渐转变敌我强弱形势，才能最后的战胜敌人。在此持久战中，我们在政治上的办法应当广泛地实行统一战线，团结全民族的力量抗日，并团结世界上和日本方面的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华战争的势力。在此持久战中，我们在军事上，便应当根据敌我的优点和缺点出发，实行进攻的战术，以发挥我军的长处，利用敌人的弱点，避免我军弱点的暴露，避免敌人长处的发挥。只有切实这样做才能争取战争的最后胜利，如果不是这样，则尽管我们有战胜敌人的客观良好条件，但胜利仍然不会自然到来的。我们应该把战术上的进攻性，贯注一切作战的行动中，一切防御一切退却都应为了进攻，无论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当然是指防御的阵地战）都应当把进攻作为它的灵魂，作为它的根本。只有这样才能胜利。

在全国第二期抗战中，对于抛弃过去消极防御转变到积极进攻的战术上，已有显然的进步。台儿庄的胜利，便是由于这个进步而取得的。但毫无疑问的，在现在的事实上还需要我们有更普遍更彻底的转变，才能开展更多更大的胜利，才能保障最后的胜利。

华北正规战的根本教训已如上述。在自卢沟桥起到临汾失陷后止的正规战中，虽然是节节退守的，虽然遭受了不少的挫败（其间当然也有个别胜利的战役），但它却足足支持了将近九个月的长时间，给了敌人以很大的兵力、财力、时间的消耗，给了华北民众以很强的民族观念与抗战决心，同时使军队受到了很大的锻炼，得到了很多进步的，而且它掩护了帮助了华北游击根据地的建立与游击战争的开展。

华北的游击战争，固然是在临汾失守以后，才更普遍的发展起来，此时一切正规军也由正规战改作游击战，但华北的游击战争却不是开始于临汾失守时的，而是在平型关战役中即已正式开始了。平型关之役，某部以最大主力猛攻、佯攻平型关之敌之侧背外，并以一小部出至灵丘东北一带作游击战，阻击该方面向平型关增援之敌。平型关伟大胜利的取得，是与该役中游击战争的配合密切有关的。尔后敌人自茹越口突入雁门关直向太原前进时，我留灵丘方面作游击战的部队便乘势夺回了已失陷的灵丘、广灵、涞源、浑源等县，给了敌人很大的袭击，夺取了敌人不少的辎重，使敌人失掉了这条后方联络线。今日以五台山为中心的冀晋察边游击战争根据地，是在平型关战役时就开始创造的。在晋东南，在晋西北等处，也是临汾失陷以前就有了游击战争的。不过，临汾失陷前华北游击战，在当时不是华北抗战的主要形式，而是配合当时主要的正规战的辅助形式，而且那时还一般的仅限于八路军作游击战。到临汾失守后，游击战便变成华北抗战的基本形式了。参加游击战的不仅为八路军，而且一切在华北的正规军，均奉蒋委员长命令进行游击战争了。

对于现已成为华北抗战的基本形式的华北游击战，我们是应当足够的认识它的整个意义和它的发展条件的。只有有了这种正确的认识，才能够产生出坚持华北游击战的决心、信心和

正确的方针，才能保障华北游击战争的广大发展。也可以说，正确的认识华北的游击战争的意义与条件，是发展华北游击战争的主要条件之一。

关于华北游击战争的意义，我想至少有以下诸点：

一、华北在人口上、物产上、面积上、形势上都是伟大的力量，无论在中国或在世界上它都占重要的地位，敌人得之可以作为他的续命汤，可以作为他扩大侵略的根据。为着保卫华北，我国曾以正规军正规战与敌人作了很残酷的斗争。但华北全部城市与要道，终于统被敌夺去了。华北成了“失陷”的形势。日寇当然大唱其得胜之歌，大做其甜蜜之梦，以为从此华北就完全是他的了。但日寇是想错了。他原来只看到中国正规军、城市、要道的力量，却没有看到华北人民的反抗力量，华北人民与一部军队结合成的游击战争的力量。日本军阀的头脑，是单纯军事观点的，成为日寇兵经的日本战斗纲要内，对于估计敌情与决定作战方针上，就根本没有提及战地居民向背之对于军事上的影响。我想日寇在中国战争的最后失败，就会失败在这一点上的。诚然，过去我们的正规战，没有打胜日本，城市与要道确实是失了，如果我们不发展游击战继续奋斗的话，那华北也确就全部变成了日寇的殖民地了。但我们坚持在华北发展军民一体的游击战争，则我们就仍能保卫华北的，我们是能够使日寇在各地的伪政权建立不起，使日寇不能在所有的地方进行经济上的、政治上的剥削与压迫（收税、做生意、开矿、抽丁、组织伪军）。只要我们进行游击战争，我们就能够保持在日寇步哨以外的地方，仍属于我们。兵力不够分配，是日寇主要弱点之一。因此，他只能占驻大的城市 and 要道，其他的地方，他就依靠组织汉奸与伪军帮他统治。我们的游击战争，除了能够袭击日寇的较小部队外，对于消灭汉奸政权，是有绝对把握的。华北游击战争，已经在事实上表现了这

种作用，已经收复了很多原来失去的城市、乡村道路。这就证明华北的游击战争，是能担任继续保卫华北的任务的。

二、集中行动与集中指挥的各兵种联合的有一定后方的大兵团的正规战，负着迎击与歼灭敌人、保卫我国诸战略要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的大城市）与战略要线的重大任务。但这样重大任务的进行，单靠正规战的孤军奋斗是不够的。它必须有游击战争广泛的配合。华北游击战争在广大地区的发展，便能到处分散敌人，牵制敌人，使敌人不能以全力对付我正规战的军队，使我在华北以外的正规战能得到华北游击战争的配合。同时，成为敌人运输军队与军需的津浦、平汉、同蒲、平绥铁路，都在华北境内或经过境内，华北游击战争是能经常截击敌人在这些铁路上的运输，妨碍敌人向西向南侵略的扩大。

三、华北的游击战争，不仅有保卫华北与配合正规战的作用，而且还有去恢复东北失地的作用。东北四省地区之大，人口之多，物产之富，形势之重要，是用不着说的。敌人在此区域，并没有处处驻有军队，而是利用汉奸与强迫一部分人替他执行剥削与压迫的政策。其他的这种统治区，只要我们的游击战争一发展进去，便立刻可以推翻他的统治而重建我们民族的政权。对于敌人驻兵很少的地方，亦可用游击战争将敌歼灭或驱逐他。我们把游击战争向东北的广大地区发展起来，便可把东北敌人孤立与封锁在几个城市中去。日本在东北所培植的伪军，其战斗力是很薄弱的，不难以政治的瓦解与战斗的进攻去消灭他的。游击队还可从伪军手里夺取日寇的武装，来武装自己。由华北向东北发展的游击战争，首先应在××与××发展起来，并渐与原在××两省西部北部原有的游击战争，衔接起来和配合行动。应当做到把日寇在东北的统治重新普遍地动摇与崩溃起来。这一任务的进行对于东北、华北及全国都是有很

大的重大的意义的。

四、在华北的游击战争中，将能产生新的伟大的抗战力量和大量的消耗敌人的力量。华北的游击战争，将能使华北各地政治上、社会上、思想上有大的革新与进步。华北有广大的人口，有巨量的枪支，它必能组织新的大的抗战军队，并使原有各地的零散队伍充实壮大起来，质量上更加提高起来。它能由游击队产生新的正规军，发展新的正规战。这一切军事、政治、社会力量的壮大与进步，它同时也就使我全国抗战总的力量增加起来。华北游击战争的发展，及其新的抗战力量的增加，就要使日寇在华北不能进行如意的剥削，不能畅行其“因粮于敌”的政策，而且在各处游击战争不断的对他袭击下，他就要不断地遭受兵力、财力、物力上的损失，这就使他不仅难达到在中国发洋财的目的，而且还使他大折老本，使他逐渐削弱下去。

五、华北在形势上是处在日寇对苏作战的侧后的重要战略地位，我们坚持华北的游击战争，这对于以后日苏战争爆发时也是有重大意义的。我国到某种时机进行大举反攻敌人时，华北在战略意义上便是我们反攻的支点，进攻的据点。

六、华北的游击战争是这次全国抗战游击战争中最先发动的地方，它有了最擅长游击战争的八路军的参加。在日寇愈向我内地深入的时候，为着到处分散、削弱与部分消灭敌人，为着保卫失地内的我国人民的生命财产，便应当在所有的失地内进行游击战争。为着提高所有的失地内的军民对游击战争的信心、决心与办法，在华北的游击战争便应当以自己的存在与发展的模范、影响别的区域，推动别的区域游击战争的发展。

上面已经说了华北游击战争的意义。下面再说到华北游击战争的难易条件。我们除了认识华北游击战争的重要意义外，还必须认识它所处的难易条件。这些问题的认识，是保证华北

游击战争发展的基本条件，华北游击战争的有利条件是什么呢？

第一，华北的地形条件，是有利于游击战争的，它有宽广的地区使游击战争能够自由行动，不致被敌所围困与捕捉。在各省交界处都有山，各省内部也有很多地方有山。这些山地是最便于游击战争作依托的。敌人机械化的部队，是不能或不易进入山地活动的。敌人大的部队如进山地则食宿均难，小部进入山地则易被歼灭。华北的河流一般的比南方河流的障碍力要小（黄河是例外），平时水小，且冬季多半结冰。另外华北的地面与东北的地面是连接的，中间不仅无水阻隔，且有山相连，这就使华北游击战争的活动区域更宽更自由了。由此可见，华北的地形条件是有利于游击战争的。

第二，华北有众多的人口，单是河北一省便有三千余万，其他各省的人口也是很多。人是活的力量，是有决定意义的力量。大量的人口是补充战斗伤亡及建立新的部队的必要条件。华北的人口不仅在数量上很大，而且在政治质量上也是很好的。自“九一八”后华北就处于国防前线了。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威胁与压迫之下，在平津学生所领导的爱国运动影响之下，民众的民族觉醒是比较提高了。前年红军的东渡，也给了华北民众以抗日的号召。此次全国抗战又首先在华北打起来，因此华北民众的抗日认识是比较深刻的，且在抗战发动以前，华北已有许多进步的分子，加入了坚主抗战的政党。华北有些地方的民众，还具有相当的游击战争的经验。华北的文化水平，也较之于某些落后的省份要好得多。这一切都是有利于华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的。

第三，华北有丰富的物产，出粮食，出棉花，出煤铁。这丰富的产物，便保证了游击战争物质的需要。

第四，华北有巨大数量的枪支，散布在各省各处。单是河

北一省即有近二十万支的民枪。抗战后，敌我散失在各地的枪支又是很大的数目。有了这样巨数的枪支，就能使各地的游击战争容易发展和有战斗力。

第五，华北游击战争发展的主要条件之一，是它有着全国抗战的配合，它不是孤军奋斗，它与过去的东北义勇军的孤军奋斗是大不相同的。敌人过去可集大力进攻义勇军，但现在却不能像过去那样容易的用集力围攻一处的办法来对付华北了。

第六，过去对付游击战争，有一个最有力的办法，即是所谓碉堡主义，但这个方法敌人是否能用以对付华北的游击战争呢？我想，一般的他是不可能的，至少也不能做到过去内战那样碉堡封锁的程度的。这一则因华北的地区比过去红军所属的地区不知大了多少倍，而敌人的兵力又很不足，敌人是无从进行全部的包围封锁的。一则因华北的土质是松土，与南方的黏土是不大相同的，且华北竹木很少，有些地方根本没有，沙土缺乏竹木是不能构筑碉堡或者是很难构筑碉堡的。再则因中国在华北的游击部队，有的还可附属一部炮兵，足以摧毁堡垒的。此外还因日寇过去没有碉堡主义的传统，其士兵也不能与中国士兵一样的吃苦，自构自筑碉堡。因此种种，日寇一般的是不能用碉堡政策对付华北的游击战，至多只能在某些要点上构筑一些工事。但他却不能普遍筑成无隙穿过的碉堡线。

第七，敌人是孤立的，是没有社会基础与地主武装配合他的。虽然他在各地也能扶植一些汉奸，但却不能成为群众性的力量。在游击战争活动下，他在各地进行的汉奸政权与伪军组织，就会建立不起，即令建立起了，也易被我摧毁。因此，敌人就会是孤立的。

第八，保证华北游击战争胜利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条

件，这就是最富于游击战争经验的八路军，全部都在华北直接作游击战。它已经和正在将自己宝贵的经验，热心诚意的传给所有在华北的其他军队及新起的人民武装。这些经验，是过去长期的斗争中从无数次的实施与检讨中得出的。这些经验是伟大的力量，它的作用不是纯书本上的理论，或单凭个人的天才，或其他的力量所能代替的，它是有其独特的巨大作用的。华北游击战争有了这样宝贵的经验的领导，就能保证它的发展。

华北游击战争发展的有利条件，在上面已经说了。下面再说到华北游击战争的困难条件。

第一，敌军因受日本武士道的麻醉，法西斯军阀的欺骗与强迫，因彼对中国的军民素极残暴、恐惧中国军民之报复，因我军对敌宣传工作不够与言语隔阂，因敌兵以为中国必败、日本必胜，且蔑视中国的落后，在此种种原因下，故敌在战斗中还有较顽强的抵抗力（但敌人的攻击精神则甚差），虽战败被困，亦不轻易缴枪就降，这就使得我们每次战斗都要付相当的牺牲。

第二，敌除用军队进攻外，并在政治上采取汉奸政策。自东北失后，日本即加紧在华北各地暗中扶植汉奸，在此次进攻中更到处培植汉奸。在我国方面，则因过去民族教育缺乏、民众抗日组织薄弱，故有少数人甘做汉奸，为虎作伥，这种情形也是华北游击战争要去克服的困难。

第三，华北各地作游击战的部队间彼此尚有些磨擦，各部进步的程度不同，历史系统复杂，思想见解复杂，因而磨擦时生，这些磨擦当然相当妨碍共同抗敌的军事政治行动的。

第四，华北的交通是比较发展的，且有不少的平原地形。铁路、汽车是便于敌人迅速调动的条件，平地是便利于敌人骑

兵及机械化的部队的活动的。我军在平地活动时，较难隐蔽目标，较难扼阻敌人和脱离敌人。

第五，华北各地要点及要道，是控在敌人手中的，我各游击区是处在敌人的被占领点之间，且距我国战略的总策源地较远。因此，华北各地游击部队，款项、械弹、医药的补充，有时感觉困难。

华北游击战的困难条件，有上述这些，但是我们以之与有利的条件比较，即可显然地看出有利的条件是大大多而且强于困难的条件的。只要正确的认识华北游击战争的重要意义，认清其发展的难易诸条件，只要坚决定下作长期奋斗的决心，并在政治上坚持统一战线原则，在军事上采取灵活积极的游击战术，注意根据各时各地的实际情况，去利用有利的条件，以战胜困难的条件，则困难是可以战胜的。华北的游击战争，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是可以广大的发展与坚持到底的。

根据一九三八年七月一日出版的《解放》
第四十三、四十四期合刊刊印。

毛泽东关于新四军可放手 在敌后活动给项英的电报

(一九三八年六月二日)

项英同志：

支电悉。

一、顾祝同较开明，望与好好联络。

二、地区扩大，已不患无回旋余地。望根据战争的实际经验，凡敌后一切无友军地区，我军均可派队活动。不但太湖以北吴淞江以西广大地区，即长江以北，到将来力能顾及时，亦应准备派出一小支队。

三、敌之总目标在进攻武汉，你们可放手在敌后活动。

四、枪支可由地方与敌人大批取得，不必多花钱远处购置。

五、加紧教导队训练，扩充名额，以备扩大部队之用。

六、赖传珠可任副旅长，或旅政委，或暂令训练教导队，望考虑。

七、电台员正令三局设法。

八、汉口来件已到。

毛

二日

根据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集》
第二卷刊印。

新四军的昨天和今天*

(一九三八年六月十五日)

项 英

一、散布在七个省区的红军游击队

(一) 朱毛主力离开江西以后

要说明新四军的诞生和成长，必须追说到一九三四年冬天，江西主力红军朱毛的突围、西进和北上到陕北苏区。那时已经到一九三五年的冬天，整整一个年头，而在江西则留下一个独立师、几个独立团，组织成中央军区，由项英同志负责。在这个区域中，坚持了三个整年的游击战争，保存了革命的力量。但因为进攻力量的强大，不得不把师团的组织分散开来，变成几个独立的指挥单位。一部分在闽西之龙、汀一带，由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方方各同志来领导。一部分留在赣南的大庾、南雄、三南一带，由项英、陈毅自领之。一部分到闽赣边之崇安一带，由黄道、曾镜冰两同志负责。这三个部分形成这个区域的中心力量。围绕这个中心，尚有其他小游击队的存在和活动（如汀州、瑞金游击队，上犹、崇义、桂东之游击队）。

这是江西苏区在朱毛主力出动后的游击武装情况。

(二) 两个军团的后代

* 本文原载集纳出版社一九三九年五月一日出版的《项英将军言论集》。

我们记得在一九三四年春天，江西红军曾派一个军团（第七军团）组成抗日先遣队，由江西经福建（曾袭击福州一次）转到浙江（江山、常山一带），又到皖南（徽州、太平、泾县一带）。虽然后来在浙赣边失败，但是由于他的英勇的行动和抗日的号召，浙赣边、浙皖边以及浙江东部（平阳、温州）各地，建立起游击队来，继续斗争，散播了抗日的影响，确立了革命堡垒。还有在福州事变时，在福建东部沿海各县农民暴动成立的一个游击区。

红军不是还有第六军团的萧克吗？自从他的主力与贺龙（第二方面军）同志会合后，在湖南的平江、浏阳，在江西永新、莲花，两个地方也都留下了游击队的种子，不断的活动。而在湖南耒阳、郴州两处，另自还有两支小游击队。

（三）红四方面军的留守部队

红四方面军是在一九三二年离开鄂豫皖苏区的，到了陕川边，建立了苏区，后来与朱毛红军在川康边会合北上到陕北去了。其留在鄂豫皖苏区的，有一部分由徐海东同志率领，转战于豫陕间，亦先到陕北苏区与刘志丹同志部分会合了。就只在湖北黄安、河南信阳两处保留下两个游击队，由高敬亭、周骏鸣两同志领导之。

从上面的概略说明，你去翻开地图来就会看见，这些红军游击队散播的区域是很广大的。1. 湖南是平江、浏阳，耒阳，郴州、桂东、桂阳三点。2. 河南是信阳、确山一带。3. 湖北是黄安（以七里坪为中心）一带。4. 江西是永新、莲花，上犹、大庾、崇义、定南、虔南、龙南（即所谓“三南”），景德镇，瑞金，铅山、上饶，都昌，铜鼓、万载七个地区。5. 安徽是祁门、婺源及皖北之六安、立煌一带。6. 福建是崇安、浦城，长汀、龙岩，连城、汀州，福鼎、福安，屏南、古田五个地区。7. 浙江是平阳、温州、庆元一带。

活动的区域虽然小，游击队的力量也不大，但是散布的面积是极其广泛的，有七个省区。

二、进攻，进攻，谈判与和平

继续五次“围剿”的进攻，一切力量从中央军队到地方保安队、民团，对于散播在这七个省区的游击队并没有放松过。这个时期从朱毛主力红军离开江西（一九三四冬）算起来到西安事变（一九三六）为止。自然，陕北红军主力已更大努力的进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是中央军的“围剿”并未停止，而特殊的在东北军中开始发生了统一战线的运动。南方七省的游击队，在这两年（一九三四——一九三六）当中同样遭受“围剿”的困苦，然而是以更新更灵活的游击战争的方式，坚持了南方革命的堡垒。不管这些游击战争的活动是如何微小，不能影响整个国内战争的局面，然而这些据点成为我们今天的朋友的心腹之患，以拔之而后快，但并未拔得了。

由于抗日统一战线的开展，由于东北军的对内战的动摇，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疯狂的进攻，由于全国抗日运动的发展，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爆发震动和改变整个中国政治生活的西安事变。和平的结果使陕北红军主力也与中央军取消了敌对行动而进入于休战状态。但从这时候一直到卢沟桥事变（一九三七·七）为止的半年时期，成为南方游击队更困难的时期，即是说虽然国民党军事当局和陕北红军进入和平谈判的状态，而对于和陕北红军在政治上一致的南方红军却采取更加猛烈“围剿”，企图在短时期内完全加以消灭。这样可以：

1. 孤立陕北的主力红军。
2. 消除在南方的革命武装。
3. 消除在南京当局所认为“心腹之害”。

虽然七个省区的谈判和平运动，我们可以说第二个时期，一直到新四军的正式成立为

止。当其在进行和平谈判的最初的时候，是个别的游击武装与个别的省、县地方政府谈判。因此，在条件内容上不能一致，而主要的能表现在省、县地方政府是没有什么诚意，而是改变一个形式，即是从战争的形式，改用表面和平而胜利以求正式的突然的进攻手段，中心还是来消灭这些力量。譬如，在福建的何鸣部队、刘突军部队被缴械，河南周骏鸣部队、江西钟德胜部队被袭击，这些都是部队已经编整后出以阴谋的处置。这种现象一直延至新四军成立后仍然继续发生。如闽中游击队的缴械等。

个别的谈判，结果仍然分住在七个省区，为南京军事当局所不愿的，必须把这些“钉子”拔出去。同时，中国共产党亦有把这些队伍集合来参加抗日战斗的愿望，于是新四军的成立的运动，才在南京提出来，这时已到一九三七年的十一月。

三、编队、集中与其困难

新四军的成立问题被提出来后，中国共产党的主要条件是以新四军参加东南战线，不北调。至于队伍则在军之下成立两个师（每师两个旅），虽然折冲结果行动地区是在江南（原来国民党军事当局是要调他到山西受八路军节制），而编制问题未得到解决，直到首都南京被占，军事当局才答应编为八个单独的支队（一个支队等于一个团）。后来又才改成四个支队，每个支队辖两个团（支队等于旅了）。结果在实际上是师一级的指挥机关没有能够成立。

这样第一支队，包括江西的永新、莲花、大庾、南雄、三南，湖南的平江、浏阳，安徽的祁门、婺源的几个部分的游击队，以陈毅为支队司令，傅秋涛为支队副司令。

第二支队，包括福建龙岩、长汀、连城、云霄（即何鸣

部)、汀州和江西瑞金及浙江平阳、温州的几个部分游击队，以张鼎丞为支队司令，粟裕为支队副司令。

第三支队，包括江西上饶、铅山，福建崇安、寿宁、福鼎、福安、南屏、古田的几个部分的游击队，以张云逸为支队司令，以谭震林为副司令。

上面三个支队在江南行动。

第四支队，包括河南信阳、确山、南阳，湖北黄安、麻城的几个部分游击队，以高敬亭为支队司令，戴季英为副司令。

上面一个支队在江北行动。

军部当着各地谈判大体解决，南京军事委员会即任叶挺将军为新四军军长，后因改编各种问题未得相当解决，直到一九三七年底，即先在汉口成立，到一九三八年一月移到南昌。

军部到南昌后，即计划各部分队伍改编，人事调整，装备补充，以及集中的时间、地点和路线。

这时期仅仅军部移到南昌，而四个支队即就本身来说，亦尚未集中。有些部分因为分散，完全不可能以支队为单位来集中，都只能由各部就原地出发，到前方来集中。已得到第三战区的命令，集中于徽州岩寺，因此军部以命令下达各部分，除第四支队外，都就原地出发向岩寺集中。然而那时候还是冬天，部队的冬衣补充没解决；各部分游击队在本区域住久了，一旦要离开，必须有些善后事情要处理；经费很少，各部分的老弱残废的安置，将士家属的安置，出发的开拔费等，都不能够解决。同时地方当局对于这部分队伍的歧视，士绅阶级之造谣破坏，双方磨擦也未减少，并且大部分是福建队伍，与安徽相距甚远，又不能取得铁道和公路的运输便利。因为这些原因，使得部队的集中不能如期完成，一直到三月初，各部分才开始分头向岩寺集中。

(一) 首先是赣皖边的景德镇的一部分(一支队)到达

岩寺。

（二）江西上饶、铅山及福建崇安的部分（三支队），因邻近安徽，出动较速，仅次于赣边之部分。

（三）湖南平江、浏阳部分（一支队），步行至萍乡（江西），乘湘赣车转浙赣路至江山下车，步行到岩寺。

（四）江西永新、莲花部分及大庾出发到吉安（江西），乘船至樟树，转乘湘赣车转浙赣路至江山下车，随上列湖南部队跟进至岩寺。

（五）闽东、闽中各部（三支队），分由宁德、古田出发，经屏南、政和、浦城入浙江之江山、常山向岩寺集中。

（六）浙江平阳之部（二支队），由温州、丽水至金华乘车至江山转常山、开化，向岩寺前进。

（七）闽西、闽南之部及江西瑞金之部，均由龙岩出发，至汀州入江西，经瑞金、会昌、雩都至赣州，乘船到樟树，乘湘赣车转浙赣路至江山下车，经常山、华埠至岩寺。

江南三个支队于此时（约在四月初）已大部集中完毕。仅福建尚有两个连，湖南平江、浏阳一个连及湖南耒阳、郴州两部，于最近始到前方，编为军部直属之特务营。

在江北的第四支队，亦于四月初会合，向合肥、巢县前进，现已在合肥以东、津浦路以西，与日寇进行游击战争了。

军部亦于四月初移岩寺指挥。

四、出动与我们的任务

部队既已完全集中在岩寺，除第四支队归第五战区李司令长官宗仁指挥之外，这三个支队就要去执行它的任务。

首先，第三战区派员来点验部队。另一方面，我们为准备着出动，一面加强本身的战斗教育，一面向第三战区要求装备

弹药的补充。

为了这些工作，就在岩寺将近住了一个月。

这时队伍点验过了，弹药装备也补充了一些，已得到一个短时期的休养和教育机会，而任务规定的命令也来了，是在南京以南的不大地地区中进行破坏铁路、公路，扰击敌人。

我们过去一般的都有山地游击战的经验，但南京附近的地形和今天的敌人，已和过去的经验不相融合。为了首先明白敌情和地理条件，我们决定派出一个先遣队出去。

先遣队是各支队派人混合组成的，配备相当充实武器弹药，由四月底乘汽车运输至南陵，通过宣城、芜湖之线左进，经当涂右侧转进，进至南京以南地区。现在它的足迹、传单、标语、影响、活动，已于江苏省的高淳、溧水、溧阳、金坛、江宁、南京、句容、宜兴、武进、镇江这一广大地区了。它虽尚未与日敌对面作战，但它已破坏了若干处公路、电线交通，宣示了中央决心抗敌的意旨，发动了这区域人民抗战的组织，打击了若干汉奸投降分子的叛国行为。

有了这个先遣队的出动，对于当面敌人的情况已渐次明了，同时地形上虽非全属山地，但也可进行游击战争。本于上项任务，其他支队现正陆续前进，挺入敌区。

同时，以前划给本军的活动区域比较狭小，几无回旋余地，而现在则比较大了，京沪铁路、京杭国道、江南铁路（即京宣线），皆由我们出入，我们当然可以担负起这个任务来。

这个任务是什么？让我重说一遍，即是破坏铁路、公路及电线的交通，截击敌人的辎重，钳制更多的敌人于几个据点，打击敌人的少数队伍，发动人民坚持抗战，组织人民自卫的武装，实行坚壁清野，困扼敌人的给养和妨害敌人，使它不能再掠夺中国资源，坚决打击为日寇作走狗的汉奸政治组织及军队。

我们已在执行这个任务，我们继续执行这个任务，并且准备在战斗中锻炼自己，壮大自己，以便打击更大的敌人，不仅能作游击战，还够作运动战和阵地战，一直到反攻，而且是反攻和克复我们的首都——南京！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二〇〇三年出版的《项英军事文选》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中共十七周年 纪念宣传纲要

(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四日)

(一) 中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马列主义的党。最后解放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是它的历史使命，因为工人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它自己。中国工人阶级的最高利益，是同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最高利益一致的。

(二) 为了最后解放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中共的首先任务，就是建立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民主共和国，争取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然后使中国革命走向共产主义去。只有共产主义的社会，才能完全实现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最后解放。

(三) 中共过去的十七年即是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而艰苦奋斗的十七年。这个奋斗的基本目标，中共远在一九二二年已经明确的提出来了。十七年来虽是由于国内外环境的变迁，使中共的某些主张不能不有某些变化，然而在其基本奋斗方向说来，则是始终一贯的。

(四)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首先提出了以神圣的民族自卫战驱逐日寇出中国，保持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的口号。经过六年的艰苦斗争，民族抗战终究于去年的七月七日开始了。中共很早指出了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关键，并使自己成为这个统一战线的发起人与组织者。

（五）日寇自占领徐州之后，主力正向着武汉进攻。保卫武汉，保卫全国，用一切方法削弱敌人，加强自己，克服一切困难与动摇，以持久战最后战胜敌人，这是中共提出的当前的紧急任务。

（六）中共在为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最后解放而英勇奋斗的十七年中，是坚强与壮大起来了。它的基本主张的正确是为十七年来中国的革命史所证实了，它已经在全国人民中，取得了极大的威信。它已经成为全国政治生活中的有力因素。一年来在民族抗战的各个战线上，中共同志已经表示出了他们是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先锋队。中共同志必须在这个方向继续努力，以求得抗战的最后胜利。

（七）为此，中共必须在任何困难条件下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坚持党在政治上与组织上的完全独立性，十倍百倍的扩大与巩固党的队伍，大大的加强党内马列主义的教育，保持与发挥历来艰苦奋斗的作风。——这就是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最后解放的保证。

中 共 中 央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刊印。

毛泽东同世界学联代表团的谈话*

(一九三八年七月二日)

第一个问题：目前陕甘宁边区在中国的意义与作用是什么？请你告诉我们，我们很需要明白这点。

答：明白了边区的性质，才能明白它在中国的意义与作用。边区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地方呢？一句话说完，是一个民主的抗日根据地。

首先，在民众方面，都有他们自己的组织。边区人民，只要在抗日原则下，都有他们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不论是工人、农民、商人、学生、知识分子、妇女、儿童，以及宗教团体、自由职业者的团体，都有这种自由。共产党与边区政府从而积极地扶植他们，帮助他们，使他们更普遍地发展下去。这里仅仅限制汉奸的活动，对于汉奸，是不给任何自由的。

其次，边区已成了直接抗战的区域，这里留了八路军的一部分，还有地方武装部队。这些军队，其内部官长与士兵的关系，其对外与人民的关系，也都有一种民主的精神，能够官兵打成一片，军民打成一片，使在抗日战争中表现不能被战胜的力量。

其次，边区的教育同样是抗日的与民主的，你们从抗日军

* 这个谈话原载一九三八年七月五日《新中华报》，题为《毛泽东先生与世界学联代表团柯乐满先生、雅德先生、傅路德先生、雷克难先生之谈话》。

政大学与陕北公学就可以看出这种精神。

其次，经济方面也是这样，以有利抗战为主旨，而以民主精神经营之。例如这里颇为发达的合作社，得了土地后的农民之于农业，都是按照这种精神，使人民的生活得到改良，同时又有利于抗日事业。这里是有租税的，但没有苛捐杂税，实行一种统一的累进税，符合于上述的主旨。

还有，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边区各级政府都是由人民投票选举的。这里证明一点，就是有些人说“知识落后的工农不能实行选举制度”，这是不符合事实的。这里实行民选的结果并不坏，每个有眼睛的人都能看到。当人民选举他们所欢喜的人去办政府的事的时候，办得很不错，这比派官办事制度要好得多，对于动员人民力量参加抗日战争，特别积极而有效。与过去苏维埃不同的，是扩大了选举与被选举的范围，即不论工人、农民、妇女、知识分子、学生、商人、有产者，只要不反对抗日而年满十八岁者，都有选举与被选举之权。

以上所述的各方面，把抗日战争与民主制度结合起来，都能收得很大的效果。在这个制度之下，无论哪一种职业的人，无论从事什么活动，都能发挥他们的天才，有什么才干的人都可以表现出来。

这就是边区的性质，边区的特点。明白了这种性质与特点，就可以明白它在全国的意义与作用是什么了。全国也应采取这个制度，应把抗日战争与民主制度结合起来，以民主制度的普遍实行去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如果全国人民都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充分自由，全国军队中官兵打成一片，军民又打成一片，全国教育也以民主精神实行之，全国经济建设发动了人民的力量并与改良人民生活相联结，全国各级政府都实行选举制度，并有各级人民的代议机关，而一切这些都是为

了争取抗战的胜利，那战胜日本就指日可期的了。民主制度在外国已是历史上形成的东西，中国则现在还未实行。边区的作用，就在做出一个榜样给全国人民看，使他们懂得这种制度是最于抗日救国有利的，是抗日救国唯一正确的道路，这就是边区在全国的意义与作用。这种制度要全国采用，是需经过全国人民切实了解，认为可行，然后才能实行的，所以我们欢迎各党各派与无党无派的人都来看一看。来看的人也不少，青年学生尤多，除了少数人说这种制度不好之外，大多数人都是说好的，这是可以引为庆幸的事。边区是中国之一部分，在中央政府领导之下，与中国其他部分是一样的，但有一点不同，这里是实行了民主制度的区域，这就是边区的特点。我们希望这个特点普及于中国。

现在有些人对于边区有两种不正确的观点：一种说边区什么都不好，有少数顽固分子这样说，这种说法显然不合事实。另一种说这里像个神圣的天堂，什么缺点都没有，这种说法也过分了。正确地说应是这样：这里的民主制度与抗日精神是很好的，值得供全国人民仿效与参考。但这里的工作还受某些条件的限制，例如物质困难即其一例，许多工作也还待继续努力，方能更好，并不是样样都好得了不得不须再求进步了。因此，欢迎外界的批评，加重了这里工作人员的努力，这也是要指出的。承诸位好意来延安参观，我就欢迎诸位的批评，指出这里的缺点，以便加以改正，使之更利于抗日救国的伟大事业。

第二个问题：目前中共在全中国的作用是什么？

答：这个问题很简单。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这就是目前中共的基本主张，它在全国的工作与作用也就在这里。

什么叫做坚持抗战？妥协还是坚持抗战，这是存在着的问

题。我们是主张抗战到底，反对任何妥协的。我们愿和国民党及其他党派与全国人民一道，坚持抗战，绝不动摇，直至收复失地打到鸭绿江为止。

什么叫做坚持统一战线？就是全国团结到底。只有坚持全国的团结，才能坚持抗战。现在虽然已有了全国的团结，但还要更加团结，不但团结几个党派就行了，还须团结全国的人民。只有全国各界人民都团结在一定的组织之中，都发动了抗战的积极性，才算巩固与扩大了统一战线。

什么叫做坚持持久战？中国现在有两种人，一种人说，“中国会亡，不能作持久战”；另一种人说，“中国很快可以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去，也无需乎持久战”。我们认为这两种意见都是不对的。首先，中国决不会亡。理由是日本虽强，但它先天不足，国内外矛盾很多；中国虽弱，但是大国，又有许多国内外的优良条件。因此，中国虽在战争的一定时期损失了许多地方，但仍能坚持战争，取得最后的胜利。但要很快地打败日本也困难，因为虽有争取胜利的可能条件，但不能很快地全部地实现，这不论中国的进步也好，日本的内溃也好，国际的援助也好，都非有相当长的时间不能达到目的。所以我们应准备长期战争，不能希望即刻胜利。

这样，现在的方针应该是：第一，坚持抗战；第二，坚持抗日统一战线；第三，坚持持久战。

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干些什么事情呢？就是干的这些事情。中共愿与各党各派及全国人民紧密地团结起来，一定要把这个方针贯彻下去，这就是中共在全国的作用。

第三个问题：中国是否有什么条件可以缩短这一持久战的时间呢？

答：要缩短战争时间，必须加强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中国的统一战线更加巩固与扩大，这是基本的。在统一战线

的方针下，各项工作须大大地发展与进步，这些工作多发展与多进步一分，战争时间就能缩短一分。第二个条件，是日本国内人民的帮助。现在这种帮助已经开始，譬如他们的士兵不愿意战争，有自杀的，有投降的，有发反战传单的，日本人民反战思想也在发展之中。如果日本的士兵与人民更多地觉悟一分，战争时间也就可以缩短一分。还有一个条件，是世界各国的帮助。我们需要世界学生的帮助，需要世界人民的帮助，也需要各国政府的帮助。如这些帮助更多更快，那末我们的战争也就会缩短。这三个条件是互相关联的，如果中国加快进步，加快团结，就能使日本国内的助我力量加快发展，也能使世界各国的助我力量加快发展。如果日本及世界各国的助我力量加快发展，也能使我们国内的抗日力量加快地发展与进步。中国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更大的打击，也就是给了日本人民的帮助，将使日本人民的解放斗争发展更快。对世界也是一样，中国的抗战，同时也就是帮助世界人民反对共同的敌人。所以中国、日本、世界各种反法西斯的势力是互相影响的，互相帮助的。世界和平不能分割，世界是一个整体，这是现在世界政治的特点。这三个条件多具备一分，则战争时间就能缩短一分。这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抗日党派及全体人民的任务，同时也是日本及世界各个先进政党与全体人民的任务。我们的战争是持久战，但我们应极力争取尽可能缩短时间的条件，如没有这些条件，则缩短时间只是空想。

第四个问题：抗战获得最后胜利之后，中共的主要任务将是什么？

答：抗战胜利后，共产党的主要任务，一句话，是建立一个自由平等的民主国家。在这个国家内，有一个独立的民主的政府，有一个代表人民的国会，有一个适合人民要求的宪法。在这个国家内的各个民族是平等的，在平等的原则下建立联合

的关系。在这个国家内，经济是向上发展的，农业、工业、商业都大大地发展，并由国家与人民合作去经营，订定八小时工作制，农民应该有土地，实行统一的累进税，对外国和平通商，订立互利的协定。在这个国家内，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的完全自由，各种优秀人物的天才都能发展，科学与一般文化都能提高，全国没有文盲。在这个国家内，军队不是与人民对立的而是与人民打成一片的。这样的国家，还不是社会主义的国家，这样的政府，也不是苏维埃政府，乃是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与不破坏私有财产原则下的国家与政府。这就是中国的现代国家，中国很需要这样一个国家。有了这样一个国家，中国就离开了半殖民地与半封建的地位，变成了自由平等的国家，离开了旧中国，变成了新中国。共产党愿意联合全国的一切党派与人民，大家努力建立这样一个国家。这样一个国家，是全国人民几十年来所希望所力争的，也是孙中山先生所希望所力争的。进行建立这样一个国家，不是把日本赶到鸭绿江之后的第二天才开始的，抗战过程中的各种工作，就都与建立这样的国家有关联。不过许多重要工作是要在抗战胜利之后才能完成，例如基本的经济建设等等。在抗战中，是要准备建立这样一个国家的先决条件，主要的是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去。这样的任务，不但是共产党的，也应该是国民党与其他革命党派的，同时是全国人民的。这是中国的历史任务。

第五个问题：你以为现在中国的学生及青年在抗战中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世界学生与青年在援华运动中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答：中国青年们的任务，可以分为一般的与特殊的。一般的任务，与前面所讲的相同，就是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民主

共和国。这是中国任何年龄、任何职业的人民之共同的任务，没有什么分别的。有分别的，是其特殊的任务。中国青年们的特殊任务是什么？就是争取自身的特殊利益，例如改良教育与学习，在学习中有参加救亡运动的权利，有组织学生与青年团体及组织救亡团体的权利，十八岁以上的青年有选举与被选举权，贫苦学生有免费入学之权，青年应大批上前线等等。

说到世界青年们帮助中国抗战的主要任务，我想，首先是经过世界学联，使世界大多数青年与学生了解有共同反对日本、帮助中国的必要，并使他们了解，这种工作是与他们自身的利益有关系的，因为和平不可分割，法西斯的世界侵略，是世界和平的仇敌。其次，学生是联络人民的桥梁，经过学生，使各个民族的人民懂得反对日本、帮助中国的必要，以及这种工作与他们自身利益的关系。至于具体的帮助方法，例如用口头和文字作宣传，劝告人民与政府给我们以物质上的帮助，不买日本货与不卖货给日本，直至组织国际抗日义勇军，准备于适当时机来华参加战争等等。

诸位代表着广大的国际学生团体来华视察，给我们以广大的同情，全中国人都感谢你们，我代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向你们致敬！希望你们回去之后，把中国伟大抗日战争的真相带给世界学生与人民。我们与你们永远团结起来，为中国的自由平等而战，为世界的永久和平与永久幸福而战！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二卷刊印。

论在敌人后方工作*

(一九三八年七月二日)

彭 雪 枫

一、任 务

在敌人后方的基本任务应该是：

一、发动群众斗争——提高群众的民族意识，激起群众对敌人的仇恨，发扬群众的斗争热情和胜利信心。在不同阶级、不同性质的群众组织中，在各种方式、各种场合的群众武装斗争中，走向直接武装的或配合已有武装的武装斗争形式。因此，随之而来的或一开头即从事于：

二、消灭敌人武装——敌人越前进，后方越扩大，兵力越薄弱，布置越空虚，那就越有利于我们“把敌人的后方变为前线”，越方便于我们“开展大规模的游击运动”，在战略上，配合我正规军作战。努力争取从秘密斗争走向公开斗争，从非武装斗争走向武装斗争；从疲劳敌人、消耗敌人走向牵制敌人、消灭敌人；从针尖刺、剪子剪走向大刀杀、阔斧砍；从敌人后方走向游击区；从游击区走向抗日根据地。于是，必须反对“流寇主义”而终于走向：

三、建立抗日政权——抗日政权建立了的根据地，本身起着它的军事上政治上的伟大作用，根据地可以成为：（一）游

* 本文原载一九三八年八月八日出版的《解放》第四十八期。

击队借以存在和发展的后方；（二）游击队（或者游击队变成的正规军）的进攻出发地；（三）影响与兴奋并指引远方或近方在敌人后方的我国民众的灯塔；（四）钳制敌人使其不得不分散兵力以举行“围剿”危害“皇军”的所谓“匪区”；（五）将来我军实行战略反攻时的“战略基地”。

这就是我们一切已经或者将要在敌人后方工作的民族英雄们的明确而又光荣的任务。这些任务可以去分头进行，可以去个别负责，然而绝对不应该把它截然分开。它们彼此是密切的联系着的，它们是政治目标下的军事行为，它们是军事手段要求的政治任务。问题中心在于我们具体的工作方式和工作内容。

二、工作方式和工作内容

一、公开的武装斗争——这是在敌人后方所进行的主要的斗争方式。开头最好从现有的正规兵团中抽出一部兵力，配属一批政治工作人员，在敌人前进时，留在原地不动（如晋察冀边区及鲁西北游击区），这样号召力量大些。另一种方式是在已经失守的地方，派出相当兵力的挺进兵团，深入敌人后方，发动游击战争（如八路军某支队之挺入平热路）。第三种方式是军事政治干部赤手空拳在群众中硬干起来的，在斗争中从弱小到强大。不论任何方式，中心问题是，如要进行公开的武装斗争，必须要有基干的武装部队。这一武装部队，在情况允许的条件下，可以灵活的“集中以打击敌人，分散以进行工作”，同时又吸引、争取、配合其他武装力量（像会门武装，绿林武装，匪伪武装，散兵游勇武装）。

这种武装斗争方式的内容当然是很广泛的，然而，基本的不外灵活的运用正确的游击战术原则。这种武装斗争，一方面

恢复了或者创造了抗日政权以至形成抗日根据地，一方面定下了与其他战线的战略上的配合。所以在政治上一定要反对那种苟且偷安、“分兵把口”的机会主义观点。在军事上必须要像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因此在战术部署上应当指挥民众组织之自卫队、联防队等有计划的在敌所必经之铁路、公路、县路上挖陷阱，埋地雷，破坏敌之交通，截断敌之运输。另外，还须派出远方活动的基干部队。这种基干游击部队，因其任务性质不同，可分：

（一）远殖游击队——这种游击队的派出是给予在某一地区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政权，即在所去之目的地“成家立业”的任务。一般说来，当授予任务时，只可给予目的，不可给予手段，只可给予活动的战略计划，不可给以呆板的战术指示。远殖游击队当派出前必须：（甲）配以必要之交通通信器材（建立无线电台，交通站等）。（乙）富裕的军事政治技术干部，尤其是能办军事政治教育的干部。（丙）相当时期内足够的用费和武器弹药。（丁）当地党及救亡工作的关系。

（二）挺进游击队——为了某一种特殊任务（远袭，破坏，迷惑敌人等）深入敌之后方，注意事项：（甲）轻装。（乙）熟悉该地点的向导及军用地图（如无军用图，能找到该县县志亦可）。（丙）达成任务的技术人才及应用材料。（丁）宣传品。

以上两种游击队的任务及其来去，最好赋予该队首长以机断专行的权力，使其自己根据敌情、任务、地形、时间的不同变化而相机从事。

这种积极向外发展的各种游击队，必然在战略上起了它伟大的作用，给敌人以“苦痛”，给我们以“欢欣”。八路军游击支队之渡潮河，扰古北口，截断平热大道，活动于冀热察边，东与东三省义勇军呼应，南与晋冀主力通声气，未尝不可在燕

山山脉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的。鲁西北的游击区，倘若能够派出自己的强有力的挺进或是远殖游击队出德州，断津浦，活动于子牙、滏阳、滹沱三河流域间，即不能扎下脚根，巩固发展，然而大量发动民众斗争，钳制敌人兵力，是百分之百有把握的。

二、秘密的政治斗争——秘密工作不但在敌之力量坚强我之力量空虚的后方应该建立，就是在敌我力量对等，以至我之力量坚强敌人力量空虚的我方根据地也应该建立的。为的是万一我军于转移地区时，不仅不会遭受敌之彻底屠杀，而且又能仍留原地继续工作。不过，这特别注意的是秘密工作的技术的问题和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的配合问题。（以下两段从略——《解放》周刊编者）

三、“合法的”群众工作。（以下一段从略——《解放》周刊编者）

三、工作的策略路线

在敌人后方工作策略上的唯一原则是使敌人的敌人越多越好，使我们的朋友越多越好。我们应响亮的提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口号，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抗战建国纲领为基础，建立不同时间不同地域的各党各派各军各团体各阶层的“共同行动纲领”，秘密的或者公开的召开代表大会，热烈讨论后订出。

我们的基本战略方针是：

把敌人的后方变为游击区！

把游击区变为抗日根据地！

如何能够使抗日根据地求得巩固与发展呢？

在政治上，“要反对游击战争的保守主义，不论是由于贪

图安逸而发生的，或由于对敌人力量过分估计而发生的，均将给予抗日战争以损失，对于游击战及其根据地本身也是不利的。”（毛泽东同志）反对“农民的保守主义”，反对机会主义者的“右倾危险”，应该是政治教育、政治斗争的中心任务之一。因此，在军事上即应采取“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就是说，部队不管强弱，人数不论多少，总要采取积极向敌动作的战术原则，同时，主要的还是发动组织并武装民众。根据地内的所有市镇村庄都有公开的各种群众武装组织和秘密的游击小组（每村三五人，八九人不等）以及秘密的灵活的交通、侦探。这些组织护卫着各乡的游击队，各乡的游击队又护卫着各区各县的基干游击队，各基干游击队又护卫着中心的主力部队。我主力部队有周围团团护卫着的“卫星群”，那就容易使我对敌人透亮明了，主力可以安然养精蓄锐的“待机”，待战役胜利条件具备时，突然给敌人以袭击。另一方面使敌人对我黑暗难测，完全可能做到使他像“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悲惨境地！

当然，这些所谓“卫星群”，都是在那里日以继夜的向敌活动，以求得做到消耗敌人，疲劳敌人，钳制敌人，分散敌人，制造敌人弱点，创造消灭敌人的条件，以便配合着主力部队打击敌人。

“一切游击战争的根据地，只有在建立了抗日的武装部队、战胜了敌人、发动了民众——这三个基本的条件逐渐具备之后，才能真正的建立起来。”（毛泽东同志）

四、准备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奋斗

在敌人后方工作，是一件“说得出做得到”的事业，然而并不是一件“一伸手就拿来”的玩具。我们要使敌人的“心腹

之地”生疮长疔，以至慢慢的烂起来，脓血淋漓，终于制死敌人的生命；敌人是不大高兴“从容就死”甚至“屈膝”的。敌人是要拔除他的“心腹之患”，他必然要实行他的“扫荡计划”，于是艰苦、困难、不如意、不顺心的各式各样意想不到的环境就要来了。问题在于我们——游击战争的指挥者，抗日根据地的领导者，敌人后方秘密奋斗的无名英雄，是不是有忍受一切苦痛的精神？是不是有克服一切困难的魄力？是不是有打破一切障碍的办法？就是说：

是不是有斗争的决心？

是不是有胜利的信心？

我们说，既在敌人后方工作，就首先抱定能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奋斗，要有胜利的信心和斗争的决心。

充分可能遇到敌人的“大举围攻”，三路五路以至九路（像山西），必然遇到敌人的封锁，尤其是经济上的封锁，使我们没有西药，没有饭吃，没有器材，没有必需的轻工业用品。敌人的封锁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主观方面没有克服“封锁”的军事上、政治上的设施与艰苦奋斗的决心。

我们有过这样的经验，没有饭吃，群众工作做得好，群众爱护我们如他自己，群众自己吃杂粮，却把米麦慷慨捐助我们。我们吃饭可以限制，每人一斤或者八两。没有盐吃，可以熬硝。没有蜡纸，可以把蜡烛融化摊在毛边纸上，油印起来，而且并不比“奥国造”的坏。学校没有粉笔，可以用石粉块代。无线电台，没有滑油，有猪油代。松树皮是我们的蜡烛，稀布浸上盐水是我们的疗伤“纱布”。充电机用酒精也可以赶得上汽油。中药西制，同样装瓶打包，携带方便。经济力量不够，可以废除薪饷制度，只要能够生活、工作。

在长期的敌人后方工作的光荣任务下，任何战斗的一员都应有此信心，具此决心，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然而，基本上还是在于我们的政治工作，军队中的、群众中的、敌人中的。

在游击区和根据地，我们应该绝对避免引起群众的无谓牺牲，要采取极有效的办法，使群众不遭受敌人的屠杀，但同时要使群众了解，牺牲在有时也是不可免的。问题是我们要动员、团结、组织并武装千百万民众参加我们的战线，和他们打成一片，混为一体！

总之，在敌人后方工作，一切都是为着武装自己，一切都是为着消灭敌人，一切都是在紧张的严肃的战斗局面下进行着。我们的口号是：

一切为着战争，一切服务战争！

把敌人后方变为游击区！

把游击区变为抗日根据地！

根据解放军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的
《彭雪枫军事文选》刊印。

我们对于国民参政会的意见*

(一九三八年七月五日)

毛泽东 等

国民参政会将于日内开会。我们七个中国共产党员被选任为参政员，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已正式决定我们七人接受政府聘请加入国民参政会。因此，许多新闻记者，参政会同人，各地共产党同志及各方友好纷纷垂询我们对于国民参政会的意见，特共同发表如左之申明。

在目前抗战剧烈的环境中，国民参政会之召开，显然表示着我国政治生活向着民主制度的一个进步，显然表示着我国各党派、各民族、各阶层、各地域的团结统一的一个进展。虽然在其产生的方法上，在其职权的规定上，国民参政会还不是尽如人意的全权的人民代表机关，但是，并不因此而失掉国民参政会在今天的作用与意义——进一步团结全国各种力量为抗战救国而努力的作用，企图使全国政治生活走向真正民主化的初步开端的意义。所以，我们——共产党人除继续地努力于促进普选的、全权的人民代表机关在将来能以建立外，将以最积极、最热忱、最诚挚的态度去参加国民参政会的工作，同时，并认为，积极的参加国民参政会的工作，也就是增强保卫武汉及第三期抗战力量的一部分重要工作，也就是促成人民全权代表机关在将来建立的一部分基础。我们代表着中国共产党参加

* 本文是中共中央长江局起草的，原载一九三八年七月五日《新华日报》。

国民参政会，诚恳地愿意在参政会内与国民党和其他各党派以及无党派关系的国民参政员同志们亲密的携手和共同的努力，以期能友好和睦地商讨和决定一切有利于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具体办法与实施方案，以便能够有效地打击与战胜日寇，并奠定使中华民国走向独立、自由、幸福的新国家的基础。

为达到战胜日寇，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国家，那末，首先在军事上必须求得前线作战部队战斗力之加强，敌人占领区域中人民游击战争之大规模的发展及有现代化武装之坚强部队的创立；在政治上，必须改善政治机构，促进省、县、区民意机关之建立，普遍地发动和组织广大民众积极参战；在经济上，必须加紧创建国防工业，调整战时财政金融，提高工、农业生产，而同时采取各种有效办法来保障与改善人民生活。而一切军事、政治、经济的改进均有赖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继续的巩固与扩大。凡此诸项均于中国共产党数年来之文件宣言（如一九三五年八一宣言，去年九月发布之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去年十二月中共中央对时局宣言，及本党各领导同志及同人等之言论主张）中反复详述，想已为国人所周知。我们在积极参加国民参政会的工作中，当忠诚地执行本党中央的一切指示，继续地为实现本党抗战时期中的各项主张而努力。

国民参政会首届会议开会之际，敌人的铁蹄已走进了中州原野，江淮河汉之间也弥漫着敌人的炮火，皖赣两湖受着敌骑的威胁，武汉成为敌人急切窥觊的目标，因之，我们认为最急迫的问题莫过于如何保卫武汉与取得第三期抗战的胜利。

目前我们认为最紧急而有待于迅速提出方案以求解决的，大约有下列各问题：怎样动员军力、人力、财力、物力来保卫我们军事、政治、经济、交通中心的大武汉及有效地进行第三期抗战；如何改革目前流弊百出的征兵制度，而代之以广大的政治动员之征募办法，以期我国军队有充足的民族意识坚定的

战士源源补充，同时使创立新军的事业得以迅速而有效地进行；如何采取具体的方法使真能达到“有钱者出钱”的目的；如何保证最低限度人民生活之改善，以期使有力者可以出力，如何普遍的发动民众、组织民众，同时，在抗战和民主的一般原则下来统一民众运动和民众组织；如何确保人民言论、集会、出版、结社之自由及保证各抗战党派之合法权利；如何能够真正有效的训练青年，使他们能够担当抗战建国的干部底责任，以期克服现在许多青年训练班令青年失望的现状；如何改善各级政治机构，首先是县及其以下的各层机构；如何认真地推行地方自治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是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和为争取抗战胜利的必要设施。我们将在参政会内与各方意见相同之人士共同陈述意见和提供议案。

在敌寇猖狂的今日，我前方将士正为维持中华民族的生存独立而浴血的奋战着。在伟大壮烈的民族战场上，我们成千累万的将士，不分党派，不分界限，互相帮助，一心一德的把枪口向着敌人，把自己的热血光荣地汇流在一起。我们相信：在国民参政会的议场中，将与我们民族解放战争的战场上一样，所有的参政员绝不会有“在朝党”和“在野党”之分歧，绝不会有党派门户之偏见争执，相反地，将会不分党派，不分地区，泯除一切隔阂，而共同一致地将自己的努力用以帮助抗战最后胜利的争取。因为：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所颁布的抗战建国纲领，不仅本党认为其战时施政方针与本党在抗战时期的纲领在基本方向上是一致的，而且其他党派亦曾表示赞同。国民政府及其坚持长期抗战争取国家民族最后胜利之国策，亦为全国人士所一致拥护。在这样基础上，我们相信：国民参政会的工作，当可预期于和睦友谊的空气中获得成功。

最后，我们——共产党员的参政员，并不因为国民参政会之未经人民的普选而丝毫推诿在全中国人民面前的应有责任。

我们深切了解：国民参政员是人民的公仆，是人民的使者，是人民的代表，我们将忠实地遵循人民的训示和人民的意志而努力工作，我们将确定地为中国人民的意志、愿望和要求的实现而奋斗。我们确信：巩固民族团结，驱逐日寇出境，是中国人民今天最迫切的要求。我们将不倦怠，不畏难，坚定忠诚地为着完满地实现这个最迫切要求而在国民参政会内及会外去努力奋斗。我们希望着全国人民无论个人或团体给我们以训示，给我们以帮助，如果我们有错失，更希望给我们以批评指责。我们希望我们及全体参政员在全国人民的援助督促鼓励及批评之下，能完成国民参政会及每个参政员所负担的神圣的民意机关和人民的代表的职责。

毛泽东 陈绍禹 秦邦宪 林祖涵⁽¹⁾
吴玉章 董必武 邓颖超

七月五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刊印。

注 释

〔1〕即林伯渠。

中共中央为 抗战一周年致蒋介石及 全国抗战将士电

(一九三八年七月六日)

蒋委员长勋鉴并转全国抗战将士公鉴：

当此伟大抗战周年纪念之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谨向最高统帅蒋委员长暨全国抗战将士致以无限热诚之慰问与无限崇高之敬礼，并向一切死难烈士致以无限衷心之哀悼。溯自卢沟桥事变以来，蒋委员长，统筹全局，前线战士，英勇奋战，各党各派，精诚团结，全国人民，协力救亡，用能前仆后继，屡摧强寇，使我民族精神为之振奋，国际视听为之改观，最后胜利之始基为之奠定。凡此丰功伟烈，实属超越前史，永为国人所矜式。当此寇入日深，国难未已，保卫武汉、保卫华南、保卫西北与猛烈发展敌后游击战争为紧急任务之际，深信蒋委员长及全体将士必能再接再厉，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与坚持持久战，本一年之经验，作艰苦之斗争，动员全民力量，一德一心，以争取最后之胜利。同人等，本此信心，号召全党同志，立于抗战之最前线，为保卫祖国流最后一滴血。号召全国同胞，进一步精诚团结，有力出力，有钱出钱，积极援助前线，一切服从抗战，为民族国家之最后解放奋斗到底。不达目

的决不停止。谨此电达，诸维共鉴。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七月六日

根据一九三八年七月十日《新中华报》
刊印。

陕甘宁边区政府一年来的政况*

(一九三八年七月七日)

林 伯 渠

陕甘宁边区政府及其所统辖之县、区、乡各级政府，在中国算是首先试行真正普选的民主制度的政府，也可以说是首先依照孙中山先生手定的宪政政制建立地方自治的模范区。今天边区政府之一切行政措施及建设事业，所以被全国人民目为抗日的模范区域之一，显然不是偶然的。兹分述之。

一、沿 革

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在一九三〇年即已在中共领导之下，开始建立苏维埃和红军。一九三五年秋会合了由鄂豫皖经陕南而达陕北之红二十五军，是年冬，复有由江西北上抗日之红军主力——第一方面军汇合于此，成立了中华苏维埃西北办事处。至西安事变前夜，有辖地十八个县（旧县界），一百二十五个区，人口约九十五万。境界则东起黄河，西止固原，南达淳化、栒邑，北迄横山以至神府，面积约三十万方里有奇。

中共早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目击日本帝国主义所加于我民族国家的灭种亡国的危机，即提出了向全国人民和军队呼吁“停战”、“抗日”的号召。一九三五年又发出

* 本文原载一九三八年七月七日《新华日报》。

有名的号召全国人民，不分阶级、不分党派、不分畛域、不分宗教信仰结成一致的内求团结外求抗战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八一宣言》。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民党举行三中全会时，中共曾电陈五项建议和四项保证，以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国共两党之重新合作。“七七事变”的前夜，中共负责代表在庐山谒蒋^①委员长共商救国大计时，蒋委员长当时曾指明三点，即：一、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二、苏维埃西北办事处改为普选的民主制度的边区政府，并由中共方面推举边区政府负责人员名单，由中央政府加委；三、中共发表与国民党共赴国难宣言后，蒋委员长发表承认中共合法地位的谈话。从这个历史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今天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所以由苏维埃制度改为民主制度及一切政策设施，更合于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最高原则，又复早得到蒋委员长的允准，同时也是本着中共历来的“抗日高于一切”的主张。因此，陕甘宁边区政府无疑属于国民政府统治下的地方政府，这是很明白的事，也是无容争辩的问题。

二、边区政府做了什么

第一，人民获得了民主自由权利。

边区自去年六月间召集了边区人民代表成立议会，选举了边区政府的负责人后，即从事由下而上的经过普选的民主，由选民投票选举了各级政府的负责人（乡长、区长、县长）。一年来，对少数不称职的行政人员，也实行了选民的罢免权，由选民提出弹劾，予以撤换。其余一切抗日救国的群众团体（如民众抗敌后援会、西北青年救国会、职工会、农民协会、学生会、妇女协会……等）和合作社之类的组织，均一律实行自下而上的民主制度，赋予人民以选任和罢免之权。

在边区内，国民党派有特派员，共产党尽一切可能帮助建立边区各县国民党的县区各级党部。由此可见，边区不但实行了普选的民主制度，同时也成为抗日的各党各派精诚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验区。

在行政系统内及一切国家机关群众团体中，均以“廉洁”、“尽职”的原则为选任和鉴别干部的标准。边区一切行政人员和一切工作人员，从最高负责人至下层工作人员，都是领着等于普通劳动者工资的薪水，克己奉公为民众倡导。对公众财政的出纳，设有由民主选出的审核委员会的组织，担任经理财政的机关和负责人须按时向自己所属的群众公布报销，同时审核委员会也有随时调阅财政机关账目之权。经过这种完全民主的办法，的确营私舞弊的现象是很少发生的，即使偶然有个别的贪污的事情发现，群众很快就可以发觉，毫不客气地和他斗争，追回贪污的钱，罢免贪污分子的工作，立即重新选任更好的人员来管理。

第二，热烈的抗战动员。

因为边区近百万的人民获得了民主自由的权利，因此，也就改变了他们以往对政治问题冷淡、对国家政权仇视的态度。在全面抗战的今天，他们用最关心的态度来注意每一政治事件的发展和各级政府对于他们利益的维护。换句话说，边区人民已经认识了政府是他们自己的政府。当政府每一政治动员和号召发出之后，他们总是以极大的热忱来回答的。如去年“七七”事件发生以后，全边区人民经过各种动员的方式很快就了解并接受了政府抗战救国的一切解释和动员令，在很短时间内，各界各职业的救国团体——职工会、农民协会、学生会、商会、妇女协会、自卫军、少先队、儿童团，全用突击的精神加以整理，并健强其工作。特别是当太原失守时，沿河人民热烈地帮助守军完成河防工事，动员壮丁上前方补充八路军，以

及踊跃地加入地方的武装组织——自卫军、少先队，参加地方戒严，肃清汉奸敌探……等工作，处处都表示他们是有足够的力量来发动和配合全国的抗战工作，以实现“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光荣任务的。

第三，相当地改善了人民的生活。

在经济动员方面，也因为边区人民政治认识的提高，而且已经照孙中山先生民生主义中“耕者有其田”的政纲，使劳动农民都获得了土地，因此，改变了他们过去对劳动的态度。他们认识了今天的劳动不是像从前一样，只是替剥削者造幸福，而自己却劳而无获。正是如此，他们更认识了要保障已得的利益，保卫自己的家乡，保卫自己的国家，就只有首先打倒日寇，驱逐日寇出中国。因此，他们在政府领导之下，更积极地加紧后方的动员工作，以配合前方将士的英勇抗战。

这种高度的抗战情绪，更表现于边区各种生产事业中。边区的生产，当然是以农业为主，在地瘠粮缺的地区，增加粮食生产差不多是最重要的事。一年来，边区政府在禁种罌粟的运动中，即已增加种植稻麦的耕地面积约占“川地”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以至由于农民获得土地而改变了劳动态度，提高了劳动热忱，因而加量的施放肥料，勤奋的耕耘、刈草与灌溉的结果；同时政府方面又实行代购耕牛、农具、种子，帮助贫苦农民和抗日军人家属广泛地开荒种树，奖励努力生产的政策，也都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以一九三六年比一九三〇年的秋收量，约增加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五十。这对于边区因日渐增加人口所增加的食粮供给，是有重大意义的。

边区是经济落后的地区，还没有大规模的工业生产，规模较大的而且于国防上非常重要的延长煤油矿，有四五百个工人，除依靠原有那点已锈坏不堪的抽油机和熬油锅外，全系用人力在工作着，曾经有一个时期，日出四五百斤糙油，然而因

资金缺乏亦无法扩大生产。这在抗战的今日，是一件值得国人注意的事。

盐池的池盐，无定河流域的晒盐，遍于陕北的煤矿及牛羊皮革，定边、盐池的枸杞、甘草……等，年来也在边区政府积极发展和奖励生产之下，提高了产量，如不是因交通过分梗塞，这些生产品将足以供西北以至全国许多地方之用。

边区政府为了有计划的改善人民的生活，除积极地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之外，还努力发展着合作社运动，如农村贷款合作社，已有基金二十万元（上述代购耕牛、农具、种子的费用即出于此）。由人民自愿集股组织的消费合作社，也有突飞猛进之势。至最近为止，全边区已有消费合作社大小共一百五十五个，股金总数已达七万九千四百七十元，包括社员八万人之多。生产合作社虽然较少，然而由于边区政府积极帮助扶植，也在日益发展中。现在延安市已有缝被服、制鞋、木料、瓷器、制糖等各种生产合作社，最初出品虽然粗劣，然而进步之快却出乎意外。如有一木料工厂，开始仅由三个木匠工人发起，向合作社借去基金一百二十元，经过四个月後，基金即已扩充到九百三十四元，超过原有基金四倍。由此可见，边区人民从自己提高了对劳动的热忱和努力从事于合作社运动中，不但有效地抵制了奸商的垄断居奇，同时也大大地改善了自己的经济生活。

建设厅为了建设国防公路，或发展边区交通事业，虽然处在财政拮据的条件下，也动员边区人力物力完成了咸榆公路之延（延安）绥（绥德）段的开筑。

第四，实施抗战教育。

在教育方面，边区可说是我国实施抗战教育最早的地区。年来因边区政府在教育方面，能以抗战教育为中心，且力求适合战争的环境，提出“政治与军事并重，理论与实践配合”，以

及选择课材时“少而精”的教育方针，一方面提高了学员们“求知”的浓烈兴趣，另方面也就收到了“速学易成”的效果。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等学校，年来培养了成千成万的有用的抗战干部，以供各地抗战救国工作的需要。

教育厅为了有计划的提高边区人民的文化水平，发展文化事业，差不多已在全边区的每一个乡建立了一所小学或者一所俱乐部。为了提供全边区的小学教师，并举办了一所鲁迅师范，现在鲁迅师范经常能招收四百学生，分为八个班。去年边区教育厅利用农暇的机会，发动了一次冬学运动，结果由于鲁迅师范学员的积极努力，与边区人民自觉求知的情绪，冬学运动收到很好的成绩。如原来计划只成立冬学四百所，结果成立了六百所。鲁迅师范为了足够的供给冬学运动的教员，还添办了一次冬学教员训练班。冬学运动，一时普遍地出现于每一穷乡僻壤的村庄。

因为冬学运动采取了教育与行政打成一片的方针，不但各区乡政府大力帮助与扶植了冬学运动的发展，而政府的各种动员工作也因为冬学教师的深入乡村，取得了工作上的配合，而使政府的每一动员都收到应有的成效。

新文字（拉丁化的新文字）在边区虽然不是发明的地方，而且推行也较上海、北平等地为迟，然而一开始便获得政府方面赞助的，却首推边区了。正因如此，边区的许多小学生，大多能以新文字来写信记事了，在边区的文化运动中新文字之于方块汉字，却有了“后来居上”之势。当然，边区青年和人民除学容易学会的新文字，以迅速提高文化程度和供实际应用外，同时也学习中国的旧文字。

此外，边区的教育从去年冬学运动以后，已建立普遍的平等教育制度，凡不识字之成年男女，或已及龄的幼童，均须入乡村小学和补习小学，期于短期内消灭文盲。因为教师全是义

务工作，且有政府资助，故一般的都办到了免收学费。前之“不得校门而入”的穷苦人民，现在也一样的享受平等教育的权利了。

第五，人民有了自卫力量。

边区人民的武装自卫工作，可说有了很久的基础，现在他们更知道国家到了这样危险的地步，挽救民族危亡的责任是何等重大，所以他们都懂得必须组织起来、武装起来，才能担荷抗战卫国的责任。

边区自卫军的成员，是规定凡年龄在十八岁以上、四十岁以下的青年壮丁，不分男女，除了在政府或其他公共机关群众团体的脱离生产的工作人员、学校教员和缠脚妇女、残废患疾者外，一律经过政治动员相当了解必须武装自卫的意义后，并取得本人的自愿才加入的。按照正规军的三三制编制，利用农暇或雨天进行军事训练。训练的课目，注重实战教练（如装退子弹、瞄准、射击、利用地形地物、测量距离、赛跑、爬山、田径赛之类的动作），教员多由各级政府的军事部人员担任，并在平时归其指挥（全边区则统归边区保安司令指挥）。对其中受训较久、体力较强的自卫队员，则另组织自卫队的模范营连，施以定期的（一星期或一月）集中训练，予以实弹射击和野外演习打野营等的实习训练。凡经过了这种训练的，补充到八路军和其他军队去，便可当成熟练战士调用，在地方上也可随时调度以应紧急事件，战争发生时即可成为游击队。在这种模范自卫队内还有一部分较好武器，如步枪、驳壳枪、手榴弹之类。

地方戒严、路口盘查和缉捕汉奸敌探的工作，自卫军是负了极大的责任。

第六，优待抗日军人家属。

边区人民过去即有优待红军家属的制度，在全国总动员一

致抗战的今天，为了动员一切壮丁自愿地抛妻别子，上前线去与敌人拼命，使前线战士安心杀敌，在边区民政厅的领导之下，开展了极广泛的优待抗日军人家属的运动。

因为大家都有自己本身的工作，便规定每星期六的下半天为义务劳动日。在这天，凡边区的政府人员，学校师生，一切未上前线的壮丁，及愿意参加的男女小孩，按照各人的劳动技能，编为各种义务劳动队，如耕田队帮助抗属进行耕种的劳作，杂役队帮助抗属扫地喂牲畜或挑水、煮饭、洗衣……妇女生产学习小组，则是教授抗属妇女学习耕田、缝纫……等生产技能，甚至砍柴、捡粪，无论大小事情都不怕没有人帮忙。

抗属如有困难，或缺粮少盐、生病婚丧等事，区乡政府还可临时动员民众或举行捐募以解决之。消费合作社出卖物品给抗属时，一律照价九折，并与股员同等享受购买的优先权。

区乡政府除了经常派人向抗属慰问外，有时还单独召集抗属举行晚会及聚餐。在晚会上，报告前线的胜利消息及战士们生活情形，并帮助写家信，由公家付邮票钱。在平时的集会或演戏剧时，多让抗属坐前排等。

第七，组训青年和妇女积极参加抗战工作。

边区内的一切工作中都证明发动青年积极性的重要，事实上也没有任何一件工作不是依靠青年积极向上和勇于任事的精神而能获得成效的。因此，边区政府经过西北青年救国的各种组织进行了适合青年要求的政治训练，提高青年的民族觉悟，养成青年的集团生活，给青年以军事知识的教育和军事技能的训练。一年来，边区一切为抗战救国的动员工作，充分的反映着青年的积极作用。

至于妇女工作，边区政府根据妇女的特殊环境与要求，把全边区妇女组织在妇女协会之下，使她们有平等的学习机会和参政的权利。特别是抗属妇女，在整个妇女运动中起着模范的

作用，她们不但鼓励自己的丈夫、儿子英勇上前线杀敌，自己也往往就是后方增加生产的模范。

边区政府为了给抗属妇女中的进步分子以更高的教育，形成为妇运工作的中心骨干，还开办了抗战军人家属学校一所，现已有学生二百余人。

的确，经过了这种政治的社会动员工作后，不但改变人民“好男不当兵”的旧观念，还引起了一般人羡慕抗属光荣的心理，大大地巩固了前方抗战将士的情绪，提高了抗战部队的战斗力，逃亡现象更因之大为减少。

这些不过是荦荦大者，至于其他发展文化事业，建立民众医院……等问题，亦均次第举办。

三、对误解和造谣者的答复

现在有极少数顽固分子，有意歪曲事实，造出种种似是而非的谰言，以挑拨边区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察其用心，不外是想给这个坚决抗日的模范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源地以污蔑和破坏，达到其破坏民族统一战线、效忠于倭寇的目的。这些少数顽固分子所借以为口舌的约有下列数端：

第一，污蔑边区政府为“封建割据”。

这种污蔑边区政府为封建割据的谰言是毫无根据的。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了，边区的形成，不但是本着中共“抗日高于一切”的主张，不但符合于孙中山先生手定的宪政政制，而且是经过蒋委员长指示和批准的。至于它实现了在中国最进步的普选民主制度，使全边区人民获得真正的民主自由权利，而大大的提高了参加抗战的热忱，这正证明边区政制进步的模范作用。我们希望在全国都能实行这种真正民主的制度，这是“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最好的保证。

第二，以中央政府尚未加委，谓边区政府的不合法。

在边区内人民大多数的意志，皆以边区政府是经过自下而上的人民普选产生的，自然为全边区九十五万人民所拥护爱戴，这是毫无疑义的。至于中央政府加委一节，原则上中央政府最高负责者曾经再三核准，只以物色主席人选问题等，致牵延了时日，这也不过是中国政府行政所常见的事情。当然我们是希望中央政府能从速解决，而且是可以从速解决的。

第三，所谓“两个县长”。

在西安事变前，本来有好些县全为苏维埃统治区，有些县仅剩一个县城，而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时，这些县已划为八路军的防区，因此，原有的县长既未调走，而苏维埃政府又已改制为县政府，且多已迁城内办公，致发生所谓“一县两长”的事情。其实这是少数县份的临时枝节现象。我们过去因每日等候中央政府对边区问题明令的发表，所以未便解决这一问题。这一问题，只要中央政府对边区问题明令一发表，便可立即合理解决。

第四，所谓“苛捐杂税”。

事实上，边区政府恰是取消了苛捐杂税，当然并不是取消了“一切捐税”。因此，有少数破坏分子专门以“边区还有苛捐杂税”的话，来挑拨边区人民与政府的感情，这完全是无耻的谰言。边区政府为了解穷苦人民的负担，豁免了不少种数加于贫苦人民身上的苛捐杂税，而代之以“有钱出钱”的合理的累进税则，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至于人民因为得到了政治的、经济的利益而自愿的缴纳救国公粮，这正是证明边区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密切联系，决不是苛捐杂税可比。

第五，谁鼓动“阶级斗争”。

自边区政府依普选的民主制度改选以后，边区政府已允许以前土地革命时逃走的地主富农回原籍居住，边区政府并公布了回籍的地主富农一律照平分土地的比例由政府按人口给以劳

动份地的法令。这种办法，当然是最公平的。然而有少数的破坏分子，却以为这是继续“阶级斗争”，挑拨回籍的地主要索回原有土地，恢复封建剥削。这些分子的方法，恰倒是有意在鼓动“阶级斗争”，破坏抗日后方的秩序。

四、向中央政府和全国人民呼吁的几点意见

第一，事实证明，只要能给人民以民主自由权利，就是像边区这样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的区域，也能发挥这样广大的抗战力量。因此，我们希望中央政府及全国人民对边区政府应给以鼓励，并希望能以边区现行政制为榜样，次第推行全国。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竭诚欢迎各地政府和人民团体派代表来边区参观，并愿接受各方善意的批评和交换在抗战动员方面的许多宝贵经验。

第二，建议中央政府从速解决主席人选的问题，并依法加委。

第三，边区有丰富的物产，尤富于军事工业原料的宝藏，在抗战建国的今天，我们竭诚欢迎海外侨胞国内巨富投资开采。

第四，边区地广人稀，耕地广阔，希望中央政府及各救济团体，资助难民同胞到边区进行开垦事业。

第五，希望全国各界同胞，对边区的文化事业、经济建设事业多方予以人力、物力的援助，俾边区政府有足够的力量担负起西北国防的一部分重任。

根据华艺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林伯渠文集》刊印。

注 释

〔1〕指蒋介石。

刘少奇关于晋察冀根据地工作 给聂荣臻、彭真的信

（一九三八年七月十日）

荣臻、彭真二同志：

你们送来党代表大会的文件及大批材料，均收到。这些材料我们都看过了。一般的我感觉到你们在各方面的工作都做得很好，很对。我前次交龚逢春同志带给你们及冀中省委的信，想你们已经看过了，所以我在这里关于一般的问题都不说了，我只说到以下的一些个别问题。

第一、对于士绅地主的态度问题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要联合与争取一切愿意抗日的人抗日。在这里，士绅地主之愿意抗日者，也包括在联合与争取之内。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环节，在已有组织的政党与实力方面来说，是国共两党的合作以及一切抗日党派和抗日武装、抗日团体的合作；在社会群众基础方面来说，是联合与争取广大工农小资产阶级群众到抗日阵线上来。在你们那里，各种不同的政党和武装部队，并没有很多，并不很复杂。因此，你们统一战线的对象，直接联合各党派、各武装部队的问题，比其他地区来得要小；而社会群众基础方面的统一战线问题，就显得更重要。我觉得把士绅地主摒之于抗日统一战线之外，

在对日抗战中即刻与过早的牺牲士绅地主阶层，是不对的。但同样，把抗日统一战线的主要对象，放在联合与争取士绅地主身上，也是不对的。

在你们那里，在最初一个时期是多少犯了前一种错误。某些过左的政策与行动是过多的牺牲了士绅地主阶层的利益。来一次纠正，是完全必要。但在纠正这些错误时，似乎又有偏向后一种错误的危险发生，比如在你们的文件上屡次说到：争取地主资本家和我们共同抗日，是边区党政治上的中心任务，许多地方单独提出联合地主士绅的口号和说法，并且要尽可能吸引士绅地主参加政权机关，参加农会的会议等。在许多地方似乎要说，应设法使士绅地主团结起来，使他们能参加或者建立何种组织。同志们！我觉得从这些文件出发，就可能使下层的同志把统一战线的主要对象，放在地主绅士身上，不知不觉的忽视广大的工农小资产阶级群众，并牺牲他们的利益。

在黄敬同志报告中说：在经济斗争错误倾向纠正的过程中，群众就显出疲惫、情绪低落的现象。这是值得注意的。现在就是要纠正一些过右的错误，不要使群众的情绪低落，不使地主豪绅反对工农的气焰抬高，不要使工农小资产阶级群众有这样的感觉：共产党以及边区政府对地主士绅亲热，而对他们表示疏远。

如果着重提出联合与争取地主士绅，而没有着重提出联合与争取广大工农小资产阶级，就有可能使一些同志对地主士绅特别亲热，而对群众疏远。我们应该明确的确定的方针与中心任务，是联合与团结广大的工农小资产阶级群众，同时，不过分的伤害地主士绅，以便尽可能联合一些地主士绅抗日，或至少不积极反对抗日。党的口号，还是争取与联合一切愿意抗日的人抗日，不要单独提出联合地主士绅的口号。

对于过左的过分的伤害地主富户的政策与群众行动，是应

该纠正与向群众解释的。使地主富户在边区能够生活，能够安居，从而使他们援助抗日，至少不反对抗日，但也不要故意在政治上、社会上，尤其在精神上和各种组织中，着重的去提高地主士绅的地位，因为：（一）他们原来在各方面都有很高的地位与权力，用不着再提高。（二）他们参加政权机关及各种组织，是要企图操纵政权与群众团体，以适合他们的利益。结果，会使政府与群众团体毫无生气。（三）地主绅士地位提高，就要压落工农的地位，阻碍着工农抗战的积极性。

地主富户士绅在乡村中有深厚的基础，在历史上就有一切办法去操纵乡村中的一切，现在虽然在某些地方动摇了他们的地位，但他们还有一切办法去操纵。他们可以在反对与批评你们的态度之下去操纵，也可以在联合你们“积极抗日”、“拥护政府”等态度之下，取得政府及群众团体的地位，去操纵乡村中的一切。现在你们还是要继续打破这种操纵，而不是去巩固与恢复这种操纵。要在发展群众运动、提高群众政治文化水准、实行民主制度等办法中，逐渐打破这种操纵。

虽然在政府机关及抗日组织中，不要故意去排挤那些真正积极抗日的地主士绅（有一些有力量的真正抗日的士绅来参加是好的），但也不要故意去一般的提拔地主士绅，吸引到他们去参加农会的会议，更不妥当；团结与建立地主士绅的阶级组织，也不妥当。在抗战中，不是要去巩固与扩大地主阶级的力量和团结，而是要在政治上孤立与分散他们，不过这种政治上的孤立与分散，是要在“团结抗日”的口号之下来实现。他们不积极抗日，不团结，兢兢于自私的利益，加紧反对积极抗日的工农与政府等，他们就孤立起来。过左的政策与行动不能孤立他们，相反，更要促成他们的阶级团结，以及取得社会上某些人对他们的同情。纠正过左的错误，不是为了使他们有阶级的团结，而是为了孤立与分散他们（开始吸引一些能与我们合

作的积极抗日的地主士绅和我们一同走，并且中立他们中之一部分，孤立他们中之顽固分子)。

关于这个问题，你们似乎还有在党内干部中解释的必要。当然在文件中不要说孤立什么人的话。

第二、关于民主政府与公开文件的形式问题

你们那里的政府，是在敌人后方的中华民国的地方抗日政府。它采取了许多办法，实行了许多政策，以加强政府与人民的联系；它取得广大人民的拥护以从事抗战，并直接依靠广大群众的武装力量，同时，根据中央政府的法令进行统治。但它在组织上与制度上还是不够民主的，它还不是由广大群众的直接投票所选举，而且就是国民政府所颁布的自治法也没有能够实行。所以现在就称你们那里的政府为民主政府，还是不够的。这是一。

第二，现在国民党与阎锡山都还不主张组织民主政府，人民的民主政府是共产党及其他小党所主张所提出的口号，是我们在抗战中努力要达到的目的。但是这样的政府，不论在你们那里、在全国都还不能做到。目前在你们的文件上屡次称你们现在的政府就是人民的民主政府，使得国民党与阎锡山看了都不满意，都以为是共产党包办的政府。

称为统一战线的政府，也是一样。国民党与阎锡山至今还不愿承认“统一战线”四个字，也还不容许和各党各派共同组织统一战线的政府。如果说是统一战线政府的话，他们就认为政府不是他们的。

因此，在你们的宣传上，在政府及其他公开团体与机关的文件和口号上，应以少说或者不说“民主政府”、“统一战线政府”等语为好。相反，应用三民主义及阎锡山按劳分配主义的

语句。

某些部队机关和团体以及个人，如果是阎的或国民党的，那些部队机关团体和个人就应该说阎与国民党的话，在它们的文件口号上就应多用国民党与阎所常用的术语，少用共产党及马列主义的术语，如国共合作、肃清托派、民主政府、统一战线等名词都是共产党常用的术语，他们应该避免一些。

自然我不是反对你们那里的政府更民主化，反对你们去加强各部队、各团体机关中的工作，并且进一步的掌握它们。你们必须这样去做。但当你们这样去做的时候，偏要少这样说，而应该那样说，然后，你们才能更好的去这样做，这就是你们的力量要更掩藏一些。新的内容要用旧的形式表现，用阎与国民党的形式表现。这虽然是形式，然而对你们、对全国的统一战线都很要紧。特别对于秘密工作要紧。

第三、关于政府组织的问题

为了使你们那里比较巩固的地区之地方政府的组织更进一步的民主化，县市政府以下可以根据国民政府的地方自治法令来组织。在这种法令上有县参议会、市参议会、区民大会、区民代表大会、乡民镇民大会及区乡监察委员会等，并且规定一切公民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诸权（载民国二十五年《申报年鉴》），并可将区公所改为区署，加强区乡政府的工作能力与自卫能力（民国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南昌行营颁布之“改设区制，健全地方行政组织办法”——二十五年《申报年鉴》）。

这种制度，在你们那里自然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做好的，而须要经过很好的解释教育与动员，并须经过相当长时期的锻炼才能做好，但我觉得在比较稳定的地区能够实行，并于增加政

府权力与威信有益。至于在路东以及其他游击区政府的组织，自应简单些，正式的选举或者难于进行，仍然可以采用当地各团体代表推选政府的办法。

在这种地方自治办法实行以后，邻、闾、乡、区均有居民大会及代表会，一切权力应归于这种会议。如是，农会、牺盟等代替政府的事情，就可减少。一切公民即可经过这种会议去实施自己的权力。同时，这也是统一战线的最好形式。

某些高级官吏、军队中的某些个人及个别部队轻视地方政府与不遵守政府法令的行动是应该反对的。因为这与建立民主政府的方针相反，这种行动的普遍发生，必然的要使人民感觉自己没有权力，民主政府无法建立，而且要使人民、政府与军队发生对立。

第四、关于民众运动问题

关于民众运动，因为许多干部与积极分子参加到各个战线上工作去了，如是，民众团体本身的工作就不得不削弱些，这固然是没有办法的。但是现在你们建立各团体比较健全的领导机关，是真正去组织群众与教育群众的必要条件。要真正的去组织乡村群众，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这需要切实的、不怕麻烦的、深入而活泼的工作。因此，培养一批这样的群众工作干部，并且不随便调动他们，是很必要的。

我想省委应分别讨论工会、农会、青年、妇女等团体的工作，分别规定各团体的计划，并动员各级党部协助这些团体。然后才能使各团体真正的建立起来，并在各方面表示他们的作用。群众团体的经费，也是必须协助的（由政府或由党协助），完全不给他们经费，他们就很难工作。但协助他们一些经费，对政府来说，也不会是怎样折本的事，群众运动的正确进行，

常常能在各方面协助政府解决财政的困难。在这里应该把我们的目光看远一些。

此外，各个群众团体设法自己筹一些基金，也是可以的。

群众团体要经常维系群众，必须去经常注意群众的切身生活问题。即使是很小的群众的切身利益，群众团体都必要注意到。但是，一次提出过高的要求，对于动员与组织群众，并不是经常都很好的办法。而应陆续的一次一次的逐渐的去改善群众生活。

改善群众生活，是有几方面的办法：如向雇主、地主、富农要求加资、减租、改善待遇，以及由政府实行某些政策，以保障群众生活，和群众团体举办一些对群众有利的事业等等。自然你们现在改善群众生活，是要从多方面去进行。你们已有这种多方面进行的可能，而不应简单的只是从牺牲雇主地主利益的观点上去进行。但你们也不必把群众向雇主地主要求改善生活的斗争称为“消极的办法”，而对其它办法称为“积极的办法”，因为这样的名词，似觉带有鄙弃前一种办法的意味，在下面就可能发生用这样的名词去压制群众斗争的现象。

此外关于所谓“农业生产合作制度”，在农民中组织“劳动纪律突击队”等，我觉得这都是一些空洞的名词，而这类空洞的名词，对于农村群众，对于幼稚的党员去大堆的使用，是很不适当的。这只有把农民的头脑弄糊涂。自然，在农村劳动力缺乏的情形下，号召农民在生产中互相协助是很好的。但是现在农业中组织任何类似集体农场的所谓“集体生产”，都是不对的；在独立小生产者的农民中去组织“劳动纪律突击队”，也是完全不可能的。这些是社会主义建设时代的劳动方法，当然不能搬到你们那里的农村中去使用。

第五、关于党的工作问题

在你们那里党的组织任务，应该主要是巩固与严密党的组织和教育训练新党员。这需要很有计划的来进行。最近送给你们的材料，有一些书籍是可以作为教育材料的。你们党内刊物，也应供给许多新党员以教育材料。

目前，一个铅印所对于你们是很重要的，你们要设法创办。路东有一个印刷所，是否可以搬过来。这是严重的政治问题之一。

在党的组织还薄弱的地区及某些区乡，至今还没有支部组织的，以及某些部队、机关和企业中党员还很少的，都还要继续发展党员，建立支部。但在党员已有大量发展的地方，可以暂时停止发展，专作一时期教育训练。

在党的秘密工作上，可分作两种来说：一是对敌人的秘密，这是需要绝对的秘密，这对你们不是今天的主要工作方式，只是在敌人地区是主要的。二是对同盟者的秘密，这是只在党的组织工作上的秘密，但在各个地区都应注意。目前，你们第二种秘密工作很不好，你们的党内刊物及许多文件，都公开说政府的党团工作、群众团体的党团工作，以及无论在哪里都能暴露出你们的组织状况。这是必须留心的。现在山西已有一些党员因关系暴露被捕，队伍被缴械，机关被解散等等。如果你们那里的关系暴露太多，将来在长期抗战中，也许要发生你们意料不到的事变。某些机关的被改组在你们那里还是完全可能的，望你们严重注意这一点。你们的文件和党内刊物，不要写组织状况，不要随便去谈政府工作及某些群众团体的工作；如果要谈，就必须站在第三者的地位去谈。

（略）

最后关于武装部队的工作，因为在你们送来的文件中，缺少部队这部分材料，所以我也不说了。不过我认为你们那里游击战还应该是作战的主要方式。你们部队正规化，但作战还似应以游击战争为主。

下月初我们还可以送一些干部到你们那里，但你们要准备成立冀东省委。致以
民族革命的敬礼！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毛泽东等关于对阎锡山的 统战工作问题给朱德、 彭德怀等的电报

(一九三八年七月十四日)

致朱、彭并致朱瑞同志：

彭十二日电收到。

(一) 阎扩军计划应表赞助，但扩军三十万不能完成。

(二) 劝阎将牺盟改为三民主义青年团恐不能实现。因依照三民主义青年团章程，蒋^[1]要委派各级团长，而阎必然拒绝，同时阎对劝告人也将生疑心。

(三) 阎梁^[2]已怀疑他的新势力中有共产党，因此秘密工作尤其某些特别关系必须十分警戒，禁止公开工作人员随便写信，对违反一切秘密工作的行动须给以处罚。

(四) 严格通知各公开机关团体与阎之部队中工作的同志，多说阎锡山的话，在文件口号宣传上多用阎之按劳主义的术语，少用马列主义的术语，如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民主政权等语，不要公开机关和团体使用。过去用他们名义所写的这些口号要洗去，在表面上使阎的中心思想被尊重，减少阎的怀疑，但在内容上要维持我们抗日救国的内容。

(五) 闻六区行政主任续济川已被调动，确否？代替者是谁？望告。

毛、洛、胡^[3]

十四日

注 释

- 〔1〕指蒋介石。
- 〔2〕指梁化之。
- 〔3〕指张闻天、刘少奇。

论秘密工作及其与 公开工作的联系*

(一九三八年七月二十二日)

刘 少 奇

—

全国正在抗战中，国共合作事实上已经在基本上成立，我党的合法地位已大体上取得，似乎秘密工作对于我党已经是不需要了，或者至少是不重要了。然而实际上却不然。秘密工作对于我们依然还是很重要。最近许多地方由于我们同志在秘密工作上犯了许多错误，以致引起工作上和组织上的极大损失。因此我们的同志现在还要来研究在目前条件下的秘密工作。

我们现在有以下几种秘密工作：一种是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的地区与城市。在这里秘密工作是党的主要工作。虽然我们应该利用一切公开合法的可能机会去团结群众，但党的组织、党的活动，以及一切反日活动，都需要秘密。这是一种绝对的秘密。另一种秘密工作，是在中国内地、在许多友党友军管辖的地区。在这里公开工作与合法运动是党的主要工作。目前整

* 这是刘少奇写的党内工作参考材料《华北党的工作经验》的一部分。一九三九年，刘少奇针对本文写了一段文字：“这是去年七月对华北工作写的一篇文章，它虽然是在当时华北情况下提议的办法，但在今天也可作其他地方的参考。但这只能作参考，有些办法已不适合了。特此声明。”

个局势的趋向，是使党更加走向公开，党也要用一切方法去争取自己公开合法的地位（如党的公开代表，公开机关，公开机关报的设立等）。但是在党走向与争取公开的过程中，还要依据各个时期、各个地方的环境，保持党的所必需保持的秘密工作，特别是在党的组织上的秘密。第三种秘密工作，特别是在我党直接领导下的陕北边区及部队。为了防备汉奸敌探及某些阴谋破坏者，在某些部分的工作上也还需要秘密。第四种秘密工作是在八路军收复的某些地区。这些地区的军事政治暂时还在八路军与党的维持之下走向统一战线的形式（如河北现在的某些地区）。在这里不独有党的公开机关、报纸，还有党员公开参加地方政权。然而还有许多秘密工作须要保持。特别是要准备这些地区重复转入敌手之后的秘密工作。

但是中国的局势是在激烈的变动中，上述各种地区的工作条件都有互相转变的极大可能。我们应该充分看到这一点，并预先有准备的根据环境的变动来重新改组我们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配合。上述四种秘密工作，主要的是前两种。我这篇文章也只说到前两种秘密工作。

二

我党在敌占城市和地区的活动，虽然需要绝对的秘密，但我党在这些城市的工作条件，已经比抗战以前不同了。因此，我们在这些城市中的秘密工作，也比以前国内战争时期不同些。这些不同主要的我可以举出下列几点：

一、由于全国抗战和游击战争在这些城市周围的广大发展，由于统治这些城市的是中国人大家痛恨的异族日本帝国主义者，实行野蛮的帝国主义政策，所以在这些城市中广大的中国人民，是同情于反对日本统治者的斗争，并且提高了反对日

本帝国主义的勇气。因此党的工作与活动也更易得到群众的同情与掩护。

二、由于我党统一战线的方针与坚决抗日，并在全国与各党各派合作，消除了我党在这些城市中与某些中国人们的某些对立。过去某些反对我们以至陷害我们的人，现在大多数不陷害我们了，或者转向同情与赞助我们抗日。所以我们的活动，对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奸细需要绝对的秘密，但对中国人民常常可以半公开的进行。我们在这些城市中活动的范围与条件，比以前是要宽泛得多了。

三、由于这些城市的统治者是日本帝国主义，所以一切反日的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过去可以公开或半公开进行的，现在却不能进行了，或者都要秘密的进行。群众运动与群众组织可利用的合法范围比以前更小了（惟其因为可利用的合法机会更小，如果有可利用的合法机会，我们就要更注意的去利用）。

四、敌人虽然极力想在我们党内布置内奸，极力想了解我们党内的一切情形，但是他们今天对我党内部的情形还是相当隔膜的。

由于上述这些特点，我们可以说，在这些城市，党在群众中活动的条件尤其在社会上层分子中活动的条件比以前更好更宽泛了，但群众运动的条件就更狭小了。秘密反日活动条件更好了，但公开反日运动的条件更坏了。因此，党在这些城市中，建立秘密的反日小团体，在上层分子中进行某些联络工作，发行秘密的反日宣传品等，是可以的。但举行公开反日罢工及反日示威等，是不好的。在自发的形式之下，进行改善群众日常生活的斗争，是可以作的，但举行公开的政治运动是不好的。党的组织以及一切反日的组织是要绝对秘密的，但许多联系与教育群众的组织就要完全公开。

至于党在敌占地区及城市的政治任务，可以分作以下两种

来说。一种是暂时没有可能收复的地区与大城市。在这里党的任务是进行长期的秘密工作，聚集力量，隐蔽力量，以准备将来决定胜负的斗争，同时援助附近乡村游击战争。另一种是现在就有可能收复或进行游击战争的地区与小城市。在这里党的任务，进行秘密工作，动员与组织群众配合中国军队与游击队的行动，为推翻汉奸政权，驱逐日敌而斗争。由于这种任务的不同，自然也使得我们工作方式与组织方式有所不同。然而这都是一种绝对的秘密工作。

至于第二种秘密工作，对于我党同志几乎还完全是一个新的问题，一般说来，我党过去是没有这种工作经验的。因此，我们特别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是很有必要。有些同志不了解这种秘密工作与前一种秘密工作的分别，而把他们混淆起来，那是不妥当的。

我们为什么需要这种秘密工作？这不是由于我们愿意的，而是由于我们某些友党友军至今还不能完全谅解我们，还嫉妒我党的发展，还不愿意在组织上与我们正式合作，还有某些顽固分子企图在组织上陷害我们，进行阴谋破坏我党，甚至使我们去参加各种光明正大的救亡工作，参加各种救亡团体和机关，与诚心诚意的去援助我们抗日的朋友等，也常常不能以共产党员公开的面目出现，常常不能不在形式上掩蔽共产党员的面目，采取各种秘密的方式去进行。这对于我们是一件非常痛苦、非常遗恨的事情！当然如果上述各种现象能够廓清的话，我们自然不愿意保留这种秘密工作，但是无奈这些不合理的现象，总还存在着。因此，我们这种秘密工作也非得继续保持不可。

现在我们的一切工作与活动，差不多都是合法的，现在我们几乎不需要进行什么非法运动与非法斗争。然而即使如此，我们进行合法的工作还需要秘密的。这应该是奇怪的。合法本

来就应该可以公开，但是我们偏不能公开。这除开某些人对我们的宗派门户之见以外，是不能解释的。法律是他们订出来的，然而违反法律的常常是他们自己，而不是我们。他们常常可以公开违法，我们反而要秘密的在法律范围之内活动。某某审判官曾经向着一个被审判的共产党员说：即使你的工作做得怎样好，怎样合法与光明正大，你如果是我们的人，我们当然要传令嘉奖，但发现你是一个共产党员，那我们就要逮捕你，并解散你所指挥下的一切组织。中国的事情就有这样奇怪！好，我现在就来研究一下“合法的秘密工作”吧！

我们的同志依照他的社会地位及其他关系，参加到各种团体和组织中去。我们的目的是要真正进行一些救国工作，是要巩固与改进这些团体和组织，提高这些团体和组织在抗战中的作用、效能与威信，而不是去破坏与瓦解这些团体和组织。这就使得我们的同志有了一个基本条件，他一定能够很好的长期的在这个团体和组织中待下去，并能取得信任，只要他不暴露党的组织关系，不犯重大的过失。

然而我们同志的弱点，就在于常常暴露他党的组织关系，或者常引起别人的怀疑与不信任。这种暴露与怀疑的引起，是由两方面来的，一是由于公开工作同志的错误与疏忽；二是由于党的组织的错误与疏忽。

我们知道这种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配合，是很困难的。这种困难是由于下列的原因：

（一）公开工作的同志经常与友党同志及非党群众处在一起，共同工作。他的活动与个人生活都完全公开；但是他同时又要与党的组织建立秘密联系，取得党的指示与教育，并且要在公开工作中去执行党的指示。因此，在比较长的时期内，公开工作同志的关系与来历等，就容易被人察觉。

（二）目前中国各地的环境与工作条件及友党友军对我们

与对革命的态度，变化都是很快的。因此，使得我们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配合，需要时常改组。而在这种改组中，就常常妨害我们的秘密工作。

（三）公开工作的同志大部分都很幼稚，缺乏工作经验，尤其缺乏社会经验，缺乏基本的理论与独立工作的能力，因此，他们常常没有把握去独立的处理问题，而要经常取得党的帮助与指示。同样我们党内工作的同志很幼稚，经验也不足，因此，在指导上也不免要发生许多错误。因为这些错误与这种关系的过于密切，如是就容易妨害秘密。

（四）由于群众抗日运动的极大发展，党的威信的极大提高，到处要求共产党的帮助与对于共产党员的尊敬等，就常常冲昏我们同志冷静的头脑，破坏我们同志的忍耐性，使我们的同志放肆起来，使同志的言论和行动超过环境所能允许的范围以外去，超过他的地位和身份所能允许的范围以外去，完全不必要的暴露出我们的组织关系。

在革命低落的时期，在党的活动处在绝对秘密条件下，与由党独立领导革命运动的时期，要保持党员的组织秘密，是比较不困难的。而在革命高涨的时期，在党的活动要采取广大的公开合法的方式，并与其他各党各派进行统一战线共同领导革命运动的时期，要保持党的组织秘密是更困难的。尤其是值得注意的，是某些友党还派了不少秘密的侦探打入我党的内部来，系统的侦察我党的组织状况，这就更增加了我们秘密工作的困难。

我们公开工作的同志，常常不去研究友党的理论、文件和作风，并且学习这些理论、文件和作风，有批判的接收与利用，去进行真正革命工作。常常不去研究国家的法律、命令和组织并且利用这些法律、命令和组织去进行工作。常常不会说群众的话，说人家所常说的，说自己所处地位和身份所恰应

说的话，并依照人家的作风和形式去进行真正的革命工作，在旧的作风和形式之内去装进新的革命的内容。我们的同志常常是相反，是一套“布尔什维克”的作风，是一套马列主义的术语，是一套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等名词。自然，在这种形式之下，不需要人家来考察，一望而知其为哪一类的人。以这而云保持秘密，那只能欺骗自己！

我们公开工作同志常常使过多的人知道他与党的关系，随便向人家写信，并在这些信上暴露自己的面目，随便放置与阅读党的文件刊物。

我们许多党的工作同志，也是非常极端的不小心，不是很技术的与公开同志建立关系，随便向人说出公开同志的关系，甚至在会议上、文件中随便写出、说出党的组织、分布状况、党员数目，某些困难和机关中党的影响与工作，以及某些团体和机关的工作应该如何进行等，特别在某些党部说秘密工作的文件上泄露许多秘密关系。这种情形，已经到极严重与不可忍耐的程度。

公开工作的同志如果要秘密他党的组织关系，就必需秘密好。如果秘密不好，结果还是被人知道，那就比不秘密还坏，甚至因此要引起某些人的误会，并利用这些事情来反对我们，甚至给我们以难堪的打击等。这种教训已经不少了。

三

为了要使这种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配合得适当，必需有长远的眼光，必须了解现在的环境，同时估计到将来的环境，必需有很好的忍耐性、很好的应付环境的技术与经常的小心谨慎和最高的警觉性等。

在方法上应根据各个地方各个工作部门的具体情况来确

定。譬如在河北比在山西应该有些不同，在晋东比在晋西又有些不同，在华北比在华南又有很大的不同，在某些救亡团体比在某些正规机关更有许多不同……而我们的同志在群众中以共产党员或八路军人员的面目出现，或者以普通的群众面目出现，或者以抗日积极分子的面目出现，或者以其他派别的忠实拥护者的面目出现，其方法、其态度均应有所不同。但是一般说来，我们可以提出下列的方法：

（一）一切比较负责的公开工作同志，不要兼党内的秘密工作，即使是党的公开代表也最好不兼秘密工作。

（二）在一个公开机关中，如果有几个比较负责的同志，可成立特别小组，或者完全不要有任何形式的组织，而直接与相当党的负责人发生关系。他们不参加党的普通支部，一般也不要采用党团的名称。

（三）公开工作的同志除开与指定的党的负责人接头、讨论问题、报告工作外，不要向党内任何其他的同志发生组织关系与报告工作。如果组织关系断绝，也不要随便的乱找组织关系，而应该耐心的独立工作。只有遇着党内最负责的同志之时，才可说明组织关系，或者经过其他可靠的同志去找可靠的地方组织关系。

（四）公开工作同志，不要去介绍同志入党，不要介绍人到延安或八路军及其他公开的共产党机关，不要与一切公开的共产党机关和个人发生经常的关系，不要与延安及一切公开共产党机关的人员通信，不要在一切信件上说党的工作情形与马列主义问题等。

（五）公开工作同志如果必须与党的负责人通信，姓名地址、寄信方法、说事语句都必须特别约定，否则就不要通信，一般不许由邮局与党的负责人通信。

（六）公开工作同志，应该在公开的言论文字上多说该公

开团体或机关所常说的一套术语，少说或者完全不说马列主义的术语及一切我党所单独使用的名词口号等（如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等语句，其他党派是不常用的）。他们说的应该是那一套，但做的则应该是这一套，比如统一战线、民主、改善人民生活等，尽可以少说多做。他们的作风，也应该尽可能适合该公开团体或机关。

（七）一切公开工作同志应多多团结非党的进步分子与同情者，许多工作（如订买党的刊物，进行各种宣传，提出各种计划等）可以经过他们去做，而自己则站在指导与计划的地位，有时并可在形式上反对某种过分左的活动等。

（八）如果有党的同志或任何其他的人没有经过其他组织的介绍，去向公开工作的同志找组织关系者，公开工作同志应该拒绝，即使是过去相识的同志，亦不要发生同志的关系，尤其不要代替失掉关系的同志找组织关系。

（九）党的组织对于重要的公开工作同志，要指定特别可靠的人去与之发生关系，或者成立管理这些关系的特别部门，并且不要随便调换，必要时应经过几个互相不连系的系统去管理这些关系。

（十）党对于各个不同系统的公开工作同志的指示，不要完全一样，要分别各个不同的系统，分别不同的工作的性质，分别上层与下层，给以不同的指示。如对上层侧重于一般工作的领导，对下层侧重于具体指示等。并且要教育公开工作同志，不要在公开会议上把党的指示全套的搬出来，而应该提出最重要的或补充别人之不足等。因为只有这样，才不致使这些不同系统的同志互相暴露。

（十一）党指导公开工作同志，一般用口头传达，或经过公开刊物、公开文件，少用信件。尤其不要经过随便的人去传递信件。而在这种信件中也不要暴露任何组织关系。

（十二）各级党部一般不要印发秘密文件，一切印发的文件，都要准备这些文件落到别人手中去。都不要把任何秘密事件写在这些文件上。在文件上也不要签署省委、县委等名义。当着党在某些团体和机关中建立了组织与工作之后，在党的文件上就不要再说这些团体和机关的工作了。如果说，也只能站在第三者的地位，用批评、建议等方式去说（如我党对国民党的批评与建议一样），而不要带有任何指导工作的口吻和神气。就是要使别人虽然得了我们的文件，也无法发现我们党在这些团体和机关中有什么组织和工作。

（十三）对于某些工作，当着我们实际去进行或正在进行的时候，那我们就不要去对外宣传，以免引起人家的注意。比如说：当我们正在组织某地农民的时候，我们党的对外宣传品就不要说某地农民组织如何如何。当着我们实际能使某地某种工作做好的时候，我们就不说某地某种工作如何好。

（十四）各地党必须建立自己的交通，必须慎选交通人员，必须严格训练交通员。党的工作报告与指示绝对不要由邮局寄送，甚至用鸡毛信送报告。绝对不能容许交通人员拆阅信件。

（十五）党的工作报告也应该只是一般的写，而不要写具体的组织状况与组织关系。这些十分秘密的事情，必须用口头当面报告与传达，必要的时候也只能用密写由交通带送。

（十六）党的负责人不要将公开工作同志的关系随便使其他同志知道。只能向上级党部指定的负责人报告。各地党员的数目字，对内对外均应绝对秘密。

（十七）不要在党的比较大的会议上尤其在党内刊物上、文件上来讨论党的秘密工作。秘密工作方法是不能在党内公开讨论的，因为一公开讨论就不能秘密了。

(十八) 党要教育一切同志，使同志了解只知道他所必需知道的事情，而不要知道他所能够知道的事情。对于某些好打听党内秘密的同志应该给以批评，对于随便向人泄露党内秘密的同志须给以处分。

上述各种办法，虽然还不是最好的办法，但如果能够全部实行，是可以比较恰当的组织我们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配合，望我们的同志多多在实际工作中去研究。

自然，公开工作同志，由于他们的工作，由于他所处的环境，比较容易受外界的引诱，容易失去了党的立场，须要有更好的党的教育与党的意识的锻炼等。但是另一方面又由于要保持他的组织关系的秘密，而不能参加党的生活，不能与党的组织有过多的接触。这里自然是一个矛盾，我们也无法完全克服。我们只能想出一切补救的办法来减少这种缺点，如党的公开书籍、报纸与文件的很好发行等。各级党部必须给以更大的注意。

四

各地党部除开很好的去组织秘密工作外，向党内同志再三叮咛秘密工作外，还必须依据各地环境与条件，在可能的范围之内，去争取党的公开与合法地位，如建立公开的共产党机关，发行公开的共产党机关报，派遣公开的共产党代表，某些党员以公开的共产党员面目去参加某些工作和团体，公开用共产党的名义招待各界、召集谈话会，公开用共产党地方党部名义对当地各种重要问题提出建议、发表意见谈话等。党的这种公开合法地位，在许多地方可以取得。我党在武汉、西安、江西等地都有公开机关、报纸，并曾时常招待各界，发表文件意见等。当然在其他的方面也有这种可能，特别在华北。而国民

党中央最近也有决议，对于其他党派及其分子在遵守国法与拥护三民主义之条件下，要推诚相见。这种正式的共产党机关与人员特别是文件的公开可能性，常常比其他非党的群众团体还要大。友党友军常常不能正式的封闭、逮捕及禁止这些机关、人员和文件、书报。而且发生这种事件，共产党可以正式提出交涉，正式保护这些机关、人员与报纸，即使是顽固分子，也只能采用非正式的阴谋手段来反对与监视我们。我们的同志必需而充分估计目前环境的这一特点。而且我们现在也不害怕人家来封闭、逮捕与禁止我们这些公开机关和人员以及他们的活动。

党的这种公开合法地位的取得，对党的工作与政治影响有极大的好处，所以只要一有可能，我们就应努力的争取。然而我们许多同志对这点还常常是估计不足，或放任这种有利的机会不去利用与争取。这是损失。党在各地取得上述各种公开的地位和进行某些公开的活动，有什么好处？好处多得很：

第一，能够更好、更广泛的去进行统一战线，提高我党在抗战中的作用；

第二，能更大、更广泛的去号召、组织与动员群众参加抗战，并加强我党与群众的关系；

第三，更公开、更正式的与汉奸及顽固分子进行斗争；

第四，也更能使我们的秘密工作易于组织。

有人以为争取党的公开与合法地位，就要妨害与破坏党的秘密工作。其实这种想法是错误的。这种人根本还没有了解党的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联系的问题。很明白，党在各地如果有公开的机关和代表与群众联系、与友党友军及社会各团体联系，如果经常有党的报纸、党的公开文件、党所召集的非党会议等，去提出各种问题、解释各种问题，再去指导群众及一切非党的团体和组织，那么就可以大大减少党经过秘密的组织路

线去指导各种工作的必要了，就可使党的领导不完全依靠秘密路线与秘密工作，就可使党的领导与作用和影响走到更正式一些，就可使党的秘密工作范围缩小到仅仅必要的程度。许多秘密的文件，秘密的指导，秘密的关系，都可减少。这样就自然使秘密工作更好做了，秘密的保持更容易了。相反，如果党的领导完全或大部要依靠秘密文件、秘密关系和秘密工作去实现，把秘密工作扩大起来，增加秘密文件和关系，即使是技术很好，自然也就给人家察觉与暴露我们的机会更多，使秘密工作更难组织。

我们如果能够更好的去组织党的公开工作，也就能够更好的去组织党的秘密工作。相反，如果公开工作组织不好，秘密工作也是不能组织很好的。公开工作的范围、党的公开合法地位及活动的范围，应尽可能的使之扩大；一切指导与工作能够采用公开合法的方式去实现的，应尽可能公开去做。而秘密工作的范围、秘密文件、秘密的指导关系及秘密机关等，应尽可能的使之缩小到必要的程度，这样不独使党的工作要获得更大的成绩，而且也更能够保持党的秘密工作。相反如果缩小公开工作的范围，也就要扩大秘密工作的范围，这样一方面要使党的工作限于狭小的秘密范围之内，同时也要妨害与破坏秘密工作。

所以更好的去争取与利用公开，原则上不会妨害与破坏秘密工作，反能够帮助秘密工作。而不争取与利用公开，反而要妨害与破坏秘密工作。这一个并不深奥的问题，十余年来为我们许多同志所未能彻底了解，在今天实还有向同志解释的必要。在这方面还有不少的错误发生。当我们向同志谈要采用公开合法的方式去大规模组织与领导群众及武装抗战的时候，同志中常常发生取消党的秘密工作“公开一切”的错误。当我们向同志谈要注意秘密工作的时候，同志中又常常发生取消公开

工作，放弃可能利用的公开机会，使党的工作走向狭隘的牛角尖里去。他们的想法，是要公开就不要秘密，要秘密就不要公开，他们始终没有很好的了解公开与秘密适当的有机的辩证法的联系和配合。

当然，没有正确了解公开与秘密的联系和配合，不根据条件与环境，没有分寸、没有条理的去乱七八糟公开党的机关和人员，公开党的文件和报纸，把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混做一团，分不清楚，那是可以最大的破坏秘密工作，同时也要最大的破坏公开工作。这是完全要不得的（以前我们同志就犯过许多这样的错误）。而我们所说的要保持党的必要的秘密工作，同时又要尽可能的争取党的公开合法地位，是估计了现在与将来的环境和条件，是有分寸、有条理的去组织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配合，是把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不同分得清楚的。所以这样对于公开工作有益，而且对于秘密工作也有益，即是对党的整个工作有益。因此，我们去建立党的公开机关、代表和报纸，以及进行党的公开活动时，要注意下列几点：

（一）党的公开机关和人员，与党的秘密工作机关和人员分开，不混在一起。

（二）党的公开机关可能完全是一个外交机关，公开代表、公开党员可能完全是外交人员，公开的与各党各派及一切非党人员和团体发生联系。但党的实际工作，特别是组织工作不在这些机关中进行，也不由公开人员担负。只有在党的公开有了保障的地方（如现在陕北边区及河北的某些地方），党的工作才可部分的或全部的在这些机关中进行，并由党的公开代表负担党的实际工作。

（三）以党员面目出现的公开工作同志与以非党员面目出现的公开工作同志，不要发生党内的同志关系。

（四）党的公开机关与人员，及召集的会议等，最好要有

必要的保护，以防阴谋、破坏捣乱等。

(五) 党的公开机关和代表发表文件、讲演、谈话、政见等，应该慎重，应该在中央的总方针下，并应绝对服从当地党的组织的决定。同时这些公开的机关和代表在讲演谈话及答复人家的问题，不要泄露党的任何秘密。最好党的秘密尽可以少使这些公开的同志知道，除开他所必需知道者以外。

(六) 公开的共产党员，要准备在环境转向恶化、不能立足时，能够离开当地，而不致影响到党的工作不能继续。因此，不能使党的重要干部通通去公开。

我们同志如果能够依照上述各项去组织党的公开，那么能够更多更广泛的公开，只有对于党的工作有益，对于秘密工作也有益，所以我们应该很好的去组织。

要公开就必需正式的公开（如果可能的话），要秘密就必需好好的秘密（如果必要的话）。我们同志的特点，就常常在这里，他们既不很好的正式的去组织公开工作，又不很好的严格的去组织秘密工作，结果就常常使得要公开的不能好好公开，要秘密的也不能好好秘密，使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都被破坏。

五

在组织党的公开工作时，还必须充分的估计到下列两点：（一）中国各地的环境在激烈变动中，因此常常使得党的工作突然的或者逐渐的要由公开转入秘密，或由秘密转入公开（比如敌人突然占领某地，或由八路军突然收复某地，党的工作就突然转入秘密，或突然转入公开。又如友党友军对我党态度突然的或者逐渐的转变，党的工作也就要突然的或逐渐的转入公开或者转入秘密）；（二）党的工作由秘密转入公开是容易的，

但由公开转入秘密是困难的。已经公开了的人员和东西，不能再秘密（这不是说他们完全不能潜伏），但秘密的人员和东西可以随时使他们公开。由于上述两点，我们同志在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配合问题上，就应该有远大的眼光。他们不只应该看到今天，而且还应该看到明天，看到将来环境的可能变动，而有所准备。而在公开党的人员和组织时，应该有充分的必要的保留和最大的谨慎。

如何来组织这种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转变呢？

第一，在由相对的公开转入绝对的秘密时，即在某地突然要被敌人占领时，应该：（一）过去参加的一切党员与非党员和一切不能在敌占后立足的人员，均须有组织的退出（加入游击队或转移地区工作）。根据当时的条件，布置若干在敌占后能够存在与活动的人员留在当地。这种人员事先就应有准备。如果当时的情形很严重与混乱，人民的全部或绝大多数均退出当地时，那么这种人员也应暂时随群众退出，待群众有相当大的部分回到当地时，这种人员再回去。（二）如果有可能，应该布置敌占后的交通网与情报网。（三）在敌占后，情况相当安定时，附近的游击队和党的组织，经过群众与及某种特别关系去布置这些地区的秘密工作。

第二，在由绝对的秘密转入相对的公开时，即在某地为八路军或友军收复时，应该：（一）公开抗日救国的群众运动，但党员的大多数仍应以非党的抗日积极分子的面目出现，去参加与领导各方面的工作。（二）如果是八路军收复的地区，建立某些党的公开机关与公开代表公开党员是可以的。如果是友军收复的地区，那就要看友军对共产党的态度，来决定这种公开机关与公开代表是否立即设立。（三）要估计这些地区是否有重复被敌人夺占的可能？如果这种可能性很大，那末就要更多的保留党的秘密工作人员和组织，不参加一切公开活动。

(四) 要很快的协助军队肃清汉奸敌探，并在自己内部肃清内奸。

第三，由友党及友军的态度好转，使党的工作有更大公开合法的可能时，我们要尽量利用这种可能去进行各方面的工作，就是使党更加转向公开。这时候应该：(一) 要尽可能扩大这种公开合法的可能性。一直到建立党的公开机关报纸，各党各派的共同委员会以至派遣代表参加政府、武装部队、群众团体等。(二) 在某些团体和机关中公开少数的个别党员，这种公开的方式最好也采用正式的由某个党员公开发表加入党的宣言，由党发表接收某人入党的申明等，或者由某些团体公开要求党派人帮助的请书，由党发表接受请求的申明等。(三) 保持组织上及其他必要的秘密工作，党员的大多数仍然以非党积极分子面目出现。(四) 为了保持某些同志的非党面目，把这些同志从普通的组织中划分出来。(五) 要禁止党员不经组织允许自由去公开党员面目的行动，特别是那些以公开党的关系去出风头的行动。

第四，由于友党友军的态度恶化，使党的公开工作可能性缩小时，就应该：(一) 要组织防御的斗争。如果人家以正式的反共的态度来进攻我们党，那末这种防御的斗争，是比较好组织的。但今天人家还是也很少可能来正式宣布反共，与共产党决裂。今天反对我们的人还常常是采用非正式的阴谋诡计及假借某些口实，从旁面、从某些部分的问题与工作上来攻我们。对于公开正式的共产党机关与人员，他们还不敢下手。为了防御这种进攻，我们要在政治上使这种斗争走向公开化与正规化。因此，在人家进攻我们时，我们常常可以宣布某些机关人员属于共产党，来防御人家的进攻，公开的正式的保护这些机关和人员。(二) 我们不要自动取消与解散某些已经公开了的机关，公开党员也不要随便隐蔽与离开（除非在不得已时）。

我们要相当顽强的撑持与保卫我党已得的公开合法地位。（三）要批评公布友党友军这一切破坏团结、制造磨擦、挑拨斗争的一切事实，并向上级机关控告，提出交涉，为被打击的非党团体和人员申公愤等。（四）要更加严紧党的秘密组织与工作，主要的工作经过秘密路线而进行。（五）那些已经暴露关系、发生危险，而党又无法保护他们的党员，设法秘密的逃避。（六）从新建立一些秘密机关和秘密的关系，旧的关系的减少，及秘密文件的肃清与减少等。（七）特别注意混入组织的内奸。

上述各项就是在重新改组我党公开与秘密工作时所应该注意的，这当然只是一般的提出。具体的办法是要在各个具体情况下来决定的。

秘密工作对于我们自然是一件极不痛快的事情。然而为了抗战的胜利，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如果必需进行秘密工作的话，那我们就只有很好的来进行秘密工作。

一、此文不得印刷，特别是其中所说的具体方法。

二、此文抄寄各省委，由各省委用口头分别向某些负责的公开工作同志及党的负责同志传达。只有最负责同志才可阅读本文。

三、各负责同志可根据此文教育干部的秘密工作，但不得在会议上去作报告。

胡 服

七月二十二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张闻天等关于我们在抗战过程中的总方针给陈绍禹等的电报

(一九三八年八月六日)

陈周博凯叶⁽¹⁾：

保卫武汉，重在发动民众，军事则重在袭击敌人之侧后，迟滞敌进，争取时间，务须避免不利的决战，至事实上不可守时，不惜断然放弃之。因目前许多军队的战斗力远不如前，若再损失过大，将增加各将领对蒋⁽²⁾之不满，投降派与割据派起而乘之，有影响蒋的地位及继续抗战之虞。在抗战过程中巩固蒋之地位，坚持抗战，坚决打击投降派，应是我们的总方针。而军队力量之保存，是执行此方针之基础。请加注意为盼。

洛陈康王胡毛⁽³⁾

鱼

根据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集》
第二卷刊印。

注 释

(1) 指周恩来、秦邦宪、何克全、叶剑英。

(2) 指蒋介石。

(3) 指陈云、康生、王稼祥、刘少奇、毛泽东。

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

(一九三八年)

第一条 边区所属之行政机关、武装部队及公营企业之人员犯本条例之罪者，依本条例处断。

凡群众组织及社会公益事务团体之人员犯本条例之罪，经所属团体控告者，亦依本条例处理。

第二条 有左列行为之一者，以贪污论罪。

- (一) 克扣或截留应行发给或缴纳之财物者；
- (二) 买卖公用物品从中舞弊者；
- (三) 盗窃侵吞公有财物者；
- (四) 强占强征或强募财物者；
- (五) 意在图利贩运违禁或漏税物品者；
- (六) 擅移公款作为私人营利者；
- (七) 违法收募税捐者；
- (八) 伪造或虚报收支账目者；
- (九) 勒索敲诈收受贿赂者；
- (十) 为私人利益而浪费公有之财物者。

第三条 犯第二条之罪者，以其数目之多少，及发生影响之大小，依左列之规定惩治之。

(一) 贪污数目在五百元以上者，处死刑或五年以上之有期徒刑；

(二) 贪污数目在三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者，处三年以上五年以下之有期徒刑；

(三) 贪污数目在一百元以上三百元以下者，处一年以上至三年以下之有期徒刑；

(四) 贪污数目在一百元以下者，处一年以下之有期徒刑或苦役。

第四条 前第三条之未遂罪罚之。

第五条 犯本条例之罪，除依照第三条之规定处罚外，应追缴其贪污所得之财物，如属于私人者，视其性质，分别发还受害人全部或□部分，无法追缴时得没收犯罪人财产抵偿。

第六条 犯本条例之罪，于发觉前自首者，除依第五条之规定令其缴出所得财物外，得减轻或免除其处罚。

第七条 犯本条例之罪者，由地方法庭审判，呈边区高等法院核准后执行之。

第八条 本条例解释之权属于边区政府。

第九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施行。

根据一九三八年八月十五日《新中华报》
刊印。

毛泽东等关于晋察冀边区货币 政策给聂荣臻等的电报

(一九三八年八月十七日)

聂彭并告朱彭⁽¹⁾：

边区货币政策应根据以下原则：

(一) 边区应有比较稳定的货币，以备同日寇作持久的斗争。

(二) 边区的纸币数目，不应超过边区市场上的需要数量。这里应该估计到边区之扩大和缩小之可能。

(三) 边区的纸币应该有准备金：第一，货物，特别是工业品；第二，伪币；第三，法币。

(四) 日寇占领城市及铁路线，我据有农村。边区工业品之来源是日寇占领地，边区农业产品之出卖地，亦在日寇占领区域。因此边区应该有适当的对外贸易政策，以作货币政策之后盾。

(五) 边区军费浩大，财政货币政策应着眼于将来军费之来源。

(六) 在抗战最后胜利之前，法币一定继续跌价，法币有逐渐在华北灭迹之可能。杂币更会跌落，伪币亦会有一定程度的跌落。边区纸币如数量过多，亦会跌落。问题中心在于边区纸币应维持不低于伪币之比价。

我们提议下列具体办法：

甲、发行一定数量的边区纸币（此数量由你们考虑决定电告我们），收买法币，保留一部分法币，大部分购买工业品，用一部分法币兑换伪币。

乙、对于杂币应设各种方法使其流到边区以外去。

丙、有无可能送一部分杂币至总部及一二〇师，带一部分法币来延安，请考虑电复。

丁、扩大边区纸币的印刷，因将来印刷一定比现在更困难。

上述各项请考虑研究。待彭真来延时再详细讨论决定。

毛、洛、王、胡^{〔2〕}

八月十七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二卷刊印。

注 释

〔1〕指彭真，朱德、彭德怀。

〔2〕指张闻天、王稼祥、刘少奇。

关于党内教育问题*

(一九三八年八月十八日)

刘 少 奇

从你们的文件上看，“思想斗争”的口号在你们那里是提得很高的，并且在这种口号下，党内的惩办制度已经部分的发生，在党内留党察看二星期、一个月、三个月，以至撤职、罚苦工与禁闭的事实，已经有些。在党内使用所谓各种主义（如军阀主义、自由主义、土匪主义等）的名词也太多，甚至有些滥用这些名词。这种情形如果再发展下去，可能造成党内一些不正常的现象。

某些人认为同志如果犯了错误，就必须处罚一下，而且错误犯得多大，处罚就须多重，否则党纪就似乎无法维持。他们完全用一种法律的观念来对待那些犯错误的同志，不管这些同志过去的历史思想以及对于错误的态度和了解程度等，法律是完全不管这些，一律平等的给犯错误的同志以处罚，而在处罚以后，就以为满足了，不管那些受处罚的同志是否真正的改正了自己的错误（你们的文件有一个地方说，某些人口头上承认错误，而实际上并没有改正）。他们不是从政治上来观察那些犯错误的同志，耐心的从思想上和政治上来纠正那些同志的错误。这就是在党内产生惩办制度的根本原因。

我想请你们那里党内的负责同志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对于

* 这是刘少奇给朱瑞及中共晋冀豫省委的信的节选。

一个犯错误的同志，给以处罚与打击，常常不能使这个同志冷静的细心的去考虑问题，思索自己的错误，以至自动的去改正错误，而耐心的说服与教育，不给打击与处罚去刺激他，反而常常能使他更容易的去了解与改正错误。在这种情形下，对同志还是给以处罚好，不给处罚好呢？处罚与无情的思想斗争的火力，是带着一些强迫性质的。思想上、政治上的错误，当着他还没有了解以前，是不能采用强迫的方法使他改正的，而必须从思想上、政治上去说服他，使他自动的改正，简单的处罚在这里是完全解决不了问题的。那些以为给以处罚问题就了结的人，是完全不懂得思想问题的本质。如果在党内对同志的处罚与打击过多，就可能大大的束缚党员群众的自动性与创造性，可能使党员不敢工作，不敢解决问题，不敢说话，使党变成生气很少的党。

对于同志中任何思想上、行动上、工作上的错误，都不要放松，都必须深刻的了解与注视一切同志思想的发展，都必须用一切方法去纠正同志中一切的错误。在这里，采取自由主义、麻木不仁与放任的态度，是完全不对的，是不能在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然而，对同志的处罚、打击与所谓“无情的斗争”，并不是纠正同志错误的好方法，更不是唯一的办法；相反，应该对那些犯错误的同志（尤其是新同志）采用同志的、诚恳的、甚至是温和与委婉的态度，爱护他，尊重他，细心的从原则上去分析他的错误，使他从原则上去了解错误与改正错误，这样反而常常是纠正同志错误的较好方法，常常能使同志心悦诚服的去改正错误，并能更兴奋的去为党工作。处罚与打击（公开的批评与斗争也是一种打击）只有在必要的时候，对付党内坚持错误的顽固分子才可以采用；而且这种处罚与打击也还是为了教育（非给以处罚与打击不能使他警觉与改正错误时）他自己与同志。处罚与打击而离开了教育，即就是一种单

纯的惩罚主义。

每一个同志犯错误都必须去纠正，但对每一个犯错误的同志并不一定都要给以处罚，只要他的错误能纠正，不处罚最好。

你们不要在党内过高的提出思想斗争的口号，更不要使用许多内容不十分明显的名词，因为这些名词对于同志常常成为罪名、大帽子。自然，思想斗争在党内是经常有的，一切同志中不正确的思想是要克服的，但是这一般要采用诚恳的平心静气的说服与教育的方式，不要随随便便的去打击同志。

党内的团结，同志的团结，现在非常要紧，我们要提出党内团结的口号。同志中有不同的意见，应该很和气的来说，不要随随便便的吵闹起来，闹意气。应有最高的原则性。

一般在党内是要提倡学习与教育的口号，提倡自我批评，思想斗争的口号不要提。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
《刘少奇论党的建设》刊印。

毛泽东等关于对阎锡山取消 战委会的态度及对山西新旧派的 方针给彭德怀等的电报

(一九三八年八月二十二日)

德怀、贺、萧、关、甘并赵、罗、子华、尚昆⁽¹⁾同志：

(1) 战委会有八路军的代表及共产党员公开参加，阎久有取消动委之意，但为避免与我党我军正面磨擦，授意下层提出改变战委组织，阎本人并不坚决，张杨会商⁽²⁾即阎之授意与吉县会议之结果，有刺探我方态度作用。

(2) 目前我党我军及子华等同志应公开表示如下态度：

1. 战委在阎司令长官领导下，在抗战中已有不少成绩（如动员新兵、组织游击队等），在群众中已有威信，它的组织证明更适合于各派团结，比起实施委会⁽³⁾更合理，如对抗战与团结有利，不应取消或改变。根据上述理由，反对取消或改组战委的提议，并争取张、杨同情。

2. 万一阎表示非改变不可，则我们以战委系群众性组织，在雁北各地有其决定系统，必须经过代表会议形式传达阎司令长官意见，以推延时间，待情况变动。

3. 最后非改变不可，则我们可提出条件，要求实施委会允许各驻军党派团体代表参加，并实行战委工作纲领，战委人员全部参加实施会，游击队干部保持现状不得调换，因战委全部人员均有功抗战，无理由调换他们工作。

(3) 关于新旧势力的冲突，我们基本方针是支持发展新势力，但我党我军及战委公开表示态度时不要作左右袒护。我们应号召新旧各派团结起来，设法做到在旧派反对新派时，不反对我党我军，并能同我们在某些地方合作抗日，动员组织群众与改造部队等。

(4) 向牺盟会提议，提高警觉，动员群众与舆论，对于各种破坏他们的行动给以坚决回答。

(5) 战委下的武装须迅速巩固，并设法改变一部在我军与直接指挥之下来。

毛、洛、王、胡^[4]

二十二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指贺龙、萧克、关向应、甘泗淇，赵林、罗贵波、程子华、杨尚昆。

〔2〕指山西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张隽轩、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杨集贤在河口的会商，内容是取消战委会的问题。

〔3〕指阎锡山一九三七年七月组织的山西省总动员实施委员会。

〔4〕指张闻天、王稼祥、刘少奇。

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声明*

(一九三八年九月)

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共产国际主席团的会议上，宣读了下述的宣言：

(一) 中国共产党及时的预见到：贪婪的日本帝国主义不会限制于仅仅侵占东北四省，而是并吞全中国。为了团结一切民族力量以保卫祖国起见，中共从自己方面尽了一切可能去结束十年来的内战，以取得对于国民党的友好的合作。这一努力，对于国民党也发生了影响，在西安事变中尤其是如此。因为在西安事变中，中共坚决主张和平解决，而打破了日本走卒所准备的卑污的谋害蒋介石以挑拨中国新的内战之行为。从此以后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就开始接近，以后就进到了合作。

(二) 日本法西斯军阀，于一九三七年秋开始侵夺中国北部及东南部的广大的领土，他们希望得到迅速的、容易的胜利，希望逼得国民政府屈膝投降，希望“以华制华”。可是他们的打算是惨酷的失败了。蒋介石，政府，及国民党，没有投降，他们出来保护自己的国家以反对日本侵略者，而中国人民则起来进行伟大人民所值得有的英勇斗争。因此，全副武装的日本侵略者的进攻，迅即遭受中华民族的顽强抵抗，这种抵抗给了日本以巨大的损失，使他们对于中国的进攻，转成一种对于他们甚为繁重的持久的战争。这一战争，日益要求日本使用

* 这个文件是任弼时代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宣读的。

更大的军事力量。战争越是继续，日本的困难愈是增加，日本侵略的完全失败的日子，便越是迫近。

（三）但是在最近的时期中，中国民族还须要以英勇的努力克服极大的困难。反对残暴日本帝国主义的自卫战争，是对于我们民族一切生动力量的巨大的锻炼。只有民族的一切力量团结起来，进行这一伟大的斗争，才能保证中国民族的胜利。可是最近数月来的经验已经指明正是这种自卫战争，是有伟大的力量，来团结中国民族。在战争的烈火中，旧的数千百年的分裂国家的屏障是被破坏着，团结我们四万万人民成为一个统一的力量，成为一个真正统一民族的伟大过程是在完成着。这就是中国人民之所以不可战胜的基本保证。

（四）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成立起来了。在蒋介石统率之下，中国全部国家政权与一切军队之统一，亦正在完成中。这些正是中华民族解放运动的最重要的收获，同时也是整个中华民族亲密的战斗的团结的基础。统一战线的扩大与巩固，是胜利的保卫中国的决定条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应当包括中国的一切抗日党派。这一统一战线的参加者，必须真正亲密地联合起来。国民政府的正确政策，必须被实行。彼此间必须有完全的相互的信任，共同工作与共同负责。

（五）中国劳动群众的组织性的缺乏，妨碍着并延缓着动员一切人民力量来进行抗日斗争的事业。为着克服这一弱点，必须由国民党及共产党加紧努力，去吸收劳动群众到各种现有的及新的组织中来。这样来造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强的下层群众基础。首先应当把工人组织于职工会中，把现有的职工会转变为真正广大的群众组织，使之成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斗争中特别重要与可靠的堡垒。在日军占领区域，应当以适当形式建立职工运动的许多不大的据点。

(六) 在中国人民占最大多数的农民，是一种巨大的力量，没有这种力量来积极参加保护祖国的斗争，要胜利的进行长期战争是不可能的。为着增加收成，提高农民对于积极参加民族解放战争与各种保卫国家工作的兴趣，必须改善他们的物质生活与法律地位，同样必须注意农民群众中的政治工作。在日军占领区域，农民应被组织到游击队中，以进行反对日本强盗的斗争。

(七) 同时还有一个任务，是要在保卫祖国的各种工作中，在后方，在前线，在生产中，去发展青年的积极性，不仅帮助青年学生，而且帮助青年工农组织到那些参加伟大救国事业的各种团体去。首先，共产党赞助国民党所建立的全国青年团，帮助它发展成为中国青年的真正统一组织，使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精神下工作，并使他包括青年一代的最广大的群众。

还须要有广大的工作，吸收千百万的中国妇女来有组织的参加保卫祖国的事业，以争取中国人民的最后自由，同时也就是争取中国妇女自由的光明的将来。

(八) 日本帝国主义者所害怕的，再没有比中国民族的团结更厉害的了。他们不仅在前线上进攻，而且在中国后方进行经常的破坏工作。日本侦探与走卒，挑拨中国各政党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权间的关系。特别阴险恶毒的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托洛茨基派走狗，他们尽力散播与引起国民党员对于共产党，共产党员对于国民党及蒋介石彼此间互不信任的空气与新的仇视。

所以，中国共产党认为共产党人以及中国的一切爱国人士，应当警惕的注视日本法西斯蒂及其中国走卒的下流阴谋。这些阴谋，是要来破坏民族统一战线，以帮助日本军队在前线上的进攻。必须做到把狡猾敌人的这些秘密的恶毒的走狗，必须迅速的加以揭露，坚决的加以消灭。

同时党巩固自身的队伍，驱逐反对抗日统一战线的分子，党开除了前中央委员张国焘，因为他是党的事业与中华民族事业的叛徒与逃兵。党在以后也将无情地对付将自己私人利益放在我们伟大人民利益之上的人们。

中国共产党深信，从一切方面去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会保证我们民族对于日本侵略者的完全胜利。我们的党，并不把自己对于国民党及国民政府首领蒋介石的合作，看成短期的事情，而是准备在战争之后，还继续与他们共同工作，以建设伟大的、自由的、民主的中国。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出版的
《六大以来》（上）刊印。

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定

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声明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并声明共产国际与中华民族反对日寇侵略者的解放斗争是团结一致的。

二、主席团批准开除过去中央委员张国焘的党籍的决定，他背叛共产主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事业，他将自己出卖给中华民族的敌人。主席团深信，张国焘的背叛行为，不仅必遭到中共党员的、也将遭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切忠实的拥护者的打击和愤慨。

三、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声明：

中华民族反对日寇侵略者的英勇斗争，博得了国际无产阶级及各国广大人民大众的热烈同情。一切进步的人类都了解伟大的中华民族反对野蛮的暴力，不仅是保卫自己的乡土，保卫自己的自由与独立，而且也是保卫全人类的自由与和平的事业。

如果日本法西斯军阀，竟然征服了中华民族，那末它将异常的加紧和扩大在亚洲、在太平洋以及欧洲和世界其他各处的法西斯侵略；而中国的胜利，却正是对一切法西斯侵略者征服计划的严重打击。所以，中华民族的解放战争，正是世界无产阶级，全体进步人类反对野蛮的法西斯主义暴力的总斗争中之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由此，直接所产生的，就是国际劳工运动及一切民主与和平的力量尽量支持中华民族斗争的必要与责任，同时，更继续加强对西班牙人民的援助。这种国际援助至今还没有充分的组织起来。它的规模，远不能适应当前群众对中华民族的广大同情。必需到处使这种同情，走向积极的行动，一切事情应加组织，以完成：

第一、从政治道义和物质上，给中国以援助。

第二、增加日本军阀在侵略中国中之各种困难和阻挠。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共产国际执委会谨号召国际无产阶级，共产国际各支部，以及一切热诚拥护民主与和平的人，首先执行下列任务：

(一) 用一切方法加紧国际援华运动；整个运动和国际的报纸，必须比以前更努力的反映出一方面是日寇侵略者在中国的残暴兽行，另一方面是中华民族为自由而斗争的英勇。

(二) 对日本法西斯侵略者在华的强盗行为，开展广泛的反抗运动，应组织群众大会和示威游行，并使群众的愤怒，转向反对各资本主义国家中受贿亲日的报纸。

(三) 组织并扩大对日本侵略者的群众制裁（抵制日货运动，拒绝装卸日货，拒绝装运军用品和其他资材至日本等等）。

(四) 加强募捐帮助中国，遣派医药救护队来华。

(五) 协助日本劳动群众在一切困难中加紧发展反法西斯反战争工作。

(六) 在中国政府同意下，由各国派遣有声望的代表团到

中国去，经过他们加强国际援华运动。

如果国际无产阶级及各国民主力量实际的援助中国，毫无疑问的，团结一致的中华民族的英勇，将能打倒野蛮的日本军阀，获得完全胜利，而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的中华民国，它将是世界和平、民主、进步的最重要的柱石之一。

（译自《共产国际》七月号）

根据一九三八年九月八日《新华日报》
刊印。

国际指示报告*

(一九三八年九月十四日)

王稼祥

我的报告是根据弼时在国际的报告⁽¹⁾、在国际的讨论的主要内容。

(一) 国际对中共党的路线的估计

根据国际讨论时季米特洛夫的发言，认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尤其是朱、毛⁽²⁾等领导了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国际认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

(二) 关于国共合作与统一战线问题

(1) 国际认为，统一战线是建立起来了，但今天还不够广泛与坚固，这是总的估计。

(2) 民族统一战线的特点，是反对外族压迫，又是在外国敌人打到中国来、在战争中发展起来的。在统一战线内包括了地主等复杂成分，因此还包括了一部分亲日及反共分子，这一

* 这是王稼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随后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的报告大纲。

方面的趋势是在战争中形成与发展起来的，是一种进步，另一方面又因经过国内战争，统一战线中还有反共、亲日分子进行破坏。

(3) 对国民党的估计，一般在战争中是会进步的，但因包括各个阶层，在发展中还有一种逆流。顽固派是阻碍抗战进步的。

认为蒋介石及国民党主要部分在战争中妥协的可能是更少的。

(4) 中共在统一战线中的任务，是要发展与巩固统一战线。

第一，诚意拥蒋，拥护国民政府。在诚意拥护中并不因此便不反对亲日派，相反的，正是要加紧反亲日派斗争。

第二，在巩固国共合作中，要中共党员在政府与军队中起模范作用，在政治上、工作上去影响国民党，如过去恩来影响张、杨⁽³⁾即是很好的。季米特洛夫指示要多作上层活动，使国民党党员同情于我们。

巩固国共合作不在于在国民党内及军队中建立中共党的组织，主要的在影响国民党的党员。将来国民党先进分子可能加入共产党，但今天还重在影响国民党党员。如果在国民党及国军中发展党员，坏处多，好处少。

国共两党关系主要是共同去反对主要敌人，今天任何一个党派去反日都是没有可能取胜的。中共只有在抗战中努力，才能使人民更加拥护。

第三，国际认为，中共提出拥护三民主义是正确的，要提出谁不愿统一、不实行三民主义，谁就不能真正的完成抗战的任务。

第四，中共不参加国民政府是对的，国内外有许多反对统一战线的人，我们以不参加国民政府为有利，但军事、国防部

门可以参加。

(5) 经常要反对日寇、汉奸利用磨擦阴谋破坏统一战线的行为。日寇是有许多阴谋的，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个问题，在各刊物中都要反对与揭露日寇阴谋，这是要国共两党共同去做的。日寇密令在四川制造反蒋倾向，在徐州制造地方军与中央军的对立，在各处挑拨国共间的磨擦，我们要反对敌人一切破坏统一战线的阴谋。

(三) 关于国际援华运动

国际认为，援华运动一般的是做得不够。有人说国际工人阶级还有看不起殖民地的倾向，季米特洛夫指出这不是事实，主要是我们对国际宣传做得不充分、不通俗。今后，中共要将日寇的野蛮政策、残酷行为写成控告书，并将中国人民英勇抗战情形向世界公布。

(四) 关于中共七次大会问题

国际认为，中共七次大会要着重于实际问题，主要着重于抗战中的许多实际问题，不应花很久时间去争论过去十年内战中的问题。关于总结十年经验，国际认为要特别慎重。

七大决议要特别注意短期的、实际的东西。

七大要吸引许多新的干部。

(五) 关于党内团结问题

在季米特洛夫与我谈话中有下列各点：

(1) 今天中共在全国取得公开存在，在群众中有很大的威

信，党在公开活动中是可能影响国民党的。

(2) 今天日寇特别要很巧妙的挑拨破坏党内的团结，如制造什么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冲突等。

(3) 今天的环境中，中共主要负责人很难在一块，因此更容易发生问题。

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

在我临走时他特别嘱咐，要中共团结才能建立信仰。在中国，抗日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抗日的关键，而中共的团结又是统一战线的关键。统一战线的胜利是靠党的一致与领导者间的团结。这是季米特洛夫临别时的赠言。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
《王稼祥选集》刊印。

注 释

(1) 指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于一九三八年四月十四日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作的《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书面报告大纲，同年五月十七日任弼时又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作了口头说明和补充。

(2) 指朱德、毛泽东。

(3) 指张学良、杨虎城。

论干部政策*

(一九三八年九月)

陈 云

干部政策，拿俗话来讲，就是用人之道。为何要讲这个问题呢？因为同学们要到敌人占领的后方去工作，不单是当一个游击队员，而且要当干部，当领导者，而用人之道对于领导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有一句这样的话：“干部决定一切。”这是通用于全世界的，不但外国通用，中国也通用；不但共产党通用，其他政党也通用。

可惜得很，中国共产党在过去十年斗争中，干部损失了十几万，没有陕北根据地的话，连现在这一点干部也保存不了。全中国一千八百多个县，假如每个县能够保存三个党员，我们党开展工作的力量就大得多了。

我现在来讲干部政策，只想用十二个字，分成四个问题来解释：第一，了解人；第二，气量大；第三，用得好；第四，爱护人。

先讲第一点：了解人。

了解人，要了解得彻底，不是容易的事情，严格地讲是很难的。就拿我们共产党来讲，是不是每个党员都了解人呢？我看还是做得不够的。最近就发现有两种毛病：第一种毛病是用一只眼睛看人，只看人家一面，不看全面，不能面面都看到；

* 这是陈云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讲演。

第二种毛病是只看到这个人今天干了什么，没有看到他以前干些什么，只看到他本领的高低，没有看到他本质的好坏。

只看到坏，不看到好，或者只看到好，不看到坏，这两种看法，哪一种多？一般地说，我们有些同志总是看坏的多，看好的少。有什么证据呢？如分配干部时，往往听到许多不好的话，说这个家伙自高自大，那个家伙懦弱无能，要不然，就说这个人背景复杂等等。

自高自大当然不好，是坏的，但是这种看法往往包含片面性。我们要进一步地看，每一个坏处同时也常有它的好处。这个人自高自大，但是做起事来有自信心，这种人多少有点才能，因为他起码总有点本领才敢自高自大。对这种人，我们就要用他的好处，避免他的坏处。假如你指定一个范围，告诉他正确的方向，让他尽量地去发展，他是可以做出成绩来的。对这种人，给他不十分重要的工作，使他放胆做去，发挥他的长处，在工作的过程中间，随着经验的增加，他的弱点就可以慢慢克服。经验的积累和弱点的克服是分不开的。

懦弱无能当然也不好，可是其中也有它的好处，好处是小心谨慎。因为他能力不大，所以特别唯谨唯慎。这种人不能做大刀阔斧的事，但是可以担任小心谨慎的工作，例如做机要、做调查统计等等工作。我不赞成懦弱无能，但是这种人有他的好处，我们可以用他好的一方面，小心谨慎的一方面。

再来讲背景复杂的问题。当我们发展党员的时候，凡是会说话的，有胡子的，懂得各党各派情形的，就以为他背景复杂，不敢吸收。然而这种人在社会上常常是比较有经验的，他们了解许多问题，只要他们真正信仰共产主义，而且现在愿意参加到无产阶级队伍里来，一同革命，一同前进，这又有什么不可以呢？拿我自己来说，我的背景就非常复杂。我先是相信吴佩孚的，后来相信国家主义，后来又相信三民主义，最后才

相信共产主义，因为经过比较，认识到共产主义是最好的主义。我们说这种人复杂是复杂的，但他从自己的经验中真正了解共产主义，本质也是纯洁的。青年是纯洁的，但纯洁的不仅仅是青年，老头子也可以是很纯洁的。

从上面所说的看来，一个人的长处里同时也包括某些缺点，短处里同时也含着某些优点。用人就是用他的长处，使他的长处得到发展，短处得到克服。天下没有一个人是毫无长处、毫无优点的，也没有一个人是毫无短处、毫无缺点的，所以我们说，在革命队伍里，无一人不可用。

第二种毛病是，了解人的时候，只看他的今天，不看他的昨天，或者只看过去，不看现在；只看见功不看见过，或者只看见过不看见功；只看见今天的好，不看见昨天的坏，或者只看见今天的坏，不看见昨天的好。这样就往往对于干部不能有根本的估计。这种毛病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表现在随便提上来，随便放下去。我们共产党中也有过这种情形：今天这个干部表现得好一点，就把他一抬抬上了天，同一干部明天表现得坏一点，就把他一打打到地下去。你们看见过老百姓盖房子打桩，一上一下。使用干部不能也像打桩子一样，今天看他好，便把他提得高高的，明天看他做得不够，便把他打下去，后天又把他提起来，再后又打下去。这种一上一下打桩式的用人是不对的。造房子打桩愈多愈好，如果对干部也这样来几次，我说顶多只要三次，这个干部就算断送完了，因为他的自信力早已失掉，再也不敢做工作了。过去我们在江西苏区工作的时候，有一个毛泽覃同志，是毛主席的弟弟，人家说他犯了一个错误，要不得，便认为这个人不能用。后来扩大红军需要人工作，于是派他到一个区域去，结果不但完成了任务，并且还大大地超过，成绩非常好。他回来的时候，许多人又把他抬高起来，调他到闽赣边界的游击区去工作。隔了几个月，因为他

了几句似乎有些近于右倾机会主义的话，正在这个时候，恰巧又派他去扩大红军，没有取得很好的成绩，于是又都说他不能用了。大家都不要这个人，送到这里拒绝，送到那里拒绝。一个这样的同志，竟会到处无人要，连饭都几乎吃不成了。后来红军退出江西的时候，他在战斗中勇敢地牺牲了，为着革命流了最后的一滴血。所以，我们看人不要只看一时，只看一面。对于一个人没有根本的估计，用人就会造成很大的错误。

这就是今天我要讲的了解人的问题。

再讲第二点：气量大。

用人要气量大。何以要讲这个问题？现在时代变更了。一九三八年与一九二八年有何不同？卢沟桥事变以前与卢沟桥事变以后有何不同？我说今天许多人归向了共产党，天下英雄豪杰云集延安。我记得一九三二年在上海开办一个学校，训练工人干部，只讲六天，学生也只有六个。今天我们抗大就有几千个学生，再加上陕公、鲁艺、党校，在延安就有一万多个学生。一万个跟六个比一比，相差多少？所以我说十年以来，人心大变，不管男女老少，都不怕艰苦，不远千里而来延安。抗大在武汉登报申明不招生了，一点没有用，仍旧是络绎不绝地来，没有汽车用两条腿走，男男女女从几千里外都来了。主要是革命青年，也有大学教授，有工程师，有一个七十五岁的老头子也来了。西北旅社住的什么人都有，各党各派，新闻记者，还有青年组织的参观团，等等。这些人不见得是在外面没有饭吃，要到延安来吃小米。从这种情况看来，复杂是复杂的，但是到底是复杂好还是简单好呢？从前办学校只有六个学生，倒很简单。今天各种各色的人都有，复杂得很。我看要干大事情，就免不了要遇到复杂情况。将来领导全国的时候，情况会更加复杂；只有几个人，不要发展，才简单，但是革命一定不会成功。共产党是先锋队，要领导广大的后备军，要与广

大群众打成一片，它周围必然是复杂的。今天只有抗大、陕公的同志去和敌人搏斗还不会成功，要团结更多的同志和广大的群众。干革命如果怕复杂，便会愈弄愈复杂，不怕复杂，革命就好办。

孙中山先生是一个伟大的人物，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几天之内全国就有十几个省起来响应。何以孙中山先生能够得到成功呢？原因之一就是气量大，什么红枪会、哥老会、三教九流的人他都要，不论党派成分，各种人都要，所以能做大事。我们也必须善于用人，只要这个人有一技之长，就要用，只有这样，才能成大事业。我们能不能说只有共产党员才是了不得的人才呢？不见得。社会上的人才不知有多少，许多人都不是共产党员。所以我们要有大气量，善用各种人才。单枪匹马，革命到底是干不成功的。

同志们毕业后到敌人占领区域，到敌人的后方去工作，在那些地方用人，更要有大的气量。那里有许多从大城市避难出来的人才，躲在田野山里。你代表民族和劳动人民的利益，组织游击队，只要干得好，包管躲着的人会出来归向你。那些学者、艺术家、科学家、政治家、经济学家，假装成农民的，这时候都露出真面目，投奔到你的地方，这些都是很有用的人才。山东有一处地方，只去了几个共产党员和一个八路军干部，号召老百姓抗日，一下就来了几千人，现在已经有一万人了。

现在讲第三点：用得好。

要有什么方法用人才能用得好呢？我想没有旁的道理，只要是在你领导下的人都很高兴工作，都很积极工作，能够这样，工作就一定会做得好。任何工作都是一样，你们以后做地方工作，军队工作，或者党的工作，要使每一个人都很负责，都很积极努力，都很高兴，就一定会把工作做得很好。就怕在你领导下面，常常发生这样那样的问题，如不安心，请求调动

工作，等等。一个同志如果工作合适，能发挥所长，是绝对不会请求调动工作的。他要求调动，说明他已经不能安心工作。如果常常出现这种情况，根本的原因就是领导得不好。那末，要怎样领导才能使干部高兴地安心地工作呢？只有一条，就是上级要信任下级，下级也信任上级，上下互相信任。对领导人来说，一定要做到让下级敢于说话，敢于做事。有许多下级干部，把意见放在心里不讲出来，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很服从，开会的时候你问他：“同意不同意呀？”他说：“同意呵！”“同意的举手呀！”他举手。然而，实际上问题并没有解决。所以一定要使下级敢说话，同时还要使下级敢做事，就是做错了也不要紧，如果这个下级既敢说话，又敢做事，他就一定会积极起来。

不敢说话为什么不好呢？举例来说，如果有人有某些不同的意见，又不敢说，而议案已经表决通过，这些决议案在执行的时候，就不能发生很好的效力。所以宁可争论，不要形式上的一致通过。

用什么方法使别人敢说话呢？有几点需要注意的。

第一，领导者的态度要好。如果在一个领导机关里，一个领导者别人见了他就不敢说话，事情怎么能办得好？如果大家都喜欢亲近他，都爱和他说话，这个领导者一定很能团结人。如果一个领导者架子搭得很大，面孔死板板的像阎王那么可怕，一定没有人去接近他，即使和他讲话，十句话也要忘记八句。其实，领导者又何必装出很凶很庄严的样子呢？同志们也许要问我，领导者的好坏是从政治上来看的，为什么要看面孔呢？但是很多人都要看面孔，不要说别的，就是共产党员中间也有这种习惯，所以领导者必须注意这个问题。

还有，开会的方式不要刻板。开会时尽可让到会者随便、热烈的争论。规规矩矩请他们一个一个发表意见，很可能有的

人就不会说出自己的意见，因为有人常常不敢在严肃的场面中间说话。

总而言之，如果下级敢说话，有话就讲，这就是好的现象，就证明了你们领导得好，因为他们觉得说错了也不要紧。

第二，少戴大帽子。比如，有一个人说错了几句话，你就对他来一顿批评，不是说他是“左”倾空谈主义，便是讲他有右倾机会主义的嫌疑。如果随便给人家戴上这类大而无当的帽子，一个人头上戴上三四顶，恐怕就“差不多”了，不能工作了。

有一些人，专门把任何问题都提到原则的高度。比如，某个同志犯了一些小错误，他就说人家犯错误的根源是由于政治上的动摇。小的错误能说是因为政治上的动摇吗？把每个问题都提到原则高度是不对的，这种机械的了解十分危险。因为这是一件比较严重的事，我可以讲几个故事给大家听。从前有一个女同志，她把自己的一把剪刀放在枕头下面，后来大家把它检查出来了，就推论说：“大概是她不愿拿出来给人家用吧？”于是下了个结论，批评她是“个人主义”。个人主义与我们共产主义是多么的不相容！又有一个同志在吃饭的时候吃菜吃得很多，向来是吃菜“打冲锋”，另一个同志就批评他是自私自利。假如这个同志是共产党员的话，凭着自私自利这四个字，就得考虑他的党籍问题了。还有一个例子，陕北公学有一个学生，丢了一把洋刀，据说这是一件纪念品，所以他心里很不好过。一个同志见了他那种样子，问他什么缘故，他就说因为一把刀子丢了，于是这个同志就批评他“没有牺牲精神”，说是一个革命者连性命都要敢于牺牲，难道一把小刀还不能牺牲？这个道理好像很对，实际上，这种批评用在这件小事上未免太冤枉了人家。爱护一件纪念品，并不是不应该的事，怎么能因此断定这个人对革命没有牺牲精神呢？所以这这也是一个大帽

子。戴大帽子的原因，常常是因为把每个错误夸大，不适当地提到原则的高度。我们不应该机械地去看事情，一定要分出是不是错误，错误的大小轻重，不要随便乱给别人戴大帽子。

第三，当你去批评人家错误的时候，要指出人家错误的根源以及纠正错误的方法。批评的目的并不是出气，主要是在于真正帮助人家纠正错误。一般地说，批评的人有两种态度：第一种是声势汹汹地指责人家；第二种是和颜悦色地说服人家，善意指出犯错误的原因和纠正错误的办法。只有后一种态度，才能使被批评者心服意满，问题才能够真正解决。

上级领导人对下级的批评，务必要适当和正确，千万不要戴大帽子，因为上级领导人批评下级，与同级的同志互相批评所发生的影响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同级的人，他们认为大家都差不多，即使你批评他过火一点，或不大正确，还没有什么要紧，他也不会十分在意；如果是上级给他的批评，那就不同了，因为下级对上级所说的话，都是很认真的，所以不能随便地任意地批评。假如批评得过火或不正确，那要花费很大的气力，才能使得被你批评的人对你解除误会，才能使别人对他不至于蔑视。当然下级也要想到上级的出发点是好意，不要只看到态度或语气的不妥，就以为不得了。

批评的时候还要注意到：是老党员还是新党员，是老干部还是新干部，参加共产党久不久，革命的历史长不长。因为对于老党员批评，态度和方式好不好，没有多大关系。对新党员就不同，因为他们刚刚加入，他们的意识观念与老党员有差别，所以对他们批评，宜于采取温和的方式去劝导、说服。

总结起来，就是要使人敢说话。要人敢说话，就不能给人戴大帽子，不能把每个微小的错误都提到原则的最高度。要能善意地、诚恳地批评人，态度要好，还要指出犯错误的原因以及纠正错误的方法。

用人用得好，还要使人敢于做事。如果你有这样一个脾气，喜欢在你领导下的人遇到任何一个小问题，任何一件小事情，都要向你请教，先征求你的意见，你才觉得很快活，很舒服，觉得自己才像一个领导者，这种脾气对工作妨碍很大。一个人能有多少力量、多少时间？即使你的精力很强，“天下第一”，也要有天下第二、天下第三的人来帮助扶持，你才会成功。假使没有他们，你一个人也第一不起来。领导者犯了这种毛病，会降低干部的责任心，妨碍下面同志的工作自信力和积极性。比如一件事情做得很对，他说这是上面叫我做的，一件事情做错了，他也说这是上面叫我这样做的，他完全不负责任，事情做得对不对与他没有直接的关系。下面的干部没有责任心，工作一定不会做好，还会降低他们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妨碍他们工作能力的发展。

也许有些同志要说，你这种让下面的干部发挥主动性的领导方式不大好，恐怕要生出许多错误来。然而我看，错误虽不可免，但也不必怕。在一定意义上说，一个人不犯错误就不会进步。一个人犯了一次错误，同时也就是得到一个教训，不断地取得教训，方能不断地改进自己。正确的东西常常是从错误中得来的。科学家发明的东西，哪一件不是从试验和错误中得来的？今天流线型的汽车漂亮得很，灵活得很，但是到博物馆里去看一看最初发明的汽车，笨得要命，真不好看。由从前的不好，进步到今天这样好，这中间经过了不知道多少次的试验和失败，才得到成功的。一个同志犯了一点小错，并没有什么关系；真的犯了错误，只要老老实实吸取教训，他的经验一定会增加，能力一定会提高。所以，不要怕下面干部犯错误，要让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

总结起来说，使干部敢说话、敢做事是很重要的。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干部的积极性，使干部很安心地工作。假使你说

一他就一，你说二他就二，那他就等于电话机，不能发挥他的才能。一个单位，干部不要求调动工作，而且有主动性和创造性，领导必定很好；如果干部都不安心，要求调动工作，领导一定有些什么毛病。以后大家出去做领导工作，能做到使下级敢说话、敢做事这六个字，工作效果一定会好的。

最后讲第四点：爱护人。

这里有几个问题要注意。

一、使用干部不要今天拉起来，明天又放下去，好像打桩一样，这是我前面讲过的。如果你要提拔这个干部，首先就必须全面地估计他的政治品质和能力，看他各方面是否合适，要详细考虑一番。既然提拔起来，要经常留意他的工作，到他实在不能支持的时候，就要想办法，不要等他塌台以后，再来追究责任，撤换他的工作。

二、对下面干部任何不安心问题，都要想法子去解决。我住在那个山上，有时候也烦得很，刚刚看文件，就会有人来找你，到底会不会他呢？很犹豫。可是，设身处地想一想，人家热心来找你，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事情需要解决，所以还是应该会一会。有时候正在写一件东西，一个不速之客，事先不打招呼就跑进来了，你不能还是直挺着腰板坐在那里不睬人家，只得放下笔来，倾听他说话；谈话的时候，还要聚精会神，耐心地郑重地解答各种问题，这样才能满足人家的要求。如果花了几个钟点，替一个干部把事情办好，也还是值得的。做干部工作，无论大事小事，都要不怕麻烦。除非不接受人家的要求，既然接受了，就得彻底替人家解决，花一些时间，决不是白白浪费的。

三、当着解决一个干部的问题，关系到他的政治生命的时候，要很郑重、很谨慎、很细心地去处理它。一个参加革命工作的同志，往往对于肉体生命并不重视，对于政治生命非常重

视，他宁愿牺牲一切，却不愿被党组织开除。如果在政治上发生这种问题，他就会认为他的前途没有希望了。所以不是到了不得已的时候，决不要开除党员的党籍。

常常有许多被开除党籍的同志来中央组织部上诉，或者写上诉状。这里举个例子：有一个人还很年轻，因为有人的口供说他是托派，被开除了党籍；这个人后来虽然解决了党籍问题，但是七年来光荣的历史完全不算了，同一个新党员一样。这个人要求把问题弄清楚，证人是有的，一个在西安，一个在延安，一个在一二九师，还有一个在外国，就一一写信去调查。经过比较长的时间，直到最近，各方面复信收集齐了，才知道以前是弄错了，我们承认了他过去的光荣历史。于是这个人由过去一个“死人”，只想“我还是到前线去牺牲掉算了”，现在变成活人了。调查时间花了两个月，值得不值得呢？我看是很值得的。因为两个月绝对培养不出一个干部来，花两个月挽回一个干部再值得没有了。

再举一个例子。有一男一女，有人告发他们，说男的是托派特委委员，女的是托派分子。他们到这里来读书，要求进党校，进训练班，便来找我想法子，但是人家已经控告了他们，于是我就照实告诉他们：有人说你们是托派。这年轻的一男一女听了我的话，马上就惊异得哭起来了。我便保证替他们解决这个问题。他们来的时候一跳一蹦的非常活泼，走的时候都哭了回去。后来只花了两个星期工夫，查清他们不是托派，解决了这个问题，不是很值得吗？

有的同志常常怕连累自己，不敢正确地替别的同志做证明人，所以领导人遇到这类政治历史问题，更要慎重办理，否则有些人的问题永远不能解决，使被嫌疑的同志冤沉大海，这实际上是损害党的事业。这一点，无论是领导党的工作，领导军队，都要十分注意。

同志们！做父母的爱护他们的子女是非常周到的，但是共产党爱护党员也并不下于父母爱护子女。任何一个人犯了错误，都应该帮助他纠正。如果他犯过的错误非常严重，甚至是很大的罪过，怎么办呢？这时候就要看他过去有没有功，如果有功，就要把他功过比较一下，再作处理。如果一个人从前犯了错误，现在还在犯错误，这样的人，经过批评，只要赶快觉悟，下一个决心，回头是岸，将来能够转变得好，也还可以将功赎罪的。我们共产党是讲公道的。犯了错误只要自己觉悟，只要能够切实改正，在革命队伍里就应该允许人家继续革命。今天犯了错误，以前的功劳可以拿来相抵；若是今天有错，以前也有错，可以将来赎罪。我们共产党要尽最大努力把有错误的人挽救回来，因为这样做对于革命有利。

四、对于干部不要“抬轿子”，只说他的好处。如果对于下面干部只说他好，掩饰他的缺点，以致养成他自高自大，工作不求实际，这样只会害干部，而不是帮助干部。

干部中间也有些人很喜欢别人说他的好话，说他好就感到舒服，不然他就生气，很不乐意。其实光说好话的人都是拍马屁的，拍马屁决不是件好事；不客气批评别人的人，才是好人，才够得上是革命同志。有些干部常常不了解这一点。俗话说，“忠言逆耳，良药苦口”，每个同志都要注意这一点。

总结起来，爱护人很重要。凡是提拔干部，得全面估计他的德和才；既提拔起来，就得多方面帮助他，不使他垮台。对干部一切不安心的问题，都要很耐心很彻底地去解决。当牵涉到一个干部政治生命问题的时候，要很郑重很谨慎地处理。对于干部，不要“抬轿子”，要实事求是。做到这些，才能算真正的爱护人。

我就讲这些。但是有两点必须申明：第一，同志们不要引起这种感觉，以为革命纪律这东西也可以不要了，这种观念是

不对的。一个革命的队伍必须有铁的纪律，来保障完成革命的任务。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如果没有铁的纪律，也就不会存在，不可能发展到现在这样。革命的纪律一定要遵守，希望同志们不要违犯革命的纪律，我这篇讲演不能帮助那些违犯纪律的人。第二，有的同志过去受了什么冤屈、处罚，不要使用我这篇讲演来打反攻战，今天乘机来反攻、报复，这样就不好。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谁能够不做一点错事？只要改正了，就算很好。同志们的气量要大些。

我的讲演完了。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出版的
《陈云文选》第一卷刊印。

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开幕词

(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

张 闻 天

同志们！从一九三四年一月的五中全会到现在已经五年了。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而奋斗的五年。

这五年中间有过许多重大的事变。反对五次“围剿”的英勇斗争，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中央到达陕北地区，创立陕甘宁抗日根据地，渡过黄河东征，以及后来的西征——这是一系列艰苦卓绝的斗争。由于日寇进攻华北，引起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我党在一九三五年发表了八一宣言和十二月决议，一九三六年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发生，实现了全面抗战，中国革命发展到了抗日民族战争的新阶段。现在抗战已经进行一年多了。

在这许多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变中间，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解放而英勇斗争，发挥了模范作用。

在这五年中间，我们牺牲了许多同志，有知名的同志，还有许多不知名的同志，以及党外的同志，我们深深地悼念他们。

(宣读牺牲者名单⁽¹⁾。全体起立，静默三分钟。)

我们还要向目前正在前线上浴血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日联军、全国国民革命军表示敬意。

同志们！在我们今天开会的时候，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都是非常紧张的。国际上和平阵线和侵略阵线进行着激烈的斗

争，国内武汉的抗战正处在最紧急的关头。我们是处在抗战的新阶段前面。如何使我们在中国民族抗战中发挥先锋作用，坚持已经进行了一年三个月的抗战，并增强我们的力量，这是这次全会要讨论的问题。我们要总结民族抗战的经验与教训，要正确估计目前形势，克服当前困难，使抗战走向胜利的前途。我们要确定明确的方针，使我们党进一步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使我们党成为广大的群众性的布尔什维克的党，以保证抗战的胜利。我们还要讨论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问题。所有这些，都是为着使中国共产党能在抗战中起先锋作用，实现民主共和国，直到将来实现社会主义。

我相信我们全会一定能解决这些任务。目前的历史条件对于我们党完成这些任务是有利的。我们有正确的政治方针，有共产国际对我们的宝贵支持，有全党的统一和团结！只要我们有克服困难的决心，在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就一定能够实现民主共和国的任务，并在将来转变到实现社会主义。

现在，我正式宣布：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开幕！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出版的
《张闻天选集》刊印。

注 释

〔1〕张闻天宣读的牺牲者名单如下：瞿秋白（中央委员）、方志敏（第十军军长）、顾作霖（少共中央书记）、董振堂（第五军团军团长）、刘志丹（第二十八军军长）、徐彦刚（第十六军军长）、寻淮洲（第七军团长）、何叔衡（工农监察委员）、陈寿昌（湘鄂赣省委书记）、贺昌（总政治部副主任）、刘伯坚（五军团政治部主任）、阮啸仙（中央苏区审计委员会主席）、殷鉴（河北省委书记）、李天柱（政治委员）、黄甦（军政治委员）、邓萍（三军团参谋长）、吴焕先（二十五军政委）、李才莲（少共中央分局书记）、夏曦（中央委员）、梁柏台（司法人民委员）、曾日三（五军团政治委员）、万永程（福建省委书记）、毛泽覃（中央政府委员）、谢唯俊（特委书记）、李弼庭（总政治部组织部长）、孙□力（二十三师师长）、古柏（特委书记）、顾雄（二十三师师长）、毕士梯（第十五军团参谋长）、钟伟健（西征纵队

参谋长)、谢子长(陕西省委书记)、杨森(师长)、汤福林(二军团师长)、蔡会文(军区司令)、胡海(中央土地部长)、关英(省委书记)、曹德卿(三军区第六师师长)、胡南生(团省委组织部长)、李乐天(粤赣边特委书记)、李新庭(军政治部主任)、洪超(第四师师长)、陈阿金(第五师政委)、方维夏(特委书记)、余泽洪(游击队政委)、徐策(川南游击队司令)、戴原怀(川南游击队政治部主任)、陈桂(团长)、龙腾云(福建军区司令)、刘石(特委书记)、赖昌作(特委书记)、钟瑜、钟昌才(少共省委书记)、宗孟平(特委书记)、李赐凡(江西军区司令)、李美群(女,少共省委组织部长)、张文楷(下江游击队队长)、李斗文(下江游击队政委)、陈荣文(东北联军第七军军长)、金伯阳(满洲省委委员)、夏云楷(抗日联军第六军军长)、何忠国(抗日联军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孙玉清(九军军长)、陈海松(九军政委)、杨克明(五军政委)、熊国炳(省府主席)、邹剑平(八路军副旅长)、叶成焕、陈锦秀(八团团长)、刘立明(团政治部主任)、刘立年(团政委)、胡道全(团政治部主任)、潘文碧(营长)、刘国清(营长)、刘子炎(营长)、余□龙(营长)、谭公强(山西保安游击队第一支队队副)、刘森堂(山西保安游击队第一支队营长)、周平(山西保安游击队第一支队支队副)、钱亦石(文化工作者)、陈柱天(全国学联)、鲁迅、郝梦麟、佟麟阁、赵登禹、王铭章、罗芳伍、姚子青、李桂丹、陈恒民、刘在刚。

论新阶段*

——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

(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二日——十四日)

毛泽东

同志们，我代表中央政治局向扩大的六中全会作报告，我准备说些什么呢？我要说的分为下述几部分：（一）五中全会到六中全会；（二）抗战十五个月的总结；（三）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四）全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五）长期战争与长期合作；（六）中国反侵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运动；（七）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八）党的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我要说的就是这些问题。

同志们，在全国炮火连天全世界战争危机紧迫的环境中来开我们的六中全会扩大会，我们要做些什么工作呢？我们的目

* 这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政治报告。这个报告是在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二日至十四日分四次作的，十月十二日下午讲报告的第一、第二、第三部分，十三日下午讲报告的第四部分，十四日下午讲报告的第五、第六部分，十四日晚上讲报告的第七、第八部分。报告全文发表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出版的《解放》第五十七期。其中，第七部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后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部分《抗战十五个月的总结》、第三部分《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后收入《毛泽东军事文集》。

的何在呢？我们一定要同全中国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同胞永远的团结起来，克服新的困难，动员新的力量，在目前，停止敌之进攻，在将来，实行我之反攻，达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三民主义共和国之目的，我们一定要自由，我们一定要胜利——这就是我们的目的，也就是我的报告的总方向。

一 五中全会到六中全会

（1）扩大的六中全会之召集

我们党的中央全体会议，自从一九三四年一月在江西开过第五次中央全会以来，差不多五个年头了。因为各中央委员分散工作于国内外各种不同的环境，使我们不能聚集一块。此次则除了几个同志之外，最大多数的中央委员都到了，而且到了全国各地许多领导工作的同志，使我们的这次中央全会成为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人数到得最多的一次。本来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在本年召集的，因为战争紧张的原故，不得不把“七大”推迟到明年，而当前时局向我们提出了许多的问题，必须作明确的解决，以便争取抗战的胜利，所以召集了这次扩大的中央全会。

（2）五中全会到六中全会

五年以来，我们党经历了许多重大的事变。最大与最主要的是：由国内各党派各阶级互相对立的局面转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由国内战争转到了抗日战争。

过去国内战争形成的原因，在于一九二七年不幸破裂了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这是由于当时的历史环境形成的。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又是怎样形成的呢？乃是由于新的历史环境。大家都已非常明白，自从九一八事变以来，中

华民族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经过侵略东四省的第一步骤，进到准备并实行向全中国侵略的第二步骤。这种空前的历史事变，使得国内国际情况都发生了变化。首先变化了与变化着国内各个阶层，各个党派，各个集团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也变化了与变化着国际间的相互关系。因而我们的党，根据这种空前的历史事变，根据新的国内国际关系，沿着远在一九三三年就已开始采取的新的政治立场（三个条件下与国民党内任何愿意同我们合作的成分订立抗日作战协定）的道路，把它提高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因而发表了一九三五年八月的宣言，十二月的决议，一九三六年八月的致国民党书，九月的民主共和国决议，并且根据了这些，使得我们能够在当年十二月间发生的西安事变，坚持了和平解决的方针，并于一九三七年二月送致国民党三中全会一个团结抗日的具体建议。去年五月，召集了一次临时性的代表大会（名曰苏区代表大会，有当时苏区、非苏区及红军代表参加），通过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目前阶段的任务》，批准了红军实行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苏维埃实行改为民主制。这样，就在事实上由国内战争的状态转到了开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时期。当时，中国国民党也逐渐改变了它的政策，逐渐转到了团结抗日的立场。假如没有国民党政策的转变，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那时，救国团体在许多地方有了组织，其他党派亦有了抗日要求。由于国共两党双方政策的转变，由于蒋介石先生的领导，由于全国军民的拥护，由于其他集团与其他党派的协力，就使得日本帝国主义灭亡全中国的侵略步骤，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全民族的反抗。去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发生之后，全中国就在民族领袖与最高统帅蒋委员长的统一领导之下，发出了神圣的正义的炮声，全中国形成了一个空前的抗日大团结，形成了伟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卢沟桥事变后的第二月，即去年

八月，我们党发布了一个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同时，八路军改编完成，开赴华北作战。九月二十二日，我们党发表了公开宣布以三民主义为基础与国民党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的宣言。第二日，国民党、国民政府与国民革命军的最高领袖蒋介石先生发表了承认共产党合法存在并与之团结救国的谈话。从此以后，以国共两党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完全建立起来了。十二月，为着巩固与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党又发表了愿与国民党不但合作抗日而且合作建国的宣言。此时未久，南方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开赴江南作战。从此以后，抗日团结便日益进步了。

同志们，这种由两党十年战争转到两党重新合作，并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之下执行了这个转变，奠定了两党长期合作的始基，是经过了许多艰难曲折才完成的。然而由于中央与全党的努力，总算是完成了。共产国际完全同意我们党的这个新的政治路线（共产国际决议，九月八日《新华日报》）。并为了中华民族的胜利，号召全世界各国共产党与无产阶级援助中国的抗日战争。

同志们，假如没有国共两党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建立与坚持，如此伟大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之发动、持久与争取胜利，是不可能的。现在全中国全世界的人都明白：中华民族是站起来了！一百年来受人欺凌，侮辱，侵略，压迫，特别是九一八事变以来那种难堪的奴辱地位，是改变过来了。全中国人手执武器走上了民族自卫战争的战场，全中国的最后胜利，即中华民族自由解放的曙光，已经发现了。

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的这一伟大的民族战争，和中国过去一切历史时期的战争都不相同。因为这个战争是为了把中华民族从半殖民地状态中、从亡国灭种危险中解放出来的战争，而

且这个战争是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最进步的时期进行的；同时，又是在我们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自寻死路走向崩溃的时期进行的；同时，又是在全世界先进人类正准备着空前广大与空前深刻的斗争力量，以便抵抗与战胜德日意法西斯魔王，争取世界光明前途的时期进行的。这样三方面因素的结合——以中国进步并且继续进步为主要基础的三方面的结合，就保证了我们的抗日战争一定能够最后取得胜利，而自由解放的新中国一定要出现于东亚，并成为未来光明世界中一个极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样的—一个中国，不但将造福于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而且将造福于全人类。

(3) 六中全会的任务

这次扩大的六中全会，是处于抗日战争将要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重要关头开会的，扩大的六中全会担负了重大的历史任务。

完全不错，抗日战争英勇奋斗了一年多，全国有了伟大的团结与伟大的进步，给了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的打击，虽然失地很多，但同时就有了很多胜利，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战争发展下去，主要的由于中国继续进步，同时配合着日本增加困难，国际助我增强，最后胜利定属于我，不属于敌，这也是可以预断的。谁要是看不见过去的伟大成绩与未来的胜利前途，谁就要陷入悲观主义的深坑而不能自拔。然而单看到这一方面，是不够的。抗日战争还有另一方面，还有它的消极方面，这就是我们面前摆着的许多困难。目前的情况告诉我们，一年多以来中国所有的奋斗，团结，进步，胜利，还未能阻止敌人的前进，还没有反攻敌人的力量。武汉现正处于敌人的威胁中，敌人还要向广州、长沙及西北等地进攻。因此全国人民都盼望共产党发表意见，新的环境提出了许多问题。同志们，我

们必须发表意见，必须解决问题。对的，我们党早已发表了意见，许多根本问题也早已解决了。但新的环境要求我们发布新的意见，解决新的问题。

什么是新的问题呢？

如何在现有基础上增加新的力量，渡过战争难关，停止敌之进攻，准备我之反攻，达到驱逐敌人之目的，这就是当前问题的关键。这个问题在全国无数人们中议论着，焦思着。我们应不应该回答这个问题呢？无疑是应该回答的。

这个问题展开于各方面，发生了许多的问题。

例如，十五个月抗战的经验，究竟证明了什么呢？十五个月经验证明抗日战争是长期的，还是短期的呢？战略方针是持久胜敌，还是速战胜敌呢？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还是敌人的？抗战有出路，还是妥协有出路呢？如果战争是长期的，又用什么方法去支持长期战争与取得最后胜利呢？所有这些，是否能在十五个月经验中找到根据给以明确的回答？并是否可以依据这些过去基础而在抗战的新阶段中起其积极作用，借以克服新的困难争取新的胜利呢？这些都是重要的问题。这是一类的问题。

又如，整个抗日战争将怎样发展变化呢？所谓新阶段，究将是一种什么性质的阶段呢？假定武汉不守，战争趋势将怎么样呢？今后全国努力的方向，即全中华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应是什么呢？有些什么好办法足以渡过战争的难关呢？这些更是重要的问题。这又是一类问题。

又如，国共合作的前途与远景将会怎样呢？共产党有何根据来说长期合作呢？共产党有何办法来改善两党之间的关系呢？所谓不但合作抗战而且合作建国，究将建立一个什么国呢？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怎么样呢？这也是很重要的问题。这又是一类问题。

又如，世界风云如此紧急，其趋势将怎样呢？中国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运动有何利害关系呢？这也是重要的问题。这又是一类问题。

还有，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如何呢？共产党员为着其党的政治方针而奋斗时，其工作态度应该怎样呢？共产党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同他党合作，同人民联系，足使艰难的时局走向顺利呢？共产党的内部关系怎样？有些什么好方法团结全党使之在抗日战争中尤其在当前艰难的时局中起其大的作用呢？共产党的七次代表大会究将怎样呢？这也是重要的问题。这又是一类问题。

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党内党外迫切要求解决的。近几个月来，我们经常遇到要求回答这些问题的人们。

同志们，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广大而复杂的国家，而这个国家现正处于同一个强的帝国主义作决死的斗争，这个斗争现在已接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目前正处于向新阶段发展的过渡期间。我们的扩大的六中全会是在这个时候开会的，扩大的六中全会的责任非常重大，我们要解决许多的问题。

二 抗战十五个月的总结

(1) 十五个月经验证明了什么？

让我们从十五个月的经验说起罢。

十五个月抗战的经验给了我们以什么呢？我以为主要的有三方面。第一，证明了抗日战争是长期的不是短期的，因而抗战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第二，证明了中国的抗战能够取得最后胜利，悲观论者之没有根据。第三，证明了支持长期战争与取得最后胜利之唯一正确的道路，在于统一团结全民族，力求进步与依靠民众，借以克服困难，争取胜利，而

不是其他。

(2) 抗日战争是长期的不是短期的，
战略方针是持久战不是速决战

抗战初起之时，许多人不从敌我力量基本上的对比出发，而从若干一时的与表面的现象出发，设想战争不久就可解决，速胜思想笼罩一时。然而蒋委员长在去年双十节即明白指出：“此次抗战，非一年半载可了，必经非常之困苦与艰难始可获得最后之胜利。”我们则在很早的时候就指出了抗日战争的长期性，决不是一个短时间可以解决的。“战争的结果，日本必败，中国必胜，只是牺牲要大，要经过一个很痛苦的时期。”（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六日毛泽东与斯诺谈话）“应该看到这一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所有这些都指出：抗日战争是长期的不是短期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不是速决战，抗战十五个月的经验完全证明其正确。

理由何在？在于敌强我弱，敌是优势，我是劣势，敌是帝国主义国家，我是半殖民地国家。

我们很早就指出过，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要有三个条件：第一是中国的进步，这是基本的，主要的；第二是日本的困难；第三是国际的援助。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些条件在抗战十五个月中已经怎样了？一句话回答：已经有了一个基础，但距必要的程度还很远。

拿第一个条件（战胜敌人基本的主要的条件），中国的进步来说，十五个月来确已有了一个基础，但惟有继续进步，才能最后胜敌。所谓中国的进步，包括国内政治、军事、党务、民运、文化教育等一切方面。这些方面的进步，十五个月来是非常显著的。然而单拿这些已有的东西，还不能停止敌之进

攻，实行我之反攻。反攻必须有一个准备时期，必须经过全民族的努力，使我们民族中一切生动力量有了一个广大的与深刻的发动，才有反攻胜敌之可能。因此速胜论是没有根据的，他忘记了敌强我弱这一特点，忘记了敌是优势，我是劣势，敌是帝国主义国家，我是半殖民地国家。中国具有很大的潜势力，发动起来足以使自己转败为胜，转弱为强，根本变化敌我形势，然而还待今后的努力，不是现成的事实。

拿第二条件，日本困难来说，也是这样。十五个月中，敌人出兵百万，伤亡数十万，用费数十万万，军队锐气日减，财政经济日形竭蹶，国际舆论纷起谴责，这些都是日本的野蛮侵略与中国的英勇抗战造成的结果。然而敌人这些已存的困难，还不足以停止他的进攻及利于我们的反攻，还须待到敌有更大困难我有更大的进步之时，才是反攻胜敌之机会。因此，速胜论在敌情方面也没有根据，十五个月经验已经证明了。

拿第三条件，国际助我一点来说，现在也还未至最大有利之时。十五个月来，我们有了国际间广大的舆论声援，苏联和其他民主国家根据国联决议已经给了我们许多帮助，证明了我们不是孤立的。然而我们必须看到国际和平阵线各国各有其各不相同的情况。资本主义国家，人民助我，政府则取某种程度的中立态度，其资产阶级则利用战争做生意，还在大量输送军火与军火原料给日本。社会主义国家，根本上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在援华问题上已经具体的表现出来；然而国际形势目前还不容许它作超过现时程度的援助。因此，我们对国际援助暂时决不应作过大希望。抛开自力更生的方针，而主要地寄其希望于外援，无疑是十分错误的。十五个月经验证明：只有主要依靠自力更生，同时不放松外援之争取，才是正确的道路。在这点上，过去经验也否定了速胜论。

总起来说，不论中国方面，敌人方面，国际方面，十五个月经验，都证明速胜论主张之毫无根据，相反，显露了战争的长期性与残酷性。因此，我们的战略方针，决不能是速决战，而应该是持久战。持久胜敌——这就是抗日战争的唯一正确方针。过去不相信这种方针的，现在事实给了明白的教训，应该再没有疑问了！

这就是十五个月抗战的第一个总结。

（3）最后胜利是中国的，悲观论者毫无根据

抗战以前，唯武器论大张旗鼓，认为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亡，中国必会作亚比西尼亚。抗战以后，这种议论表面没有了，但暗中流行着，抗战每至一紧张关头，这种议论必兴风作浪一次，认为中国应该停战议和，不堪再战，再战必亡。我们则相反，我们认为中国武器诚不如人，但武器是可以用人的努力增强的，战争胜负主要决定于人而不决定于物。持久抗战的结果，依据于全民族的努力，中国必能逐渐克服自己的弱点，增加自己的力量，化被动为主动，化劣势为优势；同时敌人方面的困难必逐渐增加，国际方面对我之援助必逐渐增大。综合这些因素，最后必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蒋委员长早已明白宣示：“战事既起，惟有拼全民族之生命，牺牲到底，再无中途停顿妥协之理。”（去年七月庐山谈话）“此次抗战为国民革命过程中所必经，为被侵略民族对侵略者争取独立生存之战争，与通常交战国势均力敌者大异其趣。故凭借不在武器与军备而在强毅不屈之革命精神与坚强不拔之民族意识。”（去年十二月告国民书）中国共产党亦早已指出：“日本在中国抗战的长期消耗下，它的经济行将崩溃，它的士气行将颓靡，中国方面则抗战的潜伏力一天一天的奔腾高涨。所有这些因素和其他因素配合起来，就使我们能够对日本占领地作最后的攻击，驱逐日

本的侵略军出中国。”（一九三六年毛泽东与斯诺谈话）“我们相信，已经发动的抗战必将因为全国人民的努力冲破一切障碍物而继续的前进与发展。只要真的组织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无疑的。”（中共去年八月决定）所有这些，都被十五个月的经验证明了。悲观论或亡国论者认为敌人强不可抗，中国不堪一战，妥协才是出路等等荒谬说法，已经证明是完全错的了。

理由何在？在于敌强我弱仅是一方面的事实，敌人尚有弱点存在，中国尚有优点存在。

什么是敌人的弱点呢？第一，他是比较小的国家，他的兵力、财力不足，经不起长期的消耗。由于他的兵力不足，在中国的坚强抵抗面前又不得不分散与消耗，使他无法占领全中国。即在其占领地区，由于中国的广泛发展游击战争，亦实际只能占领大城市、大道与某些平原地带，其他仍然是中国的。第二，敌人战争的性质是帝国主义的，是退步的。他的内部矛盾迫使他举行侵略战争，并迫使他采用异常野蛮的掠夺政策。这样，就使他的战争，一方面变为同整个中华民族绝对对立的战争，迫着中国除少数当汉奸者外无论什么阶层，无论什么党派，都不能不团结起来坚决抗战。另一方面，变为同他本国人民大众绝对对立的战争，日本帝国主义悉率人财以应战争的结果，已经在他国内人民与前线士兵中间逐渐酝酿了许多的不满，战争发展下去，无疑有迫使他的人民与士兵大众走上用坚决的方法反对战争本身的趋势。这些都在十五个月中已经开始证明了的。这一点，就是存在于敌人自己方面而使敌人必归失败的最主要的根据。第三，正是由于敌人战争的性质是帝国主义的，换句话说，损人利己的，就不得不把他自己同一切和他利害相反的国家处于对立地位。除了两三个法西斯国家之外，一切国家，尤其是这些国家的人民大众，都不赞

成日本的侵略战争。这样，就使得日本不得不日益缩小其国际活动的范围，日益处于孤立地位。这也是十五个月中已经开始证明了的。

这样，日本国度比较的小，影响到他兵力、财力的不足；日本战争的退步性；日本国际地位的孤立；这三者同时结合在一块，成为日本战争中存在着的先天性的弱点与困难，而这些弱点与困难又正在日益发展之中。对于这些，亡国论者与悲观主义者是瞎子，他们全没有看见，而仅仅看见了敌强我弱这一点。所以亡国论与悲观主义在敌情方面并没有根据，因而他们的妥协政策只能是亡国政策。我们是最后胜利论者，我们的观点则在敌情方面有充足的根据，十五个月经验已经开始证明了。

什么是我们的优点呢？第一，我们是大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不管敌人占去了我们主要的大城市与交通线，然而我们还有大块土地作为我们长期抗战与争取最后胜利的根据地。即在敌占地区我们也还有许多游击战争根据地。这个特点，是和小国如捷克、比利时等根本不同的。这是我们的第一个优点。第二，我们今天的抗日战争不同于中国一切历史时期的战争，我们的战争是民族革命战争，是进步的战争。不但战争本身的性质是进步的，而且这个战争是在中国前所未有的进步基础之上进行的。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不同于一切历史时期的中国，我们有了比之任何历史时期都不相同的进步的人民、进步的政党与进步的军队。在这个基础之上进行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它本身包含着可能继续发展进步的伟大力量。这一点，就是存在于我们方面而使我们足以支持长期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主要的根据。十五个月的经验证明，在原有进步基础上进行着的伟大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已经推动了全中国的进步，旧的民族腐败传统是在破坏着，新的民族进步力量是在

生长着，一个全民族统一团结进步发展的伟大过程是在向前完成着。抗战以前的中国不同于抗战以后的中国，这是有眼睛的人都能看到的了。而抗战第一阶段（这个阶段目前尚未完结）的中国又将不同于抗战尔后阶段的中国，也已经可以预断。还有，第三，我们的抗日战争不是孤立的。不管资本主义国家现时还保存其许多矛盾政策，也不管国际局势可能暂时地影响到各国助我的程度，但中国抗日战争与世界反侵略反法西斯的斗争，是不可分离地结合着。反对日本侵略战争的不仅是中国人，还有欧洲人，美洲人，非洲人，澳洲人，以及其他亚洲人。十五个月来世界各国的同情与援助，给了我们以这种确信。主要地依靠自力更生的中国，能够同时配合着世界的援助，因为今天的世界已不是从前的世界，整个世界先进人类已成为休戚相关的一体，敌人要使我们陷于孤立的企图，只会是徒然的。

这样，我们是一个很大的国家，我们的战争是进步的战争，我们又有国际的援助，这三者同时结合在一块。这些都是我们的有利条件，不但已经存在，并在日益发展之中。在这里，亡国论者与悲观主义者同样是瞎子，他们一点也看不见，而只看见我们是弱国，是劣势，是半殖民地这一点，喃喃发出其“抗战必亡”、“再战必亡”的胡说，其中许多坏蛋就根据这种胡说暗地进行其投降妥协的阴谋。我们相反，我们要根据十五个月经验中已经证明了的东西，向全党全国明确地指出我们国家与我们战争的长处与短处、有利条件与不利条件，并指出长处与有利条件在全战争中占居着优势，号召全国努力奋斗，发挥自己的长处，增强自己的有利条件，克服自己的短处与不利条件，为争取最后胜利而斗争。最后胜利将是谁的呢？我们确定地答复：中国的。在这个基础上决定我们的政策：坚决抗战还是动摇妥协呢？我们确定地答复：决不能有任何的动摇妥

协，只有坚决抗战才是出路。东四省之沦亡，奥国之灭亡，捷国之瓜分，都并非因为抗战，这是有目共见的。把丧师失地归罪于抗战的，只是完全的胡说。现在还是一样，在中国的许多优良条件下，抗战必兴，但如走妥协道路，则灭亡无可避免。因此坚决反对妥协论，反对悲观主义，唤起全民奋战到底，乃是唯一无二的方针。

总起来说，敌强我弱这个矛盾着的对比，决定了战争的长期性，决定了持久战的战略方针，我们是持久胜敌论者，不是速胜论者。敌小，我大；敌人战争是退步的，我们战争是进步的；敌之国际地位比较孤立，我则比较能得外援；这几个矛盾着的对比，又决定了战争的最后胜利定属于我，不属于敌。这就是十五个月抗战经验的第二个总结。

(4) 支持长期战争与争取最后胜利的唯一道路，在于
统一团结全民族，力求进步，依靠民众

抗日战争是长期的，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两个基本问题已从十五个月抗战经验中证明了。但支持长期战争与争取最后胜利的具体方案如何？则过去国人的意见是不一致的。许多人认为照老样下去就可以了，他们不注意团结全国，不注意军事、政治、文化、党务、民运等各方面的改进，甚至还在加重磨擦，阻碍进步。我们则从来不赞成这种意见，认为惟有全民族的统一团结，力求进步，依靠民众，才能支持长期战争与取得最后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中国国民党在其抗战建国纲领中明白指出：“欲求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固有赖于本党同志之努力，尤须全国人民戮力同心共同负担。”中国共产党亦早已指出了：“抗战时期最中心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

使抗战得到最后的胜利。”（中共去年八月决定）这些都是完全正确的，十五个月经验已经证明了。

抗战以来，把国内各个互相对立的阶级、党派、集团，都团结起来了，各个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军队，都统一于国民政府与军事委员会指挥之下了，抗战十五个月的坚持，没有这个统一团结是不可能的。也只有抗战，才能统一团结各方面。这种统一团结，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十五个月经验又向我们证明：敌人破坏阴谋之严重与内部团结巩固之不足。抗战为什么遭受很多挫折，为什么至今还不能停止敌之进攻、实行我之反攻，除了客观原因之外，统一战线力量之不足，统一战线还没有必要的扩大与巩固，是其最主要的原因。由此可知，只有更加统一团结全民族，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支持长期战争与争取最后胜利，这是第一。第二，十五个月抗战，不但推动了全民族的团结，同时又暴露了这种团结之不足；而且推动了军事、政治、文化、党务、民运各方面的进步，同时又暴露了这种进步之不足。支持长期战争与争取最后胜利，必须发动全民族各阶层中一切生动力量，而欲达此目的，非从军事、政治、文化、党务、民运等各方面力求进步不可。没有各方面的更大的进步，就不能发动全民族一切生动力量，也就不能更进一步的统一团结全民族。第三，十五个月抗战又证明了民众援助抗战力量之伟大；同时也证明了民众力量之仅在开始发动，因而使抗战得不到民众的广大援助而遭受了许多挫折。从此得到教训，国人必须进一步的认识抗战依靠民众这个基本问题。依靠民众则一切困难能够克服，任何强敌能够战胜，离开民众则将一事无成。中国今后的进步，必须充分表现在发动民众力量这一方面。

总之，支持长期战争与争取最后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在于巩固与扩大全民族的统一团结，在于力求进步以发动全民族

的生动力量，在于依靠民众以克服困难，这就是我们的第三个总结。

同志们，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力求团结与进步——这就是十五个月抗战的基本教训，也就是今后抗战的总方针。我们是能够战胜敌人的，只要我们与全国坚持这个总方针，并作了长期的广大的努力。抗日战争正在向着一个新阶段发展，新阶段中有许多新的任务，但这个总方针是不变的，十五个月经验作了我们认识新的形势提出新的任务的基础。

三 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

（1）认识战争与统一战线的规律性是决定政策的基础

同志们，在我们总结了过去经验之后，重要的问题，在于看一看当前形势发展的趋向。抗日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会怎样从过去基础之上向前变化发展的？这是我们现在要答复的问题，这一点对于我们解决当前的问题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如果对于整个抗日战争变化发展的行程没有一个大概的估计，我们就只能跟着战争打圈子，让战争把自己束缚起来，而不能将其放在自己的控制之下，加之以调节整理，造出为战争所必需的条件，引导战争向我们所要求的方向走去，争取战争的胜利。因此必须懂得抗日战争的规律性，才能实现对于它的战略指导，才能决定为战争服役的一切战略、战术、政策、计划与方案。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是一样，只有我们研究了与认识了它的规律性，我们才能有效地推动统一战线使之进入巩固发展之途，而为战争的胜利起其支柱的作用。

我们现在先来说战争问题。

(2) 特定的历史条件与主观能力的优劣 决定战争的发展过程

历史上的战争有一个阶段就完结的，例如一九〇五年的日俄战争，只有日军进攻，俄军败退，就结束了。又如意亚战争，也只有意大利进攻，亚比西尼亚失败，就告结束。中国一九二六年开始的反对北洋军阀的战争，也是一样。这是一种情形，这是由于一方面双方强弱不同，又一方面双方指导能力优劣不敌而造成的，这是第一类战争。第二类战争，以两个阶段宣告完结。例如法俄战争，拿破仑从进攻到退却，俄国从退却到反攻，双方都有两个阶段。中国古代有名的吴魏赤壁之役，秦晋淝水之役，也是这样。虽则两军强弱不同，但弱者善于利用其他优良条件，给以正确指导，故于退却之后，接着反攻，战胜敌人。但是还有第三类战争，例如外国的七年战争，八年战争，三十年战争，百年战争，乃至二十年前四年的欧洲大战（特别表现于西战场），都有三个阶段。甲方进攻，乙方退却，为第一阶段。双方相持不决，为时甚长，为第二阶段。乙方反攻，甲方退却，为第三阶段。中国历史上也有许多这类的战争。这类战争的特点，在于有一个较长的或很长的相持阶段，这也是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与战争指导集团的特性而造成的。

中日战争属于哪一类战争呢？我以为是属于第三类战争的。这是由于双方不同的历史条件与不同的战争指导集团之特殊情形而造成的。

(3) 中日战争的长期性表现于战争的三个阶段

中日战争的长期性将表现于在敌则进攻，相持，退却，在我则防御，相持，反攻，这样三个阶段之中。由于敌强我弱（敌是优势，我是劣势；敌是帝国主义国家，我是半殖民地国

家），故出现了敌方进攻、我方防御的第一阶段。不说退却而说防御，是说以战略的运动防御即节节抵抗的姿态而表现其退却，不是一下子干脆退却。但又由于在敌则小国、退步、寡助，在我则大国、进步、多助这些特殊的条件，我之英勇抗战又使敌在进攻中受到分散的困难与消耗的损失，而不得不于一定时机结束其战略上的进攻，转入军事上保守其占领地而从政治上与经济封锁上向我进攻的阶段。此时敌虽消耗，但一时尚未消耗到使之转入失败的程度；我虽坚决抗战与各方面向前进步，但一时也难进步到足以转入反攻驱敌出国的程度。依上诸因，一个双方相持的第二阶段，或中间阶段，就形成了。由于第二阶段中敌之困难与我之进步俱日增，又配合着国际有利于我不利于敌之形势，就能使敌强我弱、敌优我劣的原来状态逐渐发生变化，进到在全局看来日益于敌不利而有利于我之局面，先到敌我平衡，再到我优敌劣，彼时，就可转入我之反攻、敌之退却的第三阶段了。

上述三个阶段的看法，是依据敌我既存的与将来可能发生的双方相反对比之具体条件而作出的一种对于整个战争过程的估计，现在并不是事实，而是一种可能的趋势。要依我之主观努力，创造出为这种可能趋势所必要的条件，才能使可能趋势变为事实。然而依据既存条件，加上正确指导与全民族广大而坚持的努力，是能够使这种可能趋势变为事实的。

（4）速胜论者与亡国论者都反对这种估计

速胜论者反对三阶段论，认为我能迅速反攻，无需乎要一个中间阶段，这是不对的。抗日战争面前存在着许多困难，克服这些困难需要一定的时间，迅速反攻是不可能的。速胜论者的反对三阶段，是因为他们一方面过低估计了敌人力量，一方面又过高估计了自己力量的原故。亡国论者也反对三阶段，认

为相持与反攻都是不可能的，中国只是一个亚比西尼亚，这是不对的。他们与速胜论者相反，过高估计了敌人力量，而过低估计了自己力量。在他们面前只有黑暗，承认敌人能够灭亡全中国，我之抵抗与努力只是徒劳，办到敌我相持亦不可能，更不说什么反攻胜敌了。因此，必须一方面反对速胜论，又一方面反对亡国论，才能坚持我们的三阶段论。而在当前情况下，反对亡国论比之反对速胜论更加重要。另有一些人，口头上赞成持久战，但不赞成三阶段论。这也是不对的。所谓持久战，所谓长期战争，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表现在战争的三个阶段之中。如果承认持久战或长期战争，又不赞成三个阶段，那么，所谓持久与长期就是完全抽象的东西，没有任何的内容与现实，因而就不能实现任何实际的战略指导与任何实际的抗战政策了。实际上，这种意见仍属于速胜论，不过穿上“持久战”的外衣罢了。

(5) 三阶段论与国际形势的关系

当张高峰事件发生之时，国内一部分舆论兴高采烈，以为日苏战争如果爆发，中国就可以转入反攻，无需乎要持久战了。在这种观点下，三阶段论当然不能成立，我们的估计是错误的了。这是主要依靠外援的思想，是速胜思想之一种。然而国际形势不是照着这些朋友们的主观志愿发展的，而是依照它自己的规律。世界的主要重心在欧洲，东方是环绕着它的重要部分。世界的主要和平阵线国家与主要法西斯国家，正在为着欧洲战争危机问题，在西方纠缠不清，无论是各大国间的战争前夜或战争爆发，西方的各大小国家都将以解决欧洲问题放在议程的第一位，东方问题则不得不暂时放在第二位。拿这种情况来看中日战争，迅速反攻的两阶段论也是没有理由的。我们必须以自力更生为主，我们不但怕三阶段，而且正要造成三阶段。三阶段是中日战争的规律，不但在敌我力量对比上有其

根据，而且也在国际形势上有其根据。

（6）相持阶段是战争的枢纽

三个阶段的主要特点，在于包含一个过渡的中间阶段。这就是说，第一，我之抗战必须用尽一切努力去停止敌之进攻，假如敌之进攻不能在一定时间与一定地区停止下来，就无所谓性质不同的三个阶段。第二，相持阶段出现了时，必须用尽一切努力去准备我之反攻所必需的一切条件，设若不然，就不能过渡到反攻阶段里去，而只是永远的相持，也无所谓三阶段。在这里，对于速胜论者，我们肯定地说：必须经过一个准备时期，才能团结全国，克服困难，生长新的力量，同时配合着敌人的困难、国际的援助，然后实行反攻，驱敌出国，否则是不可能的。拿主要依靠自力胜敌的观点来看问题，不可避免的要作出这个结论。对于亡国论者与悲观主义者，我们肯定地说：只有这个过渡阶段，才是全战争的枢纽。中国化为殖民地还是获得解放，不决定于第一阶段中主要的大城市与交通线之丧失，而决定于第二阶段中全民族努力的程度。大城市与交通线的丧失是可惜的，增加了敌人的力量，减少了自己的力量。然而很多没有丧失的东西尚可作为制胜敌人的资本，唉声叹气于宝物的丧失是无益的。第一阶段中保存着的领土与各种有生力量，特别是已经获取的军事、政治、文化、党务、民运等各方面的进步，是最可宝贵的，这是第二阶段中继续进步与准备反攻的基础。然而这仅仅是继续进步与准备反攻的基础，还不能决定反攻，决定反攻的东西是第二阶段中增加上来的力量，没有伟大的新生力量之增加，反攻只是空唤的。

（7）三个阶段的特点，第一阶段

抗日战争三个阶段的特点，已经出现了的，尚未出现而可

以预计得到的，有概略指明之必要，对于指导战争与决定政策有重要的关系。

第一阶段有些什么特点或重要标志呢？

有如下三方面的东西。

第一，中国方面：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全国军队的参战，抗战的坚决性，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的发布，国民参政会的开会，共产党及其他党派的取得合法地位，游击战争的创造，全国军队的进步，民众运动的发展等等。这些都是中国方面表现进步的大事件。但同时，却又有许多有不利事件与不良现象，例如：主要大城市、交通线与主要工商业的丧失，土地与人口的丧失，全国进步的不平衡（有些地方进步得非常之慢），政治制度之一般还仅在开始走向民主化，顽固分子与腐败现象的存在，妥协倾向的酝酿等等。

第二，敌人方面：军力财力的消耗，世界舆论的责备，军纪的败坏，军队战斗力的相对地减弱，国内人心与前线军心不满的酝酿，张高峰战争的失败，汉奸军队的难于组成及已经组成者的无能等等。这些都是表现其困难的大事件。但同时却又有表现其能力的东西，那就是：进攻的坚决性，军力的顽强，占领地的扩大，政治组织力的强韧，阴谋机关的有力等等。

第三，国际方面：援华运动的增长，苏联力量的壮大及其对于中国的援助，这些都是有利于中国的东西。但是还有别的东西：欧洲大战的酝酿，英日间某种程度的妥协倾向，各国军火原料的助敌，这些都于中国不利。

以上中国、日本、国际的许多东西，都是抗战第一阶段中十五个月来表现的特点。这些特点，将分别生其影响于新的阶段之中。

（8）第二阶段

在假定武汉不守的情况之下，战争形势又将出现许多新的东西。虽然敌占武汉并不即等于旧阶段的完结、新阶段的开始，由现在敌人尚能继续进攻到他被迫停止进攻之时的这段时间，还是一个由旧阶段转向新阶段去的过渡期间。虽然如此，但武汉不守成为事实之后，就将发生许多新的情况。

武汉不守之后，以及新阶段的大部分时间，可以预计的基本情况，将是一方面更加困难，又一方面则更加进步。这是新阶段中的基本特点。

更加困难将表现于下述各方面：（一）由于主要的大城市与交通线之丧失，国家政权与作战阵地就在地域上被敌分割了，由此将发生许多新的问题；（二）财政经济之异常困难；（三）英日某种程度的妥协倾向（或相反，在日本坚持独占与威胁南洋的条件下，英日有进一步冲突的可能）；（四）如果敌攻广州，中国主要的海道交通有被割断之虞，国际援助将暂时的部分的减弱；（五）全国性伪政权有形成的可能及其对于抗日阵线的影响；（六）抗日阵线中部分叛变的可能，妥协空气的增长；（七）悲观情绪的生长，意见分歧现象的增加等等。这些都是可能发生而将加诸抗日战争身上的新困难事项。估计到这些困难，才便于有准备有计划地克服之。

更加进步将表现在下述各方面：（一）蒋委员长与国民党的坚持抗战方针及其在政治上的更加进步；（二）国共关系的改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与扩大；（三）军队改造工作的进步；（四）游击战争的发展与坚持；（五）国家民主化的进步；（六）民众运动的更大发展；（七）新的战时财政经济政策的实施；（八）抗战文化教育的提高；（九）苏联援助的继续与可能增加及中苏关系的更加亲密等等。

整个第二阶段即相持阶段，是中国准备反攻的阶段。其时间长短，依敌我力量变化的程度及国际环境如何而定。但我们应该准备长期战争，熬过这一段艰难路程，胜利的坦途就到来了。

第二阶段中虽然敌我在战略上是相持的，但仍有广泛的战争，主要表现于主力军在正面防御，而广大游击战争则发展于敌人的后方。那时，游击战争在许多重要战略地区将变为非常艰苦的战争，现在就应该准备对付这种艰苦。

(9) 第三阶段

具体情况不能预计。但彼时必是我之反攻条件业已准备完毕，同时敌之困难程度大大增加起来，国际形势又大大于我有利。彼时战争形势，不是战略防御或战略相持，而是战略反攻了；不是战略内线，而是战略外线了。彼时国内政治上必须有大的进步，军事上必须有新式技术，否则反攻是不可能的。

(10) 保卫武汉是争取时间问题不是死守问题

保卫武汉斗争的目的，一方面在于消耗敌人，又一方面在于争取时间便于我全国工作之进步，而不是死守据点。到了战况确实证明不利于我而放弃则反为有利之时，应以放弃地方保存军力为原则，因此必须避免大的不利决战。战略决战，在一二两阶段中都是不应有的，都足以妨碍抗战的坚持与反攻的准备，因此必须避免。避免战略决战而力争有利条件下的战役与战斗的决战，应是持久战的方针之一。于必要时机与一定条件下放弃某些无可再守的城市，不但是被迫的不得已的，而且是诱敌深入，分散、消耗与疲惫敌人的积极的政策。在坚持抗战而非妥协投降的大前提下，必要时机放弃某些据点，是持久战方针内所许可的，并无为之震惊的必要。

（11）由目前过渡到相持阶段

只有停止敌之进攻，才有利于我之准备反攻。而要达此目的，还须给一个大的努力。故由目前过渡到敌人被迫停止其战略进攻，转入保守其占领地，出现整个敌我相持的阶段之时，还是一个斗争的过程，须克服许多困难才能达到。因为敌在占领武汉之后，还不会立即结束其进攻，他必定还想向广州、西安、宜昌、长沙、衡州、梧州、北海、南昌、汕头、福州等地及其附近地区进攻。我要停止敌之进攻，还须针对着敌人这种企图继续执行战略的运动防御战，用极大努力进行坚持的战斗，再行大量地消耗敌人而又不为敌人所算，使敌之进攻不得不停止，把战局过渡到敌我相持的有利局面。

（12）但相持局面快要到来了

敌人占领武汉之后，他的兵力不足与兵力分散的弱点将更形暴露了。如果他再要进攻广州、西安、宜昌、长沙、南昌、梧州、福州等地并作占领之企图，他的兵力不足与兵力分散之弱点所给予他的极大困难，必将发展到他的进攻阶段之最高度，这就是我之正面主力军的顽抗与我之敌后庞大领土内游击战争的威胁，所加给敌人兵力不足（他不能足）与兵力分散（他不能不分散）现象上的极大困难。这一形势——在敌则兵力不足与兵力分散，在我则正面防御与敌后威胁，这是敌之极大劣势，我之极大优势。当然，在整个敌我力量对比上说来，敌强我弱、敌优我劣的基本形势并未变化，这只有在长期相持阶段内我用全民族的极大努力，并配合国外条件，才能使之变化。然而敌在进攻武汉的战斗中，他之强的力量已经进一步发挥了。这种强的力量之进一步发挥，一方面固然给了我们以损失，然而同时就给了他自已以困难。因为敌之强的力量（同时

即是其不足的与分散的力量)在其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之后,气力势将衰退下去,就不得不使其总的战略进攻接近了一个顶点。我们承认敌之进攻还有一点余威,并最好与最恰当的是估计到他的这点余威还相当的大,因此还有充分可能他要攻略广州、西安、宜昌、长沙、南昌、梧州、福州等处及其附近地区,甚至要准备他向着整个粤汉路与西兰公路之进攻。然而这在总的敌人力量上将只是一点余威。在日本的整个国力上说来,他要北防苏联,东防美国,南对英法,内镇人民,他只有那么多的力量,可能使用于中国方面的用的差不多了。并且在其正面与占领地内必须对付的广泛战争还依然存在,日苏、日美、日英、日法之间的矛盾在增长着,国内政府与人民的矛盾,前线官长与士兵的矛盾,大量支出与财政竭蹶的矛盾在加深着,这些都是使得敌人大大皱眉的地方。我们及全国人民必须看到这些地方,不为主要大城市与交通线之丧失所震惊,赞助政府调整全国之作战,有计划地部署粤汉路、陇海路、西兰公路及其他战略地区之作战,部署庞大敌后地区之游击战争,捉住敌人兵力不足与兵力分散的弱点,给以更多的消耗,促使更大的分散,使战争胜利地与确定地转入敌我相持的新阶段,这是全国当前的紧急任务。

(13) 敌力在逐渐减少我力在逐渐增加中

敌人是否增加了力量呢?就其原有的力量来说,没有什么增加,相反,他的力量大大地减少了。敌人原有的军力与经济力,是大大消耗了。十五个月战争中,他的军力伤亡了数十万人,消耗了大量的武器、弹药与军用资材,毁灭了数百架飞机与百余艘军舰,支出了数十万万元经费,这个消耗在日本历史上是空前的。直到他被迫停止其战略进攻之时为止,他还要消耗一大批力量。在这点上,他的盟友希特勒早已大大地发起愁

来了。然则敌人毫无力量的增加吗？有的，这就是对于中国主要的大城市与交通线及部分乡村之占领，从各国手里及中国民族资本手里夺取了市场，与从中国手里夺取了资源与生产工具，夺取了许多人力，这些是日本战争之唯一目的，他是暂时地增加了这些东西。然而问题是：这些东西能抵偿已有的战争消耗吗？不能，消耗了的全部战争“投资”是已经消耗了，他要取偿还需付以新的生产投资。问题又是：抛开日本生产投资之无能不说，假定他能的话，他能取偿其战争消耗吗？也不能。因为往后依然存在着广大战争，依然每天要消耗。只要有广大的敌后游击战争存在，例如现在华北的游击战争那样，他的取偿是很困难的。由于不断的战争，他将不但不能取偿旧的，而且还须支付新的，只要我们的抗战坚持下去，日本的这条可怜命运是大体确定了的。我们说日本在第二战略阶段即相持阶段中将逐渐化强为弱，化优为劣，这种继续消耗是决定的一方面。现在说到中国方面。中国力量究竟是减少了呢？还是增加了？我们的回答是减少了，又增加了。减少的是原有力量的质与量，这表现在军队人员武器的消耗，人口、工业、土地与资源的损失等上面，这是使得我们感到困难的重要的一方面。然而不是没有增加的，增加的是新的质与量，这表现在全国的团结，军队的进步，政治的进步，文化的进步，人民觉悟程度与组织程度的提高。主力军虽后退了，游击战争却前进了。一部分地方虽损失了，另一部分地方却进步了。问题是在：增加的程度今天还不够，今天还不够停止敌之进攻，今后更不够实行我之反攻，因此发生了必须用广大持久的努力去增加新的力量的问题。而这种增加，即全民族各个阶层中生动力量之更大发动与党政军民各方面之更大进步，基于今后之广大持久的努力是完全可能的。在主要的依靠自己生长的力量，再配合之以敌人困难之加重，国际助我之增强，就能使整个敌我形势发

生变化，由敌优我劣之现时形势，走到敌我平衡，再走到我优敌劣，这就是长期相持阶段中必须解决也可能解决的根本问题。

(14) 敌据城市我据乡村，所以战争是长期的，
但乡村能够最后战胜城市

于是问题在：敌人占领中国主要的大城市与交通线之后，敌据城市以对我，我据乡村以对敌，乡村能够战胜城市吗？答复：有困难，但是能够的。抗日战争的长期性，不但由于敌是帝国主义国家，我是半殖民地国家，而且由于这个帝国主义又复占据我之城市，我则退至乡村以抗敌，因而造成了长期性，速胜论在此是毫无根据的。然而今天中国的城市乡村问题，与资本主义外国的城市乡村问题有性质上的区别。在资本主义国家，城市在实质上形式上都统制了乡村，城市之头一断，乡村之四肢就不能生存。不能设想，在英、美、法、德、日、意等国，能够支持长期反城市的乡村农民战争。半殖民地小国也不可能。半殖民地大国如中国，在数十年前也很困难。半殖民地大国如中国，在今天，却产生了这种可能。这里明显的是三个三位一体的条件。第一是半殖民地条件。在半殖民地，城市虽带着领导性质，但不能完全统制乡村，因为城市太小，乡村太大，广大的人力物力在乡村不在城市。第二是大国的条件。失去一部，还有一部。敌以少兵临大国，加以我之坚强抵抗，就迫使敌人发生了兵力不足与兵力分散的困难，这样就不但给了我一个总的抗日根据地，即大后方，例如云、贵、川等地，使敌无法占领；而且在敌后也给了我以广大游击活动地盘，例如华北、华中、华南等地，使敌无法全占。第三是今日的条件。如果在数十年前中国被一个强大帝国主义国家武装侵占，例如英占印度那样，那是难免亡国的。今天则不同，今天主要的是中国进步了，有了新的政党、军队与人民，这是胜敌的基本力

量。其次是敌人退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已临到衰老的境界，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了与造成着他把自己送进坟墓的条件。又其次是国际形势变化了，旧的世界接近死灭，新的世界已见曙光。这些道理，我在《论持久战》中已详说过了。总之，在今天的半殖民地大国如中国，存在着许多优良条件，利于我们组织坚持的长期的广大的战争，去反对占领城市的敌人，用犬牙交错的战争，将城市包围起来，孤立城市，从长期战争中逐渐生长自己力量，变化敌我形势，再配合之以世界的变动，就能把敌人驱逐出去而恢复城市。毫无疑问，乡村反对城市就在今天的中国也是困难的，因为城市总是集中的，乡村总是分散的，敌人占领我主要的大城市与交通线之后，我之行政区域与作战阵地就在地域上被分割，给了我们以很多困难，这就规定了抗日战争的长期性与残酷性。然而我们必须说，乡村能够战胜城市，因为有上述三位一体的条件。在内战条件下，极小部分的乡村支持了长期反对城市的战争，还当帝国主义各国一致反共的时期。谁能说在民族战争条件下，又当帝国主义阵营分裂之时，中国以极大部分的乡村，不能支持长期战争去反对城市敌人呢？毫无疑问是能够的。并且现在的所谓乡村，与内战时期的乡村有很大不同，不但地域广大，而且在云、贵、川等省大后方中，尚有许多城市与许多工业，尚可与外国联络，尚可建设。依据于大后方的保持与敌后游击战争根据地的建立，从长时期中生息我之力量，削弱敌之力量，加上将来国际有利条件之配合，就能举行反攻，收回城市。蒋委员长在去年十二月告国民书中指出：“中国持久抗战，其最后胜利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实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这是完全正确的，战争虽困难，胜利前途是存在的。

(15) 妥协危机严重存在，但能够克服

我们早就说过，一部分患着恐日病的人们时刻企图动摇政府的抗战决心，主张所谓和平妥协，过去曾见之于南京失守之后，现在又在蠢蠢欲动了，这是敌人阴谋在抗日阵线内部的反映。这种危机是严重存在的，国人必须充分注意，不让亲日派得售其奸。亲日派的企图和敌人的企图是一致的，必然集中于反蒋反共，假令得售其奸，抗战的前途就成大问题。因此，全国上下憬然觉悟于敌人阴谋与内部反间之可畏，自动自觉地努力反对这种阴谋，一刻也不容放松。这种危机是否能够克服呢？那是能够的。在国共两党及一切爱国志士团结一致并作了必要的努力之后，克服妥协危机，驱除助敌张目的妖魔鬼怪，而把抗战坚持下去，不但是绝对必要的，而且是完全可能的。因为亲日派究竟没有多大的势力，抗日派的势力大于亲日派。

(16) 相持阶段中游击战争的新形势

新阶段中，正面防御的是主力军，敌后游击战争将暂时变为主要的形式。但敌后游击战争在敌我相持的新阶段中，将采取一种新形势发展着。什么是游击战争的新形势呢？即第一，在广大地区中仍能广泛的发展。这是因为在我则土地广大，在敌则兵力不足与兵力分散，只要我能坚持发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并正确地指导之，敌要根本限制我之发展是不可能的。但第二，在某些重要战略地区，例如华北与长江下流一带，势将遇到敌人残酷的进攻，平原地带将难于保存大的兵团，山地将成为主要的根据地，某些地区的游击部队可能暂时的缩小其数量，现在就应准备这一形势的到来。在现在，为了策应正面主力军的战斗，为了准备转入新阶段，应把敌后游击战争大体分为两种地区。一种是游击战争充分发展了的地区如华北，主要

方针是巩固已经建立了的基础，以准备新阶段中能够战胜敌之残酷进攻，坚持根据地。又一种是游击战争尚未充分发展，或正开始发展的地区，如华中一带，主要方针是迅速的发展游击战争，以免敌人回师时游击战争发展的困难。在将来，为了配合正面防御使主力军得到休息整理机会，为了生长力量准备战略反攻，必须用尽一切努力坚持保卫根据地的游击战争，在长期坚持中，把游击部队锻炼成为一支生力军，拖住敌人，协助正面。一般说来，新阶段中敌后游击战争是比较前一阶段要困难得多的，我们必须预先看到这种困难，承认这种困难，不可因为前一阶段的发展容易而冲昏了头脑，因为敌人一定要转过去进攻游击战争。然而能够坚持的，一切敌后工作的领导人们必须要有这种自信心。因为民族战争中的游击战争，不论敌人如何的强，总比内战时的条件优良得多。在这里，争取与瓦解伪军以孤立日寇，是非常重要的任务。

（17）抗日战争发展的新阶段同时即是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

以上说的都是抗日战争的形势问题，以下要说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势。

抗日战争发展到了新的阶段之时，同时即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之时。由于新阶段中将遇到比前更多的困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就应该适应这种情况而表现其向困难斗争并将任何困难战而胜之之伟力。为了在目前过渡期间以及到了将来的新阶段，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是表示其对于困难之无能，而是表示其具有克服困难之伟力，就必须认真的巩固统一战线与扩大统一战线。并且应该懂得：长期的战争必须有长期的统一战线才能支持，战争的长期性与统一战线的长期性，是不能分离的。

(18) 国民党有光明的前途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以国共两党为基础的，而两党中以国民党为第一大党，抗战的发动与坚持，离开国民党是不能设想的。国民党有它光荣的历史，主要的是推翻满清，建立民国，反对袁世凯，建立过联俄、联共、工农政策，举行了民国十五六年的大革命，今天又在领导着伟大的抗日战争。它有三民主义的历史传统，有孙中山先生、蒋介石先生前后两个伟大的领袖，有广大忠忱爱国的党员。所有这些，都是国人不可忽视的，这些都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果。

抗日战争的进行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中，国民党居于领导与基干中的地位。十五个月来，全国各个抗日党派都有进步，国民党的进步也是显著的。它召集了临时代表大会，发布了抗战建国纲领，召集了国民参政会，开始组织了三民主义青年团，承认了各党各派合法存在与共同抗日建国，实行了某种程度的民主权利，军事上与政治机构上的某些改革，外交政策的适合抗日要求等等，都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件。只要在坚持抗战与坚持统一战线的大前提之下，可以预断，国民党的前途是光明的。

然而至今仍有不少的人对于国民党存在着一种不正确的观察，他们对于国民党的前途是怀疑的。他们对于国民党怀疑的问题，就是能否继续抗战，能否继续进步，与能否成为抗日建国的民族联盟的问题，而这三个问题是互相结合不可分离的。我们的意见怎样呢？我们认为国民党有光明的前途，根据各种主客观条件，它是能够继续抗战，继续进步，与成为抗日建国的民族联盟的。

由于敌人进攻的坚决性，敌人对于中国各个阶层的严重的打击与掠夺，全国军队对于敌人的愤怒与抗战的英勇，全国人

民抗日运动的高涨，国际有利形势之存在等事实，基本上决定了全中国与国民党的政治方向。第一，任何党派，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及其他抗日的政党与团体在内，是非继续抗战下去不可的，谁不继续抗战，谁就只有一条当汉奸的出路，此外没有任何出路。第二，任何党派，只要它是继续抗战的，就非继续进步不可。诚然，国内政治的进步不迅速不普遍，因此招致了战争的损失。但也正因为损失，使得今后不能不在政治、军事、文化、党务、民运各方面求进步，以便能够抗拒敌人，恢复失地。这不论是当权的国民党也罢，其他党派也罢，都非继续进步不可。第三，国内进步的重要一环，是国民党组织形式的民主化，使其本身变为抗日建国的民族联盟，变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好的组织形式。这种可能有没有呢？我以为也是有的。抗日战争的大势所趋，国民党如果不向广大民众开门，容纳全国爱国党派与爱国志士于一个伟大组织之中，那要担负起继续抗战与战胜敌人的艰难任务是不可能的。在国民党四十多年的历史中，每遇大的革命斗争时，总是把它自己变为革命民族联盟的，最显著而最有历史意义的有两次。第一次，从同盟会组成到辛亥革命，孙中山先生为了反对满清建立民国之目的，联合了一切反满的革命党派（从光复会到哥老会），在这个期间，它的党员充满了英勇斗争的事迹，再接再厉，富于朝气，因而取得了辛亥革命的成功。第二次，民十三年至十六年，为了反帝反军阀之目的，对内联合了工农与共产党，对外联合了社会主义的苏联，建立了有名的“三大政策”，因而创设了黄埔，建立了党军，取得了北伐战争的胜利。所有这些，不但表现了国民党统一战线政策的发展，也表现了三民主义的发展。今天是国民党历史上第三次变为革命民族联盟的时机，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建立三民主义共和国，必须也可能把它自己变为抗日建国的民族联盟。这一伟大的运动已在开始，

承认共产党与其他党派的合法存在，承认八路军加入国民革命军系统，抗战建国纲领中明白宣布“欲求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固有赖于本党同志之努力，尤须全国人民戮力同心共同负担”，以及国民参政会的召集与三民主义青年团的组织，都表示了把它自身变为抗日建国的民族联盟之开始。现在问题是：共产党对于国民党的这一扩大组织的运动将取何种态度？赞成还是反对？我们说，我们任何时候都是赞成国民党把它自己扩大发展成为革命民族联盟的。民十三国民党改组之时，我们就取了赞助政策。今天更当民族危机万分严重之际，我们将尽一切可能赞助之。理由是抗日的友军越大越好，单单一个共产党的发展进步，是不够打退日本帝国主义的。处于第二党地位的中国共产党，虽然发起了与坚持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统一战线，并在自己的组织上向着广大革命志士开门，用以力争抗日的胜利。但若处于第一党地位的国民党依然保存过去那样的老状态，那就对于抗战，对于统一战线，都非常不利的，抗战将不能获胜，全民族陷于危险，共产党与无产阶级也逃不脱这种危险。所以共产党不但不反对，而且十分希望与坚决赞助国民党扩大与巩固其组织，实行党内民主化，并使其本身变为革命的民族联盟，以利继续抗战与争取最后胜利。

(19) 但在国民党的前途上尚有障碍物，
须努力克服才能发展

国民党的光明前途是存在的，其进步与发展是可能的，蒋介石先生及国民党的大多数是在领导和推动国民党前进。然而谁都明白，国民党中还存在着一些守旧分子，障碍着国民党进步的速度与程度。由于这些分子的存在，并与社会上许多守旧分子相结合，就在民族革命战争的洪流中造成了一股逆流，顽固地抵抗进步之舟，相当有力地阻挠着国家民主化，阻挠着一

切为抗战必需的进步事业之推行，阻挠着蒋介石先生在历次宣言、谈话、演说、命令中所说很多很好的方针方法之推行，阻挠着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之实施，阻挠着国民政府救国法令之实施，阻挠着民众运动之发展，这些都是事实，都是国民党进步所以不迅速不普遍与抗战所以受到许多不利的重大原因。他们是反对国民党进步，反对国民党发展，甚至主张妥协的，如果这些分子占居优势，那中国的民族解放事业就要受到极大挫折，所以值得严重注意。然而我们坚决相信，这种守旧势力是不能永久存在的，是没有占优势也难于占优势的，他们是逆流，但并非主流。在蒋委员长的领导，国民党大多数人的努力与全国人民的赞助之下，这种守旧倾向是能够克服的。共产党坚决赞助国民党的进步，而对于阻碍进步的守旧分子则希望他们弃旧图新，一同前进。我们希望这些人变一变，“君子之过如日月蚀”，改变过来就是好的。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了不少守旧的人在抗战过程中进步了，今后必仍有许多人会从抗战教训中发生觉悟而和大众一齐进步起来。这就是抗日战争中守旧分子的可变性。但也可能有少数人变得更坏，甘心被抗战巨涛席卷以去，这也是可变性的一面，对于这种人，就没有什么可惜的了。

（20）其他党派同样有光明前途

一切加入抗日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党派，在坚持抗战与坚持统一战线的大前提下，都有发展的前途，我们都愿意与之建立长期合作，并给以尽可能的赞助。这不论对于第三党、国家青年党、国家社会党、救国会派，或其他任何集团、任何党派，都是一样。很明显的，所谓一切党派在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的大前提下都有光明前途，是包括了克服各党内部守旧倾向这种努力的。如果存在着不利抗战与统一战线的守旧

倾向而任其发展下去，那就有断送其光明前途的危险。这不但是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其他党派也好，都是一样，都应充分注意的。

(21) 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特点

由于中国的历史原因，使得今天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同于任何外国的统一战线，如人民阵线等，也不同于中国历史上的统一战线，如第一次国共合作等，有它今天的中国的特点。认识这些特点，对于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有非常严重的意义的。

这些特点是什么呢？归结起来，共有八个，即是：全民族抗日的，长期性的，不平衡的，有军队的，有十五年经验的，大多数民众尚无组织的，三民主义的，处于新的国际环境中的。

首先是全民族抗日的。这个特点规定了我们统一战线的根本性质。一方面，我们统一战线的目的，是为了反对侵入国土的异族日本帝国主义而建立起来与发展起来的。又一方面，我们统一战线的组成，是包括全民族所有不同党派、不同阶级、不同军队、不同国内民族之一个最广大团体。由于是反对异族侵略的，所以组织成分能够如此之广大。由于组织成分之异常广大，所以这个统一战线具有伟大的力量；但同时，统一战线内部又难免许多相互间的磨擦，而须恰当地调整之，才能达到团结对外之目的。我们统一战线的这种最基本的特点——政治目的之反对异族侵略与组织成分之异常广大，不同于法国与西班牙的人民阵线，也不同于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的民族阵线（当时的国共合作），使得今天的统一战线产生了许多特殊内容与特殊结果，这是今天统一战线的第一个特点与优点，虽然在其组织复杂一方面不免同时包含着缺点。

第二是长期性的。这个特点是从第一个特点产生的。由于

这个统一战线是用民族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而日本帝国主义是一个强的帝国主义，就产生了抗日战争的长期性，因而又产生了统一战线的长期性。这一点，我在报告的第五部分还要说到的，这是一切政策的出发点。这一点也和第一次国共合作不相同。

第三是不平衡的。由于历史原因，造成了各党派各阶层政治力量的不平衡，同时在地域分布上也表现这种不平衡。国民党是第一个具有实力的大党，共产党是第二党，其他又在其次。这一情况，产生了许多特殊的东西。

第四是有军队的。国共两党都有军队——这一个特殊历史条件造成的结果，不是缺点而是优点。由于两党都有军队，使得抗日战争中两党克尽分工合作的最善责任，互相观摩激励的好处也更多了。这一点和西班牙有某些相似，但和法国不同，和第一次国共合作也不同，这也是使得两党能够长期合作的因素之一。

第五是有十五年经验的。一九二四至二七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四年，一九二七至三六年国共分裂的九年，现在国共重新合作又有了两年，这个十五年中合作——分裂——又合作的经验，最深刻地教育了国共两党、其他党派与全国人民，结论是：只应合作，不应分裂。这也是长期合作的基础之一。这种宝贵经验，世界各国都没有，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也没有的。

第六是大多数民众尚无组织的。这是中国的特点，西洋各国与此不同，所以是一个缺点，使得统一战线缺乏现成有组织的民众基础。但同时，各党之间可以分工地去组织民众，不须挤在一块老是磨擦，因为有的是尚无组织的民众，正待组织起来以应抗战之急需。

第七是三民主义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三民主义为政治基础，不但是合作抗日的基础，而且是合作建国的基础。三民

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将引导这个合作到争取全民族解放，其民权主义将引导这个合作到彻底的建立民主国家，其民生主义则更可能引导这个合作到很长的时期，三民主义的政治纲领与政治思想保证着统一战线的长期性。

第八是处在新的国际环境中的。今天的世界政治经济条件，比之第一次合作与两党内战两时期都不同。今天只有一部分帝国主义国家如日德意等反对国共合作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另一部分帝国主义国家，由于他们与日本的矛盾，现时并不反对我们的统一战线，反而采取赞助的立场。所有国家的先进人民都是赞助我们的，苏联更是诚挚的赞助。这种新的国际环境，对于我们的长期合作有重大影响。

深刻地研究与认识上述这些特点，才能采取恰当的政治上的政策与工作上的态度。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地应付政治问题与工作问题，而是站在科学的基础上正确地解决问题，抗日战争的胜利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与扩大，是需要这种科学基础的。

(22) 统一战线的新形势

抗日战争的新阶段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以一种新的姿态出现，才能应付战争的新局面。这种新姿态，就是统一战线的广大的发展与高度的巩固。十五个月团结抗战的教训，将促使各党认识这种发展与巩固之必要。发展方面，是扩大各党的组织与扩大民众的组织。巩固方面，是各党采取新的政策与新的工作，减少相互间的磨擦，办到真正的精诚团结，共赴国难。抗战新阶段中存在着许多的困难，惟有统一战线各党广大发展其组织与高度巩固各党的内部关系与各党之间的相互关系，才能有力地执行新的政治任务，战胜新的困难，达到停止敌之进攻与准备我之反攻之目的。这就是抗日战争新形势中统

一战线的新形势，由于各党的共同努力与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这种新形势的到来是完全可能的。

四 全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

根据过去抗战的总结与当前抗战及统一战线发展新阶段的估计，全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应该是什么呢？应该和过去有些什么不同呢？

总的任务应该是：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巩固与扩大统一战线，以便克服困难，停止敌之进攻，准备力量，实行我之反攻，达到最后驱逐敌人之目的。

分别说来，有如下各方面的具体任务。一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成分，应该赞助政府，并在政府领导之下，动员全民族实行起来，共产党员应成为执行这些任务的模范。

- (1) 高度的发扬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坚持抗战到底，克服悲观情绪，反对妥协企图

估计到新的抗战形势下，必有一部分人，因为主要大城市与交通线的丧失，财政经济的困难，国际援助的不及时，因而发生着与增长着对于抗战前途悲观失望的情绪。而日寇、汉奸、亲日派，必将利用这种情绪，大放其和平妥协空气，企图动摇我抗战的决心。因此，全民族的第一任务，在于高度发扬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克服一部分人的悲观情绪，坚决拥护政府继续抗战的方针，反对任何投降妥协的企图，坚持抗战到底。这一任务，比过去任何时期为重要。

为此目的，必须动员报纸、刊物、学校、宣传团体、文化艺术团体、军队政治机关、民众团体，及其他一切可能力量，向前线官兵、后方守备部队、沦陷区人民、全国民众，作广大

之宣传鼓动，坚定地有计划地执行这一方针，主张抗战到底，反对投降妥协，清洗悲观情绪，反复地指明最后胜利的可能性与必然性，指明妥协就是灭亡，抗战才有出路，号召全民族团结起来，不怕困难，不怕牺牲，我们一定要自由，我们一定要胜利，用以达到全国一致继续抗战之目的。

为此目的，一切宣传鼓动应顾到下述各方面。一方面，利用已经产生并正在继续产生的民族革命典型（英勇抗战，为国捐躯，平型关，台儿庄，八百壮士，游击战争的前进，慷慨捐输，华侨爱国等等）向前线后方国内国外，广为传播。又一方面，揭发、清洗、淘汰民族阵线中存在着与增长着的消极性（妥协倾向、悲观情绪、腐败现象等等）。再一方面，将敌人一切残暴兽行的具体实例，向全国公布，向全世界控诉，用以达到提高民族觉悟，发扬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之目的。须知这种觉悟与自信心之不足，是大大妨碍着克服困难与准备反攻的基本任务的。

(2) 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拥护国共合作，
反对分歧与分裂，反对任何的汉奸政府

新环境中，敌人的方针，必然集中于反蒋反共，建立全国性的汉奸政府，企图推翻蒋委员长，推翻国民政府，破坏国共合作与全国团结。针对着敌人的这种方针，全民族的第二任务，在于号召全国，全体一致诚心诚意的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拥护国共合作，拥护全国团结，反对敌人所施任何不利于蒋委员长、国民政府、国共合作与全国团结的行为，反对任何的汉奸政府统治中国。

为此目的，必须调节国共两党之关系，调节中央与地方之关系，调节抗战各军之关系，调节政府与人民之关系。在这些关系中，提倡公平合理互助互让之精神，减少磨擦，减少意见

分歧现象，反对利用困难与政府为难之行为。号召全国严重注意敌人、汉奸、亲日派在我们内部的挑拨离间，制造不满，制造分歧，鼓励磨擦之阴谋诡计。务使蒋委员长与国民政府的威信不受任何影响，务使国共合作与全国团结日益亲密起来，树立在困难环境中继续抗战的坚固重心，用以对抗敌人与汉奸政府，克服困难，准备反攻。

（3）提高主力军的战斗力，保卫华中、 华南与西北，停止敌之进攻

针对着敌人现时进攻武汉并继续进攻华南与西北之企图，全民族的第三个任务，在于提高主力军的战斗力，整理现有军队，增编新的军队，为保卫华中、华南与西北而战，停止敌人进攻。为此目的，中国主力军方面，第一，必须发展高度的运动战，同时辅助之以必要的与可能的阵地防御，节节抗拒敌人，消耗敌之实力。第二，必须在大后方建立可能的军事工厂，并提高制造能力，接济前线的枪械与弹药。第三，必须在军队中认真实施民族革命的政治工作，实施政治、文化、娱乐等教育，提高全军英勇奋斗持久苦战的精神。第四，就现有物质基础改善士兵生活，在连队中组织经济委员会，由士兵管理伙食。第五，提倡自觉纪律，废止打骂制度，提倡官兵之间的亲爱团结，以改善官兵关系。第六，实行公买公卖，待人和气，不强迫征粮，不强迫拉夫，不强迫当兵，改取政治动员方式解决食粮、夫役与新兵问题，以改善军民关系。第七，在前线各军之间，前线与后方各军之间，提高友爱互助精神，作战则互相策应，工作则互相观摩，消除互相观望、互相嫉忌等不良现象，以改善各军之间的关系。第八，整理现有军队，补充缺额，同时增编新的军队，加紧教育训练，以利持久作战。用这一切办法，提高主力军的战斗力，为保卫华中、华南与西北

而战，为停止敌之进攻与准备我之反攻而奋斗。

(4) 广大地发展敌后游击战争，创立和巩固我之根据地，
缩小敌之占领地，配合主力军作战

针对着敌之目的在于还要继续向我进攻，又将于一定时机抽兵进攻游击战争，企图巩固其占领地，使中国反攻困难，全民族的第四个任务，就在于广大地发展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创立许多根据地，巩固已有的根据地，用以缩小敌之占领地，在目前，配合主力军为停止敌之进攻而战，在将来，配合主力军为实行反攻而战。半殖民地中国抗日民族战争的重要特点之一，在于游击战争的广大性与长期性。没有这种游击战争，便不能牵制大量敌军，有力地配合正面主力军之作战，而停止敌之进攻；便不能使敌人占领地限制于一定地带，使之无法全部占领；便不能在敌人后方建立多数的抗日堡垒，坚持游击战争，并准备将来配合主力军之战略反攻。因此，第一，必须广大地发展一切敌人后方地带的游击战争，并创立多数的游击战争根据地，巩固已经建立起来的根据地。第二，必须依照华北榜样，留置或派遣足够数量之正规军队于敌后各个战略区域，作为长期坚持游击战争的骨干。这些军队应该逐渐学会游击战术，加强政治工作，发展民众运动，创立根据地，并帮助敌后民众游击队与游击战争逐渐提高到正规军与正规战争的道路上去。第三，一切战区与敌人后方，必须发动所有男女人民卫国保乡的热忱，除动员他们大批加入脱离生产的游击队与补充留置敌后的正规军外，把他们组织到半军事性质的抗日人民自卫队中去。抗日人民自卫队的组织，应成为一切战区与敌人后方的普遍与经常的民兵制度，他们是不脱离生产的。第四，必须协助人民组织广泛的游击队。这是脱离生产的，各县各区都应该有，成为袭击敌人、保卫地方的普遍的小队伍。第五，必须

建立游击部队中的政治工作，加强其军事、政治、文化、娱乐的教育，用以提高其战斗力。第六，必须建立游击部队中正确的军事政治制度，实现官兵的平等待遇，经济公开。第七，改造土匪部队，使他们走上抗日；肃清我军后方的及被敌利用的土匪。第八，游击战争的军火接济是一个极重要问题，一方面，大后方尽可能的接济他们；又一方面，每个游击战争根据地都必须尽量设法建立小的兵工厂，办到自制弹药、步枪、手榴弹等的程度，使游击战争无军火缺乏之虞。第九，依照敌情与我之战略需要，重新划分敌后各地作战区域与行政区域，使之适合新的战争情况。第十，必须依照战略需要，统一敌后各部队与行政区之领导，以便集中抗敌力量，消除内部矛盾，但应反对互相吞并的军阀行为。

（5）提高军事技术，创立机械化兵团，准备反攻实力

敌以不及我数之兵力而能节节深入者，除了我之政治原因外，我之技术落后是主要原因。针对着敌之长处与我之短处，全民族的第五个任务，在于提高军事技术，增加飞机、大炮、战车等之数量与使用人才，为着实行反攻而准备实力。为此目的，一方面须就现有的及可能继续增加的制造能力从部分制造与修理开始，认真从事这个工作。另一方面，多方设法从外国输入新式武器，用以逐渐改善军队的装备，创立真正现代化的机械兵团。毫无疑问，我们应该从实际看问题，在现在，实际上战斗着的是大数量的低级武器。因此，我们应该号召全国军队与人民武装，相信低级武器也能胜敌，提高政治精神，改善作战方法，发展游击战争，以补新式技术之不足。不在这方面着重致力，我们就忽视了当前的实际问题，无以克服目前的困难。在将来，为着准备战略反攻，非提高新式技术、建设新式军队不可，须知没有现代新式技术装备的足够数量的军队，要

实行反攻、收复失地是不可能的。不在这方面提高注意力，并就可能范围内认真开始去做，我们就只看见现在，忘记了将来，无以克服前途的困难。在人力物力丰富的中国，只要政治条件改善，动员方法进步，加之外国的协助，逐渐改善技术装备，决不是不可能的。

(6) 实行集中领导下的民主政治，密切政府与人民的联系，发挥抗日政权的最大能力

敌人乘我弱点之处，不但在军事，而且在政治，在我政治制度之不民主化，不能与广大人民发生密切的联系。为补救此弱点，全民族的第六个任务，在于实行集中领导下的民主制度，没有这一方面的改进，要最后战胜日寇也是不可能的。民主政治是发动全民族一切生动力量的推进机，有了这种制度，全国人民的抗日积极性将会不可计量地发动起来，成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深厚渊源。我全民族彻底地统一团结的伟大过程之完成，也只有依靠民主制度之建立。关于这一点，须从各方面实际有所设施。第一，国民参政会的开会已开始了国家民主化的第一步，尔后应使该会工作公开的顺利的进行，该会议决事项应全部付之实施，并依据该会已经决定的方案认真的建立各省各级地方参政会，推进民主政治。第二，保证抗战建国纲领所规定的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等自由权在全国范围之充分实施。这种自由是在抗战建国范围之内的，只有充分地保证了这种自由，才利于普遍发挥抗日建国的力量。这里问题是保证中央法令在各地方之实施而不受地方之随意的限制。应该限制的只是不利于抗日建国的那种自由，即汉奸、亲日派的自由，其他都不应在限制之列。第三，从战区与敌人后方开始实行多量的民主制。例如：民选各级地方政府再由上级加以委任；战区各级政府采用民主集权的委员制，并设立

各级人民代表机关；战区政府增设某些必要的工作部门；改变公文程式；清除贪污腐化无能分子，吸收抗日积极分子；减低薪俸，提倡艰苦生活；用以适合战区艰苦、复杂与流动的环境；战区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统一领导下，有颁布地方单行法令之权；战区男女公民，除汉奸外，均有选举被选举权，均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与武装抗日之自由；战区一切抗日党派均有公开合法地位，等等。在战区尤其在敌人后方，没有这些政治改革，要支持长期艰苦的抗日战争是不可能的。以上这些办法，都是为着密切政府与人民的联系，增加政府的实力，使之能在抗日战争中起其最大的作用。没有问题，全国任何地方政府，应集中于中央政府领导之下，不应因行政区域在地域上之被敌分割而有任何不尊重中央领导的表现。全国必须是依照中央法令而推行民主制的，但全国必须是统一于中央的。

（7）扩大统一的民众运动，全力援助战争

全民族的第七个任务，在于扩大各种民众运动，并使之统一起来，全力援助战争。长期艰苦的抗日战争，一切须取给于民众，没有普遍发展的并全国统一的民众运动，要长期支持战争是不可能的，尤其在战区与敌人后方，亟须这样做。抗日战争正在遇到新的困难，惟有动员民众，才能有效地克服这些困难。在全国，尤其在战区与敌人后方，亟应做到下列各项：第一，保障一切抗日民众团体与抗日民众运动的自由，确立民众团体在法律上的地位。第二，物质上帮助民众团体，尊重民众团体的独立性。第三，认真建立有广大群众参加的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商人、自由职业者、文化人与儿童的各种救国会，并使之依照地域与职业两种原则建立联合的组织。第四，发动民众积极参加各方面的抗战工作，积极援助政府与军

队，尤其在战区不可或缓。

(8) 改良民众生活，激发民众的抗战热忱与生产热忱

改良民众生活问题，过去实行的太微弱了，因此不能激发广大劳动人民的抗战热忱与生产热忱，对于坚持长期战争是非常不利的。因此，今后全民族的第八个任务，在于实行下列各项改良民众生活的政策。第一，优待抗日军人家属与残废的抗日军人。第二，救济战区灾民难民及失业工人。第三，在战区及敌后开始适当的减租减息。第四，调剂粮食及重要的日常必需品。第五，适当的增加工资，改善工人职员待遇。第六，承认工人农民对雇主地主的团体契约权。第七，禁止雇主、地主、师父、工头等对工人学徒的虐待打骂。实行这些初步的生活改良办法之后，必能提高工农贫民群众拥护政府、参加战争与参加生产的积极性，不但战争需要的一切动员帮助将大大改观，而且工业农业生产数量质量与商业的流通也会大大增加与提高起来，国家财政也就在新的农工商业基础之上而得到满意的解决。

(9) 实行新的战时财政经济政策，渡过战争难关

主要的大城市与交通线丧失之后，国家财政经济必大现困难，没有新的有效的办法，便无以渡过战争的难关。然而只要实行新的政策，动员人民力量，便任何困难也能够克服。因此，全民族的第九个任务，在于实行一种新的战时财政经济政策。主要事项如下：第一，新政策以保障抗日武装部队一切必要供给，满足人民必需品的要求，并和敌人的经济封锁与经济破坏作斗争为目的。第二，有计划的在内地重新建立国防工业，从小规模的急需的部门开始，逐渐发展改进；吸收政府、民间与外国三方面的资力；并从政治上动员工人，保障其最低

限度的物质待遇，改良工厂管理制度，以提高生产率。这些，不但是必需的，而且是可能的。第三，用政治动员与政府法令相配合，发展全国农业与手工业生产，组织春耕秋收运动，使全国农业、手工业在新的姿态下发展起来。在战区注意保护农具牲畜及手工作坊，保证被隔断区域的经济自给。第四，保护私人工商业的自由营业，同时，注意发展合作事业。第五，在有钱出钱原则下，改订各种旧税为统一的累进税，取消苛杂和摊派制度，以舒民力而利税收。第六，用政治动员与政府法令相配合，征募救国公债、救国公粮，并发动人民自动捐助经费及粮食，供给作战军队，以充实财政收入。第七，有计划的与敌人发行伪币及破坏法币的政策作斗争，允许被隔断区域设立地方银行，发行地方纸币。第八，厉行廉洁运动，改订薪饷办法，按照最低生活标准规定大体上平等的薪饷制度。第九，由国家银行办理低利借贷，协助生产事业的发展及商品的流通。第十，恢复与发展战区的邮电交通。以上所指，不过大端，必须有认真改革旧制实行新制的决心，并持之以毅力，才能消除新的困难，支持长期战争，其重心在于组织广大人民的生产积极性，使之成为战争供给而效力。中国的抗战是在一种特殊情况之下进行的，主要的大城市与交通线被敌占领，抗战的主要依靠是乡村与农民。农民是有伟大力量支持战争的，但须实行必要的政治方面与经济方面的改革。这里所说各项新政策，就是根据这种特殊情况而提出的。

（10）实行抗战教育政策，使教育为长期战争服务

在一切为着战争的原则下，一切文化教育事业均应使之适合战争的需要，因此全民族的第十个任务，在于实行如下各项的文化教育政策。第一，改订学制，废除不急需与不必要的课

程，改变管理制度，以教授战争所必需之课程及发扬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为原则。第二，创设并扩大增强各种干部学校，培养大批的抗日干部。第三，广泛发展民众教育，组织各种补习学校、识字运动、戏剧运动、歌咏运动、体育运动，创办敌前敌后各种地方通俗报纸，提高人民的民族文化与民族觉悟。第四，办理义务的小学教育，以民族精神教育新后代。一切这些，也必须拿政治上动员民力与政府的法令相配合，主要的在于发动人民自己教育自己，而政府给以恰当的指导与调整，给以可能的物质帮助，单靠政府用有限财力办的几个学校、报纸等等，是不足完成提高民族文化与民族觉悟之伟大任务的。抗战以来，教育制度已在变化中，尤其战区有了显著的改进。但至今还没有整个制度适应抗战需要的变化，这种情形是不好的。伟大的抗战必须有伟大的抗战教育运动与之相配合，二者间的不配合现象亟应免除。

(11) 力争国际援助，集中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从长期战争与集中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原则出发，组织一切可能的外援，是不可忽视的。因此，当前的第十一个任务，在于第一，坚决反对一部人所谓走德意路线的主张，因为这实际上是一种准备对敌投降的步骤。第二，力争各民主国家与苏联对我物质援助之增加，同时尽力促成各国实行国联制裁日本之决议。第三，设立一定机关，系统的收集一切敌军暴行，制成具体的文书、报告，宣扬国外，唤起全世界注意，起来惩罚日本法西斯。第四，从各党派各人民团体推出代表，组织国际宣传团体，周游列国，唤起各国人民与政府的对我同情，与我国政府的外交活动相配合。第五，保护一切同情国家在中国的侨民及其和平通商、传教等事业。第六，注意保护华侨利益，并经过华侨的努力推进各国反日援

华运动。一切这些，不管各国助我之程度如何暂时的没有增加或甚至可能部分的减少，国联决议可能依然是一句好听的话，我们都应努力的做。根据抗战的长期性，外交方针也应着眼于长期性，不重在眼前的利益，而重在将来的增援，这一点远见是必要的。

(12) 建立中国与日本兵民及朝鲜、台湾等被压迫民族的反侵略统一战线，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不但是危害中华民族的，同时也是危害日本全体兵民与朝鲜、台湾等被压迫民族的，要使日本的侵略战争失败下去，必须中日两大民族的军民大众及朝鲜、台湾等被压迫民族作广大而坚持的共同努力，建立共同的反侵略统一战线。为此目的，全民族的第十二个任务，在于：第一，向两国人民士兵大众及朝鲜、台湾民族提出这个反侵略统一战线的方针，号召他们为此而斗争。第二，由政府下令所有抗日军队抗日游击队全体官兵一律学习必要数量与恰当内容的日本话，由高级政治部准备与派出教日本话的教员到各军队中实行施教，从学几句话起到能够同日军官兵讲一篇道理为止，教育全体抗日官兵向全体敌军士兵与下级军官作口头宣传，同时补助之以文字图画宣传，逐渐感化他们，要求他们同意建立共同的反侵略统一战线，使百余万日本侵略军变成我们的友军，退出中国，推翻日本法西斯。第三，尊重与优待敌军俘虏，给以教育，经过他们去影响其余，为建立反侵略统一战线而努力。第四，设法从日本内地组织反侵略的文化人员到中国来参加这一斗争。第五，保护在中国的诚实的日本侨民。第六，教育我国军民大众，一方面提高民族自尊心，又一方面则须纠正军队与人民中的一些错误思想，区别日本帝国主义与日本人民，区别敌军军官与士兵，并区别上级军官与下级军官。

实行了上述的方针与办法，付以广大而坚持的努力，这个反侵略统一战线是能够建立起来的。中国的胜利，主要依靠自己力量的增加；但同时，敌人的困难与国际的援助，必须争取其配合。在敌人困难方面，除了因我之坚持长期战争给以逐渐的消耗，努力外交活动使敌陷于孤立而外，和日本兵民大众及朝鲜、台湾等民族建立其共同反侵略战线的政策，是不可缺少的部分。日本侵略战争愈延长，这一个统一战线便愈有建立的基础。

(13) 团结中华各族，一致对日

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但是国内各个党派、各个阶级的，而且是国内各个民族的。对着敌人已经进行并还将加紧进行分裂我国内各少数民族的诡计，当前的第十三个任务，就在于团结各民族为一体，共同对付日寇。为此目的，必须注意下述各点：第一，允许蒙、回、藏、苗、瑶、夷、番各民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在共同对日原则之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第二，各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的地方，当地政府须设置由当地少数民族的人员组成的委员会，作为省县政府的一部门，管理和他们有关事务，调节各族间的关系，在省县政府委员中应有他们的位置。第三，尊重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宗教、习惯，不但不应强迫他们学汉文汉语，而且应赞助他们发展用各族自己言语文字的文化教育。第四，纠正存在着的大汉族主义，提倡汉人用平等态度和各族接触，使日益亲善密切起来，同时禁止任何对他们带侮辱性与轻视性的言语、文字与行动。上述政策，一方面，各少数民族应自己团结起来争取实现，一方面应由政府自动实施，才能彻底改善国内各族的相互关系，真正达到团结对外之目的，怀柔羈縻的老办法是行不通了的。

（14）厉行锄奸运动，巩固前线与后方

新的形势下，汉奸、敌探、托派、亲日派必然较前更加猖獗，大肆其造谣、污蔑、分裂、破坏的阴谋，因此当前的第十四个任务，在于实现下列办法，厉行锄奸运动。第一，唤起前线与后方一切军民人等的警觉性，严密注视汉奸、敌探、托派、亲日派之活动，依照政府法令，不容情的镇压之。第二，注意保护国家机密，以叛国罪惩办泄漏机密之叛徒。第三，学校教科书中加进锄奸一课，实施提高警觉性的教育。第四，军队设置各级管理锄奸工作之部门，民众团体中人民自卫队中设置锄奸小组，国家警察加重锄奸教育，使奸徒在众目集视下无法藏身。抗战以来，吃这些奸徒们的亏真是不可计量的了。前线的将士，惊叹汉奸之多与损害作战利益之大，早已异口同声。即在后方，单是泄漏国家机密与引导敌机惨炸二事亦已中外共愤。长期抗战中如不肃清奸徒，将不能设想战争的胜利。发动广大民众之民族革命的警觉性，厉行上述锄奸办法，并使之成为广泛的运动，是争取胜利不可缺少的严重的任务。应该指出：锄奸运动应注意区别首要与胁从、自觉的与被骗的、坚决分子与动摇分子，分别处理，前者从重，后者从轻，并注意争取后者使之回心向善，决不可一例看待。还须注意确实证据，勿用刑讯，严防诬陷。锄奸目的在肃清真正奸徒，只有用正确政策与正确方法，才能达到目的。

（15）发展国共两党及各抗日党派，强固统一战线，支持长期战争

所有前述各项紧急任务，有待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各党派推动全民族，在蒋委员长统一领导之下，坚决的实行起来，而欲达此目的，非发展统一战线中各个党派的组织力量不可。现

有力量，无论何党都太小，都需发展，而大大发展国共两党尤为当前的紧急任务。在这个发展的任务中，各党均应互相赞助他党的发展，而不可互相嫉忌与互相妨碍。须知只要是抗日党派，任何一党的发展，都于抗日有利。没有问题，统一战线以国共两党为基础，而两党中又以国民党为主干，我们承认这个事实。因此，我们是坚决拥护蒋委员长及其领导下之国民政府与国民党的，并号召全国一致拥护。承认与拥护这个主干而又同时发展各党，是互相联系并不互相冲突的。

在数量上，我以为国民党应发展至五百万以上，共产党及其他党派应发展至一百万以上，在一个四万万五千万人口的大民族中，当着伟大抗战时代，吸引数百万优秀分子加入各抗日党派，不但是必需的，而且是完全可能的。诚能如此，则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扩大了，随之也将更巩固了，执行战胜敌人的一切任务就有了充分的保证，支持长期战争与长期合作，驱除日寇与建设三民主义新中国的根本目的，就不患不能达到。

五 长期战争与长期合作

现在，我们专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长期性问题来讨论一番，向着异常关心国共两党关系的人们所已经发生了的许多疑问，作一个全般的答复，这一点，对于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与扩大国共合作，顺利地执行当前紧急任务，渡过战争的难关，是有重要意义的。

问题有如下各点：战争的长期性决定合作的长期性，战争中的合作决定战争后的合作，长期合作的内容与主要条件，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长期合作的组织形式，长期合作中的互助互让政策，民主共和国问题。这些，都是很多人所关心的，我

们都得明确的给以答复。

（1）战争的长期性决定合作的长期性

由于抗日战争是长期的，整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能够且必须是长期的，其中主要的两个党——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合作，也能够且必须是长期的，这是一切政策的出发点。因此，我们的政策，无论如何要一个长期的民族统一战线，要一个长期合作，无论如何要共同维持一个统一政府，反对分歧与分裂，方才有利于渡过战争难关，对抗敌人破坏，打退日本帝国主义，并于战后完成建立新中国的任务。这是和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七年的国共合作根本不同的，那次是短期的，这次是长期的。

（2）战争中的合作决定战争后的合作

所谓长期合作，不但是在战争中的，而且是在战争后的。抗日战争是长期的，战争中的合作已经算得是长期的了。但是还不够，我们希望继续合作下去，也一定要继续合作下去。这有什么保证呢？保证就在：战争中的合作决定着战争后的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主要的国共两党，必须同患难，共生死，力求进步，并经过长期的努力，才能打退日本帝国主义，否则不能。战争之后，这样长期同过患难的有了进步的两个党，就造成了继续合作的基础。那时的国内国际条件将更有利于合作，也是现在想得到的。没有疑义，战争中的合作必有其各个合作阶段的内容，战争后的合作将更有新的内容。然而战争中的合作，将决定着战争后也能够合作，这不是没有根据的预断。

(3) 长期合作的内容与主要条件

所谓长期合作就是长期的民族统一战线，所有阶级，从资本家到工人，所有政党，从国民党到共产党，所有民族，从汉族到苗瑶弱小民族，所有军队，从中央军到八路军，所有政府，从国民政府到陕甘宁边区政府，只有民族叛徒除外，一切都在内，而且是长期在内的。民族统一战线内，有些人在长期战争中，当着熬不过艰苦斗争，个人利益超过民族利益时，会要变为民族叛徒的，因此民族统一战线是要不断地把这些民族叛徒们除外的。但这些除外，依然是民族统一战线。其理由，即长期合作的主要条件，首先是敌人战争的野蛮性与长期性。由于敌人战争的野蛮性，严重地危害着全民族各个阶层的生存，这样就迫使上层阶级也不得不与其他阶级一道抗日。上层阶级中一部分是难免退出抗日战线的，但其他部分和其他阶级大体一样，是受压迫的，不反抗便无出路。又由于这种野蛮性的战争是长期的，就决定了合作是长期的。这些是决定长期合作的一方面。但是还有第二方面，要合作中的各党，首先是国共两党，采取正确的政策，进行必要的工作。什么样的政策与工作呢？应该是从长期战争与长期合作的基点出发而规定出来与实行起来的政策与工作。应该是照顾现在又照顾将来，照顾这一阶级又照顾那一阶级，照顾这一党派又照顾那一党派，照顾这一军队又照顾那一军队，照顾这一民族又照顾那一民族的政策与工作。否则政策不对，工作不行，自乱步骤，将使合作难于持久。这样，一方面，敌人战争的野蛮性与长期性，另一方面，统一战线中的正确政策与必要工作，就使中国的民族统一战线不但应该是长期的，而且能够是长期的。是民族战线，不是人民阵线。是包括战争中与战争后的国共合作，不是企图在战争后又分裂又内战的国共合作。

（4）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

三民主义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但是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如何呢？共产党员对三民主义应采取何种态度呢？直至现在还有一些人不清楚，因此有再一次解释的必要。

还在一九三七年五月间开的我们党的临时性的代表大会上，就通过了如下的关于“坚决实行三民主义”的提纲：

“共产党是否同意三民主义？我们的答复是同意的。三民主义有它的历史变化。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曾经因为同共产党合作与坚决执行而取得人民的信仰，发动了一九二五——二七年的胜利的大革命。又曾经因为排斥共产党（清党运动），实行相反的政策，而失去人民的信仰，招致革命的失败。现在则因民族危机与社会危机极端严重，全国人民与国民党中爱国分子，因而有两党合作的迫切要求。因此重新整顿三民主义的精神，在对外独立解放的民族主义，对内民主自由的民权主义，与增进人民幸福的民生主义之下，两党重新合作，并领导人民坚决的实行起来，是完全适合于中国革命的历史要求，而应为每个共产党员所明白认识的。共产党决不抛弃其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理想，他们将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达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阶段。共产党有自己的党纲与政纲，其党纲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这是与三民主义有区别的。其民主革命政纲，亦比国内任何党派为彻底，但对于国民党第一次及第二次代表大会所宣布的三民主义纲领，则是基本上没有冲突的。因此我们不但不拒绝三民主义，而且愿意坚决实行三民主义，而且要求国民党同我们一道实行三民主义，而且号召全国人民实行三民主义，使国民党，共产党，全国人民，共同一致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这三大目标而奋斗。”

（《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目前阶段的任务》，第十一项）

去年九月二十二日，我们党的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成立的宣言中，又着重地说道：“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

一个共产主义的政党为什么采取这种态度呢？很明显的，民族独立、民权自由与民生幸福，正是共产党在民族民主革命阶段所要求实现的总目标，也是全国人民要求实现的总目标，并非某一党派单独要求的东西。只要看一看从共产党诞生以来的文献，它的政治纲领，就会明白。因此，在过去，不但在一九二四至二七年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时期，我们共产党员曾经坚决实行了三民主义。就在一九二七年两党合作不幸破裂之后，我们的一切做法，也没有违背三民主义。那时，我们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这是符合于民族主义的；我们实行了人民代表会议的政治制度，这是符合于民权主义的；我们又实行了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这是符合于民生主义的。那时，我们的一切做法，并未超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基本范畴的私有财产制。在现在抗战的阶段与战后彻底完成民主共和国的阶段，都是三民主义的阶段，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阶段。为了彻底完成这个民主阶段的任务，一切共产党员，毫无疑问，应该依照自己的一贯的革命总方针，自己的决议与宣言，同中国国民党、全国其他党派、全国广大人民一道，诚心诚意的实行三民主义。谁要是不忠实于三民主义的信奉与实行，谁就是口是心非、表里不一，谁就不是一个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任何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是同时具有现时实际任务与将来远大理想两种责任的。并且应该懂得：只有现时的实际任务获得尽可能彻底的完成，才能有根据有基础地发展到将来的远大理想那个阶段去。所谓将来的远大理想，就是共产主义，这是人类最美满的社会制度，孙中山先生也曾经认为必要实行

它，才能解决将来的社会问题。所谓现在的实际任务，就是三民主义，这是“求国际地位平等，求政治地位平等，求经济地位平等”的现阶段的基本任务，是国共两党与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因此，共产党员应该如像他们研究共产主义一样，好好研究三民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眼光，研究三民主义的理论，研究如何使三民主义具体地见之实施，研究如何用正确的三民主义思想教育人民大众，使之由了解而变为积极行动，为打退日本帝国主义，建设三民主义新中国而斗争。

（5）长期合作的组织形式

为了保证长期合作，还要解决合作的组织形式问题。我们曾经批驳了一党主义，不论是对于过去历史上说，对于当前任务上说，对于中国社会性质上说，所谓一党主义都是没有根据的，都是做不到的，行不通的，违背一致团结抗日建国的大目标，有百害而无一利的。那么，各党共存，而互相结合为一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不要一种统一的共同的组织呢？要的，必要的，没有这种统一的共同的组织，不利于团结抗日，更不利于长期合作。因此，各党应该认真研究，找到一种最适合于长期合作的统一的共同的组织形式。现在我们就来研究一下。

由于中国政治经济及各党派的历史特点，今天看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可能有下述三种组织形式。

第一种，国民党本身变为民族联盟，各党派加入国民党而又保存其独立性，但与第一次国共合作不同。如果国民党同意共产党员加入，我们将取何种态度呢？首先，我们是赞成这种办法的，因为这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好的一种统一组织形式，有利于抗日建国。不但共产党，任何其他抗日党派都可加入国民党，只要国民党同意，我们是决不反对的。如果这样做，那我们可以实行同十三年合作不相同的办法，即第一，所

有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都是公开的，将加入党员之名单提交国民党的领导机关。第二，不招收任何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有要求加入的，劝他们顾全大局，不要加入。第三，如果我们的青年党员得到国民党同意，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的话，也是一样，不组秘密党团，不收非共产党员入党。用这种办法，可以大家相安，有利无害。这是第一种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

第二种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就是各党共同组织民族联盟，拥戴蒋介石先生作这个联盟的最高领袖，各党以平等形式互派代表组织中央以至地方的各级共同委员会，为着执行共同纲领处理共同事务而努力。这也是一种很好的形式，我们也是赞成的。这种形式，我们很早就提议了，可惜还没有实行。

第三种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就是现在的办法，没有成文，不要固定，遇事协商，解决两党有关之问题。但这种形式太不密切，许多问题不能恰当的及时的得到解决。例如许多大政方针之推行，下级磨擦问题之调整，都因没有一种固定组织，让它延缓下去，所以这种办法对于长期合作是不利的。然而如果第一二种办法不行，这种办法暂时也只得仍之。

总之，长期战争中的长期合作，组织形式问题也是一个重要问题。我们极力赞成有一种统一的形式，使之利于长期合作。

(6) 长期合作中的互助互让政策

长期战争需要长期的统一战线，前已说过，这是一切政策的出发点。因此，共产党员在其工作中，在其同友党发生关系中，随时随地都要顾到这个长期性。凡于长期合作有利的，应该坚决的勇敢的做，不利的，则决不应做。

这里就发生各党之间互助互让的问题。说互助，例如各党

都要发展，都要巩固，任何一党除了发展与巩固自己之外，还应对友党的发展与巩固取赞助态度。国民党的发展与巩固，共产党员应取何种态度呢？一句话，赞助之。其理由是国民党的发展巩固利于抗日战争，利于全民族，因而也利于劳动人民与共产党，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了。现在国民党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共产党员应取什么态度呢？没有问题，取赞助态度。我们希望三民主义青年团有广大的发展，依照蒋介石先生关于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宣言做去，该团的发展是有光明前途的。也正是为着赞助，我们对于该团现行办法中之某些事项，希望有所修正，不然，好的动机将难得好的结果。三民主义青年团应该成为全国广大青年群众团结救国的统一组织，吸收各党各派各界的青年个人与青年团体加入进去，成为使整个青年一代集体地受到民族革命的教育训练之一个大集团。因此，组织上应该民主化，政治上应该发扬团员的自动自觉精神，发扬青年群众的积极性。这是我们对于三民主义青年团的态度与意见。

互助就不是互害，损人利己在个人道德是不对的，在民族道德更加不对。因此，无理的磨擦，甚至捉人杀人等事，无论如何是要不得的，共产党员决不应该以此对待友党。而如若友党以此对待我们时，我们也决不容置之不理。凡无理的事必须以严正态度对待之，才是待己待人的正道。互相规过，是朋友间的美德，也是政党间应该提倡的作风。

统一战线中有什么互让呢？有的。我们曾经在政治上作过一些让步，那就是停止没收土地，改编红军，改变苏区制度，这是一种政治上的让步，这是为了建立统一战线团结全民共同对敌的必要步骤。我们的友党也作了让步，那就是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等等。这种为了团结抗日、为了长期合作的互让政策，是很好的，很对的。只有政治上糊涂或别有用心的人，才会说：共产党投降了国民党，或国民党投降了共产党。

现在我们又主张所有各统一战线中的党派，互不在对方内部招收党员，组织支部，进行秘密活动。我们认为这种政策是必要的。现在当然和过去不同，在过去内战时期，国共两党间除了公开的战争之外，还互相使用秘密手段，进行破坏对方的活动。合作以后，当然不应有互相破坏的动机与行为了，但是互相在对方内部秘密招收党员组织支部的办法，也应该停止，使彼此安心，才能适合于长期战争中长期合作之目的。我们现在正式向国民党同志申明：我们停止在你们内部作招收党员组织支部的活动，不管统一战线采取何种的共同组织形式，我们都是这样做。但同时，也希望你们这样做。双方约定之后，下级党员如有违背，由违背之一方的上级负责处理。

此外，双方同志接触，应采谦和、尊敬、商量态度，不采傲慢、轻视、独断态度，以改善双方之关系，这也是必要的。

一切我们所说的，共产党员应该首先实行，不管对方某些人员或尚未用同样的政策、方法、态度对待我们，但我们仍然这样做，做的久了，对方某些一时尚未明白的人员也会明白了。

共产党员对于一切为国为民的事业，应该坚持自己的立场，始终不变地向着战胜日寇、建立新中国的方向走去，谁要违背了这种立场、这个方向，谁就丧失了共产党员的资格。但共产党员又必须有互助互让的精神，必须有尊重友党及和友党同志用谦和、商量态度解决问题的精神，一切有友党同志的地方，都应和他们商量解决有关事项，不应独断。没有这种精神，就不能巩固统一团结，所谓为国为民事业，战胜日寇建立新中国之目的，也就达不到。因此，决不能把必要的互让政策解释为消极行为。不但互助是积极的，互让也是积极的，因为必要的让步，是巩固两党合作求得更好的团结与更大的进步之不可缺少的条件。

（7）民主共和国问题

虽然我们的党还在一九三六年的九月间，就公布了关于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决议案，虽然中央同志曾经多次的说明过这个问题，但外间对于我们的主张仍有许多不明白的。这是一个关于抗战前途的问题。抗战的结果将怎么样呢？所谓抗战建国，照共产党的意思，究将建立一个什么国呢？这是存在着的问题。再一次解释这个问题，对于巩固各党各派长期合作的信心，是有利益的。

建立一个什么国呢？一句话答复：建立一个三民主义共和国。

我们所谓民主共和国就是三民主义共和国，它的性质是三民主义的。按照孙中山先生的说法，就是一个“求国际地位平等，求政治地位平等，求经济地位平等”的国家。第一，这个国家是一个民族主义的国家。它是一个独立国，它不受任何外国干涉，同时也不去干涉任何外国。即是说，改变中国原来的半殖民地地位，它独立起来了；但同时，无论它强盛到什么程度，决不把自己变为帝国主义，而是以平等精神同一切尊重中国独立的友邦和平往来，共存互惠。对国内各民族，给予平等权利，而在自愿原则下互相团结，建立统一的政府。第二，这个国家是一个民权主义的国家。国内人民，政治地位一律平等；各级官吏是民选的；政治制度是民主集中制；设立人民代表会议的国会与地方议会；凡十八岁以上的公民，除犯罪者外，不分阶级、男女、民族、信仰与文化程度，都有选举与被选举权。国家给予人民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并在政治上、物质上保证之。第三，这个国家是一个民生主义的国家，它不否认私有财产制。但须使工人有工作，并改良劳动条件；农民有土地，并废除苛捐杂税重租

重利；学生有书读，并保证贫苦者入学；其他各界都有事做，能够充分发挥其天才。一句话，使人人有衣穿，有饭吃，有书读，有事做。我们所谓民主共和国，就是这样一种国家，就是真正三民主义的中华民国。不是苏维埃，也不是社会主义。

中国要变为这样一个国家，要同谁作斗争呢？要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斗争。日本帝国主义剥夺我们的独立，我们就要向他要独立。日本帝国主义把我们当奴隶，我们就要向他要自由。日本帝国主义使我们陷入饥寒交迫，我们就要向他要饭吃。怎样要法？用枪口向他要。一句话，赶走日本帝国主义，就有一个独立、自由、幸福的三民主义新中华民国。

六 中国的反侵略战争与世界的反法西斯运动

(1) 中国与世界不可分

中国已紧密地与世界联成一体，中日战争是世界战争的一部分，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不能离开世界而孤立起来。新的抗战形势中可能暂时地减少一部分外国的援助，加重了中国自力更生的意义，中国无论何时也应自力更生为基本立脚点。但中国不是孤立也不能孤立，中国与世界紧密联系的事实，也是我们的立脚点，而且必须成为我们的立脚点。我们不是也不能是闭关主义者，中国早已不能闭关，现在更是一个世界性的帝国主义用战争闯进全中国来，全中国人都关心世界与中国的关系，尤其关心目前欧洲时局的变动。所以我们来分析一下当前的国际形势，是有意义的。

(2) 重新分割世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开始

资本帝国主义的本性，不但是和本国人民大众矛盾的，是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矛盾的，是和社会主义国家矛盾的，而且是

帝国主义诸国之间自相矛盾的。这最后一种矛盾在历史上的最尖锐表现，就是二十年前的世界大战。那次两组帝国主义互战的结果，产生了新的国际形势。战后世界政治经济新的发展的结果，使得世界又临到新的大战面前。在东方日寇侵略东四省、西方希特勒登台之后，新的重分世界的战争业已开始了。“法西斯主义就是战争”，一点也不错。在此情势下，一方面日德意组成了侵略阵线，实行大规模的侵略。另一方面各民主国家却为保守已得利益而在和平的名义之下准备战争；但至今不愿用实力制裁侵略者，尤其是英国的妥协政策实际上帮助了侵略者。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东四省首先被牺牲，接着亚比西尼亚亡于意大利，西班牙则助长了叛军的气焰，中国又受到日寇新的大规模的侵略，到最近，奥国与捷克又先后牺牲于希特勒。全世界已有六万万人口进入了战争，范围普及到亚、非、欧三洲，这就是新的世界战争的现时状况。

（3）现时世界战争的特点

由于一方面日德意诸法西斯国家的坚决的侵略意志，又一方面各民主国家不愿实力制裁尤其是英国的妥协政策，使得新的世界战争的现时状态表现了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不同特点，这就是首先侵略中间国家与采取各种不同的战争形式。中国、亚比西尼亚、西班牙、奥地利、捷克等国，都是半独立国家或小国，日德意诸国就拣了这些肥肉先行吞蚀。在侵略这些中间国家中，侵略者采取了三种特殊的战争形式。第一种是日本对中国、意大利对亚比西尼亚的战争，这是公开的直接的大规模的战争，但是在不宣而战的形式下进行的，开了战争史上的新纪元。采取这种不宣而战政策的目的是，在于侵略者利用各民主国家的无意制裁尤其是英国的妥协政策，暂时避免和它们的直接冲突，便利其先夺取中间国家的行动。第二种是意德两国侵

略西班牙的方式，采取了援助叛军的办法，这是历史上老办法的重演，历史上这类办法是有过的。第三种是希特勒侵略奥捷两国的方式，这里没有战争的表面（没有打响），但有战争的实际，出动了强大兵力占领奥国全部与捷克一部，并使捷克余部归属其统制，这是不战而亡人国的最巧妙的办法。这三种战争形式的采用，都是由于一方面，侵略国本身力量还不充足，暂时未便和各大国直接作战，因而采取了巧妙的战争方法，企图使自己先行壮大起来，同时即是使各大国削弱起来，再与各大国作战。又一方面，则是各民主国家不愿制裁侵略者，尤其是英国的怯懦妥协政策的结果，这种政策实际上援助了侵略者，便利其侵略各中间国家。

（4）英国妥协政策将引导法西斯各国 实行更大规模的战争

以张伯伦为首的英国保守党内阁，正在逐步进行其所谓四强合作的政策，慕尼黑协定之后，欧洲政局有暂时逆转的可能。英国大部分保守党的政策，历来是以排斥苏联妥协德意为原则的，由于他们畏惧苏联的强盛，畏惧自己过早卷入战争，畏惧本国人民运动与殖民地独立运动，早已决心牺牲西班牙、奥国、捷克等国，成就其排斥苏联妥协德意的企图。过去因为保守党内部的不统一，法国人民阵线的积极政策，国内国际舆论的责备，而没有成功。现在则利用了英国及全欧人民不愿战争的心理，利用了法国佛兰亭党的右倾，在希特勒威迫之下，订立了慕尼黑协定。这个协定是英国妥协政策的结果，假如英国不改变它的政策，势将引导法西斯各国进行更大规模的冒险战争。各大国间的战争虽暂时还可能不爆发，暂时限制于侵略中间国家的过程虽还在继续着，但最后势必引导各大国卷入空前残酷的战争里去，这是没有疑义的前途。“搬起石头打自己

的脚”，这就是张伯伦政策的必然结果。

（5）全世界多数人类在逐渐动员中

在资本主义各国方面，由于经济的总危机，资本主义已走到毫无出路的地步，六万万人口的战争牵动了全世界，新的更大的战争在威胁全人类。在社会主义国家方面，则一切都是光明的，进步的，强盛的。在这两种相反的对比之下，全世界大多数人类逐渐地找到了如何保卫自己与解放自己的方向，正在用空前的广大性与空前的深刻性逐步地团结自己并准备斗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二十年来社会主义国家的强盛、资本主义国家的衰落，六七年来法西斯国家的侵略战争、中国的伟大抗日战争、西班牙的人民战争乃至张伯伦的妥协政策等等，逐渐地教育了英法等国与全世界的人民，使他们懂得惟有组织与斗争才是出路，惟有团结世界一切自求解放的人类为一体，惟有世界人民与被压迫民族的统一战线，才有出路。这个全世界人民觉悟、组织、斗争与统一战线的伟大过程，是在向前发展着，但须经过广大而艰苦的努力才能完成。法西斯的战争威胁与张伯伦的妥协政策，最后将遇到伟大的反抗，这也是没有疑义的前途，也是法西斯战争与张伯伦政策的必然的结果。

（6）中国反侵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运动的配合

过去的，大家都明白，各民主国家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援助中国的，主要是其人民的同情中国，苏联的援助则更加积极。现在，由于日寇进攻的深入，又加深了英美法苏对日本的矛盾。虽然英国在西方的妥协政策可能搬用到东方，为了企图多少保存在日本占领地区的商业，为了幻想减轻日本对南洋的威胁，英国有可能同日本进行某种程度的妥协，但根本妥协是困难的，至少暂时有困难，这是日本独占政策的结果，东方问题

与西方问题在当前具体情况上有某种程度上的区别。日本的深入进攻，进一步加深了日美间的矛盾，苏联与中国的友谊是增长的，中美苏三国有进一步亲近的可能。但是我们第一不可忘记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区别，第二不可忘记资本主义国家之政府与资本主义国家之人民的区别，第三，更加不可忘记现时与将来的区别，我们对前者不应寄以过高的希望。应该努力争取前者一切可能的援助，在一定程度上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事实，但过高希望则不适宜。中华民族解放运动与外援的配合，主要的是和先进国家与全世界广大人民反法西斯运动之将来的配合，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不放松争取外援的方针，应该放在这种基点之上。

七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1) 问题的性质

同志们！我们有一个光明的前途，中国必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也能够战胜它。但由现在到达那个光明前途的中间，存在着一段艰难的路程。为着一个光明的中国而斗争的我们与全民族，必须有步骤地同日寇这个黑暗势力作战，而要战胜它，只有经过长期战争。在这个战争中，共产党员处于何种地位呢？他们要怎么样做才算克尽其最善的努力呢？抗战以来的经验，我们也总结了；当前的形势，我们也估计了；全民族的紧急任务，我们也提出了；用长期合作支持长期战争的理论与方法，我们也说明了；国际形势，我们也分析了。那么，还有什么呢？同志们！还有一点，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处于何种地位的问题，这就是共产党员应该怎样认识自己，加强自己，团结自己，才算在民族战争中尽了自己最大责任的问题。

（2）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

国际主义者的共产党员，是否可以同时又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呢？可以的，应该的，看什么历史条件来决定。有日本侵略者与希特勒的爱国主义，有我们的爱国主义。对于日本侵略者与希特勒，共产党员是坚决反对所谓爱国主义的，日本共产党与德国共产党他们都是战争失败主义者，用一切方法使日本侵略者与希特勒的战争失败，越失败得彻底越好。日本共产党与德国共产党都应该这样干，也正在这样干。理由是：日本侵略者与希特勒的战争，是侵害世界人民也侵害其本国人民的。对于我们，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密切结合着，我们的口号是为保卫祖国反对侵略者而战。对于我们，失败主义是罪恶，全力援助蒋委员长与国民政府是天职，是责无旁贷，在这里，不能有一点消极性。理由是：只有为着保卫祖国而战才能出全民族于水火，只有全民族的解放才能有无产阶级与劳动人民的解放，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实施。为此理由，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发挥其全部的积极性，英勇坚决地走上民族革命战争的战场，拿每一枪口瞄准日本侵略者，不容有任何的消极。必须用全力援助友党友军，不容有任何坐观成败的心理。为此理由，我们的党从九一八事变开始，就提出了用民族自卫战争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口号；后来又提出了与坚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命令红军改编为抗日的国民革命军开赴前线作战，命令自己的党员站在抗日战争的最前线，为保卫祖国流最后一滴血。这些做法，这些爱国主义，一切都是正当的，应该的，必须的，正是国际主义在中国的发挥，一点也没有违背国际主义。只有政治上糊涂或别有用心的人，才会闭着眼睛瞎说我们的做法不对，瞎说我们抛弃了国际主义。

(3) 共产党员在民族战争中的模范作用

根据上述理由，共产党员应在民族战争中表现其高度的积极性。而这种积极性，应使之具体表现于各方面，即应在各方面起其先锋的与模范的作用。我们这个战争，是在困难环境之中进行的。这种困难环境的形成，在于我们民族的广大生动力量至今还只在开始发动之中，大多数民众的民族觉悟、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之不足，大多数民众的无组织，军力的不坚强，经济的落后，政治的不民主化，腐败现象与悲观情绪的存在，统一战线内部团结巩固之不足，这些都是形成困难环境的主要原因。为此原故，共产党员不能不自觉地担负起团结全民提高落后的重大责任。在这里，共产党员的先锋作用与模范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在八路军与新四军，应该成为英勇作战的模范，执行命令的模范，纪律的模范，政治工作的模范与内部团结统一的模范。共产党员在与友党友军发生关系中，应该坚持统一团结的立场，坚持统一战线的纲领，成为实行抗战任务的模范。应该言必信，行必果，不要傲慢态度，诚心诚意地同友党友军商量问题，协同工作，成为统一战线中各党相互关系的模范。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共产党员在民众运动中，应该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是诲人不倦的教师，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与群众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等等精神，才是值得尊敬的模范。共产党员应与党外一切先进分子协同一致，为着团结全民提高落后而努力。必须懂得，共产党员不过是全民族中一小部分，党外存在着广大先进分子与积极分子，我们必须

和他们协同工作。那种“只有自己好，别人都不行”的想法，是完全不对的。共产党员对于落后人们的态度，不是轻视他们，看不起他们，而是尊重他们，亲近他们，团结他们，说服他们，鼓励他们前进。共产党员对于在工作中犯过错误的人们，除了不可救药者外，不是采取排斥态度，而是采取规劝态度，使之翻然改进，弃旧图新。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只有远见卓识，才能不失前进的方向。因此，共产党员又应成为学习的模范，他们每天都是民众的教师，但又每天都是民众的学生，只有向民众学习，向环境学习，向友党友军学习，了解了它们，才能对于工作实事求是，对于前途有远见卓识。长期战争与艰难环境中，只有共产党员协同友党友军与人民大众中之一切先进分子，高度地发挥其先锋的与模范的作用，才能动员全民族一切生动力量，提高落后，克服困难，为战胜敌人创造新中国而奋斗。

（4）团结全民族与反对民族阵线中的奸细

克服困难战胜敌人的中心任务，是团结全民族，巩固扩大统一战线，发动全民族各个阶层中的一切生动力量，这是独一无二的方针。但同时，民族统一战线中已经存在着并且还要混进来起其破坏作用的奸细，这就是暗藏的、外表上以抗日面貌出现的那些汉奸、托派、亲日派分子。共产党员应该随时注意这些奸细，并以真凭实据为基础，按照具体情况，揭发这些奸细们的罪恶，同时劝告友党友军与人民大众不要上他们的当。提高对于民族奸细们的政治警觉性，共产党员负了重要的责任。揭发与清除奸细，是与扩大巩固民族统一战线不能分离的。

(5) 扩大共产党与防止奸细混入

为了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共产党必须扩大其组织，向着真诚革命，而又信仰党的主义，拥护党的政策，并愿意服从纪律，努力工作的广大工人、农民与青年积极分子开门，使党变为伟大的带群众性的党。在这里，关门主义倾向是不能容许的。但同时，对于奸细混入的警觉性也决不可少。日本帝国主义的特务机关，时刻企图破坏我们的党，时刻企图利用暗藏的汉奸、托派、亲日派、腐化分子、投机分子，装扮积极面目，混入我们党里。对于这些分子的警惕与严防，是一刻也不应该放松的。不可因为怕奸细而把自己的党关起门来，大胆的发展党是我们确定了方针。但同时，又不可因为大胆发展而疏忽对于奸细与投机分子乘机侵入的警戒。“大胆发展而又不让一个坏分子侵入”，这就是我们发展党的总方针。

(6) 坚持统一战线与坚持党的独立性

如果中国只有一个阶级，一个党派，那就再不要什么统一战线。所谓统一战线，就是拿两个以上的阶级与党派之存在作前提的。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胜敌，并须是长期的坚持，这是确定了方针。但同时，必须保持加入统一战线中的任何党派在思想上、政治上与组织上的独立性，不论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其他党派也好，都是一样。三民主义中的民权主义是什么呢？在党派问题上说来，就是容许联合统一，同时又容许其独立共存。否认独立性，只谈统一性，这是背弃民权主义的思想，不但我们共产党不能同意，任何党派也是不能同意的。没有问题，统一战线中，独立性不能超过统一性，而是服从统一性，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只是也只能是相对的东西。不这样做，就不算坚持统一战线，就要破坏团结对敌的总

方针。但同时，决不能抹杀这种相对的独立性，无论思想上也好，政治上也好，组织上也好，各党必须有相对的自由权。如果被抹杀或自己抛弃这种相对的独立性或自由权，也同样将破坏团结对敌，破坏统一战线。这是每个共产党员，同时也是每个友党党员，应该明白的。

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的关系也是一样。抗日战争中，一切服从抗日利益是总原则，阶级斗争必须服从于民族斗争的利益与要求，而决不应是相违背。但同时，在阶级社会存在的条件下，阶级斗争不能消灭，也无法消灭，企图根本否认阶级斗争存在的理论是歪曲的理论。我们不是否认它，而是调节它，我们提倡的互助互让政策，不但适用于党派关系，基本的也适用于阶级关系。为了团结抗日，应实行一种调节各阶级相互关系的恰当的政策，不应使劳苦大众毫无政治上与生活上的保证，同时也应顾到富有者的利益，这样去适合团结对敌的总要求。

（7）照顾全局，照顾多数，及和同盟者一道来干

共产党员在领导群众，参加统一战线，并和敌人奋斗时，照顾全局，照顾多数，及和同盟者一道干的精神，是不可忽视的。共产党员应该懂得以局部需要服从全局需要之必要。在局部情形看来认为可行，而在全局看来认为不可行时，应以局部服从全局。反之也是一样，在局部情形看来认为不可行，而在全局看来认为可行时，也应以局部服从全局。这就是照顾全局的观点，共产党员决不可脱离群众的多数。置多数人的情况于不顾，而率领少数先进队伍单独冒进，这是不能成功的。随时注意组织先进分子与广大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这就是照顾多数的观点。在一切有同盟者存在的地方，遇事应和同盟者协同去干。独断专行，把同盟者置之不理的态度，是不对的。这些，都是共产党员领导艺术与工作精神方面不可忽视的地方。

一个好的共产党员，应该是善于照顾全局，善于照顾多数，并善于与同盟者协同工作的，违背了这些，就不是一个好党员。

(8) 干部政策

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十七年来，我们党已经培养了不少的领导人才，军事、政治、文化、党务、民运各方面都有了我们的骨干，这是党的光荣，也是全民族的光荣。但同时，现有的骨干还不足以支撑斗争的大厦，还须广大地培养人才。伟大的民族革命斗争中，已经涌出并正在继续涌出无数的天才家、领导者。我们的责任，就在于组织他们，培养他们，爱护他们，并善于使用他们。“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我们不要忘记这个真理。在这里，依靠原有干部的基础但不自满于这个基础，是必须的。因此，坚持而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应是我们的战斗任务。

不但关心党的干部，还要关心非党干部。党外存在着很多的人才，共产党不能把他们置之度外。去掉孤傲习气，善于同非党干部共事，真心诚意地团结他们，同时善意地给以帮助，对待他们以热烈的同志的态度，把他们的积极性与天才组织到抗战建国的伟大事业中去，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尽己自封、目无余子的态度，是不对的。

必须善于识别干部。对于干部长短优劣的识别，不但看他的表现，而且看他的本质，不但看他的一时一事，而且看他的全历史与全工作，这是识别干部的正确方法。在这里，粗心大意，任情逞性，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必须善于使用干部。领导者的责任与工作，归结起来，只有两件事：出主意，用干部。一切计划、决议、命令、指示、

文告、著述、讲演等等，都属于“出主意”一类。使这一切“主意”见之实行，必须团结干部，推动他们去做，都属于“用干部”一类。这两件事，在中国习惯上，就是所谓“用人行政”。在这个使用干部的问题上，我们民族历史中历来有两个表现邪正两派互相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一个是“任人唯亲”。前者是明君贤臣用人的方针，后者是昏君奸臣用人的方针。我们今天来说使用干部问题，是站在革命立场上的，根本与古代有区别，但也离不开“任人唯贤”这个标准。以喜怒为爱憎，阿谀逢迎者奖，骨鲠正直者罚，在古时要不得，在我们也要不得。列宁、斯大林的干部政策，在于以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与群众有密切联系，有独立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为私利等等为标准，而不是其他。在这里，过去张国焘的干部政策正是相反。在张国焘，正是阿谀者奖，正直者罚，拉拢私党，别有企图，他的小组织派别活动，是有了深长历史的。然而也正是他这种以个人为中心而不以党的政治原则为中心的干部政策，走到了他的目的之反面，一切干部都脱离了他，结果剩下了张国焘寡人一名，叛党而去，这是一个大教训。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政治经济的落后性，反映到党内，就是自由主义、个人风头主义与派别活动等恶劣倾向的根源。估计到这种根源的存在，坚持列宁、斯大林的组织路线与干部政策，反对不正派不公道的恶劣倾向，巩固党在正确路线上的统一团结，这是中央以至全党同志的责任。

必须善于爱护干部。在党的培养与艰苦斗争中创造出来的干部，是民族的珍宝。全党的荣誉，应为全党同志所尊重所爱护，各级领导机关则负有用实际办法达到爱护目的之责任。有些什么办法呢？第一，指导他们。这就是让他们放手工作，使他们敢于负责，不怕犯错误；但同时，又适时地与恰当地给以关于工作环境、工作方针与工作方法的指示，使他们能在党的

政治路线下发挥其创造性。第二，提高他们。这就是给以学习理论与方法的机会，教育他们，使之在思想上、在领导能力上较之过去提高一步。第三，检查他们的工作。不是每天检查，而是适时检查，帮助他们总结经验，纠正缺点，扩张成果，这是必要的，有委托而无检查，及至犯了严重错误，方才加以注意，不是爱护干部的办法。第四，改造他们。这就是对于有缺点的、犯错误的、有不正确思想的干部，用主要的说服方法，不得已时则用斗争方法，使他们改变过来。在这里，耐心是必要的。在并非大的原则错误又非说而不服的情况下，不适当地轻易地给人戴上“机会主义”、“小资产阶级意识”等等大帽子的方法，不适当地轻易地采用“开展斗争”的方法，都是不对的。第五，照顾他们的困难。干部的疾病问题、生活问题、家庭问题等事，党的领导机关应给以热忱的亲切的同志的关心，漠然置之、冷淡不理的态度是不对的。疾病必须医治调养，生活求其切合工作需要，家庭问题在可能范围内也须助其解决。一切这些，在物质与环境许可的限度内给以照顾，对于激励干部的工作精神，团结全党为一体的目的上，是有重要意义的。

(9) 党的纪律

十七年来，尤其是五中全会以来的党的斗争经验，证明了有在党内、八路军与新四军内继续坚持铁的纪律的必要。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没有纪律，党就无法率领群众与军队进行胜利的斗争。在过去，由于克服了张国焘一类破坏纪律的倾向，保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抗日战争的顺利执行。在今后，又必须坚持这种纪律，才能团结全党，克服新的困难，争取新的胜利。在这里，几个基本原则是不容忽视的：（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这些就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具体实施，

谁破坏了它们，谁就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谁就给了党的统一团结与党的革命斗争以极大损害。为此原故，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应该根据上述那些基本原则，给全党尤其是新党员以必要的纪律教育。过去经验证明：有些破坏纪律的人，由于他们不懂得什么是党的纪律。有些明知故犯的人，例如张国焘一类，则利用一部分党员的无知以售其奸。所以纪律教育，不但在养成一般党员服从纪律的良好作风上，是必要的；而且在监督党的领袖使之服从纪律，也有其必要。党的纪律是带着强制性的；但同时，它又必须是建立在党员与干部的自觉性上面，决不是片面的命令主义。为此原故，从中央以至地方的领导机关，应制定一种党规，把它当作党的法纪之一部分。一经制定之后，就应不折不扣地实行起来，以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动，并使之成为全党的模范。

（10）党的民主

处在伟大斗争面前的中国共产党，要求整个党的领导机关、全党的党员与干部，高度地发挥其积极性，才能引导斗争向胜利。所谓发挥积极性，不能只是一句空话，必须具体表现在领导机关、干部与党员的创造能力、负责精神、工作的活跃，敢于与善于提出问题，发表意见，批评缺点，以及对于领导机关与领导干部从爱护观点出发的监督作用等等上面。没有这些，所谓积极性就是空的。而这些积极性的发挥，有赖于党内生活制度的民主化，没有或缺乏民主生活，是不能达到发挥积极性之目的的。大批能干人才的创造，也只有在民主生活中才有可能。

由于我们国家至今还没有民主生活，反映到党内，就产生了民主生活不足的现象。这种现象，实在妨碍着全党积极性的充分发挥。同时，也就影响到统一战线中、民众运动

中，民主化之不足。为此原故，必须在党内施行民主教育，使党员懂得什么叫做民主生活，民主制与集中制的联系，并如何实行民主集中制。这样才能做到：一方面，确实扩大了党内民主生活；又一方面，不至于走到极端民主化，走到自由放任主义。

在军队中的党，也须增加必要的民主生活，以便提高党员的积极性，增强军队的战斗力。但同时，军队党的民主应少于地方党的民主，应是为着巩固军队纪律与增强战斗力的，而不是削弱纪律与战斗力。在地方党，也应是有利于巩固党的纪律与增强党的战斗力，而不是相反的。

扩大党内民主，是巩固党与发展党的必要步骤，是使党在伟大斗争中生动活跃，胜任愉快，生长新的力量，突破战争难关的有用的与重要的武器。

(11) 我们党已经从两条战线斗争中 巩固与壮大起来

十七年来，我们的党，一般地，已经学会了使用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武器——思想上、政治上及工作上的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一方面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又一方面反对左倾机会主义。

五中全会以前，我们党反对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与李立三的左倾机会主义。由于这两次党内斗争的胜利，使党获得了伟大的进步。五中全会以后，又有过两次有历史意义的党内斗争，这就是遵义会议与开除张国焘。

由于遵义会议纠正了在反五次“围剿”斗争中所犯的左倾机会主义性质的严重的原则错误，团结了党与红军，使得中央与红军主力胜利地完成了长征，转到了抗日的前进阵地，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由于巴西会议与延安会议（反

张国焘路线错误是从巴西开始而在延安完成的）反对了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得全部红军会合一处；全党更加团结起来，进行了英勇的抗日斗争。这两种机会主义错误都是在国内战争中产生的，它们的特点是战争中的错误。

这两次党内斗争所得的教训在什么地方呢？在于：（一）由于不认识中国革命战争中的特点而产生的，表现于反五次“围剿”斗争中的严重的原则错误，包含着不顾主客观条件的“左”的急性病倾向，这种倾向极端不利于革命战争，同时也不利于任何革命运动。要指出：当时的这种错误并非党的总路线的错误，而是执行当时总路线所犯的战争策略与战争方式上的严重原则错误。（二）张国焘的机会主义，则是革命战争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其内容是他的退却路线、军阀主义与反党行为的综合。只有克服了它，才能使得本质很好而且作了长期英勇斗争的红军第四方面军尤其是它的广大的干部与党员，从张国焘的机会主义统制之下解放出来，转到中央的正确路线之下。（三）中央苏区时期的伟大的组织工作，不论军事建设也好，政府工作也好，民众工作也好，党的建设也好，是有大的成绩的，没有这种组织工作与前线的英勇战斗相配合，要支持当时残酷的斗争是不可能的。然而在当时党的干部政策与组织原则方面，是犯了严重原则错误的，这表现在宗派倾向，惩办主义，与思想斗争中的过火政策。这是过去李立三路线的残余未能肃清的结果，也是当时政治上原则错误的结果。这些错误，也因遵义会议得到了纠正，使党转到了全般正确的干部政策与组织原则之下来了。在张国焘的组织路线方面，则是完全离开了党的一切原则，破坏了党的纪律，从小组织活动一直发展到反党反中央反国际的行为。中央对于张国焘的罪恶的路线错误与反党行为，曾经尽了一切可能的努力去克服它，并图挽救张国焘本人，但到了张国焘不但坚持不变，采取了两面派的

行为，而且最后实行叛党，就不得不坚决开除他的党籍。这一开除，不但获得了全党的拥护，而且获得了一切忠实于民族解放事业的人们的拥护。共产国际已经批准了这一开除，并指出：张国焘是一个逃兵与叛徒。

以上这些教训与成功，给了我们在今后团结全党，巩固思想上、政治上与组织上的一致，胜利地执行抗日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必要的前提。我们的党已经从两条战线斗争中巩固与壮大起来了。

(12) 当前的两条战线斗争

在今后新的抗战形势中，政治上反对右的悲观主义，将是头等重要的。但同时，反对“左”的急性病，也仍然要注意。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党的组织与民众组织问题上，则须继续反对“左”的关门主义倾向，以便实现长期合作，发展党与发展民众运动。但同时，无条件的合作，无条件的发展，这种右倾机会主义倾向也要注意，否则也就要妨碍合作，妨碍发展，而变为投降主义的合作与无原则的发展了。

两条战线斗争必须切合于具体对象的实际情况，决不能抽象地看问题，一般的指出与具体的应用，是有区别的。所谓“乱戴帽子”的坏习惯，也就是说的那种抽象地应用这个方法之不对。

在反倾向斗争中，反对两面派的行为，是值得严重注意的。因为两面派行为的最大危险性，在于它可能发展到小组织行动，张国焘的历史就是证据。阳奉阴违，口是心非，当面说得好听，背后又在捣鬼，这就是两面派行为的实质。提高干部与党员对于两面派行为的注意力，是巩固党的纪律之重要的要求。

（13）学 习

一般地说，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与趋势；并经过他们，去教育那些文化水准较低的党员。特殊地说，干部应该着重地研究这些东西，中央委员会与高级干部尤其应该加紧研究。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使之向着胜利，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实际运动的了解，就不能有胜利。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是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而是当作行动的指南。不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字母，而是学习他们观察问题与解决问题的立场与方法。只有这个行动指南，只有这个立场与方法，才是革命的科学，才是引导我们认识革命对象与指导革命运动的唯一正确的方针。中国党的马克思主义的修养，现已较前大有进步，但还说到普遍与深入。在这方面，我们较之若干外国的兄弟党，未免逊色。而我们的任务，是在领导一个四万万五千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着空前的历史斗争。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我们努力罢，从我们这次扩大的六中全会之后，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的更多一点，更好一点。我们的工作做得还不错，但如果不加深一步地学习理论，就无法使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一些，而只有使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一些，才有我们的胜利。因此，学习理论是胜利的条件。在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中国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主义的同志，那将是等于打倒一个日本帝国主义。同志们，我们一定要学习马克思

主义。

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大民族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发展法则，有它的民族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个，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之一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该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该给以总结，我们要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承继遗产，转过来就变为方法，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着重要的帮助的。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与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干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队伍中存在着的一些严重的缺点，是应该认真除掉的。

当前运动的特点是什么？它有什么规律性，如何指导这个运动？这些都是最实际不过的问题。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懂得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部，也还没有懂得中国的全部。运动在发展中，又有新的东西在后头，新东西是层出不穷的。研究这个运动的全面及其发展，是我们要时刻光起眼睛注意的大课题。

如果有人拒绝对于这些作认真的过细的研究，那他就不过是一个西班牙的唐·吉珂德，再加一个中国的阿Q，而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何研究？用马克思主义的工具——唯物辩证法。向谁研究？我们的先生多得很——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资本家、地主、日本帝国主义，还有全世界，他们都是我们的研究对象，同时又都是我们的先生。我们应该向他们或多或少的学到一点东西。

学习的敌人是自己的满足，要认真学习一点东西，须从不自满始。对自己，“学而不厌”，对人家，“诲人不倦”，我们应取这种态度。

（14）团结全党到团结全民族

伟大的斗争需要伟大的力量，团结全民族，发动全民族一切生动力量进入这个斗争中去，是我们确定了方针。而要达此目的，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团结，是有重大作用的，是最基本的条件。遵义会议与克服张国焘错误之后，我们的党是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最团结最统一的时期了。现在我们党内，无论在政治路线上，战略方针上，时局估计与任务提出上，中央委员会与全党，意见都是一致的。这种政治原则的一致，是团结的基本条件。党员与党员、干部与干部、领导者与领导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习惯上所谓人事关系，我们也学会了许多正确的恰当的方法，造成了在正确政治原则下的和衷共济的空气，有了更好的相互关系。由于地区的广大，情况的复杂，工作部门的不同，不同的意见是难免的、应该的，党内民主的实际，就是容许任何不同意见的提出与讨论。也正是由于民主方法，保证着交换意见，并使之概括起来作出结论，形成全党一致的方针。在这里，客观地与全面地看问题的态度，不杂主观成见与意气，不要片面的看问题，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我们也

逐渐地学会了，这又保证着党的团结。我们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者，自以为是的成见与意气用事的作风，是无用的长物。经过了十七年锻炼的中国共产党及它的领导人员，已经有了老练的作风了。所有这些，就能保证中央以至全党的团结一致，就能在全民族中形成一个团结一致的核心与重心，推动抗战进到胜利。同志们，全党团结起来，全民族团结起来，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八 召集党的七次代表大会

现在我来说最后一个问题，召集七次大会的问题。

同志们，我们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自从一九二八年开过第六次代表大会以来，由于环境的原因，已有十年没有开大会了。去年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决定准备召集七次代表大会，但准备工作尚未完成，因此今年尚难召集。此次全会扩大会应该讨论加紧这个准备工作的问题，并决定在不久时间实行召集大会。这次大会的政治意义是重大的，它将总结过去的经验，主要的是全国抗战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经验；讨论国内国际的政治形势；讨论如何进一步的团结全民族，团结国共两党及其他党派，进一步的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讨论如何在长期战争与长期合作中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方针方法与计划；讨论如何动员全国工人阶级及劳动人民更积极的参加抗战；并应讨论党在新的情况下如何进一步的团结自己，加强自己，巩固自己与国民党、其他党派及全国人民的联系，以便顺利地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除了这些政治的与组织的问题之外，七次大会应该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将全党中最有威信的许多领导同志选进中央委员会来，加强对于全党工作的领导。同志们，这次大会的意义如此重大，因此，扩大的六中全

会闭幕之后，诸位同志回到各地工作，便应在努力发展党与巩固党的基础之上，依照民主的方法，适时地进行选举，使那些最优秀的最为党员群众所信托的干部与党员有机会当选为大会的代表，使七次大会能够集全党优秀代表于一堂，保证大会的成功。我们相信，这次全国代表大会一定能够成功，一定能够给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以最庄严的最有力量的回答，让日本帝国主义在我们的全国代表大会面前发起抖来，滚到东洋大海里去，中华民族是一定要胜利的。

我的报告就此完结。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刊印。

论晋察冀边区 抗日根据地的政权

(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三日)

彭 真

晋察冀边区今天已经成为华北坚强的抗日游击根据地之一，它不但在坚持华北抗战和保卫大武汉的斗争中，起了和起着伟大的战略作用，而且在全国、全世界起了和起着极大的政治影响和作用，引起全国同胞和全世界爱好和平及进步人士之注目和爱护。它在蒋⁽¹⁾委员长，阎、程⁽²⁾司令长官，朱、彭⁽³⁾总副司令诸军政首长的领导下，依靠着八路军游击队和广大群众英勇艰苦的斗争，依靠着国共两党和全体军、政、民的精诚团结与努力，已经由原来五台、阜平、灵丘等县的狭小地区，扩大发展到冀中，东至津浦，西至同蒲，北至北宁、平绥，南至沧石、正太这几条交通要道中间的广大领土。除过平汉路一条狭窄的线和其附近的县城以外，在其他大小七十一个完整的或不完整的、巩固的或不甚巩固的县份内，我们的抗日部队已先后驱逐了敌寇的军队，摧毁了敌寇的伪政权，恢复了中华民国的政权，到处飞扬起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我国国旗。

二

这里的高级行政机关，边区行政委员会，是由边区全体军、政、民代表会（国民党、共产党两党代表参加）选举出来，并经过阎司令长官转呈国民政府行政院批准的。在边区政府下，在冀中、冀西、晋东北和察南，又创为七个行政区，设有七个专员，专员下共有四十五个县政府，八个联合县政府（管辖十八个县）和八个县佐（管辖着八个不完整的县）。县以下区有民选的区长，村有民选的村长，县于县长之外，有由工救、农救、商会、妇救、青救、驻军及士绅代表组织之县行政会。边区有同样性质之民意机关——边区行政会议。这便是边区的行政系统。

三

边区政府在它所管辖的大小七十一个县份的疆域内，已相当的安定了政治和社会经济秩序，除了边境上的游击区域，所有边区内部的土匪已逐渐绝迹。依靠广大群众——特别是自卫队的努力，许多地方的汉奸已销声匿迹，或暂时停止活动。在平汉路以西的边区财政已完全统一，冀中正在统一过程中，庞大的抗战经费都依靠着政府经手征集的财力、物力来支持，广大的人民群众在政府领导下协同军队支持着前线的战争，保卫着边区，保卫着他们的家乡，保卫了他们的春耕、夏耕、麦收和秋收，警卫着他们生活的安全，为坚持华北的抗战，配合主力保卫我们的武汉，在踊跃的出钱出力。这里政府受着边区人民的热烈拥护，有着很高的威信，因此一切政府的政策，大部分都能顺利的进行——这是许多曾经到过边区的中外新闻记者

所公认的事实。

政府的权力还远伸到附近敌人的区域，它可以经过种种关系在敌寇统治的一个小县城，销售二万元以上的救国公债；它的税收人员，可以赤手空拳在敌寇所统治的车站，经常征收烟酒关税等合理税收；它的纸币可以在附近敌区很流畅的秘密行使；它和军队可以源源不绝的大批收到敌区民众送来大批的枪支子弹。各县政府领导下的基干自卫队，也可和军队一样，去逮捕敌区的汉奸。某县县长可以便衣到某大城市内，在群众中公开进行工作，行使县长的某些职权……这里也证明它即使在敌人统治区域，也比敌寇的伪政权有着更高的威信。

在敌寇继续不断围攻下的边区各级政权，何以取得如此的政治地位和威信呢？这自然是依靠着抗日部队的拥护和尊重，依靠着蒋委员长、国民政府和阎主任的正确领导和帮助，但最主要的还是它自身有着相当高度的行政效率和广大群众自动积极的热烈的支持和爱护。

四

边区政府何以取得广大群众，甚至敌区群众之热烈支持和拥护，并且自动积极帮助政府行使职权呢？

第一，是它能尊重民众的意志，虚心考虑并接受群众的意见，细心体察群众需要和所谓“民隐”。在边区疆域内，政府给予了民众以抗日和集会、结社、言论等之绝对自由（汉奸除外），并且依靠边区和县行政会议，依靠着区、村长的真正民选，提高了群众对于政府的注意和关心。政府对于各种重大事项，都以各种形式发动民众讨论，民众经过行政会议或其他自己的组织系统，可以自由向政府提出他们的意见，要求政府实行某些善政，或取消某些弊政，并可以得到满意的实际的回

答。因此他们在实际政治生活中，了解了政府是真正代表他们的利益，代表民族利益，替国家替他们做事的政府，因此他们也就像爱护自己一样来爱护政府，对于政府每一个正确的号召和政策，按期完成或超过原来的计划。如平山县的救国公债，本定十一万元，但不到一月即完成了十八万元。

但也有个别的县长，以为自己是中古式的县老爷。因为他在民族危机严重的关头，仍想借榨取群众去发财，想控制群众，结果这些县长失掉了群众的信仰和拥护，惹起群众的厌恶。因此，他不但不能定期完成边区政府所给予他的任务，甚至在敌人进攻时，连消息也不能按时报告边区政府。特别是战区政府，要想取得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而又对群众意见不尊重，对群众利害漠不关心——甚至继续残酷的去鱼肉压迫民众，并妄想用控制群众运动来代替动员群众运动，这真是南辕北辙，达不到自己底目的。在边区内，这样的官吏，都一次次的在工作中，特别在敌寇进攻时，被民众的消极不理和反对，完全破产了。只有那些尊重群众意见，从积极方面启发群众自动性积极性的政府工作人员，才获得了相当的成绩和成功，战区的事实都证明了政府控制民运政策，成了阻碍民众抗战和政府孤立自己的自杀政策。而一切不尊重民意违犯民意的行为，往往把群众驱逐到敌人方面去，这在客观上正是帮助了敌人。

第二，是坚持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我们的政府——特别是战区的政府，只代表一部分人的利益，只取得一部分人的拥护，是不应当的，同时也无法在敌寇继续不断的围攻的环境中，支持如此艰苦的局面。它必须站在全民族、全体人民的立场，坚持着坚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在一切服从抗战、一切为了抗战的原则下，动员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持前线的抗战，积极进行一些对抗战、对各个阶级、各个阶层的人民有利的善政，并善为调处各阶级阶层间的关系和磨擦。只有这样，

政府才能获得最大多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政府才能巩固自身，并负担起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的任务。

第三，是政府工作人员的俭朴的生活和廉洁的作风。长期持久战的消耗是相当浩大繁重的，它需要人民不断的出钱出力。同时，战争的破坏又异常的残酷，大大削弱了人民出钱出力的能力。加以战区的周围，窥伺着凶恶阴险的敌人，不但在军事上凶残的继续不断的进攻，并且利用我方民众因战争而受的生活痛苦，来挑拨我军、政、民的团结。如果贪污不能彻底肃清，再伴以政府工作人员的腐化生活，不但影响抗战财力人力的动员，加重人民的负担和痛苦，影响到前线的抗战，而且会使政府无法与民众打成一片，给敌寇以挑拨离间之机会。现在边区政府各级工作人员的生活，是相当艰苦的，边区政府主席每月生活费只有十八元，各县行政工作人员生活费普通都在十元左右，一切个人的应酬、膳食、衣服且均为自备，而许多廉洁的县长还节约其生活费之一部捐助于抗战或群众团体。

至于贪污，政府依靠着广大群众之监督和协助，已相当的肃清，或正在肃清，这里我们必须表扬群众在肃清贪污中的伟大作用。例如某县税局局长，为某当局之亲属被荐于边区政府者，在任十天之内全部税收只不过三百元，而该局长竟从中贪污了二百元。于是群众大愤，立即召集大会检举，使税局长当场具悔过书，保证以后再不贪污，并全部退出了赃款。边区政府依靠着民众的检举，才相当保证了各县政府的廉洁，并间接保证了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

第四，警察制度之改革。在各县政府建立之初，警察制度曾正式或变相的恢复。结果普遍发现警察狐假虎威，鱼肉乡民和榨取、贪污、压迫民众的现象，激起多数民众直接对警察、间接对政府发生极大的不满。证明各县旧的警察制度之存在，无异是在政府与民众间掘了一条极深的鸿沟，把政府与民众隔

离起来，使政府与民众无法团结。另一方面，敌寇进攻时又丝毫不能抵抗，真可谓“抗战不足，扰民有余”。所以现在在晋察冀边区警察制度已开始代以脱离生产之基于自卫队（游击队）和普通的自卫队。今天边区到处站岗放哨的已不是手执警棒威风凛凛的警察，而是手执刀矛的儿童团的团员和自卫队队员。他们警卫了地方的安全，肃清了汉奸；他们协助政府行使了职权，并在敌寇进攻时协同军队卫护各级政府和家乡；他们成了在工作中把政府与群众密切联系起来的组织形式之一，节省了维持警察制度所必需的庞大开支。

第五，群众抗战的自动性、积极性之启发。比如出钱出力，如果民众了解，则民众自愿的踊跃的出力出钱，并帮助政府去动员别人出力出钱而毫无怨言。如果不使群众了解，不从政治上去说服鼓励而用强迫方法去勒索，不但会惹起群众极大的反感，而且根本不能动员广大的人力、财力和物力，甚至使政府威信都因之扫地。怎样启发群众的抗战的积极性，使他们自动出钱出力呢？主要是吸引群众到政府中来，共同负责商讨各种行政大计，使他们和政府站在同样负责的精神下帮助参预政府各种工作，这里不但要尊重民众的意志，而且需要政府工作人员有极好的民主作风和工作习惯与态度，使群众敢于和政府接近，乐于和政府工作人员共同商讨并进行工作。

只有这样，才能使民众认为政府是他们的政府，坚决热烈的来维护支持，使政府建立起极高的威信，把权力远伸到敌区，并从政治上粉碎敌寇的伪政权、伪组织。

五

怎样才能提高政府行政效率，成为一个具有高度行政效率的地方政府呢？

第一，政府的机构和工作要简单化、科学化——政府组织要简单化，因为今天边区是处在战争的环境，有些县份还是游击区域，政府机关有时要跟着游击队行动。如果组织庞大，便会成了累赘。同时还会发生机关重复和事权不一、行动迟缓的流弊。

以简单化的组织机构，如何负担如此复杂的工作呢？它依靠着工作也和组织一样的简单化、科学化，废除各种不必要的形式和一切不必要的手续，逐渐肃清文牍主义、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恶习。并且实行比较科学的分工，每个县政府的组织，只有一二三科分管民政、财政和教育，外设司法科，管诉讼案件。多数县份一二三科，每科只有一两个干事作助手。边区政府只多了一个实业处。因为政府集合各部工作人员于一个办公厅，即废除了许多不必要的形式和手续。因工作上简单化、科学化了一些，同时又开始实行比较科学的分工，结果不但节省了工作人员和经费，而且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第二，是与群众团体密切联系，把广大群众变成积极自觉实现政府各种政策之武器。动员所有群众团体帮助政府进行各种工作，特别是人力和资财的动员，边区政府过去的财政经济政策和锄奸工作，一贯是依靠这些方法。它所以能够肃清过去一个时期曾经存在着的严重的贪污现象，也是依靠群众团体的协助。政府组织机构的简单化和政府取得群众团体的帮助，把各种群众团体变成自己政策实现的武器，二者是不可分的。没有后者，前者便无法实现或不能很好的实现。

第三，政府有一批廉洁正直、能为抗战牺牲一切，能自动积极负责工作的人员，和群众自下而上的推动和监督（自然还有前面所说的帮助）来配合上级政府自上而下的领导。——这是保障政府组织机构简单化以后，反能提高行政效率的必要条件之一。

在战争环境中，上下级的关系，是十分难得保证经常密切的。中国许多地方行政机关，即便平日在上级长官直接严厉监督下，有时尚且变成贪污腐化、行政效能极低的机关。那末在战区如何保障各级政府能够以最大最快的速度来实现政府的政策，完成政府的工作呢？这一方面主要的是依靠政府工作人员的爱国热忱和他们的自觉性、积极性，去自动的积极刻苦的工作；同时还依靠着群众的推动和监督，这是推动政府工作的最有效的办法。许多过去的贪污现象，依靠群众的监督肃清了许多为“混事”、“做官”、“发财”而来的行政人员，因此积极认真工作起来或被驱逐了。边区各级政府，就是依靠上述这些方法，提高了它的行政效率，改革了它的工作作风和习惯，并保障了它的廉洁，因而更加加强了它与群众的联系，使自己在最困难的环境下经常完成了艰巨的任务。

六

边区政府与县政府和群众联系的组织形式，是边区或县行政会议。它直接通过行政会议并间接通过各群众团体的组织系统，动员、领导广大群众来支持实现自己的各种政策，完成自己的工作。又经过这种形式反映并吸收各界民众对于行政上的意见。它的具体方法是：在一定期间（半月——边区是一月），县或边区行政会议开会一次，县长或边区行政人员出席报告该期间政府工作。另一方面各群众团体在行政会议开会前，各经过自己的组织系统，征集会内及会外群众对政府工作之批评和意见，因此行政会议便可以比较清楚的、多方面的了解政府工作情形和群众的反映，这样不但他们对政府工作提出正确的批评政府，可以将行政上应兴应革的重大事件，提出讨论；而且行政会议也可经常自动的深刻讨论、研究、决定政府施政

方针，提交并推动帮助政府执行，与政府密切的联系起来，但它并不直接去代替政府工作，或妨碍政府行政系统之统一。

村的最高民意机关为村民大会，区的最高民意机关为区民代表会议。它们可以选举村长、区长，必要时也可以要求撤换改选区、村长（区长选举由上级指挥，并于选举后呈报上级批准），这便使区、村长与群众能够保持更密切的联系，更提高他们在群众中的威信、获得群众对于他们热烈拥护和支持。

七

晋察冀边区的政权组织，是巩固扩大晋察冀边区的有力支柱之一，它是中华民国的合法的地方政府，它的产生不但经过了人民的选举，而且经过了阎主任和国民政府的批准。它包括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爱国领袖，相当改革了自己的机构，实行了相当的民主，并且依靠各级工作人员的集体努力和互相监督鼓励与模范作用以及广大群众的帮助，相当保证了各级工作人员的艰苦生活和廉洁作风。因已有了相当高度的工作效率，而获得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支持和爱护。但仍保存着许多障碍它发展的缺点，个别的死不觉悟的行政长官还在做着控制和御用群众运动的迷梦，在一般的艰苦廉洁的环境中，个别分子贪污腐化的现象与企图还在不断的发生，文牍主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残余，仍不时涌现出来作祟，有些人对于民众仍保存着惧怕的心理，这些错误倾向和缺点，阻碍着政府更迅速的进步，妨碍着战争的动员和边区的巩固与发展，阻碍着政府更进一步普遍成为千百万民众热烈爱戴拥护的领袖，甚至客观上把民众逼到敌人一方面去，或妨碍我们把群众从敌寇欺骗下争取过来。但我们确信依靠边区各级政府和广大群众的努力，并因敌人继续不断的残酷围攻和粉碎围攻的战争之逼迫，边区军、

政、民的共同苦斗，将使边区政权飞速的克服其自身残存的缺点，日益成为国民政府领导下最健全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民主的、廉洁的、具有高度工作能力和获得最广大群众爱护的地方政府！

十月十三日

根据一九三八年十月三十一日出版的
《解放》第五十五期刊印。

注 释

- 〔1〕指蒋介石。
- 〔2〕指阎锡山、程潜。
- 〔3〕指朱德、彭德怀。

关于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的与党的组织问题

——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提纲

(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五日)

张 闻 天

第一节 绪 论

(一) 组织任务，服从于政治任务。政治任务靠组织任务来完成。组织工作上事务主义的来源，是由于组织任务脱离了政治。但在政治任务决定之后，组织工作有决定的作用。政治任务没有组织工作来完成，就变成空谈主义。

(二) 在组织工作中必须熟习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但必须严格的估计到中国民族的、政治的、文化的、思想习惯的各种特点，来决定组织工作的特点，来使组织工作中国化。

(三) 必须严格估计到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目前迅速变化着的战争形势，估计到中国各地具体环境的特点，来决定在中国不同地区、不同时期内组织工作的特点，及其在情况变化时的各种可能的转变。一切组织工作都必须从具体情况的认识出发，从实际的东西出发。

(四) 对于各国与中国组织工作上的经验的考虑与检查的必要，同时要在实践中不断学习，不断创造。应该吸收一切过去的经验与教训，但不要为过去所限制，所拘泥。在组织工作

方面，我们也要在理论上，在实践中学习，要向全党同志，向群众学习。

第二节 党在组织工作上的任务及过去的成绩与弱点

（一）我党今天组织工作上的总路线是：组织最广大的人民到抗战中来，同国民党亲密的合作，坚持与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与扩大党，使之成为全国人民的、群众的、布尔什维克的、在抗战中能够起重大的以至决定作用的党，保障在持久战中战胜日寇，争取中国民主共和国的彻底胜利。

党在组织工作上的这一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这就是说党的组织工作是服从了党的政治任务的。

（二）今天组织工作上的成绩，表现在统一战线方面，国共合作方面，党的发展方面，党的武装力量（八路军、新四军）等方面的成绩。这证明了党的组织路线是正确的。

但在上述各方面同样表现出了党在组织工作上的弱点。如统一战线，首先是国共合作还不够广大与巩固。党的组织力量还落后于政治影响，还不够强大等。

产生这些弱点的客观的原因：

（甲）国民党进步的迟缓，对于党的限制及顽固分子的捣乱。（乙）过去对党的摧残的影响（组织不大，有独立工作能力的干部的缺乏）。主观的原因：（甲）我们还没有运用一切机会进行工作。（乙）旧的组织工作方法的残余的严重存在，及新的工作经验还不够。

（三）转变中的成功与困难：

（甲）过去为苏维埃而斗争的政治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因此，根据这一政治路线而进行的组织路线基本上也是正确的。过去苏维埃运动中组织工作中最大的成绩：

A. 学会了组织坚强的铁的军队，学会了领导革命战争。B. 取得了组织政权与管理政权的经验。C. 在农村中工作的经验。D. 培养了一批在政治军事上比较老练的干部。

(乙) 目前组织工作上的大转变的任务：从两个政权对立到国内的和平统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合作）。

从党的不合法的秘密的活动到合法的公开活动。

这种转变是我党历史上的大转变。但这个转变已经比较顺利的达到了目的。因此得到了很大的成绩。

(丙) 过去组织工作中残余的存在：

A. 同国民党对立，对国民党的深刻的仇恨，与不会同国民党合作。B. 长期同整个社会隔离的状态，仇恨一切旧东西的结果，使我们不善于同整个社会接触，特别是对社会上层人士的接触。C. 苏维埃红军中行政的、军事的、简单化的工作方式与方法的存在，使我们不会运用民主的工作方法。D. 在白区白色恐怖下秘密的狭窄的工作方式的存在，使我们不善于进行公开合法的工作。E. 长期的左的关门主义、公式主义的恶劣传统的影响。

这种残余的存在，妨碍了统一战线与党的工作的更大的开展。

(四) 要求组织工作上的新的进步与发展：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根据过去组织工作上的经验，根据已经得到的成绩（新的经验），克服客观上、主观上的困难，以求得统一战线的组织工作与党的组织工作的新的进步与发展，是我们组织工作的当前任务，也是本报告的任务。

本报告分成两部分，即关于统一战线的组织工作部分和关于党的组织工作的部分。

第一部分 关于统一战线的组织工作

第三节 关于统一战线的特点与工作

（一）目前统一战线的特点，政治报告中已经讲过了，我只讲一下同组织工作有关的几点。

我们目前的统一战线，无疑的，是同法国的、西班牙的统一战线不同，同中国大革命时代的统一战线也是不同的。所以估计它的特点是很重要的。

这些特点如下：

（甲）它是在对外抗战中发展与扩大的，因此：A. 它的民族的广泛性，它包含一切抗战的人民。B. 它在抗战中的进步性（战争的地方，战争的部门，均较其他地方与部门为进步）。但 C. 它内部包含着敌对阶级、敌对党派，他们间有过合作与斗争的经验。因此，D. 在抗日战争中，在进步中包含着严重的斗争。这也就是进步的迟缓与困难的原因。

（乙）统一战线的中心力量是国共两党，中心问题也是两党的问题：A. 持久战要求两党的长期合作。长期合作的根据是由于：反日的反侵略的战争，直接敌人是日寇；投降妥协即是自己灭亡；日寇消灭蒋及国民党的政策；过去分裂时期的痛苦的经验与教训；共产党坚持合作的坚定立场；双方对于长期合作的迫切要求等。B. 但过去的长期的斗争，又在两党间造成了很深的成见与鸿沟；共产党方面怕国民党“反水”；国民党方面怕共产党“争夺领导权”；相互间存在的互相防范与警戒；特别是国民党的“联共”与“防共”政策的矛盾性。而在共产党手里，也有武装与政权。这些均是磨擦的来源。

（丙）统一战线内部（两党合作）是不平等的。A. 共产党方面承认三民主义与国民党的统治地位，及拥蒋的合作。所

谓“合法权”是在国民党的手里。它是大党。共产党是比较小的党。共产党的武装力量，也比它的小。共产党统治的边区也比它统治的地区小。而力量上的不平等，也就产生了合作形式上的不平等。形式上我们拥护它，服从它。这是国民党方面的高慢主义、阿Q主义的来源。B. 但双方还有政治上的不平等。是国民党承认抗日救国为合法，共产党（武装与政权）为合法。它的政权军队的腐化，官僚主义、军阀主义的存在。我们的政权与军队都是先进的。国民党在政治上比较落后，它的进步的被动性，它缺乏远见。而共产党则与它相反。过去十年国民党政治在人民中的恶影响及共产党在人民中的好影响。共产党在政治上的先锋作用。在政治上是国民党要接受共产党的主张。共产党方面宗派主义的根源。这种政治上的不平等，使不平等的合作形式更为复杂。

（丁）统一战线（两党合作）的发展是不平衡的。

A. 中央与地方的发展的不平衡。有些地方中央进步、地方落后，但有些地方，则地方进步、中央落后。B. 地方与地方的发展不平衡。C. 国民党、共产党双方发展的不平衡。共产党的力量，一般的发展比国民党要快，而国民党在某些地方（如敌后方）的力量则削弱了。在政治影响上，国民党与共产党同时增长了，但后者较前者为快。

（戊）中国绝大多数的人民是无组织的。他们向来在政治上是落后的、被压迫的。他们现在不但要求抗日，而且迫切的要求民主自由与民生的改善。抗战需要他们的觉醒、组织与力量，历史正推动着他们成为全国的主人。

（己）国民党的特点：A. 是以大资产阶级为主的各阶级联合的党，在革命历史上转变着自己阶级的关系。抗战发动后，国民党内部的阶级力量发生了变化与分化，进步与保守倾向间发生了斗争。B. 是同政权军队结合着的党，其内部有代

表各方面的小派别，主要的为 CC、复兴。C. 有长期历史，有一个主义，有它自己的独裁式的领袖，有革命与反革命的经验。D. 有它上层的骨干担负着各方面要职，但其下层的、普通的党员，一般的是充数的、挂名的、没有组织生活的。

（二）适合于这种特点的统一战线工作的几个注意点：

（甲）善于把握总路线，克服一切障碍，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国共长期合作的方针。在言论行动上，总是把抗日反汉奸放在第一位，表示出要求团结统一及对于国家民族的忠诚。其他如民主民生，均应放在比较次要地位。不为一时的不满、磨擦、逆流，而丧失自己的基本方向。从大处着眼，不讨小便宜，不急于成就，不为挑拨者所利用。这要求全党同志的持久性、忍耐性，不要急性病，不要冲动，而有高度的政治觉悟。

（乙）善于承认不平等，使不平等成为平等。A. 承认事实上的不平等，去推动国民党的进步，发展统一战线。尊重国民党中央的抗战国策，服从他们的抗战法令，用自上而下推动、协商、联络、影响、说服、批评等方法，使国民党党、政、军走向进步。消除两党间的成见与仇恨。争取大多数的同情者，帮助进步分子的团结。总之，在政治上提高国民党一步。B. 承认事实上的不平等，去壮大自己。不要太急于在形式上求得平等（如：“共同宣言”、“共同领导”等），而要善于在现在不平等的形式下，壮大自己，运用自己已经取得的合法权（如八路），在公开合法的组织中工作去帮助国民党，服从国民党的形式下进行工作，以组织自己的力量（党、政、军、民方面）。这要求全党同志埋头苦干，在力量上去壮大自己，使力量上的不平等也成为平等。

（丙）善于运用不平衡，使不平衡走向平衡：A. 加强、提高、强化中央，使中央进步，运用中央的一切进步的东西，

运用蒋的进步的言论，去推动地方与下层的进步。这里应认清全国性政权的作用。B. 求得与地方进步分子的合作，推动地方的进步，实现中央的抗战法令，造成模范，以推动落后的地方，不但使之与中央的进步看齐，而且超过之，以推动中央。C. 善于运用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间的不平衡，组织共产党的力量（政权、武装、民众），强化共产党的力量。善于运用局部的、部分的可能形式，不要太急于组织全国性的、全般性的东西。D. 一切都是为了统一战线在各方面的进步，建立统一的民主共和国。

（丁）善于尊重国民党，帮助国民党，使之进步，以发展统一战线。A. 用一切方法影响国民党的进步，使国民党中一切抗日分子自己团结起来。首先是到处尊重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及其领袖孙中山先生与蒋介石先生，和国民党的各种形式。同国民党的各方面的人，发生亲密的关系。动员优秀分子到国民党中去。帮助三民主义青年团的进步与发展，对于它的经常的、诚恳的、善意的批评，认真的、实际的帮助他们的工作，诚恳的、大公无私的、谦逊的态度。在坚持抗战的纲领下，团结各派国民党分子。不在国民党中发展共产党，使之安心（首先在他的CC、复兴、军队中）。但关于今天被迫加入的（如在三民主义青年团、群众团体、政府中）及过去已经进去的共产党员的具体问题的解决，还有一个过渡时期。这要在逐渐求得共产党的公开活动中，国民党的进步中，保证共产党公开后不受歧视的条件下，以求得最后的解决。发生这样问题时，国民党中央与共产党中央应求得合理解决。B. 善于同顽固分子、动摇分子、妥协分子进行斗争。（子）“避免不必要的磨擦，不怕进行必要的磨擦。”“不必要的磨擦不可有，必要的磨擦不可无”。（丑）一般采用公开合法的民主的斗争方式。自始至终站在拥护抗战国策、拥护三民主义的立场。自始至终采

取宣传、请求、请愿、舆论动员的立场上。自始至终以“劝人为善”争取大多数的立场。这样可以：自己站稳立场，使大众看来是大公无私、光明正大，真能感动与争取大部分可变分子，而孤立不可救药的分子。（寅）要有软有硬，有退让有进攻。但以防卫为主要形式。软到不丧失自己的立场，硬到不破坏统一。注意软硬的“分寸”。只有这种斗争可以打破一切“防共”的阴谋。

（戊）善于组织无组织的群众，到抗战中来。A. 在统一战线中组织无组织的民众。为了抗战而动员民众。经过抗战以组织民众。拥护政府军队以组织民众。在抗战中争取民主与改善民生，以组织民众。B. 组织民众以巩固与加强统一战线。没有民众，抗战没有力量，抗战不能巩固与持久。C. 培养民众的自动性与独立性，使他们对自己的力量有足够的自信心与主人翁的觉悟。

（己）发挥党在抗战中的模范作用、抗战的推动者与组织者的作用，保持党的独立性，并壮大自己。但应善于隐蔽自己的力量，不要太突出。A. 扩大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好的政治影响，争取在全民族中重要的地位，转变全国人民对共产党的视听。B. 要在别人不注意中、警戒疏忽中发展自己。C. “实事求是”——但求实际，不求虚名。D. 不要以自己的希望，当做实际。不要把人家同我们所讲的，当做实际。真正把自己的策略建立在“实际”基础上。

上述的一切办法，是适合于一定规律的，而不是违反规律的。只有照这些办法做去，才有利于抗战，有利于民族，也有益于共产党。

现在单独提出同汉奸与托派斗争的方法问题：

（三）同汉奸斗争中应注意之点：

（甲）公开反对汉奸的立场，指出当汉奸是中国人的最大

耻辱。造成人民对汉奸的仇恨。主张消灭汉奸。

(乙) 但应估计到各种名称不同的汉奸，如：A. 坚决的、死心塌地的大汉奸。B. 动摇的汉奸，两面摇摆的汉奸。C. 不得已的、被迫的、心上还是偏向中国的。

(丙) 对各种汉奸的基本方针：A. 消灭坚决的、死心塌地的少数大汉奸，公开宣布其罪状，没收其财产。B. 争取动摇的与被迫的汉奸同情抗日、帮助抗日。

(丁) 争取动摇的被迫的汉奸的方法：A. 对一切汉奸，开始多采取争取其回头的办法。不没收其财产，多取说服劝导的办法，给他们以自新的道路，不要“逼上梁山”。——这样办，动摇的与被迫的固然可以回头，即坚决的亦能动摇其决心。B. 坚决消灭死心塌地为日寇服务的少数大汉奸，公布其罪状，没收其财产；给其他汉奸以威吓。C. 对能够同情与帮助抗日的“汉奸”的态度：(1) 同他们发生关系时要秘密，不要为日寇所知道，要掩护他，不要暴露他。(2) 给他想办法以应付日寇。我们不要造成他们困难使他们被敌人消灭。要从持久出发，不要求一时之痛快。D. 但不要轻易相信汉奸的话，要根据具体的事实，去证明其是否可靠。E. 秘密保存来往信件、证据等，使之不得反悔。

(戊) 在特殊情况下（如日军已到或迫近，无法反抗、不能逃避时），当某些士绅组织维持会以应付日军时，应与之保持联络，以得到情报等。

(己) 在维持会中，应进行工作。

(庚) 不要轻易把汉奸帽子放在动摇妥协分子的头上。从动摇妥协到变为汉奸还有一个过程。我们策略运用得适当，可推迟他们变为汉奸的过程，或使他们真正变为汉奸时陷于孤立。

(四) 同托派斗争中应该注意之点：

（甲）解释托派在世界上的反革命作用，及其对于人类和平与革命的危害，揭发他们每一危害国家民族的事实，造成人民对于他们的仇恨。采取坚决铲除的立场。

（乙）但在具体解决问题上，应依照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对付办法；对不可救药的分子，严厉对付；对可以改邪归正的，应使之自新，效力国家。

（丙）同托派斗争的方法，在中国同在苏联有些不同：

A. 在苏联：（子）联共有了几十年同托洛斯基主义斗争的历史；托派反革命的道路，已为大众所周知；谁都反对托派，它已完全没有群众，它的“左”的资本已经用尽。（丑）苏联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已完全胜利，进入了没有阶级的社会。以斯大林同志为首的联共有全体劳动人民的拥护。（寅）代表反动阶级残余的托派的活动，不能不采取完全秘密的、阴谋暗杀的、暗探的、隐藏的、两面派的方法。（卯）社会主义国家完全可能与应该采取逮捕、公审、枪决的办法。这办法现在是比较简单的，但这是长期斗争的结果。

B. 在中国：（子）托派的历史及反革命的事实，并未为中国广大人民所周知。它的“左”的资本仍未用尽。在党力量薄弱的地方，它仍可欺骗一部分极“左”分子与落后分子。（丑）全国不为我们所统治，而且主要地区是在国民党统治之下。托派依靠国民党内的顽固分子力量，还能公开向我们进攻，压迫我们。对那里托派分子的连根铲除，一时还谈不到。（寅）我们是处在民族抗战、各阶级合作对外的时代，阶级关系很复杂。

C. 因此：（子）不应放弃而应加紧同他们进行公开的、思想的、民主的斗争，暴露他们一切破坏团结统一的罪恶，揭破他们民族的两面派的本质，采取各种策略，使他们完全陷于孤立。（丑）不应放弃争取被他们所欺骗的分子到抗战中来的

方法。(寅)对于托派中不可救药的分子,在国民党区域内只有在群众拥护、政府赞助的条件下,才能进行铲除的方法。但这只是(子)(丑)二项办法正确执行的结果。(卯)在我们统治区域,则应铲除最坏的,使受他们欺骗者改过自新。但因为今天的托派就是汉奸,故公开处决托派分子时,应用托派汉奸的名义。

(丁)总之,应该使反托派的斗争,在全国人民看来,是全国人民与极少数坏人的斗争,而不简单是共产党与托派之间的斗争。我们不要轻易把托派的帽子放在人家的头上。应分别托派与有些有托派思想的分子。也不要急于把托派的帽子,放在那些隐藏的托派分子的头上,使反对他们的斗争受到障碍,应该用真凭实据去揭破他们的真相。在斗争中应表现出有忍耐心与劝人为善的风度。

(戊)但在任何时候,不要轻易相信转向后的托派分子悔过自新等的甘言蜜语,对他们仍应严密警戒,并要在长期的实际工作中去考察他们。

第四节 不同地区不同任务与党的工作

(一)不同地区。关于不同地区要求有具体的分析,但大致可分为下列数种:

(甲)敌后方。敌后方又可分为:

A. 敌人占领的中心城市与据点——敌人的后方根据地;
B. 抗日根据地; C. 游击区——敌我力量争夺的区域; D. 敌人未占领,但即可失去的区域; E. 敌人已占领,但仍可收复的区域。

(乙)战区。战区又可分为:

A. 直接战区——前线; B. 邻近战区——预备阵地。

(丙)我后方。我后方又可分为:

A. 估计敌人会到来的近后方；B. 估计敌人不会到来的远后方；C. 抗日后方根据地的陕甘宁边区。

这些地区是互相交叉着的，而且是经常变化的。因此，对于每个地区，仍需要有具体的分析。

（二）关于不同地区不同情况进行具体分析时，应注意下列各点：

- （甲）军事战略上的一般情况；
- （乙）敌人的力量及其政策，汉奸（托派在内）的力量；
- （丙）我们政府军队的力量及其政策；
- （丁）各党派统一战线的形势；
- （戊）民众的情况及其与党、政、军的关系。
- （己）共产党力量与工作。
- （庚）历史的因素。

（三）在组织工作的总方针下不同地区的不同任务（这也要求有具体的解决，不能以此成为公式）：

（甲）敌后方（敌人占据的中心城市与据点除外）的任务是，大规模的公开的发动、组织、坚持、扩大游击战争，打击、消耗、困疲敌人以达到收复失地，保卫国土，创立抗日军队、抗日政权，建立抗日根据地，以准备将来全国的反攻。这里应建立模范的统一战线，建立强大的共产党，大批的教育干部。

（乙）在敌人占领的中心城市与据点（点线区域）的任务是，坚决的实行退却，转入秘密状态，利用公开合法，埋头苦干，在大企业中建立工人的短小精干的党的堡垒，输送大批文化人知识分子与工人干部，到农村中去领导游击战争。耐心的教育与培养干部，保存实力，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准备将来的反攻。

（丙）战区的任务是，动员与组织当地民众参战（战地服

务团、担架运输、交通慰劳、宣传队等，在敌人前进路上破坏道路、桥梁，坚壁清野，锄奸等工作），鼓励士气，帮助政府、军队进行直接的战争，争取局部胜利。依照当前情况，发动或准备必要的力量（党的与武装的），以进行游击战争。应把将要失去的城市中的大批干部、党员、青年学生，转移到乡村中去工作。可留下一小部分在内，但留的方法、留的对象，应慎重选择。

（丁）近后方——估计敌人会到来的后方的任务是，进行直接配合战区参战的动员（送新兵上前线，组织服务团上前方，献金，防空防毒，慰劳伤病兵，救济灾民难民），号召团结统一，持久抗战，揭发与打击一切挑拨离间破坏团结的阴谋，进行公开合法的政治动员。从城市中输送大批干部、学生、文化人到乡村中去，在必要的地区，预先建立堡垒，准备必要的力量，以准备游击战争的发动。在适当地区，多开办训练班，输送青年学生到各种合法的训练班中去，大批教育青年学生，再大批派他们出去工作。

（戊）远后方。远后方的任务是，响应各方面一般的抗战动员，帮助政府进行征兵、推销公债运动。一般的宣传鼓动工作，经过青年学生，在内地开始文化教育的救国运动，建立一些公开合法的救亡团体等。建立党的秘密的精干的堡垒，同时多进行上层活动，改变上层分子对共产党的观听，等待时机。

（己）陕甘宁边区。其任务是，进行切实的抗战动员，民主政治的建设，文化教育工作的普及，增进国防与民生的经济建设，肃清土匪汉奸，发扬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在全国起模范的与推动的作用。大批吸收全国青年来边区，给以必要的教育（学校工作的重要），以影响全国。同中央政府建立更密切的关系（不管他承认与否，也不必急于要他承认）。

（四）不同地区，革命形势发展的不平衡：

（甲）由于国民党进步的被动性，因此敌人愈逼得利害的地方，进步亦较快，日寇未到的地方，则仍然非常黑暗。

（乙）被日寇所蹂躏的地方，在敌后方，在战区，反动的顽固分子特别逃避得快（向内地，向日本方面），新生的力量的产生亦快，磨擦亦较少，在我后方则相反。

（丙）国民党内部的不统一，统治力量的不平衡。

（丁）共产党力量分布的不平衡。

（戊）各地方的历史条件的不同。

因此：离开战场愈近的地方，进步亦较快，工作亦较顺利；反之，离开战场愈远的地方，则愈落后，工作亦愈困难。进步的次序是：敌后方第一，战区第二，近后方第三，远后方第四。

（五）时刻记住过去革命中的两个教训：

（甲）革命武装力量的重要，革命军队在革命中所起的决定作用，及革命根据地的意义。忽视这点，是第一次大革命时代我党的弱点，而重视这点，则是苏维埃革命时代我党的强点。我们应该发挥这个强点。

（乙）同国民党挤得太紧，容易造成分裂。应该有相当的分区的活动，各自发展。大革命时代，这不可能，现在则有此可能。应该利用此可能。

（六）根据不同地区、不同任务、不同的革命形势，及过去革命的两个教训，来决定党在今天的工作的重心。

（甲）今天工作的重心，应放在：

A. 最容易动员民众参加战争，以抵抗日寇的侵掠，以建立统一战线坚固基础的地方；B. 最容易在全国人民前面能表示出自己的模范作用，“我们的位置在前线”、“牺牲奋斗”、“忠义救国”等，以推动统一战线的地方；C. 最能组织与发

展自己的力量，有大发展前途，以造成统一战线的核心的地方；D. 同国民党发生直接冲突较少的地方。

（乙）因此，党的工作重心，首先应放在敌后方战区，然后及于近后方、远后方，以至敌人占领的中心城市与据点。党的力量应依此分配，不要平分兵力（这种布置为了巩固统一战线，与国共长期合作也是必要的）。

（丙）但中心地区的中心任务，应放在进行抗日战争，创立坚强的武装力量与创立抗日根据地。其他工作都是为了为完成这种任务造成有利条件。应反对工作中的平均主义。

（丁）应教育全党同志学习领导战争，学习革命战争的战略与战术。

第五节 关于敌后方抗日根据地的建立

（一）敌后方的情况：

（甲）敌人的主力在进攻中，在占领区敌人力量的不够分配，敌之暴行，及其分布情况（日本的、汉奸的）。

（乙）八路军、新四军与其他抗日军队的存在与活动。

（丙）共产党及其他抗日党派与抗日分子的积极活动。

（丁）广大民众的抗日情绪与要求。

（戊）地区辽阔，便于游击战与运动战。

因此，根据地的创立是可能的。

（二）敌后方根据地的重要：

（甲）持久战的战略支点——牵制敌人的进攻，不断威胁敌人，反攻中的前进支撑阵地。

（乙）民主共和国的下层建筑与雏形。

（丙）抗日军补给的后方。

（丁）组织、武装与教育广大民众的自由场所，大批干部的出产地。

（戊）巩固人民抗日的自信心。

因此，创立根据地是必要的。

（三）抗日根据地的必要条件：

（甲）各党各派首先是国共两党的巩固的统一战线，而共产党在政治上起领导作用。

（乙）政府军队与民众间的团结一致。

（丙）三民主义共同纲领的开始实施（是抗日的、民主的、民生的）。

（丁）一定的有利的地理、地形及敌情的条件。

没有这些条件，持久的抗日根据地的建立是不可能的。晋冀察边区即是这种根据地一个很好的例子。

（四）但敌后方的情形也是非常复杂的。创立根据地的方法，决不能千篇一律。一般的，我们可大致分成两种类型：

（甲）在八路军、新四军、共产党占优势的活动区域创立根据地则比较直接、单纯、迅速。

（乙）在其他力量占优势的地区，创立根据地则比较间接、曲折、迟缓。

（五）在我们力量占优势的地区创立根据地时，简单的说来应注意如下几点：

（甲）在抗战中建立与改造地方武装，使之成为革命的民众的武装，统一其领导、编制与供给，设立军区、军分区、政治部等等。

（乙）在抗战中建立与改造地方政府，使之成为抗日的、民主的、廉洁的政府，统一其领导与组织。设立边区政府、行政公署、专员公署之类。

（丙）依抗战的需要发表简单的、合乎三民主义的施政纲领（抗战建国纲领），制定单行法令，并实行肃清敌探汉奸土匪，建立抗日秩序。

(丁) 普遍组织人民自卫军、少先队，进行动员、放哨、警戒等工作，并以此为基础，组织基干自卫军、模范自卫军、模范少先队、游击队，并扩大正规部队。

(戊) 公开组织工人救国会、农民救国会、妇女救国会等独立的强大的群众团体，联合成为总会或联合会，使之成为军队与政权的依靠力量，及军队与政权的进步的推动的力量。

(己) 设立省县的国民参政会，使之真正成为代表民意的机关。从村长、区长的民选逐渐走到县长的民选（原有总动员委员会的，不应取消，而使之成为半民意的机关，或民众的联合会）。

(庚) 实行减租减息、救济、优待、改善劳资剥削关系、反贪污、节约运动等办法以改善民生。

(辛) 正确的财政经济政策，以加强国防，解决给养，改善民生为原则。

(壬) 文化教育工作。学校，报纸，大批干部的培养与输送。

(癸) 大量发展党，建立强大的党的基础。一切军政民的领导，集中与统一于当地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区党委、省委）。

(子) 这种地区，仍然是国民政府的一部分，应该求得上级机关的承认与批准，即不批准时，仍应表示自己是国民政府的一部分，经常与中央或司令长官发生关系，向他们报告工作。它仍然应该是统一战线的（吸收各党派的名流学者参加）。但这种地区，应该是全国的模范区，应该是新中国的雏形。

(丑) 这种地区的工作方式应是大胆的、公开的、大手面的（反对秘密工作时代的被压迫阶级的小家子作风）。斗争形式，主要的是抗日的武装斗争，其他一切斗争形式，都为了争取这一武装斗争的胜利。但决不应看轻其他斗争形式。武装斗争形式与其他斗争形式应很好结合起来。

（寅）工作发展的次序，一般是从党所领导的武装到政权、到民运。当然在武装中、政权中、民运中均要党。这样发展的次序是顺的，适合于规律的。党的力量的分配，即应以此为标准。

（六）在其他我们没有基础的地区，为创立根据地，我们的工作方针应如下：

（甲）在能同我们推诚合作的左派上层领袖统治的地区，则应诚心诚意的赞助他，经过他来进行创立根据地的工作。一切工作应求得互相信任。

（乙）在同我们合作的中派上层领袖统治的地区，则应推动他进步的方面，防止他保守的方面，发展他下层的进步力量。对他下面的顽固分子，仍应多采取解释、联络的方法，争取他们的同情与善意的中立。但公开民主的斗争方式，仍不能放弃，主要的是防卫性的。对他们的实际的援助，只在一定的条件下，而且是有限度的。但对于他们自己发展力量，我们仍应一般采取赞助立场，不能妨碍。

（丙）在顽固分子统治的区域，我们仍应坚持抗战的方针，避免不必要的冲突，但必须同他们进行必要的斗争。对他们的捣乱破坏，应公开批评与揭发，必要与可能时应给以打击，削弱其力量，使之孤立。在斗争中，我们应不断求得自己力量的发展。

（丁）在当地豪绅地主的武装（如联庄会，会门等）统治的地区，首先应采取联结的政策，互相接近。在他们内部工作时，应采取积极参加剿匪、保卫家乡的工作，以取得他们的信任。有系统的、有计划的推动他们为保卫家乡而抗日。在他们抗日的行动中，组织人民自卫军或游击队，以逐渐瓦解其组织，孤立其上层的坏分子（一部分笼络之，给以名义；最坏的消灭之）。

(戊) 在土匪统治的区域，在土匪头子要求的情况下，可酌量派人进去工作，观察形势。可能时，可采取逐渐改造其统治系统的方针。不可能时，则应设法使之分化，瓦解他们的队伍。可同他们订立互不侵犯的或共同行动的临时协定。但在我们统治区的土匪，则应使之出境，不然则用武力消灭之。

(己) 当友党友军内部发生冲突时，应完全以大公无私的态度进行调解，以求得双方的好感，便于以后的工作。

第六节 党在军队中的工作

(一) 中国抗日军队的特点：

(甲) 是抗日的军队，在抗日中正在改造与进步。

(乙) 军队的质量，是极不一致的，有最先进的（如八路军、新四军），也有最落后的。除了八路军与新四军以外，都保存着过去军阀军队的传统。

(丙) 军队的系统很多，现在虽能一般的统一指挥，但仍不免是私人派系所依靠的力量。外边人不大能插足。

(丁) 雇佣的军队为主，征兵制还未建立。

(二) 抗日军队工作中应注意之点：

(甲) 只能巩固，不能采取瓦解、破坏的方针，但必须在帮助其改造中，来求得巩固。

(乙) 尊重军队的指挥系统，改造军队，必须经过上级军官的同意与赞成，应从上而下。反之，则违反军纪，自己处在不利的地位。

(丙) 一个军队只能有一个指挥系统。自己的军队，必须求得指挥自己军队的合法权。在别人指挥系统内的我们的某些军事单位，不能同时由我们来指挥。

(三) 我们在军队中工作的任务：

(甲) 在巩固与扩大统一战线中推动友军的进步与改造。

(乙) 建立与扩大在我们单一指挥下的军队。

(四) 在扩大我们自己的武装方面，应注意下列各点：

(甲) 主要的重心放在敌后方。

(乙) 大胆利用已有的合法权，扩大自己：A. 以八路军、新四军名义，组织各种支队、游击队；B. 尽力收编杂色队伍、自发武装，及各种游击队（地方党组织的尚未取得合法的在内）；C. 动员新兵，收容散兵，动员各种基干自卫队、游击队参加八路军、新四军。

(丙) 取得抗日政权下合法武装（如保安团等）及民众武装力量（如自卫队）的直接指挥权。

(丁) 用各种名义组织独立支队等。将自己创造的力量，不在八路军、新四军中去求合法，而交给友党人“加委”与指挥中去求得“合法”，结果一定上当，自己不能指挥，反为人家指挥来反对我们（侯如墉、郭挺一的例子）。

(五) 对自己的武装力量的必要要求：

(甲) 应该建立政治委员制、政治工作机关及党的组织，大量发展党员到全军百分之二十——百分之三十，保证党的绝对领导。

(乙) 在独立行动的军事单位内，应建立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前委”、“党委”），决定一切政治军事的问题。遇事应讨论，争论不决时，应服从党的负责者（前委或党委书记）。

(丙) 军队中党的负责同志，应绝对服从党上级机关的命令，绝对禁止在军队中进行反对上级党的言论与行动，禁止进行一切派别的、无原则的斗争（任何争论不能解决时，应交上级解决）。应在军队中创造尊敬党的领导机关、服从党的命令的优良传统。

(丁) 在作战纪律、军民关系、刻苦耐劳、自我牺牲方面，应成为一切其他军队的模范，以影响其他军队。

(戊) 同地方党应建立良好的关系。反对军队中的自高自大主义与地方党的地方主义。军队党与地方党的统一领导的必要。

(己) 以省委的军委书记兼部队政委，或省委书记兼政委，或政委兼书记的方法，以求得党与军队的统一领导。

(六) 大胆的利用八路军、新四军的合法地位，同友军发生各种关系，向他们进行各种善意的提议，供献意见，希其采纳。尊重他们的指挥。对友方对于我们干部的要求，应采取极端审慎的态度，必要派时，以少而精为原则。派出干部工作方针，不是破坏他们，而是巩固他们；不是同官长对立，而是帮助官长，以求得亲密合作与信任；不是使官长惧怕，而是使他们安心。千万不要急性病、幼稚病。他不应该直接担负发展党的组织的责任。同时应防止腐化。

(七) 党在其他军队中的工作，应：

(甲) 多同官长联络，当朋友，争取他们的同情与信任。

(乙) 在上层不愿意的情况下，不要在他们军队内发展党。

(丙) 在中央军内一律不发展党的组织，但力求更多的同情者。

(丁) 任何抗日军队内，党的组织的任务，是巩固部队，提高部队的战斗力。

(戊) 军队内的党，在需要秘密的条件下，以短小精干为原则。注意吸收官长中的特别党员。只有在军队主管长官不怕党的公开时，才大量发展党员。

(己) 利用各种文化以及群众的团体，在军队中进行政治工作，争取官长兵士们的同情抗日。

(八) 帮助同盟者建立新军的两种方法：

(甲) 只处在从旁帮助的地位，在组织上党不在新军中起决定作用，但政治上应给以必要的保障，使领导权操在革命分

子手中，不反对自己。

（乙）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组织上，直接取得我们在新军中的决定作用。这里面的党，在同盟者不愿意时，应保守绝对秘密的原则。但必须尊重同盟者的指挥与命令。军队仍然是同盟者的。

上面两种办法的采用，应依情况来决定。但后者只是在特殊情况下产生的。

（九）在敌伪军中工作的方针：采取伪军反正，瓦解敌伪军。利用敌伪军俘虏进行敌伪军工作。对反正的伪军应逐渐改造之。在中国军队政治部下应有敌伪军的工作部门，敌后方地方党应有专负责这一工作的人。

（十）敌后方区党委、省委应有军委。非战区省委，应有联络部，专门进行军队中上层的活动。

第七节 党在政府中的工作

（一）中国抗日政府的特点：

（甲）是抗日的政府，在抗战中正在改造与进步。

（乙）政府的质量是极不一致的，但除陕甘宁边区政府及抗日根据地政府外，大多数还是官僚主义的，同民众对立的机关。

（丙）政府的系统也很多。内部包含很多争权夺利的派别斗争。

（丁）政府历来受军队支配。

（戊）政府与国民党党部的结合。

（二）我们在政府中工作的总方针：

（甲）推动政府的进步与改造，使之真正成为统一战线的民主的政府。

（乙）建立一些模范的地方政府，以推动全国政府的进步。

(三) 党在目前不参加国民政府，但在与国防有关的部门，在国民党要求而且确能起某些作用时，可派人参加。

(四) 党在民意机关中，如国民参政会，应积极参加，运用这种机关，以达到坚持抗战、争取民主政治与改善民生的目的，并使之转变成为真正民意的机关。

(五) 在地方政府，首先在敌后方与战区，如有可能，共产党员应以抗日积极分子的面目，参加进去工作，不公开自己共产党员的面目。只有在个别党员有决定意义的政府内，则可公开该党员的名字，以扩大共产党的影响。

(六) 在八路军、新四军收复的以及到达的地区，应以八路军及新四军合法的地位，大批委派进步县长、行政专员、政治主任等，张开一个很广泛的合法的行政机关的网。愈大愈好(取得合法权的重要意义)。

(七) 在取得合法权后，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即应努力于政府工作的深入。组织行政委员会、行政会议、地方参政会，以及村区长以至县长的民选。民选的工作不能普遍的一次进行，而应以工作的开展的程度来决定。在没有工作基础的地区的委派与指定，常常比不成熟的民选更为民主。政府应即颁布各种布告法令，施行善政。

(八) 在敌后方与战区的友党友军统治的地区，则应积极参加他们的总动员委员会或战地动员委员会，使之成为半政权的、半民意的机关，并经过它们以改造旧政权。

(九) 在敌后方与战区，不要放松经过国民党中开明分子取得地方政权中的位置的一切机会。

(十) 共产党员在地方政府中的目的：

(甲) 坚持抗战，镇压汉奸，同破坏分子做斗争。(乙) 组织、武装民众参战，组织自己的武装力量。(丙) 改造政府成为抗日民主的廉洁的政府。(丁) 反对贪污，减租减息，改善

民生。（戊）调解内部纠纷，主张精诚团结，一致对外。

（十一）地方党对政府中的共产党员应：

（甲）经常给他以具体的实际的可能办到的指示，反对不切实的空头指示。

（乙）帮助他解决困难问题，使他能坚持下去，不是给他造成更多的困难。

（丙）帮助他取得民心。

（丁）防止他官僚腐化的倾向，经常给以可能的党的教育。

（戊）保守秘密，只同个别负责同志接洽。在政府中暂时不组织党团。

（十二）党应熟知政府的一切命令、法令、各种条例，培养一批能“做官”的人才。

（十三）八路军应做出尊重地方政权的模范，同地方政府很好的合作。

（十四）政府应帮助民众团体，扶植民众团体，但应尊重民众团体的独立性。

（十五）共产党员在政府中应尊重国民党的形式。

（十六）党内政权问题上的不正确倾向：

（甲）不了解政权的重要性，轻视政权。

（乙）不会使用政权的合法力量，历来在野的“被压迫阶级”的情绪与工作方法。

（丙）对政府中工作的共产党员的过分要求与错误的领导。

第八节 党在群众中的工作

（一）目前群众运动的状况：

（甲）群众运动发展的不平衡：敌后方、战区是群众运动最进步的地区，我后方是最落后的地区。

（乙）国民党需要群众，发展了群众运动，建立了许多机

关。但又怕群众，对群众运动实行统制政策，限制了群众运动的发展。

(丙) 群众运动的发展与统一战线的发展是密切联系着的。

(丁) 群众不但要求抗日，而且要求改善自己的地位，但大多数群众还是无组织的。

(戊) 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的大，及其组织力量的薄弱。

(己) 群众组织以多种多样的地方性为普遍。现在还没有统一的全国性的群众组织。

(二) 我们的任务：组织真正有广大群众的、公开合法的、独立的群众团体。秘密的赤色工会、赤色农会在反动时期不需要，今天更不需要。

(三) 但由于各地情况的不同，故群众运动中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亦不应相同。大别之可分为两类：(甲) 在敌后方与战区；(乙) 在我后方。

(四) 在敌后方与战区，我们群众工作的方针，应该是：

(甲) 经过八路军、新四军、党，以及各种总动会、地动会等，大量的组织公开的、合法的群众团体，如工救、农救、青救等，及半武装的群众组织（如自卫队、少先队），特别是农救、自卫队、少先队，应该在乡村中起决定的作用。

(乙) 这些群众团体，应该有他们自己的独立的组织系统，自己的工作，使参加的群众认为这个团体是他们自己的，不同政府对立，但有监督政权，推动政权的作用。

(丙) 这些群众团体的工作是：A. 参战动员，B. 民主生活，C. 民生改善与文化教育的工作。

(丁) 在八路军、新四军没有占优势，因而还不能组织这类团体的地方，则应采取过渡的办法，组织过渡的团体，以达到上述的任务。

(五) 在国民党统治强的我后方，我们的方针应该是：

（甲）经过上层统一战线，组织下层群众。

（乙）参加到国民党合法的群众组织中去，诚恳的帮助国民党人，使他们的空团体变为真正有群众的团体，不同他们争地位与领导权，而能真正进行群众工作。

（丙）运用各种公开合法的可能、各种空子（如国民党统治弱的地方），自动组织统一战线的群众团体，首先应注意于地方的、局部的统战团体（如战地服务团），特别带有桥梁作用的青年革命团体及各种训练班。

（丁）在国民党区已有历史的、有群众的革命团体，在被禁止时，不要慌张，仍应继续活动，并用公开合法、仁至义尽的方法，力争公开存在。但在有利条件下或万不得已时，亦可改变名称。在一定有利条件下，可同国民党的同类团体合并，而且在政治上我们应始终主张统一。

（戊）这些群众团体，都不是同政府对立，而是拥护政府抗战，不是为了分裂，而是为了统一。即在斗争时，亦要站在此立场上。

（六）在争取民主与改善民生中应注意：

（甲）始终站在抗日救国上，而且要在实际的参战动员中去获得民主与民生的改善。

（乙）采取公开合法的、和平的斗争方式（向政府请愿、上诉等），拥护政府的抗日法令，并要求其实现。

（丙）争取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同情。

（丁）重视协商、仲裁、调解的作用。

（戊）不要提出过高口号，以取得可能的改良为主（如文化教育、防空设备等）。

（己）不要为汉奸托派所利用。

（七）开展民运工作中的几个要点：

（甲）充分使用合法公开。

(乙) 从地方的、局部的，到全国性的。

(丙) 由上而下，经过青年知识分子的文化教育服务团体之类去组织下层基本群众。

(丁) 经过抗日救国，参战动员，到民主民生的争取。

(戊) 在局面已经打开的地方，应大胆的放手的去组织基本民众，武装他们，以充实统一战线，以推动与监督上层。

(己) 群众工作中民主主义的工作作风。——以民主主义教育群众。

A. 共同商讨，共同决定，共同执行，大家平等，不分彼此。

B. 在群众团体中共产党员不要突出，不要包办命令一切。即共产党员占优势的地方，仍然要谦逊和气。

C. 党性要在实际行动中实现，不在口头上。我们应采取无党派的形式，党派性的内容。

(八) 对非党群众领袖的态度：

(甲) 尊重他们的独立性与人格。(乙) 经常的、亲切的、同志的教育工作。(丙) 发动他们的自动性、积极性。

(九) 中央与地方党应依照情况的需要，组织民运部或职工部、农民部，研究各种民运的经验，负责某种民运的工作，培养必要的民运干部（能接近群众的、能埋头苦干的）。

(十) 地方党应统一关于当地民运的领导，群众团体的党团应直属地方党。上级群众团体的党团与下级党团，不能发生直接的指导关系。

关于各种民运工作，因材料搜集不够，不讲。青年的，有陈云同志的专门报告，故只讲一点。

(十一) 关于青年运动：

(甲) 党取消共产青年团是正确的，在取消共产青年团后，青年工作有成绩（客观的形势与主观的努力）。党对青年运动

是注意了，但还是不够的。国民党区虽没有青委，但却有青年工作。

（乙）今后要不要恢复共产青年团，经过它去领导全国青运呢？回答：不要。青年的骨干是在青年中工作的共产党员。

（丙）以后要什么？要统一的、青年的全国组织（民族解放的）。

（丁）如何达到此目的？A. 同国民党的三民主义青年团求得合作。B. 发展、扩大、巩固现在各地的统一战线的青年组织（比较先进的，但不是共产主义青年的）。C. 继续用各种各样的名称在各地组织青年团体。D. 实际在共产党领导下的青年团体内部一定的联络的通讯的关系。这种关系可以不公开或半公开的，目的是在统一内部。E. 加强党的青委工作，统一党对全国青运的领导。

第九节 关于少数民族中的工作

（一）少数民族的重要作用，特别在西北。日本正在挑拨汉族与蒙、回民的斗争，反对中国，破坏中国的国际交通线。国民政府对蒙、回民等少数民族没有一定的方针（抗战建国纲领上，没有一条说到）。而它过去对少数民族的大汉族主义，造成了民族间很深的仇恨。

（二）我们的方针：争取少数民族，在平等的原则下同少数民族联合，共同抗日。

（三）关于少数民族工作的意见：

（甲）以上层活动为中心，求得上层分子的进步，不要乱把汉奸帽子戴在他们（如五马）头上。

（乙）多找少数民族中的开明的知识分子，给以教育，使之成为少数民族工作的干部。

（丙）尊重少数民族的一切思想习惯，宗教道德，并发扬

他们过去优良的传统。在各方面认真的帮助少数民族的进步。

(丁) 对他们的内奸(蒙奸、回奸), 我们方面(即汉族方面) 应采取争取政策, 真正做到仁至义尽的地步。而动员少数民族在自己内部造成坚决反对投降日寇奸徒的阴谋。

(戊) 反对大汉族主义, 改善国民政府与少数民族地方政府的关系。

(己) 在有利条件下, 对于公开投敌的少数民族的武装叛乱, 应以武力消灭之。

(四) 建议国民政府成立回、蒙民的专门工作机关, 加强对少数民族工作的注意, 统一对少数民族的领导。在这类机关中我们可以参加工作。在有少数民族居住地区的地方政府中, 应有少数民族的代表参加, 组织少数民族部(给少数民族以自治权)。

(五) 党中央应组织少数民族委员会, 专门注意在少数民族中的工作, 研究与总结工作经验, 培养与团结少数民族的干部。现在在这方面虽有点工作, 但一般的还是自发的, 缺乏足够的领导。

第二部分 关于党的组织工作

第十节 巩固统一战线中的共产党

(一) 统一战线愈扩大、发展, 则新的问题、新的任务愈多、愈复杂, 在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的工作愈为重要。但巩固党不是为着狭窄的党的利益, 或工人阶级的行会利益, 而是为了整个统一战线的利益, 也是为着工人阶级的最高利益。统一战线的利益与党的利益是一致性的。

(二) 在统一战线中保持党的独立性。反对投降主义的倾向。什么是党的独立性? 马列主义的政治路线与战略策略的坚

持，不掩盖为共产主义的最后目的而奋斗的面目。对于一切其他党派的批评自由。组织上不受任何外力的干涉。

（三）在抗战中放弃独立性的投降倾向。特别是大资产阶级现在正在用一切方法影响共产党员（如思想上的——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物质上的——金钱、地位、美女等），使共产党成为国民党的一派，融化在国民党内，成为它的尾巴。这种影响反映到党内，成为投降主义的倾向。这表现在：忽视党在抗战中的作用，忽视党的巩固与发展，及自己力量的壮大。迁就友党，放弃自己立场。某些分子的动摇、腐化、逃跑等例子。党在这方面曾经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得到了很大成绩。但危险仍然存在，党必须在这方面继续努力。

（四）但党必须同空喊“党的独立性”、“党的原则立场”，而不会认真的、切实的进行统一战线的艰苦工作的关门主义做斗争。这种关门主义妨碍着我们为统一战线而斗争，因此也就妨碍着我党的巩固与发展。

这种关门主义在目前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甲）不懂得怎样具体的分析中国的实际情况、中国民族的特点，用各种不同的方法解决实际中极复杂的问题，用各种迂回曲折的方法实现自己的目的，而满足于千篇一律的公式主义与教条主义。

（乙）不懂得把各种各样程度极不相同的群众、集团与阶层，根据于他们自己的政治经验，用各种各样的方法组织他们到统一战线中来。而满足于空洞的号召与抽象的宣传，把领导先锋队、领导党组织的方法去领导群众。

（丙）不肯以艰苦的、忍耐的、持久的、不出风头的、一点一滴的实际工作，去同国民党诚恳的长期的合作，帮助与推动国民党的进步，消除相互间的成见与仇恨，造成相互间的信任，求得实际的利益，而满足于空谈“争取领导权”、“原则上

的尖锐性”，与政治上的风头主义，处处表示出自己的不沉着、急躁与华而不实。在自己已经取得了领导作用的地方，又表示包办、垄断与不民主。

(丁) 不肯在公开合法的群众团体中进行工作，而醉心于组织自己的、秘密的、少数先进分子的群众团体。

(戊) 不肯虚心地（低首下气的）去研究斗争中所取得的一切实际经验，去向群众学习，而自高自大，自命不凡。

(己) 气量狭小，盛气凌人，不通人情世故，不懂待人接物之道。

(五) 只有两条战线的斗争，才能使：

(甲) 统一战线的巩固与发展 and 党的巩固与发展，成为相互为用的因素，使两者间的一致性真能表现出来。

(乙) 免除党内左右倾的摇摆，使党的路线能够正确的执行与取得胜利。

(六) 但必须指出：

(甲) 党内同右倾向斗争一般的比较容易。因为：A. 在主观方面，党内有长期反右倾的历史，在同志中造成了对右倾的痛恨与畏惧。B. 在客观方面，抗战中的困难与抗战形势的变化，使大资产阶级错误的理论日益破产，它的力量亦日益削弱等。

(乙) 同党内左的关门主义斗争，即特别感觉到困难，因为：

A. 党内关门主义有过长期的历史，没有过坚持的彻底的揭发。反关门主义的斗争，往往为反右倾的斗争所掩盖，并常常使反左倾的同志有受到“右倾”帽子的威胁（如利用地方形式，即被认为不要国际主义；如利用三民主义，即被认为不要共产主义；如提倡民族化，即被认为狭隘的民族主义）。B. 革命的空洞的口号与叫喊，本身有迷惑人的力量、压倒人的力量，使人家不敢反对。C. 关门主义不要求同志们艰苦持久的

实际工作，这为党内破产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分子所欢迎。D. 关门主义把什么都简单化，不要求马列主义的深刻的研究与实际经验的苦思，因此也为幼稚的党员所欢迎。E. 客观的原因：过去国共长期的对立，持久战与国民党进步的迟缓，党内大量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与农民成分的存在。

因此，同左的关门主义也必须坚持斗争到底。这个，特别要求领导机关与领导同志有更多的努力。

（七）两条战线斗争的目的，不是在造成同志们怕犯错误的心理，而是在教育同志们能够正确的执行党的路线与运用策略，使同志们能够把：“布尔什维克的原则的坚定性与实际工作中策略上的灵活性”，“抽象的马列主义的原则与具体的实际工作经验”，“不动摇的立场与临机应变的机智”，“同群众在一起，而又能领导群众前进”，这些相反而又相成的道理联结起来，统一起来。只有这样做，才算尽了有效的反倾向斗争，真能使党的政治水平不断提高，使党不断进步。

（八）两条战线斗争中，应该纠正下列错误：

（甲）要实事求是，不要神经过敏、太多“原则性”。对某种错误不要引申、推测、发展，制造倾向。不要把个别同志一地一时的错误思想，冠以左倾、右倾的帽子。在斗争中要坚持，但不要急性病，不要张皇失措。一种思想上的某种夸大与不及，在思想过程中是任何人也免不了的。只有在当许多错误的思想中贯穿了一定的思想方向，不肯随时纠正时，才成为倾向。

（乙）不断改正自己思想上的某些错误或帮助同志们改正错误，这是党内普通的教育工作，并非什么“思想斗争”。纠正倾向，可以在很少同志的和平的谈话中讨论中解决，用不到什么“斗争”（斗争在我党内，成为公开在党内批评同志的错误并给以“打击”之语）。公开在全党内斗争，只有在不得已

的情况下才实行，如反张国焘主义的斗争之类。

(丙) 党内领导同志千万注意，不要随便给下级同志们以“倾向”的大帽子，以吓倒同志，而真能倾听同志们的意见，估计同志们某些思想的来源，给以克服，使之心悦诚服。

(丁) 要使同志们不怕发表自己的意见，而真能帮助他们在思想上的开展与进步，使他们真正能够灵活的懂得党的路线与策略，并学会自己去灵活运用，这是巩固与发展党的基本条件。

(戊) 但这一切，决不能放松对真正机会主义倾向与机会主义者的斗争，这种斗争是巩固党的必需条件。

第十一节 干部问题

(一) 什么是干部——在党的各方面工作中担负着一定的负责任务的党员。

(二) 干部的需要——各方面需要干部。党、政、军、民方面，上级、中级、下级的干部均要。干部的决定作用。一个地方只要有一个干部，即能起它的作用。干部的极端缺乏——各方面要，无法应付。有独立工作能力的干部特别缺乏。但在斗争中产生了并正产生着无数新的干部。要很好的解决干部问题，必须有正确的干部政策。

(三) 什么是正确的干部政策呢？季米特洛夫同志的六个条件：

(甲) 认识与熟习自己的干部。认识干部的几个要点：

A. 要善于在各方面发现干部。B. 不要表面的认识干部（一时的“功过”），而要求比较本质的认识干部。C. 不从狭窄的观点出发（如个人的好恶、“思想简单”、“无背景”等）来认识干部。D. 不但要看到干部的弱点，而且要看到他的优

点，不要夸张其一面。E. 应从发展中来认识干部，历史主义的考察干部的方法。

但如何保证熟习干部呢？A. 党的负责人与负责机关，对于干部的经常接触与考察。B. 把管理干部的工作，放在党的立场坚定的、可靠的、大公无私的、有忍耐性的同志手里，而且保证不经常调动他们的工作。

关于旧干部与新干部的认识的重要。双方优点与弱点的指出。

（乙）必须正确的提拔干部：

提拔干部的两个条件：A. 政治立场的坚定，不是投机家，不是空头革命家（有“德”）。B. 工作的能力（有“才”）。

提拔干部是党的经常工作，不是偶然的（一时提拔，一时又打下），一时的冲动。提拔干部应该是有组织的，经过一定过程的。同时，要大批的提拔，大胆的提拔。应该慎重的处理干部的升级或降级问题。关于新旧干部的提拔问题。

（丙）必须善于使用干部，及大胆的使用干部。

“十全十美的人，是没有的，应当利用现在所能利用的人，改正他们的弱点和缺点。”现在是我们用人的时候，多方面要人的时候。必须放手的使用干部们的每一长处，发扬他们的优点，逐渐在工作中改正他们的弱点与缺点。

怕用人，对什么人都不放心（“思想复杂”、“背景复杂”），那可以“百事无成”。我们不要“因噎废食”。在大胆用人中，碰到个别坏分子是不可避免的。

应适当的分配干部以一定的工作。工人出身的，知识分子、农民出身的，老干部的适当使用；老实的、“吊儿浪当”的、“油滑的”、“活动的”干部的适当使用。

（丁）正确的分配干部与干部的调节。干部应该放到最重

要的地方去，不要平均分配。每个地方要采取使干部地方化的方针。

(戊) 有系统的培养干部，帮助干部，发扬干部的积极性，创造性与活跃性。

仔细的指导他们，用同志的态度帮助他们，纠正他们的缺点错误。信任他们，要他们大胆的去工作，不要处处干涉，天天干涉，时时“斗争”，不要戴高帽子，什么都提到“原则高点”。对干部的政治生命，及处罚必须极端慎重。我们要有“敢说话敢做事”的干部，“肯负责，不怕负责”的干部。这种干部也最容易进步。

(己) 保存干部与关心干部。经常注意干部的生活、身体、家庭及安全，尤其要经常注意他们在思想上的进步。

(四) 我们需要干部的基本标准：

(甲) 忠实于民族，忠实于党，忠实于中国工人阶级事业，而且已经在实际上证明了的。

(乙) 同群众有联系的，为群众所公认与信任的领袖。

(丙) 在复杂环境中，能独立决定方向，并不怕负责的人。

(丁) 遵守纪律的精神，在斗争中受过布尔什维主义锻炼的。

我们不希望所有我们的干部，都合乎这样标准，然而这是我们挑选干部与培养干部的标准。

干部的模范作用的重要。对各种干部的要求不同。

对高级的、中级的、下级的干部的要求不同。对干部与普通党员的要求也不同。

(五) 要造成无数有威望的、有名声的干部及其重要性。党在各方面，工人、妇女、青年、文化方面都要有这样的干部。党应该挑选出这类干部，把他们提升起来，公开起来，但不要替他们吹牛，夸大他们的长处，掩盖他们的错误。这对于

新提升的干部，只有害处，没有好处。

党应该爱护这类已有威望、有名声的干部，不要任意糟塌。这些干部，也许在能力上不完全像我们所希望的，但他能够有威望、有名声，不是没有原因的。

（六）要使我们的干部在思想上武装起来，学习马列主义，掌握马列主义的武器。

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真正精通的马列主义者，中国革命问题就可以说解决了一半。所以必须用一切方法使我们的干部在工作中学习，在学校中学习马列主义。组织干部的学习小组——列宁主义小组之类。任何干部均应以“不知为不知”，放下自己的架子，老老实实的来学习。在中国现在有很好学习的条件，不必一定到苏联去“留学”。

第十二节 关于宣传教育工作

（一）宣传方针：

（甲）应该利用一切具体事实，宣传抗战中民族英雄们与烈士们的伟大事业，发扬为民族、为国家而牺牲奋斗的精神，指出抗战中的困难，及其必然胜利的前途，以造成民族自信心，克服困难的顽强性，以击破民族失败主义。

应该利用中华民族过去历史上一切伟大的事迹与人物，宣传中华民族的伟大，以造成民族自尊心，以击破投降妥协的心理。

（乙）应该不断破坏敌人、汉奸、托派挑拨离间的阴谋诡计与破坏作用，反复说明民族的团结统一是战胜日寇的重要条件，暴露敌人的凶恶残暴兽行的具体事实，暴露国内的一切黑暗面。

（丙）诚心诚意拥护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宣传三民主义。用马列主义的方法，来研究三民主义，发展其积极方面，

使之在抗战建国中有进一步的发展。拿住这个武器去同各种反民族、反民主、反民生的思想做斗争，打击托派分子、顽固分子对于三民主义的曲解。要在实际上证明马列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是能够帮助三民主义的实现的。

(丁) 宣传马列主义，提高全国的理论水平。特别要注意于以马列主义的革命精神与革命方法，去教育共产党员与革命青年。并以此去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研究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化的各方面。要认真的使马列主义中国化，使它为中国最广大的人民所接受。认真批判各种不正确的思想。

(戊) 在理论上，在事实上，宣传共产党是中华民族中优秀分子的党，它继承着中华民族革命的传统，负担着解放民族与人民的历史使命，以最后打破共产党是外国搬来的不适合于“国情”的恶意宣传。

(己) 应注意于对外的宣传，争取国际对于中国抗战的同情与援助。

(庚) 在宣传的方法上应多注意于：

A. 向全中国人民说话。B. 使我们的话为大众所了解。C. 多采取谦逊的、商讨的、和平的、合于中国民族习性的形式。D. 不要太抽象、太刻板、太偏激，而要生动、活泼、具体，带有充分的科学性与说服力。

(二) 关于党校教育：

(甲) 教育方针：

A. 理论与实际的联系，特别着重于马列主义的革命精神与方法的教育，着重于拿实际问题来说明马列主义的原则。B. 依照程度，由浅入深，由近（中国）到远（外国），由具体到抽象，由少到多；以启发、发挥自动性、真能懂得为原则；不要贪多，不要好高骛远，多采讨论方式。

(乙) 教育计划的拟定：

A. 新党员训练班——流动训练班，临时训练班（个别工作的需要）。一个星期至一个月的学习时间。功课一般可有：统一战线、党员须知、军事常识等。

B. 普通党校——做过支部或区委工作的同志。一个月至三个月的学习时间。功课一般可有：统一战线、党的工作、军事训练等。

以上应由各地方党部、县委、省委或分区委自己办理。

C. 中级党校——区委、县委工作人员。一个月至三个月的学习时间。功课一般可有：社会科学常识、统一战线、党的建设、军事常识等。由省委、区党委、中央局、中央办理。D. 专门人才训练班——县政、游击、财政、公安局等干部的训练。由省委、区党委、中央局、中央办理。E. 高级党校——三个月至六个月。由县委以上的特殊人才组织之。功课一般可有：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运动史与中国问题、中共党史与党的建设。由中央直接办理。F. 马列研究院——无定期，理论干部与教员的培养。G. 统一战线的学校。（子）普通军政学校（随营学校、教导队、训练班）。吸收普通革命青年。一个月至三个月的时间。各军队、各根据地均办。功课一般可有：社会科学常识、统一战线、军事常识等。（丑）抗日军政大学。三个月至六个月的时间。内中可分政治工作系、军事系及较高干部的培养。在中央所在地办。

（丙）中央与各中央局宣传部的责任：供给各地教员、教材、教育计划、研究讨论大纲。

（丁）各地方党应负责供给高级党校及马列研究院以需要的学生。而中央、中央局方面则一般保证送来学生“退回原籍”。

（戊）理论干部的培养与理论人才的搜集。搜集理论人才，文化方面的名人与名教授。搜集文化程度很高、有发展前途的

党员加以培养。搜集精通中国旧学的学者（老先生在内）。

第十三节 关于领导问题

（一）中央与地方党的关系。

估计到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地区辽阔，交通不便，战争的环境，再参考过去工作的经验，中央与地方党的关系，应确定如下的原则：

（甲）中央集中统一全国党的领导。

地方党必须严格执行中央的政治路线、决议与决定，不得有任何反对中央的言论与行动。对于中央有不同意见时，应直接向中央提出，不得向下面宣传或传达。地方党部必须严格遵守党的铁的纪律。

（乙）但中央对于地方党的指示，必须估计到各种可能的变动，而带有弹性与伸缩性，给地方党以机动的余地。中央应更多注意于全国的政治问题与正确的政治路线的把握（掌舵），研究与总结全国各地党、政、军、民的工作经验与教训，给地方党以帮助，对地方党的错误以及及时的纠正。

（丙）中央应注意于培养地方党在中央领导之下独立工作的能力与勇气，使他们对党的坚定性与临机应变适当的配合起来。对地方党的错误，多采取教育说服的方法。对地方党内部的问题，没有必要时，均由他们自己解决。

（丁）地方党应养成服从中央、尊重中央与信任中央的领导的优良传统。要善于在中央的统一方针下，拟出适合于当地情况的工作任务与工作计划，主动的、负责的、勇敢的在当地实现中央的方针。不要事事依赖中央，而要自动的创造出更多的具体办法来实现中央的方针。要反对清谈主义与公式主义的倾向。

（二）在新的情况下，党的领导系统：

（甲）在全国组织几个中央局，如北方局、中原局、东南局、南方局等，由中央直接指导，并代表中央直接指导各地方党。

（乙）在敌后方，改变省委的组织为区党委（如冀察晋区党委、冀晋豫区党委、冀鲁豫区党委等）。在敌人占领的中心城市与交通要道，可组织“点线委员会”。

（丙）中央局直接领导几个区党委或省委，在区党委、省委下为地委、中心县委或县委、分区委、支部。支部应以编村或联保组成之。

（丁）中央应有各种地方工作委员会，研究与注意各中央局及其所属党部的工作，并经常向中央提出意见，经过中央给各中央局以经常的指示与帮助。

（戊）每一地方的一切党、政、军、民的工作的领导，均统一于当地最高党部，以提高党的威信。在各方面工作的同志中，造成党为一切工作的唯一领导者的信念。各种党团均属当地的最高党部，无自己的领导系统（如过去的铁路党团）。

（三）上级党部对下级党部的领导方法：

（甲）上级党部（中央、中央局、区党委、省委），为了了解与反映下级党部的具体情况，以便利于给它以具体的指示，应有若干巡视员。巡视员的任务，一般的传达上级意见，考察地方党工作情况，提交上级。他们对地方党提出自己的意见时，只能作为建议，没有决定权。只有在上级党部特别委托时，才有此权力。

（乙）上级党部应定期的召集地方党负责同志来讨论各地工作。在情形允许时，应经常召集各地方党委书记或部长的联席会议，检阅工作与总结工作的经验，以推动工作的发展。下级党有责任经常把工作情况报告上级。会议不在多，而在确能解决下级党部所发生的问题。会议相隔时间可长些，但每次开

会时间也以长些使有结果为有利。

(丙) 经常检阅工作执行的程度，是推动工作前进、保障任务完成的最主要的办法。这种检阅，首先就是要在实际工作中认识干部、考察干部；其次，就是正确认识执行机关的优点与缺点；第三，就是考验党的决定或工作计划本身的正确性与不正确性（斯大林）。

(丁) 在检阅工作之后上级党部对下级党部工作的指示，要具体、扼要、简单、明了，切忌长篇大论、不得要领。

(戊) 领导机关的集体领导，并不妨碍一定时期内某些同志的分散行动。但在目前新党员多、干部缺乏的情况之下，领导机关的同志应更多注意于干部的教育工作（如多办各种训练班，各种会议的准备等）。

(己) 党委的工作计划，应该非常简单，只定出一定时间内确能实现的具体任务。要有中心，——从中心发展到其他。要有一定的步骤。这是工作中的一种“节奏”。

(四) 党章的修改的必要。中央应负责起草新党章，在“七大”上通过。

第十四节 关于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

(一) 抗战以后，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联系，在全国发生了基本的变动。这表现在：(甲) 抗日救国成为合法的了。(乙) 共产党求得了基本的合法的地位。(丙) 合法的范围扩大，秘密工作的范围缩小了。

(二) 不同地区，不同的公开与秘密的联系。

(甲) 在日寇占领区内的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不但党秘密，抗日救国也是秘密的。在那里的党要紧缩，但可以组织比较广泛些的救国团体（同反动时期不同）。那里，应看到利用合法及打入汉奸组织中去的重要。

（乙）在陕甘宁边区不但抗日救国公开，党主要也是公开的。但某些地区，如边区周围的邻近地区，精干的秘密党的组织仍然重要。

（丙）在八路军活动的敌后方及其占优势的根据地，抗日救国的活动一律公开，八路军军政人员一律公开，党的个别负责同志与机关公开外，一般党的组织与党员仍有秘密的必要：（甲）不使党过分的突出，吓退友党、友军、友邦。（乙）准备形势不利时的退却。

（三）在大后方的公开与秘密工作。

大后方的情况：

（甲）抗日救国工作可以公开做；有一小部分中央负责人及八路军、新四军的人可公开活动；公开设立机关与办事处；公开或半公开的出版机关报。

（乙）但在民运中，他们的军队中、政府中，一般党员如果暴露了自己是党员时，则立刻会受到打击与限制。

（丙）国民党中有开明的，也有顽固的。

（四）在大后方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联系，应实行下列几个规定：

（甲）共产党员仍用抗日救国的积极分子或普通群众的面目参加一切公开的活动，不暴露自己是党员及党的组织。要以埋头苦干的精神，去进行持久的工作，多推动非党的进步分子及国民党的积极分子来带领工作，特别在党员已经取得支配地位的组织内注意不暴露自己。

（乙）争取党的某些领导者与机关的公开，在扩大党的影响上、推动统一战线上，是必要的，已经取得合法地位的党员（如国民参政员），应大胆的进行公开的活动。

（丙）应该使公开工作与党的秘密工作划分清楚，使公开的同志与机关同秘密的同志与机关划分清楚，同时保持正确的

联系。这必须：A. 在公开组织中已经取得一定领导地位的党员，不要同时担任党的秘密工作，而且党应想出特别办法，使之不暴露自己，如不编入支部，及同个别负责同志发生关系等。B. 做党的秘密工作的负责同志，一般的应保持他们的秘密，埋藏在普通的群众中间，不担任负责的公开工作。

（丁）绝对禁止将党内的秘密消息与决定等告诉同本消息、本决定等无关的同志。禁止同志间发生不必要的关系（如通讯等）。

（戊）党的绝对秘密的指示，均用口头传达，不用油印或复写。党的文件的写法，应该准备即使失去也不要紧。任何时候不应在党的文件上、刊物上发表党员的数目字、党所领导的武装力量与团体等。

（五）在公开与秘密工作的联系上，应该纠正一种以为现在党不必再注意秘密工作的错误观点。教育同志们严格注意秘密工作规定。但必须教育同志们了解，现在的秘密工作同过去的已经有了根本的不同。今天主要的工作方式，是公开的、合法的、抗日救国的活动，今天必须坚决打破过去地下党时代的那种狭窄的秘密活动方式，特别在敌后方与战区。

（六）当全党同志愈是深入到群众运动中去，愈是能够团结广大的群众在自己的周围，愈是能够同群众打成一片（说群众话，过群众一样的生活，同群众密切联系着），则党的秘密愈是容易保持。所以在保持党的秘密方面，特别应强调这一积极的方面。

第十五节 关于发展党员

（一）有计划的发展党员，建立支部，使党成为全国性的、群众的、布尔什维克的党——是目前中心任务之一。

（二）发展党的大小、快慢，应依照各种不同的地区来决

定。如：

（甲）敌后方——应大量的发展党、创立党。速度要快。量要多。机关应大些。

（乙）我后方应短小精干些。发展速度慢些。质要高。机关应紧缩些。过去“平均发展”及“发展一倍党员”的口号的错误。

（三）发展的巩固与巩固发展的原则：

（甲）在工作的开展中去发展党，在斗争中去发展党。

（乙）发展到一定程度后，需要一时期的清理、整顿与巩固（消化），然后再发展。

（四）保证全党内工人、雇农、手工业者、劳动农民占优势。但许多地方党在开始时，多吸收革命知识分子，不是坏倾向，而正是一般的规律。党一般的要经过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帮助，而深入到下层群众中去。

（五）发展党员中的两种倾向——关门主义与拉夫主义必须纠正。

（六）从上而下的建立党与从下而上建立党，大机关与小机关，均依情况来决定。

（七）新党员的教育与党的生活，应不断在斗争中，特别在困难的情况下，考验他们，锻炼他们。

（八）关于青年党员与妇女党员。在支部中为了工作便利，组织青年小组与妇女小组是可以允许的。这种小组可分别由支委、青年干事或妇女干事管理。

（九）关于特别党员。凡党员处于特别地位，而不过一般党的组织生活者，谓之特别党员。

（十）关于恢复失联络的党员与重新入党的问题，应具体的考察。

（十一）应防止敌探奸细混入党内，应经常的洗刷坏分子

出党。

第十六节 提高党的警觉性

(一) 提高警觉性的必要：

(甲) 敌人的挑拨离间，派遣奸细的阴谋诡计（如派遣托派分子混入党内）。

(乙) 顽固分子派遣奸细混入党内。

(二) 敌探奸细在党内的活动方法：

(甲) 挑拨离间，(乙) 两面派的手段，(丙) 威迫利诱。

(三) 统一战线的阴暗方面，表现在我们同志的某种程度的麻木不仁，以及个别环节的腐化与蜕化。

(四) 如何提高警觉性？

(甲) 经常用具体事实揭破敌人友党的阴谋诡计，以教育同志。(乙) 加强党内马列主义的教育。(丙) 经常检查工作与工作的机关。(丁) 经常审查干部。(戊) 同各种倾向与两面派及挑拨离间的活动作斗争。

第十七节 发展党内民主与巩固铁的纪律

(一) 新的情况与任务：

(甲) 公开合法的扩大——这要求发展民主。

(乙) 战争的紧张环境，敌人与友党的危害，——这要求巩固铁的纪律。

(二) 在不同地区，发展民主的程度是不相同的。

(甲) 在敌后方、战区、边区、我后方等，发展民主的程度不应相同。(乙) 在秘密工作条件与战斗情况允许下，应大胆的发展党内民主。

(三) 发展党内民主问题：

(甲) 召集必要的经常的会议、大会，集体讨论，共同决

定问题，交换意见与总结经验，报告工作等。

（乙）各级党委负责人的选举，及定期的改选。

（丙）发展党内的自我批评，下级可越级控告。

（丁）上级对下级多采用说服教育的工作方法。

（四）发展党内民主的好处：

（甲）便于动员党员同志执行党的任务；（乙）便于给党员同志以党的教育；（丙）更能巩固党的团结一致；（丁）便于交换经验，总结经验；（戊）更能提高党员的积极性。

（五）但在特殊情况下，为迅速解决问题与保证党的领导起见，党仍不放弃：

（甲）采取上级指定下级、命令下级的方法；（乙）给少数同志甚至个别同志以全权解决一定问题的办法；（丙）但只要情况允许，就应发展民主。

（六）培养遵守纪律的习惯——纪律的重要特别在战争中、秘密工作中。纪律的内容即是：

（甲）少数服从多数；（乙）下级服从上级；（丙）个人服从团体；（丁）全党服从中央。

即使某一同志不同意时，也得服从。但他可向上级一定机关申诉与报告。

（七）反对党内压制民主、压制自我批评的倾向。但同时反对极端民主化，破坏纪律（不受调动，讨价还价，破坏党的决定，自由批评上级等），及无原则的派别斗争。

第十八节 关于全党的团结

（一）团结的重要。敌人的阴谋诡计，是在破坏我党的团结。上级的团结与下级的团结，与上下级间的团结的重要。特别是中央内部团结，有决定的作用。

（二）团结的基本条件：

(甲)一致的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乙)工作中的原则性,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反对无原则的派别斗争、个人利益高于一切)。(丙)服从组织决定,服从党规党法,遵守党纪。(丁)发展党内民主,发扬自我批评。(戊)养成同志间互相尊重(尊重主要领导者的意见)、信任、友爱、共生死共患难的精神。(己)谦逊和气的的工作态度。(庚)经常同破坏党内团结的言论与行动做斗争(如挑拨离间,两面派的行动)。

(三)我们的党是团结的,但必须巩固此团结。因为造成不团结的客观与主观的条件,仍然存在着。这些条件如下:

(甲)目前正在抗战的困难的转变关头。(乙)地区的分割,独立自主的分割领导的不可避免。(丙)中共领导人一言一动在全国人民中的影响的广大。(丁)敌人的挑拨离间与破坏的活动。(戊)党内新党员新干部及小资产阶级出身分子的众多,无政府的自由主义倾向的存在。(己)过去关于这方面的教育不够。

因此,巩固党内团结,仍为全党的严重任务。

(四)但是只要我们大家努力,特别是到会的同志大家努力,这些困难是容易克服的。这里我们有着克服困难的优良的条件,这就是:

(甲)有一大批党的中心干部。(乙)中央的极高的威信,中央主要领导者毛泽东同志的极高威信。(丙)中央有正确的路线与策略。(丁)全党同志均要求巩固团结。

因此,任务是严重的,但是能够完成的。

第十九节 结 论

(一)总之,中国革命要有强大的统一战线,同时要有强大的党。

(二)如何建立强大的统一战线,如何使党成为强大的党,

概括起来，必须具备下列四个条件：

（甲）坚定的正确的政治立场。

（乙）灵活的革命的实际主义。

（丙）前进的艰苦奋斗的精神。

（丁）大众的民主主义的作风。

（三）如何实现这四个条件？

（甲）学习与掌握马列主义。

（乙）以马、恩、列、斯的人格与工作作风为模范。

（丙）在斗争中向群众学习。

这样，中国革命就一定会胜利。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刊印。

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五日)

毛泽东

帮助和让步应该是积极的，不应该是消极的

为了长期合作，统一战线中的各党派实行互助互让是必需的，但应该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我们必须巩固和扩大我党我军，同时也应赞助友党友军的巩固和扩大；人民要求政府满足自己的政治经济要求，同时给政府以一切可能的利于抗日的援助；工人要求厂主改良待遇，同时积极作工以利抗日；地主应该减租减息，同时农民应该交租交息，团结对外。这些都是互助的原则和方针，是积极的方针，不是消极的片面的方针。互让也是如此。彼此不挖墙脚，彼此不在对方党政军内组织秘密支部；在我们方面，就是不在国民党及其政府、军队内组织秘密支部，使国民党安心，利于抗日。“有所不为而后可以有为”，正是这种情形。没有红军的改编，红色区域的改制，暴动政策的取消，就不能实现全国的抗日战争。让了前者就得了后者，消极的步骤达到了积极的目的。“为了更好的一跃而后退”，正是列宁主义。把让步看

* 这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所作的结论的一部分。结论是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五日和六日作的，这一部分是在五日讲的。

作纯消极的东西，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所许可的。纯消极的让步是有过的，那就是第二国际的劳资合作论，把一个阶级一个革命都让掉了。中国前有陈独秀，后有张国焘，都是投降主义者；我们应该大大地反对投降主义。我们的让步、退守、防御或停顿，不论是向同盟者或向敌人，都是当作整个革命政策的一部分看的，是联系于总的革命路线而当作不可缺少的一环看的，是当作曲线运动的一个片断看的。一句话，是积极的。

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一致性

用长期合作支持长期战争，就是说使阶级斗争服从于今天抗日的民族斗争，这是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在此原则下，保存党派和阶级的独立性，保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不是因合作和统一而牺牲党派和阶级的必要权利，而是相反，坚持党派和阶级的一定限度的权利；这才有利于合作，也才有所谓合作。否则就是将合作变成了混一，必然牺牲统一战线。在民族斗争中，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现的，这种形式，表现了两者的一致性。一方面，阶级的政治经济要求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以不破裂合作为条件；又一方面，一切阶级斗争的要求都应应以民族斗争的需要（为着抗日）为出发点。这样便把统一战线中的统一性和独立性、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一致起来了。

“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是不对的

国民党是当权的党，它至今不许有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刘少奇同志说的很对，如果所谓“一切经过”就是经过蒋介石

和阎锡山，那只是片面的服从，无所谓“经过统一战线”。在敌后，只有根据国民党已经许可的东西（例如《抗战建国纲领》），独立自主地去做，无法“一切经过”。或者估计国民党可能许可的，先斩后奏。例如设置行政专员，派兵去山东之类，先“经过”则行不通。听说法国共产党曾经提出过这个口号，那大概是因为法国有了各党的共同委员会，而对于共同决定的纲领，社会党方面不愿照做，依然干他们自己的，故共产党有提此口号以限制社会党之必要，并不是提此口号以束缚自己。中国的情形是国民党剥夺各党派的平等权利，企图指挥各党听它一党的命令。我们提这个口号，如果是要求国民党“一切”都要“经过”我们同意，是做不到的，滑稽的。如果想把我们所要做的“一切”均事先取得国民党同意，那末，它不同意怎么办？国民党的方针是限制我们发展，我们提出这个口号，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是完全不应该的。在现时，有些应该先得国民党同意，例如将三个师的番号扩编为三个军的番号，这叫做先奏后斩。有些则造成既成事实再告诉它，例如发展二十余万军队，这叫做先斩后奏。有些则暂时斩而不奏，估计它现时不会同意，例如召集边区议会之类。有些则暂时不斩不奏，例如那些如果做了就要妨碍大局的事情。总之，我们一定不要破裂统一战线，但又决不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因此不应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如果解释为“一切服从”蒋介石和阎锡山，那也是错误的。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刊印。

关于抗战中职工运动的任务

——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发言的一部分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五日)

林 育 英

持久抗战中职工运动的中心任务

在不同的地区执行不同的任务：

(一) 在长期抗战，在长期合作的原则下，工人阶级的岗位，是在抗战建国的前哨；他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即：

第一、加紧敌占领的点线工作，克服困难，建立灵活的而巩固的堡垒与据点。

第二、加紧敌后方游击根据地的工作，发动工人群众参加抗战的热忱；尽量武装工人，特别是矿工，使之成为全国工人阶级抗日的统一行动的与统一组织的模范与吸引力，使之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骨干与基础。

第三、在我大后方，应用一切方法帮助国防工业的发展，使之能适合抗战的需要，并达到政府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目的。

(二) 加强已有的工人组织，大量的组织无组织的工人，是目前职运最迫切的任务。应依据各种不同区域的经济、政治、军事不同情况和特点，用各种不同的形式组织工人。拥护

现有的合法工会，竭诚与之合作，使之变为群众的组织，尽可能的发扬民主生活。若能把散漫无组织的工人组织起来，就是职运的一个大进步。虽然工人最初团结和斗争的目的是为了工资，但到了相当的时候，“维持组织之对于工人，就比维持工资还更重要”。因为工资待遇的胜利，不过是一时的事，“那真正的效果，并不在眼前的利益，是在劳动者的团结的继续扩大。”（马克思）因此决定斗争，须有两个条件：

- A. 斗争有胜利的可能；
- B. 工人群众的组织的扩大与巩固。

这是十几年来，我们在职运中苦的也可说是血的经验教训。

（三）加强民族革命主义的教育，提高政治文化水平。要把民族解放与阶级解放的内在联系，被压迫民族的民族利益与阶级利益是相符合的，目前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是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就中国范围说，阶级的利益要服从民族利益，就世界范围说，民族利益又要服从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利益，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与无产阶级革命联盟是长期的，所以国共合作也是长期的，在中国彻底的爱国主义者，即是最忠实的国际主义者，只有民族的彻底解放，才能获得阶级的解放等观点，教育与说服工人群众，以提高其自觉性、纪律性与组织性，更加强其彻底性、坚强性与胜利的信心。

（四）国防工业的发展，是在持久抗战中战胜敌人的主要条件之一。我们工人要用一切的方法，帮助政府及厂方提高生产，反对浪费，保护产业，以表示工人拥护政府的热忱。诚心诚意的与政府合作，同时改善工人的物质生活，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与启发工人群众爱国热忱的必要条件。

（五）发展与统一工人运动，是与抗战建国有利的事业，是每个爱国男儿都应促其实现，特别是国共两党的同志，更应

负有这一责任。大家应爱护与集结这一民族力量；分散与抵消这一个力量，都是对民族的罪过。因此在每一工厂、矿山，每一地区、每一抗日根据地，均只组织一个统一的群众的工会。在全国范围内，现因日寇的野蛮占领，把中国在形势上分成若干不同的区域，现只有依据各种不同的区域和政治环境，进行艰苦的、耐心的组织工作，从实质上向着统一的方向前进，从抗战胜利的过程中，获得工人运动在形式上与实质上的统一。

（六）训练工人干部，从民族革命运动中培养新的积极分子及领导者，使之参加各方面的实际活动，这是使我们的工作向各方面正确发展与巩固的保障，是我们与工人阶级密切联系的枢纽，是目前工作最中心的一环。列宁对造就与使用工人干部，曾有这样的意见。

“我们最首要最迫切的任务是帮助造就工人革命家——在党的活动方面，其水平线与知识分子革命家相同的工人革命家（我们所以要着重党的活动方面这几个字，是因为在别的方面要工人达到同样的水平线，虽然也很必要，但是远不是这样容易，这样迫切）。”

（七）肃清托洛茨基分子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与活动，这比其他部门与其他阶层中更属重要，因工人阶级中所遗留的狭隘观念、宗派主义、小资产阶级的意识，现社会制度所给与的黑暗，文化程度的低落，生活的极端痛苦，十年来所积累的仇恨与工人的群众组织与党的组织之薄弱等等，在在均有可能给托洛茨基分子的利用。自然，中国工人阶级有十七年来英勇斗争的光荣历史的传统，有了自己的共产党的领导，有了八路军与新四军的武装与旗帜，有了国际的无产阶级特别是苏联工人阶级所创造的英勇事业与光明前途的影响，尤其是自己斗争的经验等等优点，可以完全克服那些弱点的，问题只在我们加强这一工作。

(八) 联合世界各国职工团体，共同抗日。把日寇野蛮进攻中国后，中国工人阶级所遭受的危害及其英勇斗争抗战胜利的信心与毅力，向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劳苦弟兄姐妹们宣告；要求他们不起装日本输出或输入的军用品、原料及其他货物，不替供给日本军火的资本家做工，抵制日货等等，同时用各种办法帮助中国，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这同时也就是国际无产阶级的胜利。中国的海员工人应多负责的有计划的执行这一任务。

在各种不同区域的工作方针与组织任务

甲、敌人占领的点线中的职运工作

(一) 我们的基本方针是退却的，保存力量，积蓄力量，待机而动。

估计主要的中心城市与工业区域不是在一个短时期可以收复的，同时敌人要用一切方法消灭其占领区域的反日力量，以便巩固和开展敌之已得的胜利，因此，我们要尽可能的把已经暴露的力量分散，到近郊的乡村去组织农民，发动游击战争；可以隐藏的力量，立即隐藏起来。在主要的产业中如军事工业、市政交通，特别是军事战略区域内，建立不大的坚固堡垒，埋头苦干，没有胜利把握时绝对不轻易发动斗争，更不受敌人的任何挑拨，以期保存实力，不受摧残，准备我之战略反攻时，有真实的群众基础与配合作战的力量。这是准备反攻的必要退却。

(二) 用各种不同的形式组织工人，把总的任务分开执行。这些组织须：A. 适合群众的嗜好喜爱某某方面某种程度上的利益（如组织群众、教育群众等）；B. 最普通得不引起人注意，或者是公认的合乎道德的好事；C. 同时还要使敌人不感

觉这些东西是对它的，甚至在外表上是对它同情或屈服的，因此，这些辅助组织必须尽可能的少具组织形式与尽可能的少带秘密性；如江北戏、京戏、黄陂戏、国术、玩石蛋、日文学校、英文学校、补习学校、小学校、阅报室、阅读书报小组，合作社、施医处、同乡会、关帝会、各种行会、佛教会、及其他流行的秘密结社……等。这些组织形式，它们只应起辅助的作用，是目前组织工人最好形式，最主要的组织形式。但要严守各个特点的机能，如学校只管教育，国术只管体育，不得超过客观可能的范围，使它们发挥各种各样的机能，并尽量使之发展，不要在形式上把它们联系起来。各个组织不要发生直接的关系，同时要严防与党的组织或工会中坚领导机关有任何混淆在一块儿的情况。这是要有不屈不挠的精神，历久不疲的耐性，民族胜利的信心，民族志士的性格，才能做到。

（三）对日寇组织的工会（如沪西的总工会）或其他民众团体（平津的新民会、上海的东亚同盟会、新亚会）。我们一方面，即我党或其他党派爱国分子，在口头或文字上经常不断的揭露汉奸日寇的特别是某个罪恶昭彰、为群众公认者的阴谋，把他们真正的用意解释给工人听，并要向工人放出警号，叫不要陷入他们的圈套，更不要使奸细混进秘密的组织里来；另一方面，工人运动的合法化，工人之有组织，特别是对中国有反帝斗争传统的工人阶级是有利的，我们应当利用这一合法与公开的可能，进行一般的教育与组织群众的工作，他们的发展将必然会给我们更多的宣传鼓动的材料，并且能加速某些合法的团体的出现。其结果不是日寇汉奸拉拢群众，搜捕共产党员、爱国志士，而是共产党员和爱国志士找着更多的同志。

（四）同国民党的同志及工会领袖共同进行保护原有的工会组织，是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原有工会在租界掩护下的，应尽量避免暴露，多做内部的组织、教育及日常的互相救

助的工作，如婚嫁病死等，颜色要弄得灰得不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与中外的厂方在保卫产业，维持生活的条件下，亲密合作以获得厂方某种程度的掩护，至少是使之保持善意的中立。工会的指导机关要选择各党各派或无党派的民族意识、阶级意识最坚强、最可靠，认识最清楚、最有经验、最有锻炼的工人领袖，形成小而精的团结坚固的统一战线的中坚领导机关。严守秘密的一切规则与党发生联系，它的本身，亦要严守秘密的规则，严防敌人的袭击与暗害。若工会不在租界，则设法使这些群众的组织，不具任何固定的纲领章程会期，只有几条灰色的征收会员的条例，成为特别广泛而自由的组织。如客观形势使我们连这样组织也不能存在或者需要很大的代价时，则干脆的公开宣布取消，以便保存势力另作他图。在这里，应该指出：这种情况迟早一定要到来，与其要出下必要的代价，不如尽早公开宣布取消，另作计较的为妙。

（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范围更宽广，工作环境更困难，运用的方式要更灵活，如：

A. 救济难民须取得与中外慈善团体的合作。

B. 在中国人保护中国人的口号下，组成除民族叛徒以外的不拘形式的民族统一战线，取得社会的掩护。

C. 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垄断市场、强夺原料的默契下，与英美法等国的资本家结成统一战线。

D. 在保护中国的产业的口号下，结成每个工厂内的劳资统一战线。

E. 在工人不分家，凡是拿工钱的人联合起来，保卫生活的口号下，结成工人阶级内部的统一战线；如有外国工人的地方，则与之进行反战反法西斯保卫工人阶级的利益的统一战线。

F. 一切在租借地或外人居留的地方，则与同情中国抗战

的朋友结成反法西斯侵略阵线。

G. 一切的统一战线工作，均要在各种灰色的名义之下进行，如慈善事业、人道主义、教育、卫生及同乡行会的联络、旧道德与王道的利益等等，以避免日寇汉奸及其走狗托洛茨基分子的耳目。

（六）形式上的纪念会一律避免，因为只是暴露了自己的目标，是对敌人有利的；如果有某种必要须检查力量时，则必须采取不露目标的方式行之。

（七）严守退守时间罢工斗争的条件，即第一，要有胜利的把握；第二，使组织发展，特别重要的是要使组织巩固加强而不暴露。否则虽群众愤激到任何程度都是要耐心的说服工人，不举行罢工斗争。

（八）形式上的统一组织与统一行动，在敌人的统治下，无论是租借地或有外人的地方，均是不可能的，尤其是不应该的。

（九）在租借地及外人资本的地方与纯粹敌人统治的占领区，在实行的程度上，应采取不同的工作方法方式，特别是要与国民党及其他党派的同志，亲密合作采取一致的方针，或者是分工互助。

乙、敌后方抗日根据地的职运工作

（一）基本的工作方向：

过渡时期正是敌人后方便于发展的时期，要尽量的争取时间，把当地的职工的大多数以至全部组织起来，形成抗日群众力量的骨干，建立统一的行动与统一的组织，大量发动工人参加武装抗战的工作，与农民结成抗日保家的生死同盟，参加或配合正规军，为保卫抗日根据地，缩小敌人占领区，疲劳敌人，消耗敌人而斗争，以便锻炼与壮大自己，表现工人阶级战胜困难的英勇模范。在工人的与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中，在

党、政、军中，在各种群众团体中，工人的骨干及其先锋队，就要显示出我们与日寇苦斗中的坚苦卓绝的精神，要用我们的勇敢性、坚决性、彻底性与对阶级及民族的忠诚，驱逐日寇出中国，争取最后的胜利。

(二) 主要的对象：

A. 产业或手工业的矿工，在敌人后方或战区的约二百万人，这是反对敌人的最好力量。他们在不能忍受的压迫下改造成的反抗情绪，吃苦耐劳的精神，坚决勇敢的特性，无家可归的环境，他们将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起伟大的作用，并且已经初步的显示了他们的作用。如：唐山矿工的起义，井陘矿工的神出鬼没，阳泉、六河沟等工人游击队。另一方面，若为日寇所利用，则人力与物力上的损失，增加抗战的困难与延长相持时间。因此，敌后方游击区的职运，特别是河北、江北、两湖等地矿工是占首要的地位，也就是各该边区工运成绩优劣的测量器。

B. 各铁路附近的道棚工人（即修道工人）是破坏铁路阻扰敌人交通最好的武器。他们多数是本地人或已在该地成家，若能每条铁路组织一个或几个铁道队，专司组织铁路工人破坏铁路，这对相持与反攻阶段，均有极大的意义。晋察冀边区京汉路工人铁道队已起了极伟大的作用。

C. 手工业与农业工人，这占在业工人的最大多数，是持久抗战中乡村包围城市的特点，也就是十年内战中所积蓄的经验，拿在抗日战争中全国来运用。少奇同志著的“工会工作大纲”与边区总工会的手工业工会与农业工会的两个章程，在这里是特别值得郑重介绍的，因为这三个文件均是十年来工作经验的结晶，是根据持久抗战的环境融合起来的，是值得全国各地依据实际的具体情况，善于利用的。

D. 失业工人，城市失业工人回到乡村的甚多，这是乡村

群众工作干部的最好的来源，也就是工人阶级有组织的推动和领导农民参加抗战及巩固工农联合的最好的条件，各地的党及工会应尽量搜集这些失业工人，加以适当的训练，使参加抗战动员工作。

E. 协助点线的职工运动。点线职运是党的基本群众的所在，最艰难而又重要的工作，同时可以帮助了解敌情，协同动作。应经过秘密路线，与之建立密切关系，并经常给以人力财力的援助，精神上的鼓励与安慰。

（三）中心工作：

A. 广泛的动员工人参加抗战工作，积极武装工人，特别是矿工。工人游击队及其生长的正规军，必须戴上八路军或新四军的帽子，但为兴奋和吸引全国工人参战的热忱与取得国际工人阶级的同情，必须保存其原名，如八路军井陘工人游击队，八路军唐山矿工游击队等；同时要大量吸收农民参加，有计划的挑选出工人干部出来训练，以便领导与充实其他队伍。

B. 普遍的恢复与建立工会的组织，吸收全体无组织的工人加入工会，发展工会的民主作风，建立工人阶级统一战线。工会内要包括各党各派各帮口职员，及不剥削工人的工头等等。

C. 帮助政府及军队建立修理工厂及战时经济建设，提高工人的劳动热忱，在可能的生产技术条件下提高生产效率和质量。

D. 加紧民族革命主义的教育，开办工人干部训练班、工人夜校、识字班，提高战区工人的政治认识和文化水平。

E. 安插失业工人，恢复生产，改善工人的战时生活。

F. 关于劳资争议，工会应采取适当的方法，使之合理的解决，俾能集中力量，共同抗日。

G. 实现工农的密切联合，多举行联席会议，以便在一切

问题上协同动作。

H. 积极援助被占领区的职工运动，在军事上尽量协同动作，以破坏敌人“以华制华”的毒计（政治经济方面的）。

I. 动员全战区工人积极参加政府及抗日军队的一切工作，并选择积极的工人干部，送交政府及抗日军队分配工作，以便上下一致，协同动作，击退日寇。

J. 经常与全国工会建立联系，可能时应派遣代表团到战场慰问，互相交换工作经验，促成全国工人阶级行动的统一与组织上的统一。

丙、我大后方的职运工作

（一）基本的工作方向：

A. 在过渡的困难时期，要表现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对民族无限的忠忱热爱，任劳任怨，埋头苦干，不露锋芒，用各种方法帮助国防工业的发展，在国家企业里尽量与厂方合作，提高生产反对浪费，用黄帝优秀儿女的至诚，感动当局，使其无丝毫顾虑的大步前进。

B. 在三民主义的原则、国家法律的范围与当局的谅解，及公开合法的条件之下进行工会工作，首先就是帮助已有的合法工会的工作。尽量吸收无组织的工人加入合法的工会；在保卫阶级的民族的利益的大前提下，竭诚的与工会领袖合作；为了吸引群众对工会、对国家、对民族的热烈爱护，必须多征求群众的意见，多采纳群众的意见，多吸收积极而进步的工作者参加工作；发动工人群众的最高的劳动热忱与杀敌勇气，为抗战建国、为加速反攻的准备而牺牲奋斗，使当局从需要群众进而爱护群众，更进而依靠群众。只有这样才能发挥中华民国的国民作用，更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蒋委员长所指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彻底胜利。

C. 从抗战胜利的过程中获得全国范围内工人运动的统

一，以便顺利的进行建设计划，建立三民主义的中华民国。

（二）运用公开合法的可能限度：

这即是说，不能根据主观的要求，而是根据客观上的规律，只能逐渐发展，而不能突出，致妨大局。因此运用公开合法，只能在客观可能的范围内进行，否则便是非法了。

（三）亲近与经过同情者与了解我们真实用意的国民党同志去进行职运工作，以减少阻碍，而利于抗日救国的事业。

（四）用各种各样的形式组织工人，以适合群众心理与客观可能为原则。

（五）陕甘宁边区的工人阶级，特别是边区总工会，是继承着十七年来英勇斗争的传统，他们不仅继承着五次全国劳动大会及全国总工会城市职工运动的经验，而且继承着十年来乡村职工运动的经验，是与全国的工人群众有密切联系的。现在边区工人已获得了他们所要获得的一切。目前的问题在于边区工人阶级的觉悟的程度赶不上政治上发展的速度。因此，目前的中心任务，是加强对边区工人的教育，以克服残留下的行会的狭隘性，多少非政治的倾向保守主义等残余；尽量的培养与提拔本地的工人干部；眼睛要看到全国去，要相当的满足全国工人的希望。

工作方法方式的民族化、中国化、通俗化

甲、应依据中国各地不同的政治经济的环境与不同的风俗、语言、习惯，及一般的文化程度较低的中国青年工人阶级的许多特点，来决定工作的方法与方式，因此，不独不应机械的利用国际经验如斯大哈诺夫的运动等，而且也不能机械的利用中国各地的工作经验（如在国家企业内的为了争取抗战的胜利，则提高生产反对浪费的口号是对的，若机械的运用到敌人

占领区去，则完全是错的。在占领区里，“保卫产业”、“保卫生活”的口号在中国厂里是对的，在日本厂里则又完全错了等)。我们要很客观的、很具体的了解与分析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及特点，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整个的工作方针下，决定适当的工作方法与方式，才能对症下药。工作方法与方式的是否正确，不在是否合乎某种公式，而在是否能动员群众，把群众引上逐渐进步的道路，走上积极参加抗战建国工作的道路。

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的职运工作，处处要以民族为前提，要包括每一部分的全部或大多数，减少许多不必要的阻碍与隔膜，是于持久抗战争取民族生存的事业有利的。例如：开办战时训练班，请厂长当主任，组织抗日救国会，请资本家当名誉主席，成立工会，请律师当法律顾问等等。

丙、中国有五千年来的历史，在民间存在着牢不可破的信条与习俗，若不善于运用与解释，则工作必不能深入与持久。例如俗语说，“工字不出头”，即上出头成“土”字，意为做工做到老死入土，才能使工字出头，或者因失业而下出头成为“干”字，那就更加痛苦，这是圣人制定的命运，是无法挽救的。你说劳工神圣，他说当不得饭吃。你只有将计的向他解释为：工人分开，确是永远没有出头的日子，若是工人联合起来，便有天大的力量。不信，请看工字与人字合起来不就成为一个“天”字么？自来水工人罢工，全市的人没有水喝；电灯工人罢工，全市立即成为黑暗世界；交通工人罢工，立即断绝交通，像人的血管停止一样；香港挑粪工人罢工，使香港立即变为“臭”港。若是全国以至全世界的工人阶级的统一战线成功了，发动一个全国或全世界工人的总同盟罢工及反法西斯的起义，则法西斯恶鬼只有死路一条，这不是比天的力量还大么？只有经过这样的解释，才能使工人记住：工人联合便成“天”，工人分开便不能出头，结论是工人不分家。

丁、通俗的解释问题，是教育与提高群众政治水平与推动群众行动的必要条件。中国工人文化程度的低落，是大家所周知的事，工人不认识字，“工人”的两个字，时常叫“天”字，不认识“天”字这也是常见的事情。团结、统一、联合、组织这些名词，在某一部分人听来，便立即了解，还有某一部分人听来仍是莫明其“土地堂”。又如“团结便是力”，这是很使一般的群众费解的：他们总以为刀剑枪炮才有力，“弹绝”（团结）有什么力呢？老百姓总是没有力量的。自然这也是历史上留下来的许多残酷的教训，可是我们又非要使他们了解不可，这就只有借助于通俗的解释。如首先应承认一个工人一个农民没力量的，如果人多了集合在一块儿便有力量；譬如一个工人或农民像一根火柴，一折就断，如果十根、二十根、一百根、一千根火柴捆在一起，就是用刀斫也不容易断；如果遇着一个横蛮的人硬要折要斫时，他就会折出火来烧他自己的手，斫出火来烧他自己的房子；再把罢工吃大户的实际例子告诉他，他便能了解“人多成王”，“狗多成墙”的俗语的意思；如果有了很多的人，又有刀剑枪炮，那便所向无敌了。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出版的
《六大以来》（下）刊印。

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 致蒋介石电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五日)

蒋委员长介石先生暨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诸先生勋鉴：

先生于国家危急之际，坚决领导全国军民进行持久抗战，并获得了全民族的团结统一，给了日寇以巨大打击，奠定了最终战胜敌人复兴民族之基础。敝党扩大的六中全会谨以至诚向我国英明领袖致崇高的敬意！

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于会期中得聆先生告全国国民党书，对于汉口、广州撤退后之抗战形势及我国坚持抗战取得最后胜利之方针，昭示无遗，给了悲观妥协论者以严重打击，增强了全国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敝党同人完全同意并表示热烈之拥护。

中共同人深信，我国目前正处于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的过渡时期，虽困难犹多，但过去十六个月的抗战已经造成我国空前的进步和成绩，我全国人民必能在先生的坚强领导之下，在国共两党及一切抗日党派的持久协力之下，坚持抗战，巩固和扩大全民族的团结与统一，在军事、政治、民运各方面，采取进一步之设施和改革，期以最大之努力动员全国一切生动力量，增强抗战实力，停止敌之进攻，从艰苦的相持阶段中准备新的力量，改变敌我形势，实行反攻，驱除日寇。我们相信伟大的中华民族曾经经历过艰巨斗争的磨炼，定能举国一

致，精诚团结，渡过抗战难关，争取最后胜利。

中共中央一本过去主张，愿以至诚拥护我民族领袖，拥护三民主义；并在三民主义和抗战建国纲领的政治基础上，责成全体共产党员，本互助互让、同生死、共患难之精神和互敬互商之工作办法，亲密两党间的关系，巩固两党的长期合作，团结全民族，以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和三民主义的民主共和国之实现。

最后，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以关怀民族命运之热忱，敬祝先生健康，并向国民党中央各同志致民族解放之敬礼！

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中全会

十一月五日

根据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出版的
《解放》第五十七期刊印。

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 致东北义勇军及全体同胞电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五日)

东北抗日联军杨司令靖宇转东北抗日联军的长官们、兵士们、政治工作人员们以及全体东北同胞：

在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开会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共产党的全体党员及共产党员所领导下的抗日军队与游击队，向沦陷在敌人统治下已七年多的东北同胞，向在冰山雪地与敌周旋七年多的不怕困难、艰苦奋斗之模范的东北抗日军队表示最深刻的同情，并向你们致崇高的民族革命的敬礼！

日寇于民国二十年出兵侵占我东北。去年又强夺我华北数省并进兵华中、华南，其目的在灭亡我全中国，把我四万万五千万同胞都变为日寇的奴隶。但是，自从七七事变后的中国，已非九一八时的中国了。由于国共两党政策的转变，已结束了民族分裂与国内战争的局面。全国各党派、各阶级、各军队、各地方政府都一致团结在国民政府周围，在蒋^[1]委员长领导之下，对日开始了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

虽因敌我力量的悬殊，在十六个月的抗战中我国遭受了一些局部的暂时的军事上的失利，特别是在武汉、广州失守后，一方面增加了某些困难；但是另一方面全民族的抗战力量更加团结，国共合作却更加亲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更加进步。我们坚决相信：只要我们坚持民族抗战到底，坚持持久战，坚

持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定能克服目前的困难，团结全人民的力量继续抗战，停止日本的进攻，以准备将来的反攻。

东北四省是中华民国底领土，东北三千万同胞是全体中国人民底一部分。我国对民族抗战的目的，不仅是要把日寇从内地各省驱逐出去，并且要把日寇从东北四省驱逐出去，以建立领土完整的、行政统一的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华民国。我们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会忘记沦陷在敌人铁蹄统治下的东北三千万同胞，我们也不会忘记在最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同民族死敌作长期斗争的亲爱的同志们。八路军一个支队会到冀东游击，希望在东北各地的民族志士及全体同胞，在敌人后方响应，与敌进行更加长期的持久的艰难的游击战争，更加巩固和扩大各党派、各阶级、各军队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以准备我国军队底将来反攻，而达到收复东北的目的。

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

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万岁！

东北抗日联军及一切抗日义勇军万岁！

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中全会

十一月五日

根据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出版的
《解放》第五十七期刊印。

注 释

〔1〕指蒋介石。

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 致八路军、新四军电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五日)

八路军、新四军的全体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战斗员同志们！

一年多以来，你们在蒋[□]委员长及各战区长官指挥之下，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担负了光荣的任务，在敌后方协同友军，不断的打击和消耗了大量的敌人，屡次粉碎了敌人的进攻，广泛的发动了民众和游击战争，收复了广大的失地，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你们奋不顾身的努力和坚决的牺牲精神，你们的灵活指挥和政治工作，已经取得了全国同胞和国际人士的同情和爱戴。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特于闭幕之际向英勇的同志们致亲切的慰问和热烈的敬意。并向为国捐躯的同志们表示无限的哀悼。

同志们，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须从长期的持久战中去求得最后的解决。在艰巨的斗争过程中，存在着许多严重困难。但伟大的中华民族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已经从十六个月抗战中获得了极大的进步，造成了最后战胜敌人之基础。今后亦必能在坚决继续抗战中不断的进步，更加巩固和扩大以国共两党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全民族，动员全民族的一切生动力量，克服一切困难，积蓄力量，最后反攻敌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当此武汉、广州失守，抗战形势紧急的关头，特别需要我

八路军、新四军前进战士的努力，以自己的模范作用帮助友军及民众一致努力，渡过难关。在敌后方，数倍于今天的艰苦局面尚在前面。希望你们再接再厉与敌寇作殊死战，更加积极的去帮助和亲近友军，更加努力的去发动和组织民众，更加谦和的去对待政府和民众，用互助互让、团结御侮的精神去巩固扩大统一战线。同时反对个别分子的悲观、动摇、失落、腐化的现象，保持和发扬过去的光荣传统。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坚信：你们定能始终站稳自己前进战士的岗位，你们定能坚定不移的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三民主义的民主共和国之实现而斗争。

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中全会

十一月五日

根据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出版的
《解放》第五十七期刊印。

注 释

〔1〕指蒋介石。

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 致日本共产党电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五日)

日本共产党中央并转全体党员及日本全体人民：

日本法西斯军阀自从一九三一年以来陆续侵占了中国的东北四省，去年更大规模地向我全国进攻。它的铁蹄所到之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毁灭文明，违反人道，为人类历史上向所未见。不仅中国人民痛恨万分，奋起抗战，就是全世界进步的人士也莫不愤怒之至，而对我表示极大的同情。

为着进行野蛮的对华侵略战争，日本法西斯军阀加重了对于日本人民的压迫与剥削。数十万的日本官兵已经被牺牲在战场了，后方民众生活愈困难了，民主权利被剥夺了，广大反战反法西斯蒂的劳苦群众、著名的学者、青年学生逮捕入狱了，日本人民已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了。侵华战争是违背整个日本人民的利益的，因此，日本法西斯军阀不仅是中国人民的死敌，同时也是日本人民的仇人。中日两国人民必须联合一致，结成反对日本法西斯军阀的阵线，打倒这个共同的仇敌。你们曾经开展了英勇的反战反法西斯斗争，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中全会谨向你们致革命的敬礼。

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相信：中日两国人民协力奋斗去反对共同的仇敌——日本法西斯军阀，一定能够打倒这些法西斯军阀，树立东亚的真正的和平，解放中日两国人民，并实现中日

两国人民的真正共存共荣。中国人民与日本人民之间并没有相互的仇恨而只有相互的同情，应该极大的发展这种同情，为打倒共同的仇敌日本法西斯军阀而奋斗到底。

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中全会

十一月五日

根据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出版的
《解放》第五十七期刊印。

战争和战略问题*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

毛 泽 东

一 中国的特点和革命战争

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

但是在同一个原则下，就无产阶级政党在各种条件下执行这个原则的表现说来，则基于条件的不同而不一致。在资本主义各国，在没有法西斯和没有战争的时期内，那里的条件是家内部没有了封建制度，有的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外部没有民族压迫，有的是自己民族压迫别的民族。基于这些特点，资本主义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在于经过长期的合法斗争，教育工人，生息力量，准备最后地推翻资本主义。在那里，是长期的合法斗争，是利用议会讲坛，是经济的和政治的罢工，是组织工会和教育工人。那里的组织形式是合法的，斗争形式是不流血的（非战争的）。在战争问题上，那里的共产党是反对自己国家的帝国主义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了，党

* 这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所作的结论的一部分。结论是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五日和六日作的，这一部分是六日讲的。

的政策是使本国反动政府败北。自己所要战争只是准备中的国内战争。但是这种战争，不到资产阶级处于真正无能之时，不到无产阶级的大多数有了武装起义和进行战争的决心之时，不到农民群众已经自愿援助无产阶级之时，起义和战争是不应该举行的。到了起义和战争的时候，又是首先占领城市，然后进攻乡村，而不是与此相反。所有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所曾经这样做，而在俄国的十月革命中证实了的。

中国则不同。中国的特点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

对于中国共产党，在帝国主义没有武装进攻的时候，或者是和资产阶级一道，进行反对军阀（帝国主义的走狗）的国内战争，例如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广东战争和北伐战争；或者是联合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进行反对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同样是帝国主义的走狗）的国内战争，例如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六年的土地革命战争。在帝国主义举行武装进攻的时候，则是联合国内一切反对外国侵略者的阶级和阶层，进行对外的民族战争，例如现在的抗日战争。

所有这些，表示了中国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同。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其他一切，例如民众的组织和民众的斗争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都是一定不可少，一定不可忽视，但都是为着战争的。在战争爆发以前的一切组织和斗争，是为了准备战争的，例如五四运动（一九一九年）至五卅运动（一九二五年）那一时期。在战争

爆发以后的一切组织和斗争，则是直接或间接地配合战争的，例如北伐战争时期，革命军后方的一切组织和斗争是直接地配合战争的，北洋军阀统治区域内的一切组织和斗争是间接地配合战争的。又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色区域内部的一切组织和斗争是直接地配合战争的，红色区域外部的一切组织和斗争是间接地配合战争的。再如现在抗日战争时期，抗日军后方的和敌军占领地的一切组织和斗争，也同样是直接或间接地配合战争的。

“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斯大林同志的这一论断是完全正确的；无论是对于北伐战争说来，对于土地革命战争说来，对于今天的抗日战争来说，都是正确的。这些战争都是革命战争，战争所反对的对象都是反革命，参加战争的主要成分都是革命的人民；不同的只在或者是国内战争，或者是民族战争；或者是共产党单独进行的战争，或者是国共两党联合进行的战争。当然，这些区别是重要的。这些表示了战争主体有广狭的区别（工农联合，或工农资产阶级联合），战争对象有内外的区别（反对国内敌人，或反对国外敌人；国内敌人又分北洋军阀或国民党），表示了中国的革命战争在其历史进程的各个时期中有不相同的内容。然而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都是革命战争，都表示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革命战争“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这一论断，完全适合于中国的情况。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主要的和差不多开始就面对着的任务，是联合尽可能多的同盟军，组织武装斗争，依照情况，反对内部的或外部的武装的反革命，为争取民族的和社会的解放而斗争。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

在这一点上，我们党从一九二一年成立直至一九二六年参加北伐战争的五六年内，是认识不足的。那时不懂得武装斗争在中国的极端的重要性，不去认真地准确战争和组织军队，不去注重军事的战略和战术的研究。在北伐过程中，忽视了军队的争取，片面地着重于民众运动，其结果，国民党一旦反动，一切民众运动都塌台了。一九二七年以后的一个长时期中，许多同志把党的中心任务仍旧放在准备城市起义和白区工作方面。一些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根本的转变，是在一九三一年反对敌人的第三次“围剿”胜利之后。但也还没有全党的转变，有些同志仍旧没有如同现在我们这样想。

经验告诉我们，中国的问题离开武装就不能解决。认识这一点，对于今后进行胜利的抗日战争是有利益的。抗日战争中全民武装反抗的具体事实，将教育全党进一步地认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每个党员都要时刻准备武装上前线。我们这次会议又决定党的主要工作方面是在战区和敌后，更给了一个明确的方针。这对于有些党员愿作党的组织工作，愿作民众运动的工作，而不愿研究战争和参加战争，有些学校没有注意鼓励学生上前线，等等现象，还是一剂对症的良药。大部分中国领土内党的组织工作和民众运动工作是直接联系于武装斗争的，没有也不能有单独的孤立的党的工作或民众运动。一部分距离战区较远的后方（如云南、贵州、四川）和一部分敌人控制的地区（如北平、天津、南京、上海），党的组织工作和民众运动也是配合战争的，只能也只应服从前线的要求。一句话，全党都要注重战争，学习军事，准备打仗。

二 中国国民党的战争史

我们来看一看国民党的历史，看一看它是如何地注意于战

争，是有益处的。

从孙中山组织革命的小团体起，他就进行了几次反清的武装起义。到了同盟会时期，更充满了武装起义的事迹，直至辛亥革命，武装推翻了清朝。中华革命党时期，进行了武装的反袁运动。后来的海军南下，桂林北伐和创设黄埔，都是孙中山的战争事业。

蒋介石代替孙中山，创造了国民党的全盛的军事时代。他看军队如生命，经历了北伐、内战和抗日三个时期。过去十年的蒋介石是反革命的。为了反革命，他创造了一个庞大的“中央军”。有军则有权，战争解决一切，这个基点，他是抓得很紧的。对于这点，我们应向他学习。在这点上，孙中山和蒋介石都是我们的先生。

辛亥革命后，一切军阀，都爱兵如命，他们都看重了“有军则有权”的原则。

谭延闿是一个聪明的官僚，他在湖南几起几覆，从来不做寡头省长，要做督军兼省长。他后来做了广东和武汉的国民政府主席，还是兼了第二军军长。中国有很多这样的军阀，他们都懂得中国的特点。

中国也有些不要军队的政党，其中主要的一个是进步党，但是它也懂得必须靠一个军阀才有官做。袁世凯、段祺瑞、蒋介石（附蒋的是进步党之一部转变而成的政学系）就成了它的靠山。

历史不长的几个小党，如青年党等，没有军队，因此就闹不出什么名堂来。

外国的资产阶级政党不需要各自直接管领一部分军队。中国则不同，由于封建的分割，地主或资产阶级的集团或政党，谁有枪谁就有势，谁枪多谁就势大。处在这样环境中的无产阶级政党，应该看清问题的中心。

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决不能争，再也不要学张国焘），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现在是民族抗战，还要争民族的兵权。在兵权问题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点东西。劳动人民几千年来上了反动统治阶级的欺骗和恐吓的老当，很不容易觉悟到自己掌握枪杆子的重要性。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全民抗战，把劳动人民推上了战争的舞台，共产党员应该成为这个战争的最自觉的领导者。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但是有了枪确实又可以造党，八路军在华北就造了一个大党。还可以造干部，造学校，造文化，造民众运动。延安的一切就是枪杆子造出来的。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观点看来，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有人笑我们是“战争万能论”，对，我们是革命战争万能论者，这不是坏的，是好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共产党的枪杆子造了一个社会主义。我们要造一个民主共和国。帝国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只有用枪杆子的力量才能战胜武装的资产阶级和地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可能改造。我们是战争消灭论者，我们是不要战争的；但是只能经过战争去消灭战争，不要枪杆子必须拿起枪杆子。

三 中国共产党的战争史

我们党虽然在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一九二四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三四年中，不懂得直接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的重要性；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乃至在其以后的一个时期，对此也还认识不足；但是从一九二四年

参加黄埔军事学校开始，已进到了新的阶段，开始懂得军事的重要了。经过援助国民党的广东战争和北伐战争，党已掌握了一部分军队。革命失败，得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这个时期是我们党彻底地认识军队的重要性的极端紧要的时期。没有这一时期的红军及其所进行的战争，即是说，假如共产党采取了陈独秀的取消主义的话，今天的抗日战争及其长期支持是不能设想的。

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党中央的紧急会议反对了政治上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党大进了一步。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六届四中全会，在名义上反对政治上的“左”倾机会主义，在实际上重新犯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这两个会议的内容和历史作用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两个会议都没有着重地涉及战争和战略的问题，这是当时党的工作重心还没有放在战争上面的反映。一九三三年党的中央迁至红色区域以后，情形有了根本的改变，但对于战争问题（以及一切主要问题），又犯了原则性的错误，致使革命战争遭受了严重的损失。一九三五年的遵义会议，则主要地是反对战争中的机会主义，把战争问题放在第一位，这是战争环境的反映。到今天为止，我们可以自信地说，中国共产党在十七年的斗争中，不但锻炼出来了一条坚强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而且锻炼出来了一条坚强的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路线。我们不但会运用马克思主义去解决政治问题，而且会运用马克思主义去解决战争问题；不但造就了一大批会治党会治国的有力的骨干，而且造就了一大批会治军的有力的骨干。这是无数先烈的热血浇灌出来的革命的鲜花，不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光荣，而且是世界共产党和世界人民的光荣。在世界范围内，还只有苏联、中国、西班牙三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三个军队，是属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方面的，其他各国的党

都还没有军事经验，所以我们的军队和军事经验特别值得宝贵。

为了胜利地进行今天的抗日战争，扩大和巩固八路军、新四军和一切我党所领导的游击队，是非常重要的。在此原则下，党应派遣最好的和足够数量的党员和干部上前线。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组织任务须服从于政治任务。

四 国内战争和民族战争中党的军事战略的转变

我们党的军事战略的变化问题，值得给以研究。分为国内战争和民族战争两个过程来说。

国内战争的过程，大体上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战略时期。在前期，主要的是游击战争；在后期，主要的是正规战争。但所谓正规战争是中国型的，只表现在集中兵力打运动战和指挥上、组织上的某种程度的集中性和计划性方面，其他则仍是游击性的，低级的，不能和外国军队一概而论，也和国民党的军队有些不同。因此，这种正规战，在某种意义上，是提高了的游击战。

在抗日战争的过程中，就我党的军事任务说来，也将大体上分为两个战略时期。在前期（包括战略防御和战略相持两个阶段），主要的是游击战争；在后期（战略反攻阶段），主要的将是正规战争。但抗日战争前期的游击战争，和国内战争前期的游击战争有许多不同的内容，因为是用正规性（某种程度上）的八路军去分散执行游击任务；抗日战争后期的正规战争也将不同于国内战争后期的正规战争，这是设想在装备了新式武器之后，军队和作战将要起一个大的变革而说的。这时的军队将获得高度的集中性和组织性，作战将获得高度的正规性，大大减少其游击性，低级的将变到高级的，中国型的将变到世界型的。这将是战略反攻阶段中的事业。

由此看来，国内战争和抗日战争两个过程和四个战略时期之间，共存在着三个战略的转变。第一个，国内游击战争和国内正规战争之间的转变。第二个，国内正规战争和抗日游击战争之间的转变。第三个，抗日游击战争和抗日正规战争之间的转变。

三个转变中，第一个转变曾经遇到很大的困难。这里有两方面的任务。一方面，要反对沉溺于游击性而不愿向正规性转变的右的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的倾向，这是由于干部对已经变化的敌情和任务估计不足而发生的。这一方面，拿中央红色区域来说，曾经作了艰苦的教育工作，才使之逐渐地转变过来。又一方面，则要反对过分地重视正规化的“左”的集中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倾向，这是由于一部分领导干部对敌情和任务估计过分，并且不看实情，机械地搬用外国经验而发生的。这一方面，在中央红色区域，曾经在三年的长时间内（遵义会议以前），付出了极大的牺牲，然后才从血的教训中纠正过来。这种纠正是遵义会议的成绩。

第二个转变是处于两个不同的战争过程之间的，这是一九三七年秋季（卢沟桥事变后）的事情。这时，敌人是新的，即日本帝国主义，友军是过去的敌人国民党（它对我们仍然怀着敌意），战场是地域广大的华北（暂时的我军正面，但不久就会变为长期的敌人后方）。我们的战略转变，是在这些特殊情况之下进行的一个极其严重的转变。在这些特殊的情况下，必须把过去的正规军和运动战，转变成为游击军（说的是分散使用，不是说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和游击战，才能同敌情和任务相符合。但是这样的一个转变，便在现象上表现为一个倒退的转变，因此这个转变应该是非常困难的。这时可能发生的，一方面是轻敌倾向，又一方面是恐日病，这些在国民党中都是发生了的。国民党当它从国内战争的战场向民族战争的战场转变时，主要由于轻敌，同时也存在着一种恐日病（以韩复榘、刘

峙为代表)，而遭受了很多不应有的损失。然而我们却相当顺利地执行了这个转变，不但未遭挫败，反而大大地胜利了。这是由于广大的干部适时地接受了中央的正确指导和灵活地观察情况而获得的，虽然曾经在中央和一部分军事干部之间发生过严重的争论。这一转变关系于整个抗日战争的坚持、发展和胜利，关系于中国共产党的前途非常之大，只要想一想抗日游击战争在中国民族解放命运上的历史意义，就会知道的。中国的抗日游击战争，就其特殊的广大性和长期性说来，不但在东方是空前的，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也可能是空前的。

至于由抗日游击战争到抗日正规战争的第三个转变，则属于战争发展的将来，估计那时又将发生新的情况和新的困难，现在可以不去说它。

五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

在抗日战争的全体上说来，正规战争是主要的，游击战争是辅助的，因为抗日战争的最后命运，只有正规战争才能解决。就全国来说，在抗日战争全过程的三个战略阶段（防御、相持、反攻）中，首尾两阶段，都是正规战争为主，辅之以游击战争。中间阶段，由于敌人保守占领地、我虽准备反攻但尚不能实行反攻的情况，游击战争将表现为主要形态，而辅之以正规战；但这在全战争中只是三个阶段中的一个阶段，虽然其时间可能最长。故在全体上说来，正规战争是主要的，游击战争是辅助的。不认识这一情况，不懂得正规战争是解决战争最后命运的关键，不注意正规军的建设和正规战的研究和指导，就不能战胜日本。这是一方面。

但游击战争是在全战争中占着一个重要的战略地位的。没有游击战争，忽视游击队和游击军的建设，忽视游击战的研究

和指导，也将不能战胜日本。原因是大半个中国将变为敌人的后方，如果没有最广大的和最坚持的游击战争，而使敌人安稳坐占，毫无后顾之忧，则我正面主力损伤必大，敌之进攻必更猖狂，相持局面难以出现，继续抗战可能动摇，即若不然，则我反攻力量准备不足，反攻之时没有呼应，敌之消耗可能取得补偿等等不利情况，也都要发生。假如这些情况出现，而不及及时地发展广大的和坚持的游击战争去克服它，要战胜日本也是不可能的。因此，游击战争虽在战争全体上居于辅助地位，但实占据着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抗日而忽视游击战争，无疑是非常错误的。这是又一方面。

游击战争的可能，只要具备大国这个条件就存在的，因此古代也有游击战争。但是游击战争的坚持，却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才能出现。故古代的游击战争大都是失败的游击战争，只有现代有了共产党的大国，如像内战时期的苏联和中国这样的国家，才有胜利的游击战争。在战争问题上，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的分工，就目前和一般的条件说来，国民党担任正面的正规战，共产党担任敌后的游击战，是必须的，恰当的，是互相需要、互相配合、互相协助的。

由此可以懂得，我们党的军事战略方针，由国内战争后期的正规战争转变为抗日战争前期的游击战争，是何等重要和必要的了。综合其利，有如下十八项：（一）缩小敌军的占领地；（二）扩大我军的根据地；（三）防御阶段，配合正面作战，拖住敌人；（四）相持阶段，坚持敌后根据地，利于正面整军；（五）反攻阶段，配合正面，恢复失地；（六）最迅速最有效地扩大军队；（七）最普遍地发展共产党，每个农村都可组织支部；（八）最普遍地发展民众运动，全体敌后人民，除了敌人的据点以外，都可组织起来；（九）最普遍地建立抗日的民主政权；（十）最普遍地发展抗日的文化教育；（十一）最普遍地

改善人民的生活；（十二）最便于瓦解敌人的军队；（十三）最普遍最持久地影响全国的人心，振奋全国的士气；（十四）最普遍地推动友军友党进步；（十五）适合敌强我弱条件，使自己少受损失，多打胜仗；（十六）适合敌小我大的条件，使敌人多受损失，少打胜仗；（十七）最迅速最有效地创造出大批的领导干部；（十八）最便于解决给养问题。

在长期奋斗中，游击队和游击战争应不停止于原来的地位，而向高级阶段发展，逐渐地变为正规军和正规战争，这也是没有疑义的。我们将经过游击战争，积蓄力量，把自己造成成为粉碎日本帝国主义的決定因素之一。

六 注意研究军事问题

两军敌对的一切问题依靠战争去解决，中国的存亡系于战争的胜负。因此，研究军事的理论，研究战略和战术，研究军队政治工作，不可或缓。战术的研究虽然不足，但十年来从事军事工作的同志们已有很多的成绩，已有很多根据中国条件而提出的新东西，缺点在于没有总结起来。战略问题和战争理论问题的研究，至今还只限于极少数人的工作。政治工作的研究有第一等的成绩，其经验之丰富，新创设之多而且好，全世界除了苏联就要算我们了，但缺点在于综合性和系统性的不足。为了全党和全国的需要，军事知识的通俗化，成为迫切的任务。所有这些，今后都应该注意，而战争和战略的理论则是一切的骨干。从军事理论的研究，引起兴趣，唤起全党注意于军事问题的研究，我认为是必要的。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刊印。

党规党法的报告*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

刘 少 奇

1. 关于党的组织决定。
2. 关于中委工作规则及纪律的决定。
3. 关于各级党部工作及纪律的决定。

一、我现在要报告的，首先是为何要党规党法以及组织决定。意义是：

1. 我们党章是很早规定出的，现有许多新的情况发生，所以需要六中有一决定。

党章在五次及六次大会时都有新的修改^[1]。现有新的状况。过去是根据城市组织的，对乡村组织则估计少，现在则大部在乡村中。那时党无有军队，无有政府，现在党有了军队及政府，此又是大不同。

那时党是秘密的，现在党是公开的和半公开的，有群众领袖。

那时党是小的，现则为大党。

2. 党是执行民族统一战线的党。要保证党的团结与统一，

* 这是刘少奇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关于党规党法报告的要点。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决定成立中央规则起草委员会，由刘少奇等负责起草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等三个决定，准备提交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讨论通过。

除政治上思想上之统一外，条文上亦应规定法律上非团结不可，以避免个别人破坏党的团结与统一。并以此党规与党法去教育同志。

3. 这几个文件在六中上通过也是党组织建设之一，保证按民主集中制来建设我们的党。党章必须在党大会上修改，六中无此权，故只予以补充，七次大会再予党章以大的修改。现在的决定都是暂行的决定。

二、党的组织机构的决定。

1. 在前线等地可按着此决定执行，但在有些地方则可按照本地情形参照此决定去执行。

2. 组织机构的决定：各地党部委，去一“部”字；省委改为区党委；特委改为地方委员会（地委）；县委仍旧；市委亦仍旧；县以下之区委仍为区委；支部称为支部委员会；支部以下称为支分部，此在有些情形下可要，在有些情形下则可不要，故支分部不成为党的一级组织。支分部也称支分部委员会。有必要时可组织中心县委、中心区委及中心支部等。但在各县委区委等等组织成功后，则中心县委等等可取消。

3. 各级党委内部的组织机构：A. 组织部；B. 宣传部；C. 战争动员部（即以前的军事部），此部在有些地方可不要；D. 民运部，下可设工、农、妇女、少数民族等部，但民运部在有些地方可不必要；E. 统一战线部，管理关于友党友军的联系及政府工作的，自然后方的党部不一定要此部；此外还有一秘书处。支部、支分部，下为小组；支部内不一定设部；如支部工作繁忙时可成立各种委员会。

4. 检察委员会：党章上无检查委员会^[2]的规定，现党有必要设立检查委员会。依照党的今天状况来说，组织检委会的可能少，因无这多干部，故我们决定，有些地方有可能并经过

中央决定则可组织检查委员会。检委会委员应有三年党籍以上的资格方能担任。检委会是属于党委会之下的，如对党委会的工作不满则可向上级检委会报告。检委会的委员可兼职。检委会的任务有四（如文件上所规定）。

5. 关于各级委员会的会议：

各级党委设常委，设书记。常委会有处理紧急事务之权，书记对此事处理后应交常委追认。关于扩大会议可吸收党委委员之外的工作人员参加。

下级党委应向上级党委报告工作。

三、关于中央委员会的工作规则与纪律。

如无中央及政治局、书记处之委托，中央委员不能代表党发表文件。

各中委到各地去时，有权参加各地党委的会议，考查各地党委工作，向中央作报告。中委参加各地党委工作时，如一中委为某一省委书记时，则他应服从省委。

“中委全会在特殊情况下有权开除个别中委，且可补充中委……”此条可不要，因对党内外影响不好。

关于政治局的：

“政治局本身不能开除政治局委员，须经过中央全会处理……”这一条也不要。

政治局会议，有半数委员出席则可开会，但政治局的决定须有过半数的委员通过方能有效。

各中央局的委员，各省委书记，各政府的 C. P. 党员等等须经过中央政治局通过方有效。

政治局委员到各地时，有权参加各地、各部队的工作，并有权提出工作建议。但他参加某地工作时，应服从某地党委。

党报委员会的委员应由政治局批准。

关于书记处的：

党章上无书记处，只有常委，党章上对常委的权限亦无规定。现可把常委会改为书记处，其职权是负责解决政治上……的一切日常性质的事情，召集政治局会议，但须执行政治局的决定，在未开政治局会议前，书记处有权解决一切问题，且得以中央名义发表文件……。

凡用书记处名义发表的文件等等，须一般有过半数书记处的成员签名及同意。

关于中央各部与书记处的关系。中央各部对下级各部有指导之权；但关于重要事项须经过书记处去执行。

关于同级组织的关系：省委与省委、中央局与中央局间的关系，一般是同级党部无指导关系，但同级党部间可提出建议，在不违反中央与上级党委的决定的条件下；如在违反上级党委的决定下互相建议则为小组织活动，是不允许的。

中央各书记如发表对外的文章及谈话时，可交其他书记看后再发表。

关于全国性的宣言，各地党委应根据中央的指示发表。

关于全国性的党团（如参政会、全总党团）应服从于政治局或书记处或它所指定的中央局。

四、各地党委的工作规则与纪律。

各地党委都可组织常委，但不能跨过党委。

各级党委之选举，到会的代表及党员可提出候选人，当地党委及上级党委亦可提候选人。候选人提出并受主席团审查后提交大会。选举方法：举手表决。

各级党部的文件由常委同意即可发表。

关于申诉与控告：可越级控告，在控告时有的主张应当通知当地最高党委，有的主张尽可能通知当地最高党委。争论之发生，有些同志认为党内团结，应民主多一些，发扬下级对工作的责任心，尽可能向上级控告，如此可避免在下层进行不合

法的行动。但另外党内还有一些无原则的纠纷，如衣服等等要求不满，可借端向上级控告，这些无原则的投机的纠纷还多，应养成同志的组织观念，不应有轻视当地党委的观念。争论即在于此。我们决定：控告是为了党内团结，应防止无原则的纠纷。“凡对于上级党部及负责人在政治问题及工作原则上有不同意见经过讨论后，得越级向上级申诉，直至党的最高负责人；但在申诉时未经理上级的决定不得在当地党内泄露，且应服从当地党委。”“关于组织上的处罚而有政治上原则上的问题时，可向当地组织申诉……”^{〔3〕}各级党部接到控诉书时应转交上级党部，不准扣留。

对党的负责人及群众领袖有不满时可向相当的党委提出意见，但不准在同志中及群众中乱说。

各级党委直至中央的会议在未决定向外或向同志中发表时，任何人无权发表。

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一切领导集中于中央，此为党的民主集中制。

以上报告的三个决定，我请求六中全会基本上通过，交政治局修改补充，发出教育全党同志，为党的建设的一课。中央委员及政治局委员在执行此党规党法上应表现为模范。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
《刘少奇论党的建设》刊印。

注 释

〔1〕一九二七年六月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精神，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对以前的党章做了较大修改。增加的新内容主要有：在入党条件上，规定党员的年龄必须在十八岁以上；在组织原则和组织制度方面，第一次明确提出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并设立政治局、监察委员会和党团，把党与青年团的关系列入党章。修改后的党章共十二章八十五条。一九二八年六七月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党章

也作了进一步的修改。修改后的党章基本上保持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的内容，但在结构上作了一些调整，共分十五章五十三条。明确规定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认为中国共产党为共产国际之一部分，无条件地服从共产国际的决议。

〔2〕这里提到的检察委员会、检查委员会，在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通过的《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中，都写作监察委员会。

〔3〕这里的引文，见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通过的《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第十四、十五条。

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

中共扩大的六次中央全会听了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央政治局自五中全会到六中全会之间的工作以及关于目前抗战形势及中华民族当前紧急任务的报告以后，完全同意政治局在这一时期的政治路线和具体工作。同时一致指出党在这时期的进步与成绩。党在政治局领导、全党同志努力和全国军民拥护之下，在极艰难复杂的条件之下，顺利的完成了有历史意义的政策转变——从国内各党派、各阶级、各军队、各政权对立的局面，转变到提出和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关于报告中所提出的对于抗战基本趋势的分析，对于目前抗战形势的估计和中华民族当前紧急任务，以及其他事项，扩大的六中全会完全同意。同时扩大的六中全会一致指出下列诸项，以为全党同志努力奋斗的准绳：

一 中华民族十六个月抗战的基本总结

日本法西斯军阀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起武装侵占我东北四省之后，去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以来，更实行大规模的侵略战争，来进攻我国北部、中部及南部各省。其目的是企图灭亡我中华民族，吞并我整个国家。我伟大的中华民族，在蒋⁽¹⁾委员长的领导下，由于国民党国民政府对日实行民族抗战政策的结果，由于共产党为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长期的坚

持的奋斗，由于全国军民奋起抗敌，已经掀起了伟大的英勇的民族自卫战争。十六个月来的抗战，是我中华民族发展中的伟大历史事件，造成了我中华民族空前未有的团结和进步：长期受外敌压迫的民族抬起头来了，分裂的国家政权统一起来了，对立的党派携手合作了，互相斗争过的军队变成统一的国民革命军了，国家政治制度开始走向民主化了，穷苦的民众大批的起来参加民族解放运动了，在敌人后方空前规模的游击战争发动起来了，中华民族的英勇苦斗已为全世界所同情、所钦佩了。在抗战烈火中，旧的阻碍进步的和分裂国家的屏障是在破坏着，团结四万万五千万人民为一个统一力量的过程和民族自强的新生命是在生长着。

十六个月的抗战，虽因敌我力量的悬殊，损失了许多的大城市与铁路，牺牲了数十万的英勇战士，全国人民遭受了莫大的灾难。然而我们打破了日寇的速战速决的计划，消耗了敌人数十万兵力和数十万万经费，增加了敌寇内外的困难，博得全世界先进人类的对敌谴责和对我同情。十六个月抗战的经验证明：中华民族有抵抗外寇的不可战胜的伟大力量。然而求得速胜是不可能的，抗日战争是艰苦的持久战。这是因为，敌是帝国主义国家，具有比较发达的工业和军事技术。但敌为小国，人少兵少；其进行的战争是野蛮的侵略战争，违反本国人民利益，遭受世界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法西斯统治是在死亡的道路向上发展。我是半殖民地国家，工业与军事技术比较落后。但我为大国，人多兵多，地大物博；其进行的抗战是进步的民族自卫战争，合于全民族利益和受到国际的同情与援助，在抗战中的中国是在解放、自强的道路上向上发展。因此敌在长期战争中将愈战愈难，愈战愈弱，一直到最后失败。我在长期抗战中将转弱为强，转败为胜，一直到最后胜利。这个过程将表现在持久战的三个阶段：在敌方为进攻——相持——退

却，在我方为防御——相持——反攻。在第一阶段中，我国的统一团结与进步建立起持久战的必要基础。但因敌我力量的悬殊，使我不能不在正面采取运动防御的战略，在敌后则发展广泛的游击战争，使敌人战线延长，兵力分散与消耗。这样坚持的结果，将迫使敌人停止其战略上的进攻，而使战争进入到敌我相持的阶段。在我力量准备完毕时，我将配合日寇的更加困难与国际的有利条件，实行反攻，以达到驱逐日寇出中国的最后胜利。战争的长期性，要求我中华民族长期的艰苦奋斗，要求我国共两党和一切抗日党派长期的亲密合作。用一切努力，团结和组织我四万万五千万人民成为一个统一的力量，这是保证抗日持久战获得最后胜利的基本条件。

二 目前抗战形势的特点

目前的抗战，正处在抗日持久战第一阶段转到第二阶段的过渡时期，这一过渡时期与将来相持阶段的基本特点就是：一方面我国的困难加多，另一方面我国更加团结与更加进步。武汉、广州相继不保，大工商业的丧失，主要铁路的被占领，国家政权与作战阵地在地域上的被分割，主要海道的被割断与外援的暂时减少，以及财政经济交通的困难，军火供给的不易，这些都是目前抗战形势及将来相持阶段中的困难现象。同时，日寇正在计划成立全国的伪政权，并加强其挑拨中国内部的阴谋，而汉奸亲日分子也正在利用这些困难加紧其投降妥协的活动。由于这些困难，可能在一部分人中产生悲观失望的情绪。由于这些困难，抗战阵营中可能产生意见分歧甚至某些分子的动摇与局部叛变。这些都是目前及今后抗战中的严重问题，我们必须看到这一方面。然而我们同时又必须估计到中国的更加团结，更加进步与日本困难的同时增多。蒋委员长与全国人民

的不动摇的坚决抗战，国共合作及民族统一战线的进步，国共两党数量上的发展与其政治影响的扩大，全国人民对日仇恨与同生死共患难的团结，中国还保有广大的完整地区（西北、西南）作为抗战的总后方，而在敌后方则广泛的游击战争与抗日根据地正在强大着，英勇的中国军队积蓄了丰富的抗战经验并正在巩固其战斗力，全国政治制度正在逐步的民主化（尤其在敌后方抗日根据地中），广大民众正在发动与组织起来。同时，日本因战线延长将更感兵力的不足与分散，离开海岸、铁路、大河的山地战斗，将给日寇以更大的困难，敌后方广泛的游击战争的发展，将陷敌军于到处受击、忙于应付、消耗疲惫的境地。日本在华南的行动，势将引起美日、英日、法日关系的更加尖锐化。日本坚持侵略与中国坚持抗战的结果，将使日本人民处在长期战争的威胁中，而日益增长其反战反法西斯运动。所有上述一切，都是我中华民族坚持抗战克服困难的客观有利条件。而坚持抗战克服困难的中心关键，就在于进一步团结我全民族，强固我国共合作，坚定我抗战信心，增长我新生力量，以进行长期的艰苦的百折不挠的民族自卫战争。诚能如此，在目前停止敌之进攻，在将来实行我之反攻，无疑的是能够实现的。

三 全中华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

根据上述的抗战总结与抗战形势的估计，全中华民族的基本任务应该是：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便克服困难，增加力量，停止敌之进攻，实行我之反攻，以取得最后驱逐日寇出境和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三民主义新中国的光荣胜利。在此基本原则下，全中华民族的当前紧急具体任务则应该是：

(一) 高度的发扬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坚决抗战到底，克服悲观失望情绪，反对妥协投降。

(二) 诚心诚意的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拥护国共两党及一切抗日党派的亲密合作，反对一切分裂企图，反对任何汉奸傀儡政府。

(三) 提高主力军的战斗力，扩大原有的军队，创造更多的新军，改进军队的政治工作与技术装备和训练，保卫西南西北，停止敌之进攻。

(四) 广大发展敌后方的游击战争，建立和巩固更多的抗日根据地，缩小敌之占领地区，并配合主力军作战。

(五) 提高军事技术，建立必要的军火工厂，准备反攻实力。

(六) 实行集中领导下的民主政治，改善政治机构，密切政府与人民的联系，发挥抗日政权的最大效能。

(七) 扩大民众运动和发展民众团体（工、农、商、学、文化界、妇女、青年、儿童各种组织），动员广大民众积极参加抗日战争。

(八) 为激发民众的抗战热忱和生产热忱，实行相当必要的民生改善。

(九) 实行新的战时财政经济政策，增加收入，节省支出，克服抗战中的财政经济困难。

(十) 实行国防教育政策，使教育为民族自卫战争服务。

(十一) 集中一切力量，反对日本法西斯军阀侵略者，加紧国外宣传，力争国外援助，实现对日制裁，使日寇断绝外国军火和军事原料的供给，使我国能够得到友邦的军火、军事原料、医药材料、技术人员及财政的帮助。

(十二) 建立中日两国与朝鲜、台湾等人民的反对侵略战争的统一战线，共同进行反对日本法西斯军阀的斗争。

（十三）团结中华各民族（汉、满、蒙、回、藏、苗、瑶、夷、番等）为统一的力量，共同抗日图存。

（十四）厉行锄奸（汉奸、敌探、托洛茨基分子等）运动，巩固抗战的前线和后方。

（十五）发展国共两党及一切抗日党派，强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支持长期抗战。

上述各项，实为克服困难，增加力量，停止敌之进攻与准备我之反攻的必要的具体的任务。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相信，由于这些任务的执行，中国转弱为强、转败为胜之目的，就一定能够达到。

四 国共长期合作，保证抗战建国大业的胜利， 为三民主义的新中华民国而奋斗

为了完成中华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为了顺利进行抗日持久战，就必需国共两党长期合作。国共两党合作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是抗战建国大业完成与胜利的保证。因此，建立国共两党的长期合作，不仅是国共两党同志的热望，而且是我全中国人民和一切中国朋友的希望。抗战建国是长期的事业，抗战时期的合作，造成战后合作的基石。强敌的存在，三民主义之成为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两党十余年来的相互关系所给两党党员及全国人民的深刻的教训，全国军民对于两党长期合作的切望以及为建立三民主义的新中国而奋斗的共同目标，所有这一切，就使两党长期合作的事业，具有坚定的科学基础和理论根据，因此就能够由希望变成事实。为此目的，扩大的六中全会正式决定：不在国民党中央及其军队中建立共产党的秘密组织。再一次正式宣言，中国共产党对于拥护三民主义，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的诚心诚意。再一次恳切的

责成所有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互助互让和同生死共患难的精神，以尊重合作中各政党独立性的立场，以谦和互敬互商的工作态度，去亲近国民党同志和一切抗日党派的同志。这不仅是为了减免国共两党间的磨擦，不仅是为了改善和加强两党合作的关系，而且是为了达到两党长期合作的目的。扩大的六中全会谨向国民党总裁蒋先生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称：中国共产党认为国共两党合作的最好的组织形式是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和三民主义青年团，并将加入国民党与青年团的共产党员的名单交给国民党领导机关，并且不在国民党及青年团中进行征收共产党员的活动。第二种形式则是由两党组织各级的共同委员会来进行两党合作的事宜。六中全会认为两党合作组织形式的适当解决，对于亲密两党关系保证两党长期合作有极重大的意义。

由于国共长期合作的实现与持久抗战的胜利，将产生一个独立、自由、幸福的三民主义新中华民国。中国的内部环境（以各党派各阶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力量取得抗战胜利和建国成功）和国际的条件，都指明在这一历史阶段中既不会是所谓“一党专政”的国家制度的建立，也不会是苏维埃或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出现，而将是一个新式的民主共和国，即三民主义的新中华民国。这一新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建立，是在长期艰苦抗战中去打下基础和抗战胜利后去发扬光大的。抗战建国纲领的公布，国民参政会的召集，省市参政会召集的实现，各抗日党派合法权利的取得，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权利的逐渐实现，陕甘宁边区、晋冀察边区及敌后方抗日根据地中民主之实施、民生之改善，——所有这一切，都是抗战以来国家制度走向民主化道路的具体证明。争取抗战胜利的过程，将与实现民主、改善民生的过程相因相成。中华民族抗战胜利，实现民族独立的时候，一定就是新式的民主共和国奠定

其基础的时候。这一新的三民主义新中华民国的建立，将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上的空前进步，将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起着光前裕后的伟大作用。

五 民族自卫战争中的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先进的儿女，以满腔热忱和无限英勇参加反抗日寇保卫祖国的事业，是真正无产阶级先锋队和国际主义战士应有的态度和必需的工作。共产党员必须在民族自卫战争和建立三民主义共和国的伟大斗争中，起模范战士的作用。共产党员的岗位，首先应该是在最能打击日寇的地方——前线和敌后方。共产党员应该成为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模范战士。根据一切服从抗战利益，一切为着抗战胜利，一切为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高于一切的原则立场，共产党员对友党友军应该采取精诚团结和互助互让的态度，对执行三民主义及抗战建国纲领应该采取最诚恳、最积极的立场。共产党员应该根据民权主义的精神，在政治上、组织上尊重各党派的独立性，应该成为尊重国民党和各抗日党派的独立性的模范；同时，应该坚持保证共产党本身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共产党员在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武装队伍中，应该成为智勇善战，执行命令，服从纪律，建立优良的官兵一体、军民一体与争取敌军的政治工作的模范。关于这一点，全会特别指出八路军、新四军中的共产党员，全体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及战斗员，在抗战中已经起了极光荣的作用，以后应该更加发扬这种作用。共产党员在行政工作中，应该成为廉洁奉公、不贪污、不腐化的模范。在民众运动中，应该成为不仅教育群众而且向群众学习，不包办，不独断，与他人友谊的民主合作的模范。在对待一切非共产党员的态度上，

应该是真诚和蔼、尊重合作的模范。因此，广大的发展共产党的组织，使之成为全中国的广大群众性的布尔塞维克的政党，不仅是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本身的迫切任务，而且是中华民族的共同事业。为了保证共产党员能在抗战建国大业中起其应有的作用，为了使共产党广大发展成为能担当抗战建国大业中一部分光荣任务的伟大力量，必须大批培养和提拔有胆有识、能作能为的党员干部和非党员干部，并且最适当的使用、教育和爱护这些干部。必须加紧认真地提高全党理论的水平，自上而下一致地努力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学会灵活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国际经验应用到中国每一个实际斗争中来，研究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研究中国历史，提高工农干部和一般党员的文化水平，更加改进《新华日报》、《解放》、《群众》等的內容，大量设立各级培养干部的学校、训练班等。必须建立和加强能独立工作的地方党部，培养在党、政、军、民各种工作中有声望、有信仰的领导人才。同时，必须正确地开展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去反对危害党、危害统一战线、危害抗战事业的“左”右不正确的倾向。目前“左”倾关门主义分子的危險，在于他们不了解在现时条件之下解放中国人民的唯一道路，就是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尤其是建立国共两党的长期合作；同时，在于他们不认识抗战形势而产生的“左”的急性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危險，在于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中，牺牲党的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把无产阶级为了反对共同敌人而与其他阶级建立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曲解成为使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成为资产阶级的尾巴；同时，他们在困难前面失望，而发生对抗战形势及前途的悲观主义。站在右倾机会主义的立场和采取两面派手腕，进行反党反中央斗争的张国焘，现在成了公开背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共产主义事业的叛徒和逃兵。政治局代表中央宣

布开除张国焘的党籍，是绝对正确的。六中全会完全同意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决定中开除张国焘党籍问题的意见，即是：“张国焘的背叛行为，不仅在中共队伍中，而且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切忠实的拥护者中，都会遇到完全的唾弃与蔑视。”当然，各级党部对于在实际工作中因不了解和无经验而犯错误的同志们，应当加以耐心的说服和细心的教育，乱加同志以“左”右倾机会主义帽子的错误，必须严格的纠正。同时应当彻底肃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凶恶敌人——思想上的及工作中的公式主义、教条主义与机械主义。最后，六中全会特别唤起全党提高革命警惕性，以锐敏的注意力去严防日寇及其走狗——托洛茨基分子及一切汉奸和反共的分子们在共产党内部外部所进行的各种挑拨离间和破坏危害的阴谋诡计，以布尔塞维克应具备的党性来揭发和反对一切公开的和暗藏的（采取两面派方法的）反党的和危害党的分子。每个共产党员应该爱护党和党的团结统一有如生命。认真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中央是全党最高的领导，用以严格党的纪律，使党及其各级领导机关达到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团结得如像一个人一样的程度。六中全会提醒全党同志注意：共产党的团结统一，首先是中央及各级领导机关，尤其是八路军、新四军中党的领导干部，和各中央局及省委的团结和统一，是保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向前巩固和扩大的最基本前提，同时也就是争取中华民族抗战胜利和实现建国大业的最重要条件。

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中全会指出：日本法西斯侵略者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死敌，而且是日本人民的仇敌，同时又是全世界爱护和平的先进人类的公敌。因此，“中华民族的解放战争是世界无产阶级与全体先进人类反对野蛮的法西斯主义暴力的总斗争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见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决定）中

共扩大的六中全会坚决相信：具有五千年文化历史，拥有四万万五千万人口的我伟大中华民族，在全民族团结、国共长期合作的条件下，在日本人民反战反法西斯运动的配合条件下，在全世界爱护和平的民族国家与所有先进人类的同情与援助条件下，一定能够克服困难，在持久的艰苦的奋斗中，进行反对日寇的胜利的民族自卫战争，驱逐日寇出中国，建立独立自由、幸福、光明的三民主义的新中国。光明的前途已见曙光，最后胜利是一定属于我中华民族的。

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十一月六日

根据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出版的
《解放》第五十七期刊印。

注 释

〔1〕指蒋介石。

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 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 纪律的决定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

一 中央委员会

一、根据党章第十章，党的中央委员会在党的全国大会前后期间内，是党的最高机关，在政治上、组织上指导党的一切工作。

二、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须有大多数中央委员出席，方得开会。

三、中央委员会的决议，以到会委员的多数通过而成立。

四、中央委员会审查和批准中央政治局的一切工作和报告，给予中央政治局及一切党的机关以工作方针、训令和指示，并得向外发表各种宣言和文电。

五、中央委员会的决议与文件，凡未经决定发表或向下级党部传达者，各中央委员不得向会外任何人泄露。

六、各中央委员不得在中央委员会以外对任何人发表与中央委员会决定相违反的意见，亦不得有任何相违反的行动。

七、各中央委员如果没有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及中央书记处的委托，不得以中央名义向党内党外发表言论与文件。

八、各中央委员到各地有权参加各级党委的工作及会议，

并有权向之提出政治上、组织上、工作上的意见，考查其情况，直接向中央报告，但中央委员在各地党委担任一定职务者，仍须服从该党委。

九、中央委员如有错误，除在中央委员会及政治局内部进行批评外，在未得到中央委员会或政治局的决定要公开时，各委员不得在口头、文字、报章上向党内外任何人泄露，各委员不得破坏其他委员的威信。

十、中央委员如有违犯纪律及有重大错误发生，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及政治局得依其程度之大小给以适当处分。

二 中央政治局

十一、根据党章第十章第四十条，中央委员会可由其本身委员中选出政治局，其任务为指导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前后期间之一切党的政治的、组织的工作。

十二、政治局规定每三个月左右至少须开会一次。有半数以上政治局委员到会，即得举行会议。会议之决定与通过之文件，须经半数以上政治局委员同意后，认为有效并须立即通知未到会的委员。

十三、政治局有权以中央名义发表宣言、通电及与其他党派之组织机关发生关系。

十四、凡各地中央局、中央分局之负责同志，各省委或等于省委之区党委的书记，各参加全国性的政府与部队负责工作之党员，及中央党报委员会的委员之委任，均须经过政治局的决定或批准。在特殊情形下，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得决定各省委或等于省委之区党委的书记，但必须呈报中央政治局批准。

十五、各政治局委员除开在政治局内部及向国际^[1]控诉外，不得在党内党外对任何人发表任何与政治局决定相违反的

意见，并不得有任何与政治局决定相违反的行动。

十六、各政治局委员未得到中央政治局之委任，个人不得用中央政治局名义或全党名义发表对内对外的言论文件。

十七、政治局委员有权参加各级党委与党的一切机关和部队的工作及会议，并有权向一切党的机关部队提出建议及考察情形报告政治局，但政治局委员在各地党委担负一定职务者，仍须服从该党委。

十八、政治局会议中所讨论和决定的问题，凡未经政治局决定发表时，任何政治局委员须严守秘密，不得向政治局以外任何人泄露。

十九、政治局委员如有错误，除由政治局内部批评外，凡未经政治局决定要公开时，各委员不得在口头、文字、报章上向党内外任何人泄露。各政治局委员不得有破坏政治局和政治局其他委员的威信之言论行动。

二十、政治局委员如有破坏纪律的事实，政治局得以其程度之大小决定处分或提交中央全会解决。

三 中央书记处

二一、中央书记处的任务，是办理中央委员会之组织性质和执行性质的日常工作，并负责招集政治局会议，准备政治局会议须讨论的问题，并向政治局作工作报告。

二二、有四分之一以上政治局委员提议召集政治局会议时，书记处必须召集政治局会议。

二三、中央书记处须完全执行政治局的决议，但中央书记处在政治局会议前后期间，遇有新的重大紧急事变发生，不能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时，得作新的决定，并得以中央委员会名义发表宣言、决议和电文，但事后须提交政治局会议批准及追认。

二四、书记处每星期最少须开会一次，集体的解决中央的日常工作和处理答复各党委的问题。书记处开会时，中央所在地的政治局委员，均得出席。

二五、凡用书记处名义发出之训令、电文、文件，须经过半数以上的书记同意后，方得发出。

二六、各书记、各政治局委员所领导之中央各部工作，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工作，须经常向书记处报告。中央各部重要问题之处理和答复，各部重要人员之任用或派出，均须经过书记处批准。

二七、中央各部得指导下级党委各该部门的工作，但关于各种重要问题须经由书记处指导之。中央各部之间、各中央局之间，得互通情报，并得互相提出建议（可能经过书记处转达），但不得有与中央书记处决定相抵触的建议，并不得有相互的指导关系。

二八、各书记之重要文章及对外发表之重要谈话或重要的报告大纲等，在可能时须经其他书记多数同意方能公布。

二九、中央各部所拟定之重要文件、大纲及工作条例等，须经书记处批准后才能有效。

三十、书记处所讨论之问题，未经决定公布时，各书记必须严守秘密，不得在党内外泄露。

四 各中央局及中央分局

三一、根据党章第十四条庚项，为易于指导各地党的工作起见，中央委员会得按情形之需要在数省范围内成立中央局与中央分局。

三二、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在中央决议、方针及指令之下，代表中央指导各该地区党的一切工作，并得以自己的名义

与各该地区其他党派的组织机关发生关系。

三三、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对于全国性的时事问题在得到中央决议及指令之后，得以自己的名义发表宣言、决议、通电等，但对于仅关当地的地方问题，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得自行决定发表宣言文电。

三四、各中央局、中央分局须完全执行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的决议和指令，并不得有任何违反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的文字与行动。

三五、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的委员，须遵守中央委员会的工作规则与纪律。

三六、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的委员如有错误或不称职时，由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决议处理之。

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十一月六日通过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刊印。

注 释

〔1〕指共产国际。

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 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 与纪律的决定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

一、凡各地党部已经取得合法的地位，并能召集党员大会、党的代表会者，应依照党章召集各级代表会及党员大会，并在各级代表会或党员大会上选举各该级党的领导机关——党的委员会。有监察委员会之党委，监察委员会亦须由代表会选举。

二、各级党的委员会的候选人名单，凡到会代表或到会党员、各该级党的原来的委员会及上级党委，均有权提出，但须经大会主席团汇齐并审查清楚之后，再向代表会或党员大会提出。

三、选举的方法须以候选人个别的提交会议，分次举手表决之，并须付反表决。

四、各级代表会或党员大会选出之党的委员会，须报告上级党委批准。上级党委在必要时并有权指定或取消下级党的委员会之委员。

五、各级党委下的重要工作人员及参加各武装部队、各机关、各群众团体领导机关负责的党员，须经过各该级党的委员会的决定和批准，他们并须完全执行各该级党的委员会的决定。

六、各级党的委员会的常委，须完全执行各该级党的委员会的决定。

七、各级党委的重要文件、决议，须经多数委员或常委之同意，才能发表。各级党委负责人的重要文章及谈话，在可能时须经其他委员同意后发表。

八、各级党的委员会、代表会及党员大会所通过的决定文件，凡未经决定发表者，除向上级党委报告外，各委员、各代表及到会的党员，均不得向会外任何人泄露。

九、各级党的委员会的决定须向下级党委及党员传达者，其传达的事项与内容须经委员会决定，并须指定一定的负责人去传达或用文字传达。

十、各级党的委员会的委员、代表会的代表，除在各该委员会或代表会内部及向上级党委控诉外，不得在党内党外对任何人发表与该委员会或该代表会之决定相违反的意见，亦不得有任何相违反的行动。

十一、各级党的委员会的委员、代表会的代表，须无条件的执行该委员会或该代表会的决定。

十二、各地同级党委相互之间在不妨害秘密工作范围内，得互通情报，并得互相提出建议（尽可能经过上级党委转达），但不得有指导关系，并不得有违反上级党委决议指令之建议或情报。

十三、各级党的委员会的委员、代表会的代表，如果发生错误，除在该委员会或该代表会批评并向上级党委报告外，凡未经上级党委、该委员会或该代表会决定要在党内及党外公开批评时，各委员、各代表不得在口头上、报纸上、文件上向党内外任何人泄露。

十四、凡党员对各级党委、党的负责人与上级党委在政治问题与工作原则问题上有不同意见，经过讨论后不服者，得向上级党委申诉，并得越级直接向中央及党的最高负责人申诉。但在上级党委没有指令改变前，仍须服从原来的决定，并不得在党内党外有任何反对组织、反对上级党委的言论行动。

十五、凡党员受各级组织的处分不服要求取消或改变处分者，得按级向上级党委控告，直到中央，但不得在党内党外有任何反对组织的言论行动。

十六、各级党委如果接有党员及下级党委的控诉书要求向上级党委转达者，各级党委必须转达。

十七、凡党员对于党的负责人及党在群众中的领袖有意见与批评时，除开负责的向相当的组织、党的负责人提出必要的批评外，不得随便在同志中及群众中任意批评他们的长短、错误与缺点。

十八、各级党的委员会的委员，如有破坏纪律或犯有重大错误时，该委员会或代表会得依其程度之大小决议处分，但必须报告上级党委批准。如有监察委员会者，须经监察委员会审查决定。

十九、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党的一切工作由中央集中领导，是党在组织上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各级党的委员会的委员必须无条件的执行，成为一切党员与干部的模范。

二十、各级党的委员会为了了解下面的情况、便利于工作上的指导起见，上级党委得向下级党委派遣巡视员，传达上级党委的意见，考察下面的情形报告上级党委。巡视员对于下级党委有意见时，应该向下级党委建议，由下级党委决定执行与否，巡视员没有决定与强制下级党委执行的权力。但在特殊情形之下由上级党委委托，授巡视员以此项特权者除外。

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十一月六日通过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刊印。

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 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 机构的决定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

为了适应目前战时环境与党的工作，党的各级组织机构必须加强和有所改变，兹特决定如下：

一、在敌人后方各级党委所担负的工作区域，应依照敌情、地形及战略关系与行政区分重新划分，由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及区党委决定，报告上级党委批准。

二、在敌人后方各中央局、中央分局之下，得设下列各级党的委员会：

- (1) 区党委员会（简称区党委）；
- (2) 地方党委员会（简称地方党委或地委）；
- (3) 县党委员会（简称县委）；
- (4) 市党委员会（简称市委）；
- (5) 分区党委员会（简称区委或分区委）；
- (6) 支部委员会（简称党委或支部）；

必要时在支部委员会之下得设支分部委员会（简称支分部）。

为了开辟附近地区党的组织，可设立临时的中心县委、中心区委及中心支部等。

三、各级党委所指导之下级组织，以不超过八个单位为适宜。

四、区委以上各级党的委员会之下，得分下列各部办事：

(1) 组织部——管理组织的发展，党员登记，干部的考察、征调和分配及征收党费等。

(2) 宣传部——管理对外宣传，对内教育，及党所指导的报纸、学校、训练班等。

(3) 战事动员部——动员武装人民及武装部队参加抗战等。

(4) 民运部——管理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儿童各种民众运动及民众团体中党员的工作，在民运部内得组织工人、农民、青年、妇女等委员会。

(5) 统一战线部——管理对友党联络及各机关中之党员的工作。

(6) 秘书处——管理文书、庶务、会计等事。

在秘书处及各部之下，得视事务之繁简，分为各科办事，设科长科员若干人。

上列各部，在我军后方之各地党委得依情况变通办理。

五、由各中央局决定，在区党委之下，得设监察委员会。监察委员会的职权如下：

(1) 监督各种党的机关、党的干部及党员的工作与对于党的章程决议之正确执行。

(2) 审查党的各种机关之账目。

(3) 管理审查并决定对于违反党章党纪之党员的处分，或取消其处分。

(4) 审查并决定所有要求恢复党籍或重新入党者之党籍。

(5) 监察党员关于破坏革命道德的行为。

区党委下之监察委员会的委员须有三年以上的党籍，但得兼职。

六、监察委员会的决定，一般须经过当地党委员会之批准。上级监察委员会有权改变或取消下级监察委员会之决定。

七、支部委员会之下，不设各部，由各委员分掌组织、宣传、民运、统一战线、战争动员等工作，必要时得组织各种专门工作委员会。

八、各级党委的各工作部门，对于下级党委的各该部门，均得指导其工作，但关于各种重要问题的指示，应经由各该级党委员会行使之。

九、各级党委为了便于处理组织性质及执行性质的日常工作，得由委员会全体会议推举各级委员会的书记及常务委员数人组织常委。

十、各级党的委员会及常委的会议，可以分为两种：一是经常会议，只有各该级党的正式委员有权利参加；二是扩大会议，讨论各种更带一般性质的问题和事项，除开各该级党的正式委员参加外，候补委员及其他有关系的工作人员亦可吸收其列席，并有发言权。

十一、各级党委各工作部门的会议，亦可分为扩大的与经常的两种。

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十一月六日通过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刊印。

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 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

(一) 扩大的六中全会认为，在不久的将来召集党的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全中华民族进行长期持久的民族自卫战争，争取对日抗战最后胜利，以谋中国独立、自由、解放的神圣事业上，对于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民团结、国共长期合作的事业上，对于党的工作更加进步与发展上，均有严重的历史意义。因此，六中全会批准中央政治局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关于召集党的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并同意准备委员会向全会提出的报告。

(二) 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中心任务：是在于讨论和规定在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坚持巩固和扩大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下，动员全民族的一切生动力量，团结起来，克服当前的困难，进行伟大的抗日战争，争取和保证抗日战争最后的胜利。大会要以中国共产党的统一与团结成为全民族团结的模范，它的一切工作要实事求是的解答今天克服困难、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一切主要问题。

(三) 扩大的六中全会向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建议如下的主要议事日程：

(1) 团结全民族一切生动力量，争取全中国人民对日抗战的最后胜利。

(2) 动员工人阶级积极参加对日抗战工作。

(3) 在新条件下党的建设问题。

(4) 改选党的中央领导机关。

(四) 具体的加紧完成准备召集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一切必要工作，在较短时期内召集之。

(五) 各地参加大会代表的名额，依各地党员的数量、质量和各地在抗日战争中作用的重要性分配之。代表的产出，除了某些因环境关系不能进行民主选举的地区外，须尽可能作到用民主方法选举代表。

(六) 各地代表由各地省的或区的代表大会选出。八路军、新四军的代表，由师的党代表大会或支队党代表大会选出。在特殊条件下，不能召集上述代表会议时，由各地中央局或军队的政治部按照实际情况酌定办法。

(七) 地方党部的选举方法由各地最高党部决定。

(八) 各地党部应迅即向全党党员解释七次大会的重大意义，动员全党在坚决执行六中全会决议的实际行动中，努力从政治上、组织上、技术上进行大会的准备工作，保证大会的成功。

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十一月六日通过

根据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出版的
《解放》第五十七期刊印。

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 告全国同胞、全体将士和国共 两党同志书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

我中华民族为了抵御日寇的侵略，进行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已经十六个月了。在伟大的民族抗战中，我中华民族获得了空前的进步：全国上下一致团结起来了，各党各派携手合作了，国民政府与国民革命军坚强的统一了，政府与人民、军队与人民之间的关系渐渐改善了。战争的烽火锻炼着整个民族，惊醒和激怒着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民，使他们逐渐的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了。广泛的游击战争，正在敌人后方开展着，创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牵制、疲惫与消耗了敌人的力量。这一切，都使得日本法西斯强盗，虽然花费了十六个月的时间，消耗了数十万的兵力，数十万万的经费，终不能实现其“速战速决”的迷梦！

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谨向坚决领导抗战的民族领袖蒋^[1]委员长致崇高之敬意！并以无限的热忱与慰问之敬意，致之于前线全体抗日将领，全体政治工作人员，全体抗日战士，全体游击队指战员，中央及各级地方机关的领导者与工作人员，以及领导民众运动的全体爱国志士之前！中国在抗战中所得的成绩是数十万先烈的鲜血换来的，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谨向抗日战争中壮烈牺牲的将士们、民众们，致沉痛的吊唁！

在十六个月抗战中，因为敌我力量的悬殊，丧失了许多土地、城市与铁路，全国人民遭受了很大的灾难。现在武汉失守，广州沦陷，战线已由华北、华中伸展到华南。敌人正在继续进攻，并已扬言将西安、宜昌、衡阳、北海以东地带置于其侵略目标之下。无疑的，这是一个严重的时期。在这时期中，我国的抗战将遭遇到比前更多的困难，成为我民族解放斗争中最艰苦的一段路程。

然而我伟大的中华民族，决不因这些困难而对抗战到底的决心稍有动摇。蒋委员长十月三十一日告全国国民书中所昭示全国的抗战到底的正确方针，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特表示全部的赞同与忠诚的拥护。在抗战的目前时期中，我们的困难固然加多，然而我们的力量是在不断的锻炼、进步与增加中。我们遭受很大的损失，然而全国上下一致坚持持久抗战的决心更加坚固了。我们忍痛放弃了许多城市与铁路，然而作战行动因为某些点线的放弃而更加主动自由了，日寇与亲日分子利用困难正加紧其破坏我团结、引诱我屈服的活动，然而国共合作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更加进步与巩固了。全国很多的英勇抗战将士已为国牺牲，然而几百万的军队是锻炼得更加坚强了。广大的民众受到了日寇骇人听闻的蹂躏，然而民众已经奋起抗战并逐渐组织起来了。日寇占领地区增多，然而敌后的游击战争与抗日根据地也随着扩大与巩固了。我们的财政经济更加困难，然而慷慨捐输、减薪缩食是更加普遍了。日寇在中国更加前进与深入，然而敌人因战线延长、兵力不足、前后受敌，将更要疲于奔命了。所有这些，都说明抗战虽存在着许多困难，然而我国却已有了空前的进步。从今以后，全国上下一齐努力，在已有进步基础之上获取更大的进步，就使我伟大中华民族一定能够克服困难，增加力量，停止敌之进攻，转弱为强，准备我之反攻，以驱逐日寇，还我河山，求得我中国之彻底解放。

全国各界同胞们！在这抗战的紧急关头，在这转败为胜的枢纽时期，每一个黄帝子孙都应负担起重大的责任。我拥有五千年文化、四万万五千万人口之伟大中华民族的每一分子，都应当提高自己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不畏难、不怕苦、不悲观、不失望，视日寇为死敌，视汉奸为世仇，与日寇作殊死战，反对一切傀儡政权，誓死奋斗，不屈不挠，上前线去，到军队中去，当游击队去！在生产中的工农提高生产热忱，拥有财产的富人应输财献金，以克服财政经济上之困难；在国外的华侨，应加紧其活动，以增加抗战的外援；在国内的各民族，应加紧团结，以求共同抗日图存。我各界同胞应赶紧组织起来，以增加抗战的力量。我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团结一致，拥护和参加长期抗战，这是战胜日寇最基本的保证。

英勇的前线将士们！你们的英勇牺牲精神，已经引起了全国全世界的赞叹。在这新的抗战形势中，应当更沉着，更英勇，舍小我，顾大局，为国捐躯，视死如归；更应锻炼我抗日军队和游击队，改进政治工作，加紧军事训练，求得军民一致，官兵一体；尤应建立新军，提高军事技术，巩固各军之间的亲密团结。全国所有武装队伍，都应在蒋委员长统一指挥下，服从命令，遵守纪律，进行持久抗战、全面战争，与争取主动。抗战军队的巩固与扩大，是进行持久战和战胜日寇的最基本条件。

中国国民党及一切抗日党派的同志们！日寇所怕的，更没有比中国人民的团结统一更利害了。当此战局转向新的阶段之际，日寇一定加紧其挑拨离间的阴谋，这就要求国共两党及一切抗日党派更进一步的亲密团结。我党六中全会再一次的声明：三民主义为国共两党合作及整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政治基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六中全会再一次表明：本党对于蒋委员长和国民政府的诚心诚意的拥护。并更明确指

出：国共两党及一切抗日党派，在抗战中及抗战胜利后所奋斗的共同目标，乃是三民主义的新中华民国。同时六中全会又决定：不在国民党中央及其军队中成立共产党的秘密组织，并主张共产党员用公开的交名单的方式加入国民党与三民主义青年团。这一切，都是为着巩固团结，避免误会与磨擦，巩固国共长期合作与长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对于坚持抗战、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是有伟大的历史意义的。

中国共产党的同志们！抗战以来，很多的共产党员已经作了壮烈的牺牲，显示了他们应有的作用。扩大的六中全会，谨以同志的热情与无限的哀悼，致之于本党烈士之前！同时全会号召全体同志，继续发扬先烈的光辉，到战争的最前线去，到敌人后方去。把我们的热血和能力全部贡献给抗日战争和民族解放事业，拥护蒋委员长和国民政府，参加抗战建国事业的各项工作。以真诚恳切的态度对待友党友军，以互助互让互相学习的立场与友党友军发生亲密关系，成为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模范。以共产党员应有与固有的英勇气概、热烈胸怀、坚定意志、冷静头脑和艰苦作风去对付一切困难和一切变动，团结全党为一体，去完成我党在抗战建国事业中伟大光荣的任务。

同胞们！战士们！同志们！我们无论如何要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坚持国共两党的长期合作，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与团结四万万五千万黄帝子孙的生动力量去停止敌人的进攻，准备我们的反攻。我们坚决相信，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取得中华民族独立与解放之目的，是一定能够达到的。

民族自卫战争胜利万岁！

国共两党长期合作万岁！

继续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

独立、自由、幸福的三民主义新中华民国万岁！

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十一月六日

根据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出版的
《解放》第五十七期刊印。

注 释

〔1〕指蒋介石。

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闭幕词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

王稼祥

同志们！中共六次扩大的中央全会开了一个多月的会议，现在结束了。这次得到了大的成绩，大的进步。大会中所估计所想的问题，在大会结束时已变成了事实。此次会表示我们已掌握马列主义，以之分析具体的复杂的环境，定出正确的政策与方针。此次大会表示了党的团结与一致。此次会在党史中占重要地位，总结了过去的经验，定出了工作，将会完成光荣的任务。此次会在中华民族史上亦有重大的意义，推动抗日战争走向最后胜利。

此次会是胜利的完成的！

扩大的六中全会万岁！

英勇奋斗的中共万岁！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
《王稼祥选集》刊印。

中共中央政治局 关于中原局委员会的通知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九日)

兹特决定以胡服^{〔1〕}、朱瑞、朱理治、彭雪枫、郑位三为中央中原局委员，以胡服兼中原局书记。所有长江以北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地区党的工作，概归中原局指导。特此通知。

十一月九日

右通知雪枫，前总，恩来^{〔2〕}，重庆各台。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刊印。

注 释

〔1〕 即刘少奇。

〔2〕 即周恩来。

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 北方局及分局委员的通知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九日)

兹特决定：

(一) 以朱德、彭德怀、杨尚昆、聂云臻^{〔1〕}、关向应、邓小平、彭真、程子华、郭洪涛为中央北方局委员，以朱德、彭德怀、杨尚昆为北方局常委，以杨尚昆兼北方局书记。

(二) 以郭洪涛、徐向前、黎玉、张经武为北方局山东分局委员，以郭洪涛兼分局书记。

(三) 以聂云臻、彭真、关向应、程子华为北方局晋冀察分局委员，以彭真兼分局书记。特此通知。

十一月九日

右通知前总，北局，动委会，聂台，路东徐宋^{〔2〕}，山东，恩来^{〔3〕}，重庆各台。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刊印。

注 释

- 〔1〕 即聂荣臻。
- 〔2〕 指徐向前、宋任穷。
- 〔3〕 即周恩来。

中共中央书记处 关于冀南工作的指示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北方局、冀鲁豫区党委、一二九师：

我们听了冀南来延同志的报告以后，认为党在冀南获得了很大成绩：在平原在磨擦利害的冀南区域坚持了游击战争，扩大和锻炼了党及八路军，部分的改造了政权，组织了群众运动。对于今后工作除了中央最近的关于政治形势、关于巩固党、关于群众工作、关于锄奸等决定及指示外，特提出下列意见以供你们的研究：

（一）在军队方面，除了巩固主力兵团东纵青纵外，区党委必须以最大努力来巩固和扩大地方党所领导的地方游击队，这些游击队必须成为同本地群众血肉不可分离的真正与群众打成一片的武装部队，由保安队、警察及土匪改编的县游击队必须加以大的改造，一切游击队的干部应尽量做到是本地干部，各级党委委员应当兼游击队的司令员、政委及政治部主任等，以便掌握游击队在最好的干部手中，同时依靠游击队来进行地方党的政府的及群众团体的工作。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坚持困难日益加多的平原游击战争。

（二）对统一战线方面，我们认为：

A. 须要总结过去的经验以供七大讨论的材料，因为这个区域是磨擦利害的地方（其他如群众工作、妇女及青年工作，

亦希总结)。B. 坚持原来立场，坚持主任公署，绝不轻易让步，坚持改造政权，坚持改善群众生活的比较激进的政策，工农群众是坚持敌后抗战的主要的力量的根本的力量。C. 对地主资本家采取中立孤立麻痹的政策，但不要认为他们都已是汉奸或者在同一时候都去当汉奸，应当区别他们间的不同成分而定我们不同的态度。士绅座谈会的方式是有用的，但应防止其成为团结士绅的机关，亦不宜在乡村一级采用。

（三）在民众运动方面除了中央指示外，希望注意继续改造区村政权和注意工会工作的建立。

（四）在党的问题方面，冀南党的发展是经过突击月、冲锋月、国难月的突击发展，因此目前整理与巩固工作成为中心，必须注意党员成分之改善。据我们与来延的下级同志谈话，在村的党领导机关内，富农尚有一个相当的数目，而且下层干部阶级意识非常薄弱，这应当引起区党委的最大注意，其他如干部调动工作太快、干部中还存在某些无原则斗争的现象，亦应纠正。

中央书记处

二十三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刊印。

毛泽东等关于建立 大青山游击根据地及党的政策 给周士第等的电报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周甘^[1]转李井泉：

(一) 大青山北靠外蒙，敌正重视，察热游击战争尚未开展，又形孤立，欲在那里建立冀察晋型的根据地，在今天则不可能，但坚持长期游击战争，建立游击根据地，完全可能，而且是中心任务。

(二) 故那里一切政策应以长期游击战争性质为出发点。

甲、组织伪军反正应避免过早不必要的零散爆发，惟须估计到反正情绪不可抑制时或已爆发以及军事上必要时，则毅然行之。但一般的工作，应适应长期性这一原则。

乙、反正前后应使其意识到物质条件的困难与斗争的艰苦性。反正后一般地应争取属于八路军指挥的名义，在斗争过程中改造或改编之，最好争取它靠近晋西北或晋察冀边区，但不勉强。为人作嫁，反增以后困难。

丙、对大股土匪或半土匪性质的自发抗日武装，应采取上层联络与影响推动和帮助它进步，勿造成对立以增加我们游击队和地方工作的困难。对零星土匪则可消灭之，仍须对之以礼貌，勿乱杀人。

丁、对于静漪之自卫军估计到与傅的关系，应采取上层联

络以及帮助推动它进步，不采取分化瓦解的方针。

（三）绥远问题，须处处照顾到与傅作义的统一战线，对绥远当地上层统一战线与对伪政权等策略，应不违背长期游击战争这一特点。

（四）另一基本任务是：团结蒙汉人民联合抗日，以我们正确的少数民族政策来改变中国过去传统的错误政策，我们做成模范来推动影响国民党，首先是傅作义的转变。

甲、估计蒙民的民族意识，蒙民对王公的信仰，对德王^{〔2〕}仍应采取争取的策略，继续执行要求德王回头抗日的口号。

乙、对蒙人要求收回汉人侵占的土地，应使汉人出相当代价立约收买或作租佃纳租，地方政府应依具体情况分别公正处理，以团结蒙汉联合抗日为原则。

丙、尊重蒙民风俗习惯、宗教并发扬其文化，勿侵犯蒙民利益，特别是收买马匹。必须切实教育部队。

丁、吸收蒙人中知识分子，培养蒙民干部，做蒙民工作。

（五）须向绥察边与铁路以南发展与工作，多繁殖地方游击队，培养地方干部与群众的领袖。

毛王杨贺关^{〔3〕}

迴（二十四日）

根据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刊印。

注 释

〔1〕指甘泗淇。

〔2〕即德穆楚克栋鲁普，蒙古王公。一九三六年五月在侵华日军的策划下，伪蒙古军政府成立，德王任总裁。

〔3〕指王稼祥、杨尚昆、贺龙、关向应。

毛泽东等关于冀热察区工作的 意见给朱德等的电报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朱、彭、聂并转宋、邓⁽¹⁾：

我们对冀热察区工作有如下意见：

一、宋邓支队深入冀东苦战数月，配合并促成地方党所领导的冀东起义，恢复了冀东的中国政权，发动了群众，建立了冀东的游击区，扩大了我军在敌深远后方的政治影响，给敌人以打击，一般说来是获得了成绩的。但是没有尽可能地保持并发展这一胜利，没有很好地团结地方党及军队，没有很镇静地应付那里的局面，以致退出原地区，军队及群众武装受到相当大的损失。

二、估计冀热察区的军事政治环境，认为那地区有许多有利条件是可能坚持游击战争创造游击根据地，但是也有许多困难要在长期艰苦斗争中才能达到，因此决成立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派萧克同志前往工作，并成立军政委会，统一领导军队及地方党、政权工作，军政会须有地方党及地方军队的领导者参加，名单待萧克、彭真到冀察晋后，由北方分局提出交中央批准。

三、萧不日将由延安起程经晋西北到冀察晋，指挥机关由延安拨出一部干部并由贺萧关⁽²⁾负责成立之。

四、两支队目前应在平绥路南各择适当地点整理训练补

充，主要工作如下：

甲、加强政治工作，鼓励士气，根据我们对宋邓工作估计来检察工作，主要是检查经验教训。

乙、加紧干部教育，集中一部老战士办教导队，部队中的干部则开办流动训练班或临时集合训练。

丙、严密军政组织，整顿纪律，肃清游击习气。

丁、派出政工人员在附近地区进行补充扩大工作，收买武器特别是弹药。

戊、在休整期中应避免无把握的不必要的战斗，敌如进攻则利用山地在有条件下打击之，如十分必要，可靠近冀察晋边。

五、两支队须团结一致，靠拢时须集中指挥，建立集体领导，完成休整任务。

六、与冀东须保持联系，冀东地方干部如不能时须立即派回一部工作。

毛、王、杨^{〔3〕}

二十五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指彭德怀、聂荣臻，宋时轮、邓华。

〔2〕指贺龙、关向应。

〔3〕指王稼祥、杨尚昆。

陈绍禹等关于同蒋介石谈话 情况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报告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三日)

中央书记处：

我们昨见蒋，对六中全会后毛^[1]信问题，蒋谈毛信他未见过，后又谈因事多，即或许看过也忘记了。对两党关系问题他说：共产党员退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或共产党取消名义将整个加入国民党，我都欢迎，或共产党仍然保存自己的党我也赞成，但跨党办法是绝对办不到。我的责任是将共产党合并国民党成一个组织，国民党名义可以取消，我过去打你们也是为保存共产党革命分子合于国民党，此事乃我的生死问题，此目的如达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战胜利了也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我的这个意见，至死也不变的。共产党不在国民党内发展也不行，因为民众也是国民党的，如果共产党在民众中发展，冲突也是不可免。三民主义青年团章程如果革命需要可以修改，不过这是枝节问题。根本问题不解决，一切均无意义。我们分别解释：一个组织办法做不到，如跨党办法做不到，则可采取我们提议的其他方式合作。蒋答：其他方式均无用。蒋说此问题时态度很慎重，见我们对一个组织问题不同意，即说：绍禹同志到西安时我们再谈一谈。同时晚间并派张冲来说委员长他太率直，并非说不合并只要分裂，请不要误会。

陈、周、博、吴、董^[2]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三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指毛泽东。

〔2〕指周恩来、秦邦宪、吴玉章、董必武。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 彭德怀同蒋介石谈判内容 给陈绍禹等的指示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王明、林伯渠、彭德怀并告朱、周转凯⁽¹⁾：

甲、彭在西安与老蒋谈判内容，我们有以下意见：

(1) 华北军事指挥问题：解决指挥问题，为华北抗战成败之先决条件。提议：凡八路军占优势而为主力的地区，一切军队包括友党之游击队及地方自卫队，应归八路军指挥。凡友军占优势之地区，一切部队概归友军指挥。所谓地区应以战略区域为单位，争取委任朱德为一个战区的副司令长官。

(2) 为坚持敌后抗战之利益，华北之军事指挥与政权应该合一，即军官兼地方官，而不是省主席兼游击司令。提议：华北各省区重新划分，不照过去省界，而依游击战之形势定之。某些省区及其所属各县之行政长官，应要求委任八路军将领及政治工作人员充当之。否则各省府与八路军及其他友军之磨擦，必有利于敌。

(3) 在要求划某些地区行政权给八路军而谈判顺利时或有必要时，我们可以表明放弃某些地区如冀中、冀南、平原之一部给鹿⁽²⁾及其他友军，在该地区中之八路军及其游击队可以退出或完全听从指挥，该地区中八路军所委之县长亦可让出，我们可以不再去发展武装力量，以求实现以划分区域为基础的增进合作与消弭磨擦。

（4）对最近河北、山东之磨擦，特别是武装冲突事，应向老蒋申诉，并抗议鹿沈^{〔3〕}等之无理，说明这些磨擦如不解决将成华北抗战可能失败之重要原因，我们正在把材料整理好电告你们。

（5）为坚持敌后方之抗战，军队必须改造，改进政治工作，加强游击战之训练，改进军民关系，加强部队各级指挥官之机动性，政权必须民主化，增进政权与人民间之关系，群众抗日运动必须扶持，在敌后应实行适当的财政经济政策。

（6）对两党合作方式问题：我们已有一电请参考，对我部队去华中事先试探一下，然后再决定此刻应否向蒋再提出。

乙、彭在将领会议上之立场，我们有以下意见：坚定各将领之抗战信心，强调团结统一之重要，特别是在敌后方斥责制造磨擦之有害，介绍八路军抗战之各方面经验。上述与蒋谈判之具体问题，除第五项外，不要在会议上提出。

中央书记处

二十三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指朱德、周恩来、何克全。

〔2〕指鹿钟麟。

〔3〕指沈鸿烈。